#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 著

下册

中华书局



## 草原与河川之抗争

我们知道，民族移动（völkerwanderung），是历史的主要动力之一。有史以来民族移动之潮流，无论中外，其策源地实在今日中亚北亚（包括我国满蒙新疆）。此大而言之，可称欧亚大陆（Eurasia），小而言之，可称中国伊朗之间（Seriran）。折衷而言，可称中国巴比伦之间（Ser-Mesopotamia）。这实在是历史枢纽之所在。不幸我国历史，只详于玉门关以东，长城以南。而西洋历史，只详于黑海以西，里海以南。由于这一带常为旋风之中心，及居民之缺乏历史乃至于文字，玉门黑海之间，长城里海以外，竟是历史的一大空白。直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我国经营西域以后，才有若干记载，然而大部分是附带性的。这是史学界最大的恨事。如果这空白不能填补，世界历史不仅不能圆满，甚至许多问题，可变成无根之谈。这是史学界之处女地。直到最近，由考古学家在西亚及欧亚大陆草原一带之发掘和研究，使我们对于先史时代到历史时代之间人类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而生的分化与斗争，有较明确之概念；〔注五一〕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所谓“汉学家”，对中西历史文献，作了许多比较研究，使我们对中西历史交涉，也有较明白概念。〔注五二〕这离打开历史之锁之日尚远，但这一历史空白区域，大见光明了。历史不一定本为整体，但必趋于整体。而这整体之结合点，实在中国大西北方面。所以我想先对有史前后欧亚大陆情况，尤其是中巴与中伊之间历史作一概观。

由自然环境不同，人类文化发展，自始不均齐。在旧大陆，东自蒙古高原，横断新疆中亚，西至南俄匈牙利，南经伊朗阿拉伯高原，至萨哈拉大沙漠，形成一连续而单调的欧亚与亚非草原沙漠地带。而在亚非草原之北，欧亚草原之南，则有河川平原地带。草原地带之北之东，为森林及滨海地带。草原河川之间，为山岳及盆地。当河川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草原地带居民非不知新石器技术，但仍保持旧石器时代工具。盖对付鸟兽之皮，旧石器仍有用也。及河川民进入青铜时代，草原民及山岳民均采用之，但各用以适应其环境。山岳民常为河川民之后补者。而森林地带之居民，有原住森林地带者，亦有游牧民失败被迫逃于森林中者；于是有南下而为游牧民之后补者的，亦有被穷追，远至北冰洋，至今仍继其渔猎生活，而表现为中石器或骨角

器文化圈的。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旧大陆的居民，即分化为两大系统：一是由亚欧到亚非大陆草原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次是河流平原地带的农耕民族。而在二者之间的山岳盆地，则有半农半牧的民族。游牧民外，则为林木中之狩猎民。

气候之变动，文化发展之不均齐，常促成民族移动与斗争。在远古时代，空间甚大。及干燥作用(desiccation)或水灾等事发生，人类尤其是游牧民，追求水源，发生移动；而邻近的农牧两种人民，最初发生集团冲突，而冲突且日益扩大。山岳民与森林民有时是缓冲者，有时是参加者；或为失败一方之就近继承者。而最富于动力性者，则为游牧民。尤其是在游牧民统一森林民后，或者森林民统一游牧民而游牧化后，常为历史上之扰乱因素。

从来民族之斗争，似有三大方式：一是南亚洲之草原民族(阿拉伯)对其北面农耕民族，以及北亚洲之草原民族对其南面农耕民族间争夺水源之争；二是北欧洲的海边森林民族与南部农商民族争夺海岸之争；三是东亚与中亚，中亚与西亚(欧洲本为亚洲半岛，埃及在亚欧之端，皆包括在内)争夺商路之争。前二者是南北之争，后者是东西之争。三者常以"两海之间"〔注五三〕(新疆中亚)，小亚细亚(土耳其及叙利亚)为通道与焦点。

三者之中，最为重要，而与我们关系亦最大者，是第一种南北斗争，即北牧民对南农民之斗争。不过，游牧民对农耕民之进攻，常因农耕民文化较高，技术占优势而不能顺利，如是向东西伸张两臂，采取钳形攻势。而当农耕国家之内或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反而常为游牧民进攻农耕民的机会。另一方面，农耕民为了防御游牧民，亦常向东西两方面扩张领土，或同盟范围，以增强实力。所以南北战争，亦必促进东西之合并或合作。

有史以来，我们便看到游牧、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之入侵，或破坏他们之间的商道。在中国，有玁狁戎狄匈奴之属之对黄河流域之南侵，由此进入内蒙甘肃青海西藏以及北印(此段过程在秦汉以前最不分明)。再西，有各种游牧民族对伊犁、塔里木二河，阿姆、锡尔二河，以及印度、恒河二河之夺取，由此进入波斯印度；对两河流域(米索布达米亚)之夺取，由此进入波斯与高加索，土耳其与埃及，因而巴尔干与西班牙。

此外伏尔加河与第尼泊河，多瑙河与莱茵河一带，亦有同类情形。许多文明民族在盛时都能将这潮流推走，甚至在对抗中发展武力，乘势建立

统一帝国。而在衰落之时，即为此潮流淹没，或等待机会再起。中国亦复如是。民族与帝国之兴亡，文化之摇篮与坟墓，都在这潮流的源头，尾闾和两岸。

自古迄今，人类史实为此南北战争与东西离合之交错。

在中国以西，除了巴基斯坦的情形尚有待于澄清外，我们已经知道，苏末人和埃及人最初进入农商文化。历史之第二幕，是游牧民的闪族（Semitic）登场。他们在当时原是蛮族，其故乡也许是阿拉伯。大约公元前四——三千年后，他们一批一批到两河流域。自前二八五〇年苏末人王国起，他们造成无数王朝之兴灭。他们来来去去，亦自相攻伐，与埃及人及其他蛮族战争。其中下层阶级，连着其他难民，则到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海边，向海上发展（如腓尼基）。前十四世纪，有亚拉美亚族中希伯来人之登场。他们先破坏了许多文化，然后来学习文化，并对人类今日文明作了基本的贡献。到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止，他们是西亚乃至中亚的主人。但在闪族文化最发展时期，在欧亚草原森林，即中亚北部，还有两大群蛮族。一是在东在北操乌拉阿尔泰语的，二是在西在北操雅利安语的。〔注五四〕前二〇〇〇年后，所谓雅利安人（自然连带一部分乌拉阿尔泰人）开始一批批出台。最早者也许是赫梯人（Hittites）、卡西特人（Kassites）、米坦尼人（Mitanni or Hurrians）。他们是由中亚将马带到西亚的。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和以后，则有印度人波斯人之南下印度波斯，弗里基人（Phrygians）吕底亚人（Lydians）希腊人之进入巴尔干，以及拉丁人克尔特人之西进欧洲。到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在各处取闪族而代之，唯始终未入阿拉伯。〔注五五〕大概而言，公元前三千年以降，中亚以西，经常在一大战国时代。（参看 A. C. Haddon，“The Wanderings of Peoples”；威尔士，《世界史纲》。）

这和我们纵非无关，但在春秋以前，中国因不在这漩涡之中，所受影响甚小。我们打开地形图，可以看出蒙古新疆和青康西藏两大高原外围的高山，以“世界屋顶”之葱岭（帕米尔）构成一个箭头，指向西方，隔着东亚与中亚。此天然之障碍，使中国在春秋以前，得以保持光荣孤立，不受外来干扰，发展我们的古典文化者，其故即在于此。但我们又可看到，在此箭头的斜面，有一些缺口，形成险峻谷形通道，由阿姆河上游伊犁河上游通到塔里木盆地，而到甘陕。此即李希霍芬（Richthofen）所称“丝道”（Silk Road）。另外南经西南夷者，为“香道”（Spice Road）。此外，北由阿尔泰山斜面经准噶

尔门(Dzungaria Gate)有谷峡通河西;或绕萨彦岭迤东,由西伯利亚,经过外蒙满洲,亦有许多纵断谷地,特别是满蒙交界处的尼布楚、札赉泊、呼伦贝尔一带通到辽东华北。这条路我拟称为“胡道”。〔注五六〕这两条路,在遥远古代,必早为西域与塞北民族东来与南下道路。但在战国以前,规模不大。其状态有如缓缓溪流。所谓玁狁戎狄貉氐鲜卑,人数不多,武力亦不算强大,并未给中国以大的威胁。不仅此也。他们且是中国与塞外民族之缓冲者。然而战国以后情形不同了。强大的游牧民族群,以其坚强武装,由新疆蒙古满洲一带压到中国,其形势则有如急流和潮涌;并挟其他半游牧及半狩猎之民而俱下。立于此潮流之首者,即是匈奴。并且自此以后,继之而来者,源源不绝。中国的孤立就被打破了。左宗棠说:“伊古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其由来即在于此。而中国被迫西进,为攻势防御,因而使中国进入亚洲史,其原因亦在于此。

自古以来,统一帝国之成立,皆以与外族抗争(或对抗游牧民族,或征服半游牧民,或对其他农耕民及帝国抗争,或以被压迫者起而对帝国革命,取而代之)为契机。古亚加德帝国(公元前二四五〇年),古巴比伦(前一八八〇年),埃及新王朝(前十六世纪),亚述(前十一至七世纪),加勒底(新巴比伦,前七至六世纪),波斯(前六至四世纪),希腊(前五世纪)诸帝国皆然。阿育王之统一印度(前三世纪),亦大体相同,他除对抗游牧民族外,同时是对抗亚历山大帝国之东方部队的。而西北边患,则是正所以促成秦汉帝国应运而出的。

匈奴之出现,并不是一个局部的事实。在公元前十二——八世纪,即西周时代,世界日趋安定。过去许多蛮族,如赫梯人及米坦尼人等,均在征服文明民族后建国,后来为其他蛮族征服。继赫梯而兴者,是亚述。他在八世纪,统一巴比伦,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东并伊朗(包括米太、波斯),为世界最早之大帝国。此后他已不事侵略,其首都尼尼微,为中亚文化中心。大的庭园与狮子雕刻,代表他的艺术作风。此外犹太人,弗里基人,吕底亚人,希腊人,印度人,米太、波斯人,罗马人,均由野蛮进于文明。在公元前七世纪初,由西欧到中国,如地中海一带之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东至波斯印度,均已建立城市与国家,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财富与文化。而这时候,在欧亚草原沙漠地带,出现一群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扰乱因素。他们一方面羡慕南方的财富,一方面由南方农耕文化国家输入技术(铜器),改善其

武器，并学习农耕民族的军事技术，以适应其马队。如是游牧民族变为一种骑马民族。此时他们发动全大陆性的南北战争，而亚欧多事了。纪元前七世纪起(即春秋初)，自巴尔干南俄至中亚及西伯利亚，发展了一些骑马国家，此即前面提到的基美利人、塞契特人，和萨马特人。〔注五七〕尤其是后二者，已有王国组织。他们是骑马使剑的武士，强迫被征服者为奴。他们发明了一种铜器的武器(短刀长箭)，车具马具；随塞契特而来者，还有一种“动物作风”(Animal Style)的艺术。公元前六至三世纪，即我国战国时代，西自多瑙河，经西伯利亚草原东至蒙古长城一带，普遍发现所谓“塞契特·西伯利亚·绥远文化”。自西至东，即塞契特·萨马特(Scyth - Sarmaritians)，塞种(Sacae)，坚昆·丁零，匈奴，此四者各以南俄、哈萨克、阿尔泰山北麓、长城地带为基地、向南方农业国展开攻势。而月氏亦出现于祁连山(详下)。西方之塞契特及东方之匈奴，最为凶猛。前六世纪时，大流士尝在南俄为塞契特人击败。前五世纪后，塞契特人与希腊人通商和战争。不久，匈奴对中国的情形，亦复如此。

如是中国便面临一个“全新的敌人”。匈奴如《汉书》所言，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这与过去的蛮夷戎狄大不相同。他们的武器工具风俗制度，是与塞契特十分类似的。〔注五八〕他们是从何处来的呢？他们所有的奇畜——橐驼、駃騠(骏马)、騊駼(野马，“非胡人不能服”)，都是蒙古中亚产物。他们的武器——径路刀，是亚克美尼朝波斯人的武器(Akinakes)。这是远方来的敌人。然则他们何以在战国秦汉之际，突然潮涌而至长城呢？这一方面，由于塞契特之东西扩张，以及匈奴之东西扩张，使二者发生关系。而塞契特势力方盛，匈奴被挡住了西进之路，便东到中国。游牧民族乃最初打通欧亚草原交通者。另一方面，波斯以及希腊两大帝国先后由西而东之扩张，亦不免向北方挤压，又将中亚游牧民挤得非常集中，首先促成了塞契特与匈奴之接近，接着，将匈奴等游牧民由西伯利亚东面“胡道”，准噶尔大门，挤到中国境内。在春秋以前，中国为了防御北狄，有黄河东西的华夏之族之合作。为了防御匈奴，战国以后，中国民族除筑长城以外，更加扩张大团结兼并，而有秦汉统一。秦汉统一以后，匈奴因向东西延伸，甚至与南面羌人合作，包围中国。中国不能专靠筑城自保了。如是中国亦向更东更西方面延伸，尤其是向西面延伸，遂使中国历史越过中国之境以外。而东西农耕国家也越葱岭而携手了。

## 秦汉以前之中亚北亚

现在,我们就文献资料之所知,略述波斯东征前后中国伊朗之间(Seriran)之关联。

公元前七世纪之初,亚述北部即因有新兴蛮族之侵袭,日趋瓦解。春秋之初(前六一二),闪族之加尔底人与伊朗族之米太人合作,灭亡并瓜分亚述帝国。东为米太,西为新巴比伦。新巴比伦灭亡犹太,掳其人至巴比伦。前六世纪初势力最盛。此后,波斯人渐兴,当时中国与伊朗间的情形,大部分还在云雾之中。所能知道的,公元前十世纪以降,已是游牧民与农耕民对立之局,夹着若干山岳民。据前五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特(Herodotus)之书,在公元前七世纪以降,自多瑙河至黑海及南俄顿河伏尔加河一带者,为基美利及塞契特人。塞契特人以东至西伯利亚,则有萨马特(Sauromatae)、马萨格特(Massagetae)、阿及拜(Argippaei)、伊色顿(Issedon)、阿里马皮(Arimaspi)诸族。凡此皆游牧之民,在草原形成一串连索。其在极北,则为一素食文明国家,曰"北风外居民"(Hyperdoreans)云("History"第四卷)。希氏所云,不脱《山海经》性质,未可视为信史。这些民族之地望、族类、语言之比定,都很模糊,尤以希腊人对塞契特一词使用得非常广泛,常以为游牧民通称为然。由基美利塞契特萨马特姓名与武器看,芬族(匈奴)、伊朗色彩甚浓,亦受希腊影响。而据希氏之书,在塞契特全盛时代,分为二部,西部为其附庸,从事耕种;东部为"王家",则为游牧者。这是游牧帝国之惯例。我们可想见其集团民族复杂,主从并非一族。对于匈奴突厥,亦当如是观。塞契特盛时部勒其他游牧半游牧之族,因而将其塞契特化,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匈奴纵非其同种之东支,与其有关,至少先受其影响,后来又影响他们,殆无可疑。

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七世纪下半,曾有一度西移运动。据希氏的记载,因阿里马皮人之西移,引起伊色顿人西移,因而塞契特西移,与基美利人冲突。时亚述正苦于基美利,因欢迎塞契特人之协助。亚述终为米太波斯人所灭,而塞契特势力大为伸张。此民族移动最古之记载。其原因也许由于天灾;而秦穆公之称霸西戎(前六四五——六二一),迫氐羌西走,因而一串游牧民西走,我想也是一个可能之因素。

接着是一东进运动。在孔子时代，波斯之居鲁士大王（Cyrus）先并米太（前五五〇），继灭新巴比伦（前五三八），并侵入小亚细亚及希腊人之殖民地，奠定亚克美尼帝国（Achamenid Empire）基础。其子康比斯（Cambyses）征服埃及。至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五二一——四八六），西征马其顿，北至高加索，南至埃及之南，东越阿富汗而东，据阿拉伯海之北，阿姆、锡尔之南，势力伸至北印度之五河（Punjab）之旁，其影响当然也到葱岭一带之边缘了。他在西面对赫梯人，亚述人，及埃及人抗争。在伊朗高原，统治伊朗人及“非伊朗人”。伊朗人中，包括阿姆河流域的康居（Khuwarism）、大夏（Balkh）、粟特（Sogd）、安息（Parthava）等。非伊朗人区域，包括里海附近及俾路支一带。里海东面北面一带，则伊朗所谓“敌人”（Dahae）及塞迦族（Saka，Sacae）区域。〔注五九〕这在后来，逐渐变为土朗（Turan）区域。〔注六〇〕匈奴之确实出现于中国，是前五世纪以降之事，可能是受了波斯东进之压力。

不久，我们又看见一个西进运动。自战国之初，秦晋赵不断与戎、胡及匈奴斗争。前五世纪中叶，秦晋逐大荔之戎与阴戎，羌族西逾汧陇。此戎（羌）也许是匈奴到中国后受到压力南下的。他们被逐而西，不到几年，赵襄子过雁门，破并代以御胡貉。此“胡”见于记载之始。自此中国与羌胡冲突频繁。而在西亚，亦为塞契特之极盛。

在前四世纪，又有一大东进运动。大流士之世，希腊已兴，乃有波希之战。大流士征服希腊二次失败，其子薛克斯（Xerxes）远征希腊亦失败（前四八五）。此后波斯日益腐败而衰弱。一百五十年后，轮到希腊人复仇了。公元前三三一年（孟子见梁惠王，张仪相秦之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王统一希腊后，进攻波斯。亚历山大以三万五千骑兵，第一次破波斯军四万，复破波军六十万，最后，波斯组织一百万的伊朗军和亚洲殖民地军，包括塞迦人在内，亦被亚历山大以五万人击溃之。大流士三世死于乱军之中。亚历山大乘胜踏着大流士之足迹东征。前三二九年，入阿姆、锡尔一带，臣伏大夏、粟特，筑城于大宛（Fergana）。并与塞契特酋长之女及大流士三世之女结婚。其将士亦纷与当地居民结婚。前三二七年，深入印度五河地方。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诸将争承继，前三〇一年承继决战后，帝国四分，在欧洲者曰马其顿，托雷斯；在埃及者为朴托莱梅（Ptolemy）王朝，都于亚历山大城；在亚洲者为塞流卡（Seleucus）王朝，都于叙利亚之安都（An-

tioch)(今在土耳其边境),后又建城于底格里斯河岸,曰塞流卡特昔芬城(Ctesiphon-Seleuchia)。于是希腊文化传播于欧非亚三洲,蔚为大希腊风(Hellenism)时代。(此词狭义指亚氏远征迄罗马帝国成立时的希腊文化,广义则对希伯来主义而言。)

五十年后,希腊人在亚洲之政治权力,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大举攻义渠(前三一四),赵武灵王之胡服(前三〇六),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十余年间之事。

在前三世纪有一西进运动。秦灭义渠后,即不再见戎患。唯秦与六国之战方酣之时,匈奴势力日大。前三世纪末,有李牧蒙恬之大举攻匈奴。在西方历史上,自公元前四——二世纪,则有萨马特人压迫塞契特人,终于占领黑海一带,其中包括后来中国及罗马史上之奄蔡及阿兰人(Alans)。〔注六一〕

这是公元前七世纪以降到汉初为止,中国伊朗间西进、东进两个潮流之节奏。而这和草原方面游牧民之进退兴衰,又如此息息相关。故其间纵非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断非绝无牵涉的。

我相信秦赵之攘夷,与塞契特西进代基美利人,萨马特人西进代塞契特人而起有关。而波斯希腊之东进,促进许多游牧民族伊朗化希腊化,以及其他部分之东移。此使匈奴塞契特化,亦使塞匈风俗,传到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前四五三年),赵襄子伐胡貉后攻智伯,以智伯之头为饮器,是一个显著的塞契特匈奴之风俗,与中国精神相反,而使豫让愤然报仇的。一百五十年后,赵武灵王不得不胡服骑射以御胡。而后来秦人武器艺术,亦日益受匈奴人影响。无论如何,自居鲁士到亚历山大东征,将他们所谓塞迦、塞契特人驱向阿姆锡尔河以东,我想是战国末期中国西北日益紧张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由东北到西北,只有夷狄戎及氐羌之属,而甘肃西南,新疆西藏一带,殆仍以氐羌为大宗。战国之初,东北方面始有胡貉之南下。中叶以后,在内外蒙古者为匈奴;其东则乌桓鲜卑;其北为丁零,其西北为坚昆;匈奴之西南则仍为氐羌。而自甘肃以至天山北路者,则有乌孙月氏塞种(详下)之属。据今日的资料,汉代新疆,伊朗系与吐火罗(即月氏)系语言甚为流行。我以为乌孙月氏塞种之属,以及伊朗系吐火罗系语言,一部分是大流士及亚历山大东征后进入新疆的。

此后在东亚,因六国相争而坐大之匈奴,虽为李牧蒙恬所败,旋有刘项

之争，遂乘机“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相争”。而在中亚，则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中，印度安息独立，大夏安息塞流卡诸国相争，塞契特势力乘机扩张。不过前三世纪来，中国伊朗间最大之游牧帝国，终推匈奴，他的势力逐渐东西扩张，在他西面的游牧民，则以萨马特人为主。由此东进西进之叠相激荡，土朗伊朗之分，遂以形成。前三世纪后，所谓塞契特者，与以前的成分大为不同，土朗色彩多于伊朗色彩了。〔注六二〕

接着是汉之西进，罗马之东进。亚历山大东征后约二百年，欧亚二洲接连的由罗马人与汉人发动两个持续的前进运动。但罗马前进在文化上无新意义，规模亦不如希腊。而汉人之西进，不仅远过秦赵；如想到新疆通道非伊朗高原可比，则汉人较之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精力是过之无不及的。

其一，在欧洲，在大希腊风时代受希腊人教化之罗马人勃兴，先灭迦太基。自公元前二一五——一九六年，一再击败马其顿之得意的密集方阵战术。自前一九〇年前起，不断攻击塞流卡帝国。前一四六年马其顿灭亡。同时，罗马人迫塞流卡帝国割小亚细亚之地，设亚洲省。前六四年，叙利亚变为罗马之一省。前三〇年埃及入版图，罗马帝国时代开始。他以希腊帝国承继者资格，为争夺亚美尼亚及米索布达米亚，先后与安息及萨珊波斯作长期斗争。

其次是汉代对匈奴之抵抗与进攻。秦末匈奴之势虽大振，汉人统一，终阻止其南下。如是匈奴西破月氏，乃有月氏塞种之迁移。继而中国进击匈奴，开道西域，如是继大希腊风之后，有一秦汉风或大汉风的时代。而匈奴西迁，哌哒南下，鲜卑人华，突厥勃兴之一连串事变，接踵而起。东西大通，各种宗教和会，或西去，或东来。而西罗马之灭亡，日耳曼人之建国，隋唐帝国之成立，大食帝国之勃兴，也都是在这一潮流激发而起的波动。汉人之西进及加入亚洲史，其后果之重大而深远，实在亚历山大东征之上。这是近代欧洲史家所没有充分看出的。兹先就两汉之事略述如下。〔注六三〕

## 抗匈战争与设立四郡

秦始皇时代，正匈奴头曼单于时代。他开始组织附近部落，以库伦及和林为中心，统一内外蒙古为一强大骑马国家，进而为一游牧的联邦帝国。〔注六四〕头曼当然也是受了秦人文化的影响，但基本是塞契特式的。当秦

与六国战争之时，匈奴乘机南下，进据河套。并进而与秦始皇相争。如上所述，秦既统一中国，即进而抵抗匈奴。前二一五年，蒙恬将匈奴逐出河套，匈奴东受东胡，西受月氏之压力，退至外蒙。秦楚之际，匈奴复振。有头曼之子冒顿，与刘邦同时，杀父自立，乘刘项之战，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东灭东胡（乌桓鲜卑）至于朝鲜，西击月氏，北服丁零，遂南下楼烦（雁门一带），复蒙恬所取河套，并入侵甘肃之朝那（固原），陕西之肤施（延安）。刘邦亲自抵抗，被围白登（大同附近）。《史记》曾记当时匈奴骑兵军容之盛。步兵之雄之刘邦知不能敌。用陈平计，派刘敬许以宗室公主（即和亲）及酒米金帛，始脱围而走。刘邦死，冒顿致书吕后，要娶其为妻。吕氏大怒，召集会议。樊哙请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曰，樊哙可斩也。于是卑词厚币和亲以羁縻之。至文帝，仍唯有和亲，贿赂，岁送金帛之一法。然而，匈奴还是不断进攻。这是贾谊流涕之一。〔注六五〕冒顿得汉之财物，兵益增多。由今日绥远发掘出的军器，可知绥远成了匈奴的军需根据地。文帝时，即前一六九年左右，他进攻甘肃的月氏，以其王头为饮器，并定乌孙呼揭楼兰及西域二十六国。而氐羌遂亦受其控制。初，乌孙月氏均住祁连敦煌间。月氏一时强于匈奴，曾杀乌孙之王，并能威胁中国。〔注六六〕至是月氏弃河西而西迁伊犁。当时住伊犁者为塞种。月氏逐之，塞种西迁（前一六〇左右）。至武帝初，约前一三九年左右，匈奴又助乌孙王昆莫逐月氏，月氏再西迁，塞种再南下（详下）。这是民族第一次大移动，引起中亚大变动。如果当时汉族不能团结而为统一国家，这洪流可能先冲到中国的。

匈奴灭月氏后，成为“强胡”，成为“百蛮大国”。此塞外霸权之一变，亦东亚均势之一变。〔注六七〕乃乘胜致函文帝，倍加威胁。汉廷不敢言战。刘邦时，已有韩王信、卢绾降匈奴，为其策划。冒顿死，老上单于立。文帝派宦者中行说送公主和亲，也投降匈奴。老上来函，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单于”，不断要挟，并出兵掳掠。文帝始设六将军从事防御。老上死后，军臣继位。景帝还是继续和亲政策。军臣不时骚扰。晁错尝比较中国与匈奴之短长，以为除马不如外，弓矢仍强于匈奴，然兵凶战危，万全之计，在以夷制夷，并移民实边，加强守备（《汉书》本传）。但亦可见汉人渐有信心。七国乱时，颇有勾结匈奴者。幸迅速解决，未为大害。

自冒顿至军臣，为匈奴全盛期。他们由中国及东面与西南面各族征收大批赠物和赋税，并常吸引中国降臣，助他们打听消息，做政治军事的顾问。

韩王信，卢绾，中行说是最早的汉奸；这是"恐匈病"的必然产物。汉朝如继续无抵抗政策，经济负担与政治危险，都是很严重的。

但汉人并非无能为的。文帝以来，除注意培养国力外，即从事整军经武，训练士马（详下）。白登之围后七十年，到了武帝之世，国家统一，兵马亦强，也就到了与匈奴摊牌的时候，由"备胡"而"击胡"了。武帝时代对匈用兵凡二次：第一次作战九年，第二次作战约十年。

月氏离甘肃西迁后约三十年，武帝即位（公元前一四〇），一开始即准备进攻匈奴。但汉人还极慎重。熟悉边事的主父偃，认为不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不能作战。听说月氏与匈奴有仇，先派张骞出使联络月氏（前一三九年）。马邑事件（前一三三）后，两国绝交。主战的王恢自杀。第一次张骞出使，如下所述，并未成功。不等到回国，前一二八年，匈奴攻至辽西渔阳（北平）雁门。李广与卫青出师不利，但这当是试探性的。故翌年，汉军反攻。自此至公元前一一九年，以卫青、李息、霍去病督师九次，重要战役凡三：前一二七年破匈奴于河套。先是武帝于陇东及宁夏南部置安定北地二郡。至是于绥远置朔方郡。匈奴失牛羊百余万。翌年军臣死，匈奴内争，其弟伊稚斜为单于。军臣之子降汉（是年张骞归）。右贤王复大举入寇。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复与公孙敖过居延，攻祁连山，杀匈奴三万八千人，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匈奴右部遂入于汉，初置武威（凉州）酒泉（肃州）二郡。但右翼之李广在热河为左贤王所败，李广失道自杀。前一一九年是最大决战，汉决定绝漠击匈奴，霍去病攻至瀚海（贝加尔湖），"杀虏八九万。汉军死者数万，马死者亦数万"。自此匈奴远遁漠北。前一一一年分武威、酒泉，增置张掖（甘州）、敦煌（沙州），是曰河西四郡。武威，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浑邪王地也。于是"西域之路开，羌胡之路隔"。武帝募民十万实边。增长城，设亭障，保障此一走廊。匈奴既失绥远的军需重镇，复遭惨败，无力反攻。汉亦失兵马甚多，亦须休息。

此后十五年间，武帝从事于西南夷，两粤，朝鲜活动。鉴于匈奴败而未服，张骞回后，前一一七年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成功，公主出嫁，西域大通。然两次对大宛用兵（见下）时，又内为奢侈（土木，封禅，巡狩），汉力衰敝。而匈奴则休养生息之后，卷土重来。前一〇〇年，苏武出使匈奴被留。翌年，对匈之战再起。然汉已师老兵疲，或将悍兵骄。武帝用李广利率师出外蒙，尤不得人望。李陵苦战被俘，武帝杀其家人，遂降匈奴。匈奴复以汉

降将卫律攻李广利。前九〇年李广利惨败，后亦投降，汉军数万失踪。自此武帝讳言战争了。而他死后，西南夷乌桓不安，匈奴复来入寇。

昭、宣帝时，汉之国力逐渐恢复，赵充国防御有方，匈奴不得逞。羌（青海）及西域之经营，颇有成效。宣帝时，匈奴大举攻乌孙，公主求救。前七二年，汉乃派赵充国常惠连西域兵大败之，得牛羊七十余万。匈奴遂衰耗。后遇大雪，家畜死亡甚多，又受乌桓、丁零、乌孙三面夹攻，内争复起。匈奴右部之日逐王（统治西域者）率众降汉使者郑吉，郑吉始为西域都护。时赵充国已定羌。匈奴无力南侵西侵，自相攻战。对汉主和主战，意见不一。后分为二部，曰呼韩邪，曰郅支。东匈奴呼韩邪遂降汉称臣，守受降城（河套北）。而郅支不服远走新疆，西破乌孙，北击乌揭，西破坚昆，北服丁零。并乘乌孙康居不和入康居。元帝时，副校尉陈汤，都护甘延寿深入康居，终斩郅支（前三六年）。如是呼韩邪回去统一匈奴。元帝以昭君嫁之。此后中国与匈奴维持和平者百年。中国对匈奴赏赐甚大。哀帝时，绢达八万四千匹之多，匈奴以此贩于罗马，国益富厚。今日外蒙诺颜乌拉地方出土之汉漆器铜器锦绣甚多，这些东西，亦与塞契特式之器物同在，可见当时匈奴之文化。大概而言，是汉化之增进。

王莽时，匈奴复叛。后汉初，匈奴地区旱蝗大作，遂再分为南北。这包括民族之分化，尤其文化之分化。南匈奴即呼韩邪之后，亦王昭君之后也。多至中国北部，渐事农耕。而北匈奴则屡犯长城。光武初亦持重。唯利用南北匈奴相争，收以夷制夷之利。然侵寇不止。河西城门昼闭。明帝始派窦固，耿忠耿秉祭彤来苗等四路出兵，击之于天山（吐番西），追之于蒲类（巴里坤），屯田伊吾卢（哈密）（公元七三年）。而鲜卑、乌桓、丁零亦夹击匈奴。章帝时，北匈奴常南侵南匈奴。和帝元年（公元八九年）窦宪耿秉邓鸿等始率兵大破北匈奴于燕然山（外蒙杭爱山），此即当年李广利惨败之地。四百年来匈奴之威胁，始告解除。班固所谓"摅高文之宿愤，振大汉之天声，一劳永逸"者也（《燕然山铭》）。两年后，又破之于金微山（阿尔泰山）。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扬雄云，"北狄真中国之坚敌也。"此坚敌遂远遁。这在中国和西方都引起民族移动的大潮流。

北匈奴逃亡后，南匈奴与汉人杂居山西陕西之西北。虽渐次安定，桓帝之时，羌乱刚了之后，与乌桓、鲜卑共同寇边。南匈奴为张奂所平。但鲜卑渐强，匈奴为其所侵（五胡乱华仍匈鲜对立）。建安中来朝，曹操分五部节制

之，大多居于山西。至西晋末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

北匈奴逃走后，初在乌孙康居之间游牧，不时与车师侵袭中国。据延光二年（一二三）敦煌太守张珰云，"北匈奴之呼延王常展转蒲类海（今巴里坤）秦海（即黑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后汉书》西域传）。其后鲜卑渐兴，北匈奴之踪迹，不甚分明。唯据《魏书》，尝在"康居西北建悦般国。凉州人犹谓单于王"。又云，杀奄蔡之王而有其国云。而二世纪以后罗马史上渐有 Khunni，Phuni，Unnoi，Hunni，Huns，Fins 之名出现，三四世纪时在今日俄境伏尔加河东岸，先征服阿兰人，与中国史志相符。继征服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逐渐引起欧洲民族大移动。至五世纪，阿提拉（Attila）提兵入欧。沿路的汉代文物，可以证实他们的来龙去脉。续详下章。〔注六八〕

匈奴虽曾为中国之大敌，然在中西文化史上，固曾演重要之作用。彼等控制欧亚草原之东端以及"胡道"，直接将塞契特之文化，间接将伊朗乃至希腊文化带入北亚与蒙古以及内蒙。他们在军事上在国防上，刺激中国人民之尚武乃至于统一。及与中国转入长期相持之状态，亦努力吸收中国之文化；及其败走，又将中国文物经草原道携至西方。今日在绥远出土之武器，库伦以北古墓中之汉代器物，在乌拉山东托波儿附近发现的前汉铜镜，以及在西洋民族移动时代匈人、阿兰人、阿瓦人（Avars）前进道上所发现的汉镜，汉弓，汉绢，使我们对此一世之雄的匈奴帝国历史，以及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更为分明。〔注六九〕中国文化之传入外蒙，促成了匈奴之分化。而匈奴之西迁对于日耳曼人在精神上及政治上技术上的影响，是我们知道的。至于在精神上的影响，犹待考索。已知者，匈奴人在道德上已大受汉人影响。《后汉书》南匈奴传注："匈奴谓孝为若鞮，自呼韩邪降后，与汉亲密，见汉帝谥为孝，慕之；其子以下，皆称若鞮。"而阿提拉之在西方，据威尔士云，不仅用兵如神，且能仁民爱物，爱好文学云（《世界史纲》）。匈奴是一勇敢民族。我们应以中国民族中有其血液自豪。而如果匈牙利和芬兰是其后裔，我们也真希望他们能无负其祖先。

## 西羌、乌桓、鲜卑

匈奴游牧帝国之瓦解，除汉得四郡之地，西域城郭之民获得解放，中西交通大开之外，就匈奴势力范围而言，后果有三：一、一部分农耕化，如南匈

奴。二、他的同盟者，即半游牧民族之西羌，继续与中国作战。三、他直接统治的游牧民族，则脱颖而出，代之而兴；首先是乌桓和鲜卑，后来是柔然和突厥。匈奴为一切游牧帝国之典型。西晋中国内乱时，南匈奴起事之后，西羌鲜卑先后建大帝国。结果亦不出二途：或如南匈奴合流汉族，或如北匈奴西走。

羌为亚洲一大族，亦我族一大支，传为三苗之后。《商颂》已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周初，庸蜀羌髳濮，曾与牧野之师。周室东迁，亦因犬戎之难。春秋时，自甘肃至伊洛，往往有戎。戎，氐羌也。其分布之广，遍及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西藏更无论矣。〔注七〇〕战国之初，秦赵逐之而西。余众为秦役属，一部分集于黄河、赐支、湟河三河间（今青海甘陕间），魁曰爰剑。此即所谓西羌。四传至研，其势大盛，凡百余种。始皇与六国相争时，种人尤大繁息。其在甘肃、四川、云南，属于西南夷者，称东羌；在新疆者，称南山羌。冒顿之时，西羌臣于匈奴，共扰中国。及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众始服汉。后攻金城（兰州），李息大败之，置护羌校尉。宣帝时复叛，赵充国平之。其后烧当羌最强。王莽时及东汉初，屡攻中国。后又与丁零战而胜之。其后与汉屡战屡降，屡降屡战。而居内地者，每为豪右吏民所欺；诸将出征，常焚其庐落，故羌人大恨。终汉之世，羌乱不绝。安帝初（一〇七），羌祸大发。邓骘派任尚（即在西域败事者）率军五万与羌数万人战于甘肃之通渭县，尚大败。其中一种曰滇零羌者，自称天子。其时郡吏多内地人，无战意，争徙内郡，百姓不愿迁者，则刈其禾，焚其居，大概是一种"焦土政策"。于是汉人颇多投羌；羌祸遂如火燎原。三年，虞诩始大败之。十余年间，用去军费已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军民死者不可计。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至顺帝时，东西羌会合，入三辅，烧园陵，杀吏民。七年间，用且八十亿。"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江湖之民，群为盗贼。青徐饥荒，人民流离，军士劳怨"。至桓帝时，段颎始决意进击，灭羌于平凉（一六九年），凡百八十战，斩首者三万余。用四十四亿，汉军死者数百人而已。羌寇略定，而黄巾起矣（《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西羌传）。至晋，羌与氐复大振。

乌桓与鲜卑，据《后汉书》，本东胡，为冒顿所灭，余类保此二山为号。〔注七一〕时乌桓在辽河之西，而鲜卑在西剌木伦河之北。两部皆自推强健公平者为"大人"。武帝移置于辽东及东内蒙古，以乌桓校尉监之，为汉侦察匈奴之动静。王莽时，乌桓丁零之兵变发生，郡吏杀其质。光武时，遂与匈

奴连兵为寇，马援御之而败，辽东颇受祸。其后匈奴内乱，乌桓攻之。光武联络乌桓，鲜卑大人亦归附。灵帝末，乌桓据辽东辽西，中山太守张纯附之；其大人曰蹋顿，尝助袁绍击公孙瓒。曹操平之，收为天下名骑。我以为后来所谓“鞑靼”，或由蹋顿而来。乌桓自此多归化了。鲜卑在乌桓以北，汉初未通中国。光武时，与匈奴入寇辽东，太守祭彤大破之。南匈奴既降，愿为中国保塞，始通译使。自匈奴之衰，渐有其地。及北匈奴逃走，追击其后。灵帝初，有檀石槐者，立庭于歠仇水上（当绥远岱海），北拒丁零，东却扶馀，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分为三部：东自右北平以东，其魁曰弥加阙机素利等。中自上谷以东，其魁柯最阙，居慕容寺。西自乌孙以东，大人有置鞬落罗等。幽并凉三州均受寇掠。蔡邕云：“自匈奴遁走，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为之谋主，兵马过于匈奴。”檀石槐死后，三部分裂。小种鲜卑轲比能继起。及袁绍据河北，中国人亡叛者多归之。后曹操破之（《后汉书》、《三国志》乌桓鲜卑传）。然其势已成。汉魏间，慕容、宇文、段、拓拔诸部并起。

## 西域之开通与经营

自汉“列四郡，据两关”（北玉门，南阳关，详下），西域即在望了。

《史记》大宛传记西方诸国，尚无统一之名。西域之称，始于《汉书》。自汉至唐，此名词狭义指玉门以西，葱岭以东，即清初新疆南北二道之原来界线（包括今俄属中亚之一部分）。〔注七二〕广义指中国伊朗间，即葱岭里海间，即今俄属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更广义则不仅包括波斯与伊拉克，印度与阿拉伯，即欧洲亦泛指之。

“西域之迹，开自张骞”（以下多杂引《史》、《汉》原文编成）。汉朝为寻求盟国夹击匈奴，募能出使月氏者。张骞应募于前一三九年，西使月氏（时月氏西迁塞种故地伊犁），为匈奴所留，凡十余年，娶妻有子，终脱走。是时月氏又为乌孙匈奴联军所破，离开伊犁，乌孙据之。骞不知月氏何往，先至大宛，得月氏踪迹，由大宛送其至康居，康居引导其至月氏，则月氏已臣大夏而君之，都妫水（即阿姆河）北为王庭，地肥美，无报仇意，且距汉及匈奴已远。〔注七三〕骞不得要领，留岁余，由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军臣死，始亡归（前一二六）。当初从者百余人，十三年后，唯一人从之同归。所至有大宛，

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大国，闻其旁大国五六。他曾在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大夏人云市之身毒(Sind，北印度)者。因建议经西南夷，即四川云南以通大夏之属(巴基斯坦一带)。终以费用太大中止。其间随卫青出征，导军有功，封博望侯。后二年随李广出征，几死(前一二一年)。

骞始终主张连西域通大夏，以断匈奴"右臂"。月氏无望，乃转念于乌孙。浑邪既降，河西无匈奴之迹。武帝派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持金帛数千巨万使乌孙，缔结同盟，招其东居故地。虽无结果，骞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扞罙(即扞弥)及其他诸国。乌孙为发导译。后乌孙使者随张骞到汉(前一一五)，知人众富厚，乃益重汉。前一一四年，张骞死。而所遣副使偕诸国人到汉。四郡既设，汉与西域交通频繁。汉亦遣使求马于乌孙大宛，并发使至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均见后)，使者相望于道。一岁多至十余辈，一辈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皆持巨量金帛前往。而亦多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但其后汉使益多，而所持者益少，诸国每苦于供应，匈奴复从中挑拨。楼兰姑师与匈奴勾结，攻劫汉使，匈奴亦时出奇兵，切断交通。前一〇八年，武帝遣赵破奴率兵数万平之。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大宛诸国皆来使观汉广大，外国客大都多人，汉皆散财帛赏赐甚厚，外国使更来更去(其中诈称使节商人自不少)。匈奴乃威胁乌孙；乌孙恐，遣使献马，求婚于汉。前一〇五年，皇族刘建之女细君下嫁乌孙老王昆莫为夫人，终完成中国乌孙之同盟。中国赠送甚盛。中国使者，纷纷西行。求河源采玉石于阗(《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翌年，求大宛之汗血马，大宛王不许，攻杀汉使，乃派李广利万里伐大宛。出兵十余万，作战四年。大宛终属于汉，献马三千匹(前一〇二)。虽得不偿失，而将吏多贪暴，尤可遗憾；然自此"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蒲昌海，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注七四〕内属者三十六国。然楼兰仍依违汉与匈奴间。昭帝时，受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霍光遣傅介子往刺死其王，立亲汉者为王，改其名为鄯善。汉并派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其地，与以"威重"。宣帝时，汉与乌孙联军败匈奴后，以常惠持节驻乌孙。常惠盖尝随苏武出使者。而龟兹杀扞弥亲汉者，常惠发诸国兵，斩凶手，龟兹遂服。时郑吉驻鄯善渠犁一带主持屯田事。姑师常为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吉遂发兵破车师，分为车师前国、后国，及山北六

国(且弥东西,卑陆前后,蒲类前后)。"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然匈奴不自安矣"。及日逐王降汉,乃使吉并护北道,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郑吉置矣"(前六〇年)。中国号令达西域,始于张骞,成于郑吉。先是匈奴于右部置日逐王于焉耆,称僮仆都尉,赋税诸国。自是结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冯奉世则安定莎车。解忧公主(后嫁乌孙王者)为乌孙三代国母,主政数十年;其侍女"冯夫人(嫽)持汉节,到处行赏赐焉"。旋"都护治乌垒(今库车城),习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注七五〕屯田车师前王庭(此即柳中,亦即高昌,在吐鲁番广安西)。匈奴东蒲类王降都护,分车师后王国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宣元以后,单于称藩,西域服从"(西域传,郑吉传)。

王莽时,四夷皆畔。戊己校尉刁护应付无方,其部下杀之,率男女二千余人降匈奴。旋匈奴击北边,西域遂瓦解。然都护李崇出西域,诸国尚郊迎送兵谷。而焉耆攻之,崇收余众,还保龟兹。此后西域再分为五十五国,与中国既绝,皆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光武时诸国遣使求内属,请都护。光武以未遑外事谢之。其后匈奴稍衰弱,汉以莎车王为都护。莎车跋扈,汉夺回印绶。莎车攻鄯善龟兹。鄯善于阗车师亦事兼并。鄯善车师继龟兹而附匈奴。汉均不问。西域不通者六十五年。明帝初,匈奴胁诸国寇河西,始命将帅北伐匈奴。而西域复通,始于班超。

窦固伐匈奴时,派班超使西域(公元七三年)。超至鄯善(即楼兰)攻杀匈奴使者,并破莎车,定疏勒。于阗诸国,皆遣子至汉。时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己校尉。明帝死,北匈奴率焉耆、龟兹来攻,陈睦覆没。明帝方卒,无暇为救援之方,车师亦叛,耿恭苦战,始回玉门。于是欲征还班超,再罢都护。然超仍留西域苦斗,其后班超上书请兵谓西域诸国皆向化,唯焉耆龟兹不服,陈屯田莎车疏勒,以夷狄攻夷狄之略。平陵人徐幹上书愿助超,于是以弛刑及志愿者千人就超至西域,得乌孙于阗诸国合作,大败龟兹莎车联军,威震西域。其时大月氏与康居联姻,尝助班超。后月氏求尚汉公主,被拒攻超,超大败之。班超乃为都护。唯焉耆犹未定,班超发龟兹鄯善兵攻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汉之力量,"逾葱岭,迄县度"〔注七六〕(《后汉书》班超传)。不仅此也,且几乎达于欧洲。时西方有大秦国(详下),"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班超遣甘英使至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渡安息,船人曰,海水广大,三月乃得

度，遇风有二岁者，海中数有死亡。英闻之乃止”(《后汉书》西域传)。时公元九十七年也。安息人之言，不过恐吓。而甘英无勇，殊负班超之托。东西交通因此延误。超在西域前后三十一年，一〇二年回国，旋病死，年七十一。任尚继为都护。西域均绝于汉，北匈奴复威胁之，共为边患。初超回国时，任尚问计。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顺子孙，蛮夷难养易败，水清无鱼，君宜宽小过，总大纲。”尚曰，“我以班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不数年西域反乱，具如超所戒。其后梁慬尚能立汉威德于西域。安帝时，匈奴连车师寇河西，议者欲闭玉门关，陈忠极力反对。班勇(超子)议不可。汉乃派勇复至西域为长史，屯柳中(高昌)。勇平定车师，击降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皆来服从。光武以来，至此所谓“三绝三通”。顺帝以后，汉已不振。桓帝初，最后一个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杀，车师亦攻屯营，自亦听之。然自魏至晋，西域仍朝贡不绝。“略如汉故事，至晋不改”(《后汉书》班超传；《晋书》地理志)。班氏父子之功伟矣。

此后中国经过甚大之变化；西域有自然界之沧桑(干涸、沙灾)，而政治风云之变幻有过之无不及。兹先略志要点，为了解以后所述之线索，亦中国盛衰之寒暑表也。晋初，中国声势在西域尚得一振。五胡乱后，苻坚定西域。其后则沮渠氏一时势力遍北道。其后则北魏与柔然(蠕蠕)争西域。柔然与哌哒合作。五世纪中叶以后(南北朝中叶)，此处为哌哒势力范围(哌哒即西史之“Ephthaplites”或“白匈奴”)。汉人势力告一结束。哌哒尝侵波斯，及突厥灭柔然，波斯遂助突厥灭哌哒。约百年后，至六世纪中叶，突厥为西域之主人。至七世纪中叶，即唐代，中国再立其霸权，而其深广，且逾汉代。到八世纪中叶，西藏(吐蕃)勃兴，终与阿拉伯人(大食)联合，消灭汉人的势力，中国在苦斗后于八世纪末撤退。西藏统治不到百年，突厥回鹘酋长统治中亚及新疆一带，渐成回教范围。其后河西新藏及葱岭以外为西夏西辽及花剌子模所统治。宋代对西域根本无所作为。到了十三世纪以后，蒙古人打通东西，西域在察合台汗国。明代亦通商西域，不仅注意海外而已。至清初，准噶尔霸西域，与清相争几七十年，乾隆时代终定新疆——亦“新疆”一词之始。一七九五年清军在高仙芝越帕米尔后九百年，派兵再越帕米尔。在叶什尔库尔(Yeshilkul)北面十里的苏满山崖上，尚有乾隆纪功碑。此后英俄入侵中亚与新疆。其先阿富汗犹与我国争帕米尔。而俄人又宣称其所有权。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约诺夫(Yonov)大佐命令哥萨克兵

扫荡阿富汗守兵后，将汉文碑移到塔什干博物馆。但白石碑座犹在。两千年来中国威力屡及伊摩斯山（Imaos）外，“今抚遗物，如在目前”——这八字是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的文字，读者诸君之感想又何如乎？〔注七七〕

## 西域之情况

张骞通西域，为中国开辟一新世界。今《史记》大宛传，《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为当时中亚最可靠信史。盖《史记》本张骞，《汉书》作者尝参窦宪之幕，亲至居延以外北匈奴之庭，又为班超之兄；而《后汉书》则本于班勇所记也。《三国志》所引《魏略》，殆亦本班记。〔注七八〕故自有最大之权威。厥后东晋法显西行，北魏董晋高明西使，以及宋僧宋云慧生，隋代韦节杜行满，唐代玄奘等，均亲历西域记载见闻，唐代官方资料尤多。元明有邱处机、耶律楚材、李达、陈诚西行记事。故中国关于西域史料，实最完整。

在叙述西域事情之前，首须郑重一说的，是真正了解中国尤其是两汉文化之真面目，不能专由两汉辞赋，经学，乃至阴阳五行说来看，而必须由两汉之西域经营来看。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在此处作国际竞争；尤其因为在这里，更充分表现汉人的气力。中国人所须克服的，不在匈奴之武力，而是西域之自然环境。此环境不在路途远近，而是其为世界上最艰苦通道。艰苦之最甚者有三：奇热，奇寒，奇险。法显《佛国记》云：

> “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
>
> “小雪山冬夏积雪，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
>
> “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傍旋梯道，七百余所。悬絙过河，数十余处。”

法显同行十人，归仅一人。不久昙无竭二十五人西行，归仅五人。“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急流若箭，东西两山，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岸举烟，后人见烟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山，悬崖壁立。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三日方过。及到平地，失十二人”（《梁高僧传》本传）。故慧立赞其师玄奘云：“嗟乎！若非为中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

游此者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欧人第一个至此处者为马可波罗，始传其险难于欧洲。近世海定及斯坦因以更现代的配备，冒万死之危险才得通过，于是一举成名天下知。〔注七九〕然而在两汉，前后总是二十万人以上在这一地带奔走，驱驰，建设，作战。因此，对于中国本无认识的他们，只因看了我们祖先龙虎精神，骆驼毅力，也就低头肃然起敬了。斯坦因于过帕米尔后，甚惜中国汉唐将士竟不在此立碑；因此其困难，较之欧洲史上汉尼拔以至拿破伦与苏伏洛夫之越阿尔卑斯，简直是不成比例云。

次拟指出，我国史书记载，都是认真慎重而可靠的。大约法显以后，玄奘以前，新疆有一可怖沙灾。玄奘与辩机之《大唐西域记》云：

“瞿萨旦那〔Kustana，即和阗〕……国北曷劳洛迦城，安富饶乐。后有罗汉曰，从后七日，当雨沙土，填满此城，略无遗类。闻者莫不嗤笑。第七日夜，雨沙土……从此东行，入大流沙，乏水草，多热风。行四百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从此东行六百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涅末(且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复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我引这一段后来的文章，即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海定和斯坦因在新疆发掘，即因读此一段文章并在新疆听到同样传说。结果，在流沙中发现古城，“证实中国古代旅行家和沙漠边缘土民所说，都是真话”。斯坦因继之再三发掘，又皆证实“历代中国正史之真确可靠”。这也表示，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如我国“疑古派”者，又不如“不如无书”了。

这些发掘，不仅使西域古史恢复新的生命，也使我们和世界重新认识两汉文化的精神，以及中国史书的价值。

汉四史(及《魏略》)关于西域所记，其中为全世界学者未决之问题甚多。兹以《史》、《汉》诸书为主，西人之记载研究为辅，以见我祖先活力、知慧与成绩之一斑。案语则作者之管见。

先记国名位置。《汉书》云：西域本六十三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自玉门阳关〔注八〇〕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山北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注八一〕案：张骞第一次出国，是由北道去，而由南道回的。(五九一页图)

南道之国有：婼羌(案今柴达木西至新藏边区及喀什米尔东北)、鄯善

(即今罗布泊南,已沦沙漠),且末(车尔城)、小宛、戎卢(安德悦一带,沦沙漠)、精绝、扜弥、渠勒(尼雅一带,沦沙漠)、于阗(克里雅,和阗东南)、皮山(今皮山及以南之地)、乌秅(喀喇昆仑山口与瓦罕之间,葱岭南部)、西夜、子合(叶城及叶尔羌河东岸)、蒲犁(今蒲犁及塔什库尔干)、依耐(英吉沙及西南)、无雷(疏勒之西葱岭北部)、难兜(坎巨提及其西南)。

自此南经罽宾,西南入安息,折东经大月氏康居,由西至东(《汉书》叙述法如此),则为北道之国:大宛(今浩罕),桃槐,休循,捐毒(皆自安集延以至阿赖岭南),莎车(叶尔羌),疏勒(喀什噶尔),尉头(巴楚),乌孙(今伊犁、哈萨克一带),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龟兹(库车),乌垒(库车东南,都护所在),渠犁(焉耆附近),尉犁,危须(博斯腾湖东南),焉耆(哈喇沙尔),乌贪訾离(绥来),卑陆前后(阜康),郁立斯(古城),单桓(迪化一带),蒲类前后(巴里坤,即镇西北),东西且弥(马那斯河),劫国(昌吉),狐胡(乌克沁),山国(南山谷中),车师前国、都尉国(高昌,吐鲁番),后国、城长国(济木萨,奇台一带)。〔注八二〕

两汉之际,诸国攻战兼并。先是莎车灭龟兹,后于阗破莎车主南道,各国多附匈奴,龟兹借匈奴复国,攻疏勒而霸北道。班超到后,颇复原状。疏勒得月氏之援,与于阗龟兹为敌;为班超所制止。焉耆尉黎危须抗命,为班勇所平定。此后于阗疏勒强权,汉不能制。至三国,据《魏略》,仅有二十国矣。〔注八三〕

次述人文状况。以上国家虽多,人口甚少。除乌孙六十三万,大宛三十万外,余多仅数万;此外不过数千人或数百人之城邦或镇而已。

中国伊朗间,阿姆及塔里木二河域最早进入农耕生活。《汉书》:"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又云:"自且莫以往皆种五谷,略与汉同,有异则记。"难兜等地,有银铜铁作兵。车师轮台,水草丰美。其记为行国而非居国者,除乌孙外,为婼羌(读儿羌),鄯善,西夜,子合,依耐,无雷,休循,捐毒,尉头。而蒲类车师诸国,有城市亦有游牧之民。据《后汉书》,蒲类后国在后汉有披发逐水草者移来(即移支国)。

案:汉世新疆中亚人种可以月氏大宛乌孙康居为代表,其后则有匈奴汉人。西人称新疆与中亚为东西土耳其斯坦,且以为系土耳其族发祥之地,纵非一种政治宣传,亦为昧于历史之见。其实当时新疆南路,多为氐羌之族,如婼羌。据《汉书》,鄯善,"与婼羌同。西夜子合与胡异,类氐羌行国"。蒲

犁依耐无雷亦相同。唯西部和阗一带，发现文书，多为塞语，当为塞种（详下）。

其在北道者，东部为月氏故地，而月氏实为氐羌之族，故婼羌亦称婼月氏。月氏西迁，以吐火罗（Tokhara）知名西域，故月氏又即吐火罗。《汉书》云，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此去胡来王助汉守玉门关。颜师古注，“言其去离胡戎来附汉也”。案：此望文生义。我相信去胡来即后来吐火罗之最早译法。盖玄奘所谓睹货罗故国，及睹货罗国故地，皆在葱岭东西沿山之地，包括婼羌、月氏，及后来哌哒之地，故知月氏哌哒吐火罗实三而一也。〔注八四〕西部为塞种故地。《汉书》云，乌孙本塞种；又云塞种西迁，休循捐毒，故皆塞种，民俗衣服类乌孙。而和阗一带塞种，似亦由北道移来者。〔注八五〕其后北道为匈奴乌孙所分据。蒲类车师一带，多为匈奴。匈奴西走后，披发逐水草者迁来，当仍为羌族。

塞种者，其大本营在康居奄蔡一带，属于畜牧水草之行国，以东部伊朗之游牧民为主体，而与塞契特、马萨格特、萨马特有密切关系者。大宛以西，是农耕雅利安的区域。《史记》、《汉书》皆云，“自大宛至安息同俗同语言，深眼多须，善贾市。”此仍今日伊朗人之风貌。但我们知道，其中又有塞种，有希腊人，以及西亚人乃至若干印度人之血统。凡月氏塞种大宛，皆本与突厥——土耳其无关。今日尚存于罗布泊一带之半渔半牧人，以及斯坦因在此发现之风化尸体，斯坦因以为不类其邻居之吉尔吉思人。我想此当系月氏之遗。又斯坦因在和阗一带所看到的巴克波人（Bakhpo），在帕米尔一带所见到的噶尔察人（Ghalchas）以及塔什克人，皆与“欧洲人十分相像，代表极纯粹的阿尔卑型，一见知其与吉尔吉思人不同”。此当为塞种乃至大宛之遗。大体言之，乌孙西迁以前，西域中亚实为氐羌及塞种之地；月氏塞种皆与原土耳其族无关。〔注八六〕

与土耳其族有关者为乌孙。《焦氏易林》云，“乌孙氏女深目黑丑。”颜师古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而《唐书》言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是乌孙与黠戛斯有关，亦即与坚昆、吉尔吉思有关。唯因在塞种月氏故地，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汉书》）而已。

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可知秦汉西域民族当以月氏塞种及乌孙为大宗。此外，匈奴在四五百年间，当然留下许多后裔。而汉通西域三百年间，中国人的血统，又要占甚大的成份。就《汉书》记载西域人口，包括乌孙大宛在内

(非属国之康居等除外),共为一,二六八,〇九一人(《后汉书》仅于阗、焉耆各增数万)。但中国用兵西域,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十数万(如李广利两次伐大宛),而归来的不过十之一二。除战死外,流亡于西域者必多。来往使者商人,不在少数。屯田卒吏,经常在二千以上。都护所在,官民亦必不少。汉与乌孙长期通婚,并长期以宫女嫁鄯善,而从者亦不少。而龟兹王亦求娶汉公主之女于乌孙。李崇及其随员之后,均在龟兹。诸如此类之事,不知凡几。故今日新疆之民,实多汉人后裔之血统。尤其是高昌,据《汉书》及《北史》,皆"汉武以后西征将士之尤困者因住焉",此"汉魏遗黎"之政治势力,亦历久不衰。

又《魏书》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而于阗固汉人采玉穷河源之地也。不仅新疆如此,蒙古亦然。《汉书》云,"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秦筑长城界中国"(西域传)。但此非谓长城以外,即无秦汉之人。秦汉以来,中国人逃入匈奴者不少。张骞李陵卫律李绪苏武等,均有子孙在匈奴。赵破奴二万人亡于匈奴,李广利军队万人散于蒙古西部,刁护的属员二千余人在哈密附近降附匈奴,尤其是三次较大的数字。他们的后裔,当多散在蒙古科布多及阿山道一带。因此,所谓匈奴也好,五胡也好,鲜卑、突厥、蒙古也好,决非纯粹的胡人,而实有中国的血统。而如以后可见,两汉三国以后,一方面胡人入华,一方面汉人入胡的趋势日益显著。所谓汉人,多为杂汉。而所谓鲜卑人也好,所谓土耳其人也好,蒙古人也好,实更都是"杂胡",决不是本来有所谓土耳其蒙古种族的。大体说来,自两汉以至六朝,西域中亚,是吐火罗斯坦;自乌拉山至贝加尔湖一带,才是丁零斯坦、坚昆斯坦、乌孙斯坦、突厥斯坦。隋唐以后,中亚才成为土耳其斯坦的。

当时新疆语言、文字,亦与此情形印证。斯坦因以来,据流沙掘出文物考证,共有四种语言:流行于北路之龟兹焉耆者,一为吐火罗语;二、尚有一种不明语,或为龟兹语,或为疏勒(佉沙)方言尚不能定。其三,流行于南路之和阗语。最后是通行的窣利(粟特)语(Sogdian)。〔注八七〕窣利语之为伊朗系,自无问题。和阗语西人多认为东部伊朗语,近知其确为塞种语。至于吐火罗语,当初西人均断其为雅利安语。由玄奘的记载,我不能相信此说。而近来西人的看法也大为动摇了。至于文字,有窣利文,古印度婆罗文(Brahmi),古巴基斯坦佉卢文(Kharoshthi),梵文,皆与汉文并行;七世纪左

右，便有西藏文，窣利体和卢尼体（Runic）的回鹘突厥文，以及由西藏文而来的西夏文字，而这亦皆与汉文并行的。〔注八八〕

在政治上，以上概内属国，等于汉之自治领。先有使者、校尉、卫司马节制，后设都护、长史管理。各国皆置吏，有译长、城长、百长、千长、且渠、当户、都尉、将、相、侯、王之官，大抵皆各国固有者，亦皆当地之人，不过皆佩汉印绶。除关系国防与礼节之事外，未见中国对诸国内政有所干涉。两汉对西域国防，以玉门为枢纽，鄯善为要冲，乌孙大宛，则最西之国境线。郑吉以后，都护驻乌垒，班超以后，长史驻高昌。其职责在屯田，护路，"督察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汉书》）

如斯坦因所说的，中国为了对抗匈奴而经营西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辛劳，坚忍和灵敏的组织力。而"中国统治所以能维持长久，与其说由于武力，不如说由于帝国派在这些地方政治代表外交手段之运用得当，以及中国优秀的文明力量。直到今日，中国日渐衰弱，中国统治这些地方，依然如故。"

在文化上，这些国家，其游牧者程度固不高，但亦多进于农耕。而大多数城郭之国，由其宫室文字，则可说其程度，仅低于当时头等文明国家如中国印度罗马一筹。关于他们的古代史，我们不甚了解。今日考古学所发现的，也只是汉代势力西渐中和以后的情况。《汉书》无一语及于佛教，《后汉书》亦未提及诸属国之佛教。但由今日发掘出佛像佛寺与汉代文物同在，则至迟在东汉佛教已流传天山南北，应无可疑。兹略举在东汉时代几个大国，以见一斑。

**吐火罗故国** 玄奘所谓"睹货罗故国"，据斯坦因考察，在今安德悦一带。此包括婼羌鄯善。《汉书》云婼羌鄯善均能作铁兵；且皆在有水草处种谷。玄奘又说"睹货罗国"，即西迁以后之大月氏，其文字"逾广窣利"，用金银等钱，粗知信义，唯甚犷暴云云；殆初入农耕也。玄奘所说的文字是西迁以前即有，或西迁以后始有，不得而知。但文字不是一天能够完备的。而他们与佛教接触，当可能甚早。（参看注八四）

**于阗** 此是南道文明古国，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乃无忧王时代所建，后"东土帝子"来征。汉魏间朱士行首至于阗求法；法显称其国丰乐殷盛，僧众数万，多大乘之学，寺塔众宝合成，庄严妙好；其奉佛教必久。又奘记云："国尚音乐，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曾拟伐迦湿弥罗（喀

什米尔)，由佛徒调解始已。又曾以数万兵击退匈奴十万之众，求婚中国。其西在南北朝有朱居，《魏书》言其“咸事佛语”；此当即奘记之沮渠(斫句迦)，“淳信三宝，大乘尤多，佛法至处，莫斯为盛。”〔注八九〕

**莎车**　《汉书》言有铁山，出青玉。两汉间，威压西域，出兵中亚，后为于阗所败，终为疏勒所并。

**疏勒**　《汉书》言有市列，《后汉书》言与月氏亲善。法显言其行小乘佛教，五年法会一次，《魏书》言其地多稻麦黄锦，魏初尝赠佛像。奘记作佉沙国，“稼穑殷盛，工织细毡”。“文字取则印度，语言异于诸国，文身绿睛”；生子压头使扁。

**龟兹**　《汉书》云，能筹冶，有铅。旁有乌垒轮台渠犁之地，均温和田美。《晋书》言其佛塔庙千所，男女剪发垂项。《魏书》言其地多孔雀。奘记作“屈支”，“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使乐，特善诸国。货用金银铜钱，习小乘教，律义取则印度。”亦有压头之俗。

**焉耆**　《晋书》言其晋初称霸西胡。《魏书》言其文同婆罗门，信佛教。奘记作“阿耆尼”，风教大略同龟兹，但无压头之俗。

玄奘所记，虽是两汉以后三四百年的情形，当非一时之事。斯坦因尝总论南疆考古结果云：〔注九〇〕

> “尼雅(于阗附近)地方当时的生活情形，尤其容易推想出来。地方官吏以及富人所居精细的建筑，制作精美的家具，雕刻得很美丽的木质装饰艺术品以及其他，都显出一种发展得很高的文明。当时的工艺品更明白地显出一种从东伊朗以及印度西北边传来的很强烈的希腊影响。
>
> “所得关于佛教的物品，可见佛教在那时塔里木盆地一般可怜民族的宗教和知识的生活中，已确实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这种强烈的印度文化影响，在附近一座颓败了的遗址同垃圾堆中所得到的许多文书里，也很显著的反映出来。在尼雅废址我曾发见木质简牍几百斤，内中大部分是公牍、契约、账簿，以及其他杂物之类，全用的婆罗文和佉卢文字体写着，这都是西元前后一世纪左右印度边陲同邻近阿富汗的地方所流行的文字。”

如后可见，等到中国文化输入此处以后，又发生新的要素和变化了。最后一说最西的两个地方。

**大宛** 这是中亚古代文化中心之一，当时城郭国之代表。亚历山大之极东殖民地，而成为我国汉时极西的自治领。“土著耕田善贾市”，惟不知铁器耳。为了马的问题，引起中国远征；此后亦和平相处。大宛之得名，西人多以为系波斯及印度人称希腊为臾那——Yavana（由 Ionia 而来）之音译。但大宛土名 Fergana，早在亚历山大以前；意指一条出口之环山河谷。地多草果。《史记》对大宛亦称“宛”。我以为宛字乃音（琬）义（苑）兼译，而大字为形容词。盖大宛有“七十城”也。唐代改称宁远。清初为浩罕汗国。〔注九一〕

又《汉书》云，“大宛治贵山城。”各国学者多以为即《新唐书》之俱战提（Kohdjend），清代称霍占。昔希腊人称为“极东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所在之地。

**乌孙**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同盟国，他是当时游牧国的代表。最初出现于甘肃之西，最后迁到伊犁和以外。西迁后，虽常受匈奴侵逼，于诸国中领土最大，人口最多，莎车龟兹亦曾受其节制。其先王庭当在伊犁，其后迁于赤谷，在纳林河（锡尔上游，唐人所谓那密水）畔。盖汉与乌孙为兄弟，为翁婿，故扶其危难，助其扩地也。然我汉公主不胜乡愁，而乌孙不甚振作。后两昆弥（王）分立，“汉用忧劳，且无宁岁”。汉末，地犹如故，后即隔绝。北魏时董琬等西过，喜见汉人，为之向导。而已为柔然（蠕蠕）所侵，多徙葱岭山中。以后渐失踪迹，其地终为突厥之王庭。唐代北庭都护府，元代察合台汗国，清代伊犁将军所驻。但由乌孙有关的事实，当可推其来去。按今日唐努乌梁海尚有乌斯及赤谷之地名，似显示乌孙系由西伯利亚入唐努乌梁海沿阿尔泰以入甘肃，然后西迁的。〔注九二〕他是第一在《史记》上记有狼的神话之族；而狼的神话，乃突厥族之一特色（虽蒙古人亦有之）。乌孙殆与丁零坚昆构成后来所谓突厥今日所谓土耳其人最主要的成份。突厥之族起于甘肃东部，以阿史那为姓，岂乌孙西迁后，其残留于东部者（东乌孙），渐变为后来突厥之主体；其西迁者，后混于丁零柔然，及突厥既盛，重新合并者乎？（参看注九五）

按：两汉属地西境，其中大宛及休循捐毒，相当于清代浩罕及布鲁特一带之地。此外难兜乌秅无雷，在葱岭西部，皮山子合、西夜蒲犁依耐，在葱岭东部，实皆为帕米尔（玄奘作波谜罗，《唐书》作播密）范围，除难兜曾属罽宾外，汉以后概属于我。一八六四年塔城条约以来，俄占中亚，蚕食新疆，伊犁

以外，沦为俄之行省（如七河省费尔干省等）。其后英俄瓜分帕米尔，虽尚存一部，略有未定之界，然昔之无雷即巴达克山，大部沦入俄之塔什克共和国，一部为英划入阿富汗；乌秅难兜即坎巨提东西之地，为英国划入克什米尔。休循捐毒变为俄属吉尔吉思共和国大部；大宛大体为月即别共和国。昔之极东亚历山大城，亦即霍占，改为列宁巴（Leninbad）。又按：乌孙盛时领地其西包括纳林以北伊犁河流域，塔城以外巴尔喀什湖一带，直至额尔齐斯河，即清代两哈萨克及乌梁海与阿尔泰淖尔所属哈萨克游牧地。一七三四年以降，俄即侵入哈萨克。塔城条约及伊犁界约后，乌孙故地，十亡其七。即今日俄属哈萨克自治国东部及吉尔吉思自治国东北部是也。抗战末期，伊犁在俄人策动下有“自治”运动。目前俄正在哈萨克进行大规模农业计划区。

**汉末“外满蒙区”之情势**　以上是两汉时代西域属国情形。汉晋之际，在大满蒙西域区（此指西伯利亚及中亚），除了高句骊南下，月氏西迁建国并强盛，南匈奴氐羌及鲜卑入华大乱以外，还有若干民族或部落，已站在历史舞台之门口，以后陆续出台。他们原在匈奴之外，及匈奴西迁，鲜卑入据匈奴故地后，他们又在鲜卑之外。虽在中国文化圈最远边缘，实未尝不通声息。及鲜卑南下，不仅与我们发生关系，且影响后来历史甚大。此处先提及其名称地望。

一是肃慎挹娄，后为勿吉靺鞨；在高句骊北。又豆莫娄，在勿吉北。

二是东胡之属。契丹住鲜卑故地（高句骊西，今热河东北）；奚，库莫奚，住乌桓故地（契丹西南）。失韦（室韦），在勿吉契丹北（语同契丹）。地豆干（霤），在失韦西。乌洛侯，在地豆干北。

凡豆莫娄，失韦，地豆干，乌洛侯，皆在贝加尔湖至黑龙江域。（以上据《魏书》）

三是柔然，又称蠕蠕，茹茹，芮芮。据《魏书》，亦东胡之族。其政治始祖木骨闾亦与拓拔氏始祖力微同时。其先役于鲜卑，后并丁零，随鲜卑南迁，入据蒙古，与元魏相争，而为突厥所覆。其兴亡有如彗星，然如续卷可见，他在亚洲史文化史上实有重要影响。〔注九三〕

四是丁零，乌揭，坚昆。我们已知其出现外蒙甚早，甚至最早。据《史记》、《汉书》，丁零在匈奴之北；当即贝加尔湖以西至叶尼塞河一带；坚昆在匈奴康居之间，乌揭（呼揭）乌孙之北，亦即匈奴之西北。而乌揭又在乌孙之

北。《汉书》又云，坚昆为大国，北去单于庭（库伦）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此当在今鄂毕河中游，即今俄属乌拉山东，托波尔一带。乌揭当在今塔城一带。乌孙康居之间，尚有小国乌禅幕。他们皆曾服属匈奴，匈奴尝封汉降将卫律为丁零王。李陵为右校王，或辖一部分之坚昆。乌揭亦单于封地。但他们（尤其是丁零、坚昆）亦尝乘匈奴之衰败而攻之，虽与汉之关系甚少，实两汉潜在的盟国。及匈奴瓦解，乌桓鲜卑居匈奴故地，柔然继鲜卑之后。丁零则西迁阿尔泰山之北之西，汉末似分为二部，后散布于哈萨克一带，后至咸海，以铁勒、高车、乌纥，回鹘、康里之名出现。而坚昆则南下，集中唐努乌梁海，后以羯、契骨、结骨、黠戛斯之名出现。〔注九四〕丁零殆回纥之前身，而坚昆则吉尔吉斯之始祖。乌揭后不见，可能本丁零之一部，而回鹘回纥之始称。丁零在汉末继塞种之后，居于乌孙康居之间的哈萨克区域。此皆预定了他们后来的活动。〔注九五〕

五是哌哒。月氏极盛而衰后，同族之哌哒由吐火罗故地南下，继起代之，并入征印度。（详下及续卷）

六是悦般。匈奴西迁之初，曾于哈萨克一带徘徊立悦般国。大概诸族阻其南下，终于西去伏尔加河而入欧。

## 属国外之西域

葱岭之外，属国以外，《史记》记有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安息、条枝、黎轩、身毒之属。

《汉书》于西域不属都护者，记有下列诸国：罽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安息、条枝、黎轩。《后汉书》有高附、天竺，以及栗弋、严国、聊国、奄蔡，以及阿蛮、斯宾、于罗、大秦。这些国家可分三个区域：一为印度一带，二为中亚本部及波斯，三为大秦一带。第二部分最为复杂，即先后为波斯希腊帝国殖民地，后来皆与大月氏有关者。兹以各国历史为经，汉四史为纬，略言大西域之情势。

**身毒、天笃、天竺** 张骞传身毒，班超传天笃，班勇传天竺之名；印度之称，玄奘以后始著。凡身毒，天竺，泛指印度半岛，特指印度。印度原一地理名词，除无忧王时代及蒙兀儿帝国以后外，从无统一时期。今印度半岛分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二部（东部尚有东巴基斯坦），而与中国发生关系者，隋唐以

前，实以巴基斯坦为多。张骞所闻身毒，乃 Sind，在今巴基斯坦。印人之先由此人，印孔雀王朝由此勃兴，以后希腊人，塞种，月氏以及后来之回族，亦皆由此侵入印度。

按：印度土著为陀罗毗荼人（Dravidians），蒙陀族（Munda），这是与中印半岛人，藏人，吐火罗人，释迦族血缘相近，而与雅利安之印度较远的。而印度半岛最古文化遗迹，如摩衡觉陀罗等文化，是属于他们的。

印度人以及其他的雅利安人，最初或居于中亚。大约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印人才由五河到印度河（身毒）一带，征服当地土人。原是一群游牧好战之群，行多神教。前一二千年到前八百年，为吠陀时代，此以四大赞神歌之形成为名。此时进入半农半牧时期，婆罗门教成立。部落数百，各有小王。及相兼并，渐有若干之大王。社会分为四阶级，曰婆罗门（僧侣），曰刹帝利（王族），曰吠奢（平民），曰首陀罗（奴隶）。僧侣颇肆专横。前八〇〇——五五〇为史诗时代，以后来两大史诗描写之时代著名。前八世纪后，印人进移东部恒河（冈底斯河）；进入农耕。征服攻战，兼并结果，大者十六国，以摩揭陀（Magadha）为最强。此国亦起于今之东巴基斯坦。南部有案达罗（Andra），似为陀罗毗荼人之国。此时四姓之制法律化，婆罗门教系统化（初期《奥义书》）。但在恒河一带，本来文化较高。雅利安人来后与其混血，有所谓非吠陀的雅利安（Vritya - Aryan）。于是在印度东部，乃有一种非雅利安的反婆罗门的倾向。耆那教佛教即代表此倾向的。前五五〇——三二〇为新教学时代。一方面是婆罗门教之哲学化（后期《奥义书》）和修正派（六师），一方面是反对派——耆那教与佛教——尤其是佛教之兴起。前三二一年以后，是以孔雀王朝为中心之佛教传播时代。而此为希腊人东进以后之事。至公元四世纪后，印度教复兴，十世纪后回教始来。国人每以印度与佛教乃不可分离之名词。其实七八世纪以后，佛教日趋衰灭了。

当新教时代婆罗门教盛极而分化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有释迦（Shakya）族所建小国曰迦比罗（Kapilavastu），其王子本慈悲平等之义倡佛教。此即佛陀。旧说生卒为前五六五——四八五，即较孔子略长；近代考证则以为前四六六——三八六，即与墨子约略同时。得摩揭陀国王之赞助，传播其新教于北印中印。释迦非印度雅利安族，其教亦反婆罗门之教也。〔注九六〕

在释迦创教以前，即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波斯大流士时代及死后，

小亚细亚希腊领地，埃及，中亚及印度西北健驮罗（Gandhara）一带，均在波斯版图，摩揭陀及其他印人国家亦受影响。前三二六年，亚历山大侵入五河。其后天热还师，但留有少数驻军。亚历山大死，五河地方有旃达罗笈多（Chandragupta Maurya）者，起而对外抵抗逐希腊人，对内革命取摩揭陀王位而代之。他出身贱族，据说甚至为波斯南部之焦黑人（Ethiopian）。彼于前三二〇年即位，建立孔雀（Maurya）王朝，都华氏城（Patliputra）。至此印度始有恒河印度河大体统一之国家。前三一一年左右塞流西帝国复来入侵，亦被击退。此后两国议和，派使通商。其子复向南部扩张。其孙即有名之无忧王，或阿输迦或阿育王（Asoka）。在位之世（前二七二——二三二），约与秦始皇同时，统一全印，并伸势力于波斯及臾那（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如大夏等）方面，为印度之极盛时期。他本为阴谋好杀之人，其后深悔过去之所为，成为佛教热心信仰者。此时尚无佛像，建塔八万四千座。唯对其他宗教，亦不歧视。佛徒四出传教，东至缅甸，北至喀什米尔，南至锡兰，西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佛教大受其鼓励，亦使印度成为一世界的国家。死后印度又趋分崩。至前一八四年（汉文帝时），西北为大夏，塞种，大月氏侵入，印人退至中部，并出现多数之王朝。西汉时中北印有松加（Sunga）王朝，康瓦（Kanva）王朝之起灭。唯南部陀罗毗荼人安达罗王国，维持较久。月氏盛时，亦向东西两方面通商。印度东岸一带之人，在公元后一世纪末，即有向爪哇方面移住者。

张骞未至身毒，亦未提及佛教。班勇始言“天竺俗同月氏，卑湿暑热，乘象而战，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别国数十，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出象犀金银，有大秦珍物，细布，好毾𣰆，诸香，胡椒……”（《后汉书》）。《魏略》云，“临儿国在天竺城中，生浮屠太子，汉哀帝使博士景卢由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汉书》又云，“和帝时遣使贡献，桓帝时频从日南来献。明帝梦金人，遣使问佛道法，楚王英始信其术”云。

**康居、奄蔡、塞种** 世人多定康居为哈萨克或吉尔吉斯草原，殆于史地未之细考。如下所述，康居变迁甚大。然其中心，实在咸海之南，锡尔（药杀）阿姆（妫水）下游之花剌子模，盛时则包括粟特（窣利），略当于今俄属土克曼之地及月即别北部之地。按康居一带，实为中亚史之关键，其重要之点有五：第一、由其跨两河流域，地甚富饶，其文化甚古，实非偶然。此处之语言（窣利语）一时为中亚之世界语。第二、他又在北在东密接广大之哈萨克

草原。此乃一人种混合形成以及分散之地。所谓雅利安乃至突厥，实形成于此。他又是民族移动孔道，东到中国，西到西亚南俄，南下印度伊朗，皆经于此。雅利安人以后，所谓塞契特种之舞台，实在于此。中国边疆民族，除东北外，也常以此为策源及尾闾。第三、由于这两个原故，大流士以后，亚历山大，大月氏之昭武，突厥之可汗，以及成吉斯汗帖木儿这些英雄之铁骑，均横戈跃马于是。第四、此处又出产一种游击商人，他们将此处汇合的语言宗教带到各处，同时又常与这些"英雄"合作，策动战争。许多国家之兴亡，都有他们的活动。第五、然因此地区之不安定，所以也不易形成稳固的国家。在历史上，康居有如变形虫之伸缩。〔注九七〕

康居在米太帝国时代的情形，尚不明白。但他是亚克美尼帝国之一部。据大流士一世(Darius I)时代的碑文，以及后来希罗多特的记载，他的领土及纳税地区，除米太、波斯、格多罗(Gadrosia)以外，在伊朗高原，有花剌子模(波文：Khwarazm；希文：Chorasmian)，粟特(Sugudu - Sogdian)，班黑(Bakhtri - Bactrian)，木鹿(Margus - Margian)，帕而特(Parthava - Parthian)以及也里(Herat)高附(Kabul)等地。以上花剌子模人在今日阿姆河下游，即元代之玉龙杰赤(Urgench)，明清所谓机洼或基华汗国(Khiva)者是。此处在前八世纪已开始成立小国，即汉代所谓康居(Kangha)之核心。粟特或窣利乃布哈尔(Bokhara)，萨马尔汗(Samar Kand)之古称。后来为帖木尔帝国之都城。班黑即今阿富汗北之 Balhk，亦即汉代之大夏。高附也里均在阿富汗。帕而特是汉代安息勃兴之区；其北即《后汉书》之木鹿，今称Merv，汉代所谓小安息者。又粟特之东，有塔什干(Tashkent)，即唐代石国；有怖捍(Fergana)，即汉代之大宛；当亦在波斯帝国文化中，亦皆为伊朗之族。〔注九八〕而在大夏以南，即沿高附(阿富汗)至俾路支西到木俱兰(Makran)一带，则印度人，蒙陀族，陀罗毗荼，闪族及阿拉伯人之伊的阿比人(Aeithiopians)甚多。里海一带，有喀士比人(Caspii)，波斯湾北为以兰人(Elamites)。此皆所谓"非伊朗人"。而在黑海以东，康居大宛以北者，则属于"敌人"之塞迦与吐火罗也。及亚历山大东征，取亚克美尼帝国而代之。其范围大体相同，惟在印度方面更深入，而在高加索及吉尔吉斯方面则稍后退而已。他占领大夏和粟特(窣利)，当时萨马尔汗(希腊人称 Marakanda 罗马人称 Transoxian)，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但他在这一带也遇到强烈抵抗。后来希腊人在大宛筑城防御塞人。大概希腊人势衰以后，康居渐

渐成长起来。不久塞种、月氏接踵而至。当匈奴乌孙击月氏后，塞种、月氏，当曾先后据吹河至铁门关间，即康居范围之内。

《史记》说康居为“行国，国小，南事月氏，东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二千里，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涯，乃北海云。时奄蔡控弦之士，较康居尤多。〔注九九〕到了《汉书》时代，不言其事月氏，并云有五王，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已是半行半居之国了。五王者，一曰苏薤，在铁门关附近，二曰附墨，在布哈尔，三曰窳匿，即塔什干，四曰罽，亦布哈尔区域，五曰奥鞬，即花剌子模也。汉通西域后，为中国，匈奴，月氏间之缓冲国。据《汉书》，人口六十万，遣子侍汉，唯不肯拜使者。汉兵尝入其国杀匈奴王。后亦相安。

据《后汉书》，栗弋（粟特），严国，聊国（柳国），奄蔡均属康居，奄蔡改名阿兰。按粟特在妫水北，本属康居，后属大夏，后属月氏。大夏瓦解后，康居月氏安息分有其地。大约东汉初，月氏南迁，康居势力益大，并向西伸张，遂抵黑海也。其后大月氏衰，所谓九姓之国，似以康居为共主。几经变迁，灭于蒙古。凡康居及九姓之地在清初为基华（包括木鹿），布哈尔（包括萨马尔汗），浩罕（包括塔什干大宛）三汗国之地。此与其外之哈萨克地，在清代中叶以前，尚多朝贡。一八六四年后，一一为俄所夷灭。

奄蔡即罗马帝国时代之 Aorsi，或亦即后再出现于印度南俄之 Azes 与 As；阿兰即 Alans。奄蔡当在塞契特种乃至萨马特之列。汉初即在高加索及克里米一带，究原在该处，抑匈奴始击月氏时西迁者，不可知。当月氏再自伊犁南下时，“塞种分散”（《汉书》）。除一部分南下外（详下），一部分必西迁，此或即阿兰，殆由康居夺奄蔡之国者。近日西方史家认为阿兰即萨马特人之后。是否与奄蔡同族不可知，但塞契特自此瓦解。阿兰在汉末为大国，据罗马记载越里海至高加索及黑海之克里米一带，统治斯拉夫日耳曼人之祖先。其后匈奴西迁，役属阿兰，并在四五世纪大移动时挟之而西迁欧洲。〔注一〇〇〕凡奄蔡阿兰之地，后为蒙古土耳其鞑靼所有。一七八三年俄并克里米，进而蚕食高加索，十九世纪之始，高加索始全为俄国所并，并由此而至外里海区，即康居之地点。

**大夏、罽宾、乌弋山离、高附** 按大夏指今阿富汗北之班黑（Balkh），罽宾原指迦毕试（Kapisa），晋后指全部喀什米尔（《唐书》作箇失蜜，玄奘作迦湿弥罗）。乌弋山离后名排特（Boledi），即俾路支一带。高附（Cophen - Kabul），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一带是波斯帝国的“东域”。而居民则以

伊朗印度各种族为主。波斯文化先得自亚述一带，而大夏(班黑)是古波斯生命活跃之地，祆教即起于此。又由大夏以至喀什米尔以至恒河，则印度文化形成之过程。又亚历山大东征以后，这一带是希腊人之殖民地或东域。亚历山大自印度凯旋，乃经木俱兰(Makran)沿阿拉伯海经格多罗(Gadrosia)至古波斯城，以兰(Elam)，而至巴比伦。大夏一面与塞流西帝国交通，同时与东部诸希腊殖民城市交通。故大夏又希腊东域之中心。张骞不知希腊，但他经营西域之热情，是因想联合“大夏之属”而引起的。

亚历山大先娶塞契特酋长阿夏(Oxyartes)之女罗珊(Roxana)为妻，后又纳大流士三世之女(Stateira)。阿夏旋为希腊大夏首任省长。亚历山大帝国经承继决战分裂后，西南亚洲亦生新的变化。先是公元前三二〇年，五河地方印人逐退希腊人，开孔雀王朝。前二五六年左右，希腊人的大夏省长第阿多特(Diodotus)乘塞流卡及朴托莱梅两王朝之战，塞流卡王城鞭长莫及，宣布独立称王，是即希腊·大夏国(Greaco - Baciria)。后有粟特及今阿富汗土地，仍行希腊政教。前二四八年，原来帕而特地方萨马特族中之巴纳族(Parni)酋长名安息(Arsaces)者，推翻希腊人政权独立，其后嗣入据波斯高原，建帕而特国，即中国史书之安息国(Parthia)，则为波斯人占多数国家。于是希腊殖民者之中亚领土，分为大夏安息二部(周赧王至秦王政之际)。两国互相攻战，而希腊人东方总部之塞流卡王朝，亦时欲恢复其中亚权力，形成三角斗争。大夏安息均常依塞契特人自重，助长了后者之势力。而大夏国内军人攘夺政权，内争时起，亦常恃塞契特人决胜负。前二三〇年，部将攸替德摩(Eutydemus)夺第阿多特之位为大夏王。此时塞流卡王朝之安都三世与其合作，击败安息，一时恢复了塞流卡王国之权力(前二〇九年左右，即陈胜起兵之年)。不过安息王国仍保持其独立。

前一九〇年，罗马隔断大夏与希腊本土之连络。攸替德摩后继者狄麦特(Demetrius)乃越兴都库什，侵入高附及印度之五河一带。前一七〇年大夏守将幼克拉底(Eucralides)又独立称王。希腊人互相攻伐，大夏的希腊势力日衰。此时帕而特、塞契特或塞迦纷起反抗希腊人，继而前一四〇年前后月氏塞种大举而至，益迫希腊人南退印度。罗马史地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云：

> “塞契特族中最著名的 Asioi，Pasianoi，Tokharoi，Sacarauroi 等游牧民，由锡尔河北侵入，灭亡大夏。”

最后二者，相当于月氏和塞种。〔注一〇一〕此正张骞由大宛康居往访大月氏之时。

据《史记》：匈奴攻击月氏（约前一六九年），月氏西走（伊犁）〔逐塞种〕。（此后塞种当在吹河及锡尔河一带。）旋匈奴助乌孙又逐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大宛传）。《汉书》云：“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这是一种月氏追塞种，塞种追希腊人之形势。就《史》、《汉》之年代推测，大概塞种至迟在前一三九年左右占领粟特，月氏至迟在前一二九年左右占领粟特。然月氏似乎并未立即南下。此或者由于塞种与大夏（希腊人）一时合作，抵抗月氏之南下。或大夏鉴于不能抵抗此洪流，求臣属于月氏以自保。但结果大夏自然不支。大概在前一四〇年左右，大夏之希腊政权已不存在，而逐渐转入大月氏统治之下了。

这个情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亚历山大及希腊人多与塞种结婚，其军队亦多系塞种佣兵。希腊人统治既衰之后，各种政变，常有塞种兵变在内，实意中事。公元前二世纪以降，原在大夏之希腊人，先退至高附，继至喀什米尔、五河一带，建立王朝（如弥兰王）。及塞种月氏追踪而至，到公元前四十年，希腊势力全部瓦解了。〔注一〇二〕

而原来散居乌孙康居一带之塞种，为月氏所迫，除残留于新疆乌孙大宛附近者外，一部分西走奄蔡，大部分随希腊人奔大夏，复由此分散。自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一二世纪中，塞王南至喀布尔流域占罽宾。一部分入阿富汗之西南，即今日之 Seistan 之地。一部分南经俾路支至印度河建小国，今已发现塞种代替希腊人所建王朝之希印风货币。此所谓“分散为数国”也。塞种南下时，并与希腊人安息人乃至奄蔡人合流。凡此诸族，皆蒙塞种之称。据印度资料，其西北边境王朝，有臾那（希腊），有塞种，有安息（Parthlavas）。而其关系，亦不甚分明。然自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起，希腊及塞种政权陆续为月氏所接收。如此了解，则中西记载和考古（主要是货币）资料，均可相符。

大夏，即希腊之大夏，据《史记》云，“妫水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兵弱畏战，善贾市，民可百余万，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盖希腊城邦之风也。又云，“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之蓝市城应在班黑附近，殊无问题。唯大夏得名之说不一，而马卡尔

(Marquart)始以为即吐火罗之音译,甚得赞同。〔注一〇三〕但张骞到大夏时,吐火罗人(即月氏)尚未至阿富汗,故未可视为定论。我以为夏即班黑之“黑”,或希腊(Hellas)之“希”之音译。同时天气暑热,有如长夏而来。盖亦音义并译的。

《汉书》记罽宾云:“种五谷蒲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象、孔雀、流离。”其王尝杀汉使,汉使亦尝另立其君。乌弋山离出产民俗货币,同于罽宾。《后汉书》言高附“俗似天竺,善贾贩”。又《后汉书》言乌弋山离为“安息役属为外国”。《后汉书》言高附依违于罽宾天竺安息三国间。“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所属无常,后属安息。”及贵霜王破安息,皆入大月氏版图。

**大月氏、贵霜**　最后承继希腊大夏帝国之遗产者为大月氏。如问大月氏地点,可说以今日巴基斯坦为中心,且奄有阿富汗及北印之大部分。〔注一〇四〕《史记》云,月氏本行国。意即据大夏后为居国。其后向东西扩张,一时安息人,印度人,希腊人,塞种人均受其支配,且直抵汉之边境,为中亚大帝国者凡五百年。《汉书》云“大夏民弱畏战,月氏徙来,皆臣畜之。有五翎侯,皆属大月氏。”五侯者:一休密,即护密(Wakhan),无雷之西,兴都库什之北。二双靡,即商弥(乞特拉尔)。三贵霜,即健驮罗。四肸顿,在贵霜西。五高附,见前。

《后汉书》,大月氏分大夏为五部,“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疑即 Pushto,指阿富汗及印度之间居民)、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此后最为富盛。诸国称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西域传)。又据班超传,月氏尝助班超攻车师,康居尝助疏勒抗班超,亦因月氏之劝而退兵。其后求婚汉室,为超所拒。出兵七万攻班超,为超以计败之。此后遂常贡珍宝。但自班勇以后,其政治与文化势力似已深入疏勒和阗。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健驮罗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冬居印度,夏还迦毕试,春秋止健驮罗。大兴佛教,具释三藏。”为大月氏极盛。万震《南州志》云,“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与大秦同,人民赤白,土地所出,奇玮珍物,天竺不及也”(《史记正义》引)。又据西史,公元前一世纪,五河一带,为塞种或安息、臾那之王朝。公元一世纪初,Kushan 王朝 Kujula Kadphises 勃兴,征服印度西北一带,此当即贵霜之丘就却。时月氏曾派人至罗

马通商。公元一、二世纪，北印、大夏、粟特，皆在其势力之下。在著名 Kanishka 王时代，都于健驮罗附近一带之白沙瓦（Peshawar）为佛教护法，即迦腻色迦王也。大乘佛教及今日以健驮罗艺术知名于世之希腊佛教艺术，皆以此为中心。《后汉书》言月氏与康居联姻。考古学亦证明康居王统，与贵霜安息乃至黑海一带王家皆为有关。在月氏文化影响下，康居亦贵霜化，此康居贵霜集团，成为中亚之支配势力。此在文化史政治史上有重大关系之月氏贵霜帝国，其盛时固奄有今日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北印及中亚之布哈尔一带，而在汉代势力衰后，伸其势力于新疆。〔注一〇五〕汉晋之间，承继波斯希腊及孔雀三帝国之遗产，为中西文化之媒介。时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史记正义》引康泰外国传）。迦留陀伽《佛说十二游经》云：

“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天子，土多名象。西有大秦天子，地饶金银。西北有月氏天子，地多好马。”

迦腻色迦王后，月氏因内乱而衰。东汉之末，月氏人归化中国者甚多，在凉州流寓者尤极一时之盛。至三世纪，即三国晋初，西有萨珊波斯之兴，月氏遂受压迫，除高附罽宾五河外，印度之领土皆失，中亚情况亦不明瞭。至四世纪，南有印度笈多朝之起，北有蠕蠕之兴，势益不振。至五世纪，哌哒自妫水南下。法显西行时，大月氏即已由历史上消失了。〔注一〇六〕

**安息、波斯** 汉代不知波斯，只知安息。安息继古波斯之后，开萨珊波斯之先，但非即波斯。唯皆以伊朗高原为主要范围而已。古代波斯仅指伊朗西南，所谓 Faristan；里海西南曰米太，东南曰帕而特（在德黑兰东），即安息。在波斯帝国时代，安息实为游牧民之区域。其后脱离大夏独立而建国，其盛时领土，以今日伊朗为中心，尚有伊拉克阿拉伯及阿富汗之一部分，及今俄属土克曼高加索之一部分。不过始终是不稳定的。按安息独立之初，本为小国。因塞流卡王朝有叙利亚人之反抗，罗马人之兴起，不遑顾及，始能站住。复因大夏内争，得以强大。公元前二一二——一二九年，对塞流卡夺巴比伦土地，至幼发拉底河，北并高加索，南至阿拉伯，东临妫水，有大夏之一部，占领底格里斯河岸塞流卡所建之城，即迁都于是。公元前一〇〇年左右（武昭之际），最为强大，一时大月氏及亚美尼亚受其支配。罗马既兴，与争高加索之霸权。前九十二年，二国曾订和约，常与塞种吐火罗合作抵抗塞流卡王国，然亦受塞种吐火罗之人侵。安息有两王，皆为吐火罗人所杀。

至米特里达特大王(Mithridates Ⅱ),击败月氏或塞种。此后亚美尼亚勃兴,高加索之地尽失,而罗马复攻米索布达米亚。在庞培、安东尼时代,形成安息、亚美尼亚、罗马之三角斗争。至奥古斯都(公元前二十年),安息罗马议和平,以亚美尼亚归罗马,而米索布达米亚归安息。此后安息亚美尼亚渐合作对抗罗马。然大月氏已兴,蚕食安息。而罗马在特拉扬(Trajanus,九八——一一七)为帝时,欲承继希腊人之遗产,东征安息。此时月氏曾派使至罗马(据传亦为迦腻色迦王所派),盖欲排除安息,为中国罗马丝绢贸易之中介人。安息受月氏罗马之夹攻,国势日衰。公元七七年后,国内多乱,诸王分立。至二世纪中叶,罗马皇帝安敦(Marcus Aurelius Atoninus)为亚美尼亚问题派兵征安息。一九八年,首都为罗马所掠,国势日崩。三世纪初(二二六),波斯人之民族主义,随袄教之复兴而发展。三世纪初(二二六年,即诸葛伐魏之时),波斯省长推翻安息王朝,是为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开波斯文化之黄金时代,续与罗马东罗马相争。〔注一〇七〕

其与中国关系,则张骞始传之。《史记》云:"俗土著耕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大小数百城,最为大国,临妫水。民商贾,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如其王面。画革旁行,以为书记(皮纸横写)。"《汉书》云:武帝时以二万骑迎汉使,派使来汉,以大鸟卵及犁轩眩人(幻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后汉书》云"户口胜兵,最为殷盛。"章帝时献师子符拔(似麟无角)。和帝时,尼甘英之西行。后国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枝大鸟云。

**条枝、犁轩、大秦**　《史记》两《汉书》所记,与西方历史对照,大体可明。惟安息以西之条枝、犁轩(犁鞬)、大秦所指何在,至今使人困惑。《史记》云:"条枝,在安息西,临西海,安息役属之。长老言有弱水西王母。"《汉书》谓条枝"在乌弋山离西,自条枝乘水西行,近日所入。"《后汉书》则谓在安息西南,属安息。今日学界多数同意所谓条枝,指叙利亚,亦有谓指阿拉伯或克里米者。唯希腊罗马时代叙利亚,亦包米索布达米亚而言。我以为条枝即底格里斯河之音译,指今日伊拉克;《后汉书》所云"甘英临大海欲度",即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后汉书》又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南乘海乃通大秦。"我以为于罗或即耶路撒冷,亦未可知。则在地中海红海之间矣。〔注一〇八〕

《史记》、《汉书》只提及犁轩。《魏略》及《后汉书》云:"大秦国一名犁鞬,

在安息条枝西大海之西”。“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大秦。外国珍异皆出焉，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夏德以为犁轩即叙利亚埃及阿拉伯三地间之 Rekem。白鸟库吉与伯希和以为即亚历山大之“历山”。后说甚是。中国人对西方之界线，是逐渐扩张的。《魏略》及《后汉书》云：“大秦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几于日所入”；疑《汉书》条枝近日所入不实。其实此不过表示中国对西方之界线逐渐扩张而已。而西王母之说忽盛，其鼎鼎大名之 Cleopatra 乎？〔注一〇九〕大秦何所指？由一名犁轩之说，固可云指埃及。由“大秦王安敦”之说，亦可云指罗马。而《史记》云，安息北有奄蔡犁轩，亦有指为亚美尼亚者。《魏书》云：“大秦国都安都城”，当即塞流卡国之 Antiochia，故指为叙利亚者亦有力。日本藤田丰八以为大秦即波斯文 Daksina 之音译，意为左方下方西方之意；故以大秦泛指安息以西而言。而《史》、《汉》常提及大秦犁轩之眩人(魔术)，而此与印度类似，故有指为印度者。我以为应了解这几点：古人之西方世界观，是随时扩张的(西人对亚洲观念亦然)。在张骞时代，塞流卡帝国还有小亚细亚及叙利亚一带之地，亚历山大在希腊治下；所以他传犁轩之名。班超时代，罗马势力已达安息边境。所以他想直通之大秦，当指罗马。又汉人不以另有意义之大字译音。大宛大夏大月氏之“大”，皆非译音。东汉安帝时，张珰已知秦海。黑海古称“Pontus Euxinus”(义云友好之海)，秦当即 Xin 之音译。故海西指黑海及地中海西无疑。又《后汉书》除海道外，还有一条通大秦陆路：“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多不经。”此处所谓绕海北行，当指由波斯湾而北，出海西至大秦则指由黑海南岸以至义大利。飞桥，指鞑靼尼尔海峡。海北诸国，指地中海北之马其顿、雅典与罗马。而除大秦王安敦记事外，《魏略》、《后汉书》均有大秦三十六将会议国事，王无常人简立贤者之说。此指罗马元老院，亦无疑义。综两汉人之报导，大秦泛指希腊罗马世界；先指东部，后指本部；先指埃及，后指罗马；似乎极为显然。〔注一一〇〕唯汉人对于黑海地中海之地形不甚分明，尤不知亚历山大城与希腊罗马帝国之关系，故常令人生南辕北辙之印象而已。

随汉人世界知识及权力之扩大，《史记》两《汉书》并记有诸国离长安洛阳道里。如大宛去长安万二千五百里，大月氏安息万一千六百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安息去洛阳二万五千里，而大秦又在安息西七千里外。虽未可

尽信为确，然如《后汉书》西域传所云，“五十余国，纳质内属，条枝安息，至于海滨。四万里外，重译贡献。”汉之光热与力，其放射之区亦远矣。

## 汉通西域之影响

张骞西征，史公谓之“凿空”，夏德（Hirth）比之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其动机主要是为了国防。一是“断匈奴左臂，隔绝南羌月氏”。二是为了确保马匹之供应。马是古代的空军，这是中国的弱点。所以当时天马来华，是一大事。《天马歌》云：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九夷服。”

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目标，是为了水利探险黄河之源。又斯坦因谓汉通西域除了政治目的以外，即在推销中国过剩之丝织品。丝是中西交通之大导线，中国亦尽力维持丝道交通。但中国之目的，究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然其影响之重大远过乎此，简直是武帝张骞梦想不到的。而其意义与教训，也还是我们今日领会不尽的。

简单的说，汉通西域影响有三大方面。一是开辟了欧亚之商业交通，二是维持了亚洲乃至欧洲之和平，三是促进了中西文化之交流。这三者交互影响，又共同影响以后的历史。我想，自孔子以后，没有比秦始皇，刘邦，董仲舒与张骞，影响中国和亚洲历史更大的了。

对此三者择要论述之前，先要指出，张骞所以能完成开创这一伟大业绩，也有三个重要的背景。

第一，秦汉以来，中国人世界观扩大，有建立一种世界国家的气魄或想像。在周代，中国人对西方之想像是“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战国时代一变。如《楚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战国末又一变。一方面有邹衍大九州之说。另一方面，秦赵之人，均有其先造父导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说。于是有《山海经》一类的书。如太史公所言，“禹本纪及山海经言黄河出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上有醴泉瑶池，有西王母及其他怪物。”因此“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马而朝万国”（《盐铁论》）。此亦可谓类乎哥仑布之受《马可波罗游记》之影响矣。

第二，张骞之前，早有许多无名英雄为其前驱。他说在大夏，看见邛杖

蜀布,而系市之身毒者。他又听说"乘象国曰滇越(《魏略》作盘越,汉越国),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可见张骞以前,川滇与越缅印之间,已有交通。他是以胡奴甘父为向导西行的。可见当时胡人(匈奴)早有到西域者。他由羌中归,可见青海与新疆西藏,亦必早有交通。他是汉中人,必先由西北西南两方面得到西域的若干消息。

第三,华夏以来的声名文物,足为其事业之精神后盾。而秦汉之国力,足以对其事业作实力支持。这是中国传于西域的两个名字可以证明的。

## 丝锦文化与秦汉国力

中国为西方所知最早当在何时,尚为一谜。有人以为希罗多特(五世纪)书中之"北风外居民"即指中国,但不过揣测而已。

西方对于中国最早之称,一是丝国(Seres,Serica),二是支那(Sin,Thin,Cina,China,Chine)。前者还似乎稍早。波斯帝国最先打通欧亚陆路交通。仕于波斯王庭的一个希腊人的历史家克特西(Ktesias)的著作中最先提到"丝国",其书当在公元前四〇〇年顷,即春秋之末。亚理士多德提到蚕。亚历山大东征时,派尼亚古斯(Nearchus)探印度洋;又携有各种专家之幕僚,其中之一名奥涅西克利图(Onesikritus,前三二八年死)。二人均在断片文字中,传丝国之名。而纪元前一世纪罗马大诗人味吉尔(Virgil)已有咏丝之作。其后亚历山大城斯特拉波(Strabo,63BC - 25A. D. )之《地志》,谓"丝国人寿长二百岁"。一世纪之普林尼(Plinius 23—97 A. D. )在《博物志》中更明白提到中国之丝。〔注一一一〕此是由中国出产,即丝锦文化(Sericulture)而来的名称。

关于后一系列称呼,在印度《摩奴法典》中,即有"Maha China"(大支那)之名。孔雀王朝时宰相之著作中,亦有支那二字。此与《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提到秦国("Sinim")是否中国,自可有怀疑余地。但以后印度波斯方面之文书,均以支那称中国。关其来源,最可信者,当仍为秦之威力四播后,传于西南而来。直到汉晋,匈奴西域,仍称汉为秦。〔注一一二〕一世纪后,南洋香料贸易渐盛。一世纪末希腊人的《红海一览》(Peri - plus Mar is Erythraei)(实指阿拉伯海)一书,明白的称中国为:"Thin"。公元一五〇年罗马学者朴托莱梅(Ptolemy)《地志》中提及"丝国"(指我西北)"秦国"(指我

西南);其实皆为中国。

以上所举诸书所说的中国,大体上都说东临大海,南接高山,地大物博,人皆“和平,中正,俭朴;以绢铁为特产”云云。五世纪后,“丝国”、“支那”不甚为西方提及,此盖自西罗马之衰亡与西方兴趣集中于基督教,而东罗马帝国则方与萨珊波斯相争,无暇东顾也。

大概而言,丝国为北方陆路(丝道)上称呼,支那是南方海道(香道)上称呼。

在张骞之时,秦汉在域外能号令敬意——不仅是一经济的实力的,而且是一文化的道义的权力,是很显然的。否则,他是不能见重于外国的。

## 丝道之自由

中国之开通西域,目的不在经济,但为了支持政治,必保护丝道自由(Freedom of Silk Road);而此为远东与大秦交通之一决定性步骤。

交通之开辟,常以民间的商业的活动为先驱,此必有追求之对象。中国兴趣所在,为西方之玉。《管子》揆度篇:“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案:何秋涛谓禺氏即月氏)。天山南路产玉,于阗尤多。玉门之名,或由此得。瑶池之说,当亦由此来。于阗与西亚之玉石贸易,据说可追溯至公元前二千年。

古代西方人最感惊奇者是中国之丝。亚理士多德谓蚕为一种有角之虫。味吉尔谓丝由树叶作出,其后有谓由竹叶作出者,二世纪后半,始谓系由一种蜘蛛作出者。希腊罗马以中国丝锦为稀世之珍。据说亚历山大东征,丝为主要动机之一(见《大英百科全书》丝锦条)。艳后克乐巴有专门为他织绵衣之处。罗马贵妇尤爱之。西人考证,中国之丝出现于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而丝贸易之盛,则在公元后一世纪。当时大普林尼谓罗马金钱流入印度、阿拉伯、丝国三地,年不下一亿赛(Sesterce,罗马币名,合银元七十万)。而消耗最大者,则为丝绸。威尔士谓当时丝至罗马,价等黄金。然用之者众,金钱东流,有如流水(《世界史纲》)。桑弘羊也说到西域诸国“贵彩缯”(《汉纪》作绵缯)。但西域人大概多半是转贩于希腊罗马的。

此项商品之聚散,以于阗叙利亚二地为中心。于阗盛行一种传说,即于阗王为求蚕桑之术,乃求婚于东国王,并告王女,于阗无蚕,不能制衣。王女

始将蚕种私藏帽中带来云(此说载于玄奘《西域记》及《唐书》,斯坦因且发现此一传说之板画)。直至六世纪中叶东罗马求士丁(Justinian)帝时代,才派两个波斯僧人用竹棍将蚕种带到西方。〔注一一三〕

东西之贸易交通,也可说是一种丝玉因缘。此种因缘,又因亚历山大东征,张骞西征而大开。

张骞以后,由敦煌出西域南北二道,已见于前。西洋人对此丝道有朴托莱梅之书保留下一世纪马其顿商人由叙利亚到丝国的路程记录。据近世赫曼(A. Herrmann)考释,谓由叙利亚之安都(Antioch)越幼发拉底至安息,经德黑兰及木鹿(Merv)至大夏,再至帕米尔,经一"石塔",达疏勒。由此分二路:北路经 Issedon Scythia(赫曼以为即库车),Damna(或即焉耆),Issedon Serica(即鄯善)达 Daxata(玉门关)。南路经叶尔羌,和阗以至 Throana(敦煌)与北路合,经 Drosakhe(酒泉,肃州)Thogora(张掖,甘州)以至丝都(Sera Metropolis,长安)支那(Thinae,洛阳)云。("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E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及匈奴西迁,又多一新道。故《魏略》西戎传有新道。至隋代裴矩《西域图记》,有南中北三道。中道即汉之北道,此即法显出国时所经之道。而北道则《魏略》新道;即由伊吾(哈密)经车师后国(济木萨)出乌孙(伊犁)而至吹河北,此即玄奘出国时所经之道。但这条路,也是早已存在的草原道。

这东西贸易路,自古以来,在安息大夏康居的商人手中。他们是天才的商业民族。及匈奴势盛,达到河西与西域,这贸易线便在匈奴控制之下,而东西贸易全为匈奴垄断。秦筑长城,汉设河西四郡,驻军西域,先后打通南北二道。此在国防上是切断敌人补给线,保障自己补给线;而在商业上即在维持丝道之自由。所谓都护,即总护南北二道之意。于是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输出西方,西方之玻璃、软玉、罽(毛毯)、火浣布、鸵鸟、孔雀、狮子,山积长安诸苑。匈奴失此利益,势必反攻。及窦宪北征,最北的草原道也开了。汉逐匈奴甚得西域同情,即是汉人打通并保护交通,对他们有极大利益。东西交通既开,匈奴失去一主要财源。屡欲夺回无功,就只有崩溃之一途了。

但西域的若干民族,也不愿这条路能直接交通,失去中介之利。所以甘英渡海通大秦,即已为安息人妨害。二世纪初罗马安息相争,陆道受阻。汉末匈奴勾结车师叛乱,西域不通。海上交通就应运而兴了。

## 漢代中國與西方

圖例

- 絲道
- 匈奴西遷道
- 現在亞洲國界
- 羅馬最大疆域
- 東方都市
- 羅馬都市
- 今地名 加（ ）



古代南海交通以越南为中心。秦设象郡，汉武设珠崖、儋耳、日南后，曾遣使至南洋诸国，市明珠、流离等物。《汉书》地理志有都元、邑卢没、谌离、黄支等国。据考证：都元在马来半岛，邑卢没、谌离在缅甸，黄支即印度东岸之Kanchipura，亦即玄奘所记建志补罗国（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另一方面，印度与欧洲，自古即有交通。一世纪来，陆路受阻，而罗马人发现印度洋上之季候风，自埃及至印度之航海大盛，贸易直达中印半岛。香料贸易以苏门答剌及越南为聚散之地。《晋书》所云安息天竺与大秦交市海中，其利百倍者是也。乃有甘英之尝试。又蜀贾早通越缅。安帝时掸国遣使者来朝。顺帝时叶调掸国来贡。掸即缅境暹族，叶调有谓为爪哇者。则“香道”已开。西洋史上一六二——一六五年，有名哲人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攻略安息，取得波斯湾。《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由日南遣使献象牙、犀角、瑇瑁。此中国与欧洲正式直接交通之始。孙权时，大秦贾人秦论由交趾见孙权（《梁书》中天竺传）。后来法显义净，也是经此航线的。

这一段历史，是土耳其人隔断东西交通，引起航海运动的先行事件。

## “Pax Hanica”

其二，是维持了亚洲之和平。西域原属匈奴。汉连西域，不仅孤立了匈奴，也解放西域不受匈奴之奴役。不仅此也。西域诸国，亦常战争，王莽以后西域不通，诸国内争及兼并甚烈。西域复通，汉为之兴废继绝。汉之都护，常发生调解作用。不仅此也。汉在西域之权力地位，对当时世界和平，大有贡献。一、如无汉之力抗匈奴，则匈奴即能完成后来蒙古人的事业；如无汉在西域势力，则匈奴必南下中亚，中亚历史必不同。二、当时中国与乌孙为同盟，与大月氏及康居亦甚友好。（东汉时大月氏与康居为同盟，中国一度与大月氏作战，旋即和好。）中国与安息亦甚友好。但大月氏与安息则时有冲突。汉力及于兴都库什以后，月氏安息两国关系亦趋良好。三、在这形势下，使安息未能扩张，另一方面，也使是时的东罗马不能进攻安息，因而维持了安息与罗马之均势，东方与西方之和平。终两汉之世，中亚大体维持了内外和平。这是中国大一统后进入亚洲历史并能对世界担负责任的表现。

罗马帝国时代，号称“罗马式和平”(Pax Romana)。这和平是建设于武力镇压上的。但“汉式和平”不同。例如班超在西域，只有极少数(一千人左右)志愿军。中国亦不像亚历山大及后来后继者的希腊人罗马人干涉各国的政教，强迫实行希腊化与罗马化。而这也是希腊罗马的势力早成陈迹，而中国力量细水长流，如今健在之故。

近来东比(Toynbee)高唱“西方国家”与苏俄应学习大秦与安息模范，“和平共存”。他不仅没有知道苏俄不是安息；更没有知道，只有两大势力之时，是没有均势的。没有大月氏，没有中国，当时罗马安息均势，根本不能维持。他似乎不大知道月氏的重要性。更不知道两汉的重要性。不仅此也，即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与波斯能维持均势，也还是因为有突厥和中国的势力存在于东方。西方常有热心于牺牲中国购买和平的历史家，其对于东方历史之无知，往往如此。

## 中国文化之西流

第三是促进了中西文化之交流。如上可以看出，自战国以至两汉，西域成为波斯，希腊，印度，中国四大文化会合点。大夏、安息原为波斯文化之地。其后亚历山大及塞流卡王朝带来希腊文化。而印度文化自佛教以后向外扩张。佛教，如上所述，严格而言，并非印度思想，但毕竟产生于印度，且使印度借此参加世界思想之运动会。最后，是中国文化之来到中亚，有所与，亦有所取。这真是一个可惊异的大聚会。西方史家过于夸张大希腊风之意义。这不是很公平的。近来欧人意见亦渐变更(如 Max Cary)。我想先略谈中国，再及其他。

由张骞到班超父子，三百多年，汉人在西域驻军屯田，使节商人来往甚多。中国文物，如木简、绢、纸在敦煌及罗布泊之流沙中出土者已有数千片。这是汉文化的证据。不过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日常实用性的。占卜，药方，兵，算，字学之书。此外多为佛教美术。若干外国学者据此，以为当时西域文化，就美术言，有波斯风，希腊风，印度风而无中国风(如勒科克)。至于中国文化，唐代以前，在西域，实浅入而不彻底，并未改变当地固有文化，而其流传，不出当时汉人戍边吏士之中(如羽田)。而这些人，我们已知，多半是罪犯亡命之徒。所以，不少学者据以灭杀西域汉文化之意义。但他们忽略，

今日西域出土古物，原是很局部的东西。再则，随亚历山大而东来者，何尝不是与中国西戎同类之人物？他们尤忽略，中国即使殖民，决不干涉各民族固有文化。又忽略，如唐代看见汉化之进一步深入，亦由两汉之奠基。明乎此，即以现有资料而论，我们即不能不惊叹汉代文化在西域表现的力量了。

前面说过，必研究西域的情形，才愈能了解汉代文化之实际及其精神。我想就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请读者耐心的由东到西对中国文化在西域表现作一鸟瞰。（凡涉及考古学的，多摘引自斯坦因和海定之书。）

首先是汉代长城一带。按《史》、《汉》匈奴传均载太初三年（前一〇二）后"使徐自为出五原塞，远者千里筑城障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屯其旁。"斯坦因在一九〇七年后发现汉长城遗址。他将所得文书交给沙畹研究后，在《西域考古记》曾作如下扼要之叙述与观察：

四郡既开，西域大通。但中国使者常受匈奴袭击。于是中国即建立屯戍，保护新辟中亚之大道，并延长长城。秦长城是防御性，而汉长城是前进政策之工具。至于嘉峪关砖城，乃中国中古以后恢复闭关态度封锁中亚而造，用意完全相反。汉长城极似古罗马的长城系统(Lime System)。〔注一一四〕此长城自张掖之北至敦煌，对罗布泊大路伸展，止于疏勒河边经过处，又突向西南，蜿蜒约二十四哩，止于沼泽地方，全长达四百哩。城墙至今厚八呎，高七呎，用芦柴与泥筑成，土中含有盐质，已成半化石状态。"在这种地方，墙可抵抗人同自然。芦柴和泥层的弹性和黏性，抵挡风蚀，比任何其他东西高明。注视耸立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出产，无滴水，建设这种坚固的城墙，真表现人类之辛劳。然四百哩长城竟于短期告竣了。"

长城西段光石高原上，有很多碉楼耸立，基部方达廿呎至四十呎，顶上渐小。这一定推行于全长城线。

在长城沿线发现彩绢，木简，书法异常干净。在长城西端发现太始元年（前九六年）木简，此是长城尽头。地名是大煎都。此可考定工程年代。

"由中国史学之祖之可靠记载，我们知道汉武帝第二次远征西域后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障。这些瞭望台是当作烽火台用的，同时是一防线。位置似乎是用反光镜观察摆成的。长城线后面有小驿站，大概是障。"在这里面发现许多木简，上有汉宣帝年号，以及字书（《急就章》），历书，窣利文木简，绢书，婆罗文，用中国新出纸张所写窣利文通信，以及武器、药品。有一

个诏令上书："属太守，察地形，依阻险，坚壁垒，远候望。"一个木简上书："箭一支归库，另易新者。"

"西元后一世纪，古长城曾筑复城，由此处商道之旁耸立之方堡可以见之。此砖筑城墙底厚十五呎，至今高度还有三十呎以上。一百码处有一小丘，是驿站。中有文书，表示其为古玉门关。其中有很多木简，述及长城方面之军情。离此五哩，有三间相连之屋址，长五百六十呎，高至今有达二十五呎者。这一定是用作仓库的。果然发现木简，谈到衣物粮食之储运。""这充分表示中国最初进入中亚需要何等伟大力量，系统组织，以及人力方面伟大的痛苦和牺牲了。"

按《史记》匈奴传及《汉书》地理志注说："武帝使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民国十九年，我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酒泉沿额济纳河到居延海，发现万片的木简，此即敦煌简外的居延简。最早者是宣帝时代的东西。（现由劳榦先生等整理，有《居延汉简考释》。）

其次，应略及敦煌。此原是胡人之区，后为西域大门，是军事交通孔道，也是商业中心。《后汉书》地理志注；"华戎所支一都会也。"两汉对当地吏治甚为注意，人文也逐渐发达。窦融世代服务河西。侯瑾，盖勋，张奂，索靖，皆敦煌人。汉末为汉人避乱要地之一，后来成为佛教中心；然此亦是由先有汉化基础。敦煌之有名，除了这一带简牍古迹以外，有西千佛洞，万佛峡，和千佛洞（莫高窟）的佛像，尤其是莫高窟石室中的卷子。其中所藏中国古典残本，各种宗教（包括极希罕的袄教、景教、摩尼教）文书，通俗文学残卷，尤其是各种西域中亚语文，如窣利、龟兹、和阗语、佉卢文、婆罗文、梵文、卢尼文，以及回鹘、突厥、吐蕃、西夏、蒙古文书，各种中国艺术品。精华皆由王道士卖于斯坦因与伯希和。但主要是晋末以至唐宋时代之物，当略述于次卷。

其次是鄯善，即楼兰，亦即罗布泊一带。罗布泊乃先史时代之内海，汉代已干涸。有东城曰扜泥，新筑西城曰伊循，"其地肥美，汉遣司马吏士屯田焉"（《汉书》）。而今则已沦沙漠，唯婼羌尚有遗址。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斯文海定首先发现楼兰故址，不啻一东方旁贝。海氏发现的遗物中，有米、麦、竹简、纸张，卍图案地毯，与今日一样的毛笔。古书有《战国策》残卷，用最古之纸写成；早于欧洲用纸者七百年。此外，是公元后六四——二七〇年（汉明帝至西晋之初）的文件，涉及政治、军事、农业、工业。还有乘法表和私人信件。此外有宝石、货币。其房屋有仓

库、客栈、伤兵医院、邮局、庙宇、住宅茅屋，其中有精美家具、土罐。他交与孔好古(Conrady)研究。孔氏说是“一页紧张世界史纪念碑；一首田园诗，一幅浮世绘，而在世界史伟大而阴暗的背景上。”海定云，“当时正是中国瓦解期。这些政府官吏的私人信件中表示他们从未丧失对国家责任心。想到这些中国人以如此毅力与勇气尽责时，令人感叹，并了解这奇异民族是如何统治半个亚洲的。”

其后一九〇六——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又再三到这一带发掘。据斯氏说，由古佉卢文等，知本名“Kroraina”当楼兰一名之由来；又称“Nob”，即玄奘所称纳缚波。他发现的磨朗，即小纳布城，或即扜泥城；大纳布城当即婼羌。他在楼兰寺塔遗址和住宅中，发现汉代古钱、陶器、箭簇、木器雕刻。一小捆黄绢，宽十九吋，这是中国丝织品西运的标准形式。有佉卢文，婆罗文，乃至纸写的窣利文。有两汉至晋初以木简和纸写的汉字文书。他还发现中国建筑的城墙。在婼羌一带，发现汉字、窣利、佉卢、婆罗文之木片纸片文书，漆器、丝毛织品。又在到敦煌大路上发现许多汉代古钱，金属器物，珠宝，铁的匕首和马具。楼兰古墓中发现汉镜，中国文书，彩绢地毯，花纹有作希腊风者。这些葬式，皆中国至今尚有者。又在古墓中发现一束麻黄，这是祆教徒后来浸作圣水用的。在楼兰发现佛寺，其中木刻，皆具健驮罗风。在磨朗的佛寺中发现长达十八呎壁画，有希罗美术中的有翼天使，并有伊朗的风味；又有婆罗文字体之梵文贝叶。以时代而论，至少是公元四世纪以前的东西。较晚期者，则卢尼文的突厥文书；又西藏时代的佛经文件，约千件以上，而其中则无汉字，这是中国势力撤退之时。

此外，是于阗。克里雅河附近之尼雅，是古于阗地方(也许本为扜弥之地)。斯坦因发现当时房屋有火炉、木柜与花园，许多木版文书，汉文与佉卢文同在。有中国木质文房器具，两颗印，一作中国篆字，一作西式人首。这些东西，与希腊女神像同在。又有中国筷子，后汉古钱，许多汉代木简，中国官署的命令，一片木简有晋初年号。很多佉卢文书(约一世纪)记古印俗语及雅语，即在印度，也很少如此古的文书。更晚者则有唐人之碑和藏人文书。

此外，是今日和阗。和阗当古于阗之西部。在这一带，常有古物出土，有“找宝商人”在丹丹乌里克一带地下发掘许多佛像金叶。海定先到此处，后来斯坦因在此发现佛寺，中有前述介绍蚕桑到和阗的中国公主画版。又和阗发现甚多的货币，除王莽时代之货币外，有于阗本身之货币，他一面刻

汉字“五铢”，一面有佉卢文之于阗语，记其王名，类似月氏；而无方孔，亦如月氏。此最足以表示于阗为中国月氏文化会合之地。又在此处之佛寺发现婆罗文的和阗语纸卷，证明古和阗语与东伊朗语有关，此外，则有波斯式印度菩萨像。在这里发现的中国文书，多是唐代官吏的报告。又在一名“护国寺”的寺院中发现借据，姓名是中国人，但贷款者不是中国人。

此外是北路之高昌、龟兹。高昌，后汉称柳中，班勇驻节，后又称火州、黑城子、哈剌和绰者是也（今吐鲁番东南八十里）。地为中国军事前哨，过此而北，即匈奴领域之准噶尔盆地。“自高昌壁通后部金满城（济木萨）五百里，此西域门户，故戊己校尉互屯。伊吾柳中皆膏腴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后汉书》）。自武帝以来，汉人子孙多留该处。而亦与匈奴混杂，为新疆一大汉人殖民地区与汉文化之绿洲。“其他八城，皆有华人”。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北史》）。三国以后，前凉张骏，前秦苻坚，后凉吕光，西凉李暠，北凉沮渠蒙逊，柔然、高车，均据其地。然统治者常为汉人，最后仍归于唐。此处不仅为突厥文化起源之地，而亦与唐代文化有关。

龟兹，离都护所在不过三百余里。龟兹王绛宾尚乌孙公主女，曾留汉一年，中国曾赐龟兹王数千万。时来朝贺，效汉衣冠制度，治宫室，徼道、钟鼓，如汉家仪，至为西域人所嫉妒（《汉书》）。汉颁印绶，传为国宝（《新唐书》）。可见其濡染汉化者之深。又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有佛塔寺千所（《晋书》），自受月氏影响。龟兹可说亦中国月氏文化交流重地。厥后佛图澄，尤其是鸠摩罗什均由龟兹来华传佛教，均精汉语汉文，自非偶然。

此外尚有莎车，西汉时即欲自托于汉（《汉书》）。其王为太子时住长安甚久，“慕乐中国，参其典法，尝戒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汉书》）。这还不能证明西域汉化之程度吗？

天山北路所发现考古学资料，一九〇二——一九〇八年后德俄二国所得最多，英法日亦得一部分。但主要为健驮罗佛教美术品。此种美术所受中国影响，乃较晚期之事。至中国文物，多系隋唐以后者，不过日本橘瑞超在高昌得到西晋初年（二九六）《诸佛要集经》，为法护所译，又有凉王大且渠安周所写之《十住论》断片。观二者字迹，实出汉人。又许多汉译佛典如《三藏记集》等，皆出此处。汉译佛典，实多由此而传中国的。〔注一一五〕

此外是葱岭山中。玄奘记一传说，谓波斯王娶中国公主过朅盘陀国，遇兵乱，遂置女于孤峰。有神自日轮中来，生子称尊，公主摄政。其人自称“至

那提其瞿咀罗”，意即“汉日天种”。“汉貌胡服，威德远被”。大兴佛法，几与月氏齐鸣。斯坦因循玄奘书探险，在薄犁听到同样传说。照他的游记，蒲犁应即今之沙里库尔(Sarikol)，而朅盘陀即塔什库尔干(Tash Kurgan)，石堡之意；附近有峰，土人称克则库尔干(Kiz - Kurgan)，即公主堡。而城堡建筑，与长城相同。由此经一万五千呎之齐齐里克(当即奘记乌锻国)至疏勒，地形道里全合。奘记近于神话。然如果想到亚历大山在印度亦多神话(印北土人有自称希腊神话中神之子者)，这无非是汉代在“世界屋顶”精神威权之写照而已。

以上自甘肃至葱岭，我们由文献可以看出，汉之蚕桑文化，军事工程，制度官仪，农田水利之西传，而地下的建筑、货币、武器、文书、纸笔，复可为证。更重要者，是在这一切后面的一种民族的气力。斯坦因看出这一点。他在循古道横渡罗布泊后说：“古史上如是伟大贸易，横过自古以来即无水草燃料的一百二十哩大道，在文化交流上，有莫大成就。这究竟是如何组织与支持的，实难想像。事实上中国声威，经济富源与组织能力，实远过中国人民军事力量。这是精神胜于物质的一种胜利。”

此外，自葱岭以西以至大秦，中国文化之西传，只就是文献上可见者略述数语。此除上述丝缯以外，以漆器、铁器及水利农田技术，最为重要。《史记》大宛传云，西域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汉人始教为之。初，罗马人以铁来自印度。罗马人以一切异物来自印度，正如中国以一切异物出自大秦。至普林尼谓，“各种铁器之中，胜利撒榄枝终属丝国”云。又大宛传云，宛得秦人知穿井，汉代屯田西域，为军需要政，亦为西域人所欢迎。此对于游牧民之转化农耕，启发甚大。而纸之西传，亦文化上之大事。此外便是竹杖，蜀布，桃李，以及黄连麻黄茯苓等药用植物了。

在学术上，已有西洋人指出，西方炼金术，很可能是中国传去的。又，中国医学发达较早。罗马名医格林(Galen，130—201)为亚洲人，以脉治病，其出自中国可知。

这些事实，应使史学界对当时大汉风重新研究和估计。同时，这也可以纠正国人一种看法，以为中国文化长于精神短于物质之说。反之，在最精神的事物方面，即道德、哲学、文艺方面，如希腊人一样，两汉在西域没有留下同等重大的影响，确系事实。不过，此处预先提及一句的，到了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

## 波斯系文化及其东传

波斯文化之重要在这几点：一、古以兰(Elam)文化启发两河流域的文化，然伊朗(即米太与波斯)，则是承继巴比伦和小亚细亚，同时，也受叙利亚的影响的。波斯人的艺术都借自埃及、亚述、巴比伦、吕底亚，乃至希腊，只有在建筑上，有其独特作风。此外则音乐亦甚发达。二、苏鲁支所倡祆教(Zarathustrianism)，是波斯人的发明。他与婆罗门教有共同的渊源，一方面是对抗波斯固有之术数(Magi)而起，而另一方面，是与犹太人之犹太教共同反抗巴比伦人而起，而早即相互影响者。先是犹太人之北朝以色列为亚述所灭，南朝犹太与埃及合作，亦卒为"巴比伦之囚俘"。犹太教虽早于祆教，今日《旧约》最早部分实完成于巴比伦，而希伯来之预言家，是拥护居鲁士的。厥后居鲁士解放犹太人，许其回归巴勒斯坦。故犹太人与波斯人关系，早极密切。祆教原在大夏康居一带兴起，而甚得居鲁士及其后继者之信奉。亚历山大东征后，祆教衰落。不过祆教之二元思想及其后来的变形，对于其他宗教之流传与内容，发生促进与影响作用。塞流卡帝国时代，在叙利亚，有马克比兄弟(Maccabeus)之反抗希腊人运动(前一六八)，此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连锁。而在大夏安息康居一带，则公元前一世纪起，佛教开始流行，而此处之佛教，已渐与原始佛教有异。其后在安息、波斯，固有术数渐盛，公元一世纪后，有拜日教(Mithraism)。此教在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争胜，而基督教所谓复活节，原即拜日教之拜日节。到了萨珊朝，祆教成为国教，终于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了。三、波斯人之长处，尤其在政治组织方面。大流士帝国不仅是世界帝国规模中早具规模的，而且能实行宗教宽容的。亚历山大东征，亦因有亚克美尼帝国开路。此后，希腊罗马政教，大受波人影响。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尚稍能保持大流士宽容之传统，而罗马人在这方面，大为不如。四、此处对我们最关重要的，是波斯帝国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有创造文化的民族，有传递文化的民族，有破坏歪曲文化的民族。波斯属于第二种。在文字上，居鲁士帝国铭文用楔形文，文书用亚拉美文(Aramaic)，即叙利亚古文，亦即后来耶稣所用文字。这种亚拉美文字，后来稍加变化，成为佉卢文，为北印一带通行文字，直至公元五世纪。印度本部用婆罗文。二者皆传至西域，是我们知道的。在艺术上，伊朗的武器与

动物作风，对塞契特匈奴等民族的影响，已在前面说过。在装饰和建筑上，亚克美尼帝国对无忧王时代的印度，有甚大影响。此后，亚克美尼帝国常雇用希腊人。六世纪末，大流士一世派希腊人斯基拉(Skylax)探测印度河西航路，使印度为希腊人所知。不待说，将中国介绍给希腊罗马，并为中国与犁轩大秦贸易之中介者，也是波斯人。

两汉时代，波斯系文物传于中国者，除毛织品(罽)外，以动物，植物，魔术，音乐，雕刻最著。武帝以来，安息即献条枝大鸟，狮子，以及孔雀犀牛之属。又曾献及犁轩眩人。眩人即魔术家。最有价值者则为植物。凡苜蓿，葡萄，石榴，豌豆，胡椒，胡麻，胡桃，胡萝卜，杏仁，水仙，及其他附有胡字植物，皆伊朗物也(B. Laufer，"Sino - Iranica"，李时珍《本草纲目》)。《晋书》乐志言"张骞由西域得横吹之乐，即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造新声二十八解。"其所指尚无定论，然属于北印度亦即波斯系之音乐，则似无问题。龟兹人好音乐，其后输入中国，是同一系统的东西。又后汉以降，中国墓前，常有有翼石狮，这是波斯风之物。后汉和帝时(一〇一)安息王满屈献狮子及条枝大鸟。满屈据说即安息王 Pakor 二世。其太子还到中国传布佛教，此即有名之安世高。厥后"波斯胡贾"在海通以前，迄在中国对外贸易权方面占重要势力。〔注一一六〕

## 希腊风文化及其东传

亚历山大东征前，希腊人已多在波斯。自东征至塞流卡王朝为罗马所灭，希腊人在西亚一带势力，维持将近二百七十年。而在安息以东的希腊王朝，还多苟延了二三十年。在此期间，亚洲以"亚历山大"为名之都市，有七十之多。希腊人与当地居民通婚甚盛。一时希腊风弥漫中亚，即安息亦然。希腊风货币到处流行。这是由今日考古学可以证明的。希腊的文字乃至于戏剧，亦流行于安息以至北印。雕刻绘画，如下所说，影响更为深远。安息以西，在塞流西王国势力之下，使希腊文化于本国衰微之后，保持甚久期间于叙利亚、巴比伦和培加蒙(Pergamum)，并与埃及之亚历山大城争胜。但对于希腊及希腊风影响，未可夸张。古希腊文化原受小亚细亚影响。希腊文化之勃兴，亦受波斯之冲击。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思想中，西人亦言有波斯印度之成份。亚历山大东征，亦因有居鲁士大流士为先驱。到东方后，希

腊士兵请印度医生治病，是是时印度医学水准，尚在希腊之上。在整个希腊风时期，除希腊风之城市，货币，文字与艺术以外，在精神方面，希腊于东方是输入为多。在巴比伦一带之希腊人，多研究巴比伦之自然科学与占星术，有贡献于后期希腊文明。而在印度西北一带，则原来大夏系统之希腊人弥兰王，受那先比丘之感化而成为佛徒。此即最古巴利文佛教古典"Milinda Panha"(《弥兰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即其一部分。据云原文为希腊文(Tarn,"The Hellenistic Age")。那先者，义云龙军，喀什米尔人，十六罗汉之一，在马鸣前百余年，倡"佛果唯有真如"说。欧洲历史家每以为至公元前一世纪，希腊风因日益吸收东方思想而解体。事实上，所谓希腊风者，原是一种混合的文明。一种在波斯底子上所涂希腊色调，并继续添上其他亚洲色彩的。此种混合文明，在公元前一世纪仍见其盛况。如叙利亚希腊人坡西多尼斯(Posidonius)之学贯东西是也。诚然，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西亚各地已到处有民族主义之兴起，尤以叙利亚和波斯之民族主义为然。但巴比伦之犹太人很多希腊化。安息占领特昔芬后，仍保存希腊风。甚至在波斯若干地方，希腊风都市，保持到公元后二世纪。打倒希腊风者不是亚洲人而是罗马人。第一、此时罗马人除武力政策外，已无任何精神上之创造。即在地中海以西，袄教基督教已日益普遍。第二、自安敦东征(一六四)安息，焚毁塞流卡特昔芬城，此后中亚之希腊文遂废，而亚拉美文代兴。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交替之关键也。而此时起于罗马属地埃及之新柏拉图主义，实即印度思想，袄教及基督教以与希腊哲学混合者。至四世纪初，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希腊风始最后宣布死刑。但希腊风在西亚垂死之时，希腊风的佛教美术，即所谓健驮罗美术，自公元前一世纪末起，逐渐在大月氏帝国开花。

张骞到大夏时，希腊殖民者在大夏一带已有二百年历史。此一时流行于中亚之希腊风，当时汉人似乎甚少感觉。有人指出大宛是"希腊"音译，这是靠不住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轩"县，王先谦说是处"犁轩"归附之民者，并无确据。〔注一一七〕有谓汉初太初历系受希腊"Callippus"历之影响者，亦仅附会之词。不过，我想指出《史记》及两《汉书》对于大宛、大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高附之城邑和货币之描写，已显然有希腊色彩。我还以为《汉书》所谓塞种，也包有希腊人在内。在文化上，希腊对中国亦非无影响。例如希腊的装饰艺术早经塞契特传至蒙古，伊朗人将葡萄与动物结合，

希腊人复美化之，六朝以后，我国铜镜上有海兽葡萄之图案，是显然之希腊风。更重要的，是健驮罗美术，经天山南北，表现于敦煌、云冈、龙门之佛像，并对中国绘画发生影响，又东渡日本，表现于法隆寺之建筑。但这不是纯希腊的。至于为希腊光华之科学哲学，既未在中亚留下足迹，则在中国不感印象，自无足奇异。此后大秦以“金银奇宝”著名，多为装饰奢侈之品，如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流离、火浣布、细布、苏合（香水）之类，及郁金十二种香（《后汉书》、《魏略》）。此外诸书所记大秦货物乐舞传来中国者名目甚多，但真正属于罗马者，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注一一八〕盖多托大秦为名。且“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后汉书》）。此外，汉末对罗马元老院立贤之制，已有极良好的传说了。（见三六二页）

希腊人所以不能在中亚留下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希腊人在中亚，都是凭借武力的殖民者。武力被罗马人击溃后，大希腊风文化，亦随之崩溃。此与和平传布的佛教影响，恰成对照。接收希腊帝国的罗马人，更是武力主义者，亦未能深入中亚。除有关景教东来外，对于中亚影响，自是更为薄弱的。

## 印度系之文化

但是，有一种重要精神文化因西域开通而来华者，即是佛教及其有关的事物。这涉及印度、希腊，尤其是月氏。

当印度史诗时代文化向恒河方面发展时，在开明贵族及新派僧侣间，发生新学派，即所谓《森林书》、《奥义书》等梵书（Brahmans）。初期《奥义书》（Upanisad，意为近坐）中，有一种梵（Brahman）我（Atman）一如之思想。到后期《奥义书》，则有幻（Maya），以及轮回（Samsara）、业（Karma）之思想。同时有空（Akasa）及五原素说。此已是前五世纪左右之时了。此时一方面有六师哲学之萌芽，此等于印度之辩者；有摩奴法典（Manava Dharma Sasutra）之开始（但其编定，当在公元前一世纪），此为四姓制度之法律化。另一方面，有反婆罗门哲学，如顺世外道（Lokayata），耆那教（Jainism）及佛教是也。相信轮回与业，求涅槃（Nivana）与解脱（Mokkha），此印度思想之所同。不同者，是各有达磨（Dharma，法道之意）。佛教与婆罗门不同者，不信吠陀，否认四姓，并深信人可不依梵天，而可依自觉自力而得解脱。佛教最

胜处而近于中国者，即在乎此。此后佛教大盛，分为大小二乘；而婆罗门系统则分为六派哲学；即数论，瑜珈，声论（弥曼差），胜论，吠檀多，正理（尼夜耶）。〔注一一九〕此后印度思想，亦甚少根本变化。唯八世纪后婆罗门教变为印度教，在印人中特盛，直至今日。佛教最衰落。耆那教尚保存一部分势力，甘地思想即颇有其色彩。

印人生活思想，以宗教为中心，但此外亦有其学问。自昔婆罗门有四期生活：修学，家长，苦行，游行。修学时期，须研究四吠陀与五明（声明、巧明、医方明、因明，及内明；内明即宗教哲学也）。家长期指结婚后成为家长，主持祭神而言。佛教徒亦修五明，唯坚持出家及男女隔绝，是最特殊的。

佛教原为一种宗教改革，注重实行。释迦以其人格才辩，在世之时，已以三宝（佛、法、僧）三学（戒、定、慧），成为一大势力。佛灭之年，弟子阿难、迦叶、优波离等五百人为第一次法戒结集，四阿含（Agamas，阿含义云法归）出焉。前二八七年有第二次结集，始有上座（耆宿）、大众（青年）之分。此为南派北派，小乘大乘之原。及无忧王之世，为第三次之结集，三藏（经、律、论）始定。无忧王因出身贫贱，不守婆罗门法律，与塞流卡王朝通婚，希腊风气传入印度。而佛教徒曾到波斯以及叙利亚传教，王弟且至锡兰布教，使佛教为一世界性的宗教。〔注一二〇〕

无忧王死后，北印先后在大夏塞种月氏侵入之潮流中，一时佛教稍衰。此时中南印度，六派哲学大盛。其中的数论（Samkhya）瑜珈（Yoga）二派对于后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派发生影响；如物质、精神、灵魂之三位一体说，忘我（Ekstasia）之说，是很多人认为具印度色彩的。毕达哥拉派教团之成立，有谓即已受印度影响者。三宝和三位一体，僧伽与基督教会有无关系，亦为一有兴味之问题。

至迟在公元前一世纪，佛教已传入妫水流域以及塔里木河流域。公元后一世纪中到达中国内地。而印度之五明，七曜之术，医方、文字、文学之类，亦附佛教而传入中国。然中国内地之佛教，在法显以前，实由月氏安息康居及西域，尤其是月氏传入的。

## 中亚文化聚散地之月氏

凡波斯希腊印度文化交织之地，后皆在月氏治下。故月氏遂成中亚各

种文化汇合与聚散之场。

月氏贵霜统一阿富汗及北印时，罗马亦占领埃及。亚历山大城仍为东西贸易中心，且因季候风之发现而更为频繁。月氏原用希腊风货币，至是用罗马货币，且模仿之。波斯之拜火教，印度之婆罗门教，希腊埃及之多神教，乃至于基督教，均在其领域内流传；唯佛教最为兴盛。其时摩竭陀国耆那教大盛，佛徒集月氏为中心。月氏在政治上承继孔雀王朝之霸权，迦腻色迦王亦继无忧王为佛教之大护法。他集中罗汉四百九十九人，在高僧世友(Vasumitra)主持之下，为第四次的三藏结集。世友者，世传禅宗西土第七祖是也。以前佛典皆以巴利语(Pali)写定，雅语，即梵语(Sanskrit)佛典自此始。又造"毗婆沙论"(义云广论)，集北方有部佛学(小乘)之大成。旋著名的马鸣(Asvaghosa)亦来此处，他是大乘佛教最早之大师，《佛本行赞》、《大庄严经论》作者，又传为今佛学上一大公案的《大乘起信论》之作者。〔注一二一〕是由小乘到大乘的过渡，亦完成于此。而这是与健驮罗的佛教美术之完成与发展同时的。以前佛教美术无人像，有之，自所谓健驮罗美术，即希腊风佛像始。如法国傅歇(Foucher)所云，这多半是印度感情与希腊艺术美之结合，而多是东方化的希腊人与印度人之杂种美术家的制作。此种美术，多半在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在迦腻王之世完成其形式，到三四世纪臻于极盛。其后当地色彩渐多，而七世纪后，中国的成分也加入了。

迦腻色迦王所奉佛教，仍为有部，亦世之所谓小乘也。所谓大乘佛教，以一世纪之《大般若波罗密经》("Prajinaparamital Sutra"，义云大智度，《金刚经》即其最小的一部分)为基础。此以一切皆空为根本义。而弘扬其说者，则为二三世纪间之龙树(Nagarijuna)及提婆(Deva)师弟。前者即《中论》与《大智度》之著者，提倡真空(Sunya)，亦谓中观(Madhyama)。迦腻王之世，此说已起。毗婆沙论，殆以"有"抗"空"者。其后三、四世纪弥勒(Maitreya)及弟子无着(Asanga)世亲(Vasubandhu)兄弟集唯识论(Vijnanavadins)之大成，即大乘之相宗。而他们也是出于健驮罗的。在我看，这大乘相宗，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有宗，而这也表示月氏佛教始终为有宗之传统。空宗乃极端否定派，有宗是一种主智的客观观念论。

中国习闻大乘一词，总以为大小有高下深浅之意。另一方面，西人则谓大乘非佛说。其实佛教皆以大乘自居，小乘乃对反对者之称而已。佛教如

"四阿含"所说，本为一种修行宗教，对抗婆罗门而起。然佛教乃在一多神教及哲学辩论之环境中，随其流传，遂渗人其他宗教之神话，而在思想上，亦摄其他哲学而增强思辨内容。小乘受六派哲学之影响，说我空法有。大乘进一步说我法俱空。而新有宗之唯识派说万法唯识，则又空宗之进一步。至此佛学亦难再有发挥。如是在印度本部之佛教，遂受印度教之影响，变为密宗，趋于崩溃。而在中国，则受中国思想之影响，变为禅宗。佛学流变，可作如是观。〔注一二二〕

《后汉书》云，"佛道神化，兴自身毒。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暑乘象，班勇虽列其奉浮图，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关于佛教来华时代，异说甚多。如秦始皇时说，霍去病得金人说，纯属附会。世多信《魏略》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而牟子《理惑论》，《释氏稽古录》，《魏书》及《梁高僧传》，则云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使西域，于天竺邻境月氏国"得四十二章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来，立白马寺于洛阳等语，大抵相同。〔注一二三〕中国于佛教在两汉之际，由耳闻而目睹，当系事实。而此耳闻目睹，皆自月氏。盖是时印度已在月氏治下也。其后西僧来华传教译经者，后汉三国，以月氏安息康居为多。西僧初来，多以国为姓。最早者为安息之安清（世高），于桓帝时至汉，曾到广州荆州及江淮间。其后则有月氏人支娄迦谶游洛阳传译大乘。后有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孙权拜为博士）。此即三支，皆月氏人也。又灵帝时，印度之竺佛朔，安息人安玄，献帝时康居人康孟详，孙权时，康僧会来华（《高僧传》）。厥后西晋初之竺法护本月氏人，后徙敦煌，译经百余卷，时称敦煌菩萨。"经法所以广流中华，护之力也"。以后两晋之世，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如佛图澄、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佛陀耶舍、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或学自罽宾，或出自罽宾，或为吐火罗人，即皆在月氏治下者。〔注一二四〕由此亦可见月氏与我国佛教关系之深切了。续见六节。

除佛教外，在工艺上有一事系由月氏传入者，则琉璃是也。此为中国极为珍异之物。《魏书》云，"世祖时（四二五年），大月氏国人商贩京师，能铸石为五色琉璃。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见者以为神明。自此琉璃遂贱"云。

月氏既由中华西迁，应有中国文化甚深影响，惜乎文献无征。唯玄奘云迦腻色迦王伽蓝壁画，其人物"容貌服饰，颇同东夏"云。

## 论两汉对外政策及其得失

自严尤谓“御夷”之道“周仅中策，秦无策，汉得下策”以来，是历代认为并无万全之计的(《汉书》匈奴传)。严尤以“武帝有克获之功，而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两败俱伤；故云下策。此后关于秦皇汉武，历史上大多誉其武功，而毁其扰民。这自是很矛盾的。近百年来，尤其是抗战以来，中国人大抵赞成他们攘夷的气力，并以为都是自卫性的。但美国有拉铁摩尔(Lattimore)者，则指中国过去是一“次帝国主义者”，对边疆大抵是侵略性的。假如帝国主义是一种利用优越军事势力，夺取他国领土、权利，干涉他国内政，以榨取特殊经济利益的政策，则中国对这一套从来无缘，而且是从来反对的。自古中国以用兵好战为大戒，“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主要的原因，即是在中国看，中国比外国比边疆富足(此在今日，自是错误的)，故无意要求域外及不毛之地。〔注一二五〕对于夷狄入侵，总是能忍则忍。对所谓藩属，并不干涉其内政(“干涉”到册封为止)，只有保护的义务。所谓“朝贡”，实在甚少，而“赏赐”实在甚多。此在经济上乃赔本买卖。中国所求者，没有超过息事宁人，自保安全之限度。〔注一二六〕所以，“次帝国主义”之说，只能看作是分离中国的阴谋之理论。但是，中国确曾劳师远征；乃至确曾出兵于域外(如西域)。在这意义上，中国盛时的政策，并不限于自卫；尤以汉唐为然。

一个国家恃其力量以侵略黩武为事，自是罪恶；而此亦断无善果。而自卫是一国家之权利与义务。不能自卫，是可悲乃至可耻的。但我们对于侵略之对策，是否不能超过自卫范围呢？由文化史观点看，问题不仅在动机之是否自卫；我们还要看力量，方法和效果如何：他是否善用自己的国力？他是否能够带来更持久的和平秩序，更高度的文化水准？

即使是自卫行为，但国力不足，只求快意，一战而败，不算贤明。即使是自卫行为，亦有相当乃至很强力量，但使自己不断从事战争，也决不是贤明的。本来出于自卫，而在自卫成功以后，流为报复，或使自己成为新侵略者，其罪害与侵略同。

但仅以自卫为满足，决非金科玉律。所谓中立主义究竟是小国不得已之词。一个大国如已有充分自卫之力，而不能用，不善用，以维持国际秩序，

保护弱小，而以中立主义或孤立主义为得计，亦不足取。一个大国只求驱敌于国门之前，而不图驱敌于国门之外，也还是终于不能自卫的。至于姑息主义之可耻而无效，更不待说了。

今天美国人认为国防线在莱茵，并且出兵韩国。他援助各国，这当然不是狭义的自卫行为。但美国并没有向各国要求特殊权利，这是一个大国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明白这几点，才可以论断两汉对外政策之意义与教训。

## 对匈作战之必要与成功

汉人对匈战争是必要的。以匈奴与汉关系而言，没有人能否认：侵略者是匈奴而不是中国。汉武帝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后来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可以代表汉人心理。班固于武帝事四夷，皆有贬词，对匈奴则否，并说和亲无益；可知汉人深知对匈奴战争，是不得已的自卫。

但如果武帝之战为是，是否文景之不战为非呢？是不大然。如无汉初六七十年之休息，汉不仅无可战之力，且无可战之人。加之七国反侧于内，汉初是不能对外战争的。有文景之储备国力，才能有武帝之战争。而在对匈奴作战以后，不仅解除中国威胁，且使塞北西域有更多和平与自由，造成了一个更高的文化时代。这便是对匈奴战争之意义与价值。

汉对匈奴有必战之势，问题在有无可战之力，必胜之方。汉初之不战与后来宋人之不战，是大不同的。七十年间，汉人都在研究和准备对匈奴问题。我们看看陈平、刘敬、樊哙、季布、贾谊、晁错、王恢、韩安国、主父偃、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关于和战之策的言论，可知汉人对匈奴问题之苦心焦思。而汉代在军事上的准备，也很认真而得法。汉人自知对匈作战的前提，除了一般的国民人力和内部安定以外，是粮食运输和骑兵战术问题的解决。文帝即躬自骑射，选六郡子弟。此后移民实边，积极进行骑兵建设。汉牧苑卅六所，分置西北，养马卅万头（《汉官仪》）。有“马复令”，奖人民养马（西域传）。设八校尉，一半为骑兵军官预备队。武帝之初，国力已极雄厚。在战斗上，我们有敌人所无之长（弓矢之利），而敌人之长（骑兵）则已不能专利。于是在思想上武帝初期的贤良文学之士，公羊春秋学派，以及守边

之将，都富于进取精神。严助、张骞、司马相如、王恢、李广、卫青、桑弘羊的一代，对匈作战成为一时的主张了。

武帝初，闽越与东瓯作战，东瓯告急于汉，大尉田蚡主张不管，且说秦即弃而不管的。严助说：

> “特患力不能援，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汉书》严助传）

这正是当时汉民族的一股新锐的大气概。而他所说的“力”与“德”之能不能问题，在原则上是永远正确的。而越闽出兵不过是一种演习。

马邑事件后，匈奴还不知利害，依然进犯。经过几次试验，汉人知道可战，也就决定作彻底歼灭战了。为进行这一战争，还有远大的外交，即一面断匈奴左臂右臂（朝鲜、西域），一面对匈奴加以分化，如霍去病军中甚多“荤允之士”，汉之将相公卿颇有匈奴人（如赵信、公孙贺、金日磾）。匈奴终分为二，也是这长期政策之效果。

我只引太史公所记的一个战役，以见战场上的汉人。元狩四年，即前一二九年卫青以五万骑出击，匈奴想用其得意的诱敌深入之法；而——

> “大将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暮，单于乘六骑驰出，汉军发轻骑夜追之，行二百里，不得单于，捕斩万余，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而返，悉烧其城余粟而归。”（卫青传）

这一段文字，甚可看出汉军的战略战术（闪电歼灭，取粮于敌），以及士气——勇敢，镇定，旺盛攻击精神；所谓“力战深入”者是也。这决不是武帝一人之功：“天子与诸将议。”亦非卫霍之功：如卫青所说，“军大捷，皆诸将校力战之功也。”又张骞导军，知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至于兵马之盛，弓弩之强，屯田备塞，以便粮食，明敌情者，都是长期研究准备之结果。这都是先为不可胜，集全国之人力，而后才能振大汉之天声的。

这战争是终于成功的。“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值匈奴百年之运，覆以威德，单于臣服。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后六十余年，王莽始开边衅，单于归怨，边祸构矣”（匈奴传）。

汉以和平为目的，不以报复为目的，也是很明白的。金日磾以匈奴休屠

王子受汉武托孤之任。“三世称藩，宾于汉庭。”终迁其民于内地，并无种族相仇之意。这是我民族最伟大的精神。

## 国力之节奏与武帝之失策

然汉人始终不以武帝之远征为然。班固认为对匈奴应该“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其实，这又何尝是一劳永逸之道？我以为武帝之失，不在远征，而在不知善用国力，而且滥用国力。他不知道他所以能战，是国力不是其个人之“武”。作战方针是正确的，但所付代价是过于惨重；而这惨重程度，并非不可减轻的。

在许多民族之发展中，有一种一张一弛的节奏。在一定时期，国家相当平安而自由，将国力蓄积起来。等到国力充实，此时或者被迫抵抗外侮，乃至向国境外扩张。或者对内发展公共工程和建筑，提高生活水准。于是国家的力量，社会的文化，又得到一度的高扬。这原是一民族健康的锻炼，也是一民族健康之标志。有史以来，凡在文化上有贡献的国家，未有不经此过程而兴盛的。秦汉亦是如此。此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但是，当国力发展以后，如果不能作适当的收缩与调整，即可能向两方面发展。其一是不量力的继续扩张，此即穷兵黩武。不量力的建设，也是一样（如秦之长城，隋之运河）。其次，不度德的奢侈或独乐，金字塔也好，天空花园也好，封禅也好，巡狩也好，土木后宫也好，都是一样的。而能否善于保持这一节奏，固然看国民的智慧，政治家的才识，尤要看政权能否随国力之扩张，扩大其基础。历史上许多帝国盛极而衰，而今日美国尚能维持一种动力的进步者，其关键也在此。

以此看秦汉之兴亡和盛衰，十分显著。看秦始皇汉武帝之武功，才真知得失。秦王政即位之初，是秦国国力之高峰。因此，很容易的并吞六国，击走匈奴。但他不知休息，不知扩大政府基础，反“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海内愁怨，遂用畔溃”。

汉初，“承秦之敝，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鲜盖藏，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刘邦及其后继者深知大体，与民休息，大省刑罚，劝农贵粟，薄赋轻徭。如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衣食滋殖，人口蕃息。

至武帝即位，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人给家足。廪

庾皆满，京师之钱不可数。太仓之粟，腐不可食。守闾阎者食粱肉，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平准书）。“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西域传）。这是汉武帝用兵的本钱。

然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汉武虽将匈奴击退，汉亦濒于崩溃之边缘。“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同上）实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对整个两汉及后来政治，发生了永久的恶劣影响。这是我们不可不知的。

太史公和班固在《平准书》和《食货志》中对武帝对外作战以来的政治恶化过程，有极生动沉痛的叙述。要而言之：

一、因财政困难而为诛求；

二、因诛求而始卖官，使政治恶化；

三、因政治恶化而严刑峻法；

四、因严刑峻法而枉死者多；

五、赏赐，招降，水灾，移民，使府库空竭，实行通货膨胀；

六、用统制及公卖政策，取缔伪币，平抑物价，并无效果。同时军费无着，兵员短缺，民怨沸腾，乃禁止人民议论国事，要求大家阿谀；

七、如是杀鸡取卵，苛征横敛，实行没收，中产阶级破产；

八、水灾发生，还大兴土木，封禅巡狩，同时出击西羌，实行屯田，生产减少，物价更高；

九、最后只有由政府统制贸易，开店，以平物价；

十、结果是“竭天下之财以奉上而不足”，民变发生。同时，外患复来。

这充分看出汉武帝之不恤民力，手忙脚乱。至士卒之死伤，饿死者，尤不可数。平心而论，战争必有牺牲，必使经济失调。但如此混乱，则实在由于他的不行。他不知道一度战争之后需要一度的休息。他本人尤有极大缺点。第一、他喜欢独断；第二、他只用他的亲戚；第三、更无理由的，是竟在匈奴未灭之前，大兴土木（“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与大宛作战，自坏政策。这不仅是不聪明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而原因呢，为了“欲侯宠姬李氏”。公卿皆议罢宛兵，他坚持不可。李广利所率者，又是一般“恶少年”。其后又借卜卦选李广利去当强敌匈奴，战败即杀其家人。即非疯狂，亦为儿戏矣。

一国之力不是无限的。政治家的领导，即是培养、鼓舞、使用国力与人才之艺术。

武帝初期，甚能用人，社会有一种朝气。后来愈来愈集权，国力也就愈来愈萎缩了。太史公在《匈奴列传》中一再叹息的说，“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他岂仅在对外作赌国运之战之时不能用人才而已，根本两汉之世，非外戚不主兵。所以每次战争以后，必然是外戚得势。为了对外戚制衡，发生宦官权力。由于武帝之不善择将相，浪费国力，由于对外战争常招来政治之恶化，才使中国人民及知识分子矫枉过正，趋于厌战，甚至不免趋于柔懦；而这也就渐次使中国文武的距离增大。此贻误后来，是更可惜的。

武帝耀武扬威四十五年，终无大成。其后“悔悟”，继以昭帝时代之休息，宣帝时代之修明内治，得以重建强大国力，完成对匈奴战争初步胜利。

王莽欲对外立威，自固政权，而终于轻开边衅，自取灭亡。严尤之言，盖有所激而发。

在这一点，光武是聪明的。东汉之初，他极力休息，继之以明章，仍以休息为主。而匈奴后来入寇。如斯坦因所说，“中国为保护西北边陲不受匈奴侵寇起见，不得已恢复其向中亚前进政策。”而完成驱逐匈奴之大业之世，不是“武”帝而是“和”帝。由此可见武功基础，实在文治，亦即国力。

##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

其次，说到西域方面，在外交上，不仅方针是正确的，在方法上也是成功的。两汉对西域政策，除李广利攻大宛外，中国的金帛外交(Gold & Silk Diplomacy)是成功的。中国对西域各国有经济援助，有经济合作(屯田)，有军事同盟，不许匈奴向西域发展。这政策是坚定的，也是成功的(平均每次至少金以数百斤计，帛以数百匹计)。这应首先归功于张骞的国际主义之远见。以及以后郑吉、陈汤、段会宗尤其是班超父子这一批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之才能。西洋人赞美亚历山大的世界眼光。其实中国一位偏将陈汤早即有一种国际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又说，“今郅支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因与都护甘延寿谋，

矫诏入康居，擒郅支。汤本好学能文之士，故有眼光。惜私行不检，汉朝嘉其功而不谅其矫制出兵生事蛮夷之罪，匡衡下之于狱，因刘向救护，充军敦煌。这也可看出汉人是不主张黩武的。

由于西汉牺牲过大，东汉视出兵西域为畏途。班超所以能久驻西域，即能不用大兵，除继续前代军经援政策（如赐乌孙锦帛，赠月氏锦帛，赐焉耆彩五百匹等），特着重以夷制夷政策，用志愿军，而不用国家"地面部队"。"以夷制夷"虽在清末成为误国之言，但亦视国力人才如何而已。

汉代有如是之国力，班超有如是之才能，故用之而成。斯坦因对这位军事家外交家钦佩不置，不是偶然的。当时西域政策，有两点是必须一提的。其一，对西域各国不干涉其内政；但各国叛乱战争，必秉公处理。其二，两个标准决不含糊，一是礼节，所讲"汉家不通无礼之国"，如对汉使汉民侵害，即不来往。二是绝对不容许"中立主义"。在汉与匈奴之间，必有一明白的选择。如因附汉而遭受匈奴威胁，汉朝的援助，唯力是恃。此外，我们决无民族偏见和优越感。公主出嫁，即是证明。这都是极坚定，而也极成功的。

当时经营西域的费用，其先出之于国内。后来之事，史乘未详，大概来源不外二端。一是商税，二是屯田。屯田之议，始于主父偃。而具体计划，则始于桑弘羊屯田轮台之议。武帝在李广利投降后，十分灰心，不愿实行。其实弘羊的搜括办法多不可为训，或亦实逼处此。唯有屯田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昭帝依然实行。所可惜的，主要用军人屯田，且不免用罪人囚人前往，而没有奖励良民前往。其次，在商业上，当时是准国营政策，未鼓励人民自由经营。（班超时代颇有商人活动，班超传"吏士贾客千四百人"。）且只用人民血汗的丝织品，去换取珍贵的奢侈品，没有从人民必需品上促进商业发展。更可惜的，是缺乏教化上，文化上的努力。假如当时能有文翁，任延，锡光一类人物在西域工作，情形一定是大不同的。

虽然如此，西域经营毕竟是一大负担与牺牲。所以武帝后，不断有孤立主义者，主张放弃西域。前汉代表者是杜钦、郭舜。后汉之初，则有第五伦。班超以后，孤立派得势。一般朝臣，如镡显、毛轸等均力主"取消"西域，班勇则力言唇亡齿寒之义，认为放弃西域，谁能保匈奴之不为边害？边害一生，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班勇传）。说得最恺切的，是尚书陈忠（安帝末）上书：

“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糜于卢山之壑。府库殚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卅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后汉书》西域传)

两汉至清，中国为西域不知牺牲了多少人力财力。以我概略估计，中国人死于西域一带者，当不下五千万。曾纪泽说历代是以东南之财富，养西北之土地。为什么如此？这实在是地形使然。张珰曾主张放弃西域。后了解西域不保，则河西不保，才主张经营西域。左宗棠说保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自从西伯利亚出了强敌以后，未有满蒙新疆失其一不失其二，失其二不失其三；而失其三犹能不亡者，未之有也。

有两汉博望(张骞)安远(郑吉)定远(班超)三侯及两汉军民之经营奋斗，直到魏晋，西域诸国仍如汉世，对中国朝贡不绝，遣子留学。唐代继之，使中国文化种下不拔之根。我们的祖先不仅流了他们的血汗，也确有他们的德泽。

## 羌乱与其他边变

至于西南夷两粤朝鲜，实与匈奴不同。此皆城郭之民，且早有中国文化的传播，其统一有自然之势。即后汉之西羌、鲜卑，以至两晋之五胡，都为降胡，不能说是敌国外患。其为变乱，虽有民族问题在内，在本质上是黄巾群盗性质，是一种国内战争，一种边疆民变。近代史家很少注意此点，故议论

每多错误。我以为两汉在这几方面之统一，不过如秦之统一六国，不能算是次帝国主义。然用兵也说不上是自卫。试观对西南夷用兵，均败多胜少，如有贤吏，亦相安无事。南粤本未用兵而定，后来是故意用兵。朝鲜本无事，水陆二军争功，反自取其辱。所以太史公与班固都觉得“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徒以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班固主张对两粤朝鲜西南夷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此对匈奴未可援用，而这三方面，是可以适用的。李澄源先生谓班固之论，为中国武力不竞之故（见其《秦汉史》），即由对二者没有分清。为了国家的统一与进步，对边疆也不能说绝对不能用兵。然至于劳师动众，甚至于多所杀伤，那毕竟是政治的失败。而两汉自对匈奴长期作战后，治边事者，好武之人，遂多于右文之士。若辽东方面能多用文治之功，我相信朝鲜也许终在中国版图，不致另立为国的。

西羌之事，尤为显著的证明。西羌匈奴相处甚久，武帝后匈奴煽动其共谋困汉。宣帝时，情势甚严重。赵充国以七十六岁之老将当之，其行军“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始终待羌人以恩信，屯田备战守，以逸待劳，坐待其瓦解，大著成效。而酒泉太守辛武贤屡欲轻战，汉廷亦常责充国不战。而充国力主“帝王之兵，贵谋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终用其谋，得以无事。充国死，好战者继任，羌人遂反畔。若论中国将才，卫青赵充国者，始可谓典型。

王莽无能好事。至东汉之初，班彪谓“今凉州有降羌，与汉人杂处，数为小吏黠民所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光武从之。但无根本之计，持重之人。此后常用征剿，而愈剿愈乱，皆充国早预言于前汉者。羌乱遂如火燎原。范晔云：“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而从事征剿的“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以如此之将戡乱，适如火上加油矣。

北匈奴逃遁后，所谓南匈奴，已改变其生活方式，是可以和汉人共存的。而其所以发生问题，亦是“将帅不忠，聚奸所致”。顺帝时代熟悉边事的陈龟，对此实在说得十分中肯，而为我们应该不忽视的。而梁冀秦桧，虽在表面上硬软不同，本质是一个东西。〔注一二七〕无文德以为武功之后继，这武

功是有害而无益的。

即使后来的五胡，也如夏曾佑所说，“汉人每于战胜后，虏掠其民，致之内地，不加教养，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致思乱。及其事起，其事比御外尤难。”

然范晔颇以赵充国马援击羌后迁于内地，为致祸之由；又以段颎斩杀政策为有效，张奂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伤和”之言为迂（《后汉书》西羌传）。其实赵马之时，汉人有驾驭羌民的信心。他们未想到后人不克负荷而已。至于晋代郭钦江统等徙戎之说，后来颇多佩为卓见者，实真迂谈。既入矣，岂能徙之而去乎？至于段颎，诚一虎将，然五胡南北朝时代之戾气，亦由此而生。“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自羌胡之乱，天下精兵集于凉州。羌祸暂息，而汉末大乱实始于凉州诸将之董卓。由此可知兵到底是唯圣人于不得已时而用之的。

总之，汉代对抗匈奴的政策，不失上策，不过武帝执行之不善。而对于西域外交，可称远大，不过文教之功不足。至于两粤西南夷朝鲜之事，未可云武帝之武功。而后汉之羌祸，只是东汉政治破产的结果，也是东汉文化已入衰微之一显明标志。

不仅此也。一个国家最可惧者，不在敌国外患。匈奴虽是“坚敌”，只要中国能保持内部亲和与创造活力，适足为国境扩张之资。其次，自来重大边患，包括匈奴与突厥在内，无一不起于中国由腐败而分裂之时。秦楚之际，匈奴始兴。王莽之时，匈奴再叛。三国八王之乱，五胡始起。然赖中国文化最可爱精神，即包容精神，无狭隘种族之见，“过去侵暴，已成陈迹，吾侪但感觉吾族扩大之足为庆幸云尔”（梁任公）。今后安边之根本，仍在政治之修明；而应付世界之变化，必须保持中国文化之活力；而这条件，主要是政治之公道，学术之自由与前进。

## 四　秦汉文化之精神物质基础

以上可说是汉代文化在世界上的表现。汉人何以能此？以下我开始论述秦汉文化之主要内容：道德与经济，政教与学术。这是我先民应付当时内外问题之力量与成绩，亦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凭借。

## 秦汉文化之意义与价值

先须略说秦汉文化之重要及其一般性质。秦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骨干。书契以后（约二千六百年）文化，至两汉而完成。两汉以后（约二千二百年）文化，由秦汉发轫。在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隋唐，是三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秦汉文化不同于周，唐也不同于汉。以我们今日而言，其由唐代以后而来者，远较由汉而来者多。但没有汉人，也就没有唐人，是不待说的。秦汉历史与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开阖之龙门。要了解中国历史来去，学术源流，必由秦汉开始。三代之倾向不同，列国之色彩不同。秦汉文化不仅是以前三代春秋战国文化之发展，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综合与创造。不过秦文化是华夏文化尤其是三晋文化与西戎文化之综合而军国化者；两汉则为夏楚文化综合而儒学化者。此一综合创造，最足以表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两晋以后，中国人的血统，文化，民质，经过甚大变化。因此，要知道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必先知秦和两汉文化。

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尝汇集时人所论中国文化或其特点：如静而非动，保守而非进取，重精神而轻物质，尚道义而轻功利，重虚文而薄实效等等之说。此盖由于先有两宋文化于心中。殊不知两宋文化，是受了印度佛教影响的。而两汉文化毋宁是动而非静，进取而非保守，重实效而薄虚文；而且，决不轻视物质的。

又近数十年来国人论史者，每以为先秦文化因自由而活泼，两汉以来，因尊儒而停滞。甚至以为汉代文化不过儒学，儒学不过经学，而经学不过阴阳五行之说。此实皮相之谈。由上节我们已知秦汉文化在世界上地位。由以下，必知秦汉文化尤其是两汉文化，不仅是先秦之承继，而且作了一大创造与进步，其成就不仅未失先秦之长，而且只有大大超过先秦水准的。

## 秦汉文化之背景

秦汉文化其所以能完成此一伟大进步与创造，可说有两大背景与三大基础。

两大背景指内部背景和外部背景。内部背景，在纵的方面，指夏商周秦

以来文化之蓄积，春秋战国以来自由思想自由企业之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一统之机运与实现。横的方面指秦及六国的成就，秦的军事政治，邹鲁经学，韩魏政术，齐楚学术(《汉书》邹阳传)。尤其是楚人文化，可谓汉文化之新主流(见下)。全国文化在汉代作一大融会，因而也有一大发展。此外边境民族亦不断以新血液参加中国文化范围，蔚为两汉之盛况与活力。这是以下可以看出的。

所谓外部背景，指当时匈奴对中国之压力与挑战。由于当时中国内在的充实活泼，这挑战既不能使中国瓦解，就反而帮助了中国的跃进。这是我们在上章业已讨论过的。

现在要说到秦汉文化之基础，此指精神的与物质的；具体的说，即民质与技术，或道德与经济。二者是秦汉文化能力之根源，亦是其构成部分。然使二者结合而为一者，则又"书同文"之功。兹先论之。

## 文字、笔、纸、典籍

以我国幅员等于欧洲，而能结为一大民族，且在统一以后，并未因民族之差别而为民族性之战争者，则中国之文字，以及用此文字之典籍——主要是六经——之流传，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结合力。秦汉以来文字之统一，书契之进步，文献之集中与传播，对于以后文化之进步，又具有决定性的推进力。仓颉为中国文字第一次之统一。周宣王时，太史籀为第二次之统一。六国秦汉后，由李斯等就史籀大篆及其他古文，标准化为小篆，为第三次之统一。此外，又造隶书。汉代隶书成为通行文字，称为"今文"；由此而有楷书(真书、八分)。此正式书体之一大变，只等待唐代印刷术为最后之固定化了。又战国有草书，至汉有章草，汉末有草书行书；这是手写书体。这两体文字——铭刻体与手写体——之标准化与改进，促进秦汉文化之进步，至今仍为中国文化之基础。此外，汉人有"小学"。许慎《说文解字》是第一部字典。此外郑玄、刘熙、孙炎等，研究训诂、声韵。文字之学，亦自汉人始。

文字之变化与统一，与文具书契有关。战国时除竹木简外已用帛书。除漆外，似已有墨。墨系以桐烟作者。当时之笔，主为竹笔。至蒙恬，始有兔毛羊毫之笔。而墨丸亦渐造成。至蔡伦之纸，遂为中国文化一大光荣成就。笔纸虽不始于蒙恬蔡伦，但此二大工具之改进，是秦汉不朽之功劳。汉

初已有磨墨与砚。有了竹笔，即有隶书，有了纸张，以及文房四宝齐备，楷书即代隶书而为正式书体，而汉末书法也成为一种艺术风气了。（参看拙著《中国之语言与文字》。）〔注一二八〕

秦人焚书造成一文化之暂时停顿。然秦末汉初讲学著书之人——尤其是儒家不绝，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到了汉代，除挟书之禁，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收集天下之书，编成《七略》，大有功于文化（《汉书》艺文志）。世人只知汉代罢百家。其实对先秦文献整理流传者，正赖汉人。西汉末书籍已是商品。到东汉之初，王充读书于书店（《后汉书》王充传）。这正是耶稣说教之时。全世界之有书店，殆以中国为最早了。凡此一切，连同公私学校，促进汉代民族团结，学术流传，文化进步，是很显然的。

## 秦汉人之气质

假使有人问我，一国国力之源泉为何？我说，文化。如问文化之源泉为何？我说"气质"或"风俗"。这两个中国名词，没有"Soul"、"Spirit"那么神秘，而可以作"Morale"，"Mentality"，"Vitality"三者之包括。

这刚刚与所谓唯物史观相反。大家知道，马克斯主义力主经济决定论。不过亦须指出，以技术与经济为一社会力量之标志，或国家富强之标志，乃人类学家及社会学者之公言，并非马氏之独特发明。〔注一二九〕其实，技术之发明与操纵，仍在人群之本身。技术不能单独决定一切，亦不能永久专利。许多技术进步的民族，败于蛮族之手；而虽愚必明，虽弱必强，存乎其人。因此，我相信精神比物质更为重要。一个民族的技术，是其实现力，而精神是其潜在力。精神力中最重要者，也许即是老生常谈之道德。道德非他，是一个民族生命力之健全状态，亦内部亲和团结之条件。当一个民族统治阶级腐败之时，亦即活力枯竭之时，技术也好，知识也好，是不足自保的；而只要一个民族还有新的成份品质，因而生机之时，必能创造新的力量与前途。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民族之生命力所积甚厚，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中。秦对六国之战争，使六国平民由六国贵族获得一种解放。其后楚汉对秦的战争，也使全国平民由秦之苛政获得解放。新力量不断脱颖而出。这都不失其进步的意义。所以，虽然有战国之末和秦末之战争，中国民族生命力表现

一种有余不尽之活跃态势。虽然社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文化仍在进步，即社会仍有一股生机。这生机，只要稍得休息，依然蓬勃发展起来。这便是两汉之初国力民力之由来。

秦汉"海内为一，混同天下"(《史记》、《汉书》)；此对全国人民活动，供给一大舞台，也供给一大熔炉。太史公在《货殖传》中谈到秦汉之际各地民风；大抵诸夏之地，重稼穑，有先王之遗风；齐楚都会之地，则趋利巧而好议论；燕赵卫陇近胡之处，民好任侠，不事农商。班固据朱赣之说，论汉代各地民情；大意云：

秦地(陕、甘、川、滇)初好稼穑，及并六国，风俗不纯，世家好礼文，商贾为利，游侠通奸。安定六郡，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凉州一部本匈奴地，宜畜牧，以吏不苛刻，民德宽和。巴蜀轻易偏狭，但文章冠天下。秦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十分之三，富十分之六。

魏地(山西西南、河南之北)，刚强无礼，河东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

周地(洛阳)，贵财贱义。

韩地(河南郑县一带)，好淫信鬼而鄙朴，又申韩之习犹存。

赵地(河北西南、山西一部、绥远一部)，男子多悲歌慷慨，女多倡优。

燕地(河北东北、热、察、辽及朝鲜北)，愚悍而好义，有奴婢之习。

齐地(山东北、河北东南)，俗奢侈，士好经术，失则言行不符。

鲁地(山东西南、江苏淮北)，好商贾，多巧伪；然好学。

宋地(山东河南江苏交界处)，厚重多君子，民贫好奸盗。

卫地(河南河北之间)，民俗刚武，亦好声色。

楚地(湖南北、汉中及河南东南)，火耕水耨，民食鱼稻，渔猎山伐，信巫鬼，与巴蜀同俗，汝南有气势。

吴越(江苏安徽南及浙江江西)，人好勇。屈宋而后，汉兴有枚乘邹阳兴于文景之际，淮南王都寿春，招宾客，而吴有严助朱买臣，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案：据《史记》货殖传，自徐州至荆州，曰西楚，彭城以东及苏扬浙江，曰东楚，湖南安徽称南楚，故班志附吴越于楚。)

粤地(今两广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富。又珠崖男耕女织，中国人多侵凌之，故数岁一反云。(《汉书》地理志)

这和今天的情形不大相同。就当时一般而言，是厚重，好勇，好利，好辩。这也说明当时中国人是生命力丰富的。

这大体说来，是承战国时代各国之流风。然秦统一后，不能不给全国风气以一定影响。汉人虽评秦人"风俗薄恶，民人抵冒"，荀子固称其民俭朴，官吏谨严。大抵战国之世，中国人皆重义好勇，亦重成功(即所谓功利)；观管子《水利篇》可见一般。而秦人以军国主义立国，常至于好勇忘义。贾谊说秦人喜"进取"，无家庭之爱，称之为"敝恶"。另一方面，始皇自好逸乐，但其刻石一则曰"男女礼顺，昭隔内外"；再则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这颇像道学先生，因得顾亭林的赞美。在斯巴达式的国家，是重耕战之士，同时重男轻女的。这种严肃主义，是与六国民情难容的。所以终于失败了。

汉兴，于秦多所因，亦多所革。"汉初相将旧时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议论务在宽厚。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汉书》刑法志)。班固尝以二语赞汉德："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两都赋》)。故民风又一变。秦亡之后，汉武帝所代表的帝王权威还未确立前，汉人是很自由的。这七十年间，可说是汉人气质形成时期，此可称"大汉风"。这有与秦风相同的：

一、活力充沛，身心刚健。秦始皇之精力惊人。汉初诸人如张苍、冯唐、申公，均享寿百岁。公孙宏、苏武、赵充国、贡禹、扬雄、刘歆、王充、班超、马融、郑玄，寿低者七十一二，高者八十六七。寿命不代表人格，然一般高寿，自国民康强之象。帝王初亦不弱，刘邦打乱仗，文帝武帝皆骑射。不过以后日趋委靡而已。汉代对人的称许，除"长者"外，常说到"壮"字(尚有"壮之"，"壮其人"等)。长者可谓君子，壮士(韩信尝自称壮士)首先应有英雄的才气胆力和抱负，并且也应该是讲信义的；虽然到后来意思也变了。其时文武未分，故一时人才出将入相，能文能武。汉人不仅武人，即文人也喜欢击剑。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尹翁归等。张骞，苏武，马援，班超等，即以体力与坚忍而论，皆足惊人。到了东汉主兵者尤多文人。此固如范晔所云，"时政平则文德用，武略之士无有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无论如何，这是汉人刚强的证据。铙歌《战城南》云："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何等豪壮？《白头吟》云，"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信为卓文君作，真巾帼须眉。自无怪乎两司马之咳唾风雷，班固《燕然山铭》之振大汉天声也。

二、规模闳大，气力沉雄。以建筑为例，秦汉之长城，阿房、建章、昭阳之宫，都气魄宏大而坚实。班固《两都赋》之矜夸馆室，犹可见之。及今"西风

残照,汉家陵阙”,犹令人想见当年豪放。又如汉人著作,如贾、晁、董仲舒、赵充国之议论,《史记》、《汉书》的体制,扬雄之哲理,许慎之《说文》,郑玄之经学,都是纪念碑式的。代表汉人文学之辞赋,也是纪念碑式的。

三、中国文化本来甚重功用实效。孔墨都重人生与实用,不过一依人,一依天。秦汉以来,二者接近,此风尤盛。《易经》与《传》即专谈利害。汉人称六艺为“经术”“儒术”,讲“通经致用”,即着重于其实用性。秦始皇自称“兴利除害”。以后陆贾、晁错、公孙弘、桑弘羊均以为言;此固墨子之口号也。武帝尤大谈“世务”、“功利”、“便利”。汉人甚少空洞的文章,如晁错赵充国之奏议,皆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一文一武,其议论竟相通。由此言之,汉武帝之好大喜功,也可说是时代精神。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正对时代风气为纠正,勉人求大功远利,勿求急功近利者。(亦有谓“不计”本为“不急”者。后来宋明儒者所反对之功利,则亦另有所指。)所以他正是通经制用论之提倡者。汉人之实事求是之风,是非常显著的。

四、于是秦汉前后,我们看到两种风气,日益盛大。一为货殖,二为游侠。自贵族消灭,平民抬头。平民以治生为急。刘邦等可以白衣为帝,而其他的人至少可以白衣发财。太史公赞货殖云:“布衣匹夫,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故秦汉间企业家甚多,至有“素封”之说。帝王不欲其与王者争权,常加摧抑。然汉人仍乐之。知识分子不仕者,亦认此为当然出路之一。陆贾以后得千金,分其五子,令其生产。马援亦曾货殖。唯因对正当货殖无保障之道,终开“豪人货殖”(仲长统语)之门,为汉代覆亡主要原因。

又周末以来,儒重理性,侠尚意气。刘邦为帝,起舞唱歌,是游侠本色。自季布陈豨以至汲黯郑当时,皆任侠好士。当时长安,是都人士女、游士列肆之区,亦游侠斗鸡走马赌博之窟。即武帝之豪荡不羁,固有染于游侠趣味者。史公赞游侠云:“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背信,不背言,仁义有取。”若朱家剧孟,信可当之无愧。帝王恶其与王者争权,常加摧抑。其后有郭解、朱安世、陈遵、万章、楼护、原涉之徒,气象渐薄。而民间仗义之侠,又一变为勾结权门之侠。武帝杀郭解朱安世。是后宣帝微时,以及石显王莽等,均曾勾结游侠;唯王莽得势,仍设法诛锄之。光武借之而兴,即位后又制裁之而已。余韵流风,自有存者。如杜季良之高义,虽马援亦爱重之。耿弇父况,至以

"侠游"为字。然东汉之世,多为权门之爪牙,甚至为梁冀之刺客。袁术董卓曹操亦喜任侠,则酒食征逐,徒有其名者而已。大抵国家统一以后,侠即无所施其技。其在近世各国,多变为秘密社会,亦皆良莠不齐也。

五、尚有由六国风气而来,而由汉人特别加以发展的若干事。首先是历史精神。昔西方人士在天上求归宿,印度人在涅槃中求归宿,中国人在历史上求归宿。秦汉——尤其是汉人在这一点表现得甚分明。一切制作经纶,都想为万世法,为后世法。秦始皇行为荒唐,然想为后世法,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秦人法后王,而汉人倾向于法先王。陆贾首倡之,并为刘邦说古今成败之故。贾谊说"为万世法程";晁错说"扬名万世之后";司马迁说"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惧文采不章于后世",为中国史学之鼻祖。赵充国以垂死之年,志在为"后法",力说兵之利害,以为"卒死,谁复当言者"。武帝晚年自称如不改制,恐后世无法,即受此种空气之影响。

六、惩秦代之失,汉人特重宽厚爱人之德。为汉代之政治典型者是文帝。他常说怛恻敦厚字样。路温舒云,"文帝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虽润色之词,汉人之舆论倾向固如是;自始至终,无敢公然反对者。其表现于政治者,则"孝廉"二字之提出。文帝诏云,"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廉吏,民之表也。"到武帝时,孝廉成为经常选举之途。叔孙通以后,汉人标榜"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下,西汉皇帝之谥,均加孝字。《汉房中歌》首句为"大孝备矣"。汉世各地讲《孝经》,等于后世之四书。到了郑玄,以《孝经》为六艺之总汇。因此汉人反对分居,且有三年之丧之说。这自然不可为训。胡适先生以为孝道是汉儒的宗教,三年之丧为"野蛮"。其实儒墨二家,都讲忠孝,所不同者,丧礼长短,乐之存废,鬼之有无而已。儒家三年之丧,亦重在精神。其他一切皆虚文化后,汉人也才将这一点也虚文化的。

七、如妇女地位是民主程度之一标志,则汉代男女地位相当平等。此亦与秦不同。《说文解字》云:妻者齐也;此为汉人恒言。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传为标准夫妇之典故。汉初,刘邦还沛,欢宴故旧,宗室诸母均参加,可见汉初农村,男女交际尚平常;唯东汉渐拘谨耳。又如司马相如卓文君事;朱买臣之妻以贫求去;外黄富人之女嫁庸奴,亡其夫,其父之故人闻张耳贤,劝嫁张耳,终嫁之。皆可见妇女结婚离婚,有一定之自由。又光武之姊湖阳公主新寡,欲嫁宋弘。弘被引见,帝令公主坐屏风后,谓弘曰:"谚言贵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谓主曰：“事不谐矣。”此不仅可见妇女可再嫁，亦可见汉人夫妇之风。《孔雀东南飞》可见夫妇之笃，《上山采蘼芜》则讽刺轻于离婚者。《陇西行》云，“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可见妇女之自立。刘向及《后汉书》为列女作传，可见妇女地位之提高。班昭授经马融，蔡文姬授书王粲，均功在文史。唯妇人不得再嫁，亦由班姬提倡而传。此外，普通男女，多一夫一妻。《盐铁论》云：“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以成家。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是以女或旷怨，男或无匹。”可见多妻之俗，实由帝王或贵族所造成。武帝桓灵之后宫，尤荒唐无人道。自来伤风败俗，皆由权贵也。〔注一三〇〕

八、汉人重名义。秦汉间人，力争成功。栾布云，“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而季布则以一诺千金，为人所重。及时局安定，政复清和，人人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说汉初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班固说汉初之人，耻言人之过失。此皆可见汉人之厚重及自尊心。于是奋发之心，加上一层荣誉之感。刘邦以“行义（仪）”为登用之资，逐渐乡举里选，成为定制；德行刚毅，为用人之标准；一玷清议，终身不齿者，亦由社会风气而来。顾亭林谓汉人“以名为治”，信乎不诬。朝廷功名之士，在野儒侠之徒，亦是因爱名之念，而冒险犯难，苦行厉节，乃至感激轻生的。“慷慨好立功立事”（《后汉书》种暠传），始终是汉人一般的性格。疏财仗义，亦汉人之风气。及朝廷制裁游侠，而货殖之道亦渐窄狭，同时儒学日盛，慷慨英多之气，遂洗炼于独行义行之中。西汉已有散财（杨恽）让爵（韦玄成）及报恩复仇（朱博）之行。至东汉尤盛。例如朱晖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及大饥，尽散其财。张堪在太学，一言以妻子相托，堪死晖即厚济其家，家人莫知其故。种暠父有财三千万，均尽散于邑里贫民。管宁、许靖，周济故旧。李固杜乔被害，弟子郭亮杨匡收尸护尸。第五种得罪宦官单超，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为超外孙。种门下士孙斌，知种往必被害，与侠客追及种于途，格杀送吏，与种俱逃。至于让爵辞官安贫守道之士，尤难枚举。汉人甚重恩怨。报恩报仇，至代人报仇之事亦多（崔瑗魏朗苏不韦郅恽何颙）。虽未可为训，然平生风义，固后世所难得者。其后积发为党锢，亦由此而一泄无余矣。

以上可见汉人品概之一般。这真是民风淳厚，士气峥嵘，应使我们自豪

于先人之德。在两汉盛时，除戚宦外，很难找出一个爱钱怕死的人（萧何李陵，未有言其贪怯者）。太史公称李陵曰：

“其为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尝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李陵是否足以当之，另一问题，但这些品性，是汉人最重视的。及陵败降匈奴，陇西士大夫皆以为愧。此种急公好义之气，廉耻之心，是汉代国力之源泉，也就是汉人之风度。

## 汉代民德之升降

自汉初至武帝即位，凡六十六年。自前一四一——八七年，他作了五十四年皇帝。尊儒，远征，土木，巡狩，求仙，以及声色狗马之事，他都做了。如法国沙畹博士法译《史记》序论所云，“武帝一贯政策，是使汉代各种潜力，完全发挥出来了。”一方面说，百年来的国力在他的时代开花；然另一方面，也在他的时代枯竭。一方面说，汉人之道德力，在他的时代表现出来；一方面说，也由他的时代开始斲丧。这便是经过战争，经过一套经济之统制，使帝王权力提高而集中；由此集中，造成了特殊势力系统，此一系统复经过巡狩土木与求仙而益趋堕落。寡头势力既成，国家的富力，成为他们淫佚之资；及国富耗薄，便公然为侵夺之政。政治宽厚公平，社会自有正气。权利被垄断后，必廉耻道乖；而在经济破产之后，廉耻便更难保了。武帝之世，在霸主、佞幸、酷吏以下，政治渐失其宽大公明之风。世传李陵答苏武书云，“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此权门之为贪。又杀李陵之母妻，下史公于蚕室，则权门之为暴。贪暴为无耻之本。汉初之人，是不知阿谀，不知贪，不知谄的。自此士大夫阿谀败容，吏士舞文弄法，没于赂遗（平准书，货殖传）。昭帝之世，对内对外俱取收缩政策。国力虽得恢复，然帝王之权提高后，则难收缩。外戚势力日见扩大。宣帝末，陈万年以郡吏为贿赂，善事人，得许、史助，为御史大夫。其子咸为郎，数言事。万年病将死，教子于床下，咸睡。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汉书》公孙贺陈万年传）然父谄子不谄，则谄道犹未大行。元帝时，贡禹上言，以为武帝以钱赎罪，以谷补吏，为风俗败坏之原，谓：“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

书(按谓识字写隶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 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益见廉耻之荡然矣。廉耻既荡,乃有王氏之祸。

自此至于东汉虽有道德之维护,不敌宫廷、外戚、宦官领导道德之堕落。至梁冀以外戚专权,益使道德恶化。童谣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胡广(字伯始)以善敷衍固位。民歌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时汉阳赵壹作《刺世疾邪赋》云:

> "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媀名势。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无耻之徒升官发财,不是可怕的。无耻而讲学问文章,才是可怕的。这就进入一个价值颠倒的时代。继之者是急转直下之公然无耻。桓灵时,宦官专政,公开卖官。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秀才、孝廉是汉代立国之栋梁。现在是自掘坟墓,自己否定自己了。然汉廷不仅无觉悟,还要肆毒于忠良。童谣云,"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洛阳劝酒之词),今年尚可,后年铙。"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骑万乘上北邙。"(以上童谣及解释,见《后汉书》五行志。)于是汉朝自己结束自己的命运。诚如王船山所云,"乱政至于卖官,未有不亡者也。"

自汉武以降,帝王权力虽集中,使道德陵夷,然汉代仍表现其活力者,则言论有相当自由,清议有相当威权之故。王莽是淆乱舆论而盗国的。但舆论并未因此而乱而绝。东汉一代,言论之势力较前汉有过之无不及。此亦即知识分子为中流之砥柱。到了梁冀以后,外戚宦官合体,淆乱舆论,且摧残舆论;腐化自己,也腐化知识分子;汉朝便无可救药了。西汉末之腐败,不过是皇室及社会上层;到了东汉,则溃烂的范围,已及于知识分子本身。其先还有苦节,及苦节不能支持,复受党锢之打击,除一部抛出为狂放外,其余也就同流合污了。故葛洪以为"风俗莫弊于汉末":"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父兄贵显,望门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见收。"即喜评论他人者,"口习丑言,身行敝事。"章太炎先生云,"闾巷之间,据道推方,嶷然不群者,梁鸿、韩康、郑玄、申屠蟠。汉之纯德,在下吏诸生间,虽魏晋不失也。"然此不足挽当

时之狂澜，是不待说的。

道德是一社会健全状态，则道德之崩溃，如贪、如暴、如伪、如谄、如冷血，不过是社会解体时之发热现象。人类价值标准颠倒消灭之后，继之而来者，必然是一疯狂的暴力时代。王莽赤眉之乱，据班固云，"生民几亡，鬼神泯绝。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两都赋》)。到了黄巾、董卓及诸军阀之乱，则看王粲之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之诗"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千载之下，犹当断肠！

总之，汉人的德性——刚健恢弘之气，实事求是之诚，由宽厚而生的亲和力，由自爱而生的荣誉心，是两汉光荣伟大的根本。在汉人道德崩溃后，不但汉朝天下完了，连汉代文化也崩溃了。如后面可见，董卓之乱，不是一王朝之终结，而是一种文化时代之终结。六朝时代，若干技艺，颇见发展。然汉人意气已尽，是无可讳言的。

不少人谈到汉人，美其尚武精神。但武不是独立的道德。一个社会健全，不患不武。诚然，汉人是能武的。但汉不以武兴，而以武亡。离开道德，武可以杀人，亦可自杀。汉之为汉，在宽厚自尊，不在于武。这是我要特别一说的。

## 秦汉之技术水准

战国以来，一般的实业技术和生产力，大为进步，尤以冶铁炼钢之术为然。在秦汉统一政府和市场之下，尤足以促进生产交通和各种实业之发展。虽然后来帝王对人民事业怀抱戒心，秦汉时代在经济建设生产技术上的成就，是规模宏远，民至于今受其赐的。

最大的贡献，是水利农田。我国以治水建国，以水为最大利害，故史公有河渠书，班氏有沟洫志。自管仲设水官，历代因之。《文献通考》云，"秦汉并设都水长丞，武帝置水衡都尉，使者；东京并置河堤谒者"，而由司空总管之。秦之富强，得力于水利。李冰建设，犹为吾人目睹。郑国渠成，卒并诸侯，诚所谓"臣为秦建万世之功"者。灌溉之利外，尚有漕运，始皇扩宋国邗沟，连络长江黄河，扩宋国原有鸿沟，连络淮黄。又开灵渠，以通长江珠江。秦注意西北水利。新秦(河套)之经营未竟，但于宁夏开秦渠，为西北水利之始。

汉初萧何在关中置堰坝，引褒水。上说汉人是讲功利的。汉人所谓功利，外指国防，内指水利。武帝初用郑当时引渭穿渠，灌田万顷。又于晋穿渠引河汾之水，于蜀开褒斜道。屯田朔方湟中，塞瓠子，开白渠。《汉书》说，“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一时空气，争言水利。齐人延年上书，主张由昆仑向海开大河。不论如何，这总是后人不能想像的大计。武帝“武功”在功罪之间，而其所兴水利，尤其是西北水利，则万世之利。自山东长被水灾，元帝时，尹忠方略疏阔，受责，自杀。哀帝时，贾让言治河三策，基本理论是不错的。关于农田，始皇已有上农除末之语。汉初重视农业，吕后设孝弟力田之官。文帝云，“农，天下之本也”；躬耕劝农。武帝不断征伐，人屡相食，晚年悔悟，力奖农业，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创代田之法，轮流耕种，三犁共一牛，用器、下种、耕耘，皆有便巧，令人民学习（食货志）。东汉初，任延所至修水利，设学校。杜诗亦在南阳大兴水利。王莽时黄河二次改道，迄未治理。王景（朝鲜人）治河后，千年无大患。王杜并皆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注一三一〕（《后汉书》各本传）。东汉末，博士马钧发明翻车，即水车（《三国志》杜夔传注）。又曹操用枣祗韩浩之议，兴屯田。徐邈皇甫隆皆于敦煌兴农田水利（《三国志》魏武徐邈仓慈传）。诸葛务农殖谷，并屯田渭滨。孙权亦令诸将，增广田亩。凡此，皆承汉初之风而来。先人的远谋，今后的大事，首在于此。

秦汉建设第二大事，为交通。秦于驿道邮道之外，大修驰道。宽者五十步，狭者五尺，三丈而树。所谓“车同轨”也。此大耗国力，然为汉之资本。汉代统一后，对西南西北之桥路，均事兴修，如武帝发九十万人修雁门险阻。后汉桂阳太守卫飒于广东凿山通道。时陆路用牛马及人力牛马驴之车。汉代对马政极重视；官马三十万，民马亦十余万匹。〔注一三二〕道旁常植树（桐梓等），将作大匠主之。沿途有邮驿，亭传，逆旅。其在边境，置高土橹，上作桔皋，为烽燧之用。至于水运，除内河及沿海民航外，海航已用于军事。始皇除派徐福航海求仙外，令尉屠睢率楼船攻越。其后武帝遣杨仆由齐浮海击朝鲜，严助由会稽浮海救东瓯。漕运亦大兴。张良说刘邦云，“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桑弘羊时，关东漕岁益三百万石，不过亦为苦役而已。东汉漕运工程最大者为明帝时汴渠，亦王景主持者。《潜夫论》云：“江南之本，人海乘淮，逆河溯洛。”是河海已联运。西汉末，胡刚亡命交趾。东汉末，许靖亦往，而管宁亡命辽东。可见南北航行，

相当便利(参看吕思勉《秦汉史》下册交通条)。建安中曹操亦颇事开渠,并通海运。吴尤重海运。吴使为公孙渊所杀,孙权欲亲征辽东。而大秦贾人有来吴者。东海与黄海尤其是南海交通由吴大开。(详续卷)

其三,水利工程农业技术之进步,水陆交通之开发,自得力于工业之进步。秦汉大工业有四种。一是传统的纺织。齐自古为纺织中心,女工最巧;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陈留与蜀,亦继之而兴。此在汉代为一大对外输出品和外交武器,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注一三三〕除纺织外,有五种新兴工业,即冶铁、煮盐、铸钱、开矿与造船。秦世郭纵,猗顿,寡妇清,蜀卓氏,程郑氏,宛孔氏,以铸冶致富。卓氏等至汉犹称巨富。继之者鲁丙氏,成都罗氏,皆以冶铁致富。此皆为平民(《汉书》货殖传)。贵族宠臣吴王濞、邓通,则铸钱致富。连带而起的是盐业,以及新燃料之使用。汉代盐铁之利,盛极一时。《盐铁论》说:"山海者,财用之宝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盐冶之地,皆低山川,近铁炭。……往者豪强大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后汉书》:杜诗为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注曰:"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倘能再进一步,亦离汽机不远。此所谓炭,也许是木炭。但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博物记》,蜀郡即临邛用井火煮盐。又引《豫章记》曰,"建城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注一三四〕《陆士龙集》,曹操铜爵台北有冰井台,藏石炭(又称石墨)数十万斤。则汉代已用煤气与煤矣。有了铁和煤,工艺,田器,以及造车造船(楼船),陆水武器,自然随之而进步了。汉有楼船,高十余丈;有戈船,置戈于船下。昆明池中,楼船百艘。(《汉书》武帝纪,《三辅黄图》)武帝算缗,船五丈一算。皆可见公私造船之进步。

这些"Know-How",是汉代能够实现秦汉和平(Pax Sinica)的本钱。吕后曾下禁"金铁田器"出口的命令。晁错尝以明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为兵之三要。对中国与匈奴的军事长技,作一比较。匈奴之长技有三:

甲、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如也。

乙、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兵)弗如也。

丙、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如也。

而中国之长技有五:

甲、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乙、劲弩长戟射疏(广阔)又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丙、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器）弗能当也。

丁、材官（骑射之兵）驺（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戊、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汉书》晁错传）

这有似今日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对比。所以中国还能威压匈奴。《盐铁论》说："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汉书》西域传言，"自大宛以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陈汤言，"外夷兵刃朴钝，胡兵五当汉兵一，今颇得汉巧，犹三当一也"（《汉书》本传）。又，马援伐交趾，将楼船大小二千艘。而由赤壁之战，亦可想见水师之情况也。〔注一三五〕

这些重要技术与产业，半因国防秘密，半因军需浩繁理由，后来多由政府主持，或收为国有，即由政府统制。管理国家财政与工业者曰少府，除太医管医药外，考工室管兵器及诸工，东织室西织室管纺织，还有将作大匠管建筑。外郡有工官。《汉书》地理志记有丹阳之铜官，豫章鄱阳之金官，盐铁官尤多（铁官四十处）；然"豫章黄金，取之不足以更费"。卜式说官造田器不良。贡禹传云："今诸铁官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方今齐三服官（按冠绩首服，绢冬服，轻绡夏服）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亦然。"国营事业之靡费无效，自古已然。不过纺织在西汉还是许私人经营，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织，家中工人七百人。在东汉，盐铁大体是开放的。一般而言，技术总是慢慢进步的。宣帝之世，"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罕能及之"。东汉以后，更有进步。蔡伦即主持国家工业的。到了东汉末期，如张衡马钧诸葛亮蒲元，均以善制作称。

其四，实业之进步，必然是商业之发展，而货币市场之统一，亦有利于商业之发达。自姜太公铸方孔钱以后，周人承之。刀钱渐代布（镈）钱。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用黄金（二十两为单位）及半两铜钱。半两钱殆圆钱之始。货币统一，加之"法度、衡石、丈尺、车轨、文字"统一，自然促进各地物资之交换，商业之发展。〔注一三六〕秦人本重商业，巨富甚多。不过秦统一后，又从事防范统制。秦亡，汉初"富商巨贾，周流天下"。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诸大都市发展起来。工商者之财富，使文武之士惊恐，乃禁其乘车着绢，并以重税困辱之。但旋弛商贾之律，唯禁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文帝"通关去塞"，又使商业得到有利条件。商人对于统一，亦非无帮助。吴楚起

事时，列侯行从军旅求贷"子钱家"(高利贷)。其他子钱家莫肯与，唯无盐氏贷千金，十倍常息(秦汉皆岁息万二千)。一年得十倍之利。这也是汉人不喜货殖家的原因之一(《史记》、《汉书》货殖传)。

汉初商人之暴发，亦因汉初货币甚滥。先将钱改轻，后铸四铢钱(又称半两钱，按廿四铢为一两)。又许贵族自铸，货币益滥，遂便投机。及武帝之征伐与浪费，颇行通货膨胀之策(造鹿皮币，又用银造龙、马、龟三种货币，又废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又用苛扰诛求之术；如是商人破产，官僚地主抬头。此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之一关键。前一一八年武帝造五铢钱，废止其他货币，统一发行，币制才渐趋安定。终汉之世为经济一大安定力，且流传于域外。

市场之统一，货币之安定，加以国境之扩大，关塞之撤除，所谓"天下道无不通交易"(《汉书》伍被传)。尽管政府不喜商贾，欲商业之不发达而不可得。不仅国内商业发达，巴蜀广汉与西南，燕与辽东朝鲜，秦蜀与西域，早有贸易，番禺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及河西与西域贸易开通，更有空前国际贸易之盛况。此皆所以供给武帝百废俱兴及穷奢极侈者。是时"奇方异物，四面而至。天子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西域传)。桑弘羊说这是"示威怀远，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此与伦敦之加冕大礼，用意也许相同。然结果是失败的。此不仅因为得不偿失，亦由这贸易之输入是奢侈品，无益于生产。所以贤良文学批评是"贵人之所贱，珍人之所饶"(《盐铁论》)。及军兴收支不能平衡，武帝不知合理的开源节流之道，乞灵于统制之术。汉初不许商人子弟为吏，但经济是自由的。唯徒禁商人从政，而未禁官吏经商，实开官商勾结之门。至武帝用贾人之子孔僅桑弘羊，不是重商，而是一种官商政策。于是行专卖之策，苛征之策，以及以平抑物价防止暴利为名，行均输平准之策，令官吏列肆贩物；甚至为了增加收入，不惜行卖吏赎罪之策。这除了败坏政治风气之外，即破坏正当工商使无以自存，而助长权贵及投机商人之跋扈(此二者是并行的)。一国富力基础，在一般农工商。商不是可绝的，亦不当抑的。当绝当抑者，是依赖政治势力之商人。必抑特权之商人，而给正当商业以保护，国民经济，始能健全发展。而所谓抑商，所谓统制，只足以造成官僚资本之独肥，正当商人之破产，而国无有不困的。于是又以加紧统制，为不二法门。这便造成一种经济枯竭之恶循环。

而时在不断征发状态下，益使农村劳动力破产，水利之事也就无人顾及，而农业也就破坏，社会秩序也就大乱了。班固云，"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同上）。另一方面，则监军御史开军营为市场（《汉书》胡建传），大将军霍光子弟竞治第宅，丞相张禹事货殖，买田四百顷（各本传）。军纪官常也大为堕落了。可见自古以来，不能离牛油而谈大炮，而统制经济实是误国殃民的。此一失败，在当时，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正当工商，也怀抱成见了（《盐铁论》即代表之）。

其后昭宣以降，力为紧缩。经济渐入正轨。但武帝以来，权贵势力业已伸入商业与经济。贡禹云，"诸曹侍中以上家，私贩卖，与民争利"（本传）。如下可见，此在都市农村皆成为破坏因素。武帝还未全面统制。王莽亦用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王孙卿等），更全面统制，以图解决经济困难。结果造成大乱。东汉以来，大体承昭宣时代政策，商业发展较前汉有过之无不及。文人颇有经商者，如樊宏世代稼穑，财至巨万，第五伦贩盐，崔寔卖酒。姑臧（武威）、交趾、会稽，为对外通商要地（《后汉书》孔奋、贾琮、朱晖传）。〔注一三七〕北与鲜卑互市，东与岛夷（东鳀人、夷洲、澶洲），南与西南夷，西与西域大秦通商；贾客随班超至西域，甚至参战。但东汉初年据桓谭之奏，则官商即有勾结。〔注一三八〕末年权门公然掠夺人民之财产，如梁冀敲诈富人士孙奋不遂，即枉法夺其财产一亿七千万，侯览亦强占人民田地财产。复有"豪人货殖，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仲长统《昌言》）。再加上横征暴敛，汉代经济便崩溃了。

然大体言之，两汉商业还是发展的。观《盐铁论》，扬雄、班固、张衡之《蜀都》、《两都》、《二京赋》所描写的，可见当时都城之繁盛。而观《潜夫论》及《昌言》，尤可见东汉市场之活跃。〔注一三九〕西汉末，长安、成都二处人口皆在三四十万。后汉之河南尹人口百余万，其中洛阳城人口当五十万以上也。

## 秦汉人民生活水准及其变动

秦汉经济基础在农业，人口最多者为农民。《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之言，"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余百三十五石。食，人

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衣，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及赋敛，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力耕之心也。”此当秦汉人托李悝之说者，可为研究秦汉一般人民生活之标准。由此可见当时仍以自耕农为多。据吕思勉先生推算，汉一石略合今二斗。如补农民不足之数，当为粟百八十石，即今三十六石，粗米二十一石六斗，乃可勉支。以石五元（银元）计，共得百有八元，人得二十一元六角云（《秦汉史》）。悝说盖指谷贵伤民，谷贱伤农。《史记》货殖传谓：“粜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李悝所谓石三十，盖指低价而言。故只要略增米价，则农民生活勉强可过。况农民尚可兼营一点副业也。又李悝创平粜，秦汉均事积贮，以备灾荒。宣帝时耿寿昌创常平仓，遂成定制。

秦汉以降，人口在增加中，然生产事业亦在发达中。土地多在开辟。文景以降，常奖励人民开边垦荒，且常贷以田宅犁牛种食。汉成帝时，人口六千万，为两汉人口最多之时，可耕地为三千二百余万顷，已垦田为八百卅万顷。山林川泽在外（食货志）。这比例大概始终差不多。如若平均分配，一人可得七十亩。虽有豪富兼并，然地权素在政府之手。汉世政府拥有大量土地，据汉史记载，赐田权贵甚多，贫民无地者亦常由政府颁给，即所谓赐田。〔注一四〇〕一家百亩，殆为常事，比较今日土地不足情形（今日内地每一农家平均只能有三亩，东北可分十亩），是大不同的。国家尚多可以自由开垦之土地，而且工商事业亦在发展中。所以秦汉时代，除非天灾人祸，一般人生活，是能够殷实的。

事实自不尽然。《汉书》食货志记秦至西汉人相食及民饿死者，凡四次。一为秦汉之际，二为武帝对外作战之时，三、四次皆因水旱之灾。即大兵凶年也。此后王莽时人相食。此后东汉蝗灾屡见，水旱亦多，亦再三有人相食之记载。但多数是局部性的。唯对西羌用兵时，以及汉末黄巾卓乱时，则人民受害范围更大。故人祸实酷于天灾。人祸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天灾是突然的。只要不是人祸之积发与天灾之突发合并起来，汉人生活比我们好得多了。

秦统一六国后，一时甚富厚。始皇自称“诸产繁殖”。及始皇大事征发，“收泰半之税，发闾左之戍”，农民始破产。“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灾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因循未改”（董仲舒语）。因秦汉之虐

政，天下愁怨，遂用溃畔。董氏所谓“汉兴因循未改”者，指汉初饥馑与诸侯并起及后来武帝时而言。事实上刘邦即位，即持无为之道，与民休息，渐趋安定。然农商发展不均衡。贾谊乃力主劝农。晁错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收不过一百石，倘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而偿债者，此农人所以流亡也。”他提出守边备塞力本务农之方针。于是文帝以后，薄赋轻徭，力为节俭，并“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皆安居乐业，工商亦发展。文景之世，家给人足，为汉人乐道之太平盛世。此史公所谓“孝文施大德”也。

故汉初虽有贫富，多为中产之家。汉文帝以百金为中人十家之产。案汉世黄金一斤万钱，则中人之家为钱十万（吕思勉以粜中价折合，约今二千银元）。景帝下令赀十算以上始能为官，十算，十万也。其后哀帝诏水灾区域民资不满十万，无出租赋，似仍以此为标准。此可见汉代保护中产阶级之政策。张汤死，家产五百金，而史不以为不廉；此则标准官僚之财产。当时三百万以上者为富人，一般商人多有之；如武帝“徙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吕云合六万元）。至于豪富大官，灌夫数千万，大贾宛孔氏数千金，刁间数千万。若五千万，殆等于今日百万元也。

生产力之发达，中产阶级之健全，乃能使武帝从事远征与奢侈。及过度，造成全国经济之崩溃。然昭宣紧缩，国力随之恢复。因文物进步，生活水准提高。这不坏。大兵之后，生活程度（物价）亦增加。这亦不要紧。可遗憾者，是权豪势力侵入经济后，高生活水准增高了他们的奢侈欲，垄断欲；而高物价则使中产阶级处于不利地位。结果，促进兼并——不公平的兼并。对此情形，一般的统制有害无益；即一般之无为，亦是不够的。这是只有对权豪统制，对人民无为，才能有效的。然在当时，无为已算难能可贵了。

汉世一般人民之生活，关于衣，除丝麻外，木棉已输入。食仍米麦并行，蔬菜以外，狗肉与鸡豕鱼羊同样流行。唯汉初内地肉食，并非常事。除酒早有，汉世常禁外，茶已有市；今日之豆腐，豆豉，面、饼，粽、馒头，酱醋糖等，皆始于秦汉三国间。一般居室，大体已如今日情形。〔注一四一〕昭宣以后，衣服之文采，饮食之烹调，宅第之装饰，苑囿之铺张，花样大为增加。《盐铁论·散不足》篇，曾以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比较古今生活状况。贤良说，“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箕子之讥，始在天

子，今在匹夫。”汉代知识分子常为普遍禁奢之论。其实社会富力之增加，必使一般人衣食住水准提高。问题实在负担不公平，机会不公平，乃能使权贵为额外奢侈，掠夺平民应有之享受耳。当平民衣食不足时，富人有食小鹿雏羊，衣必皮衣、朱貂，金簪玉珥者，更不论台榭楼阁，五乐歌儿，郑舞赵讴而已。娱乐除赌博弈棋弹丸外，有蹴鞠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百兽马戏，斗虎奇虫之艺。〔注一四二〕汉人最奢处，尤在丧祭。帝王不待说，人民亦然。“古者明器有形无实，今厚资多藏器用以为孝”；“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士大夫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倾盖社场。”《盐铁论》谓其“宽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礼而笃于祭”，实“嫚亲贵势”云。自杨王孙龚胜，以至樊宏郑玄均主薄葬，无裨世风。然另一方面，则有“短褐糟糠”之贫民。王章以诸生无被，卧牛衣（乱麻为之）中。是时物价，由严君平卖卜成都，日得百钱，即闭肆下帘授《老子》，表示最低家庭开支之需；而此已四倍于以前农夫收入（一三五石作五十钱粜，年六七五〇钱）。扬雄自序家产不满十金；此犹文帝时代中产之资；又云家贫者，则物价已高之故。又《货殖传》：西汉末京师富人如姓伟，樊嘉五千万，其他张长叔十千万，王君房樊少翁等皆巨万（即亿，古以十万为亿，汉人以万万为亿）。此乃世代累积而来，亦已较过去大贾财产为大。最大者仍为官僚资本。如董贤伏诛时财产四十三万万（约八千万元），亦可见以贫求富，农不如商；而商不如官。而以王章与董贤相较，可知西汉后期中产阶级已较文景时代没落矣。

此亦即表示西汉后期自耕农破产，因而大地主日多。破产之农民，只得为“大家”耕作。武帝时，酷吏宁成尝谓，“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辞职后，贳贷陂田千余顷，假平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酷吏传）。武帝末，二千石子弟常在农村侵渔百姓，始派御史督察之（详下节）。《盐铁论》所谓“逋流皆在大家”者，当指此类。而在都市中，则有官僚贩卖。此皆足威胁普通商贾及自耕农。元帝时，学者贡禹自称有田百三十亩，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因元帝征聘，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得俸钱月九千二百，常有天子送礼，太医免费治病，后为光禄大夫，俸钱月万二千，家日以富，身日以寿（《汉书》本传）。此可见当时生活程度，以及卖田风气。他又说农民须纳租及草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耕，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因主张禁官营商，废止货币（均见本传）。其废钱之论虽不通，

但可见汉代常颁田于农民，特生活程度甚高，租税甚重，加以豪门货殖，自耕农无以自存耳，其结果是土地集中于权贵。由此可见土地兼并，除水旱之灾及农民副业不足外，主要由于政治失轨，政权集中，特权势力之形成而来。至西汉末，土地不均，已甚严重。然大地主主要仍为政治上有势力者。如董贤赐田一次即达千顷之多。师丹主张限田，乃以王侯为对象。到王莽专政之时（平帝元始四年），许多知识分子将旧货，经传，笙磬，拿到市场出卖讲价（《三辅黄图》）。此等于今日之摆地摊。这也是中产阶级崩溃之标志。

王莽的政策，因此而起。但王莽政策，却更促成中产阶级全面崩溃。

东汉初年，政府很节约，生产力在提高，一般社会生活甚安定，中产阶级得以恢复其势力。但章和以后，经过外戚专政，水旱之灾，西羌之乱，加之宦官之乱政；豪门地主成了一个系统，一个阶级，而中产阶级卷入全面破产之过程中。贫富悬隔日甚，奴婢之数也日多。自耕农及佃农情形日恶。荀悦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然而大乱起矣。

但必须知道，此时之豪强并非西汉初年冶铁的卓氏，或东汉初年务农的樊氏，而只是豪门。东汉初年风俗甚为朴实，而末年奢侈，较西汉为尤甚。王符对当时洛阳的奢侈，记载甚详。但能为奢侈的，不是西汉的素封（编户齐民以财力相竞者），也是豪门。豪门非他，外戚宦官而已。章帝初年诏云，“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和帝时马防兄弟奴婢至千人以上。马氏尚名人之后，其他可知。汉政府常为慈善之举，自咎之诏（如顺帝云，“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况我元元，婴此困毒”），然此无益于溃烂之局。梁冀伏诛时，财产三十余万万，等于今日之六千万矣。宦官侯览受纳货遗以巨万（亿）计。他们甚至公然掠夺人民财产。不仅贪污，而且残暴。而灵帝之流，则日以胡服、胡帐、胡饭、胡笛、胡舞与京师贵戚相乐（《后汉书》五行志）；犹今日之西装、西餐、电气冰箱、爵士舞也。他们还竞造宫室，争修花园。货殖所入不足，便再征税。其荒唐又过于西汉矣。仲长统云：

>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在豪门贪污之下，自耕农痛苦，自爱的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尤其痛苦。一般平民常死无以为葬。羊续周燮诸人，极力为苦行。然亦如仲长统所痛

言，“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损益于风俗也。”〔注一四三〕于是“八方分崩，中夏鱼溃。”（刘陶语）

如果中产阶级是两汉的支柱，则中产阶级（当时主要是耕读两界）之崩溃，是汉代大乱的由来。而中外古今，大抵如此；中国尤其如此，汉代早已如此。

由上可见，由于秦汉人继先人勤俭之德，以及生产力之逐渐进步，尤其在统一的国家成立之后，农工商本应发达，而民生安乐亦无问题的。民生威胁，除大兵凶年外，即是豪权。而豪权乱政，亦必引起大兵与凶年。

中国自古不废货殖，唯不乐奢僭。中国不讳言富，不过更重富且仁义。欲达此目的，必农工商平均发达。秦汉之初，市场乍开，铸冶新兴，一时甚有资本主义趋势。不过一则统一以后帝权始而控制工商。而战乱之后，农商发展有不均衡现象，一般人对商渐有成见。此观《史》《汉》二货殖传议论之变迁，即可见其消息（此后且无为货殖立传者）。乃有限商政策，资本主义遂未发展。〔注一四四〕加之中国无海外贸易，正当货殖之发展，亦复有限。再加上家族制度，财产有自然平均之势。故中国成为一中产阶级为主体之国家。而此亦为汉之力量之所在。但中产阶级利在政治清平。故帝王谨慎，轻徭薄赋，则中产阶级强，国家必兴。文景之世，昭宣之世，以及光武明章之世，皆然。而无论为公为私（远征、奢侈），而为苛征暴敛，则中产阶级必衰，国家必乱。然帝王政治终将趋于贪侈，是不待说的。其次，国家之患，不在有特富之人，而在多赤贫之人；避免之道，不在困辱商人，只在树立正当工商之轨道。不在禁止商人为吏，而在禁止任何凭借政治势力经商，此尤须禁止权豪货殖。否则，权豪勾结商人货殖，较之资本主义更有百害而无一利。然帝王政治终必变为权豪政治。权豪在法纪舆论有威权时，尚不敢公然货殖。然在帝王政治下，权豪政治必终于走到权豪资本主义，亦即官僚资本主义。此种官僚资本主义之破坏国民经济，危害中产阶级，较任何帝王一人之奢纵，官吏本身之贪污尤甚。盖官僚资本即是集体贪污也。是以以武帝之滥用无度，一旦悬崖勒马，尚得无事。东汉国力虽增，终因官僚资本之集体贪污，使中产阶级全面解体而亡国。

由此可见廉耻与中产阶级，关系国家兴亡。二者隆替，关键在于政治。故当续论秦汉政治，尤须注意其对二者利害之处。

# 五　秦汉之政治制度

秦始皇即位后，自称“法令由一统，上古以来所未有”（《史记》始皇本纪）。这是事实。历代创制，实以秦汉最多最根本。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切制度，与学艺一样，都是承继过去，同时因时移势异，针对当前需要，而为因革损益的。但损益之时，人们自可因利害识见而有不同的倾向。秦制多承六国，非尽秦人特创。唯始皇加强皇权。班固说：“汉迪（至）于秦，有革有因”（《汉书》叙传）。而在对秦制之因革损益中，皇朝与知识分子倾向不同。所以汉代制度是皇帝与读书人折衷产物。这一制度，也是中国二千年来的基础。

关于文物典章制度，太史公始为八书：礼，乐，律（张晏云当作兵书），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班书分为十志：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班书有《百官表》，《后汉书》增为《百官志》。唐杜佑著《通典》，始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立后世政书规模。《文献通考》本之细分，并增经籍，封建等。又《通志》则入四夷于“传”，而于“略”中增氏族，六书等。专志两汉制度者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凡此皆本章后四节对象，而十之六七括论于本节。〔注一四五〕

《史记》首列礼，他书礼则逐渐后移，皆非偶然。我们要了解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可由他的宪法等入手。古代国家，包括秦汉，并无成文宪法。但我们犹可依一个宪法结构以观察其制度。一国的宪法及其他之法，皆有其根据。我首先要说，儒家原欲以所谓礼放大，据以制定政治制度。但此大业并未成功，于是礼的意义逐渐缩小。故本节由此开始，进而论汉代行政区域，人民权利，皇帝地位及政府组织，以及军事、财政、司法、文官和教育的情形。

## 礼与法

孟德斯鸠云，“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也。一切有于所生表其年德者，皆将为孝敬之所存。从此而有报施之义焉。子孝，亲不可不慈……此

所谓伦理，礼经；支那所以立国者胥在此。支那政治家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一言以括之曰礼……斯支那之治为极盛。”严复先生按语云，“不觉低首下心服其伟识”。以后辜鸿铭先生笑西洋人专以上帝与法律（军警）吓人。梁漱溟先生极力说中国礼治之妙。

这些话只是在极限制意义上才是确实的，而不可夸张。中国之礼，西洋之法，同由宗教分化而出。《说文》：“礼，事神致福也。”格特尔（Gettell）云，“最初的罗马法，是由宗教仪节，习惯条规，及公认的正义概念混合而成的。犯法不视为违害国家而是渎神”（《政治思想史》）。其实，巴比伦法，犹太法，以及印度法莫不皆然。我国古代以“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为大罪，亦是如此。我国法律观念与西洋法律观念不同者，不在起源，而在范围和重点。我国之所谓法律，关于法，几指刑法。《说文》：“法，刑也。”但西方古法亦然。巴比伦法中亦有割鼻、切耳、去势等刑。不过律的观念大异。我国所谓律，指音乐及度量衡。此转为调和轻重及划一。故历及服装（正朔、服色），亦是大事。又不同者，自巴比伦法起，除刑法外，即有关民法，诉讼法，商法，税法，奴隶法，婚姻，相续，养子，债务奴隶处理，借贷农佃之契约等项规定。罗马人之法律，实由此而来。而中国关于民法，婚姻相续，由“宗法”决定；财产问题，只要度量衡合“律”，几凭习惯法处理；对于财产法，确是不甚注意的。于是在我国维持社会秩序者，只有两套东西：一即礼——传统制度，一般习惯；二即法——实即刑法。此非中国人没有礼与刑之间的法之观念，只是读书人不注意（苏东坡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政府不干涉，社会上凭“理”“义”解决。西洋人关乎权利义务的观念，我们认之为“义”。至于契约，在中国人看，信义问题重于损害赔偿问题。财产纠纷由有关团体与长老先行调处。换言之，西洋之法，一部分也在中国礼之范围之内。

这不同，在我看来，是由历史与社会原因而来的；而双方知识分子出身立场不同，亦有绝大影响。至其利害得失，都不是一方面的。我们长处即在短处中，短处也即在长处中。除本节外，末节尚将加以研究。此处我先提出一言者，时至今日，如以为我们只要礼，而无须西洋人之法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如以为我们缺乏西洋人法的观念，即为我们民主宪法之落后原因，也是皮相看法。须知成文宪法到美国独立才有（一七七六——一七八九）。此至今不过二百年。西洋近代民主政治虽由希腊罗马的观念受到启发，但在制度上，断不能谓有直接关系。

明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秦汉政治制度。因为我们国家与西洋国家不同，是双方同时在两汉和罗马帝国时代才定型化的。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汉儒对礼与法的解决，实有决定的影响。

西洋国家，例如罗马，其成立与发展与我们不同者有二：一即族类复杂，阶级之制甚严。二即他们皆先为城邦（前五世纪，罗马不过一七〇平方公里，后至四百万平方公里），其领土是不断扩大，而此扩大，方法是靠武力征服，而目的则在于经济特权。他们自始有贵族、与平民、与奴隶之区别。政权操于元老院，此实贵族机关。平民负纳税当兵义务，被征服者为奴。奴隶解放，升为平民，即所谓"自由人"。平民负债，降为奴隶。罗马人生活中心，是市民权或公民权，此种公民权包括"公权"之参政、上诉，"私权"之财产所有，及婚姻。在平时，债权债务是生活中心。所以他们的法，亦以财产、债权、债务为中心。但罗马扩张要平民出力，于是这些权利之一部或全部便授与平民。大规模对外战争还需要旧的奴隶出力，所以奴隶也便逐渐获得公民权。随罗马之扩大，便有法之扩大——由《十二铜表法》到"万民法"到"自然法"；而其内容，即是公民权之扩张。即原来只适用于贵族，自由民和罗马人间的权益的法律，扩张于帝国以内之人民。西方权利义务观念，即由此而来。平民参政是罗马扩张实力之源泉。又罗马之扩张，是由许多武人带兵各自出去开疆扩土的，他们照例各自随意在殖民地征税，即以其财富武力，回国争权。于是平民参政逐渐形成军人干政乃至专政之局。所以罗马政治或宪法问题，即元老院与诸将军，以及诸将军间权利之调节与帝国税务收支系统问题。而西方人在政治上之"牵制与均衡"观念，即由此而来。罗马帝政时代实即军人专政。西洋所谓皇帝（Emperor），原是罗马出征将军（Imperator）之号。"帝王意志是法律源泉"，其所谓法，主要是皇帝之敕令（Constitutiones）和法律学者的法律纲要（Institutiones）——此为今日宪法、制度二字之所从来。罗马"将军政府"及其法律，实在比秦还坏，亦终不免于灭亡。此后在法朗克时代，一时只有日耳曼法与教会法、封建法。及罗马法复兴，王政成立，有"王权神授说"，国王只对上帝负责。然始而教会、贵族合作，要求特权。继而都市发达，中产阶级成长，要求平权。经荷兰、英国革命，美法革命，逐渐成立代议政府与分权的宪政。

中国过去历史发展的情形不同。在政治上，人民因同文而同质，无自由民与奴隶之别。此容易以家庭观念看社会。故有同胞观念，而缺公民观念。

在经济上，中国为一可以农业自给之地区，自古人民以小农之自耕农为主体。凡人应有其产，亦不成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财产问题不如罗马之重要。历史上，尤其是汉人所谓“让财”，在罗马是不可想像的。又中国国土之扩张，是靠农业拓殖而扩大，而不是借征服殖民地而扩大的。武力征服在中国历史上素不占重要地位。除乱世以外，军人干政之局是很少的。蒙恬将军数十万在外，假造秦始皇一个命令，即可使其自杀。这在罗马史上，乃不可想像之事。

中国统一帝国之产生，一方面是周代封建制度瓦解而产生，一方面是由诸侯之国集合而产生的。换言之，即由中国封建社会自动演进的。故由封建到统一以后，贵族与平民问题变为皇帝与平民问题。

如前所述，礼起于宗教。随国家之组织化，宗教早不甚重要了。周公制礼作乐之意义，即将古代之宗教习俗，变为封建时代维系社会秩序之礼。礼的中心则为伦理关系。士以上受礼之支配，此是一种君子协定。而所谓法，实即是刑法，所以防卫政权安全与贵族利益者。狭义之法几乎专指军法，〔注一四六〕与西洋之法，意义不同。但希腊人之“奥林皮克”，未尝不是他们的礼乐，而希腊人之刑法，也是极为严酷的（如 Dracon 之法犯罪皆处死，僭主滥用死刑）。〔注一四七〕所以说中国重礼义而不重法，或说中国人无法的观念，用刑特酷，皆未得事实之真相。不过由于生活方式之不同，希腊罗马人重视财产与奴隶，我们更注意伦理与安全。所以罗马帝国历史，是公民权随版图扩大而扩大之历史；中华帝国——首先秦汉帝国之形成，是礼之普及、分化与变质之历史。

成周以降，凡近世所谓政治法律制度者，原来皆在“礼”之范围之内。在此封建社会，礼乐是政教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但随封建制度之分解，国家扩大以后，在孔子时代，礼的威权已经动摇，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之类。孔子非常愤慨。其时晋郑有新“刑书”之作，孔子不以为然。他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赞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他有意继周公制礼作乐，适应新的时代。他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是想扩大礼乐精神，建立一新的政治制度。此精神即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即以同胞之义待人也。他主张仁、义、直、和、忠恕，为礼之本。不过“文之以礼乐”，“约之以礼”。以后孟子荀子皆主张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实皆为孔子本义。要而言之，即欲以君子之道待万民也。他没有写成文件，只提出许多原

则。如前第四章可见，战国时代儒家，都根据这精神谈礼。原以礼乐为职业的儒家，进而研究各种人文知识，成为一大学派，特别发挥礼之原则。他们所谓礼，可包括国家宪法，社会秩序，日常礼俗，若与乐联合起来，还包括文艺美术，风俗道德在内。这是广义之礼。即不然，他们希望能对政府、社会、家庭各方面定下若干规则。这是中义之礼。至天子的郊祀庙祀之礼，君臣朝见之仪，以及民间婚丧之制，实仅狭义之礼。今日“三礼”内容，即是这无所不包之礼。当时儒家对礼并无一确切定义，系统条文，但希望扩大礼的意义，重建国家社会制度，是相同的。《礼记》托孔子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祭天)社(祭地)之礼，禘(天子祭远祖于太庙而以其祖配之)尝(秋祭)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不过“礼尊其义也。失其义，祝史之事也”(《郊特牲》)。“其义”是什么呢？“揖让而治者，礼乐也”。又，“礼乐管乎人情”(《礼记》)。“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史记》乐书)。以人情为本，教化为本，养人为本，以明堂议政，学校教人以为治(《汉书》礼乐志)。这是要将士礼扩大，王制——先王之制普及。但这并非说先王未行者便不得行。“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而“仁者，义之本也”(《礼记》)。此为正统礼治论，而此礼治制度之根据，毕竟是仁义。此即所谓王道。其次，荀子一派，则主张“尊先祖而隆君师”，而定“度量分界”，“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天子拱己而正”(《礼论》，《王霸》)。此与《周礼》所言相近，实礼法并行，王霸杂用之始。此外，墨家主张尊天明鬼而人民平等，法家主张尊君明法，人民平等，而不要天鬼与礼乐。道家则主张法自然，天子少管事。自古以来，我国虽有人主张君臣有尊卑者，但没有主张人民有尊卑者。然君臣之尊卑，在儒家看亦受礼之节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唯墨法二家稍不同而已。中国人其所以对权利及法之观念淡薄者，实因此问题原不甚严重之故。较之西方，我们个人主义传统实在更强。所以在古人看，只要不是暴乱之君，政治也是社会中人人相与之道的问题。这见解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自古中国一向是并没有大的不平等，不自由，而人民也能自治的。

战国之末，大一统之局业已在望。大家寻求统一国家的政治原理。当儒家如孟荀两派的人鼓吹礼乐政治的时候，吕不韦在鼓吹道德政治，即自然

政治（即黄老政治），韩非则将荀子之礼变为法，力主法术政治，即以皇帝权力为基础的专制政治。秦人素行法术政治。始皇胸有成竹，不喜知识分子多嘴。统一天下后，以吏为师，传习法令。吏即后世之师爷。法即帝王之法令。又悉纳六国礼仪，采其尊君抑臣者（《史记》礼书）。发挥法（刑）治，扩张帝权。这总算有一规模。然而实际是以小人待万民也。黄老派和儒家都起来反对。人民群起革命。

秦法既不可行，汉兴，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刘邦左右无人，结果还是请了一个秦朝的滑头博士叔孙通来定制度，而"大抵皆袭秦故"（《礼书》）。当叔孙通为汉制礼时，拉鲁国儒生合作。鲁二生曰，"礼乐必百年而后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这表示儒家对叔孙通之无原则之不满。但汉初制度毕竟草草因袭秦朝，只是加以修正罢了。汉初仍用法吏行政。好在政府大体"无为"，没有大的问题。

但秦法尚在。诸侯无道，匈奴威胁，非"无为"可了。故儒生不断呼吁改制，亦即变法。即不仅变秦朝之法，还要有所建设，即是制礼。汉廷先则反对，继而又找一些方士参加制礼，而儒家本身，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儒者多以古典为言。然当时礼书并不完全（实际上即古代典籍无适应大帝国者）。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徐生善为容（容乃仪而非礼）。仪礼为士礼（汉世但称礼，东晋以后始渐称仪礼），即关乎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但此亦不能适用大国天子制度。《礼记》乃七十子后学所记，不认为最高权威。大家还记得明堂，而后得古文逸礼，其中亦有关明堂者。但儒家对这些古文，意见不一致。武宣之时，研究仪礼之后苍曾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然如何"推"法，没有具体办法。明堂和推致之说，都有民主意义。前者是议而后治，后者视天子亦士耳。大概汉廷不感兴趣，终无所成。只是因董仲舒主张，略仿诸侯贡士之说，定孝廉学校之制而止。后来《周官》（即周礼）出世，虽然言六官及五礼（吉、凶、军、宾、嘉）只是官制，且不完全（缺冬官），得到许多人重视，尊为礼经者，即因其愈于"推致"之说也（《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但是，当时博士不信任。而如下所述，即真正实行，也无甚价值。由于汉儒只想根据古典制礼，这运动自贾谊起到蔡邕止，一直没有成功。班固说，"六艺之义同归，礼乐之用为急"。但他不能不说："大汉继周，未能立礼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增叹也"（《汉书》礼乐志）。如果礼乐政治是正统儒家之目标，班固的话，表示汉代虽号尊

崇儒术,并未实现正统之儒之理想。而这亦由此一事实而来:即原始的礼乐政治,只能行之于封建时代(如周),或都市国家(如希腊)。到了皇政帝国,只有三条路:一是以皇帝的意志为治。秦始皇如此,《罗马法》说“帝王之意志是法律之渊源”,亦是如此。这是与中国传统不相容的。二是以神意为治,回教之卡利发政治(Caliphate),中世欧洲之教父政治(Papacy)如此;而墨子,汉代方士及谶纬家,亦颇有此倾向。然而这是与当时中国一般文化水准不相容的。三是以民意为治。充礼乐政治精神,只有前进到民主宪政。汉初之儒并非无此倾向。但这没有多少先例可循,当时许多条件也不够,尤其是皇帝不赞成,没有走通。结果,是汉式政治。

汉式政治是前三种政治的一种折衷。诚然,我们没有宪法,尤其缺乏一张人权清单(Bill of Rights)。但皇帝意志亦非法律渊源。我们法令制度之渊源是什么呢?在原则上,汉代儒家是承认在民意的。不过说得较为委曲。儒家相信,民意之表示在天心。天心是仁爱的。然天不言。基督教相信“上帝种植于人心的神圣大法”,由教典教主教会提出之。我们则以为行天心者,是先王之制。宣天心者,是圣贤之言。因此,六经,尤其是礼,便是法制根据。班固说,“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儒林传)。例如,禹拜昌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等,都是言论自由之原则。以后儒家又将天意与经义结合起来,即所谓“洪范五行传”(即《汉书》五行志)。汉人有“天宪”之说。第五伦说,人君不可违天心,失经义。能不违失,可以“继”下去;否则可“革”可“禅”。(后来王船山云,可禅可继可革,唯不可使异类间之。)此种间接民意观,可说是汉人对于政治的基本观念。因此,汉人虽然没有一部宪法条文,孔孟以来,已有一宪法的序文和原则了。

但是,毕竟因为没有具体的条文,又因为秦汉之变革太大,许多新的情势是经义中找不出根据,无“成法”可循的。这就不能阻止皇帝行使立法权,而皇帝之“法”,自然只是为他的便利的。因此,汉代政治终止于礼法并行政治,亦即儒生法吏并行政治。不过由于礼乐之鼓吹,《周礼》之研究,虽然礼乐的政治终未成功,然而汉儒做到了几件事情:(一)遏止了秦式刑法政治;(二)建立了汉代平民参政政治,相对的限制了皇权,亦即维护了民权;(三)秦代以来杂祀并兴,汉初方士参加制礼,益使人神杂糅;自西汉之末至东汉大为整饬,使祭祀合理化;(四)不断批评秦法,使刑法人道化;(五)儒家伦理

观念普及。此结果有二:(六)郑玄等以礼并法,自此有“礼法”之称,并开后来制度之学(唐人仿周礼定六典,至明清六部犹仿周官);自庄子至两汉,春秋为经世之书,此后礼学成了经世之学大宗了(如曾国藩所云);(七)随家族制度之巩固,士礼复兴,至六朝大盛。

而由于新的礼乐政治——即礼之普及运动之未成功,旧时礼乐本身,亦分化而变质。于是在周汉之际无所不包之礼,逐渐分化为皇朝之礼仪(月令及皇家婚丧),郊社宗庙之祭祀,如《后汉书》礼仪志、祭祀志所记者是;此外则人民及士大夫间自己通行之礼俗(如婚丧、祀祖、过节、以至财产关系),折衷于儒家之伦理观念,转而影响到法典内容(如唐律);而如上所言,周礼之学渐成经制之学或行政法之学,此又与经学史学结合为政治经济之学了。〔注一四八〕乐,原为礼之附属。然民间另有其礼乐。到了汉代,礼乐也不一定相连,终于乐为艺术之一种。至原来附于礼的宗教成份,一部分合流于祭祀,一部分到汉末,单独以宗教的姿态——附于道教而出现了(详下)。所以,儒家所鼓吹的礼乐,只成为一种追怀和想像而已。

自汉以来,一般人常以“礼乐刑政”,“礼乐兵农”为言。但“周礼”既已过去,是后即没有一个基于礼乐的制度之方案,而只有汉式的政治;以致黄梨洲有“三代以下无法”之叹。事实上,如我们不能回到古老的政教合一,则只有在一个基于文化复兴的民主宪政确立之后,才能实现古人所憧憬而不曾具体化,更不曾实现的礼乐政治: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富于公共精神,及艺术趣味的社会和政治。

有此了解,即可进而论述在大一统后秦汉的政治制度,乃至于学术思想。

## 郡县

秦汉以来,我们在政治上有两大空前变革。一是在垂直方面,撤除中间层次,变为人民和皇帝(皇室)的二层关系。二是在水平方面,诸国林立变为大国一统。二者是一同时运动。先说后者。

废封建为郡县,即统一的王国。秦汉并以前诸王国,且除郡县外,尚有属国。属国有附于郡县者,有半独立者(如乌桓西羌西域)。故秦汉又实为帝国。

如前所述，郡县制在春秋时代即由晋国开始。以后秦楚二国都力行中央集权之制，以至直统郡县。甚至燕国，乐毅破齐后，将齐国七十余城，均变为郡县。秦始皇不过将这一制度普遍完成而已。其初县大于郡，后来郡大于县，先分三十六郡，后共四十郡。西周一百多国，至此成为一国，在一个皇帝之下。直到四十多年以前〔此书成于一九五四年〕，我国大体维持这一制度。

但始皇行之过激，“封建思想”还在人心。刘项起事，一时皆复封建。刘邦原不过一联军领袖。即位之初，封七个异姓王，一百多功臣为列侯。侯国虽不过一县，王国大者百余城，七王国占了天下大半。其后刘邦解决异姓之王，大封同姓之王。同姓王尾大不掉。到景帝削除七国之乱、将藩国权力收回中央，命其“不得治国”。武帝初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事后（前一二二年），胶东王亦反。皆失败自杀。削爵者百六人。武帝进一步以左官、附益、酎金等律削王侯之权。封建势力遂告解决。〔注一四九〕此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与富室无异。贾谊晁错主张，至是实现。当然剩余皇族仍为国家一大寄生集团。但因为无权，逐渐没落，至汉末，王侯后裔，大抵均成平民。

武帝时，汉初功臣宿将都死完了。此后汉朝百官公卿之外，仅有景武以来的新功臣，外戚恩泽，和前代之封（如殷周孔子之后）。然除霍光一度有封邑外，大抵有禄无权，甚至仅有虚封。侯国之称，实附郡县。盖封建已仅留虚名矣。

自汉初颇将秦郡分割，至武帝开边，或恢复秦地，或收入边地，乃改内史（秦首都）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称为三辅。与三河（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同辖司隶。武帝元封五年，即前一〇六年，建十三部，置刺史，凡郡国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治蛮夷者曰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后汉并朔方州于并，而别以司隶所属为一州，仍十三州之数。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百八十。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里。后汉领土，大体相同。〔注一五〇〕

这些地名，读者会时常遇到，各志今地如下（据两《汉书》地理志，及潘抑强《中国历史韵编》，金兆丰《中国通史》）：

司隶　州治：前汉长安后汉洛阳。辖区：山西西南，河南西北，陕西中部。

凉州(旧雍州) 州治:甘肃秦安。辖区:甘肃大部,宁夏一部。

并州 州治:山西阳曲。辖区:绥远南半,山西大部,陕西北部。

幽州 州治:河北蓟县。辖区:察哈尔南部,冀辽朝鲜大部。

冀州 州治:河北鄗县。辖区:河北南部,河南北角一部之地。

青州 州治:山东临淄。辖区:山东东北及胶州半岛。

兖州 州治:山东金乡。辖区:河南东北角,山东西南。

扬州 州治:安徽和县。辖区:苏皖南部,及浙赣闽三省。

徐州 州治:山东郯城。辖区:苏中北,皖西北,鲁东南。

豫州 州治:安徽亳县。辖区:山东南角,安徽西北,豫东。

荆州 州治:先常德后江陵。辖区:两广北,豫西南,及两湖。

益州(旧梁州) 州治:四川广汉。辖区:陕南鄂北,川滇黔。

交州 州治:广西苍梧。辖区:两广中南及越南大部。

此外尚有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所辖地区。

皇甫谧云:战国之末,“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及秦,杀伤居三分之二。陈项又肆其余烈。刘邦定天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文景休息六十年,民众大增”(《帝王世纪》)。又云,“平帝时,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汉人口之极盛也。后因莽篡,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百姓虚耗十有二存。”据应劭,后汉顺帝时,“户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汉官仪》)。经黄巾董卓三国之乱,曹丕时“万有一存。”蒋济云,“今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郡。”刘禅、孙皓降魏晋皆不过百万余人。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三百七十余万,于汉末不过到五分之一。此亦可知盛衰矣。(略据《帝王世纪》,两《汉书》地理志。)

## 齐民

世卿瓦解,附庸解放,大家加入原来的庶人工商,使中国在战国时代已进入一平民社会。秦国父兄为天子,子弟为匹夫。汉初一度保留王侯,并有任子(即得世袭)之制,均逐渐淘汰。所以汉代大体上是一平民社会。在春秋时代有阶级意义之士农工商,秦汉以来,成为平等之四民了。而其自秦以来,即有户籍之制(所谓名数,占著)。故史汉称其时社会为“编户齐民”。诚

然，对商人有限制。如羽林期门，“医、商、百工不得与”(《汉书》地理志，如淳注)。但此由奖励六郡子弟体格，并与入赀为郎同为奖励中产之家之意；后亦有名无实。四民除有罪外，一般而言，虽有贫富，决无贵贱。倒是对于嫡庶观念甚为重视。此为宗法习惯之遗留。

当时农村都市状况，实与今日僻远农村镇市状况相差不远。普通农民大率一家数口，聚族而居，各耕其田。此由上节李悝之言，及刘邦所谓“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可见一斑。〔注一五一〕都市中有住宅区及交易之区，交易之区曰市。如长安有九市，洛阳有二十四街。市多有城(《后汉书》班彪传注，《三国志》陆逊传)。

如前所述，中国原是一自由民国家，奴隶是不规则现象，只是到了西周和春秋之初，比较多一点。战国时代逐渐自动解放。可是秦汉统一以后，常有奴隶记载。应劭《风俗通义》云：“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意林》引)。这是不错的。秦统一六国后，俘虏罪人增多，都成了奴隶。秦始皇筑骊山陵阿房宫，用六国刑徒七十万人。这是政治性奴隶。汉代革命等于否定这制度。但战乱后大饥，民有卖子者，高祖下令承认。此贾捐之所谓“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者。此所谓经济性奴隶。然不过一时现象。其后高祖下诏免奴婢为庶人，足见中国素不认此为当然。此与罗马万民法犹肯定奴隶制度，绝不相同。不过既有奴隶之存在，即有利用奴隶致富者。先是奴隶为王侯高官所有(张良家有僮仆三百人，张安世家僮七百，王商私奴千数)，其后富人亦蓄奴(如卓王孙僮客八百人，刁间用奴致富，糜竺之祖货殖，僮客万人)。这是私人奴隶。汉武帝为了筹款，没收奴隶，得奴婢以万计，于是汉代的国营事业，即以奴婢充之。这是政府奴隶。但公私奴婢生活与其他国家奴隶不同。如见有奴婢二字即认为奴隶制度，则为大误。除蜀卓氏，程郑氏，皆以迁虏致大富外，贾谊言，“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是古天子后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贡禹言，“诸官奴婢十余万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百巨万。”自然亦有虐待奴婢之事，如王褒《僮约》所云。此盖由当时边地，如燕巴蜀羌有蓄奴旧俗，因其故俗而恶遇之。大抵秦人对被征服者有奴视之心，而汉人对凡自无生活根据，如工人、如佃农等，皆谓之奴。两汉家奴，称为家僮，或僮客奴客。战国时有食客。两汉之末，大乱之后，平民有依附豪族求存而为其工作者，称为宾客或门生，亦家僮性质。西汉及东汉末，又有部曲之名，乃平时之宾客，战时部勒之者。其来源殆与欧洲之武

士近似。凡此奴婢之类，其生活固有较平民为佳，且有仗势欺人者。〔注一五二〕故汉代所谓奴婢者，仍有宾客性质。汉代之主奴，实即主客。直至今日，佃户称为佃客。奴而称客，其非希腊罗马之奴隶，欧洲中古或俄国之农奴，美国南北战争之黑奴可知。到了光武，数下放奴之诏。建武七年下诏，民遭饥乱为奴者，去留悉听；敢拘制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下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杀奴不得减罪"云。安帝永初四年，诏人官为奴者免为庶人。此吾族之美德，固在林肯放奴（一八六三）之前一千八百年也。

汉代也有所谓豪强。一部分为六国以来旧族大姓。此外在农村中宗族盛者自易称强；都市中游侠之徒，亦有称为豪强者。要非特殊势力。其后则有汉初侯王功臣之族，二千石之家而久宦者，变为大地主与富商。但他们同为政府摧抑的对象，并非特殊阶级。

所以秦汉时代，在皇帝之下，至少在理论上法律上是无所谓不平等的。这种情形，到东汉后期才一变。

当然，齐民与皇帝之间，还有百官公卿。有政权的公卿与无政权的平民，即官吏与百姓，决不是真平等的。但这不是法律的，也不是经济的。公卿很容易丧失权力。最初公卿专属于皇帝集团，后来人民也可以成为公卿。公卿的权力，不是固定的。不过这种情形，到东汉末年也一变。

据《三国志》，刘禅降时，送"士民簿，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此可概见两汉社会之分化。易言之，王室与将士、官吏，构成统治阶级，其他皆齐民之列。孔子以来，在正常状态下，谓吾汉族无喀斯特（Caste）克拉斯（Class）之制可也。

现在要说到人民自由之程度。战国时代，人民倒无所谓不自由。到了秦代，则有平等而无自由。除传统信仰自由无问题外，政治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大受威胁。后来营业亦不自由。而秦时既有户籍，又常大规模迁移人口。居住迁移自由也受威胁。及大事征发，生命财产都无保障了。但时间不久，即被推翻。汉初人身、言论、营业自由恢复，迁移初干禁令，后来只要"占著"（申报）亦不禁。以后人民还争得参政之权。不过，在对匈战争后，刑罚太重，负担太重。自是以来，人民权利常大受侵害。然在中国传统观点看，这不是人民权利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暴虐无道问题。而暴虐无道，不是违背了某一条法律，而是根本不应该的。在哀平、王莽、桓灵之时，也都覆亡。由于中国根本不承认人应受歧视，所以也笼统的将自由不

自由问题看作一个正常与反常，治和乱的问题。

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还不在有一个奢侈或暴虐的皇帝。一人之奢侈暴虐，总归是有限的。可怕的是贪暴成为一个阶级或集团。秦汉以来，中国既为齐民社会，统治者并非一个阶级。所以在中国治的时代总还比乱的时代多。

但政权毕竟是一部可以制造贵族的机器。即在民主政治之下，除非人民都能运用民主功能，亦难免产生特权阶级。秦汉以来，既有一个不动之威的帝权，除了所谓谏诤之外，也不能有今日所谓“反对党”的力量，加之还有外戚宦官这些天然腐败力量发生作用，而保持专制政权新陈代谢的选举制度也不免为少数人所把持；如是，逐渐发生贪吏苛吏(《汉书》鲍宣传)。到了东汉末年，则有一种“权豪之家多尚奢丽”(《后汉书》羊续传)。此种权豪，非西汉初之豪强可比了。此种权豪，又即东汉末年所谓“势家”。此种势家并非封建时代之贵族。后者是出身于武士首领，前者乃出身于专制时代之官僚。他们出身不一定“贵”，他们作兴比齐民更贱。因此，能无所不为。然积之以时日，他们不仅成为一个系统，而且成为一种“世家”——官僚世家。势家成为世家后，东汉末年已有所谓“势家”、“单门”之别了(《后汉书》赵壹传)。这便是造成汉代大乱的阀阅，且亦即流毒六朝之世族。然而，这大乱之病灶，又实在帝权。

## 帝权

在封建社会诸侯国家，君王是特殊的。在齐民社会郡县国家，皇帝更特殊了，其最亲近之集团亦特殊了。春秋战国以前，有层层贵族，人民地位虽在最低，但王不过是最高贵族。在贵族系列中，王还不能为所欲为。自有皇帝之称，就不同了。牺牲了封建贵族权力之后，平民地位略增，仍不及皇帝收益之大。

中国未尝承认主权在皇帝——“朕即国家”；亦未尝承认皇帝可以独裁。自古我们认为天子应南面无为，并有争臣七人(《论语》,《孝经》)。自六国至秦，博士掌通古今，近乎立法。丞相助天子理万机，实行政首长。此外廷尉须“循三尺法”,“质诸朝廷，与众共之”,不能徇天子之意；“廷，平也”(《汉书》百官表，杜周传)。非无三权分立之意。但用人行政之权在皇帝手上，结果

立法、司法之权也集中于皇帝。权力集中，不受节制，便易于腐败。问题不在皇帝善恶，而在皇权无控制之具。而始皇始开滥用皇权恶例，前面已说得甚多了。

现在必须说到秦汉初行帝制，在一般人心目中，在皇帝们本身，皇帝至高无上的观念，并未确立起来。皇权之大，是积渐所致。秦汉皇帝之权虽大，犹较后世为轻。以始皇之暴，杀嫪毐后，茅焦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始皇起，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教。"爵之上卿。（《通鉴》）

刘向《说苑》云：

"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始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无以应云。遂罢谋，无禅意也。"

刘邦称帝之先，对诸将说："吾不敢当帝位。"称帝之后下诏说："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天下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

在汉文帝之时，有请建太子者，文帝说：

"今不选举（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汉》文帝纪）。

武帝对内完成统一，对外征伐以后，帝权始大张。然以汉武帝之跋扈，晚年亦说：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通鉴》）

自有天人相与之说，两汉诏书，皆多惧词（赵翼《廿二史劄记》）。如和帝

诏云：

“朕以眇末，奉承鸿烈，水旱违度，而未护忠言，用思孔疚。官不得于上，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覆案不急，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其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朕将悉听焉。”

所以然者，便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无阶级之制，知识分子素来主张人格平等。没有任何一群人有特权，故亦无任何一人有特权。所以皇帝也还是一夫。第二，自古以来，即有民为邦本之论，无为而治之论，民贵君轻之论，暴君可诛之论。第三，即夏禹定传子之制，由于让国逃国的传说和禅让的理论，并没有人认为家天下是当然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得人心者昌，有德者居之；为战国以来之公论。又自《易经》有革命之说，秦汉之际，有两种学说：一是邹衍五德说，证明天下无不散之王朝。假如革命二字照其原始意义用，邹衍之说，确是一“革命学说”。二是自孔孟提倡周道，文王周公成为理想的天子与丞相。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发挥天意即在民心，王道本乎人情，灾异即天之警告的学说。因此奉劝帝王，只有照三代模范，尤其是向做了八百年皇帝的周家“学习”，以得天佑，多保持几天天下。而王道之条目，都在圣人书中，前代史中。如若违抗，一意孤行，则天怒人怨，秦朝便是现实例子。秦汉革命，只证明“王侯无种”，证明儒家所说，确是真理。因此，汉代帝王，在其本心，都算谨慎，至少没有一个人敢于公然否认这一套原理的。秦始皇称人民为黔首。汉代自始至终，称为“元元”。元者，始也，大也。这是一大观念的变化。

这不是少数人的思想，可说是汉代的思潮。汉人常说“天生民而树之君”，而君所以养民，不能伤民。汉人决不认为皇帝可以无条件做下去。盖宽饶说，苟无其德，不居其位。谷永对成帝说：

“王天下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王者为民也，不私一姓。躬行道德，博爱仁恕，税不过常法，百姓寿考，则符瑞并至。失道妄行，诛逐仁贤，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上天震怒，终不改悟，更命有德。奏上，天子甚感其言。”

皇帝更不可不规矩。陈蕃云：

“人君者，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乱及八方，况髡无罪，杀无辜乎？”

皇帝断乎不可以独裁。国家大事，多经公卿“集议”（两汉《会要》）。陈

忠云：

“三公称曰冢宰，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

我们虽无积极保护民权之条文，却有消极限制君权官权之条文。我们有许多关于君的戒律。大体言之，便是根据六经旧典，纳谏用贤，省刑薄税等项。除以上所引，汉四史中关于此类言论，几不可胜数。〔注一五三〕这也可说是不成文宪法。如若公然犯“宪”，无改悔希望，即当去位退位。王莽能以巧取，曹丕能以豪夺得位，也就是由这些背景产生的。虽然他们非其人，然帝王之妄自尊大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国是从无理论根据的。

然则后世皇帝神乎其神之势是如何来的呢？就制度言，我们忽于制衡之理（罗马人知之），后尚将提及。就事势言，常因对外兴大兵，对内作流血斗争（大狱、政变、革命）而起。此在前面多可看出。而就人言，则始皇作俑后，首先是宦官赵高弄出来，而无聊知识分子如李斯者加以附和而造成的。王符说：

“赵高对二世曰：屡见群臣众议政事，则黩黩以示短，不若藏己独断，神且尊严。二世乃深自幽隐，独进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出倚诏令以自尊，天下鱼烂。”（《潜夫论》）

但一个二世，一个赵高，一个李斯，还不能扩张帝权。秦汉之制，丞相入朝，天子为起立；丞相道谒，天子为下车。三公坐而论道。刘邦为帝后，樊哙能排闼直入。周昌说他是“桀纣”，他不过笑笑。贾谊召对，文帝为之前席。汲黯面责汉武“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至于光武，严光能将脚放在他肚皮之上。即两晋南朝之昏乱，此风犹未尽替；如刘毅斥晋武帝不如桓灵，王导与元帝共坐，慧远提倡“沙门不敬王者”。帝权是经多数的二世赵高李斯逐渐累积而扩张的。东汉帝权大于西汉，两汉以后，大于两汉。至于宋元明，大臣对于天子由立而跪。到了清朝，仅“奴才”之称，也就够了。

两汉帝政，是秦朝先例与时代思潮之折衷。由于前者，皇权至大，可以组织政府颁布法律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决定政策，当然还可以个人作威作福；但由于知识分子提出一套天意之可畏，古圣先王之道必法，结果，帝王有绝大顾忌，而国家也有一个人民可参加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所以帝权不是无限的。

所可惜者，汉人毕竟没有想出一个天意代表者的民意，在制度上控制帝

权的规则，终不能阻止帝权之扩大，恶化，与腐败而已。

## 百官

秦之制度颇多沿自六国者，官制亦然。〔注一五四〕两汉制度多沿秦制，官制亦然；唯稍有损益。至于王莽颇改名称。东汉继之，稍加简化。秦制：天子之下，中央政府是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二人），太尉，御史大夫（二人）。丞相管民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内管图书，外监州郡，并受公卿奏事举劾。三公之下辖九卿，分司庶政，有奉常（掌宗庙之礼），郎中令（管宫中门户），卫尉（管宫门卫守），太仆（管舆马），廷尉（管刑法），典客（管外属国及蛮夷），宗正（管亲属），治粟内史（掌钱谷），少府（掌山海之税，考工、尚书亦属之）；此可见帝国政府由诸侯政府放大之痕迹，而宫中府中，实不分明，亦由于此。此外有中尉管首都巡行部队；博士属奉常；将军是临时出征之任。地方官，除中央派遣之御史外，负责者为郡守与郡尉，分司民政与军事；县有县令县长（万户以下称长）。郡守地位，略同九卿。县以下有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掌教化、讼税和治安。乡下有亭（十五里一亭），亭长管治安（刘邦原为亭长）。此外市有市长（太史公之先曾为市长）。这自是皇帝与中央集权的制度。不过中央军民分治，监察独立，略有分权之意。郡守之权甚重，尚有均权之意。而乡三老地位颇尊，乡长以上是民选，尚有地方自治之意。

两汉大抵承此制度，名称常有变更。如丞相改为相国，大司徒；太尉名大司马；御史名大司空；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廷尉为大理；典客名大行令，大鸿胪；治粟内史为大农令，大司农；郡守更名太守；中尉改为执金吾等。哀帝时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万人。

西汉之初，丞相皆功臣，体制甚尊，权力甚大。《后汉书》百官志注，太尉下有十三曹，或汉初丞相以下掾属。〔注一五五〕不过，因此即对三公九卿之制加以理想化，说中国不是专制政治，就不是事实。在理论上，三公九卿对皇帝负责。而皇帝只对天负责。在事实上，除汉唐盛时外，相权都不曾实行。我们只好说，知识分子用了许多脑筋，限制专制而已。最可惜的，汉人在官制上对秦制改善甚少。首先是武帝以后，随皇权扩大，三公坐而论道之意，皇帝垂拱而治之说，一天一天没有了。

其关中央者，一是尚书之官始重。尚书六国有之，在秦属少府，为皇帝

私人秘书;原不过传达侍从记注之臣。武帝始以宦者为尚书。其后霍光领尚书事,尚书之权日重。《汉书》佞幸传引萧望之云:“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到了东汉,据陈忠云,“三公有名无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仲长统说“光武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然“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这决非愤慨之词。到了蜀汉,以诸葛之大权在握,并录尚书事,犹有“宫中府中”之言。魏晋以后,尚书反成为行政机关了。其次,在西汉,三公之中,御史大夫之权犹大。至东汉,三公之权集于太尉,下设十三曹,盖以参谋长主国政。复次,秦之监御史,是否常设,犹为问题。汉初遣史分刺州,亦不常置。其官阶小于郡守。武帝时,于郡国之上设十三州,设刺史,以六条之法(对豪强贪污等)督察,此本考课之一端,然自此郡权渐轻。此外尚有绣衣直指之制,近乎特务。〔注一五六〕其后成帝时刺史改为州牧,于是郡上又添了州。此为后世三级制之雏型。〔注一五七〕光武因之,益重刺史之权,罢都尉,太守无兵权。由此发生反动。灵帝时以四方兵寇,又渐改为州牧,兵权日重,终助成汉末割据之祸。近人时以地方区域之大小,关系治乱,因主缩小省区;不知不由国家制度法令实业教育谋国家之统一,只想在划分省区上用功夫,谋控制牵制之法,只是治丝益棼,庸人自扰而已。

秦汉官制中有一点甚可注意者,即秦之郎中令,汉之光禄勋。这是秦汉文武官吏之养成所。在汉代,属官有“大夫”和“郎”,“议郎”,“郎中”,“侍郎”,多至数千人。最初也许都是武士,后用文学之臣。武帝以后,又有仆射,期门,虎贲郎,羽林骑,常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补之,父死子代。这等于一种军官学校,同时也是一种训练团式的机构。董仲舒之对策,即使平民打入这一机关。其后郡国孝廉博士弟子亦均经郎官训练,始得服务。此种延揽人才之法,可谓用心良苦。而自武帝以入财补郎,太史公已叹郎选之滥,至汉末而公然卖官,更不堪问了。

汉世中央宰相,除萧曹为后世称道外,以魏相、丙吉、第五伦、左雄为有声。此外甚少表现。非无人也,不能行其权也。而李固、陈蕃且死于非命。更坏的是人也不行。仲长统说:“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赖以治理者少,坐以危亡者众”(《群书治要》引)。地方官原亦乖滥,仲长统说:“景帝显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犹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意林》)。但两汉地方政治,颇多良吏,为后世称美,尤以边远之区为然。盖中央初事集权,地方自治之意犹存,而有志之士欲为表见,于地方,较中枢为易。又能自辟掾

属，较能引用地方善良之士。而朝廷固亦愿地方无事也。“文翁而后，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汉书》循吏传）。至于东汉，“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守交趾，移变边俗。”第五伦宋均以名吏入参朝政；此外，边凤、延笃治京兆有声；而卫飒，王景，秦彭，王涣，许荆，孟尝，刘矩，刘宠，仇览，童恢，鲁恭，吴祐，刘宽，以及汉末颍川四长（荀淑，韩韶，陈寔，钟皓）等均能兴民生之利，倡学校之化。汉世甚重乡三老。朱邑爰延郑玄皆曾为啬夫。乡三老对孝子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循吏传，各本传，南蛮，西南夷传，百官志。）此汉政最胜处也。

循吏之外，亦有酷吏。两《汉书》所载酷吏，本在制裁豪强。然亦多希承意旨杀人取宠者，如王温舒、严延年等号称“屠伯”。《后汉书》所谓酷吏，则与前汉大为不同，不可不知（盖东汉权豪与西汉豪强大不相同）。如董宣黄昌，乃能不畏强御，持身廉洁，酷于强而不酷于弱者。光武姊阳湖公主苍头杀人，董宣为洛阳令，亲数主之过失，格杀凶手。主诉光武，召见，宣抗言曰：“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光武欲其叩头，宣两手撑地，终不肯伏。公主挑拨，光武终释且奖之，因号“卧虎”。死时大麦数斛，破车一乘而已。党人张俭，亦名列酷吏。此后世包龙图海瑞所从法也。唯究非治世之征而已。而梁冀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也都趋于恶滥了。

汉代政治之恶化以及其崩溃，与官吏待遇关系至大。秦爵有二十级，汉仍之，后可买；此尚非至重要者。百官薪俸：三公大将军号称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九卿郡守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以下为比二千石百二十斛。使匈奴及乌桓西羌校尉皆比二千石。直降至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止。东汉凡诸俸受，半钱半谷（光武时例）。除三公外，最高额为中二千石月钱九千，米七十二斛。而下吏之俸，不足农夫五口之人。仲长统云：

> “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入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汉书》本传）

其结果便是贪污。仲长统又说：“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供养，安得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又如左雄所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贪污成风之后，亦有以清高立名者，但这无补于大局。公教人员待遇之薄，是汉朝亡国重大原因之一。

## 兵制

秦行征兵制，令民为十五之法。十人中五人耕，五人战。董仲舒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使民不过三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谓兵役分更卒、正卒、戍卒三者。民二十三始服役，曰更卒；给事郡县一月而更(高不满六尺二寸为罢癃)。继为正卒，为卫士，材官(步兵)，骑士(车骑)，或近水处有楼船(水师)，一年；复戍边一年。有事须受征调。年五十六乃免为庶民归田。汉初因之。每年八月，太守都尉令长召集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这是国民兵。中央常备军称卫士，有二：南军属卫尉，守皇宫；北军属中尉及执金吾，卫戍首都(李广程不识皆卫尉)；共约五万人，自民间之材官骑士轮调(番上)。有事则发郡国之材官骑士，以将军督师，以羽檄虎符发兵。至武帝则内增七校(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八校，胡骑不常置，故云七)，外扩楼船，岁时修肄讲武备；则常备兵已加扩充了。又《汉书》高帝纪注，"民廿三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昭帝纪注云："天下人皆戍边三日，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案即免役钱)。"又食货志云："后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大约先如秦制，戍边一年，其后改为卫士材官骑士各一年，戍边减为三日，且可出更赋(免役钱)以代之而已。不过往来戍边，衣食皆须自备。(按《汉书》刑法志、高帝纪、昭帝纪、吴王濞传注引应劭、服虔、如淳之说，不甚相同。以上大概言之。)

武帝时，已用募兵。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昭帝时兵常不足，益募兵，名曰"犇命"。于是更赋日重。至东汉，光武始罢郡国材官骑士，只有中央之虎贲、羽林五营及卫兵。此兵制之一大变。然皆不简练，一旦有事，常远征胡羌兵。窦固窦宪军中多胡兵。蔡文姬云："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此亦五胡乱华之由来，固有类乎罗马之亡者也。

## 税制

秦有更卒无更赋(有力役无免役钱)，国用所资，由田租、口赋、盐铁之

利。董仲舒所谓二十倍于古者。秦筑阿房前，田税似十五税一，汉初因复之。景帝以后，三十税一。遂为定制，为一大惠政。复常赐民田租。似工商之入甚多也。东汉初行什一之税，后复三十税一。大约西汉之末，田租已折为钱。此外秦有藁税（草税），汉亦仍之。三十税一，自为薄赋。但自土地兼并贪风大起以后，大抵富家豪强因此得利，而平民则常有乡官部吏之诛求（贡禹左雄均云），所以政府困穷，无以供俸禄，转滋贪污（仲长统云）。凡谷货皆大司农掌管。此外尚有工商衡虞之税，工税市税，其数初不甚大。自古山海属政府，故果木打鱼有税，唯时亦免之。西汉属于少府所管，东汉属大司农。

《汉书》刑法志云，"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者，首为口赋，即丁赋。汉初，民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二十。武帝时，因事四夷，又增三钱（三岁即须出口钱），十五至五十六则出算钱，凡百二十钱（百二十钱为一算）。缪凤林先生计，汉时米石五十钱，约今量二斗余计之，廿三钱可购今米量一斗，百二十钱可买五斗余，不为不重矣（《中国通史要略》）。其后又有更赋，已述于前。月钱二千，日钱百，县官重责更赋，为虐政之一（《汉书》鲍宣传）。

汉世军费，以盐铁为大宗，此亦由秦而来（太史公之先有为秦铁官者）。汉初，先由诸侯自取，至武帝收归国有。元帝时，罢而旋复；至东汉，复而旋罢。武帝时，大兴土木，事四夷，增算缗钱（缗为钱串，等于所得税），税商贾，税车船（又商人逃税买田能告密者为罚款，曰告缗钱），榷酒酤，开马税，设均输（公卖）及买爵赎刑之法。可谓尽聚敛之能事矣。开端以后，每难取消。至王莽尚欲假《周礼》之名，实行全面统制，终于覆亡。东汉稍事整饬，但至桓灵，又亩敛十钱，对地主不多，对贫民则横敛矣（《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文献通考》）。

西汉虽长期用兵，国力未竭，则国力甚厚之故。黄金似乎甚多。梁孝王死时黄金四十万斤。汉武帝征匈奴，一次赏黄金二十余万斤。王莽遣九虎东行时，省中黄金万六十柜，一柜万斤。此外各处各有数柜。财帛珠玉尚不在内。东汉国用常感不足；说者谓赋税较轻之故；实则由军费支出较大（非征兵），贵族拒交田租，贪污更多（如梁冀）为然。至东汉末，董卓搜刮所得，不过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大约西汉黄金先入豪富之手，后则渐入民间也。〔注一五八〕

秦汉赋税用途有别，田赋供国用，山泽市税供天子之私用。桓谭《新论》云："汉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藏都内。少府之入十三

万万，以供赏赐。”此岁出入之大概。

汉代取之于民，亦有用之于民者。除将公田赐与功臣贵族外，前后均常赐荒田于贫民，听其耕种，“勿令游手”。又常贷种食于贫民，元帝时，“资不满千钱者，贱贷种食”。又常免田赋。东汉时有惠政。如光武末，赐天下老弱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章帝时，下胎养令，产子者，勿算三岁，怀孕者，与谷三斛，其夫勿算一岁；虽非根本之法，总是应该称道的。（《两汉会要》民政食货卷）

## 刑法

秦俗本较野蛮，及商鞅为政，法尚严酷，除城旦（旦起治城）、舂（妇人舂米，皆四年）、鬼薪（拾薪给宗庙）、白粲（择米，皆三岁刑）等劳役，黥、劓、髡等肉刑，死刑大辟之外，有连坐之法，三族之诛，车裂镬烹之刑。甚至弃灰于市，也要重刑。又干涉人民生活，二男不分居倍赋，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为奴。至李斯，偶语弃市，读书有罪。“秦法繁如秋荼，网密如凝脂”（《盐铁论》）。循至全国皆罪人，而秦亦亡。是谓“作法自毙”。

所以汉高祖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得到天下的欢呼。但这不过一时之事。萧何始据秦律为《九章律》，今不传，唯“不道”、“不敬”之目尚在，则秦人之遗。此称《律经》。又叔孙通增《旁章》十八篇（后张汤等增至六十篇）。又由天子诏令增损者为“令”。后汉陈忠有“决事比”，则属判例。

《周官》定大司寇总司法之权。秦汉以廷尉、校尉，郡县长及啬夫，掌各级审判，则司法完全附于行政。州刺史以八月巡行州郡断冤狱。秋季决狱，至少在汉初已然。

监狱，周称狱，秦称囹圄，汉专称狱。狱有二种：一为地方之狱，二为诏狱，如廷尉诏狱，若卢诏狱，皆审判大臣及办国营事业者。武帝时，多至廿六所。

自春秋之末经战国至秦，用刑日酷。此我国一种不名誉事。汉初仍以要斩，烹，醢，夷三族，以对功臣，直可谓蛮性之遗留。

因知识分子呼吁，自此以降，用刑日趋文明。不过武帝时代一度恶化，至东汉末而大滥。

惠帝吕后时除挟书律及妖言三族之罪，是开明趋势之始。刑法到文帝而大为缓和。文帝以孝女缇萦上书，采张苍议，除肉刑。宫刑似亦废止。以髡钳代黥，笞刑代劓及斩趾，此外则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为庶人。于是死刑以下，可免残废。然笞刑亦常致死。西汉末流刑甚多。东汉则死刑以下，髡而徙边为重刑。

武帝时，经淮南之狱，复外事四夷，内为诛求，法苛刑酷。张汤、赵禹之徒，条定法令，禁纲浸密，计大辟四百九条。另一方面，又许用钱赎罪。酷吏乘之，上下其手。宣帝初，路温舒上书尚德缓刑，以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即宣帝亦叹狱吏"用心失人道"。人心所向，宣帝除连坐之法，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孕者未乳均减刑。元哀之时，减死刑一等。然"昭宣元成哀平六世，……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所"(《汉书》刑法志)。而"掖廷之狱，榜箠惨于炮烙"。盖狱吏残酷，已成风气。光武时，议省刑法。京师唯余诏狱一所。楚王英事后，又生酷刑之风。郭躬陈宠始以法吏为儒学，从事宽刑运动。章帝时，除酷刑五十余种。宠子忠主张除蚕室，污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减重，母子兄弟可相代等事皆施行。案自光武以降，"上下胥以苛酷为能，而拷掠之际，尤极残忍"(《文献通考》)；至此为一大转变。然至于党锢之事，又完全到一反常状态了。不过，大体而言，由儒者之倡德治，两汉刑法，渐趋宽大。西汉于定国，东汉虞经等司狱者，亦渐趋和平。汉初律学，操于法吏之手(所谓刀笔吏)，东汉则马融、郑玄、应劭诸大儒均注解法律。法学遂入儒者之手。虽动机主义，家族主义之见，颇有问题，然近人情，保贫穷，矜老弱者，均仁言利溥。东汉一大议论，为肉刑是否存废。郑玄赞成之，孔融反对之。然赞成者，不过以为外轻刑而内杀人，非主严刑也。又两汉重恩仇，儒者多事复仇，故多原谅之，而法吏则深痛恶之。复仇本为原始反抗，然流弊滋多，儒者亦渐不赞成之矣。

如上所述，中国所谓法，实指刑法。秦汉法律对民法不甚注意，大概是以尊重民间之习惯者为多，而首先由乡三老处断，亦可避免恶吏上下其手。唯东汉时曾定婚嫁之律。

## 选举与学校

封建时代用公子公孙世卿，县郡时代用官吏僚属。上述秦汉官吏，是如

何来的呢？此必谈选举与学校。此二者皆因董仲舒之鼓吹，成为汉人在政治上最大的建树，影响以后二千年之政治。但古代选举与今日选举意义不同，学校亦与今日学校性质不尽相同。必先说明此点，才能了解汉代此二者之真相。

近世民主国家，以教育启发民智，培养人才；人民组织政党，依宪法经投票直接间接选举一定之人，组织政府，任职一定期间；又定立一定文官制度，使人民愿意担任公职者，可经考试申请乃至征求方式，担任国家之官吏，并有一定人事法规，决定其进退与待遇。这学校，选举，官吏三件事有关连，但不是一回事。

但在我国古代，照儒家的说法，学校教士，选举取士是一致的。尤其在成周之世为然。此有今古文二派说法。《王制》说，有秀士、选士、进士诸目，由乡学，司徒，大乐正告于王者而后用之。《尚书大传》及何休云，诸侯于天子，三岁一贡士入大学，秀者为造士。《周礼》说，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三年，乡大夫皆考其德行道艺，献其书于王，王再拜受之；此所谓乡举里选；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也。二者以三代选举出于学校，以教官掌人事，是相同的。这些话中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也是理想。但决不足奇。这无非是政教一致时代，贵族政治时代应有之事。三代学校，贵族为主。平民进身，亦止于士。明乎此，则这些话都是很自然的。特儒家标准化之，而又扩大之耳。

自孔子讲学，教育普及。降至战国，平民崛起。此为私人讲学，诸侯求贤时期。

秦人取士之法，有征召，亦有察举，而博士似亦有弟子。其事不详。唯无学校。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即以学宦（汉人称仕宦）为唯一教育方法。秦世用人之法，大抵如此。〔注一五九〕

而汉初亦然，唯范围较广泛。汉初萧何草律，学童讽书九千字以上为吏，即以吏为师之意。是时大臣僚属，非出武力，即出法吏。（服务军中者曰武吏，文事者曰文吏。）尚有任子之制，二千石子弟为郎；任富赀之制（如张释之，司马相如）。此外用人之法，自高祖下诏求贤，文帝以后，屡诏郡国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策试；亦有上书求售者。如东方朔，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上书言世务。偶然也有荐举（如吴公荐贾谊），和特征（如武帝之征枚乘）。在功臣已尽之后，国事日繁之时，必须有一定办法了。

所以自武帝以后，则有了法定途径。此即科举。〔注一六〇〕

一为特科。此多冠以“贤良”二字。科目无定，除贤良方正，文学有道之科之外，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治河，使绝国，明习兵法，茂材异能可充博士，及明阴阳灾异，通历算本草者之类。此多由一时之需要与好尚而来。这是继汉初之法，唯举行不时，方式亦不一。

最重要的是常科。首为孝廉。此亦可谓岁举。此由董仲舒倡议，每年由地方察举，州举秀才郡举孝廉，推荐中央。秀才后以避讳改茂才。孝廉即孝子廉吏之意。分为四科：即德行高洁，学通经中，明习法令，刚毅多略。武帝时，郡国孝廉各一人。和帝时，大郡五六十万举二人，小郡二十万举一人。先为郎，后任用。其后人数日多，而举者被举者间，自亦有请托，尤以权贵把持，渐趋浮滥。至东汉，左雄始限以年龄（四十岁），并始以文字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其后黄琼又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文献通考》）。

次为学校。汉代学校一方面是与孝廉并行的一种选举制度，一方面是一种教育制度。汉代始倡学校者，并非董仲舒而为文翁。他在景帝末为蜀郡太守，选郡县小吏张叔等十余人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归来，与以高职；又修学官于成都，招弟子，为除更徭（即免役），高者补吏，次为孝弟力田（《汉书》循吏传）。案文翁亦学《春秋》，大约与董仲舒是朋友。及董仲舒倡议设学校，培养人才，经公孙弘定制，中央地方皆设学校。〔注一六一〕平民可以入学，而且可经考试参政。在中央，博士置弟子员（过去有博士，间有弟子，非定制），〔注一六二〕先为五十人，元帝时，增至千人。地方亦可推荐“如弟子”（旁听生）。每年考试一次，所谓明经射策。〔注一六三〕武帝时，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高弟补郎中。其后王莽时有甲科乙科丙科；甲科补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郡国亦仿文翁之法，广设学校。郡国文学之士颇多人才（如匡衡），于地方文化大有贡献（《汉书》儒林传、文翁传、匡衡传）。自学校大兴，汉代官吏，大抵先经学校，再经察举，为国家服务。“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文学之士，彬彬称盛焉。”（《史记》儒林传）

至东汉，光武大修太学，明帝亲自讲学，观者亿万，复为功臣外戚别立校舍，匈奴亦遣子入学。至顺帝时，太学有一千八百五十室，学生至三万人。郡国学校亦大发达（《后汉书》儒林传）。

前汉已有私人学校，至于后汉尤盛，学生数千为常事。班固《两都赋》所谓“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者是也。〔注一六四〕

当时博士弟子，明经射策，等于一种明经之科。故当时国学，所讲者是经学，尤其是十四博士的今文经学，皆以家法传授（见下节），实以公务人员之养成为主。这是汉代国学与今日学校不同的。

然就政府言，明经重要，明法亦重要。当时国学是否研究法不可知。唯以吏为师，未因学校而止，则甚显然。由文翁遣吏之分途学习法令与就学博士，左雄之分途考试诸生与文吏，可知两汉是吏学并行的。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数百人。此私人之法学。而儒者亦治法律。王涣习《尚书》，读律令。马融郑玄均注律。至三国时，魏用郑玄所注之律，设律学博士，则儒法合流矣。

当时一般传授研究者，不仅经学法学。经学亦非一派。十四博士之学，原皆起自民间；及成为国学，以师法家法号专门。而自国家学校说经，渐趋于“碎义便词”之时，民间则有古文之学，老易之学，方术之学。平帝五年（公元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至者数千人（《通考》选举考）。足见民间教授研究其他学问者，大有其人。至于东汉，官学极盛而衰，太学生虽日多，至于汉末，“多以浮华相尚”（《后汉书》儒林传）。太学成为游谈之地（仇览传）。及“党人既诛，善士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儒林传）。故东汉学者多以通儒为贵，不以经师为贵。通儒之学皆游学而得。如班彪“幼与兄嗣共游学，自远至父党扬雄之门，莫不造门”（《汉书》叙传）。而所谓通儒，固不拘于经学者。如崔瑗“从贾逵质正，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并高于文辞书法。”又自西汉之末，扬雄向长研究老易；东汉之末，马融法真提倡老子之学。其他各种方术，除医学多家传外，其他亦颇有授徒者。如樊英善风角星算七纬推步，受业者四方而至。他如范冉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又华佗游学徐土，并通数经养性之术云（俱见《后汉书》各本传）。

由此可见汉代学校，其始是文翁之地方设施，其终普及全国；其始是复兴诸侯贡士之制，其终是普及教育于民间；其始是广秦人以吏为师，以博士为师，其终是提高全国公务人员之教育程度；其始是由国家效孔子私人讲学，其终是知识分子效国家而为私人讲学；其始是国家承认民间之儒学，其终是民间另有其新学古文（老易、方术）；其始是人才辈出，学校巩固了汉代

的政权；其结果是变为浮华，由此变为游谈，变为党锢中人，成为汉室之反对者。又由此变为忿争言告的无耻之徒，成为汉代政府的腐烂者。

武帝以后，除贤良文学外，贡举学校，为人才教育登用之途，对于政治之平民化有绝大功劳。然而，因此以为两汉政府为士人政府、文治政府，则又言过其实。说到选举，西汉也多流弊，至东汉，选举之权由三府移于尚书。因孝廉人数日多，请托徇私之弊，自爱者不屑参加。既得利益阶级，又把持选举，即王符所谓“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仲长统所谓“选士而论族姓阀阅”者。选政不公不实，为汉代在位者多非其人，而政治日趋腐败之故。顺帝末，朱穆即云：“以韩（安国）翟（方进）之操，为汉名宰，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桓帝时，陈蕃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汉末公卿大夫已为一辈权富、势家所把持。魏晋之九品中正，则是将汉代选举流弊状态合法化的。

说到学校，成帝时，博士由丞相御史及二千石的卿大夫决定。而皇帝讲经，亦决不可为训。利禄之势既成，结果除谶纬流于迂怪之外，不是“章句小儒”，就是“浮华之士”了。

更重要的，孝廉也好，博士弟子也好，总要先经过一番“训练”，才能见用。至于东汉之末，宦官以子弟为吏，察举孝廉，而且还设鸿都门学，更是亵渎斯文了。所贵乎读书人者，讲学问，讲道义，未有书生而论族阀，未有书生而阿附宦官者。到了书香门第，到了鸿都才子，即书生的变质，即是书生的腐败。有了腐败，必有矫激。于是汉代政权和文化，即都不能维持了。然而，汉终能维持四百年之天下者，仍选举与学校之功也。

## 论两汉政治制度

由上可见两汉制度是对秦为因革损益的。因之最大者，是统一帝权；革之最大者，是对人民观念。损之较多者是刑罚，益之最大者是文教。此是儒家功劳最大处。现在且对汉代政治制度得失作一概括的批评。以人民权利义务而论，其先人民负担很轻，后来人民纳税当兵服劳役的义务是很重的。此自由匈奴问题而来。至人民的权利，虽说没有成文的规定，但不是没有一定公认原则的。首先，人民是平等的。其次，自古以来，信仰自由，在中国从无问题。最重要的言论自由，早为一种神圣原则。秦朝取消了这权利，所以

必亡。在汉代，这权利总算大为恢复。舆论威权，日益提高，而因儒家提倡，帝王不能逾制，刑不可酷，税不可重，人民生命财产不可侵害，也可说是天经地义。我们从来是确认人民平等自由博爱之原则的。较之同时代罗马帝国，我们实在更文明更进步。

但终于“王纲解纽”生灵涂炭者，其故安在呢？这当然不能以宿命论解释。这与罗马帝国覆亡原因，亦大有不同。罗马是因黩武的帝国主义而亡国的，汉代则是因戚宦官僚之腐败而亡国的。这也不是如日本内藤虎次郎所说“文化中毒”，文化是无毒的。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戚宦。实在汉朝制度本身，也有很多毛病。

汉制流弊最大者：第一，中央过于集权。以中国之大，在一齐民社会与郡县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定与秩序。但此不可以中央及皇帝集权保障之。汉初地方诸侯跋扈，而中央开明。及中央集权后，中央也腐败了。中央与皇帝集权是互相促进的。光武较刘邦有学问得多，而东汉崩坏得更快者，即在于此。其次，司法权附于行政权。其三，行政之职权，皇帝与政府亦划分不清；尤其是皇帝侵政府之权，皇帝之收入，几占国家三分之一。此皆流弊无穷。凡此都是汉人都提到的。

但由今天看，汉制之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之混淆。一方面皇帝的诏令可以有法律性质，是皇帝有立法权。另一方面，三公所说，皇帝应该接受，此是三公有立法权。又一方面，由人民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也有参加国家大计之讨论，如《盐铁论》所记。但是，皇帝最后有否决权。诚然，如皇帝不断实行否决权，人民是有权革命的（罗马人不承认人民有革命权）。但不能事先预防，只能事后革命，乃是中国政治之历史的痛苦之症结。与皇帝否决权同时的，即知识分子只争参政权，而不争立法权。照儒家理想，皇帝无为，政由三公（此即内阁制之意）；另一方面，天子除应有诤臣外，还应与博学有道之人集会明堂，公决大事（此有议会制之意）。又先哲所以勉知识分子者，曰“为帝者师”，“为百世师”。此亦劝知识分子争立法权之意。但汉代选举学校之制虽为一大进步，只到参政权为止，人民只选举官吏，知识分子与官吏只对皇帝上奏，上条陈，而没有形成一个有立法权之团体，控制皇帝及政府之权。不仅选举终须受行政之干涉，而没有一个独立的立法机关，亦无法阻止官吏之腐化。第五伦看出这一点，但没有想出救济之法。汉人最后求决于教育。但汉代学校固然有功，然自始是禄利之途，多于学问之意；这是班

固已早指出的。汉代大学者很少是国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不求独立的立法之权，而使学术附庸于行政，也成为汉代政治恶化另一重大症结。

这不是以今日之标准，责备古人。而是因为历史的影响力，是不会停止的；真知古人真正的得失，足以助长我们的经验。

两汉的民德，经济尤其政治，是由文化蓄积而来，亦由当时一般学术思想而来。所以，我们最后必须论究秦汉人一般的学艺状况。

# 六　秦汉之学术思想

本节专论秦汉人精神创作系统，此指宗教、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包括经学史学在内。马班及《后汉书》除对学术界重要人物有传外，并有儒林、文苑、方术之传。刘歆、班固，就先秦以迄汉人著作，分为六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后二者《后汉书》称为方术，《晋书》称技术）。此分类固不妥，然以此为线索，据《史记》、两《汉书》书、志、传，看秦汉人之文章著作，文献记载，实物表现，亦略可见秦汉人信仰情感，技能和思想。不过秦帝国时代甚短（以前属于战国）。他只是为两汉准备地盘。故此节所言，以两汉为主。

前面我说到两汉文化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现在要特别指出，两汉文化乃在时间上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在空间上集六国文化之大成，并在统一帝国中发展之。他在平均成就上，超过先秦水准。就同时代世界而言，也超过希腊人罗马人的水准。此后中国一切，无不直接间接由两汉而来。这也许与若干流行看法不同，但看完本章本节，必知余言不谬。

## 两汉学术思想之背景

欲知汉人学术思想所以然之故，须先说下列四点：

一、秦汉之际时势特点；

二、秦汉之际思潮状态；

三、汉人所须解决之问题；

四、汉人在学术上思想上之努力方向。

其一、秦汉间时势有三个要点："乱"，"一"，"变"。六国之乱，至秦统一；复乱，至汉统一。秦汉统一之局，固为中国过去所无；而变得尤快。"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古以来，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此对当时之人，自印象甚深，因而求变之理。

其二、当时中国学风学派很复杂，各地文化之发展亦不均齐。此与统一之局，迅速的破坏与再建，皆与人以莫大的惊异。统一后学派学风，自亦互相影响与融会。

秦汉前后思潮，由本章第一节，可见有几个主要趋势：一是刑名，二是方士，三是黄老，四是儒家与墨家。此本互有关系，及各成体系以后，亦互相批评，互相影响。两汉四百年之思想，大抵为此四者之离合，不过时有主从之不同，后来并有新因素(佛教)之加入而已。

有旧时巫祝之学，有朝廷所用之学，有民间日用之学，有师儒之学，有新兴宗教方术之学。秦代朝廷所用之学，乃刑名之学，即商韩李斯之学。至于民间日用之学，则农田工艺之经验。然此外尚有神祀与巫术——医卜星相之学。此固与哲学科学同源。宗教巫术合理化，即哲学与科学也。自过去师儒之学，即儒墨法道之学兴，旧时神巫之说渐退。然墨家仍以天鬼名。即黄老之说，亦有巫术成分。至在一般社会中，鬼神术数有其潜势力，尤不待说。当国家扩大之时，各地之宗教巫术集中，如秦晋神祠，楚国神话，燕齐方士，越卜胡巫，乃至后来佛教，足壮传统神巫之声势。过去合理主义文化，如不能以新知增强，则宗教巫术反得以缘附若干新知识而转盛。而一帝国政府对各地特殊民俗，固亦有尊重必要。亚历山大东征后，所谓希腊主义时代，埃及之亚历山大城及巴比伦一带迷信转盛。此与秦汉统一以后宗教巫术勃兴，其理相同。秦汉之方士，盖传统巫术而因附当时新学问潮流大盛者。

所谓新潮者，即阴阳五行之说是也。如第四章所言，此自今视之，固极浅陋。然以五种元素说明天地万物之原，以阴阳二力说明其变化之故，以此配合空间时间——五方，四时十二月以及五脏，五音十二律，乃至天干地支，其引申几无穷尽。此在当时是一新学说。秦汉之统一，需要统一宇宙观。此说可供给之。秦汉之革命，此说亦可解释之。如是各种学派，纷纷取此新理论以为武装。

阴阳五行之说，并非一家之言。观《汉书》艺文志所记，有术数方伎之阴

阳五行，术数略方伎略所载者是；有兵家之阴阳，兵书略所载者是；有诸子之阴阳五行，阴阳家邹衍所说及《吕览》十二纪所记者是；有六艺之阴阳，《明堂阴阳》及董仲舒所说者是；有六艺之五行，刘向所说者是（《汉书》五行传本之）。

《汉志》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方伎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此皆科学与巫术相混者。阴阳五行说原由数术而来。我曾说阴阳之说，五行之说，多源于音律工艺（数术略中之五行家多研究钟律之书）。而音律在古代常与算术有关。其后五星发见，皆流于天文学。至邹衍，加以理论化而大盛。数术方伎家复取以自壮，引申附会。儒者复用以说《易》、《书》、《春秋》。方伎之中，别有神仙一派。神仙之说，如前所言，半为养生之术，半为神话之谈，盛于战国之末。帝王既淫侈，复有患得患失之心，黠者推波助澜，修医药房中炼金之术，饰以神道占卜接神之事，复取邹衍之说，以为理论根据。皇帝求长生求万世，求金银求治病求子嗣，遂乞灵焉。此称“方仙道”，即秦汉所谓方士也。于是帝王除专权的刑名之术以求固位外，复有个人祈福的神仙方士之学，以求延年。自始皇任刑法，信方士，烧诗书、史记百家之语，唯余方术卜巫种树之书。当时研究学问的人，无书可读，不能不受此影响；或因帝王既相信之，为了自存，或求利，亦以为门面或工具。此风至汉尤然。而方士遂益修其他数术方伎。故一时方术，集中于方仙道。

此方仙道较鬼神进步，与宗教类似，然亦与宗教不同。盖宗教乃非现世的，皆主一最高或若干上帝；而方仙道乃极现世的，认活人可以为神。如谓中国文化有特点，此亦其一。此固宗教巫术神话科学混合物，一种准宗教，又一种高级魔术，而又一种伪科学也。盖方仙道必借长生、符箓、丹鼎、占卜之类，发生若干实效，见信于人。虽多为玄虚，然卫生、医药、化学、天文固亦往往有关。不然，以秦皇、汉武、曹操之雄，亦未可完全以虚言相欺也。正因其有若干小术，见信朝廷，于是国家礼制之事，亦请彼等主持，以致封禅郊祀及庙祭之类，每妄诞浪费，不可究诘。

然国计民生之事，究不能专恃乎此。其荒唐处亦终暴露。故汉代儒家、道家以及治天文星历者，乃对各种神道方术加以合理化。而纯巫术神话成分，遂因佛教传来，初以道教出现。不过后来道教徒固亦研究科学者也。

其三、在统一与变乱之中，一般人对于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要求一圆满的解释与解决。就思想而言，春秋以来学问，本渐离天而言人事。及世事日

繁，论天者复众（邹衍），荀子虽不信机祥，阴阳五行说仍不胫而走。及世界大变甚急，统一帝国形成，尤重感天人之故的密切。一个通天地人的统一世界观，遂为一般人之要求。首先继邹衍而起者，是《吕氏春秋》。其次则为《易传》、《中庸》。所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弥纶天地之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到了汉代，则刘安、董仲舒皆求天人之故。太史公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谶纬由此而起，《太玄》由此而作。虽内容各有虚实，而目标固皆在设计一种宇宙观也。其次，就政治问题而言，汉人有急求解决者。秦汉统一，是一全新局势。秦虽废封建，立郡县，还是承数百年之基业，慢慢发展而来。汉以布衣为天子，尤史无前例。此局其可久乎？这在当时人心中，是一大问题。在王族中，也一直有一心病。刘氏既可革秦之命，难道别人不可革刘氏之命？自古道，天命无常，难道常在汉家？武力既不一定可恃，究竟凭什么来证明汉家天下之合理？用什么来维持汉家天下之长久？始皇统一，不二世而亡。此对汉人印象亦极深。封建乎？郡县乎？汉廷一度游移之后，仍走向统一。但在制度上，大体袭秦之旧。这在许多人看来，决不是健全的办法。导之以德乎？齐之以刑乎？加之，此时匈奴日趋强大；和乎？战乎？此外，统一与大乱之后，贫富悬绝自然也是一大问题。无为乎？井田乎？限田乎？对于一般知识分子，除了这些大问题外，还有一个切身问题。他们破坏了旧贵族社会，来了秦的专制。秦的专制瓦解了，又来了一个新贵族政权，而这政权显然不是亲知识分子的。然则对这政权是反对呢，还是妥协呢？或者，有什么方法来限制新贵族的权力呢？当时的人，想从两方面去求解决。一是求之于当时自然知识，二是求之于古代经验。前者是阴阳五行说之研究与批评以及各种实测实验，后者是周秦旧师之学以至六艺或六经之整理与研究以及各种理智思考。二者发生关联，也是自然之势。首先提出这些问题，试图解决者，即是陆贾、贾谊、刘安、董仲舒等人。

其四、大概一个社会文化表现活力之时间有二：一是社会开始团结之时，一是开始分解之时。亦犹原子融合或分裂之时，皆能放出大量之能力也。用圣西门之术语，前者为“组织的”，后者为“批评的”。不过前一期的批评力，也常为后一期之组织力。两汉学术常表现此种节奏。首先秦汉儒学经学，即经批评，组织，再批评，再组织之过程。由于统一，为了统一，以及随

统一分裂，秦汉学术思想有这三个趋势，即：组织化，合理化，分离化。

一、因各种学派方术文体集中，汉人在各方面为学艺之组织化，以建立统一的世界观。

二、当刑名方盛，而方士仗阴阳五行而流传时，黄老儒家一面受其影响，一面予以批评，逐渐重建合理主义之文化。由此发生两派经学，制度之人文化，史学之建立及科学之独立。

三、因合理主义之潮流，随统一之瓦解，由既成学术之僵化，尤其因学术之进步，个人主义之抬头，有学问上新派别（玄学、政论、礼学）和艺术新种类之出现，以及思想学术之新的分合。

西洋学术史常先论宗教，罗素谓哲学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盖西方宗教影响较大，其哲学科学，皆直接批评宗教方术而起。而秦汉间宗教方术虽盛，尚未能独霸人类之精神。（也许正因此故，我国对宗教方术之批评，亦不若彼等之锐利。）所以我愿取如下论述之次序，即哲学，科学，音乐与文学，造型美术，宗教。

## 哲学

我国古无哲学之名，而泛称为“道”、“术”。凡六艺诸子乃至群史，皆与哲学有关。而有组织的与分科的哲学，实自两汉开始。

秦代专讲刑名、方术。汉代黄老儒学同时抬头。前者以淮南子为一大组织，后者以董仲舒为一大组织。董仲舒后，儒学大盛，成为经学；然混于灾异，杂于谶纬。先有太史公，组织史学；后有扬雄，首创玄学及文字之学。自兹以后，批评之风大盛（桓谭、王充），学风一变。其于经学，古文之学兴；其于史学，有班氏之断代；其于科学，则有张衡，别实测于方术；其于政治，则有王符，开论政之先河。至于汉末，则思想界有三个关键人物，一则郑玄，二则宋衷，各集古学之大成，各开创两种学派；三则仲长统，开老庄之运。此秦汉思潮之大势也。〔注一六五〕

## 秦汉之际——刑名与《易传》

始皇时代，朝廷用刑名之学。刑指申、韩，名固研究论理，实则讲究分

类，附于法家者（李斯时有成公游谈不仕）。但始皇又喜神仙方士之道。此外，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之说流行（前者如吕不韦，后者如楚人南公）。儒家最受压迫。儒家本以礼乐谈政治。始皇既下令“莫谈国事”，儒家除谈修养外（《中庸》），多发挥《易经》以谈天。《易经》本筮书，亦用于算术（后详）。在战国末已有人研究，讨论阴阳，与礼、乐、诗、书、春秋相配（《庄子》天运，天下）。但大盛则始于秦汉之际。《汉书》儒林传云：

“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王同、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杨何。”（节引）

今《十翼》大部，当出秦汉间。《易传》受阴阳家影响，以阴阳配乾坤（唯汉初之《易》不言五行）。又颇受老子影响，如“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又，“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又云，“盈天地间皆万物也”；此仍为唯物论。而“一阴一阳之谓道”，“迭用刚柔”，则以阴阳之生生论宇宙之发生，阴阳之循环、平衡论宇宙人生之变化。更重要者，是效天法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冯友兰尝云老子重反合，《易传》重时中。然而老子言守雌因循，而《易》言“君子自强不息”，尤儒之所以为儒。盖当时之儒家深信秦政必败，而读书人不可失自信也。〔注一六六〕

## 由刑名到黄老——《淮南子》

汉初之学，仍大体继承秦代者。《汉书》云：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器、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高纪》）

以上除陆贾《新语》外，还是先秦及秦人之遗产为多；对于汉初政治，张苍影响，实尚较叔孙通为多。〔注一六七〕秦人遗产中又刑名为多，不过加以和缓而已。法吏仍为平民出身之途。此后文景均好刑名。晁错以儒者，学申商刑名于轵县张恢，为博士（《汉书》错传）。以后儒生压倒法吏，但法吏传统终汉世未绝。

秦汉之际，早有黄老潮流。《吕氏春秋》：“维秦八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所以诲颛顼矣。”是黄帝之书，已大盛于时。天下恶秦法，汉初黄老术极

盛。《史记》载乐毅之后，乐臣公以黄帝老子之术显于齐，教盖公为曹参师。张良学于黄石公，陈平少学黄老。太史公父习道论于黄子。《汉书》记邓公……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公卿间（晁错传）。又“汲黯学黄老言，郑当时好黄老言”（汲郑列传）。窦太后亦好黄老术。然则所谓黄帝书者，何书乎？王符云：“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潜夫论》）。大概最初黄帝之书是讲卫生及心理卫生的。由此申引而论政治（如吕氏、淮南、贾谊所引）。并与老子清净之说合，始有政治上黄老术。〔注一六八〕当时知识分子，知道皇帝政治之下，愈是有为，百姓愈受其害，所以提倡清净无为，消极的限制王权。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当时黄老之术是大有功绩的。韩非亦言无为，但黄老究竟是与刑名对立的。

**《淮南子》** 汉代黄老学之大家，自推刘安（武帝元朔二年即公元前一二七年死）宾客所作《淮南子》。此书大体仿《吕氏春秋》。吕氏结先秦之果，刘安开两汉之花。安为刘邦之孙。“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集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盐铁论》）；宾客数千人，有八公及大山小山之徒，著《淮南子》三书。内书廿一篇，杂儒道、阴阳、兵家、农家之言，而以黄老老庄为主体。〔注一六九〕虽然甚少创见，但他此书是综合当时知识，应用《易传》，首先组织一个天地人之系统宇宙观的。世界最初乃无时间之“太始”。浑沌未开，亦谓太一。其时唯阴阳错合，优游宇宙。“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轻者为天，重者为地。清合易，而重凝难，故先天后地。天地之合精为阴阳，阴阳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集阳为火为日，集阴为水为月。日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直到《幼学故事琼林》，这还是中国人的天文常识。

他以为人是一小宇宙。“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又云：

>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以与天地参，而心为之主。五星失行，州国受殃。天地爱其神明，人曷能久劳不息乎？”

人当效天休息，此点不同于《易传》，而同于老庄。他认为人应该“与道合一”，“性合于道”，“法天顺情”；应该无为返朴，去嗜欲好憎。此之谓真人，圣人，大丈夫——不过他本人则是一个内多欲而口谈无为的人。

反正此书成于宾客，刘安本人并不负责任。在政治上，此书折衷儒道，

颇能反映当时思想："削法刻诛，非霸王之业"；"因天地之自然，六合不足均"；"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无为者，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也。"又说，"古之治天下者，必达乎性命之情"；认"孔墨为外道，仁义礼乐可以救败而非可通治"；"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而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又主张"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其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在以"人性为人之斗极"（齐俗训），明人性而立是非，主张圣人因人性而治天下，"圣人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之而为之节文者也"（泰族训）。又主张法天象地，立明堂，制礼乐以治国，则是儒家的根本主张。又中书外书者，即所谓"枕中鸿宝"，是与神仙黄白之术有关的。他以谋反伏诛，但传说得道成仙，并将鸡犬也带上天去了。其书自不如所自负之甚，但是汉初思想之百货店。《淮南子》书中之阴阳五行说人性自然论，神仙思想，及其爱好《离骚》，一直是两汉风气。而这也可说是代表楚学的。淮南王谋反事发作时，已到董仲舒的时代了。

## 由黄老到儒术——陆贾、贾谊、董仲舒

**陆、贾**　董仲舒之前，儒者已作数十年之奋斗。真正汉学之第一人，当推陆贾。他提倡诗书，主张行仁义，法先圣；又著书论秦亡汉兴及古今成败之理，即所谓《新语》。此是汉之开国文献，于儒学史学，皆影响甚大。其后约廿年文帝之世，贾谊治诸子百家为博士，以为秦之余风遗俗，今尚未改。俗吏所务，在于刀笔而不知大体。汉室内忧外患甚重，未可因循，而当重定经制。除过秦论，治安策外，尚有《新书》。两人都反对亡秦之政，是与黄老一致的。世传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新语》以"先圣（伏羲黄帝等）始有制作，立百官，殖农桑，备器械代人力，设赏罚，民畏法而无礼义。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后世衰废，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原情立本以绪人伦，以匡衰乱"。这和黄老极力称道上古不同。其谓"道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与《新书》所谓"道从物所接，其本谓之灵，其末谓之术"，都可看作黄老儒术之综合。贾谊《鹏鸟赋》有云，"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真人恬漠，独与道息"，纯道家言。其主张色尚黄，数用五，则阴阳家言。惟力主张以礼义定制度，制度之要在兴学校，谓"礼禁将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凡与民为敌者迟早必为民所败；则儒家之根本主张。陆贾、

贾谊之书，可看作黄老儒术之过渡。而二人亦皆与楚学有关，可见楚学与汉学关系之重大也。

**儒学与经术之兴** 汉初黄老儒学似乎是携手反对秦世政治的。到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争论，则黄老儒学业已分途。鲁韩齐之儒，已以六经为旗帜，讲学为方法，锻炼出更多的后备军。于是儒术代黄老术而兴。亦即鲁齐之学，代楚学而兴。

今日六经，在秦汉间才成立，通称六艺。《庄子》天运篇及天下篇始加连举。而始加议论的，则《礼记》经解。陆贾《新语》有五经六艺之名（道基篇）。贾谊《新书》称六术。《淮南子》论六艺异科同道（泰族训）。太史公滑稽列传及自序，论"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经传以千万数"。五经之称，是与五行有关的。董仲舒于六艺特提出《春秋》为中心。《汉书》艺文志以乐、诗、书、礼、春秋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学者耕且养，二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其时皆称经术，甚少称为经学者。（经学二字连用始见《汉书》邹阳传兒宽传）

文景以来，已有博士，但不限于儒生；而儒生博士，以《诗》与《春秋》为多，至武帝始有五经博士。

今文家以西汉博士之学是儒家正统。其实汉初儒学与后来博士之学颇有不同。

其一，汉初之儒，以邹鲁之学为主。其后则韩齐继兴。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汉初儒者以鲁申公为著，乃浮丘伯弟子，曾为楚元王交（高祖同母弟，向歆即其后）之师。高堂生之《礼》，穀梁之《春秋》，亦为鲁学。文帝时博士韩婴，代表韩学。

景帝以后，则齐学大盛。田何弟子丁宽，以易学为梁孝王将军，授施、孟、梁丘，施为少府。胡毋生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博士，公孙弘亦胡毋生弟子。凡此与伏生之书，辕固生之诗，皆为齐学，尤以公羊为著。公羊著于竹帛，实在汉初。因其大一统，大复仇，即所谓尊王攘夷，与当时汉人需要相合，大受欢迎。于是《易》与《春秋》，成为西汉经学之主力。

其次，武帝以前儒学，其自尊与民主精神较为强厚。并且，也很少灾异之言。申公因楚元王之子无礼，即不合作而去。又对武帝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又韩婴之《韩诗外传》云：

"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

亡。"又云：

"君者何也？群也。为天下除害者谓之君。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

后来辕固生告诉公孙弘，"务正学以言，勿曲学阿世。"凡此皆可见汉初之儒，颇不妥协也。

武帝时代儒学，则因"上尊公羊"(《汉书》儒林传)，公羊春秋最有势力。武帝之尊儒，亦多因公羊尊王攘夷，与其志趣相合。公羊遂为皇朝与儒生合作之桥梁。公羊本多言灾异。至于采阴阳五行说，为儒学建立一新哲学系统奠定汉代儒学势力者，是董仲舒。

**董仲舒**　(公元前二〇〇？——一二〇?)景帝时治《春秋》为博士，武帝初，上有名贤良三策，推动了汉代改制。第一策主张法天施政——"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第二策提出"素王"之说，主张立太学养士，为教化之本源。郡国举士为王政之要义。第三策主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这在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已经说过。兹论其哲学。

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所谓天，有意志，并非上帝。此天之意志，即天道，无非是博爱无私。他所谓阴阳，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德教为阳，刑罚为阴。帝王之宪，在力本任贤，任德不任刑。此与老、《易》之阴阳有别。老、《易》对阴阳是中立的，而董氏则以为必以阳道为主而阴为辅。如若"残贼良民，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如是发生妖孽，而"天即以灾异谴告之"。他又说一人亦有阴阳；阴为情、为贪，阳为性、为仁，人亦当以性治情。此乃合孟荀之说，而与淮南不同。盖淮南以性情为一，而他以为性情有善恶之分。而他最重要的见解，则以天为万物之本，而人为万物之灵，天生万物以养之。"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礼节。"王者受命于天，必使人民"各遂其生"。而一切制度，必"改前世之弊"。今当损周之文，用夏之忠云。

这些话皆甚平正。高扬人道尊严，反对帝王滥用权力，尤其有功。又今世传《春秋繁露》，亦其所作，其中发挥天人之际，有较多哲学意义，亦有较多神秘色彩。

整个世界中，有十大类的存在。"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世界之根原曰元。“一元者太始也。人之元在天地之前。”故人为最贵。“天地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三者相为手足”。故天地无人，则不成宇宙。天地有阴阳二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亦相胜。阴阳二气之动，乃成四时，而五行配之，如木主春气而居东方。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五行，五脏又与五性(仁义礼智信)相配。

对策只言五常。而《繁露》则提出三纲五纪为行为规律。王受命于天以治人。设官分职，亦当法天，然必归之于仁。“天之生民非为王也，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恶之。”如若不仁，则有灾异。灾为“天谴”，异为“天威”。

历史之变化，亦循天之规律。邹衍有五德说，董仲舒则有三统说，即黑、白、赤；夏黑统，商白统，周赤统。继周者，又为黑统。如此循环，周而复始。三统以三正代表之。而治道则为商、夏、质、文，周而复始。故后代之王必改制，即变更前代之法革除前代之敝也。

《春秋》为孔子本天理而作之书。其中有微言大义，而归于“敬贤重民”。《春秋》有名分。“名分者，圣人所以达天意而为呼号者也。”而孔子乃受天命“通百王之道”，立新王之制者。而其所示大义，有“十指”“五始”“三世”之说；而后来公羊家如何休，则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其他“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亦由此而出。此后古文日盛，公羊说衰，但至清末而复兴。今文派之康有为先生等遂力言古文乃新(莽)学伪经，而公羊乃素王之大道；据以谈变法立教，并以与《礼运》大同之说相合。一时甚动听闻，至今尚为人称道。

书中又有“求雨闭诸阳，纵诸阴；止雨反是”之类。他设土龙以求雨，亦以言灾异败事。古文派之章太炎说他是神人大巫，且以其为拥护君权者。胡适先生且戏称其为“董道士”。但刘师培先生说他是将天放在君上，而以圣王之道，以仁恕为归；惟不欲骤废君权，以求贤为限君权之法云(《中国民约精义》)。这是持平之论。然尚不止此。

一个思想家很难不受时代影响，而任何一种学说都难免发生流弊，而此则须继起之有人。就当时而言，董仲舒对于纠正秦式政治，保护人民权益，实在尽了他最善之努力。他虽求与汉廷合作，但议论堂皇，绝未失儒者立场。在思想上，他好言阴阳灾异。此自是受了邹衍的影响。邹衍之五德、机祥，即汉人三统、灾异之所本。我还想指出，董氏亦颇受墨子影响。将董氏

天人三策和《墨子》天志、明鬼参观，可知其确是相通的。《天志》云，“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避天鬼之所憎，节四时，调阴阳，疾灾戾疫凶饿则不至。”《明鬼》云，“鬼神能赏贤罚暴。”此亦汉代阴阳灾异说之所本。我在前面说过，公羊之学固与邹衍有关，也与墨子有关。墨子《尚同》主张上同于天子，以上同于天，主张“一同其国”，“一同天下”，即公羊“大一统”之所本。但我们也须知，天降灾异之说原各民族以及中国原始信仰。洪范即言休咎，厥后内史过及伯阳父之言，亦近灾异（《国语》）。春秋以降，才更重人民，尤其是孔子，不信神怪，使传统信仰人文化。但战国秦汉间世变之剧烈，灾异之频仍，有非当时人力所能解释者。而墨子之徒仍盛言传统天鬼。邹衍欲与以自然哲学的解释。《管子》水地篇说齐楚秦越之民性皆水性使然；“水清则人心易”，以为改良水即可改良人心，当即邹衍派之一说。这理论颇怪，然亦较近科学，亦为一种唯物论也。《吕氏春秋》受儒墨阴阳影响，如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是谓大同”，以及月令之类。不过吕氏用以扩大黄老之说（刘安亦同）。董子受他们影响，但将他们之说儒家化，仁义化。他将墨子鬼神之天，变为一包括全自然之天，墨子所谓神，变为人类之“同心”，墨子所欲“上同”于赏善罚恶之天志，变为正心正本之王道。他将邹衍之自然哲学变为历史哲学，将历史转变之理，归于德与刑，质与文。以德之不修，刑之失当，为二气乖谬，来解释灾异。这毕竟是墨与阴阳进一步合理化，并以儒学兼并之，因而扩大儒学内容的。他使儒学驳杂，但此亦儒学壮大之必经过程。刘邦以剑推翻秦之政权，他以笔改变秦之制度。他使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家之笔，有与天谴天威同等威权，使帝王有所畏惧，加以驯服！

《汉书》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是想用阴阳驾驭帝政，亦不屈于武帝；但他的后学，亦由此走上阿世乃至迂怪之途，也是不可否认的。〔注一七〇〕真正发展其《春秋》之学建历史哲学者，是太史公。

**公孙弘**　董仲舒这一套仍不为武帝所喜。公孙弘（前二〇〇——一二一），原为牧豕者，亦治公羊之学；在六十几时，征为博士，使匈奴，不合武帝意。元光五年，再以贤良推荐，本不愿就。其后对策大为武帝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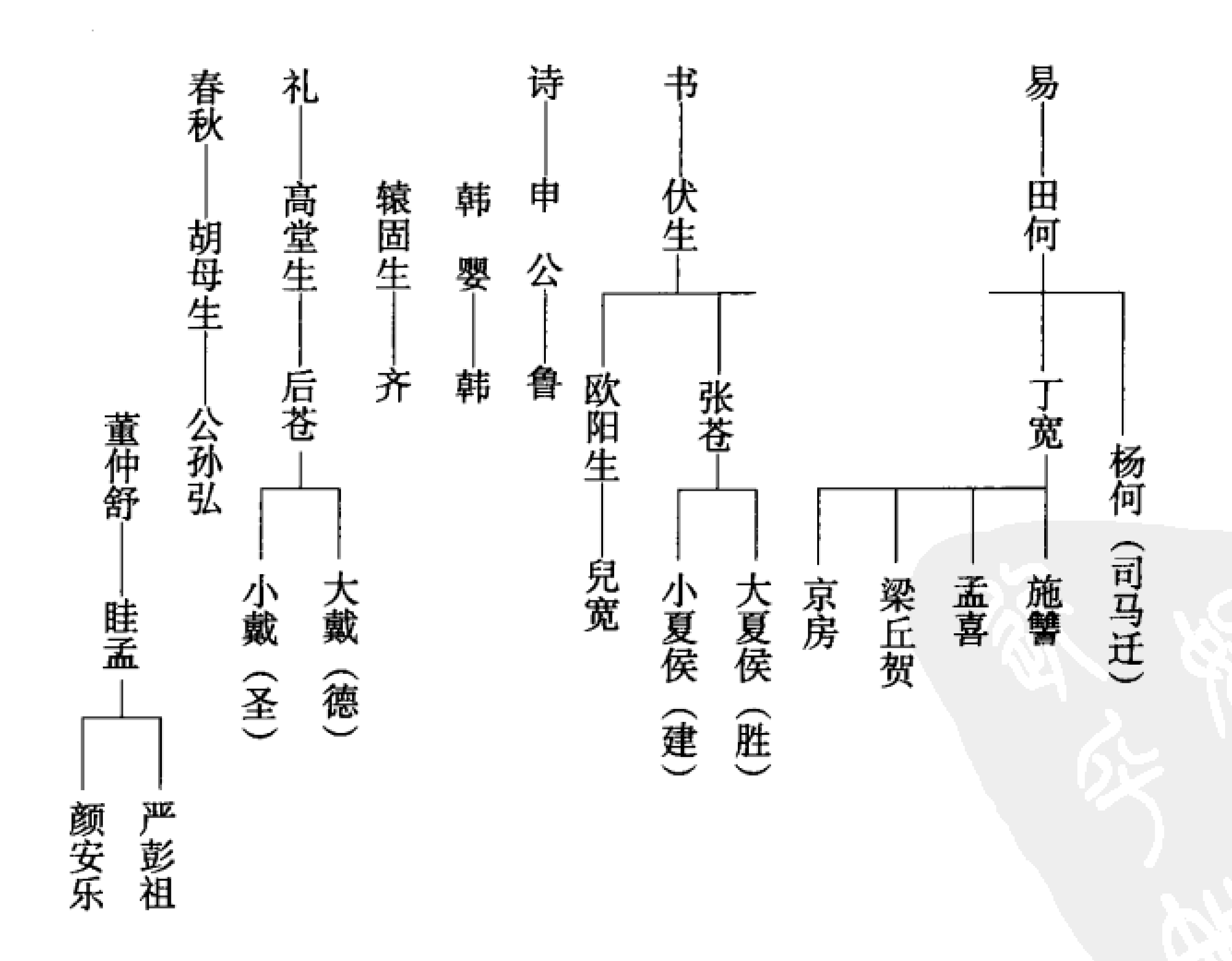
“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生杀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

兼爱与术，可看出墨子与申韩的影响。武帝所以大喜，自然是最后的

“术”。这是以儒者“缘饰”法吏之政的。于是公孙弘以儒者为丞相封侯。《汉书》说他“希世用事，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而董仲舒可说是以春秋之义绳君王的。他并交结张汤，杀郭解，及主父偃，并徙仲舒于胶西。观公孙、董之升沉，即可知武帝前后之儒，有大不同者在。儒家变质，混于法术，自公孙弘始。

## 经学之成立——今文与古文

如上所述，前一二四年，武帝以公孙弘之议，立学官——经学博士之官。除齐鲁韩诗学已有博士外，武帝立杨何之易，欧阳氏之尚书，后苍之礼，及胡母生董仲舒之公羊春秋。至此五经博士齐备，并置弟子。即以经学为国学也。其后宣帝又增加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及穀梁春秋。后立京氏易，旋废。元帝时，又增京氏易，穀梁旋废。平帝时，立左氏，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旋罢。所以至东汉只有所谓十四博士之学。〔注一七一〕传授源流如下：




当时博士等于国定教授，他们的经书，等于国定教科书。这些官家博士的经书课本，是由当时老师宿儒口头传授，而以汉世通行隶书写成的。故称

“今文”。但此一名称，是“古文”出世后才有的。

早自惠帝除挟书之禁后，民间及山岩屋壁藏书出世。先有伏生之书。及武帝异母弟河间献王搜求书籍，所得与汉朝等。又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礼经、论语、孝经，皆古字也，孔安国悉得其书(《汉书》)。《史记》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司马迁尝从其问故。河间献王所得皆先秦古文旧籍，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门下有博士毛公贯公。毛公治诗，自谓子夏所传。还有《左氏春秋》，汉初即有张苍贾谊传之，贾谊授贯公。此外易于民间有费高二氏之说。这些书大多数亦秘府(国立图书馆)藏有，一部分在民间流传；因为是用古文写的(即先秦文字)，于是有古文之学。

易——费直(以彖、象、系辞、文言、说经)。

书——孔安国古文尚书(刘歆班固云：鲁恭王坏孔子室所得，归孔安国，以考廿九篇多十六篇，安国〔家〕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略与《史记》有异)。

礼——逸仪(鲁恭王坏孔子室所得)。

又周官经(河间献王得之，又刘歆校书发现)。

春秋——张苍贾谊贯公及刘歆治左氏传。

于是就有两种的经与经学：一是博士口传，师法教授的今文经学；一是早著竹帛，民间传授者的古文经学。〔注一七二〕

一方面看，这不过是文字版本问题。如龚自珍所云，在以汉代文字写定以前，皆是古文；在写定以后，皆是今文。另一方面，这些新出的古文，与博士之书，除字句训诂不同(如尚书皋陶谟今文为“七始咏”，古文为“在治忽”)外，有的多出篇章(如孔安国尚书、逸礼)，有的是解释不同(如毛诗与三家)，有的根本性质不同(如左传与公羊)，而更重要的，还有周礼与仪礼，究竟谁是经的问题。这在今日看，也许无问题；皆是先秦古籍，至多是史料鉴定问题。然在当时，经学刚视为治国乃至为学之最高典籍，完备与否问题，以及真伪问题，自为大事。加之国家方立博士之官，其中有权利问题，也有荣誉问题。由此开始今古文之争。但如果仅仅是争立学官之事，亦不重要。在今古文之争论中，在官学与民学之争论中，实牵涉到史料问题以至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的内容在内。这不仅是两汉学术之一大公案，而且成为两千年来学术变化之一大关键。这就不能不注意了。

此一问题之发生，最初是因立学官而起的。在今文经学立学官后，新出古文之学只有民间许多学者研究（如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他们自希望列于学官，但为博士所拒。于是今古文之争起。宣帝时，亲诏诸儒于石渠，论五经异同，始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成帝时，曾欲据秘府所藏逸礼，孔安国书及左氏春秋立之，“抑而未施”。哀帝时，刘歆掌图书，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诏歆与博士会商。诸儒以尚书已备，左氏不传春秋，拒绝讨论，刘歆曾为书责博士“守残妒真”。博士则谓歆非毁旧章。平帝时，王莽当政，立左氏，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王莽为帝，广设博士之官，周官（周礼）尔雅均在内。儒生有责歆颠倒五经毁师法者。光武时，复十四博士之旧。韩歆主张立费氏易及左氏，博士范升反对，立而旋废。章帝好古文尚书及左氏传，尝诏诸儒于白虎观，考求同异。由贾逵之力争（见后），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虽不列学官，皆擢高弟为讲郎，给事近署。灵帝时，卢植请立毛诗、左氏、周礼，未见听。终两汉之世，官学仍为十四博士之学，即所谓今文之学。（以上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儒林传；《汉书》景十三王传，艺文志，宣帝纪，刘歆传，王莽传；《后汉书》章帝纪。）

这是经今古文问题之大概经过。但到东汉，官学虽奉今文，而民间古文日盛。东汉之末，何休为《公羊解诂》，并抨击左氏穀梁。郑玄著书反击，为今古学最后之论战。自此以后，古文日盛。到了两晋之际，今文亡失，古文独传；至唐代，古文成为官学了。

到了两宋，又有新学问起来，反对古文学。此即理学。此在元明两代，成为官学。

到了明代，又有新学问起来，反对程朱一派理学。此即心学或王学。

清代官学仍是程朱，但民间则是一反刍时期。先有遗民之学，且多为王学，继而古文兴起，继而今文再兴；到了清末，对诸子兴趣，又顿趋浓厚。但世界思潮涌来，我们面临一剧变之局，整个中国文化遭遇一种生死关头了。

凡儒学，今文，古文，乃至于理学，皆经生长，兴盛，分裂，衰亡，乃至再生之过程。这是我们以后都要加以研究的；而政府之保护提倡大抵害多于利，则是可以在此预先一言的。

现在且说武帝立经学为国学以后到西汉末年的情况。

# 西汉后期之经学——穀梁学、盐铁论、京房、谶纬、刘向、歆

儒学在秦受压迫；在汉初原为在野之学，对抗刑名、脱离黄老而起。其时今文学者是有志为国家改制，为人民谋利益的。他们采当时阴阳，墨家，及刑名之说，扩大易与春秋内容，为经学支柱。这终得政府承认，日益盛大。“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百有余年，传业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传）。这安定了汉帝国，而当时儒家也力求对国对民有所效力。他们讲通经致用，有禹贡治水，春秋断狱，三百篇当谏书之说。公羊学对当时统一抗战，也发生鼓舞人心士气作用。武帝好神仙淫祀，儒家也并不苟同（详下）。然成了官学，成了禄利之路以后，博士及弟子各以师法家法标榜，其本身自不免成为学阀。今古文之争，自有既得利益问题。而更坏的是由于受政府保护、干涉后，其内容日趋于保守。帝王决定五经异同，尤于学问有害无益。因此，今文经学烦琐化了。此《汉志》所谓“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者。其次，急功近利，不免曲学阿世。尤其是公羊之说，变成“酷吏佞臣之言”（俞正燮语）。武帝以后，由于今文学之锢蔽及公羊学之流弊，又由于开边远征造成民生困顿，大家发生反感；经学有几种变化。其一，穀梁代公羊而起。其二，承阴阳灾异之潮流，而昭宣以后政治集权之流害日益显著，“灾异”（日月食及水旱蝗灾之类）又特别频仍。过去的灾异说不能够预言，经书中也找不到解决。如是经学又与新起的占星术结合，此即所谓纬书。其三，到西汉之末，政治日益无望，思想渐走入两条死巷。一是神权，即谶书；次则不满于神权者，别无出路，只好复古。《周礼》和古文也就大行了。

**穀梁学** 穀梁春秋究为今文学抑古文学，清代今文家之说不一。其在汉初由申公传授，与公羊同时著于竹帛，同派之学（鲁诗）列于学官，可谓今文之学。但在齐学公羊得势后，穀梁是鲁学，就被抑压，始终未能正式列于学官而言，亦可谓古文之学。而在思想内容上，亦确较近于古文。

武帝尊公羊，但其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武五子传）。此“父与子”之好

尚，表示潮流之变化。其后田千秋夏侯胜萧望之刘向等均受穀梁之学。而张禹（非成帝师传论语之张禹）萧望之翟方进刘歆又研究左氏，至东汉大盛。

此西汉经学之变也。穀梁之起，是今文学之分化，亦古文学抬头之先声。

公穀皆尊王攘夷，然有不同处。前略言之，兹举二条，以见其旨趣之有别：

《春秋》——“庄公十一年春，甲午治兵。”

《公羊》——“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旅一也。皆习战也。”

《穀梁》——“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春秋》——“惠王二十年春王正月，不雨。”

《公羊》——“何以书？记异也。”

《穀梁》——“不雨者，闵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在注重民事，不满战争这两方面，桓宽《盐铁论》正反映由公羊到穀梁的思想变化。

**盐铁论** 桓宽《盐铁论》可见昭宣时代思想。昭帝初（前八一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问民间疾苦；六十人，均主罢盐铁酒榷均输之政，因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辩论（按是年苏武归）。宽本公羊学者，后为庐江太守。书记当时辩论，不仅可见当时社会状况，亦可见当时朝野两派思想。桑弘羊称道管子申商邹衍之学，主张任法而治。文学贤良则称道孔孟，道德为先。桑弘羊等主张征盐铁的基本理由，是抗伐匈奴的国防经济上必要，“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但贤良文学反问他持政十余年，“未见种蠡之功，唯有靡敝之效”，亦公卿无词以对的。不过，文学贤良只有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以来之一套话。弘羊说他们是“愚儒，不知世务”，不无理由。贤良文学主张罢盐铁的基本理由，认为国家治道，在广道德之端，仁义之路，去奢崇俭，不与民争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他们说王者贵德而贱用兵，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及文德，“治国之道，由中及外，古者伐不善以安诸夏，无有敝诸夏而役夷狄者”；将士饥寒，百姓劳苦，决非长策；这是不错的。但他们只知道务本节用，分土井田，去奢抑末，稼穑兴邦。弘羊则主张“备器械工商，一切养生送死之具，待工而立，待商而通”，自是进步的见解。不过贤良文学说“农器苦恶，不给民用，割草不痛”，自是事实。先是卜式已说过同样

的话，反对官吏办平价事业。式主张先富民然后税之，其政策适与弘羊相反，故不为武帝所喜。至是贤良文学更力言公卿奢侈，下吏侵渔百姓；也是统制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此外，弘羊高谈富强，认拘儒无用，赞成秦始皇焚坑，鄙笑孔孟原宪之贫穷无功，自夸其致富成业，为言实鄙。然而文学贤良虽指出秦政亡国，非斯自杀，只说一套"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处约乐病，颜子箪食瓢饮"之类，毕竟是冬烘议论为多。后代儒者多左袒其中贤良文学，然就辩论而言辩论，桑弘羊颇见才智纵横（他甚至说水旱是阴阳之运，非关人力），不似后代只知聚敛贪污之士。其时贤良文学，实不足折服弘羊。不过近人转而赞美弘羊之大计，笑儒生之迂阔（如李源澄《秦汉史》），也是不正当的。国防诚然重要，但必先足食然后足兵；尤必须度德量力。不顾及经济的力量，不注意负担公平，只知道靠统制救急，是杀鸡取卵，徒便豪门，结果只足以破坏国防的。

在这一辩论中，不仅可以看出法吏儒生之立场不同，亦可以看出公羊穀梁两种倾向之存在。前期之儒，气象是扩张的，进取的；后期之儒，则是收敛的，保守的。此是武帝政策流弊之反动。经此辩论，盐铁未罢，酒酤停止，均输似亦已停止。行政上颇事整饬，僻远郡县有合并或放弃者（如废真番，并临屯于乐浪，弃珠崖）。神仙淫祀，一度冷静。此在当时是必然也必要的。所可惜者，此后儒家，如贡禹、王吉、刘向、匡衡，大抵趋于保守，无复汉初活气。于是复古仿古之空气，日益浓厚。盖一面由于武帝政策流弊，使学者害怕；另一方面，亦因博士之学，本身亦趋硬化也。《盐铁论》中文学之士，说有"执经守道之儒"，"公卿面从之儒"。其实更重要的，是真正能经国济民之儒啊！然在经济思想史上，此是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最古的论战，至今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灾异**　汉之国力，因此收缩而恢复。然政治上外戚宦官势力日张。此时汉朝实需要有第二个董仲舒出来改制。然而还只有灾异之说。随戚宦势力之日张，灾异之说大兴，且流为谶纬。

灾异，谶，纬，三者常为言史者混为一谈，实非一事；不过后来合流而已。如上所述，汉代儒家始倡灾异者为董仲舒。除感于天人之关系外，殆亦有意借灾异之说，以谏时君；盖若辈既不能动之以仁义，唯有怵之以天威。然风气既成，在两汉灾异成为政治上大题目，至常以灾异策免三公（参看《廿二史劄记》）。而这亦因外戚宦官与儒生争权，皆以灾异为借口，增加其戏剧化。

神道之说大兴，孔学精神转晦。而为灾异之说者，亦罕不以此自灾。班固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名者也。察其所言，假经设谊，依托象类。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李寻流放，此学之大戒也。京房危言刺讥，构怨强臣，悲夫!”(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然三者理论系统，根源不同。《汉志》易家有《古杂》，《杂灾异》，殆灾异古说。董仲舒言灾异，以阴(刑)阳(德)为主。用刑不当，即有水旱之灾。稍后夏侯始昌则以《洪范》说历史上灾异。政治不良即有五行之变。如夺民农时，则木曲直；弃法律，逐功臣，则有火灾；废祭祀，则有水灾；治宫室为淫乱，则有土灾；皇之不极，则日月乱，星辰逆引云云(《汉书》五行传)。此不过言天人间有一种感应，其神秘性并不浓厚。此正统灾异说者，乃以阴阳五行说为根据者也。

谶、纬连称，实非一事。谶者，验也；预言之意。《史记》赵世家已有之，出于原始占卜。《说文》云，“河洛所出书为谶”。刘歆以八卦为河图，《洪范》(九畴)为洛书(《汉书》五行志)。此与北魏及宋人所传“黑白点子”之图书不同(见后)。八卦、《洪范》，早认为有一种天降符命之意义。故《连山》、《归藏》、《周易》皆传与图书有关。而卜辞繇辞，亦可谓广义之谶。《吕览》恃君篇云：“绿图，幡簿，从此生矣。”《淮南子》云，“洛出丹书，河出绿图。”而“亡秦者胡”，见于图录，称曰秦谶。大约秦汉间必有若干书籍，附会河图洛书(八卦九畴)，有图有说而为政治预言者，曰谶。《汉志》数术略有《图书秘记》，当即此类。自来图谶连称。大约类乎推背图与烧饼歌。又多作三言，类古之繇词，或即一种谶诗，而上有图画者。此原始之谶，殆以言符命为主者。

纬者，对经而言，其出现自在六经之名成立之后。董仲舒引“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出春秋纬，太史公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出易纬，则至迟汉初有之。谶纬之书，隋代禁绝。就古书所引纬书佚文，大抵本《易经》八卦立其宇宙观，尤多涉天文历数(看《后汉书》律历志)。诸经皆有纬，而易纬最早(《文献通考》引胡致堂说)。纬书之宇宙观，与孟喜京房一派易学有密切关系，与而阴阳五行说别为系统，实宋儒所谓“象数之学”。冯友兰先生指出此点，甚是(《中国哲学史》)。唯以与希腊毕达哥拉派相同，则不尽然。盖各国均有象数之学，且为自然哲学之一大派。而中国象数之学，早于毕达哥拉甚

远。孟京易、纬书、象数之学者，盖出自“畴人”，即古之星历专家也。〔注一七三〕

**象数之学与京房**　各国数学，皆由具体算测进而为抽象公式的。其始多以物象表示，实例推演，工具运算（如珠算，筹算，算盘）。我国有两种黑白点子之数字方阵（一作五十点，一作十五点），即宋人称为河图洛书者，实为一种幻方，各国皆有之，殆古人教人识数者，或竟为一种原始珠算（筹加珠即算盘）。盖以圆石为算具也。其后则有筮。此一面用于占卜，一面用于计算。〔注一七四〕而所谓八卦九畴，亦与计数之术有关。其后数学发达，幻方早成陈迹，唯流传社会，渐忘其所以然。《左传》云，“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滋而后有数”（僖十五年）；为象、数二字之最早者。其后天文学发达，除观察家外，有更复杂计算。历算家乃另用筹策计算，即所谓畴人。秦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将五行哲学化，且牵涉音乐算术。《易传》及《淮南子》将卜筮之易哲学化，高升为经学。如是治天文历算者，乃极力仿五行配合法，而另用八卦配合天然人事，且以数学方法推演之（排列、组合，二分）。再阴阳五行说后，八卦九畴渐附有神秘意义，过去流传社会之幻方，亦渐附以神秘意义，并称为河图洛书（以下以汉人图书，宋人图书区别之）。于是有象数乃至图书之学。

汉初《易传》中已有象数之学。《易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此自古不得其解。其实大衍乃古代识数之名词（十为小衍，二个五十即一百为大衍，据《汉书》律历志及郝经之说）。而此段之言，不过仿《周髀算经》及三统历而为卜筮之法而已。《周髀》以勾股弦测天，有“勾股方圆图”，以简单数字表示之：

$3^2+4^2+5^2=50$

$(3+4)^2=49$

又《周髀》载古历法原则（即四分术）云：“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部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四千五百六十岁。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至三统历，立黄钟之宫律八十一为日法（九九相乘），以章十九为闰法，日闰相乘为统法（1539），三统法为元法（4617）。又推日月五星大周之公倍数为 7,879,680 年，于是冬至朔旦七曜齐会，是曰三统会岁。又以三会为一统，三统 23,639,040 岁，名太极上元。以统法除三统

会岁，得 5120；以元法除太极上元，亦得 5210，合之即“万物气体之数”（《汉书》律历志）。此《易传》之所本。近人有以三统历系得自易象者。我想是历法在先，言卜者附会为易卜；儒者不察（如刘歆），又附会于易学。于是形成一种“律算——测星——占卜”之三合物，此即象数之学。然倘无若干实测实算之功，亦不能有象数之学也。

又《易传》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指古幻方图。刘歆引此文并未称为河图。传到后来，即关朗朱子称为河图，刘牧称为洛书者。

至纬书而系统大备。易纬《乾凿度》云，“太一取其数以引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按张衡云，“律历卦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指图谶）”。则九宫非迷信。郑玄云，太一即北斗，居于中央，下行八卦，由坎宫至于离宫则周矣云（《后汉书》张衡传注引），当即当时观察星图并推算所用之格子。当时有以古幻方数字表示者，此即后来关朗朱子所谓洛书，刘牧所谓河图。〔注一七五〕

凡此之类，本极平常。唯其时为学者喜附经典而为配搭，故神其说以动听闻，尤以是故神其说以言灾异，辗转夸张，便流于怪异而已。

此中亦有儒者与数术家之争胜。汉初张苍最长历算。终绌于方士公孙臣，臣必甚通历算之人。及太史公等出，始胜过彼等。至宣元之际，儒者仅能以五行言灾异。而京房乃甚精历算音律之人，著有《律历》一书，所谈更为细密。正因如此，象数之学始大流行。谶纬据以立说，刘歆受其影响。《后汉书》律历志亦多据其说。直到贾逵、张衡测候之学胜过京房派之时，谶纬之说始息。两汉儒学是因能征服科学而盛大，而科学是因能将数术合理化而得以发展的。

阴阳五行说，以五行为主，不涉八卦。五行与八卦无关。十翼亦无言五行者，说卦传始以八卦配四方。孟喜京房乃以八卦、干支、四方、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相配者，又与十二律相配，并将五行合并在内。此即所谓卦气说。盖仿阴阳五行说而又推广象数之论者。其所言又较五行为繁琐。然此又表示当时方术之进步。京房为当时一天文历算学者，且欲以此论政，终殒其身。《汉书》云，“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云即孟氏学。刘向校书，诸易家说皆祖田何，唯京氏为异党。延寿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房明灾异，为石显所诛”（儒林传）。“隐士”者，盖

当时以天文(占星术)历算(象数)说易者也。彼等又称“道人”(京房传)。京房学问人格颇为时所重(后汉言方术者多本京氏易)。其他数术家遂均效之以配各经。治经者亦采其说。翼奉为齐诗名家,谓诗有“四始”“五际”,将诗配于五行干支,又将六情(喜怒哀乐爱恶)配于东西南北上下。此类纬书,固多穿凿附会之能事,然亦颇存古代社会史料(《白虎通》所引)。亦时有新奇之论,且含有科学民主思想者。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即出易纬,而地动说出于书纬(详下)。言灾异者又取此新说立论,所谓“考天心言王道之安危”。此初期之纬书也。

**纬书之谶化**　于是纬书由谈灾异进而为政治预言。我以为这是由方术进步与政治恶化而来。成哀以后,谶纬合流,而渐混为一。张衡云,“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当指此而言。王莽光武信谶,当又多附会者。流传至东汉,各经都有纬,名字也很古怪。据《后汉书》樊英传注: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璇玑钤,考灵耀……;诗纬,含神雾,……;礼纬,含文嘉……;乐纬,动声仪……;孝经纬,钩命决;春秋纬,演孔图,元命苞……。又有直称为谶者,如《春秋谶》、《论语谍考谶》。而其中遂益多“神怪之言”(王充)。最有趣者,则以孔子为大神,以灵异而生,为后世预言。有的说黑帝生孔子,得麟之后,天降血书,化为白书,曰《演孔图》,有作图制法之状。有的说孔子为汉帝制法,有的说孔子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传后王(春秋纬《演孔图》,《汉含孳》,《论语谍考谶》)。又有称为《河图》、《洛书》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 “谶、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私家撰述,渐杂术数之言,以神其说。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附会(孔子),遂与谶合为一。”

这区别是大体不错的。纬书原不荒唐,纬书谶化才荒唐的。王莽受此荒唐空气影响,又将这些东西和神仙、淫祀混合。光武不信神仙淫祀,却极信谶纬,并将他编定,视为圣书。光武封禅刻石言此类书“八十一篇”。“又其十卷,皆不昭晳”云(《后汉书》祭祀志)。《三国志》先主传群臣劝进表云:“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隋书》经籍志云:“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文王所受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孔子九圣之所增演。又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八十一篇。”在西汉,纬谶不过外学。到了东汉,成为“内学”(《后汉书》方术传),地位几在六经之上。朝廷大事

皆决之。《后汉书》及蔡邕集中传记，许多学者多“综览五经，兼明图纬”。亦可见其流行也。

这些东西，自不高明。故神其说可谓迂，但全以迷信斥之，则亦昧于学术发展之故。近人对汉人之易学，尤其是焦京之易概斥为方士易，即坐此病。如京房能预测日食；谓月无光，以日为光；又最早主张设考功课吏法，提高行政效能，终不容于宦官。以后王符亟称其人，郑玄亦读其书，对东汉科学，甚有贡献，决非妖妄之人。这一套东西中，非无合理之处。其错误在于方法。在零细科学知识进步后，有两种方法整理之。一是将这些知识和既成系统（五行、八卦、六经）配搭；并无区别的引用于社会与人事现象；这是纬书方法，所得是方术，象数之学，纬谶之书，八股文章。二是不肯定任何系统为不可争辩的真理，将已实证知识再实证于其他同类现象，以求更包括的可实证原理；并且，画分各种原理之有效范围；这便是近代科学方法。我们须知，这种配搭方法是人类所必经，尤其是有了经典以后所易蹈。但极易误人歧途。更危险者，是遇到政治恶化之时，他可以还原到更原始的神话与魔术。后期希腊主义时代占星术与哲学混合，先变为新柏拉图主义，后变为基督教神学，乃至文艺复兴期通神术。这和阴阳灾异以及纬书变为谶纬，是一个道路。我们还可自豪尚未不合理到新柏拉图及基督神学中的若干部分。〔注一七六〕还须注意，不仅古人可以走到图谶道路，今人只要用配搭方法，机械而夸张类推，皆可达到新的谶纬。在我看，黑格尔历史哲学，马克斯唯物史观，以至二十世纪斯本格勒和东比诸人哲学著作，都包含谶纬成分。马克斯以社会四阶段预言无产者专政，斯本格勒以春夏秋冬预言新凯撒主义之出现，其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虽有精粗之别，理论构造是相同的。时至今日，我们还有许多人以配搭为学，实为误用聪明之事，故论之于此。

至于纬书谶化以后，如下可见，引起很大的反对，然仍为许多人相信者，则由于政治原因。这些谶纬书中，有政治预言与政治批评。刘姓的人因其有刘氏受命之文而信之；一般知识分子因其中有政治批评而利用之。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也。

**神道与复古** 然而，这究竟是思想贫困，政治贫困之苦闷之象征。随政治之恶化，这一套东西愈向神怪退步，而神怪之说也愈藉这一套流传。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谓汉运已终，应再受命于天。朝

廷之儒如夏贺良李寻亦好之。唯刘向以为妖妄。然自此妖妄大兴。而愈妖妄才愈能使帝王动心。淫祀大兴,仙道复起。

儒者自多反对淫祀,不信谶记的。但京房萧望之死后,没有为国家制度谋改革者。他们另一条道路,即是复古。王吉贡禹匡衡刘向等都反对淫祀,反对奢侈,主张修德以求天意。但其积极主张,只是"述旧礼,明王制"之类。贡禹主张废止货币。此后复古空气日高。梅福以为只要尊孔,"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即谷永慷慨陈词者,亦集中于"动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其实根本问题固不在此。而代表后期西汉儒家思想者则刘向父子。

**刘向刘歆父子**　向(公元前七七——后六)歆(公元前五三——后二三)父子领校秘书,自是当时最博览的人。向治穀梁,而歆则好左氏。其论政本儒家之正统。刘向《说苑》云:"天之生人也,非以为君也;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刘向在哲学上另一建树,是重新讨论人性。自孟善荀恶之论而后,告子谓性无善恶。公孙尼子谓性有善有恶。仲舒既以阴阳论情性,以性善情恶,刘向以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于是有扬雄之善恶混,王充之有善有恶,及荀悦之性三品说。向歆父子最大贡献,尤在文献之学。观刘向《战国策》序,论西周春秋战国及秦代政治之演变,言简意赅。刘歆编定《七略》,判剖艺文,复精历算天文,于学无所不究。唯向歆父子亦如桓谭所云,系"通人而蔽"者。向得淮南书,即以神仙黄白可致。他不信谶纬,但笃信五行灾异,而此实较旧的灾异说。刘歆看见周礼,即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竟欲与莽定明堂兴教化。他对于谶纬则颇为动心。向见扼于王氏,莽则以歆为国师,不过利用其声名,其子与其本人,皆为莽杀。平心论之,实为书呆,也缺乏恬淡。然传授文献之功不可没。东汉初学者,多出其门。

## 史学始建者——司马迁及班固、蔡邕、陈寿

由上可见,董仲舒后,西汉之正统儒学,实无踵武之人;而在西汉之末,今文经学,已人穷途之境。事实上,经学乃前代所传,并非汉人所创,汉人之

功，仅在整理。清张金吾著《两汉五经博士考》，见于记载博士凡二百五十余人。若董仲舒、郑玄固在其中，其他无关于后世者为多。班固云："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数人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向传）。王充所推赏者为董仲舒、刘子政、扬子云、桓君山。他又推东番邹伯奇之《元思》、《检论》，临淮袁太伯之《易章句》，袁文术之《咸铭》，会稽吴君高之《越纽录》，周长生之《洞历》，子政子云不能过云。这些书均不传。可见汉人并不以经师代表学者。

汉代学问最胜处，实在经学之外，不过亦皆以经学为过渡。一为史学，二为玄学。此外，三，今学既敝，古学乃兴，古学虽经学，实不限于经学。四，政治恶化，有论政之书。过去依经论政，对皇帝论政，东汉则多抒己见。兹先论《太史公书》（《史记》原名），盖此书不仅为两汉著作之最高峰，亦有启发于以下三者也。

**司马迁** 字子长，龙门人（陕西韩城北），他年青于武帝十二岁，亦死于其后（前一四五——八四?）。其先世为史官，为武士，为铁官，为市长。父谈为太史令，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汉兴百年，天下遗文古书，毕集于太史公。"他年十岁，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南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复奉使巴蜀昆明。元封初（前一〇八）继父职为太史公令。太初元年（前一〇四），始作《史记》。又七年，以言论遭李陵之祸。为中书令，发愤成书。此不仅为成一家之言，实代表汉人一代最大之创作能力。此书之意义：一、著作之规模。其书多本古史及《世本》，然由他的匠心，构成一个天体。他本精于天文。十表象天干，十二纪象地支，八书象八卦，共象二十八宿，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毂一语，七十列传象车之齿数（按亦取孔子弟子之数）。一百三十篇，则象十二月及闰余（见自序及司马贞说）。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二千四百十三年之事。〔注一七七〕二是史学史识。他使历史变为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天文、地理、制度、经济、学术。于学术，注重实验，"天文……验于轨度"；于史事，注重年代学（表），注重考信，摒除神怪不雅之言。他注重文化史。对于水的利害，经济政治学术对历史的作用，都有深刻观察。他并有世界史眼光，对当时域外之国有"居国"、"行国"之分。三、他是一伟大民主主义者。说，"君臣并至使各自明"，"缘人情而制礼，因人性而作仪"，"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自序，礼书，

货殖传。)他美周公之和天下，斥秦轻百姓力与好战。医卜星相，学者博士，商人侠客，帝王将相，一律论述其贤不肖。全部《史记》是先民后君，伸张民权；指斥独夫与谀佞。其“微言大义”，多在序目及“太史公曰”之中。四是对历史的忠实。扬雄刘向服其“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班固称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实录”。因此被称为“谤书”。后曹魏明帝(曹叡)谓“司马迁非贬孝武，令人切齿”，是真不自量矣。五、是他的文章。文史本非一事，然文能副史，自是上乘，所谓“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他以浩然之气，发为江河之文，不求工而自工；即以文论，已足千秋。茅坤谓“蕴藉百家，包罗前代，胸有天下大势”，故能为天马之文，是也。六、由此五者，他提高了史学地位。他引董仲舒之言，孔子作春秋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明王道。继论拨乱反正莫于春秋，万物聚散皆在春秋。“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然后述圣贤发愤著书之意，而他承敝通变，述往思来，藏之名山，传后世圣人君子，自抒抱负。后人每以此为文人之常套，然他够资格说这话，乃以无比气力，无限热诚，开创一门大学问来教世救民的。郑樵云，“六经以后，唯此有作。”在他以前，史仅经之附庸。自此以后，经史并称，甚至六经皆史。孔子以讲学救世。而以数十万字系统著作救世，自史公作最光荣的开始(子书多弟子所记，且均单篇)。自从他开了这一体例，并树立史家之尊严与道德勇气，后世遵之修史，使帝王卿相有所忌惮，在无形中史学有安定国家社会之功。而他推尊孔氏，推尊夷齐，教育后世以是非善恶标准，其鼓舞知识分子者，真可谓深远了。班彪谓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真吕祖谦所谓“迂拘曲士之见”矣。如果董仲舒张骞是在事功上奠定汉代内政外交的人，则史公才真是汉代最大学者。〔注一七八〕

此一大作不仅为两汉最大光荣，亦中国最大光荣。无论希腊罗马多少人才，在此一伟大的人文史学家之前，皆当低首。甚至吉朋以前，西人史作，无此规模，亦无此识解。而至今使中国著作在全世界著作之林最无愧色者，我看还是他所创的史学，使中国为史学之国。我愿借此机会，建议今后大学当精选《史记》为基本国文教材之一。

**班氏父子兄妹**　《太史公书》后，续者甚多(如扬雄褚少孙等)。至《汉书》始本《史记》，详一代之废兴，为另一大作。

《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之合作，大部成于固(三二——九二)

手。王充年稍长于固，死约二年，固亦以窦宪之狱枉死。其书“文赡事详”（范晔语），唯创意较少。虽谓史公是非颇谬于圣人，而议论实多同司马。非战争，斥苛法，刺佞谀，讥神道。论爱群之义云：“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能胜物，不能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悦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刑法志）。“因史立法”（叙传）之言，见其卓识。论政治得失，学术源流，均能见其大，不仅网罗一代文献。固死，天文志及八表由妹班昭续成之，后又由马续（马援孙，马融兄）补成一部分。班昭授学马融，复传女诫。今日中国关于妇女道德观念，主要是班昭提倡的。《汉书》始为断代之体。惜“自此陈陈相因，无改斯道”（郑樵语）而已。

班氏父子以后，刘珍作《东观汉记》，卢植等补作《后汉史篇》，荀悦作《汉纪》，吴之谢承作《后汉书》，而一代史才，当推蔡邕，不幸被杀。幸曾本胡广作汉史志部，经谯周司马彪等，加以补充。至宋与范晔之纪传相合，始成今之《后汉书》。又汉末谯周作《古史考》，赵晔作《吴越春秋》，袁康作《越绝书》。又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而陈寿《三国志》，最为白眉。陈范之书，皆继踵马班存一代文献。然气力又称弱矣。

## 玄学及自然主义倡导者——扬雄、桓谭、王充、张衡

**扬雄**　史公发展春秋建史学，扬雄（公元前五三？——公元后一八？）发展易经建玄学。而皆有取老子。西汉末首倡老学者为严遵，著《道德指归》。班嗣（班彪从兄）“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汉书》叙传）。发扬老严之学者是扬雄。雄字子云，成都人。他的政治态度与文章之隐约和仿古癖引起甚多误解。但须知他是生在一个政治昏虐谶纬风行的时代。这是第二秦末之世。这不是一个可以明白说话的时代。明乎此便可知他之好为深湛之思，提倡好古乐道，是一帖时代清凉剂；而他的《法言》、《太玄》，是志在救当时今文儒学之敝，并为穷途儒学，开一新途径的。他以“玄”字将易与老子结合，主张因循自然之道，无为之为。“太玄赋”云“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但扬氏之学，仍以孔子为主体。《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他对当时申韩谶纬，都取批评的态度。他说申韩为奸道，斥当时谶纬为巫鼓之说。

他否认神怪神仙，说“有生必有死，自然之道也”。“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这实在说出儒家与阴阳家不同处。他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法，邹衍迂而不信，孔子才是入道之门。在政治上主张知民情，发中和。他说人性善恶混。所以有善恶由于气。最重要的是指出一个心字：“人心其神矣乎”，“圣人之言天也，圣人之道，群心之用也。”他甚至相信，“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他自比孟子，以复兴儒学自任。

他主要哲学著作是《太玄》。玄者，“自然之道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仁义道德礼智，要合五经”（自序传）。桓谭《新论》云：“伏羲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此乃应用三统历浑天说以推广易义。按易有阴阳（—与--），太玄则有一二三（—　--　-.-）即始、中、终。易有六爻，玄有四重，即方州部家（如☳，☰等）；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以配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易有六十四卦，玄有八十一首。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玄有七百廿九赞。二赞为一昼夜，故为三百六十四日半。他想以此“体自然”来通天地人。并用玄之一元论代替易之二元论。这自然是一种烦琐哲学，不脱配搭附会方式，以八十一首，分配于一岁之四时，而不问其根据。但加利略以前的文艺复兴期自然哲学家，其思考方式也是这一路数。他教人“体自然”来研究学问，毕竟是对科学之进一步接近。他的批评精神影响了桓谭王充，他批评谶纬，研究古文奇字，也推动了古文学之兴。其刻意为文，品藻人物，也影响东汉的风气。在思想上，最大的影响在谋孔老之融合，并将黄老术和儒术变为黄老学和儒学而综合之，使儒家由政治走向自然，扩大了儒学之天地。于是有贾逵马融宋衷之学，使古文经学包括天文与老学；以自然法论天，则有张衡陆绩等浑天之学；以自然法论政，则流为仲长统王弼嵇康等愤世之言。其人其书对当时思想启发之功是很大的。影响所及，一般人以玄为名号（如刘玄，郑玄，刘玄德，夏侯玄，玄通先生，玄行先生，玄晏先生）。至于魏晋六朝，乃有玄学，与儒、史、文齐立。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代的国学，老子与五经并列。王通之《文中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模仿《法言》。韩愈于孔孟外，亟称相如子长子云。到了宋代，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行成仍对《太玄》加以研究和模仿。而近代之西方布鲁诺、莱布尼兹，亦以数理和“玄子”论哲学者也。〔注一七九〕

**桓谭**　桓谭字君山，与扬雄年相若，而卒稍后。亦扬雄思想之发展者。

曾为王莽典乐大夫，后仕光武之朝，因反谶被黜。其书《新论》不传，有辑本。大意尊王贱霸，非图谶，无仙道，综核古今得失，以及仪象典章，人文乐律。他批评当时“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对汉代学者，贾谊刘安而后，唯推崇司马迁扬雄为通人。自孟子区别王霸后，他对王霸两种政治，有最好的说明：

“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孔门不言五霸，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严可均《全文》引）

用今日名词说，王道即民主，霸道即独裁。仲尼之门，羞称五霸。况霸之奴，霸之余乎？王充云：“《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词，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此可见东汉批评精神，大受司马迁扬雄桓谭的启发。桓谭的书，又颇涉物理博物，影响杨泉傅玄甚大。

**王充** （二七——九一？），少孤贫，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卖书，一见辄记。以俗儒失真，闭户著《论衡》。他的根本思想是“疾虚妄”。他不甚用玄字，而用“自然”。“天道自然，无为；黄老家论天道，得其实矣。”他说“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人为万物中有智慧者也。他反对神异迷信，以为一切皆事理之必然发展。他是命运论者。人之凶吉祸福，纯为运气。而此命几乎是预定的。他反对董仲舒一流的天人合一论，反灾异谶纬，以鬼神之说，出于畏惧之情。人死即如火灭，决无有鬼。他最了不得的见解，是“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这是十分科学的。其论天象，颇重观察，唯信盖天。对人性持三品说，但教化可以使恶为善。于政治仍主礼乐，主张儒生治本，文吏治末，才是正当的政治。法吏不知经学以治国，犹医无方术以治病。此则仍为儒家之言。他分儒者为著作之文儒，说经之世儒，斥章句小儒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他反对崇古卑今，以正小儒之失，谓“知古不知今为陆沉，知今不知古为盲瞽。”《问孔》、《刺孟》及其他诸篇，虽见其批评精神，亦多故事炫耀之处。其所征引，多齐东野语之类，唯亦有许多新颖资料（如变虚篇记齐时太卜即有地动之说）。《宣汉》至《须颂》不免自相矛盾。这在当时自是一部奇书（蔡邕得以为宝），不过，近人亦不免过誉而已。

**张衡** 西鄂人，生于公元七八年，卒于一三九年（顺帝四年）。幼贫，敏

而好学。游太学，通五经六艺。与崔瑗为友，而学尊扬雄。尝谓“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汉家二百岁之书也。”他是哲学家，作太玄注。是一史学家，为太史令，参议汉家典礼，评论迁固之书。是一经学家，“通五经”，著《周官训诂》。是一艺术家，“善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一大文学家，作《两京赋》，《怨篇》，《定情赋》，《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等（陶潜《闲情赋》，《归去来辞》，实受其影响）。是一政治家，为河间相，不畏豪强，有政绩。他最杰出的，是一科学家。“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报告观星者以星之出没时间（世界最古时钟）。又作地动仪（世界最古地震仪），自动车，自飞木雕，指南车，测日土圭。又曾造飞鸟历，著《算罔论》，地形图。他著《灵宪》释浑天说，以万有始于太素，言宇宙之形成，略同淮南；谓月光由日而来，出京房，月蚀由地所蔽，同王充。他说微星之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大宇宙是无限的，而我们的宇宙之径为二亿三万二千里。唯还不知地动之说而已（《后汉书》本传，《隋书》天文志）。崔瑗说他“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赋辞丽说，奇技伟艺……”。他可说是中国的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参看孙文青《张衡年谱》）。反对谶纬虚伪不实，使科学走上实测之道路，是他最大功劳。

## 由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贾逵、马融、宋衷、郑玄

当今文之学日益囚于现实阿附时君，杂于谶纬之时，有反对派及改革运动。此一方面表现为古文学者之守死善道，一方面表现为老学之复兴。二者均助长考证与批评精神。司马迁以博学通才，受老学之家传，从孔安国问故，已表现此一趋势。孔氏世传古文尚书，其后刘向父子校领中秘（图书馆），皆“好古博见强记”。其时张敞、尹咸、翟方进（刘歆尝从问学）、徐敖、王璜、涂恽、桑钦等治左氏古文尚书及毛诗。又自严君平后，老学大兴。扬雄益弘厥旨。扬雄刘歆出，学风一变。扬雄之学，至张衡宋衷而盛大，为玄学先驱。古文之学，以刘歆为护法，至郑玄而大成，成经学之统一。前者以自然反对天命说，后者会通古籍，考订古文；皆攻击谶纬，使今文学动摇。

到了东汉，官学虽仍为今文学，古文学自成潮流。《隋书》经籍志云：

“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行于世。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俗儒趋时，益为其学。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遂因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为之古学。”

光武所以崇尚今文，即因其有谶。《后汉书》郑兴传云：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非之耶？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仍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到了章帝时代，贾逵为了求立左氏，竟采取一种便宜战术。贾逵上奏云：

“光武〔时〕，左氏穀梁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独《左传》有明文（案：《左传》有‘其处者为刘氏’）。”

范晔云：“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哉！”孔疏亦指“其处者为刘氏”云：“插注此词，将以媚世。”

这固然表示贾逵手段之不光明，也充分表示当时官学之鄙陋。尽管东汉官学，仍十四博士之旧，朝廷亦援五行灾异决大事（如曹褒所定之礼），然学者心知其非。古文学者，如杜林、杜子春、谢曼卿、卫宏、郑兴郑众父子、贾徽贾逵父子、许慎、马融、卢植、郑玄、服虔，并皆博洽多闻，兼通五经，号称通儒，古文日盛。另一方面，桓谭、王充、张衡、蔡邕、宋衷，均发表批评精神，推尊玄言。在反对今文谶纬上，两派是合作而且勾通的。例如桓谭王充，皆左袒古文。许慎注《淮南》，马融注《老子》。这便造成魏晋古文玄学合流之势。神怪之说，遂以澄清。东汉之末，太学清流，党锢名士，皆不重谶纬，甚至绝无谶纬之余习。

**贾逵**　东汉古学大师为郑兴贾逵。《后汉书》云，“郑贾之学，几乎数百年中，为诸儒宗。”贾学之传尤盛。郑兴及贾逵之父，皆刘歆门人。又皆兼通诸经并通历算。逵尤博洽，诸儒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著经传义诂周官解故等百余万言，又造黄道仪，参正东汉之历。又与班固同时校书。而为东汉经学之殿军者，则马融、宋衷、郑玄。

**马融**　马援侄孙，少张衡一岁。注诗书易论语，也注老子、淮南、离骚，

同时也研究法律。子弟千数，卢植郑玄皆出其门。唯品节不为士林所重。他达生任性，称道老庄。老庄连用，东汉似以他为最早。与崔瑗均好为碑颂之文，则蔡邕之先行。

**宋衷**　(忠)，字仲子，南阳人。灵帝死时，刘表镇荆州。表为党锢中人，故知识分子逃难者多归之。表立学校，求儒术。由宋衷、綦毋闿等撰《五经章句后定》，又有所谓《荆州八袠》。王粲，文字学者邯郸淳，黄老家刘先，文学家刘廙均参加著作。一时荆州为文化中心而宋衷殆为领袖(《后汉书》刘表传，《南齐书》王僧虔传，《三国志》王粲传，王粲《荆州文学记》)。自王粲以下，其后皆归曹操。宋衷后为曹丕所杀，其著作仅存断片。他与司马徽均讲古学，而其古学，依准贾马，而不同于郑玄。宋衷又作《太玄解诂》，盖以老学说经者也。厥后魏之王肃，蜀之李仁尹默，均由司马徽宋衷受学。而宋衷《太玄解诂》，传于吴会，吴人多研究之，陆绩范望均有注解；虞翻陆凯，均好太玄。又宋衷推崇许靖，靖为劭之兄，后入蜀为司徒。司马徽与诸葛为忘年交，亦荐之于刘备者，亦可知其学术之渊源。后魏晋间之王弼，乃王粲族孙，刘表之外孙子。亦可见荆州学派与三国及魏晋学术关系之重大矣。(《汉书》扬雄传注，《三国志》王朗，李譔，许靖，尹默，诸葛，陆绩诸传注，及《世说》注。)

**郑玄**　郑玄字康成(一二七——二〇〇)，北海高密人。少为啬夫，后入太学，习孝经、论语、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由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其后问学马融，客耕东莱，遭党锢之祸，始隐居教授著作。所注易、诗、书、礼、论语、尚书大传、中侯及天文七政及驳许慎临孝存之书，凡百余万言。又答弟子问难《郑志》八篇。东汉左氏早甚流行，及郑君注毛诗、古文尚书、费氏易，以及周礼等，自此今学日绝，而古文日盛。盖东汉之儒，多兼治今古。郑氏始为今文之学，并通谶纬，由今入古，遍注群经，“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囊括大典，网罗多家”(《后汉书》)。郑氏说经，与贾马纯古学又有不同，盖亦取今文；唯以古文兼并今文，诸经因郑注流传，遂使今古统一。世以郑氏混淆师法，实则有综合之功。又《晋书》刑法志云，“旧时秦汉之律，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魏世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云。汉世儒吏分途，而自郑氏言律，则使法律儒学化。此王充所谓“道明，贤儒乘俗吏(骑于其上之意)；道废，贤儒处下位”者。扬雄以后，儒者已征服黄老；郑玄以后，儒者又征服刑

名矣。

然则以什么征服刑名？曰，礼。郑玄遍注群经，而最精三礼，所谓“礼是郑学”。他将礼记周礼仪礼折衷，以为昏义（《礼记》中一篇）所云为夏制，王制（《礼记》中一篇）为殷制，周礼为周制。这虽不一定有何根据，但对古代礼制作精勤的研究，成为可读之书，使六艺重心，由易与春秋转移于三礼，造成经学又一大转变，开辟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公扬雄以后，郑玄是影响中国历史最大之人了。

郑玄所以造成重大转变的，在他以其卓绝人格，渊博史识，使经学真正成为一种新学问。汉人以经为术，为利禄之途。史公另树史学，扬雄将儒学附以哲学意义，而郑氏则以绝伦精力，将五经变为一个严正的制度考文之学；亦即政治经济学。此外，以《孝经》为六艺之总汇，也是由郑玄提倡的。盖以孝为政治经济之基础也。

但郑注并非没有哲学意义。如《乐记》注云："道谓仁义也"；"理犹性也。"其注《中庸》"仁者人也"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虽简略，实后来唐宋韩愈"原道"及张载西铭"民胞物与"说之由出。

**赵岐**　最后还有一人应该一提的，是赵岐。他饱经忧患，后郑玄一年死。他在思想上一大功劳，是表彰孟子。文帝时，孟子立博士，其后博士仅有五经。盖民贵君轻之说，不为汉王所喜。此后扬雄王充颇推孟子。其后刘陶提倡孟子。至岐始为章句，宋人尊为四书之一云。

由此可见儒学不是一个自足的学派，而是一扩张的学派。最初儒家讲诗书礼乐。孟子言春秋。邹衍荀卿则包含阴阳刑法之说。秦汉之际，儒家包含了易。汉初之公羊家，融合了邹衍与墨家。扬雄融合了黄老。贾逵郑玄则融合了两汉的科学与律学。儒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学派，常有其同盟军。今文学与阴阳谶纬同盟，而古文派则与黄老及更合理的科学同盟。后来今学自封，古学不断扩大其范围与同盟。此儒学所以盛大，亦古学胜于今学之故。

及两汉政权沦亡后，汉人所培植发展的经学之种子，早已传播下来。这一面由宋衷传于魏蜀吴，一面由郑玄传于河北及蜀。以后一发展为南学，一发展为北学。而南北经学合流，便出现隋唐之统一。这是我在下一卷中要追寻其足迹的。政权皆有死，国无学不立。唯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的。

## 经今古文之争及其批评

上言今古文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故此段略论其真相。

在西汉初期，今古文并无截然之壁垒。如兒宽事伏生，又受学孔安国。汉末翟方进治穀梁，亦好左氏。而同一今文，反多派系，如诗三家，书三家等是也。成哀以后，以争立学官，始渐成今古之水火。而后人之党同伐异尤热心于前人。荀悦《申鉴》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仲尼邈，先师殁，将谁使折之也。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郑玄而后，古学独行，至宋人始批评古文，故宋世经学，又有与今文接近者。欧阳修胡宏疑《周礼》为伪作。清初姚际恒广列伪书之名。至清中叶，公羊再兴，进而考今文遗说。刘逢禄始以左传经刘歆窜益。至廖平谓刘歆为"圣学莽操"。康有为据之，以古文皆刘歆伪造以佐王莽者，故称为"新学伪经"。一时甚动听闻。刘师培力为古文辩诬，章太炎则力辟今文实谶纬妄说，而刘歆功继孔子。直至今日，争论未休。

就文献价值言，凡经传之类，皆古代典籍与史料，无论今古皆有价值。古文并不否定今文。唯今文自以为完备，只此一家，此不可赞成者。

就训诂而言，皆足供参考，应比较研究之，皆非可以尽信者。如尧典"璇机玉衡"，今文以为北斗七星，古文以为浑天仪，古文显为后起之说。又如尧典"大麓"，古文以为山林，今文以为"录尚书事"，今文显为后起之说。此各有长短也。

其有关古代礼制者，班固《白虎通义》，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可见一斑。关于国家，今文（王制为主）全国分五服，方五百里，古文（周礼为主）分九服，方万里。官制，今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少；古文则三公三孤以外，六卿以下，官至万人。古文显为后起之说。关于社会，古文所说，较近人情者为多。然亦证明今文亦颇存古俗。故今文近"古"，而古文反近"今"也。

其有关经义者，如今文以象数说易，公羊义法说春秋，五行灾异说书；古文易则以传解经，春秋以左传史事解经，书亦以古史解经。古文较为平实，甚为显然。诚然，古文毛诗迂拘，盛言美刺，为宋以来学者所讥。朱子据《后

汉书》卫宏传“宏从谢曼卿学，因作毛诗序”，明诗序非子夏毛公之作。然观三家诗遗说（鲁诗遗说甚少），亦多以美刺为言。而穿凿及不近情理处，反较毛诗为甚。毛序殆综合三家之说，而特别注重人伦德教者。诗序云，“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毛诗所说，固多离题万里者，然亦汉人以三百篇当谏书之必然归趋也。而今古所争，亦不在此。

真伪之争，性质最为重大，最为千古疑案者有三：

其一，相争最烈者，为左传、公羊。今文派以左传不解经。桓谭云，春秋无左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此一问题前已论及，即左传与春秋乃有关之书，但不一定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公穀是政论，不是历史。

其二，性质最重大者是《周礼》。《周礼》晚出（本称《周官》），即在两汉，或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斥为六国阴谋之书。今文派力斥为刘歆伪造；古文派则又力言其确为周公所作。折衷派《四库全书提要》以为周公所作，但未完全实行，如唐之《开元六典》，宋之《政和五礼》然。但封国、官制、九畿，不合《孟子》、《书经》；则断不能谓为周制。而太史公引之；林孝存谓武帝疑为末世渎乱之书；文帝时乐人献书，乃《周官》大司乐章；则汉初有之，不能谓为刘歆伪造。所以我在前面说到此为战国末期儒者之理想国。自此书出世，其对政治思想影响之深长，殆无与伦比。虽然王莽欲见之实行而失败，一般学者仍极尊崇。所以然者，在积极方面，汉人需要一个有根据的大一统的制度。在消极方面，两汉以来，一般人对政治上有两大痛苦问题，一为皇权扩张，官同虚设；二为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周礼》设官分职，有一整然之行政法。汉代中央虽有制度，常受帝王私意干涉，加之国家扩大，还是丞相专任，还是三公分权，在西汉末年已是一大问题。次则井田之制，本为古今二派共同之理想。但孟子王制言之未详，而《周礼》则规模甚备。在土地问题日趋严重之时，自亦为人所重视。此外乡举里选之制，兵制，山泽归公之制，均有一定之办法。又《周礼》关于天子口腹妻妾之制，诚极荒唐，但较之武帝后宫数千人，桓灵后宫数千人，已经大有节制。《抱朴子》尝谓帝王贪淫无度，唯行《周礼》略为节制，这也是一般学者重视他的原因。在汉初，国家安全根本有问题。一般人谈世务。武帝以后，国家安全无问题，问题在皇权之无法。所以一般学者皆谈“法度”。但在崇古空气下，法度只好求之周孔之道。明堂之说，推致之说既已落空，只好在行政制度上谋改进，所以《周官》也就为人所重视崇信了。《后汉书》百官志云：“周公作《周官》，分职著

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来事之范，殆未有所穷也。”《周礼》价值，正在有法胜于无法。自杜子春由刘歆受《周礼》之学，至东汉，郑众贾逵张衡马融郑玄均为作注。汉末论政之士，如崔寔、仲长统，均以行《周礼》为救世之方（唯区博荀悦，知井田不可复）。及郑氏注后，流传河洛。其后北魏试行而成功，于唐代影响甚大。宋王安石行之而失败，然张程朱诸子仍极尊信。朱子且云，“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明末诸儒，对《周礼》亦不能忘情。明清六部，实以六官为蓝本。太平天国之制，亦受《周礼》影响甚大。清末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进化时，孙诒让亦以《周礼》多近西方制度而表彰之。在我看来，《周礼》果真实现，如柏拉图之“共和国”一样，将为一斯巴达式之国家，亦即一集权专制国家。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而论，因代表封建到郡县过渡期之理想，除史料价值外，对于绝对王权，犹有限制之意；而对于行政制度，有参考之价值而已。

其三，问题最复杂者为《尚书》。今文派以书经二十八篇为备，后得泰誓为廿九篇。孔安国本多出十六篇，在当时未被承认。泰誓真伪亦有问题。成帝时，出现张霸之伪古文尚书百两篇，其伪为定论，书亦无传。东汉初，“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出以示卫宏徐巡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卫子徐生复能传之，是道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不悔所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后汉书》杜林传，儒林传）。汉末刘陶又集今古文尚书为《中文尚书》，后亦无传者。据陆德明《释文》，则“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今日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出于东晋初梅赜所献。宋代以来，世多疑者，清人阎若璩详细考证，认为伪书，今通称《伪孔传》，几成定谳。我以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并有昌明民权价值；详续卷。〔注一八〇〕

要而言之，今古文之学，是朝野二派之学，其废兴是一种自然之演进。最初的今文学，讲求致用，甚有生气。到后来严彭祖（董仲舒再传）诸人，仍有执经守道之风。不过西汉今文经学与皇朝关系太密，内容逐渐干枯。其先或欲借灾异改革政治，随王权之硬化，日益带神学色彩。若干不争气之儒生，几乎要将孔子变为教主。谶纬之说，几乎衍为一种王权神授论。王权或神权皆不足畏，唯二者结合，将民不堪命（如欧洲中世，俄国有史以来皆如

此）。这是中国学术一大危机。幸有古文之学起而矫正。就个人而言，以好古之笃学，代利禄之追求；在学问上，以古代之政法，代“孔教”之制造；以自然之论，破神怪之言；并以道德之提倡，代非常之异义。诚然，古文之学，并不能完全与谶纬绝缘，但大体而言，古学是今学进一步之人文化，合理化，民主化。再者，今文之经文具在，经义亦大体可知。他只是自然融解于古文中。他并未失传，尤非受古文压迫而失传的。

清末公羊派以今文之亡，即圣学之亡，自称“孤绪微茫接董生”（夏曾佑）。以公羊三世之说，附会进化，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为变法张本，虽时代之空气，亦有进步之意义。但在学术上说，究不过一种宣传。皮锡瑞至以纬候足征，尤为热心过度。至谓古文皆刘歆“伪造”，实仅罗织之词（参看章太炎刘师培诸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仅可供谈助，而无当于事实。王莽乃今古之学并皆利用之人，其用以诬民惑世者尤在谶纬。而凡所谓“伪经”，无一不出刘歆以前；刘歆并时之人，仅谓其毁旧章师法，无言其伪经者。于是康有为乃不得不谓《史记》亦为刘歆所伪，班固乃受其欺，尤不近理。不仅刘歆一人无遍伪群书之力，凡万目睽睽之书，皆非一人所得而伪。即所谓《伪孔传》者，亦汉晋间人缀拾旧文而成，非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任何一人所能伪造也。今文之兴，非武帝董氏之力；古文之兴，亦非王莽刘歆之故。

学派之持久兴衰，皆由于社会的自然淘汰。近人不明乎此，如钱玄同顾颉刚等志在惊人，以刻意疑古为能事，以新今文派自居。纵非以此炫奇为捷径，亦误于不知学问应以求是为目的，非以疑古或泥古为目的也。

伪经之说，始于廖平。平初著《今古学考》，以今古之学为孔子初年晚年之说，条举其不同。其后著《知圣》、《辟刘》二篇，倡刘歆伪经论。然此后又有所谓小大之学，以王制治中国，周礼治世界。其后又有“人天”之学。自言学有六变。康有为或钱玄同等但拾廖氏二变之学，而周予同君则拾其《今古学考》，列为今古文异同表。辗转相传，今教科书中多载之。其中非无是处，但据为典要，甚可误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不知今古之别。但如果以为今古真是两种壁垒，而不知今古每一派之中，亦有不同，而今古二大派后来反逐渐融而为一，则反而将问题弄糊涂了。

我非偏袒古文学派。以书籍而言，如上所说，凡今文派所尊信的书，倒比较多是近古的。但如谓公羊所传皆孔子之真意，则不可信。古文派的书

籍，也是先秦旧籍，但《周礼》当在《仪礼》之后，如果说是孔子乃至周公之书，便不可信。今文派过信公羊穿凿与古文派过信《周礼》之实在，其失维均。前者之教权主义，后者之复古主义，皆不可为训。他们都是戴其颜色眼镜说经。毛诗与三家诗也都是不可尽信的。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时代国家的学问都要受时代限制，带入主观的见解。研学术史是最有兴趣的学问，其目的在增益我们智慧，不在守一派一先生之言，做古人之“部曲”。因此，须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经学。因此，必须考虑到他们眼镜之颜色，我们也才愈能接近真相，也愈能得到启发。丁宽之易，孟京之易，荀爽之易，王弼之易，干宝之易，关朗朱熹之易，只是秦末西汉东汉魏晋宋人之易，都不是周易。他们都是借题发挥。因此，研究古人著作，在各归原主(此意龚自珍言之)，辨别本来的和引申的；辨别因革损益。因此，古书真伪问题，亦即在还其时代。如《伪孔传》信其真为三代文献，即伪；且必误解历史。但看作汉晋人作品，不仅不伪，且实有绝大价值。所以一切是非真伪，在我们所出“价钱”如何而已。

更当知者，正因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我们如只是停在古人所在之地，就失去学问之目的。我们的凭借与材料更多了，我们应以遗产为资本，当代为标准，世界为规模，经营更大的学问。今日还要标榜今古汉宋，决非古人所望于后人。贤父兄一定是希望其子弟能够自立门户，一代胜似一代的。况今日是世界大通时代。对外争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谈读经之士所当知的。

若专以今古废兴而言，还有一大教训不可不知者，此即章太炎所云，“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此不磨之论。今文之学，继黄老刑名而兴，实有建树。及成官学，阿世诬民。于是老学古学复振。魏晋南朝是老学世界，结果流于虚无，只为佛学开路。北朝古学大兴，至隋唐而为官学。其间佛学亦趋支离，禅学乃起于民间而为改革。至宋人起而反对汉唐注疏，同时则与禅学携手，此即所谓理学。此理学历南宋元明为官学，其后王阳明起而改革。由此可见：一、真学问必出于民间；二、学问不能脱离大政治，然不能恃现实政治权力之保护；三、学问目的诚为致用，但必由纯学问出发，始能成学问之大用；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学问总须求胜。过去还不过求胜古人，今后还要求胜外国。然求胜之道，在如蜜蜂采

百花以炼精华，方法与功力并进，决不是可以忽然掘地得金，忽然路遇异人，或忽然正中头彩也。

## 论政之书——潜夫论、政论、昌言

两汉人喜谈政治。西汉论政，多向皇帝上奏议，或假注经立言。自太史公扬雄在他们的历史与哲学中论政，桓谭《新论》，是以论政为主的。到了王充有专门论政之书。他说“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作政务之书”；不传。此后作者，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最著，而三人的倾向不同。

**王符**　与张衡崔瑗马融同时。前面我已颇引其说。他的重要思想，首先是儒家的民本主义。“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国以民为本，君以臣为基。”“天之所甚爱者民也，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似此之言，不一而足。二是爱惜民力。此意盖本于扬雄。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礼义生于富足，盗贼生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生于无日。”他之攻击贵戚浮侈，在于浪费民力，浪费时间。时间即价值。这是很实际亦很有思辩的见解。三，汉人有崇本抑末之说。王符之本末论稍有不同。“富民者，以农桑为本，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最后，他特别注重选政。他在说了“天以民为心”之后，说：“君以恤民为本，政以选为本。选举实则忠贤进。选以法令为本。法令正，则选举实。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国家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

**崔寔**　崔瑗之子。瑗为古文之学，且好老子。而崔寔《政论》，则力主严峻刑法，舍王图霸，并认为“刑罚为治乱之药石，德教为兴平之粱肉。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病”（《后汉书》本传）。王船山说他是“仁义之蟊贼”；其后荀悦钟繇申言之，曹操决行之，启百年严酷之政；殆“百草欲衰，而鶗鴂先鸣者”。然寔生桓帝之世，其言殆有激而发。他也说如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行井田而作礼乐，亦可为宽。他所谓严刑，实欲对付权贵。唯忘记以刑治乱，不过火上添油，多半还是刑到百姓而已。

**仲长统**　前面亦颇引其言，此处特别提出二点。第一，他很赞成崔寔之《政论》，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又力主行《周官》之政。另一方面，作《乐志论》曰：

“思老氏之玄虚，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又诗曰：

“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他在建安初（二〇六）仕于曹操幕府，死于曹丕称帝之年（年四十一），已开竹林之风气了。

其时刘廙《政论》，刘劭《人物志》，皆以法家名家之言，主张考绩之法，及为人物品第，后来成为九品中正之制。而以儒家立场立言者，则荀悦《申鉴》，徐幹《中论》。此正赤壁战时（二〇八）。继而刘备诸葛入蜀，另一时代（三国）开始了。此老庄与刑名复活与曹操专权的建安时代之事，将综述于次卷，说明三国之形成。

## 科学

今日所谓科学，汉人分别列于术数、方技或方术。《汉志》有术数、方技二略，《后汉书》有方术传。〔注一八一〕如上所言，方术乃科学而与宗教巫术相混者（王俭且以方术宗教合称术艺，阮孝绪称技术）。天文、历谱，一面研究天象与算术历法，一面与望气、服色、灾异、谶纬相杂。五行乃研究钟律音乐度量衡者，为五行说所从出，又为灾异说本源。形法乃研究水地、人物、六畜之性，人畜之健康器物之利钝者，亦与看相堪舆不可分。蓍龟为易学所由出，杂占又包括教田、相土、养鱼、种树。方技之中，本草医方与神仙房中相提并论，黄白（炼金）之术亦出焉。此固中外同然；天文本出占星术，化学本出炼金术也。但是，此在周汉之际已逐渐分化。其神秘化者将论于宗教之节。而其中合理主义成份逐渐发展，则卓然成为独立之科学。此外，如九流中之农家，兵家中之兵技巧，固自始毫无神秘主义之色彩。此均将论于本节。我们将可看出，汉代天文历算农工理化工艺，在理论上实际上完成许多重大成就，为以后中国科学之基础，即在世界上，亦放射异彩。汉人所造于中国者，岂仅经学而已。

## 钟律与度量衡

《汉书》以后，律历合志。朱载堉云，历者礼之本，律者乐之宗。古代施政大事是天时水土。所谓观象授时，敷土作贡者是也。由天地之测量，而生历算。又古人觉察到天体、度量、数字、音乐，皆有一种调和与比例之关系，故乐律、度量衡、历法、天文、数学，常不分离，发生配搭。《尧典》所言古代要政，首即“敬授人时”，“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益稷》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古文作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此后律、历、数之事皆太史掌之。〔注一八二〕

钟律，以长九寸围九分之管为黄钟，十一月吹之之声为宫，三分损益之以得十二律，是我国音乐历法和度量衡之基础。汉人尤在这方面用心思。太史公说，“六律万事根本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说：“一十百千万起于黄钟之数，宫商角徵羽起于黄钟之律，分寸尺丈引起于黄钟之长，龠合升斗斛起于黄钟之龠，铢两斤钧石起于黄钟之重。”又记汉武定太初历云，“落下闳运算，其法以律起历，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所从出，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其后京房以管声不调，而以十三弦定六十律，称为“律准”，为刘歆三统历之所本。甲子纪年法亦由此出。

音律与实际推算，不必有关系。其所以发生关系由于通过度量衡。黄钟定度，量衡随之。测量单位由此标准化。由黄钟之管以定容积，而圆周之率，遂即由此试验而定。为换算之便，汉代度量，完全十进化。衡承旧制，用四八进制，但铢以下亦作十进。《左传》，“齐旧四量，豆、区、鬴、钟”。《考工记》，卓氏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刘歆本此作铜斛尺，斛方尺而圆其外（外切圆）。其尺即汉晋法尺（约合今市尺七·一一二五寸）。

其所以音律与度量衡发生关系，则由自古以来，我们注重和——调和的观念。音响不同原由于空气振动之频率不同，而乐音之频率则有规则或成比例。此对度量衡之考究制造，与十进法之普及（详下），及其他仪器制造之精密化，皆有关系。因此对天文历法数学乃至声学（至朱载堉而大成）之进步，亦有贡献。然而，自然与社会究竟不是都成一定比例的，所以混律数为

一谈，亦限制其更进一步之发展。〔注一八三〕

## 天文

古之所谓宪，首指历法。天文历法，皆起于农业需要。“授历明时”，首先为了农时。而天文则历法之本。〔注一八四〕

西洋天文学，由占星术来。中国天文之学，本有二派。一言星象，如《周礼》保章氏，观星以辨妖祥。此主占卜，西洋所谓占星学。二为历家，如《周礼》冯相氏，观星以辨四时之叙，此主测验，则纯正之天文学也。中国天文之学，自古亦分为二途。太史公言二者渊源，似以为皆出重黎、羲和、巫咸、史佚、苌弘、子韦、裨灶、甘公、唐昧、尹皋、石申；而前者日者龟策附之（日者即“汉志”之杂占，龟策即蓍龟）；后者畴人附之。畴人即筹人，即算者。此后各史“律历”、“天文”分别为志之故，亦由于此。唯在元代以前，亦始终相混而已。

古人观天，首先察日月之运行以定季节。三千五百年前，廿八宿适当赤道，故我国与巴比伦、印度之历法皆以赤道为坐标。唯埃及希腊以黄道为坐标，周代以后，东西洋都以太阳高度定季节，盖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乃有圭和表测影之法。此即《周髀》所记之术，亦《周礼》所谓“以土圭之法测土深（纬度），正日景，以求地中”者。二十八宿亦逐渐增加神秘色彩（占星），或化为神话之想像（如牛郎织女）。〔注一八五〕

春秋战国之际，天文家辈出，观察五行星运动（木，岁星；金，太白；土，镇星；火，荧惑；水，辰星）。盖五星周期皆有一定已为古人注意矣。于是有楚甘德、魏石申《星经》（约一百二十余），此世界最古之星图（约前三五〇年）。此天文学一大进步。而后期阴阳五行说，又由此而立其根据。太史公所谓“天有五星，地有五行”者是也。

汉代承此基础，在天文学上作画期的进步。由于我国对星象保有长期记录，到了汉代，复改进观测方法，遂得推各星与日月会合周期，日月交食周期，修正历法，并对天象作系统的理论的研究。战国以来，法天之思想大盛（如《周礼》六官，辀人）。宇宙尤为汉人最感兴趣的学问。哲学与政治，皆以法天为言；而著作之体裁（如《史记》），艺术之题材（如云气图案），乃至宗教之趣味（神仙），亦集中于天体。

周代以来，天体有三说。首先是天圆地方，天上地下之说。此即《周髀》“盖天”说。周末有二新说出。一为“浑天”说，以天地皆为圆形，地在天中。二为“宣夜”说，大意谓天无质，无限，“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行止皆积气焉”。汉初“宣盖沸腾”，郗萌主宣夜最力，但浑天终占势力（《晋书》天文志）。浑天既胜，盖天亦修正其说，即《周髀》所谓“天象盖笠，地法覆槃”者，即以天地乃两个平行的弧形也。但终不胜浑天说。

浑天说确本于更精密之观测。我国自古有灵台，为观象之所。汉曰清台，又曰候台。武帝时，由老天文学家唐都分天部。落下闳始造浑天仪。以前多以肉眼观天，《尧典》所谓璇玑，原指北极，玉衡指斗九星。至汉人乃造器观天，称浑天仪为璇玑。玉衡乃长八尺，径一寸之长筒，“转玑窥衡，以知星宿”（《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星经》，《史记正义》引蔡邕说）。即一种望远之具也。日晷漏刻，古已有之。汉则造铜表，置长安灵台（《玉海》引；明朝之表至今尚存）。古制刻漏，昼夜百刻（《尚书正义》引马融说）。汉代其制益精。《后汉书》律历志云：

“圣人之作历也，观璇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璇衡追日，光道（黄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月有交，亏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见，步术生焉。见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数生焉。……”

汉人在天文上之一大进步，是浑天仪制作与改进。落下闳创始后，鲜于妄人、耿寿昌均作之。在理论上阐扬浑天者首为扬雄。他先信盖天，后力倡浑天。至东汉，贾逵造黄道铜仪。而张衡造浑天仪最精，且以漏水转运计时：

“衡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廿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捩，随月虚盈，因历开落。”

其后吴中陆绩、王蕃，亦造浑象（均见《晋书》天文志）。张衡以后，浑天之说遂定。《后汉书》律历志注及《开元占经》引其说。清洪颐煊辑其遗文，大意云：

“天如弹丸，地如卵中黄。天大地小，各乘气而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廿八宿半见半隐，两端谓之南北极。赤道横带天之腹，黄道斜带其腹，各二十四度。日与五行，行黄道。……二十四气，一气相

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据严可均《全文》引）〔注一八六〕

汉人之天体观，亦承战国先秦，而因实测更加系统化：

一、银河系。我国以银河定天体之方向。自古称银河为天汉。此似表示中国天文知识，起于汉水上游。汉人以天汉起于东方之尾、箕，没于天狗、天纪之南。对天地均以经纬定之，唯天图所指东西南北，恰与地图上者相反。

二、恒星系。星之位置，埃及人希腊人在太阳出没时于黄道观察之；我国则以北斗为天极，于赤道上观察之。周天分为五宫：中宫，东苍龙，南朱鸟，西咸池（白虎），北玄武，以二十八宿分配之。天象下应国家体制。中宫中北斗为君，文昌六星为相。此亦以皇帝与知识分子等量齐观。赤道又分十二次，代表地上之分野。〔注一八七〕

三、七曜系。哥白尼前，人类皆以太阳为行星，我国亦然。《史记》云，“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但汉人不仅知道七曜之周期，且知外行星（木、火、土），内行星（金、水）之区别。（《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

案：《后汉书》律历志称，“刘洪作七曜术”。而《高僧传》等皆称“安世高，七曜五行，无不综达”。唐代采用印度七曜历。世遂以汉代历法亦受印度影响。其实中国自古即有七政之名，汉末刘陶作《七曜论》，郄萌亦言七曜（《后汉书》刘陶传，《晋书》天文志）。五星推步，早在印人之前。纵七曜之名，受印人语言影响，汉世天文学，绝无印人影响。

此时天文学自有占星术色彩。如《史》、《汉》均言“文昌六星，色齐则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荧惑出舍则有大兵，辰星出于房心二星间则地动。”此同时代各国皆有类似之信仰。案：汉人称五星亦曰五纬，纬书对经而言，亦即星书之意。汉人固有禨祥灾异一派，而所谓风角推步，为实际观测之学。〔注一八八〕《汉书》时代，知星有七百八十三。魏晋间陈卓总诸星图，定为一四六四星，张衡以星有二千五百，微星盖万一千五百廿，超过希腊罗马人所知。又汉人对赤道黄道及日月运行已有精密测量。所谓“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是也。汉人称日月五星轨道曰“行度”，外内行星周期曰“见”曰“复”，或合称之为“终”。当星日地在一线，名曰“合日”，其所测竟与今日极相近。京房刘歆能推算日月食，至东汉，观测益精密。贾逵已知岁差，测得黄道宿度。刘洪能推算月行迟速。宗绀、宗诚、刘固、刘恂、杨伟能推月食之度。四分历所测水星一终之数，与今测密合。西人云，“世有终身不见水星者，中国在二

千年前已精密测定之”。(朱文鑫《历法通志》引 C. A. Young “General Astronomy”)

中国古代天文学之进步,拉普拉斯(Laplace)早已注意及之。然不久西来之说大盛。拉克伯里等倡之,一部分日人(如饭岛忠夫)和之。而力加辟正者,亦日人新城新藏之功为大。新城尝谓“中国古天文学使我发生兴趣,一因其文献丰富,二因一部分学者以中国天文学来自西洋印度,三则据余研究,此实无根据之诬言。以春秋战国而言,中国天文学较西洋印度,至少进步二百年以上”(《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内藤虎次郎作序称之云,“博士以禹域历术,为其国人所自创。又审廿八宿之先定于印度天方,以绌泰西古历东渐之诐说,是其有功东西古史,不止补苴云尔也。盖禹域文明起于帕尔特之说,出于三十年前,使人齿冷。而人心好奇,妄谈至今未熄,则摧陷之力,不得不俟之博士也。”(按原序为汉文,帕字似当为加字,原书民国十七年出版。)录此二段,感愧随之。

## 历法

历法随天文而进步。各国最早之历,为纯阴历,即以月之圆缺为根据者。大约尧舜以前,中国亦用此法。自此至于汉代,我国历法经过四个阶段。

最早者是辰法。即以辰为标准,定太阳在天上地位,以定四季。我国之辰,包括北斗、商(大火)、参,以及后起廿八宿。四千年前北斗(今大熊星座)比今日更近北极。此孔子所谓“众星拱之”者。一夜之中,由斗柄方向可知时刻。一年之间,由日没后斗柄方向,可知季节;即春联所谓“斗柄回寅万户春”者。北斗是我古代文明之第一大功臣。后来虽然渐远,但在人类心目中,仍有最高位置。到了商殷,我国所用之辰,主为大火,故又称为商。此为五月之星,故农(農)字亦从辰。此星周围六宿(角亢氐房心尾),构成龙之形象(西人称为天蝎),故龙又成为神物。在正对面者,是参(Orion 座之三星,西人称为猎户),在十一月间晚上最为注目。此星象斧钺,十二支之戌,由此而来,此正古人狩猎之时,故西人径称猎户,而在我国又生犬之联想,而岁字亦从戌。《尧典》以鸟、火、虚、昴四中星为标准,以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此据东西学者考证,最合于公元前二千年的天象,此以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

四时成岁，为我国最古见于记载之历法。〔注一八九〕我国之历，向称阴历，实则既采太阳年之十二次，又用月之盈亏，实为阴阳合历。程发轫先生云，“我国历法兼备阴阳二式，特具一格，廿四节气依日躔而定，合乎阳历，朔望弦晦依月相而定，合乎阴历”(《春秋历数》讲义)。后来中国历法特点遂定于此时。〔注一九〇〕

其次殷周之际，由北斗、参、商，进而完成廿八宿系统，乃有廿八宿法。盖因岁差关系，北斗等逐渐远移，乃注意于日月均经之黄道。将黄道一周天之星，分为廿八区。月比恒星一昼一夜东移十三度，二七·三日一周，二十八宿等于月之巡回旅馆，故称为宿，亦称为舍。每三月后回溯月之位置(故称为朔)，以定日之位置。日以一年经黄道一周(此即天文学上所谓视动)。分黄道为十二次或十二宫，以月为媒介，合日之轨迹，以定节气。新城新藏以为这是西纪前千年中国最早发明，传于印度及波斯的。以后在月蚀之时，精密确定月之位置，以定反对方向日之位置，以校正历法，亦中外皆然。《夏小正》殆中国最古历书。据能田忠亮研究，合于二千年前之天象，一部分合于六百年前天象。此历甚得欢迎，为《诗经》所用，亦孔子所主张者。(《东洋天文学史论丛》)〔注一九一〕

再其次，至春秋之时，有《周髀》(髀者表也)测影法。以冬至夏至，日影长短，定一岁之日数。据新城研究春秋长历，决定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实在春秋中叶，十九年七闰之法，中国早于西方约二百年。《左传》记载分一年为分(春秋)至(冬夏)启(立春夏)闭(立秋冬)八节，即廿四节气之始，由此进于七十六年法，亦自然之势。四分历之基础，于焉奠定。《吕览》十二纪至《礼记》月令，《淮南》时则，即此一系统历书。

又其次，战国中叶以后，甘石等由木星(岁星)十二年之周期，进而知五行星之周期，乃有五步法。于是先有岁星纪年之法，进而欲求宇宙循环之大周期，求五星大周之公倍数及与日月会岁之公倍数，以定长期历法。系统历法，遂以编成。此即所谓古六历也。《汉书》律历志云，“五霸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历。”此汉代以来所传六历，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祖冲之云，“皆在汉初周末，理不得远。”但此亦皆多本于战国之历法知识。如所谓颛顼历，确已成立于公元前三六〇年之际(新城说)。祖冲之又云，“古之六历，皆同四分”；即皆以四分法(三六五日又四分之一，及十九岁七闰，七十六年一蔀)为基础。又自春秋之末已有

三正之说，即夏建寅（阴正月），殷建丑（十二月），周建子（十一月）。《左传》皆周正，而魏楚则用夏正，此盖与革命之说相王之事有关。故六历年始，各有不同。

秦汉之际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时张苍为历家。汉代既系一大革命，时议改历。其时六派历家争胜。祖冲之又云，“周汉之际，畴人丧业，曲技竞设，图谶实繁。”此说至足重视。此表示当时天文学之普及，即后来谶纬之起源。《后汉书》律历志所载，多纬书所言。此等失业天文家不得实测机会，遂多附会灾异。然彼等固有一定之天文历数知识，故又颇谈言微中。而他们对汉代天文学，遂亦功过兼之也。

汉代历法至汉武始定，此即《太初历》（前一〇四）。此后又变更三次。定太初历时，实集一时人才。《汉书》律历志云：

“诏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议造汉历，姓等不能为算，乃选治历邓平及司马可、宜君，及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

太初历详情，《史》、《汉》所记，不甚分明。大约当时不止一种方案，而结果采决邓平八十一分法（一月为廿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用太岁纪年，则无问题。行后不久，张寿王以为有疏漏，与鲜于妄人争论。至刘歆略加修改，称《三统历》。保留四分法之十九年法，以一三五个月为月蚀周期，推日月五星周期会合齐同之期，称为“太极上元”。是后历法，皆本其规模。仍用八十一分法，唯知岁星一四四年多行一次，立超辰纪年法。又定冬至在牵牛初度。牵合至广，病亦在焉。

后知其不甚合，东汉杨岑、张盛、编䜣、李梵与贾逵等，复四分法，称“四分历”，弃超辰而用斗分（冬至在斗）以甲子纪年。其推五星，益为精密。《后汉书》律历志云，“日发其端，周而为岁，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为岁之日数”。十九岁七闰，七十六岁九百四十月，一月廿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阴阳两用，规模益加固定。

按汉代之历，虽有《太初》、《三统》、《四分》之分，太初三统，大同小异，唯三统略有变通。定太初历时，太史公实主持其事。而史公书所载《历术甲子篇》，实为四分法。故后人有以为史公不以邓平之术为然，特以诏用其术，故存其文以见意者（朱文鑫《历法通志》引）。后张衡、蔡邕又知四分之疏，在岁

余过大。灵帝时刘洪作《乾象历》，郑玄、阚泽注之。徐岳传其术，王蕃造其器。此测五星益密，会合周期，除火星外皆与今测密近；又知月行有疾迟，创日月食限；古历至是一大变。魏晋以后皆本乾象，以为损益，未能出其范围。

汉历与后世关系最大者，尚有数事。一为干支纪年。天干在商代，似为日之序数，地支似为月之序数，后用于十二次。干支纪月，岁星纪年，已起于春秋列国，由岁星纪年变为太岁纪年，史公用之；超辰纪年，刘歆用之。四分历后，始以干支纪年。干支纪时，则在魏晋以后。二为节气，此《吕览》开端，今日节气之齐备，始记于《淮南子》。三、五行值日用事，起于三统历。四、十二生肖始载《论衡》，其来源不可考，中亚用之，成吉思汗用之。

自太初历至民国初采用阳历，改历约七八十次。此与西方由儒略历变为格里高历，即经固定，完全不同。盖中历务欲求顾及日月乃至五星会同之故（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然天文历算亦颇由此而发达。能田忠敬云："中国天文历法之发达极古，至汉武始入历法制定时代，可谓天文历法复兴之世。此后编䜣、刘洪、虞喜、何承天、祖冲之、李淳风、僧一行、郭守敬，皆能发明推阐。然历久不能无差。至于明末利玛窦等东来，西法传于中国，尔来中国天文历法，更为精确。今日吾人所谓科学，未有较天文历法更古者，任何国家皆以此为文化重要部分，而亦为一民族文化尺度。尤其是中国，素为政治第一要务，今日天文学，实其延长。此点而言，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实东洋文化最足自豪之处。如能确定其年代，明东西交流，究其文明之源，实世界文化史上极有意义之事。"（《东洋天文学史论丛》）〔注一九二〕

## 数学

数学起于几方面之需要：一为历法，测天纪日用之，此已见前。二为农田水利，规矩方圆以起。《周髀》云，"禹所以治天下者，数之所由生也。"二者皆关农业。三则军事与商业。此由《孙子算经》、《九章算术》及度量衡制所可见者。而历算关系尤密，星历专家之外必赖畴人运算。故《汉志》算书，附于历谱。蔡邕云："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是也。

如其他学问一样，数学自先秦至两汉为一大发展。如果数学是文明之镜，我想首先指出，两汉时代，中国数学又于天文外自成为一独立科学；而其水准，实在超过同时代任何国家，即指希腊罗马和印度。

我知道这句话与一般观念颇有不同。自拉普拉斯推崇中国天文学后，世人多知中国造就之高。尤其是中国历史保存的东亚天象记录，是治天文学史之宝。天文学之进步应预想数学之进步。但关于中国数学，却未被重视。所以然者，一、大家都震于希腊人之数学或几何学。近数十年来，学者颇知希腊人成就，不如所传之甚，奠定近代数学，尤其是代数三角算术基础者，乃印度与阿拉伯人。然印度阿拉伯数学，毕竟又是受希腊影响的。二、更重要的，一般欧洲人关于中国数学，以前大抵只知道《周髀算经》。此外中国古算书，有钱宝琮、李俨诸先生之著作，未受注意。说来很可惭愧，多赖日本三上义夫以英文介绍中日数学，《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九章算术》以及宋末几本重要数学书，始稍为世界所知。然汉代数学主要著作之《九章算术》，实未被认真研究。〔注一九三〕此处我想郑重提出一句，汉人之学最足自豪于世者，除史学外，即是数学。除了在本章之末将对中西文化水准作一比较外，先说两汉数学发达的原因，其次略述汉代数学之成绩。

汉代数学发达的原因有三：一、历法，工程，远征军事及工商业之发达；二、有较进步之算术工具；三、中国最早有十进法之观念，及自由数字之使用。历法以数学为基础。然历法之进步，自亦可促进数学之进步。这由上节多少可以看出。而汉代远征与工商情形，亦已略述于前。后面两点，或须略加解释，且须多少涉及后来以及外国情形。

**算具** 各国最初皆用圆石计算。其后则有算盘。此有三种方式，一为砂盘，二为移动的算珠或算码，三为连带的算珠，即今日中国日本犹使用者。砂盘为笔算所自出，此印度人最先。第二种算盘，实皆简陋。而当各国使用此种算具时，中国则用筹算。筹算记载，早在春秋。到汉代，“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汉书》律历志)。又有两种颜色，赤黑代表正负。其后又有骨角玉铁为之者，则必已变形。六朝时，广二分，长三寸(《隋书》律历志)。又新起一种广三分，长四寸者(《数术记遗》)。大约在唐时，数字符号刻在木上，长签之筹变为矩形之块，若“马将”然。至宋作圆形，若象棋子。仍称为筹，实为算木。而算盘则有如棋盘。此为天元术四元术(代数)所使用之器械。宋元之际，则珠算出现。“珠算”之名，出于汉末。但现在之珠算盘，出于宋代，因计算四则便利，至明而大盛。而笔算亦自明末大盛。筹竹算木之法，遂罕为人所知。故以梅文鼎之专家，其《算器考》犹以为“珠盘起于元末明初，天下习用之而遂忘古法”。而钱大昕且谓不知珠算起于何时。

幸筹算传于朝鲜，至十九世纪犹用之。算木传于日本，盛行至十六世纪以后，与珠算并行，至十八世纪，算木始为笔算代替。而由该二国所传古算书图，犹可见我国之古法也。西人有谓珠算系由中亚传来者，日本小仓金之助谓算盘系由罗马传于印度再至中国。史密士名著《数学史》(D. E. Smith "History of Mathematics")载各国算盘图，《大英百科全书》有摘要并附图，此一见可知其与我国算盘，有精粗之别。而日本算盘则我故物。凡竹筹、算木、珠盘，皆我国特有算器，造成我国特殊数学。算器促进我国算术代数之发达，然亦限制其更高度之发展。此世界各种发明常有之现象也。

**十进法、〇、自由数字及符号**　今日每一小学生皆知十进法，九九表，〇及＋、－、×、÷、＝之符号。然如果稍为研究数学史——如加觉里(Cajori)《初等数学史》及史密士之《数学史》等，即可知此乃人类数万年数千年始能想出之事。非常奇怪，人类虽有两手十指，但人类初多用二进、三进、四进、五进，其后有廿进、六十进法。巴比伦人用六十进法，罗马人用十二进法。埃及人希腊人知道一十百千万，多少有十进法之观念，但不能用九数。他们一切分数，以一为分子；正如巴比伦人、罗马人，对任何分数必以六十或十二为分母。今日英法人二十进之痕迹甚多，如一镑二十先令，Score 一字之流行。林肯著名之"三民"演讲，第一个字即说"四个二十"。而法人称九十曰"quatre vingt dix"，即四个二十加十也。至度量衡上十进法实与民主政治一样年青。富兰克林、杰费生首先主张美国采用，法德继之，而英人仍加拒绝，迄今用其三进二十进之制。

首先采用十进法的是什么人呢？西洋数学史及科学史家大都一致的将此荣誉归于印度人。拉普拉斯云：

> "一切之数以十进法表示，实天才方法。首先发见者为印度人。这是算术上一大发明，而为古代希腊数学家亚几默德、阿婆罗尼，所想不到者。"

但泽(Dantzig)谓希腊人不懂十进法，简直是不可理解之事。为什么印度人能有此发明呢？一般科学史说，此由印度人先发明〇。〇在印度称为空(Sunya，英 Void)，原起于印度形而上学之空(Sunya)，其后用于数学。由此有十进法。先传于阿拉伯，再传于欧洲云。过去多以为印度之零起于一二世纪。但印度古代之空指空气(Vayu，Akasa)，空无之空(Sunya)，始于一世纪之"般若"，提倡于二世纪之龙树。至五世纪印度大数学家阿略波陀

(Aryabhatta,476—?)始有零之观念。又有人说,希腊数学家弟阿帆图(Diophantus,246—330),已知负数观念,阿略波陀是受他之启发的。但零之观念,并非零之符号。此符号先作圆点,后作圆圈。据史密士与加宾斯基(Karpinski)共同考证,谓印度人用零之符号,最早见于九世纪末(八七六)之铭文。他未说明此为点抑圈。观其摩本,则印人最初仍用点。其用圈在九一七——一〇五〇之间。十二世纪(一一五〇)波士珂罗(Bhoskara)手稿中,仍圈点并用。亦有作□形者。〔注一九四〕大约在十一世纪末传入阿拉伯,称为 as-sifr(无)。此在当时一大惊奇。故十二世纪初,波斯大诗人兼大数学家大天文学家奥马哈延(Omar Khayyam)自作墓志铭云:

"星辰既没,天幕方张,无已破晓,其速前行。"

(英译云:"The stars are setting/and the caravan starts/for the dawn of nothing/oh,make haste!")

此咏零之名句,亦其重大纪念。我想〇之诞生,当在此以前不久。先是有花剌子模人(康居人)著算术书,经西班牙传入欧洲。到十世纪末年,教皇始传印度九数符号于欧洲人,但他犹不知零。到十三世纪,义大利人才将阿拉伯人算术书及其数字与零之符号介绍欧洲,为欧洲有算术之始。一三〇〇年左右,始有井字形之五五乘法表,十五世纪才有完整之九九表。又:七世纪至十二世纪,印度阿拉伯始有不固定分子分母之分数及十进分数。关于大数字,十三世纪以前欧洲人不知有百万(英人尚在后)。又:埃及人始用叉形之加减符号。十二世纪,印人在数字之上记圈点表负数。今日正负乘除之符号,在十五世纪中叶之后始渐有之。至十六世纪,即文艺复兴后期始告完成。凡此情事,犹如昨日。然自此以后,欧人数学亦突飞猛进矣。惟〇仍称为暗号(cipher)。称为 zero,乃距今不过百年之事而已。(以上据加觉里、史密士上引书,及霍格本《百万人之数学》——Hogben,"Mathematic for Millions")

再看中国,尤其是汉代情形。我想数的观念首先是由生活与艺术、游戏而起的。四面、八方、四季、十二月、五音、八音、五行的观念,也许最早。其后用到度量衡,用于数之游戏(宋人所谓图书),才逐渐发生抽象的连续的数字观念,如一二三四……之类。以后在进一步测天测地,计月计日之中,使基数序数的系统形成,并发展了计算方法。

我国最早不只一种计数系统。四与八是一系统,此可称为八卦系统。

到了殷人，已有十干（殷王均以干名，天干称十母，地支称十二子，似后起）。此十进法之起源。殷末则有九的观念。于是有九畴系统。凡井田之法，九州之说，以及九府圜法、九章之书之类，皆与九畴有关。畴人之称本此。昔传黄帝伏羲作九九之数，甚难置信。然九九乘法发明于春秋初，似无可疑。“齐桓公设庭燎，有以九九进者”（《战国策》及《汉书》梅福传）。又《周髀》云：“数出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汉赵君卿注云，“九九，乘除之原也。”九数观念，又由楚人发展之，即所谓玄。至《周礼》乃有九数之教（六艺之一）。

自有九数，即有十进法，于是在周汉之间，即战国时代，我们看到度量衡上八进到十进的转换。《周髀》八尺，仞、寻、常，皆以八计。周亩一百六十步，秦亩二百四十步。八铢为锱，廿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后则十进大行。齐人之豆、区、鬴、钟，表示过渡。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而十鬴则为钟（《左传》注）。《孙子算经》多作十进，并载九九歌诀。秦汉之际，长度细分皆十进（如忽、秒、毫、厘、分、寸、丈、引），量全以十进（圭、秒、撮、勺、合、升、斗、斛），铢以下亦然（黍、累）。又周汉间，皆以什二什三计利息。案《广雅》云，龠二为合。《说苑》则云，十龠为合。当汉人所改。古书多作九章，又言篇什。《班志》云，“一十百千万，纪于一，协于十。”

此皆可见，十进法实以中国为最早。而汉人则使十进法普遍化。

但我还想指出，仅仅十进或有零，并不能保证自由运算。埃及人知十进法，其分数不自由，数至百万而止。北美马雅人（Maya）与印度人同时有零之符号（其形作盂形，中加四画），而运算只能在一定数目范围内。唯有将九数自由分离结合，始能有自由数字，而表示大数与分数。史密士云，“中国人在最早期间，使用极难之分数”，并举《周髀》为证。而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可见，中国在最初有自由数字，其次则印度人也。

现在要说到零。有九数，有十进法，零即在其中矣。如谓印度哲学之空，启发零的观念，则中国列子言虚，老子言无，在龙树前五百年。龙树之无指无别，老子之无则有大用。老子云：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之书，本身即八十一篇。毂为圆孔，户初亦圆孔。老子又言十之分数（“生之徒十之三”），又言正反损益。此则老子之时，十进观念形成，乃无问题之事。而正反损益，或有启于正负数之观念。

战国末似已有数字符号。秦及新莽钱币𝍮 𝍥 𝍧等符号，此表示至迟秦汉已有之。《孙子算经》言其写法。至唐代敦煌石室发现之《立成竿（古算字）经》，〔注一九五〕有九九歌诀，似《孙子算经》之补充，其中具载𝍠𝍡𝍢𝍣𝍤𝍥𝍦𝍧𝍨。单、百、万作直形；十位、千位、亿位则横之；如六十六作𝍮𝍥。此当先用筹排列之形，其后则合记于竹木。然则印刷或亦导源于算数也。

汉代编成之《九章算术》，由张苍编定，刘徽注释补充，不仅有正数负数，且有零之观念矣。正负以赤黑之筹表之，零在当时算具上，称为“消夺”，而刘徽亦名之为“空”（见《九章算术》方程章）。此负数观念，希腊弟阿帆图始有之，乃两晋间人，在张苍后四百余年，刘徽后六十年左右。阿略波陀曾经提出零之观念，乃齐梁时代之人，在张苍后约六百年，刘徽后二百余年也。

然零之观念，尚非零之符号。中国古用算具，不易以符号表现。印度零之符号，原为点，后为圈。圈点在中国古代用为标点，古称离经，章句，句读。纬书家之河图洛书以黑白圈点表奇偶数。但汉代无用圈点表零之显然证据。至上述敦煌《立成竿经》九九表，其记四百五作𝍣𝍤，二百八作𝍡𝍧，百八作𝍠𝍧，中留空位。而十与廿作𝍩◎𝍪◎，似以双圈代表零之单位。此乃开元天宝前（七一〇——七五〇）之书，而是时印度并无〇之符号，是已经知道的。

而扬雄以圈表太玄。到韩愈时代，禅宗大师宗密（七八〇——八四一）用圈点代表哲学观念：◉表真心，●表妄想，而◑表阿赖耶识。这是后来周敦颐邵雍之无极太极图所由出，而印度此时犹无〇之符号，是我们知道的。

但印度笔算和零之符号，确已于开元间输入中国。其时印度瞿昙一族在中国为太史令监，传《九执历》及笔算。《玉海》九执历条云：

> “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七一八）诏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之。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陈玄景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算字法样》条，记印度九数后云：

> “右天竺算法，用上件九个字乘除，其字皆一举札而成，九数至十，进入前位，每空位处，恒安一点。”

要点即在此“一点”二字。此证明八世纪印度之零，原作一点，而同时中

国则作双圈。印度在十二世纪犹圈点并用，而中国在十二三世纪间，秦九韶之《数学九章》及李冶之《测圆海镜》中，亦作圆圈矣。〔注一九六〕案史密士对于〇之符号之起源，谓希腊以〇(omicron)表示小孔，印人用之与点同表示负数，及早已忘却之事，仅谓“〇似乎是印度发明”，其词尚不肯定。我想究竟中国之单圈由自己句读、河图洛书符号或双圈变化而来；或由印度而来；还是印度之圈点，由中国而来；或印度之单圈，由中国双圈而来；并非不是一个绝无问题之事。尚可一言者，我国古人对他人之长，甚喜吸收。印度的一笔字与圈(如果圈是他的)，确甚便利。然中国未予接受者，除中国一般数学水准较印人为高外，即我们原有一套数字符号，勉强可用。此与两湖之人学北京话，较闽粤人为难，其理相同。如果圈是印度之发明，或可促成我国及早接受印度数字。此点亦可间接证明我国之零(〇)非来自印度也。

顺便一提的，在秦九韶之书中，除〇以外，又用×、ȯ、ō、ẋ、各种符号，而李冶则加\于数字，表示负号。此实全世界数学符号与负数记号之最早者(如上所述，印人仅于字头加〇与 、表示其小于〇)。此亦可表示中国数学之进步性。

老实说，一六〇〇年以前，中国数学水准在各国之先，以后才慢慢落后的。中国所以能握数学霸权，说来亦不足异。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洋数学，希腊集中于哲学家之手，几何学发达；印度数学集中于婆罗门之手，附于历法，故三角代数甚精。希腊直到亚历山大城时代，印度直到笈多时代，因东西贸易，数学才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则因学问普及较早，更民主，更世俗，故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有一种平均发展之势，此自促进数学之进步。其次，亦与中国特殊言语有关。单音语言自由结合，甚易促成九数之自由离合，故九九表在中国发明甚早，且甚易记忆，而西洋先只有五五表，又不能变为歌诀，至今只好看表也。然仅仅这一点是不能永久保障霸权的。到了航海事业发达，而我缺乏进一步的磨砺以须，便钝退下来了。

**汉代数学书**　现在可以回到奠定中国数学光荣的汉代数学——其著作与人物。

唐代有算经十书：《九章》、《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此以算术代数为主；《周髀》、《五经》、《海岛》、《缀术》、《缉古》，皆关几何三角者。《缀术》祖冲之所作，因遗失，后世以徐岳《数术记遗》补之。以上十一部，除张丘建、夏侯阳、五经、缀术、缉古五种外，皆三国以前之著作。余六种之中，

周髀、孙子、九章，一部分是先秦时代资料，大部分则经汉人整理补充、修正、注释的。五曹、海岛、记遗三种，则汉人及汉末人所作。

《周髀》三卷，汉赵爽（君卿）注。上卷前面讲勾股，是毕达哥拉式的几何学。末引《吕览》之说，是战国时代的东西。其中有后来《周髀》家和赵君卿关于天文学之补充（如七衡六间图）。下卷多半是后汉四分历前后新盖天派之说，当然有赵君卿本人之意见。能田忠敬云，“《周髀》成书，当在蔡邕之前。然天算之概念及方法之起源颇古。有远传周代，近传春秋战国间天象部分，实后世天算先驱。孙子量竿之术，刘徽海岛之术，皆基于此。纬书家之天算，天地四游之理，明基于此。在天文学史上，诚千古之至宝。”（《周髀算经之研究》）

《孙子算经》三卷，今仅残本，详论乘除，有分数比例开方，粮食征兵营造等算法，乃入门及军用算术。举例自五等诸侯至佛书，当先秦资料，汉人补益之。有名之一题云：

> “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

此后世所谓“韩信点兵”，乃简单之代数术；大衍术、天元术所从出也。

《五曹算经》五卷，乃官吏之应用算术，当为东汉之书，其中论及量田、织布之算法。织布算是一种级数算法。

《数术记遗》一卷，旧题徐岳著，今仅残篇，北周甄鸾注。岳为刘洪弟子，而作者为道教徒，语当伪托，亦无内容。唯其中言大数、小数、循环；又云算之种类，有“积算，太一，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运算，了知，成数，龟算，珠算，计算”，“唯有九宫，守一不移”等语；有史料价值，并见道教研算之迹耳。

此外《汉志》载《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又有乘马延平（人名）明计算。当皆属《商功》（汉代工程计算术）。而尹咸与向歆父子校数术之书，当亦当时明算者也。然代表汉代数学水准者，当推《九章》与刘徽。

**《九章算术》与刘徽** 九章由刘徽作注，其自序云：

> “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九章是也。暴秦焚书，后张苍、耿寿昌皆善算命世，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所论者多近语也。”

此可见此书乃先秦雏型，张苍、耿寿昌、刘徽补充注释者。苍乃秦之遗

老，汉之元勋，《史》、《汉》有传。寿昌为宣帝时大司农中丞，创常平法者。刘徽邑里生卒不详，《隋书》律历志云“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知其书成于刘禅降魏之岁（二六三），晋初尚存。一书跨三汉之兴亡，真可谓汉代文化之纪念碑也。

九章内容如下：

方田，御田畴界域——论面积分数。

粟米，御交易变易——论比例。

衰分，御贵贱禀税——公约公倍。

少广，御积幂方圆——开平方立方。

商功，御工程积实——工程筑城开河治水，圆柱圆锥体积。

均输，御远近劳费——租税征收，等差级数。

盈不足，御隐杂互见——复假定法，须用指数、函数、二次式解之。

方程，御错糅正负——多元一次方程式。

勾股，御高深广远——平面几何。

由此可见此为汉代上自军国税收，下至民间日用之数书。其中关于经济物价之史料，亦颇足珍贵。〔注一九七〕兹举数例，以见汉代数学问题之一般：

“今有粟七斗八升，欲为豉，问得几何？答曰，为豉九斗八升二十五分升之七。术曰，以粟求豉，六十三之五十而一。

“今有圆锥，下周三丈五尺，高五丈一尺，问积几何？答曰，一千七百三十五尺一十二分尺之五。

“今有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今并一顷，价钱一万，问善恶田各几何？答曰，善田十二亩半，恶田八十七亩半。

“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答曰，本三万四百六十八钱三十七万一千二百九十三钱之八万四千八百七十六。利二万九千五百三十一钱三十七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分钱之二十八万六千四百一十七。

“今有武马一匹，中马两匹，下马三匹，皆载四十石至阪，皆不能上。武马借中马一匹，中马借下马一匹，下马借武马一匹，乃皆上。问武中下马各力引几何？答曰：武马一匹引力二二石七分石之六，中马十七石

七分石之一，下马五石七分之五。术曰，如方程各置所借，以正负术入之。

“今有邑，不知大小，各中开门。出北门三十步有树，出西门七百五十步见树。问邑方几何。答曰：一里。”

徽注，又扩其内容，其中有二次方程，小数计算，圆周及角锥体之算法。最重要者，为圆周率算法。周髀之径一周三以后，刘歆等改定为三·一五四七，张衡所得，为十之平方根。而刘徽定为 $314\frac{4}{25}$——即 3.1416。他和后来祖冲之之密率都是独步当时全世界最精之率。（案：李淳风注只知祖冲之约率；戴东原注亦遗徽之一六，不知何故。）再刘徽是用的割圆术，祖冲之方法，亦是刘徽方法，而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最正确方法。

徽又以九章“未足以博尽群数”，著《重差》（案重读虫），此即《海岛算经》。原书已佚，就武英殿聚丛书所辑，则为三角术。盖正确之圆率，实三角之前提也。又日本传“三开重差”，则开平、开立及四次方程式以上之开法（泽田吾一《日本数学史》）。

清焦循谓刘注《九章》与许氏《说文》同有功六艺。后世推为算经之首，而有“缀术”、“吏术”（见后）之学。有了张衡，天文脱离占星术，有了刘徽，数学也由天文之附属成为一种学问。除了以上所说诸人之外，除了历算家（如邓平落下闳刘歆）之外，汉代以来，经史学者无不兼治天文历数。司马迁、贾逵、班固、马续、何休、郑玄、宋衷并精历算；治历之刘洪徐岳亦与徽相先后。所以能造成中国数学之黄金时代。南北朝之世，祖冲之、甄鸾继起。隋唐之际，则有王孝通，以后有李淳风、僧一行。宋有贾宪、沈括。宋末有秦九韶《数书九章》，李冶《测图海镜》，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四元玉鉴》，为四大名家，形成中国数学第二黄金时代。惜知识分子多注重虚文。秦九韶叹学者鄙之不讲，李冶愤谓九九为“贱伎”，对汉人之重视数学，表示钦佩。秦九韶云：

“数与道非二本也。汉去古未远，有张苍，许商，乘马延年，耿寿昌，郑元（玄），张衡，刘洪之伦，或明天道，而法传于后，或许功策，而效验于时。后世学者自高，鄙不之讲，此学殆绝。惟治历畴人，能为乘除，而弗通于开方衍变。若官府会事，则府史一二象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识，上之人亦委而听焉。持算者唯若人，则鄙之也宜矣。呜呼，乐有制氏，仅

记铿锵，而谓与天地同和者止于是，可乎？今数术之书，尚三十余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叀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独大衍法不载九章，未有能推之者，历家演法颇用之，以为方程者，误也。”(《数书九章》自序)〔注一九八〕

这一段话，可看出数学兴衰之故。盖科学必理论与实用并进，始成其精；必一面普及，一面提高，始成其盛。汉宋科学进步，皆由于此。四家以后，元明之间，仍有郭守敬、顾应祥、朱载堉、程大位诸人之研究。及明末西算始来，大体上已有较胜于中国之处(尤其是几何学)。而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等仍能“会通求胜”(徐语)，“兼收亟取”(梅语)，为中国数学第三黄金时代。此后则人益前进而我瞠乎后矣。

## 农、医、博物、理化、工程、工艺、地理

兹对汉代天文数学以外科学成就，略记要点于下：

一为农田之学。前汉赵过、氾胜之，为著名农学家，《汉志》尚有尹都尉、王氏、蔡癸之农书，及种树藏果相蚕之书，皆不传。后汉则崔寔以儒者而为《四民月令》。水利之学，前汉有贾让，后汉有王景。汉世江南农业尚原始，所谓“水耕火耨”。两汉农业大事，除普修水利，输入西域南海植物之外，即将一般农业兼蚕桑技术，传播江南。

次为医学。《汉志》医经医方五百卷，由李柱国校定。《难经》、《素问》，恐怕亦是汉人整理的。汉初医学家以仓公淳于意(缇萦之父)传扁鹊脉术，最有名，《史记》载其治病甚详。中国医学到他也才成为独立的学问。次则楼护。再王莽使太医度人五脏，黄宪父子为牛医，则解剖兽医之学已兴。东汉张机(仲景)华陀之内外科，至今艳称。张机《金匮》，与《素问》、《难经》，称为医家三典。

西汉本草之学兴。《神农本草经》殆两汉编成，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此与解剖之学，皆表示医学进于实验方法。而中国博物之学，首先集中于本草。大儒蔡邕，亦究本草之学。汉人已为动、植、矿之细分，唯人则最灵。

次为物理化学工程。此可由几方面看。首先是各种国防民生工程(如长城、水利沟洫)，宫室建筑，造船，航海的技术。又如诸葛恪知比重之理。

其次是各种国防民生和学术上之机械，工艺，和食品化学。《汉志》云："兵技巧，习手足，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凡书百九十九篇。汉代以石为炮，即所谓霹雳车。又有连弩。所谓精金良铁，盐铁之利，以及纺织之染色，铜器之涂金，金银之镂刻镶嵌，漆器之精美，豆腐豆豉酒糖之酿造，皆可见一般科学技术水准。汉世仪器皆以铜为之，即知铜能抵抗热涨冷缩(《汉书》所谓不为燥湿寒暑改节)。"慈石引铁"，为淮南子、班固、王充、许慎所注意。音律亦声学。至于张衡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诸葛亮木牛、流马、连弩，李譔、蒲元弓弩机械之巧(《三国志》本传，《全文》)，马钧纺织机、水车、石炮(《三国志》杜夔传注)，可见当时科学工艺之精进。此外，李少君淮南王为炼金术，王莽求奇技以伐匈奴，或言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百千里，取大鸟羽，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即堕。虽幼稚，各种科学技术原皆由此而来的。

其三，秦汉人在工艺上一最大成就就是瓷与釉。邹阳《酒赋》及许氏《说文》皆有瓷字。而这是承继战国时代发展的。洛弗(Laufer)曾著《中国瓷器之起源》(The Beginning of Porcelain in China)，继之研究者有 Brankstone Hochstadter，Karlbbeck 等。据其化验，战国经汉至六朝瓷釉，可分二种：一以铅为熔媒剂达八九百度之低火度者；二以灰为熔媒剂，达一千二三百度之高火度者。洛弗博士以低火釉由西方传来，而高火釉则汉族独创，汉以前已有之，汉代更为精工，至唐宋使世界惊异之青白瓷，即由此而来。浙江之德清窑，是由汉代即著名的。

其四，笔墨之改进，造纸之发明，尤功在万世。《后汉书》蔡伦传："蔡伦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又造意用树肤麻头为纸。元兴元年(一〇五)奏上，天下咸称蔡侯纸。"案伦为耒阳人，后以罪自杀。但纸并非始于蔡氏。蔡氏以前用帛纸。应劭《风俗通义》云：光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全文》辑自《御览》)。蔡氏同时，左伯之纸，较蔡氏为佳。特蔡氏于宫中造纸，开盛用之端耳。又汉人之书，有丹书，有墨书。丹书先秦已有之，此乃水银化合物。而墨丸之制造，则汉人始有者。而其历久不坏，亦见其精美也。

最后是地理学。汉人地学，一为地志。《山海经》成于先秦，而经秦汉间人补充。然杂于神话。至汉，史公、刘向、朱赣始有真正地学，为《汉书》地理志所本。《汉书》地理志不仅详于道理，并注重人文，即物产民俗。而汉代旅

行家之域外远征探险，已见于前。《周髀》并言“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水经》传桑钦作，乃东汉经学家。二为地图。地图古已有之。秦代地图甚详，即萧何所收者。《史记》淮南王传，“日夜与伍被案舆地图”。《汉书》：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汉武帝纪，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后汉书》邓禹传，记光武搜舆地图以示禹。其后汉末张松献益州地图于刘备，亦有名之轶话也。

## 物质与宇宙

在理论方面，汉人对小宇宙大宇宙均有研究。关于物质之原始，汉人称为气，太素。一切天下之物皆由气或太素构成。此由先秦来，而汉代系统化。《淮南子》首论之。其说宇宙原起，已见于前，即以宇宙生气，凡天地、星辰、万物、水火，皆气之轻重，阴阳成分之不同（四四八页）。他又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著书谈炼金术的人。扬雄以自然依数理运动。王充以一切皆一气“自然而生”，即人亦然。气，阴阳，五行，支配中国，凡二千年之久。直至西人东来。不是汉人无进步，而是后人无进步。又物与物关系，除五行之生克外，尚有吸斥关系。班固所谓“至齐之德，犹如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此即认物之本质相同，而相互间关系有拒吸不同也。与刘徽同时之杨泉，著《物理论》（今有辑本）。此自非近世物理学，然已表示对于自然现象法则之注意矣。

言天体者，如前所言，自古有三家，汉代各有主张者，亦皆连到宇宙论。一曰盖天，本于《周髀》，淮南子主之，王充犹信之。次曰宣夜，汉末郗萌主之（厥后姚信虞喜倡之）。三曰浑天，汉初落下闳倡之，自扬雄桓谭谈天、贾逵造黄道仪以后，张衡集其大成，蔡邕、刘洪、陆绩、王蕃均主之，遂为正统学说。三派在宇宙起源论上是相同的。张衡《灵宪》可为代表（《灵宪》讨论宇宙起源，《浑仪图法》乃讨论天体构造的）：

> “太素之前，不可为象，中虚外无，斯为溟涬；道之根也。道根既建，太素始萌。并气同色，混沌不分，其气体未可得而形，其迟速未可得而纪也。斯谓庞鸿，道之干也。道干既育，万物成体。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动以行施，地静以合化，烟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太元（亦作天元），道之实也。于是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情性万殊，自然相生。人之

精者作圣……"

此与淮南子所说，大体相似。所谓溟涬，类乎星云(汉人已有星云之称，又名"归邪"，见《史记》天官书)，而太素，实为原子，太元则类乎元素。

但在天地构造论上，则三者有同有不同。盖天主天上地下，浑天主天外地中。浑天主地圆说，初期盖天为地平说，后期受浑天说影响，为半圆说。能田忠敬云："《周髀》之法，以表测日晷之长，相当于球面坐标上第一坐标系。浑天法以二十八宿之广度测天，相当于球面坐标系上第二第三坐标系。在天地构造论上，浑天说虽有缺点，由球面天文学观点看，其根本概念及大体数字，颇得正鹄，较盖天进步。然二者皆可得优良历法，此后世所以有浑盖合一之论。"(《汉代论天考》)

初期盖天及浑天均主天动地静，但后期盖天说有地动说。如尚书纬《考灵曜》云：

>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

但此仅为右转说(如抽陀罗然)，并非哥白尼之旋转说也。

浑天说既为一般人所接受，久不为人重视之宣夜(明幽之意)说仍有郄萌主张之。萌乃谶纬学者，尝集图纬之书，为《春秋灾异》，《后汉书》律历志亦颇引其说。宣夜说以为天乃无限空间，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而非附着于天体。此盖九天说之发展，以行星各有轨道。在浑盖外别成一说，其后东晋虞喜以星辰各自运行，如江海之有潮汐，测定岁差，为天文学上之一大发明。可见纬书如去其谶，实不可厚非。虽为浑天说所掩，其影响亦不绝。阮元以为西人之说，或出宣夜，并非傅会之谈。近世西方之天体论，乃对亚理士多德、朴托莱梅之固定的天体为解放者也。

要而言之，汉代虽未达到哥白尼地动论水准，地圆说已成为公论。不仅浑天家主之，医书亦言之(《内经》岐伯之说)。京房言月以日为光；王充言月蚀由月为地所蔽，魏人周晃言日蚀由地月掩日(见《全文》引)。又吴人严畯作《潮水论》，唯书不存，不过杨泉说及"潮有大小，月有盈亏"，已知月与潮之关系矣。

然汉代对于天地(日地)距离及地球直径所测甚不精。就《周髀》、《张衡集》，及《宋书》、《晋书》天文志所引，列表于下：

周　　髀　周天直径八十一万里　地径二万八千里　日地相去十万三千里
洛书甄耀度　周天一百七万里
春秋考异邮　同　　上
张　　衡　日地距离一亿一万六千三百里　地径同
郑　　玄　天径十六万二千里　日地距离八万一千四百里
陆　　绩　日地距离三十五万里

除周髀地径极近现代测量(7926 哩)外,余皆不如后期希腊人之确(详后)。

但中国人宇宙论有一点极为特色,即我们有大宇宙观念,并以时空同论,这是希腊人印度人所无的。战国时代已有大九州之说,中国为天下八十分之一。这还是有限的。《淮南子》云,“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大家知道,这是相对论式的观点。扬雄认天体无边。张衡言小宇宙不精,然以为我们的天体以外,“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宣夜说更力言无限的宇宙。爱因斯坦以来倾向于宇宙“无边有限”说。自巴洛马天文台大望远镜开始工作以后,近年来宇宙无限说抬头〔按一九七七年有限说又起〕。汉人之言,非本近代观察,然亦可见其想像力矣。

## 音乐与文艺

殷人是很艺术的,音乐雕刻均豪放。周人较朴实,表现庄严。前者多宗教色彩,后者亦多少如此。六国中,郑人有浮世风,楚人尤富于想像。秦人重实用,集中六国及外来要素,趣味偏于宏伟。汉人制礼作乐没有成功。两汉的艺术文学,承继周秦郑卫及楚国因素,而后来又逐渐吸收北胡西域的因素,不过楚风是基调。除实用与宏大外,又增加富丽幻想色彩。在文艺上的成就,至今还在影响我们。惜乎两宋以降,我们渐变为一个不很艺术的民族了。〔注一九九〕

文艺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在社会组织化时代,艺术趋于综合式。在社会分解时,趋于分离式。秦汉初期之建筑、刻画、歌舞诗,及辞赋,都是综合式的。绘画五言诗及其他文体,由此分化出来。

## 乐与舞

十二律吕反映宇宙之节奏与调和，政治伦理当以调和为则，而乐亦可移风易俗：此中国古典的音乐理论。

周人重乐。但孔子要“放郑声”，魏文侯听古乐则睡，只喜欢郑卫之音。可见周人古典音乐（雅乐），在春秋时代，已不为人所喜，而郑声成为时髦了。班固云，“自此礼乐丧矣。”秦人在李斯时代，流行的依然是郑卫之音（《谏逐客书》）。汉高祖乐楚声，升于庙堂。而流行者仍为郑声。汉人要罢郑声，“又不制雅乐，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郑卫当时在交通中心，能吸收新的趣味。郑风之兮字特多，其受楚人影响，是很明白的。雅乐陵夷以后，郑声楚声也还是中国之古典。

古典之乐器，已具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秦汉以后，各音之中，增加了新的种类。秦人造筝。箜篌、琵琶，是中国与长城一带的混合物。箜篌或出于朝鲜（崔豹《古今注》），琵琶是乌孙公主西行时中国乐师造以送行的。笛角皆出于羌。胡篪胡笳，皆自外来（《宋书》乐志）。雅乐不能有新乐器，自无怪其衰。但音乐也是一极自然的东西。古乐成分又何尝不在琵琶箜篌之中呢？

周人六代之乐章，至秦唯余韶武。汉初有制氏，略知其略。但仅记铿锵，不明其义。又周有房中乐，秦名曰寿人。叔孙通奏上。惠帝始立乐府，改为房中乐，唯改为楚声，即安世乐也。文帝时，有魏之老乐工窦公献《周官》大司乐章于河间献王。河间献王采《周官》诸子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乐记》代表我国古典的音乐理论，亦艺术理论。武帝大兴乐府，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定文字。今所传郊祀歌十九章是也。其后北方西域音乐输入。崔豹《古今注》云：“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如是“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蔡邕《礼乐志》云，汉乐有四品：一、大予乐，郊祀用之，钟鼓为主。二、周雅颂乐，辟雍飨射用之，琴瑟为主。三、黄门鼓吹，天子宴群臣用之。四为短箫铙歌，则军乐也。汉末，唯一古乐大师为荆州杜夔，而左延年则郑声专家也。（《汉书》礼乐志，《后汉书》礼仪志注，《三国志》杜夔传，《宋书》乐志。）

秦之舞本于周。始皇改名之为五行舞。至汉本之，有五行、文始、武德

之舞等。秦代有一种“角抵”，大概是二人打拳。汉角抵大为流行，尤盛行于军中。高祖又喜巴渝舞。其后胡乐胡舞大量输入，还有漫衍鱼龙之戏。这是真兽，还是今日龙灯狮子之类则不详。西汉末年，乐鼓员、讴员、倡人（优）、象人（假面人），共八百廿九人。这些东西是供朝廷娱乐的，也常为“招待外宾”和招待士兵之用。顺帝时，在德阳殿陈鱼龙百戏招待各国侍子，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规模总算不小了。（《汉书》礼乐志，西域传，《后汉书》礼仪志）

社会上亦有其歌舞。刘邦还沛酒酣起舞，并唱“大风”，自非五行、文始之舞。贵族富人多女乐，太史公说，“赵地女子弹弦跕屣，游媚富贵，遍诸侯后宫。”又云：“赵女郑姬设形容，长袂利屣，目挑心招。”（《货殖传》）傅毅《舞赋》描写郑女之舞：“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其少进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倾。卓约闲靡，机迅体轻。”张衡《舞赋》：“搦纤腰以互折，眸烂烂以流光。”观曹植所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则当时妇女固具矫健之美，非如后世之柔弱也。又郡县立稷祠，有灵星舞，用童男十六人象教田云（《后汉书》祭祀志）。

秦汉时代宴客时有舞，如舞剑，舞鞞，而后有巾舞。《宋书》云：

>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舞。诗云，屡舞屡仙是也，但不宜屡尔。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傅毅张衡所赋，是也。公莫舞，今之巾舞。相传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祖。且语庄云，‘公莫’，云莫害汉王也。江左有拂舞，吴舞，或言白纻舞。”（乐志）

## 文学——乐府歌辞、五七言诗、辞赋、散文、其他

我国古来文章、文学二字，所包甚广（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文学子游子夏”）。《考工记》称绘画为文章。汉世“贤良文学”，殆包文史辞赋而言。大抵自来我国，文学一词，实兼韵散二者而言也。

中国文化史有二要点，即中国文化，扩大于商、周、晋、齐之东西发展；而灿烂于诸夏、三楚之南北结合。无论在国土上，在哲学、科学上（道家、甘德星学皆楚学），在文学上皆然。在文学上，继国风而起者，实为楚辞。

“屈原死后，宋玉、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是赋体之

名，起于宋玉之徒。此后风骚结合，诗赋结合，奠定秦汉新文学之基础。为此结合之中介者，为荀子。其所为赋，即混合诗赋，而于抒情外，进而说理叙事者。此中国韵文史上之一大转变也。而在散文方面，在战国之末秦汉之际发生影响最大者，除诸子之文外，则其时之纵横家。在此秦汉之际，称为"长短说"；而其人则多齐人（如蒯通、主父偃等）。按《战国策》原文，当本六国史记，唯如现在文字，或经纵横家之润色。（然有谓《国策》作于蒯通者，则未可信。）秦汉散文之修辞，固受影响，即汉人奏议，亦系承其风而归于醇正者。又在韵文上，即汉人辞赋，亦有纵横色彩。要之，夏、楚、齐文学之汇合，始于秦而成于汉。

秦人文学原受中原影响，唯富于军国色彩，如《秦风》。后受法家影响，教训主义特重，如始皇刻石。《汉志》诗赋略，有周秦及六国谣歌诗，又黄公为秦博士作歌诗，又有秦时杂赋九篇，皆不传。又始皇使博士为仙人诗，亦不传。然秦时诗赋甚盛可知。又《汉志》有秦时奏事廿篇不传。然由《吕览》及李斯之文，则秦散文固可观。而纵横之士一时集于秦国，是我们知道的。汉代文学，即承此潮流而发展而楚色尤浓。秦末楚人极活跃。项羽刘邦以及萧何陆贾周勃，皆为楚人。项羽有垓下歌。刘邦作大风歌。楚学楚声楚辞，成为汉代思想文学之主流。谚云，"唐诗晋字汉文章。"周秦以来，文学在两汉作新综合，同时起新分化。后世各种文体，大体皆备于汉世矣。兹仍依韵散二类分述之。韵文（即美文）又可分三类，即乐府歌辞，五七言诗，辞赋。先论乐府。

**乐府** 韵文初皆合乐，诗骚同然。周代以来，国家大典行礼之时，均奏乐歌诗，士大夫相见赋诗。至三国犹然。《晋书》乐志云，"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除旧歌外，再作行礼诗。"而琴歌、舞曲，亦即诗人所作，或民间所唱之辞也。周有采诗之官。汉效之，武帝时始立乐府，然"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两都赋》）。李延年主音乐，而文词制作修饰，则司马相如等主之。然除若干庙堂之什外，所谓赵代秦楚之讴，班书未录，其词多难考见。幸有《宋书》引蔡邕叙汉乐云：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续举魏晋郊庙之诗，相和清商之词，以及舞曲铙歌；其中颇录古词，即汉人之作。沈约知音，去汉未久，其分类实据音乐，而由此亦可见魏晋六朝之韵文，皆本于汉代之乐府。或依调制新词，或

但拟其格式。厥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搜罗自远古至五代诗歌，分为十二类：一、郊庙，二、燕射，三、鼓吹，四、横吹，五、相和，六、清商，七、舞曲，八、琴曲，九、杂曲，十、近代，十一、杂歌谣，十二、新乐府。最后四者，实隋唐以后因新乐产生之新诗，及文人之拟作。自郑樵以清商即相和，而梁任公则取郭氏前八类，唯以杂曲代琴曲。研究文学史者，至今议论纷纷。我以为若论汉代音乐，当本蔡邕之说；若论汉代诗歌之体，则明胡应麟分郊祀，铙歌，相和，清商四体最为简明。盖横吹鼓吹，皆属铙歌；而舞曲者，实即燕射之用，而其体裁，除楚辞体外（如武帝秋风词），不外相和、清商。至于杂曲，实即文人拟乐府也（如马援、李延年、张衡等人之作）。要之：一、郊庙歌之类，如《房中乐》、《郊祀歌十九章》；大概音杂夏楚，体兼诗骚。而较始皇刻石，多和乐宏大之趣。二、铙歌，多军歌体，中鼓吹曲，我国固有；横吹曲则张骞通西域后参用鼓角者。如军歌《战城南》；情诗《上邪》、《有所思》等；情调均极激越。三、清商、相和之曲，则采自民间，可说是郑楚文学之结晶。相和者，一人倡，三人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如"江南可采莲"，"薤露"，"鸡鸣"，"乌孙八九子"，"东光乎"，"平陵东"。清商者，有平、清、瑟、大曲、楚调五种，似一人独唱。所谓"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曹丕）是也。《上谒》，《来日》，《东门》，《陌上桑》（罗敷行），《西门》，《默默》，《白鹄》，《何尝》，《洛阳行》，《白头吟》，《饮马长城窟》属之。

兹各举一首如下：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偃武。"（郊祀歌）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铙歌）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北。"（相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夫为乐，为乐当及时。……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何用解愁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清商）

由此可见，汉世乐府，实一面仿效《诗经》，一面解散《楚辞》，而有三五六七言之长短句，而五言之体，渐趋固定。

**五七言诗**　其次，五七言诗起于两汉之乐府。汉世乐府除四言外，有三、七、五、九、六言五体，据《宋书》云，系依木火土金水之数。而五七言由文人拟作，成为中国诗体之新古典形式。

西汉文人之作，尚多四言（如韦孟、东方朔）。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已为五言。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光武时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皆通篇五言。唯班固咏缇萦，尚“质木无文”。直至东汉之末，乃有古诗十九首及世传苏李诗，或将清商之曲加以整齐，或托苏李赠答，咏叹离别，为五言诗之典型。作者或称枚乘，或称曹植，要以无名作者为允。十九首之一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又如：“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真钟嵘所谓“年代湮灭，清音独远。”蔡邕父女，秦嘉夫妇，皆擅五言。而《孔雀东南飞》长诗（一七八五字，中国第一首长诗）尤称绝唱。然已是衰世之音矣。至于建安以降，造成五言诗全盛时代。

七言诗，郊祀歌《天马章》“专精励意逝九阂，纷纭六幕绝大海”，及《天门》末段，皆为七言。汉世批评人物，亦常用之。如“车如栖鸡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陈蕃传）。汉人传记中常有善七言琴歌之语。此乃七言七句，实七言诗之真正起原。张衡四愁诗即是此体。兹录蔡邕琴歌一首：

“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建安中曹植陈琳，亦杂七言，渐去兮字。至传曹丕作之《燕歌行》则为十五句之七言且尽去兮字矣。至唐代尤为七言之黄金时代，并始以律绝整然之七言，屹然为中国诗体之标准形式。

沈德潜评西汉歌诗为“拙直”，“浑厚”，“矫健空灵之气”，是不错的。换言之，有一种野性。至东汉，则修词圆熟，意兴遥深，有时如沈德潜所云，“方圆之至”；然有时气力厚重又稍逊矣。

汉诗（五言）极盛，咸推建安。而曹氏父子三人，均擅文名。实则其时七子，皆汉末四方之才，王粲尤为冠冕。唯曹氏“礼貌英俊”，一时集于邺下。子建自是“才子”。然钟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亦阿好之言。至于操丕

之作，常有捉刀，故璧瑕互见。唯群相磨炼，自有精光。太白云，“蓬莱文章建安骨”；又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合而观之，得其实矣。

**辞赋**　纯粹文人之作，则两汉以辞赋知名，尚在五言之前。五言是国风之延长，辞赋则直接受楚辞及荀卿赋之影响。“汉初词人，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品物毕图，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

汉人之赋可分二类。一是班固所谓“贤人失志之赋”，这是承继屈原的。贾谊以后，作者不绝，直到三国以降，才逐渐为五言诗（咏怀、游仙）所代替。二是说理叙事之赋，这是本荀卿而扩大之的。扬雄班固所谓“靡丽闳衍”之辞，陆机所谓“体物浏亮”者，此以枚乘《七发》开山，司马相如《子虚》、《大人》、《哀二世》，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蜀都》，班固《两都》，张衡《二京》、《思玄》而造极。至建安中，王粲作《登楼赋》，开六朝小赋之先河。“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较《哀江南》，犹有汉人生气也。

近人对于汉赋一概称为庙堂文学，甚至讥为死文，字书；只恭维王褒《僮约》。此妄论，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女乐为诗歌之原，俳优为戏曲之原。到了武帝之初，因国家富厚，“设俳优，舞郑女”（东方朔语）。当时俳优犹承先秦优孟衣冠，以滑稽为主，即一种喜剧。刘备入蜀之初，博士许慈胡潜二人由口角而至杖斗。备愍之，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以感切之（《蜀志》许慈传）。最初之赋，即俳优侏儒倡家所说。其后文人写赋以供俳优讽诵。故赋可说是剧本。凡赋多作二人对话，宾主问答。（又《汉志》有主客赋。）而枚皋云，“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皆可为证。王褒《僮约》，殆即本来俳优之赋。

史称汉武帝于其时辞赋家“俳优畜之”，宣帝以“辞赋贤于俳优博奕”，扬雄亦以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许即是此故。如大家所知，其后文人仿之，寓以讽谏，或不甘写俳优剧本，以其体自写其情志，才有以上诸人之赋。由俳优变为辞赋，正如由乐府变为五七言诗。而其文学价值，又何可否认？如《七发》、《两都》，其结构，其词藻，其想像，都是很难得的。至于不好懂之故，一则当时字体不好认，二则亦有当时口语在内。若有人易以通行之字，或译为较通俗文体，实在是不坏的文章。近人一面轻视汉赋，一面说中国无叙事诗，此直不通之论。此后赋一面分化为箴铭连珠，一面分化为颂诔之体和骈文，直至近代，王闿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之文，皆颇得力于汉

赋。在文学史上，决不可忽视的。

**散文**　六朝之世，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唐宋以后，韩愈以后，文又以散文为主。故《昭明文选》，赋诗居先；而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论辨为首。〔注二〇〇〕近世西人仅以美文小说为文学，其实亦不过一部分人之见。然无论中外，散文典型，皆为史学。秦汉之际散文，首为《国策》，次为论史论政之文。而汉人所称文章之士，则首推两司马。相如为韵文之宗，太史公则散文之宗，其后则扬雄为著。曾国藩分文为十一类——论著，辞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除辞赋哀祭外，太史公书无不包括。而史公对中国文学，除内容外，在形式上：一则长短相错。以三四五六字相错，《左传》、《国策》有之。然史公之文，有时一字，有时十字，实尽运用之妙。二则无废语，虽长江大河，皆言之有物。三则出之于自然。韩愈每论文必太史、相如、子云三人连称。而柳宗元则谓本于书诗礼易春秋为道之原，参之穀梁、孟、荀、老庄、国语、离骚以博之，而最后则“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是太史公不仅为中国史学之祖，又中国散文之典型矣。

然太史公非刻意为文者，尤不长于美文。他作了一篇《士不遇赋》，几如明张燧所云，“绝不成文理。千古奇才竟绌于雕虫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强耶？”

**其他**　刻意为文，始于扬雄。文章摹仿亦始于扬雄。此风至东汉大盛。中国所谓文章，最特殊者，为韵散兼行之体。此尤以铭、颂、哀、诔之文为著。此实由史文、辞赋分化而出。铭颂之体，秦刻石及汉景帝颂（见《汉志》）已是。而其盛则始于扬雄之《赵充国颂》与《十二州箴》。哀诔之文，挚虞谓始于崔瑗。其实东汉初杜笃已为诔，特崔氏父子，“世擅雕龙”，更专心于文章书法。而蔡邕尤工各体之文，著有“诗，赋，碑，诔，铭，赞，连珠，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十篇”。王应麟谓“文苑传自东汉始而文始卑”。此自经学家之观点。由文学观点看，东汉之文究有进步之势。顾亭林且谓“汉世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然扬雄尝叹“抚我华而不食我实”。蔡邕亦谓“诗画辞赋，才之小者。君子当志其大者。”后来酬应之文之滥调，亦二人所不及料者矣。

小说之名，始于汉世，刘班列于十家之一。孟子之所谓齐东野语，庄子所云“齐谐”志怪之书，其他诸子中寓言，神话，及韩非《说林》之类，皆小说滥

觞。而《说林》开掌故笔记之端，尤我国小说特有之体。专门小说，当以《穆天子传》最早。《汉志》所载小说十五家，殆多为汉时之书，最有名者为《虞初周说》，其人在武帝时以方士为郎，大约谈周时轶闻及神怪之事者。今所传汉魏小说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内传》之类，托东方朔班固等，自不可信。不过神仙与西王母传说在汉代确极流行。汉末鸿都文学，"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又"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虚冒名氏"（蔡邕传），亦小说戏剧进化之一端。唯我国小说，一直在轶事、志异、识小、寓言阶段，至唐代始有波澜，宋元明始与戏剧并为大国耳。

## 造形艺术及书法

**建筑**　最足以代表一时代之情趣者，莫如造型美术；最足代表一时代美术情操者，莫如建筑。秦汉最大建筑，莫如万里长城。今日长城并非当年长城，但规模尚在。

其次是宫室。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阿房宫殿高数十仞（八尺曰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史记》始皇本记，《汉书》贾山传）。萧何治未央宫，刘邦怒其过于"壮丽"。武帝后，务为壮丽，营造不休。体象天地，雕玉裁金。"历十二世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班固《两都赋》）。武帝建章宫最伟大，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台井干楼，咸高五十余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阶陛及楼屋椽首，咸以玉为之（《水经注》）。班固谓长安西郊"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其中乃有大宛之马，条枝之鸟"；"神池灵沼，修池飞阁"（《两都赋》）。成帝昭阳宫最为美丽。此著明美人飞燕姊妹之居。据《汉书》外戚传，其宫中施彤朱，殿涂髹漆，门皆镀金，阶用白玉，四壁则黄金真珠宝石珊瑚孔雀羽毛为饰。班固说，"屋不呈材，墙不露形。"鲁灵光殿规模"上应星宿"。王莽征天下工匠，起九庙，祖庙东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欂栌，饰金银雕文（《三辅黄图》）。东汉因儒学影响，其初朝廷之明堂辟雍，大为朴素。然其后贵族宦官乱政，若辈私第，奢拟帝王。梁冀修造楼观，数年乃成。壁柱雕镂，图以云气仙灵。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后汉书》本传）。侯览第宅十六区，高楼池苑，堂阁相期，饰以奇画青丹之属。至于桓灵二帝，急起直追武帝成帝，大造宫殿苑囿。灵帝敛天下之钱，

修宫室，发诸郡材木文石，材木至于腐积。造万金堂，铸虾蟆吐水，转水入宫。作翻车渴乌（机车唧筒之类）引水洒路。桓帝于宫中祀浮图老子，灵帝则喜胡服胡床胡饭，日以胡乐胡舞为戏。（案房屋有楼，居室用床，皆起于汉。）仲长统说汉末宫室云：

“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台榭高数十百尺，壁带加珠玉之物。”（《群书治要》引）

其次则陵墓。始皇葬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贾山传）。其后汉文帝有霸陵，武帝有茂陵，宣帝有杜陵，成帝有昌陵，多埋金玉珠宝。寻至戚宦，纷纷效尤。“京师贵戚，郡县豪家，必欲江南之木。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东至乐浪，西达敦煌。金镂玉匣，多埋珠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潜夫论》）

这说明汉代的富力，然而也说明财富之集中，浪费，造成汉代之灭亡。西汉财富集中于一个皇帝，中产阶级还多。到了东汉，过皇帝生活者，不只一人，中产阶级就不能生存。因此，也就不能不亡国了。这些巨大工程，皆人民之血汗，一代的工巧。他由无赖的帝王将相集中，又被无赖的盗贼消灭。阿房宫因“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之宫室，西汉毁于赤眉，东汉毁于董卓，并及陵墓；墓之发掘，直至晋时。《晋书》索琳传云，西晋末盗发霸杜二陵，多得珍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多耶？”琳曰：“汉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茂陵，赤眉取陵中，不能减半，今犹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

**论秦始皇墓前兵马俑** 近年来大陆考古学上新发现甚多，尤以秦始皇墓侧兵马俑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面色如生之女尸及许多古书古物最为惊动世界。而秦兵马俑且有“世界第八奇”之称。去年秋天，著者游大陆，特别到西安看了秦兵马俑，准备对本书第五版论秦汉造型艺术部分加以补充。而返台之时，书已全部印就。于是仅在卷首插图中补秦兵马俑图片五帧，在卷末补此论述。

关于秦始皇骊山陵墓之奢侈，本书五一二页曾引《汉书》贾山传，略作说明。兹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如下：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锢而致椁〔外棺〕。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

弩矢，有所穿近者则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者皆知之，藏重〔第二次之意〕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墓道〕。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此记始皇陵最详者。又集解引《皇览》，“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又正义引《关中记》，“有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山诸山。”

我国帝王陵墓构造，大抵棺椁置于地下深处，上作宫殿，陈列殉葬物品。秦始皇墓特别淫侈，总观上文，似层层宫殿之上，另以巨石作成拱门式之城楼，再于楼上聚土为山，即今之郦山。由于当初建筑之工匠皆活埋而死，无人知其内藏，而整个之墓埋于山下，所以项羽屠咸阳，杀秦降王，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未波及始皇陵墓。

一九七四年，在西安市东三十七公里秦始皇陵东侧，因农民打井发现若干巨大陶制人像。经过钻探和发掘，证明这是秦始皇墓中陪葬的兵马俑。坑有三个，一号坑全部发掘，已有一千件兵马。三坑合计，人马可能在五千左右。至一九八〇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又发现两乘镶饰金银的铜车马。

由于出土的陶俑人马与空气接触后发生变色和变质作用，现在发掘工作已停止进行。而秦始皇墓的地址和结构至今还是一谜。不过陵墓最外部的兵马俑出土后吸引了全世界游客，而大陆也常运一部分到外国去展览，轰动世界，遂有“八奇”之称。在其他六奇业已消失之时，秦兵马俑与埃及金字塔并为世界之二奇了。

这陶质兵马和铜质车马，表现两千年前秦代军队的衣帽、铠甲、鞋子以及铜簇、马具的形式，秦代军人军官的阵容和当时河曲马的体态。军人体格都是高大的。即使在两千年后，看那纵横的排列，仍想见秦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风。而每一军人的面部各不相同，以及铜车装饰的华丽，可以看出当时工艺水准之优秀。

始皇的陵墓以及他到处游行的刻石，和埃及法老们的金字塔，罗马皇帝们的墓一样，都是陶醉于权势，以及权势之永远保持——个人之长生与万世一系。

但秦兵马俑还表现更多的军国主义，因兵马俑还是金字塔中和罗马帝

王墓中所无的。但秦国的军国主义可以削平六国，不能长此统治中国。他二世而亡。因此时儒家学派已经起来，代表中国人民不要军国主义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是靠他的兵马，尤其是靠他用各国人才，并用其财富与金钱收买各国政治人物。他早已刮除国内贵族，成立了官僚制度和常备军，最后兼并六个封建诸侯王国，而统一中国。

秦代兵马俑与铜马车对于了解汉代艺术也有启示作用。汉代文化是纠正秦代只讲权力而不顾仁义而来的；在艺术上，汉代也是纠正秦代量的宏大主义而走向质的优美的。（【《论秦始皇墓前兵马俑》为作者】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八日记）

**雕刻绘画** 雕刻图画，先多附于宫室。秦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铜人），高达五丈（《汉书》五行志）。汉建章宫铜凤，亦高五丈，饰以黄金（《水经注》）。此外又有承露铜柱，石刻牛郎织女，和巨鲸。杜甫咏古诗云：

>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
>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西汉霍去病墓前石兽（牛羊马），东汉鲁王墓及中岳庙前石人（翁仲），高颐墓前石狮等至今尚存（唯多在外国）。又《三国志》王朗传，会稽人木刻秦始皇像，与大禹同庙；则已有木像矣。

汉代美术，会合南北，尤受楚人影响。楚人于宫庙为壁画。《天问》所咏，即楚庙中天地山川神怪及古圣贤人物之图画。汉人亦承其风。武帝设画官。宫殿皆有“彩室”、“画堂”、“画室”（成帝纪注）。灵光殿除外部壮丽外，其内“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随色象类，曲得其情。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此可见汉世色彩之画。又州郡“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夷人畏惮”（《后汉书》西南夷传）。则地方亦然。

壁画除神怪外，以历史及当代人物肖象为主。武帝图功臣于麒麟阁，画金日磾母，画李夫人，画周公抱成王图赐霍光。其后汉明帝图功臣于南宫云台。汉之壁画，大概都是“述故事以昭鉴戒，状神怪以祝吉祥”。然亦有为猥亵之画者。〔注二〇一〕除壁画外，亦有屏风之画，及单幅肖像之画（如团扇上）。成帝幄坐，张画屏风画妲已。光武召见宋弘，屏风上有列女。而毛延

寿之昭君画像，惹出千古悲剧。桓帝征姜肱不至，使画工图其形。又《后汉书》应劭传，其父应奉为司隶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可知汉世人物画肖像画之盛。

然中国古建筑易毁。一则多系帝王之宫殿而非如西方之神殿，有较多之神性与普遍性，兵乱犹不敢毁之。二则多土木，不如西方多石造，易于保存。于是附属之刻画亦不可得而见。唯中国古代有石室，主为藏书及国家重器之用，所谓金匮石室。又汉人重葬，以宗庙礼移于陵墓，而有石祠（享堂）石阙（墓门）。《水经注》常言及汉代石室，高丈余，四壁隐起雕刻，盖亦仿宫殿者。在石室无存之后，唯此可推见汉之建筑及其刻画之一般。今传世者，以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及画像，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石刻为有名，可见当时车马衣服之制。前者为前汉所建，画为阴刻，后者后汉所建，画为阳刻。又成县五瑞之图（黄龙、白鹿、嘉禾、连理，甘露及承露人），则刻于山崖。近年来四川、朝鲜及满洲，亦发现墓室甚多。观其结构，可见汉人建筑。斗拱制，翚飞式，皆承前代美化；柱之形状甚多（圆形、八方、四方），常刻蟠龙，头饰有似希腊者。一般雕刻绘画，兴趣所在，为神仙、巨兽及历史人物，其气象甚生动。今存汉代石阙之石狮，与今日各地官署前石狮类似。然一般而言，多甚古拙，远不如希腊之工。中国之石，非如大理石之细腻，故尚不能以此代表汉代之建筑刻画也。这些石室石刻，亦后来佛教窟像之先声。

尚有两类古物，可见两汉建筑之大概规模及雕刻绘画之细工水准者。一为瓦当，画砖，明器。汉代陶瓦明器除人马车之外，有楼阁殿屋之形，有作三层之高楼者，有为羊豕之圈者。瓦当多作圆形或半圆形，有字有动植物图案。砖有方形的字与图案之砖，有长方形或方形的画砖。画砖之画颇类石刻所见。然彩色画砖，则精美之至。今波士顿博物馆有洛阳出土之东汉画砖数块，其中有斗兽之画。又有一幅风俗画，以胡粉为底，朱彩着色。女人容貌，极为生动。现存汉画中最高之作品也。此尚出于画匠之手，由此可推当时画家作品之水准。然即此作品，较之顾恺之《女史箴》，亦未遑多让。若非然者，何至有昭君怨乎？此外山水背景，亦在汉代略见萌芽。一般而言，汉画以线条为主，自此为中国之传统。此由毛笔而来；所谓骨法用笔，乃中国作画之基本技术也。亦因生命感之丰富而来，所谓“气韵生动”，乃中国作画之最高境界也。

**工艺美术及书法** 次为工艺美术品。此不仅可见工艺水准，亦可见艺术趣味。金玉为古代工艺二大材料。我们已知殷代青铜美术之精。周人青铜美术不如，更重玉器。除圭外，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黑璜，多用于装饰。商周铜器样式多动物，作凹凸之纹。周代以降，品质日劣。不过战国时代，造器地区扩大，金银镶嵌渐起，人物图案渐代替兽纹。秦式艺术多趋于实用品，样式则多为浅的云纹。又武器马具上之动物式装饰，则表现塞契特之影响。汉代实用品大量用铁，铜器全盛期告一结束，然各种工艺并兴，并继承殷周动物式及秦代纹样作风，更加轻快，发展雄健豪华装饰美。今存于世，流传各国者，一为铜器，如香炉，烛台，武器，尤其是铜镜，不少用金银镶嵌花纹者。二为玉制礼器，佩饰，剑柄，带钩等。三为丝织品之染色及图案花纹。四为漆器，如奁匣之类及图案花纹。五为瓷器及陶瓦器(上述之砖、瓦当、明器之属)。前三者承于前代，后二者则汉人特别发展者。其品质之精，世有定评。铜器有的刻动物。铜漆锦帛花纹多天象、云气、神仙、孝子、龙虎、凤凰、狮、鲸、连理、灵芝，而几何形图案，如涡云及菱形，多作流线型式，尤为特色。汉镜最为世所珍贵。现存巴黎之玉虎，伦敦之玉马首，可代表汉人之玉器艺术。而丝漆品，磁器与釉彩，皆自汉代即代表中国文物，经中亚传于欧洲，是我们已知道的。(关于汉代美术，可看 Sirén and Winkworth，"Chinese Art"；A. Silcock，《中国美术史导论》；日本平凡社《世界美术全集》第七卷收集两汉美术品照片。)〔注二〇二〕

要而言之，汉人之艺术特色，为量之闳大，实用性，向无限宇宙之追求，动力性之美感。此表现为法象制器(天象山河)，神仙思想(云气，武帝所谓飘飘有凌云之志)，雄伟的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飞翔式跃进式的均齐感(图案之形)。汉镜亦表现汉人美感。《汉书》常说人之仪容，而以"伟丽"形容之。张苍"长大肥白"，王陵"怪其美"，始得赦不斩。张敞亡命豁达，为妇画眉。汉人之艺术趣味，是实用的，壮美的，动进的。

此外，自笔墨纸发明以来，隶楷草行皆备于汉。东汉人——曹喜、杜度、张芝、刘德昇、蔡邕、钟繇等将各体标准化；同时创造了一新艺术，即书法。自此书画二者，也就相辅而行。(汉镜上多有字，开后世题画之风。)这是中国特有的。唯在这一方面，中国之画，或亦多少受累耳。书法至晋而极盛。这亦表现知识分子之趣味，然与一般文化关系，毕竟是非常间接的；本书从略。

## 宗教

上说中国无宗教。然秦汉之始与终，却可见宗教复活之趋势。其始如上所述，由于因帝国各地宗教巫术集中，帝王淫侈自大之心，促进淫祀。其后则因佛教东来。而秦末及汉末大乱，乃促成宗教复活之因素。宗教情绪总是因苦难而发生的。而宗教又终于促成汉代之乱亡。

所谓中国无宗教者，非言中国人思想中从无宗教成份。宗教以超人崇拜，神话，精灵信仰，及一定仪式为基础，而因与巫术、民俗、乐舞——此即后来方术、道德、文学结合，尤其是与政治结合，有民众信仰，始表现一种完整的力量；此即政教一体之时。自人文思想之发达，政教之分化，首先政治独立；及儒学诸子之兴，将道德带走，并将祖先之祭祀带走，各种方术渐趋合理化，神话泄之于文学（如楚辞）。这是各国都经过的过程，不过中国经过得最早。于是中国本来宗教，便显得只剩下一种淫祀（多神教）与低级巫术，而不成形体。所以有人说中国宗教甚为浅薄。然而我想，这不是坏事。中国一般人缺乏严肃认真之精神，也许多少与宗教之缺乏或淡薄有关。但这不是不可以其他补救的。严复先生尝谓中国有“名教”。责任心、名誉心之培养，道德观念之提高，是可以有宗教之长而无其短的。名是三不朽的象征。

不是中国本无宗教，而是中国“宗教革命”最早。不是中国宗教浅薄，而是中国宗教之分化最早。但宗教种子尚存在于社会。一遇到有利因素，便重行复活。然又因儒学思想之根深蒂固，宗教亦难于再兴。

## 祭祀之合理化

祭祀是宗教原始形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对中国古代宗教，作了一个极好的简史：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下至禽兽豺獭有祭。民之精爽者，神或降之。曰巫、觋；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曰祝；能知四时牺牲，氏姓所出者，为宗。故有神民之官。民神异业，敬而不黩。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家为巫史。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无相侵黩。自共工氏霸九州，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烈山氏子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郊祀社稷，由来尚矣。舜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五岳。禹遵之。十三世至孔甲，好神。神黩。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乃弃烈山氏子，而以周弃代为稷祠……后帝乙嫚神，震死。后纣淫乱，武王伐之。周公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室中）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后十三世，世益衰，礼乐废。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汉书》郊祀志）

此我国由民神杂扰而民神分属，而政教分离，祭祀合理化之过程。祭祀归于礼乐后，宗教即瓦解了。

## 所谓封禅

但春秋之世，秦齐诸侯扩大天神之祭。《汉书》郊祀志续云：秦襄公攻戎救周，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祭坛），祀白帝。古以雍州最高，神明之隩。黄帝尝用事，晚周亦郊焉。（案：此亦表示中国文化起于雍州。）其后畤益多，如鄜畤祭白帝，密畤祭青帝，又作上畤下畤祭黄帝、炎帝。又有陈宝祠（陈仓宝夫人）。而齐有天、地、兵、阴、阳、日、月、四时八主之祠，及封禅之传说。封谓于泰山筑坛祭天，禅谓祭泰山下小山梁父以祭地，古帝王于受命后见太平之瑞，皆以此报群神之功云。齐桓公尝欲封禅，管仲止之。秦并天下，古来西部东部宗教之残余会合，乃祭四岳、五渎，及雍州之日月、星辰、二八宿、风伯、雨师。又祭周人杜主祠寿星祠，唯雍四畤上帝最尊，人民则祭陈宝。三年一郊。名山大川八神之属，上过则祠。民各自奉其祠。汉兴，刘邦谓天有白、青、黄、赤四帝，加上他本人为黑帝，共为五帝。又祭蚩尤，立祀官女巫，梁巫祠天地，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秦巫祠杜主，荆巫祠司命，九天巫祠九天，尚有河巫之类。此淫祀之大集中。文帝稍革之，唯听公孙臣谈服色之言，郊祀上帝于雍。赵人新垣平言望气，作渭阳五帝庙，一殿五门。

## 方仙道

秦汉之际的方仙道利用秦皇汉武淫侈之心，使封禅变为求仙运动，为汉代宗教形成一重要桥梁。

先是始皇登泰山，以雍州之祭礼，行封禅之礼，遇风雨。乃东游海上祭八神，求仙真人。其时燕人有方仙道，皆以邹衍之说，讲形销解化之事。屡派方士徐市（福）发童男女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神仙之奇药。不得而死。到了武帝即位，初至雍郊，先信神君（女死为神者）。时有李少君，言辟谷，自谓能化丹沙为黄金，又尝见安期生，安期生来往蓬莱云。武帝乃从事炼金，又派人入蓬莱。而燕齐之士，争言神事。不过地上既已统一，天上亦非统一不可。亳人缪忌奏言天神泰一最贵，五帝佐之。案：此殷人传说也。武帝令太祝立泰一坛。其后齐人少翁能使人与神通，封为文成将军（后不验杀之）。作甘泉宫，图天地泰一诸鬼神，又作柏梁、铜柱，及承露仙人掌之属。其后武帝生病，巫医无所不致。病愈幸汾阴，立后土祠，于泽中圜丘为五坛，望拜如上帝礼。乃始巡泰山。而齐人栾大言能致神仙，封为五利将军（后亦以不验被杀）。旋得"宝鼎"。而齐人公孙卿因嬖人献《鼎书》，谓汉帝能封禅成仙如黄帝，言"黄帝游五山与神会，且战且学仙"云。武帝喜，令祠官宽舒筑泰一五帝坛等，见美光黄气。方士言黄帝使素女作五十弦，仿作箜篌及瑟。乃议封禅，诸儒所言，不合其意，罢诸儒，益信方士，登中岳，在山上闻若有言"万岁"者。上泰山，巡海上，"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益发船入海求蓬莱"。上泰山时以玉牒书秘礼，无风雨，夜若有光昼见白云，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可得，武帝"欣然庶几遇之"。后遣方士采仙药者以千数。及平两粤，又效越祝鸡卜；作延寿观，庆灵芝。齐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效之。作昆仑楼，祭泰一五帝于明堂。又上泰山，考验方士入海求仙者不验，仍"冀遇之"。公孙卿云，求仙不可急，仙人好楼居，乃作建章宫之属，北有大池，中有蓬莱之属；又改历法，改元太初。是岁伐大宛，以丁夫人及洛阳人虞初诅（咒）匈奴，复封禅泰山，候神人及入海求仙者，终无有验。天子厌怠，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封禅书）。武帝半世纪的皇帝生涯，是四种运动：求仙，远征，声色狗马，文学经术。

凡此求仙之荒唐，非武帝一人之事。黄帝成仙之说，《淮南鸿宝》之书淮南登仙，及东方朔为神仙下凡之说，在汉盛传，安期生王乔等，以活人成仙，汉人亦多信其事。元帝时，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之奸。王莽至死尚信其可以成仙。凡此荒唐，亦与医药卫生之术有关。当时方士采药、化丹、作液汤（郊祀志）。今传汉末魏伯阳《参同契》，本京房"纳甲"说（纳十干于八卦）言丹鼎，以为人可自炼精气而为内丹，无须外求仙药。此外亦与天文航海知识有关。故求仙运动亦反映汉人方术进步，人力增进，征服自然之欲望，特不得其道耳。又求仙运动对汉代建筑雕刻绘画亦发生绝大影响（如承露仙人，云气图案）；犹后世佛教之于艺术也。

秦皇汉武之入海求仙，有如若干少年入山访求剑仙一样，其本身并非宗教。然求仙促进求神，促进淫祀，促进宗教。武帝之时，除秦人雍五畤陈宝祠外，有甘泉泰一五帝之神（泰畤），汾阴后土之祠，最尊；此外泰山五年一封，八神及群岳过则祀之，外则粤祝祠等。至宣帝时，广立神祠，又修匈奴之径路神祠，求益州金马碧鸡之神，有所谓白鹤、凤凰、甘露、黄龙之瑞。由于神道之兴，宗庙之礼亦神权化，宣帝为武帝立庙。各地亦立之。此后皇帝皇后之庙凡百余所，一岁祠上食用二万余石（?），卫士乐工几至六万人之数（《汉书》韦玄成传）。至元帝时，贡禹、韦玄成、匡衡、张谭始以古礼天子七庙，又天子唯当于国郊南北祭天地群神，应罢其过浮乱者。匡衡云："祭祀之义，以民为本。"罢郡国之庙，其他杂祀罢四百余所。然刘向尚以为所罢过多，复泰畤汾阴及雍五畤陈宝祠。成帝无子，又复好之。谷永、杜业谓"奇怪鬼神仙人服食，黄冶变化，化色五仓，无有毫厘之验"，"奉天之道，贵以诚质"云。似不能见听。哀帝时庙凡七百所。王莽之世，分群神为五部，立官社官稷，自六宗至小鬼神凡至千七百所。至于东汉，初崇省约，有告天郊祀明堂六宗之祀，宗庙则七庙为四时伏腊之祭，社稷一岁三祠，此外则先农、迎春之礼，大体本于儒家之说。至桓帝好神仙，为老子浮图之祀矣。（《汉书》郊祀志，《后汉书》祭祀志）

这似乎可见两汉神怪空气之弥漫。不过，这多半为皇家求寿求子之为，以及方士迎合之事，知识分子固不信之，且因儒家之批评，使祭祀折衷于礼。宗教仪式还不能在淫祀或杂祀中建立起来。唯亦足推动宗教空气，为宗教运动铺路，则是不成问题的。

## 谶纬与道士

推动两汉宗教运动另一潮流，是谶纬。谶纬与神仙有些瓜葛，但凭藉不同。神仙借助于医药神话，谶纬则由天文易经而来。前者言长生，后者言灾异、象数符命。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自朝廷信方仙道，民间方术日益花样繁多。另一方面，自阴阳五行说兴，阴阳家以五星说禨祥，儒者以五行说灾异，乃有新方士。旧方士指方仙道，新方士则谈星望气者。他们先效经书而为纬书，后以图谶附会儒学。

前面已述正统灾异说与纬、谶之别。灾异言五行，纬书言象数，图谶言符命。不过互相影响，且皆日益受新方士影响，渐有新旧方士合流之势。政治恶化推动此一合流；纬书谶化，即其具体表现。

**灾异与谶纬**　亦皆非宗教。唯均多神话。三者推波助澜，一时殆欲将儒学变为儒教，将孔子变为预言家与教主。然儒学究与宗教不相容；孔子终不类教主。欧亚诸国统一后常有国教。国教在中国始终造不出来，即由于此。

然随政治之恶化，人心有一种宗教要求，于是谶纬等日益依附于方士乃至巫术，向宗教前进矣。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谓汉运已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下凡教我云。刘向以为妖妄。至哀帝时，天灾屡见，哀帝又大病，夏贺良、解光、李寻，提倡其书，一时并改元，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终以“不合经义”，贺良以左道伏诛，李寻充军敦煌。李寻固以儒者而治占星之术者。此已具备宗教雏型，乃黄巾道教之根苗，亦洪秀全之远祖也。至王莽，侈言符命，一时图谶与五经同列，神仙之说亦同时大兴。先是京房自称“道人”。王莽时，“道士西门君惠好天文谶记，言刘氏当兴”(王莽传)。此道士一词之始。而君惠又言龟鹤遐龄之术(《太平御览》引)，则图谶又兼言神仙。我以为二者相合，乃宗教复活之始。

光武以图谶起兵，特别相信，图谶书至东汉大盛。及政治之日趋无望，西域魔术之逐渐输入，神仙方术之声势日盛。言易及天象者，已开始言神。安帝时，有郎𫖮者，治京氏易，“夜占象度”，上书言政，亦大抵儒家言。然论点则一派神话：

“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孔子曰，汉三百岁计历改宪。今在戌

仲十年。诗纬氾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云。(《后汉书》郎顗传)

郎顗之言中，尚无佛教痕迹。直至正始中管辂言阴阳五行鬼神，仍京房传统。然另一方面，顺桓时之于吉、襄楷，显然已知佛教。曹操招致方术之士，亦显然有西域方术影响。〔注二〇三〕张天师之出现，终须佛教为模范也。

## 浮图道

上言佛教来华，系西域尤其是月氏之介绍。至中国何时有佛，说者不一。大凡一种新信仰新风气，常先由民间或少数知识分子接受，后始为统治阶级接受，复经知识分子之提倡而普遍，亦难指一人一事为起源。世传汉明帝感梦求法之说，未可为据。“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后汉书》楚王英传)，则佛教传入当在明帝之前。而就文献资料，则楚王英为祀佛之始。顺帝时张衡提及“展季桑门，谁能不营”(《西京赋》)。桓帝时，宫中祀浮图老子(《后汉书》桓帝纪，祭祀志，襄楷传)，皆可见其日渐盛大。襄楷所言浮屠以好女为革囊，出《四十二章经》，则此经至少桓常时已译出(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注二〇四〕此与安世高来华，临淮人严佛调助其译经，皆翻译事业之始。献帝时，丹阳(镇江)笮融在徐州广陵(扬州)“大起浮图祠，容三千人，课读佛经”(《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此国人造寺之始。孙权时，康僧会东来，造寺建塔。而其时边吏奏云，“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查”(严可均《全文》引)。是否即僧会，则不可知。其后“孙琳坏浮图祠，斩道人”(孙琳传)。凡此皆可见汉末及三国时江南佛教日盛之迹。盖是时交州归吴所辖，为中外贸易要地，中国避乱往者亦多。牟融《理惑论》云，“灵帝崩后，天下扰乱，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又提到当地沙门“剃头发，披赤巾”；甚至“取贱买卖，专行诈给”；似将交州佛徒与印度月氏波斯商人视为一体也。〔注二〇五〕

梁任公以为佛教初自南方，其后流传于北方者(《梁任公近著》)。其说甚可信。不过，当时佛教来华，有二门户，一为交州，二为敦煌。如上所言，三国时，徐邈镇凉州，西域与魏交通甚密。诸葛北伐，月支康居之人又与蜀

通，其中自多佛徒。特南方士大夫先接受之，遂早见著录而已。而佛教结实，终在北方。魏甘露中（二六〇）朱士行削发为僧，并赴于阗求经而死，为汉地沙门之始，亦求法运动之始（《历代三宝记》，《高僧传》）。及晋初竺法护译经传法，佛教始大流传。按汉晋之际，中国大乱，而月氏康居亦有大乱。交州敦煌，为中国及西域双方人士贸易与避乱之地，乃造成佛教发展之契机。自古以来，文化潮流皆与难民有关者也。

浮图或浮屠（即佛陀）为我国对佛最早之称，其教则称为浮屠道。“佛”字或起于江南，始见牟融之论。陈寿尚浮屠与佛并用，以后佛字成为通称，刘宋时有“佛教”之名，此亦佛教大行之标志。佛徒先称沙门，此为月氏语。亦泛称道人。而自石勒、苻坚统一华北，由西域来者，则称和尚；盖疏勒于阗语也。〔注二〇六〕

外来文化之输入，以长城边缘胡羌之武器音乐最早，次则佛教，以后则回教，以后则耶教与西学。佛教本为一种宗教，然除仪式教义外，与其相连者，尚有印度、月氏、康居之艺术（建筑、雕刻、绘画），方术（自符咒、医术以至七曜五明之类），以及与经文有关之语言、文学、哲学——此与后来耶教与医学天文相连相似。其对中国影响之大，唯近世西学，始得而比。而其输入流传之因缘，有可得而言者。一种外来文化之输入，自以经济政治军事与交通为前提。然一种外来思想之被接受，除本为白纸之民族外，必本国若干精神上之事物有与其类似者，为之媒介；必有一定政治社会情况，为之促成；必本国之文化已趋衰微，失其信仰，始能取固有文化而代之。要而言之，自张骞开通西域，已启佛教来华之渐。黄老方仙道谶纬皆为佛教之精神传导体；而桓灵以降，中国之大乱，大汉风文化之解体，则使佛教大行之决定原因。西汉之末，佛教已为中国少数人所知。东汉一代，日渐发展。盖在士大夫心目中，浮图视与黄老相似（张衡所谓展季桑门）；而在一般帝王社会，则视为一种新方仙道（襄楷所谓兴国广嗣之术）。自东方求仙（蓬莱）失败，遂以为西方求仙可凭。桓灵以前，佛教一面混于方术，一面附于老庄，在中国播种其种子。至其大盛，实在桓灵以后，三国之世及五胡之时。中国大乱，生灵涂炭。人皆厌世，渴望精神之安慰。大汉风文化，以民德之厚重，学术之实用为特色。当其盛时，磅礴灿烂。及其瓦解，气节衰微，才智枯竭；生活上多虚伪倾险之徒，学问上则有谶纬章句之庸妄。而曹操司马懿父子复对中国文化之威信，为最后之摧毁（详续卷）。中国已入精神之无政府时代。其时在

政治上代表中国文化正统者，唯诸葛亮。然一木不能支大厦。自此廉耻荡然。尧舜不复生，求之神仙；神仙不可得（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求之于虚无；而虚无亦流于矫饰（虚无在三国时本为恬淡之意，其后始变为竹林及放达，仅以酣饮为高。详续卷）。而诸马相砍，五胡杀来。中原板荡，白骨成山。此时佛教已与其庞大之文物（经像）东来，说慈悲戒杀，苦乐皆空。凡其修德养心之言，亦颇同孔老；而灵魂不死，因果报应，则西来之新说（中国唯有三不朽及积善有余庆之义）。神仙之说较之菩萨净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牟融谓有如阳货之于孔子）；而虚无又远不如涅槃之彻底。故三国之世，佛教已在中国立足。其后乐淫好杀之夷狄酋豪，对此庄严，已感震悚；复以其为胡教，亦乐于皈依。而南渡衣冠，亦由老庄及五斗米道，进信三宝。至于苦难之人民，尤愿得佛陀大力为之救济，有西方净土为之归宿。于是胡汉披靡，雅俗神驰矣。

佛教渐盛后，其影响约有四方面。一、刺激道教之模仿与形成，为黄巾之哲学，促成东汉之亡。二、其经典及其文学、艺术以及方术、哲学，则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与启发，几难计量（如艺术上佛像、佛寺、佛塔，文字文学上之反切，由佛经翻译而发生的名词、文体、题材之移入，哲学上之翻译模拟与创造以及所谓婆罗门天文医方等）。此足丰富中国文化内容者。三、如上所述，佛教传播是与国亡世乱，大汉风文化之解体平行，且为其代用品的。中国人既感精神之空虚，自朱士行以迄唐之悟空，有一五百年之西行求法运动（二六〇——七五一）。如两汉人之精力表现于三百年之西域经营，则继起之大事，实为五百年之西行求法。这是我要在续卷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当作一个中心来叙述的。四、然佛学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之高深奥妙，而究极且有与中国文化不相容者。所以到了宋人，都"出入释老，返求六经"。佛教对中国文化，功过皆多。最大之功，是与儒学合作，和缓胡人残忍，融合胡汉南北之界，有助于隋唐之一统（Grousset，Silcock 均言之）。而最大过，则是与老庄合流，促进中国人精神之萎缩。盖二氏皆有深思处，然一言无一言空，终有逃避现世之倾向（尽管老庄言无用之用，尽管佛教言大雄无畏勇猛精进）。有其一，对强烈现世主义之中国文化，皆可起调和之作用。二者合起来，其消极性便过于严重。所以两汉文化恢弘之气，受到打击以后，便流于虚弱，乃至形成一种精神之孤立主义。明乎此，我们才能更正确的估计王阳明哲学之伟大意义了。详末卷。

## 太平道及五斗米道

以上封禅，杂祀，神仙，图谶皆尚不能构成宗教。及佛教输入，乃又有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始倡者为于吉，实行者为三张：张角，张脩，张鲁。汉武帝欲以方仙道神化其政权，而结果演变为黄巾之太平道颠覆刘氏政权。

东汉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神书"，名曰《太平清领书》。"其书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桓帝既立黄老浮屠，襄楷复上其书。不听。至灵帝时，"张角颇有其书焉"(《后汉书》襄楷传)。查此书即道家所谓《太平经》。乃似上承《包元太平经》，而受《四十二章经》之影响者。这是道家第一部经典。《后汉书》云，"巨鹿张角号大贤良师，事黄老道"(皇甫嵩传)。《三国志》言张角为黄巾首领，其道亦称"中黄大一"(魏武传注)。一时扰乱全国，为皇甫嵩及曹操诸人所平。此又称太平道。同时即有张陵张脩张鲁之五斗米道。《三国志》张鲁传云："祖父陵客蜀，作道书，受道者出五斗米，陵死，子衡传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刘焉以为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后鲁杀脩。刘璋代焉，以鲁不顺，杀其母。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与黄巾相似，雄据巴汉，凡三十年。"曹操破之，后降操。《后汉书》刘焉传，以张陵沛人，顺帝时客于蜀。道书作符书。叙事略同。而《典略》云：

>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教民缅匿法。光和中，东方有张角，为太平道，以符水治病。汉中有张脩，五斗米道。法略与角同，加静坐。以老子五千言使都习，号为奸令、鬼吏；为病人请祷"云。(《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晋鱼豢《典略》)

裴松之注，以为张脩即张衡。以后，五斗米道传于江南，益与太平合流，而为道教。〔注二〇七〕然直至葛洪、陶弘景、寇谦之，始完成道教之理论组织也。

章太炎以墨子为黄巾道士所由出。夏曾佑尝以方士并入儒林，乃有西汉谶纬；儒家与方士分离，即东汉道教原始。日人内藤虎次郎谓谶纬亦因西域交通后，受西域方面之影响者(《中国中古之文化》)。而近人(如汤用彤)颇以道教全为佛教之模仿。我以为道教在我国有固有之胚胎，此即鬼神杂祀方术；后来方士加神仙道，先托黄老；后来新方士再加纬谶，欲托孔子。孔子不可干，模仿佛教仪式，先犹附托黄老。及士大夫颇言老子，终于专以老

子为教主。甚至有老子化胡之说与佛争胜。〔注二〇八〕要之道教内以巫觋、神仙、谶纬为基础，外因佛教而定形。于是二氏（释老）并兴（《魏书》始为释老志）。二者相煽相生，亦相争相克。其始因道教模仿，过露马脚，不敌佛教。然在南北朝之世，道教有一定民族主义之意义；而在佛教烦琐堕落以后，终因其合乎中国脾味，亦曾两度抬头（唐末、元代）发生对抗佛教或喇嘛教之力量。世人皆知道教为卑俗之宗教。其实，此由中国人本不习惯于宗教也。我想中国人可在任何方面高深，但恐怕绝对产生不出一种高深宗教。不过道教中包含若干科学成分，也是不可忽视的。〔注二〇九〕而一神论、泛神论、或如佛教之教主成神论究竟何者更为高深，亦殊难说也。

此后两晋南北朝是二氏时代。无宗教之国而竟有二氏之兴者，最大原因，亦乘汉末政治绝望及两晋大乱，人心视为奇方之故。一到中国统一，终以儒学为布帛菽粟，而二氏为点心矣。

# 七　秦汉文化之历史的世界的意义

## 两汉文化是中国历史之基础与骨干

中国文化开始定型于黄帝、夏禹之世，经历商代，到周人完成中国古典文化，而此在春秋时代之齐晋鲁开花结实。此一文化，由孔子加以整理传播，同时秦楚亦努力吸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伐不绝，实质上是诸夏文化积点成面，由内而外，凝固团结的时期。在六国衰亡之后，诸夏边境之秦人起而统一中国。接着诸夏以外之楚人起而推翻秦帝国。汉代文化，是周秦文化之发展，实以楚文化为最新成份。中国文化与民族至此结晶，并为以后中国之出发点。先秦文化赖汉人而传，以后文化，亦皆由汉人出发。全部中国文化建筑之柱石，都是汉人奠定的。

而此时中国遇到外来劲敌之匈奴。在对抗此一敌人过程中，汉人又将中国历史带入一新时代。即由于对当时亚洲局势应付中，使中国文化传播东亚、中亚乃至欧洲，于是将中国历史变为亚洲史。同时，中国人也就建立一个当时世界最大之帝国，并发展“大汉风”文化。

此后中国历史，直到清末以前，只是两汉帝国以及“大汉风”文化破坏与

再建的过程。此因外内因素无根本变化。在此过程中，边境中国人民和内地文化上的反对派（有如过去之秦楚），常是新帝国之创造者。如我们不认为秦人是异族，则鲜卑、蒙古、满清，当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以后，亦非异族。

支持大帝国是要人才与文化的。文化与民质是础石泥土砖瓦，而人才则为栋梁。倘无不断的翻新，以新的柱石栋梁支持，帝国大厦终必崩坏。此亦可说明末朝季世，即有若干人才，无补于危亡之故。政治之恶化，使两汉文化衰败，而大厦亦到汉末趋于瓦解。西晋时代一度支持起来，唯栋梁朽腐，不能对抗五胡之暴风雨。但国虽破而文化难亡。此后中国文化之种子，一面在江南保存一部分残余，一部分星散在华北，均逐渐再生。此外，北印月氏（佛教）文化，也在中国播种开花。由此三者之结合，尤其是儒学之复兴，将中国破裂的文化与社会团结起来并发生新的气力。在隋唐时代，我们看见一个秦汉时代之再现。唐宋以后，中国文化虽然有新的色彩，也有新的发展，但根本规模还是两汉式的。如果唐代类西汉，则北宋类东汉。而南宋时代，实在一面是新三国（宋，辽，金），一面也像东晋。蒙元勃兴，实际上是元魏之再现，不过规模更大而已。明人恢复汉业，有似唐人。然他们不是北方汉人势力，而是淮、泗、荆、吴人士。此中国历史之一变。但这些地方是古之楚地，所以还是重演汉人故事。世人每轻视明代文化，这是不正确的。明代足继汉唐。不过蒙古大帝国瓦解后，世界正酝酿大变化，西方有文艺复兴与航海运动。而朱元璋朱棣父子教养太低，造成后来的特殊腐败。而清人入关，可说是鲜卑南下之历史之第三次重演。而此时西方则由科学革命进于工业革命了。

于是十九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另一全新的局势：工业与帝国主义时代。不过我们是被动的进入世界史的时代。中国应建一个新的国家生存于世界史中，而这一国家，自亦与秦汉式国家不同。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团结全国，吸收新知，创造新文化，来建设这一新国家，以适应新环境的原理，是相同的。汉人能创造新文化，适应其环境，改造其环境，以建设新帝国，才有此后二千年的历史。近代中国人的负担较刘邦时代沉重，但我们的气力才智，似乎远不如先人。这是今天忧患之由来。在结束两汉史时，尚须论其世界史之意义。

就国史而言，黄帝禹舜周孔而后，没有比汉人集体成就给我们赐与更多的。如要谈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即是秦汉文化或汉文化。这是中国历史的

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之骨干。

## 关于汉代文化之误解

首先必须指出关于汉代文化学术之许多误解。过去宋儒指出汉儒说经许多错误，这是后人胜于前人处。但宋人轻视汉唐，以汉人为“功利”，则并不公道。宋人之学，大部分是由汉人而来的（尤其是易学）。不过兼并“二氏”而已。

到了清代乾嘉之时，由于反对宋学，重张汉学之帜。而所谓汉学，主为经学，所谓经学，主为考据。他们对名物考证，大费心血。古书赖汉人而传；而汉人之书，赖清人才大为读通。但是，汉人之学，实在不止经学，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近时，许多人艳称先秦，轻视汉代。他们甚至以为汉代尊儒，几乎要负中国不进步的责任。汉武尊儒，乃儒学便于专制之证；而罢黜百家乃中国学术停滞，尤其是科学不发达之故。汉代学术不过儒学，儒学不过经学，经学不过阴阳五行。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不失一本大作。他说中国无近世哲学，此言不甚错。但谓“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其所见皆以古代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又有著《汉代学术史略》之顾颉刚，既以经学不过阴阳•五行谶纬，而阴阳五行谶纬全为荒唐迷信，遂极力将其戏画化。曾不思果然如此，则此一世界最大帝国何能存在，且垂范至于今日？

钱穆先生说研究本国史应附带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尚不作此先决之要求，只指出两个森严的事实：第一、今日已经成了一个世界。一切应在世界史中决算。愈研究世界史，才愈能衡量中国史或外国史之价值。我不因自己是中国人，即故意空言本国史之光荣。我不赞成浪漫主义的夸张。但相信即使是火星人，如能对地球各地历史加以研究，一定会惊奇于中国史之价值，尤其是汉人之才能。钱先生所谓本国史虚无主义者，乃正是对中外历史皆为无知之人。第二、我们的体质与言语，使我们没有方法不做中国人。即使我们自己不承认是中国人，全世界依然认我们为中国人。我不赞成一种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但相信一个人最大的责任，最后是要对人类——亦即世界史有所贡献。而这贡献，一个合理而必然的基础或杠杆，依然是自己的民族与国家，换言之，即是继续创造自己本国的历史；使

本国历史能对世界历史作有价值的贡献。这是我研究历史的根本观念——目的;基此目的,也便有下述同时比较的方法。根据这观念,我才觉得每一中国人实大可自豪自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两汉文化之子孙。兹先指出上说对于汉代文化误解,非皮相之见,即道听途说之言。

第一、儒学之尊,非因汉武之尊;儒学亦不便于专制。秦末以来,儒学业已大盛,此儒家奋斗之结果。而儒家较之其他诸家,对国家政治有较系统之理论;而儒家所奉六艺,较之他家之书有更大弹性(此二点冯友兰已言之)。再则儒家又能吸收他家之说以成其大,亦其得人信仰之原因。汉武尊儒,不过因儒学已成思想之主潮,犹之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不过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若言便于专制,莫过法家。后来专制君主皆"阳儒阴法"。所谓"阳儒",则儒学非专制者所喜明矣。

第二、所谓罢黜百家并非统制思想;汉人之学,自始至终不限于儒书。以为有经学即子学结束,是绝大错误。恰恰相反,汉人对于以前的文化和书籍,作了一大整理。自惠帝除挟书之禁,武帝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更搜求天下遗书。《汉志》所列,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集于中央图书馆。在汉初,各种学派自由流行,观司马谈论六家,枚乘七发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孔老孟子列举,可见。及武帝尊儒以后,《汉志》所列,六艺不过六略之一,此外尚有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儒家不过九流之一。儒家见重,不过"于道为最高"(《汉志》),非百家之学,因此而中断。百家之学,汉人均有著录,阴阳、道德,始终流行。老实说,汉室尊儒,对儒学害多利少。罢黜百家,不过不以百家为博士,这应该无损于百家的。厥后魏晋间郑默、荀勖制定中经,列群书为甲乙丙丁之部。自兹以后,诸子百家,均皆收录。除隋世焚谶纬外,何尝废百家之学乎?

较奇怪者,是名墨之式微。按名家实为论定义分类之学,其后流于刑名。刘歆《六略》,刘熙《释名》,刘劭《人物志》,仍其遗意。至魏晋六朝而有名理之学。至于墨家,葛洪谓墨子变为地仙(《神仙传》)。全谢山以为鬼神之说所由起(《经史问答》),章太炎以为即黄巾道士所从出,梁任公则以为游侠者是。然此均无确据。我在前面指出汉初谈灾异公羊之儒家,有墨学尊天、明鬼、尚同之成份在内。汉人著作自《淮南子》,《盐铁论》以至蔡邕之文,均以儒墨并称。儒墨并称而无独立之墨家,足见汉人心目中儒墨实渐不分。观兼爱、尚同、尚贤之说,为汉人所常言;而节俭、节葬为汉人所实行,亦可为

证。至于墨家鬼神术数，与方士相通，亦自然之势。换言之，汉代墨家已为儒家方士所吸收。或以为墨学尚有科学成分，须知汉代在科学上自有卓越之进步，无待墨家也。〔注二一〇〕

第三、尊崇儒术，其真正意义不过是设立国学，为教育之基础，并为朝野共同信守之标准。此在当时是必然亦有必要。儒学及诸子促成统一，统一政权确定其教育方针课程，乃不可免者。汉武如不尊儒，亦会选其他学说为基本科目，其结果又何如乎？所谓立五经博士者，五经等于今日国定教科书，博士等于大学教授，博士弟子等于今日大学生。经书为国民读本，学生受业乃可做国家公务员必经过程。这一面等于后世之必修科，一面等于后世之科举。知后世之学问不限于教科书与科举，即知汉人之学问与学者亦不限于经学与经师。即以经学而言，其内容是历史，其根本思想固均在安民保民。使博士弟子参政，以补充和代替贵族子弟，是一进步；而使五经成为帝王与知识分子共同信守之标准，尤其是一种进步。汉人批评帝王之标准是："六经者圣人统天地之心者也"(《汉书》匡衡传)，"五经之文，圣人之言，天地之戒"(鲍永传)。所以，与其说是帝王以经学统制人民思想，不如说是知识分子以六经统制帝王行为。六经成为宪章原理。这并未完全成功，但使帝王仍有忌惮，总比没有一个标准好。

第四、汉人之学，实在不限于经学。汉人之真学问，如史学，艺文，天文历算及其他科学，均在经学之外；而汉代最大之学者，亦多在经师之外。汉人以通儒为贵，不以经师为贵，这是我们知道的。即以经学而言，由今文至古文，其范围亦皆逐渐扩大。尤其是天文历算，几为经学家所必通，此风至清代犹然(江永戴震焦循阮元)。而汉人除天体外，对国际问题亦极注意。如赵充国郑吉等，均"通知外国事"者。至于所谓"旧瓶新酒"，实即借题发挥；所谓经学，亦因时代而变者。此亦中外皆然。今日西人多了解近代哲学问题，亦多系古代中古哲学之老问题(如淮德海《科学与现代世界》，罗素《哲学史》所云)。然汉人又非无新问题之提出。如阴阳，如浑天，如玄，皆非六艺固有也。

第五、诚然，汉人之学，颇受阴阳五行灾异之束缚。这些东西之本身，在今日固极幼稚，但非全然迷信；而汉儒之学虽与方士相混，亦始终与方士有别。如上所言，阴阳五行乃一种自然哲学，纬学即是星学，我们不能以今日标准衡量二千年前的人。希腊人的自然哲学，以至克己派快乐派，并不一定比阴阳五行说高明。尤其是国家统一，世界扩大之后，自然需要统一世界

观。汉人之哲学努力，即求一完整的宇宙哲学为政治及生活之原理。然如无更有力科学知识，则求助于前科学乃至宗教是不可避免的。后期希腊哲学受神秘主义及占星术之类影响，结果为基督教开路。此亦与儒学受燕齐方士及西域方术影响，为佛教流入开路并发生道教相似。但西方回到“上帝”而我们走向“自然”，这是汉人进步之处。还须指出，汉儒所谓阴阳，与方士所说亦有不同。董仲舒以德教为阳而兵刑为阴。《监铁论》说“政有德则阴阳调”。到了东汉，王符之说可为代表：“天心顺，则阴阳和。民安乐，则天心顺。”然则以文化为主，以人民为主，以知识分子为主，才合天道；武力政治，帝王戚宦政治，独裁与军人政治皆为逆天；非大议论乎？再封禅为古代祭天地之祀典，明堂为朝会诸侯及教学所在，本极寻常。而汉人言之多怪异者，则帝王自欺，方士欺人使然。近人蒙文通先生云，凡言鬼神者，方士之言；言服色者，阴阳家之言；以封禅明禅让，以明堂言议政者，儒者之言(《先秦政治思想之发展》)；甚是。神仙，淫祀，图谶之诬，儒家始终不与合流也。

由上所论，可见许多对汉代文化之误解，实由于不解。

次对汉人学风特点，略述数言。第一是其博大坚实。其规模以宇宙为对象，而其精神则为“朴学”(出儒林传)。庄严典雅，朴茂沉雄；于汉人一切制作皆可见之。第二是其吸收精进之精神。汉人之学并不细致，甚至很粗，然而富于活力。他吸收各方面的材料，也向各方面追求——上天下地四海九洲追求。斯本格勒谓近代西洋文明是“浮士德式”的，美国人以“实用主义”自称。我看汉人文化真是浮士德式的，实用主义的。神仙与远征，皆浮士德精神；所谓“实事求是”(河间献王传)，即实用主义。汉人文化如谓有缺点，即在缺乏内省的精神。故后来政治不能与帝国规模协调，大汉风文化解体时，于是乎一变而向虚无逃避，再变而对印度月氏之佛教低首。这是一种反动。然汉代学术不仅在中国有承先启后之功，而在世界上平均超过了同时代任何民族之成就，则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 两汉文化在世界史上之意义

如上所言，一国文化须在世界史中决算，因此，当与并时各国成绩比较。

西人尝言“希腊之光荣，罗马之伟大。”以人口言，当西汉末成帝时，汉之人口五千万时，罗马公民约七百万；如加上奴隶，总数至多当不过一千五百

万左右；不过汉人口四分之一。有推罗马末期人口为七千万者。这大概是将亚洲蛮族算人，不足为据。不过罗马城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较长安洛阳为多。以面积言，罗马帝国自英伦至巴比伦，虽地跨三洲，充其量不过四百万平方公里。然实以地中海为中心，东北之地，乃蛮人区域。故陆地面积，远较两汉帝国为小。此亦可见近代西方人每以希腊罗马为当时世界文化唯一中心是何等错误。

但这尚非重要。我们还应看东西文化成就与水准。近世中外人士，常以东西文化对立，并夸张其固有不同。过去欧人常说“光自东来”。十八世纪欧洲人尚礼赞中华，至吉朋始以东方·专制主权连称。十九世纪欧人突盛，黑格尔之流，始谓东方无哲学。后来西人知其不然，则又谓东方无科学。百余年来，他们以哲学科学为“希腊奇迹”，亦即西洋特产。然在罗马时代，西洋的哲学科学，几乎停顿，政治亦堕落。他们则说这是由于受了“东方神秘主义，专制主义”之影响。其必然推论，是欧洲黑暗时代，亦当归咎于东方。凡此偏见，深入西人之心。此其不合事实，我常有批评，尚拟专书批评。而我国许多人不察，为西方宣传及其科学吓倒，于是，不是自惭于东方的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即极力说我们有道德与礼乐，作勉强的矜持。我曾说过，要真正判别东西文化，须用“同时比较法”。如将这方法用于两汉前后，恐怕我们将发现一个事实，即在两汉，我们的道德未必特别胜于西方；艺术文史互有短长；然我们的科学，及科学“女王”之数学，却决定的胜于西方人，胜于希腊、印度，更无待说罗马了。兹继上卷先秦时代(一八五——一八八)将秦汉时代世界三大区域文化及知识分子要事，作一对照表：

| 中国<br>(匈奴东胡月氏活动) | 希腊罗马世界<br>(塞契特萨马特) | 印度与月氏及波斯 |
|---|---|---|
| 公元前二九九　屈原死 | 公元前二八三　朴托莱梅一世死 | 公元前二七三　无尤王即位 |
| 二六六　范雎相秦 | 二八〇　塞流卡一世死<br>二七〇　Epicurus 死 | |
| 二六〇左右　别墨公孙龙邹衍五千言 | 二六四　Zeno 死 | |
| 二五六　秦灭周 | 二六四—二四一　罗马一次布匿战争 | 约前二五〇　数论、瑜珈二派起 |
| 二四六　吕不韦相秦 | 二五〇　大夏独立 | |

（续）

| | | |
|---|---|---|
| | 二四九　安息独立 | 二四四　无忧王第三次结集佛经大建窣堵婆(塔) |
| 二三五　吕不韦死 | | |
| 二三三　荀子韩非死 | 二三五　Timon 死 | |
| 二三〇—二二一　秦灭韩赵燕魏楚齐 | 二三〇　Aristarchus 死 | |
| 二二一　秦始皇统一，李斯蒙恬，长城，毛笔，小篆，隶书，阿房宫 | | |
| 二一三——二一二　焚书坑儒 | 二一七　汉尼拔破罗马军 | |
| 二〇九　陈胜起义 | 二一二　Archimedes 死 | |
| 二〇二　刘邦即位 | 二〇七　Chrysippus 死 | 二〇〇　史诗“Maabhharata”编成 |
| 二〇〇　刘邦被围白登 | | |
| 一九一　惠帝除挟书禁 | 一九二　Eratothenes 死 | “Ramayana”编成 |
| | 一九二——一八二　塞流卡国与罗马战 | 一八四　孔雀王朝亡 |
| 一六八　贾谊死 | 一六八　罗马大败马其顿 | |
| 一六七　仓公在狱，其女上书 | 约一五〇　“Venus de Milo” | |
| 一五四　晁错死 | “Laocoon” | 一八〇——一四〇　弥兰王那先比丘之世 |
| 一五二　张苍死 | 一四七——一四六　加太基亡、马其顿希腊亡、加图死 | |
| 一四〇　武帝即位 | | 一四〇　月氏统治大夏 |
| 一三九　张骞出使月氏 | | |
| 一三六　立五经博士 | | |

（续）

| | | |
|---|---|---|
| 一三四　董仲舒对策 | | |
| 一二七　主父偃死 | 一三三—一二三　格拉古兄弟改革 | |
| 一二二　淮南王死 | 一二二　Polybius 死 | |
| 一二一　大破匈奴 | | |
| 一一八　司马相如死 | | —一〇〇　摩奴法典编成 |
| 一一六　作柏梁台，汉设四郡 | | |
| 一一一　琉璃东来 | 中国瓷釉铁漆西传 | 二〇〇—一〇〇　弥曼差派盛 |
| 一〇四　落下闳造浑仪，太初历 | | |
| 九八　太史公遭祸 | 八二　苏拉为独裁官 | 九二　安息罗马媾和 |
| 八一　议盐铁 | 六四　塞流卡国亡 | |
| 六〇　郑吉为都护 | 五五　Lucretius 死 | |
| 五二　赵充国死 | 五一　Posidonius 死 | 一〇〇—五〇　胜论派盛 |
| | 四四　凯撒死 | 五〇　塞种等人北印 |
| 四四　贡禹死 | 四三　Cicero 死 | |
| 三七　京房死 | 三〇　克乐巴死，罗马入帝国 | 二三　安息征亚美尼亚 |
| 二六　刘向校书 | 一九　Virgil 死 | 五　贵霜朝丘就却统一月氏 |
| | 四　耶稣生 | |
| 公元后八　王莽称帝 | 公元后八　Horatius 死 | |
| 一八　扬雄死 | 一四　奥古斯都死 | |
| 二三　刘歆死 | 二一　Strabo 死 | |
| 二五　刘秀即位 | | |
| 二七　王充生 | | |
| 四三　马援征交趾 | 三三　耶稣死 | |
| 五四　班彪死 | 四三　克劳狄侵不列颠 | 五〇　贵霜统一北印 |
| 五七　倭人始贡，日本纪年始 | 六四　尼禄焚罗马 | |

（续）

| | | |
|---|---|---|
| 六六　明帝时匈奴遣子入学，佛教东来 | 六六　保罗彼得殉教 | 六六　安息王至罗马与尼禄言和 |
| 人像画书法发达 | | |
| 七一　楚王英死 | 七九　Pliny 死 | |
| 七四　班超出使 | 罗马建竞技场 | 八〇　波斯拜日教起 |
| 八九　燕然山铭 | Pompeii 及 Herculaneum 毁灭 | |
| 九二　班固死 | | 一——一〇〇　吠檀多派盛 |
| 一〇一　贾逵死 | 九八——一一七　特拉扬之世罗马版图最大 | |
| 一〇五　蔡伦之纸 | | |
| 一一五　卢诩破羌 | 一二〇　Tacitus 死 | |
| 一二三　班勇使西域 | 一二五　Plutarch 死 | 一三三　迦腻色迦王四次结集佛典世友马鸣之时 |
| 一三七　日南徼外变乱 | 一一七——一三八　哈德连之世罗马缩短防线在亚洲后退 | |
| 一三九　张衡死 | | |
| 一四一　梁冀为大将军 | | 一〇〇——一五〇　健驮罗美术兴起 |
| 一四六　太学生三万人 | 一二一——一五一　朴托莱梅观测天文 | 一〇〇——一五〇　正理派（尼夜耶） |
| 一六六　马融死 | 一六六　大秦王安敦遣使到中国 | |
| 一六六——一六八　党锢、陈蕃死，安世高来华 | 日耳曼人与罗马战 | |
| 一七四　刘洪作乾象历 | | 一五〇　乌苌学艺始兴 |
| 一八四　张角起事 | | |
| 一八九　董卓入洛 | | |
| 一九二　蔡邕死 | 一九二—　罗马军人乱政始 | |

（续）

| | | |
|---|---|---|
| 一九六　曹操迁献帝于许 | | |
| 二〇〇　郑玄死 | 二〇一　Galen 死 | 一五〇—二〇〇　龙树在世 |
| 二〇七　诸葛亮出山 | 二〇八　罗马军人不列颠镇压 | |
| 二一九　仲长统死 | 二一二　加拉加拉普及公民权旋被杀大乱 | |
| 二二〇　曹丕篡汉 | | 二二六　波斯萨珊朝祆教再兴 |
| 二三二　曹植死 | 二二二　罗马人向峨特人贡 | |
| 二六二　嵇康死 | 二三〇　Tertullian 死 | 二四一　波斯与罗马战争开始 |
| 二六三　蜀亡，刘徽注九章成 | 二七〇　Plotinus、Diophantus 死 | 二六〇　摩尼教起 |
| 二八五　晋太康末，百济王仁至日 | 二八六　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二分 | 二七〇　弥勒派学说起 |

我由这一简表所得印象如此：

一、希腊罗马人的造型艺术，乃至受他们影响的健驮罗美术，尤其是在人体表现方面，超过汉人水准。但中国绘画就素描言，不在他们之下。罗马月氏的工艺美术（时印度已衰），如香水、玻璃，为我们不知；而丝、漆、瓷器、釉，是我们的独创。

二、在文学上，我们的乐府、诗歌、辞赋，不弱于印度文学，超过罗马的诗歌；不过我们没有《变形记》那样的小说。至于史学，印度无可谈，而直到十八世纪前，欧洲无有可望马班项背者。

三、罗马人最自豪者是土木与法学。一般宫殿，就文献所传，我们不逊于罗马；惜我们无存者。如以长城言，我们尚可自豪。说到法律，罗马法是阶级的法律，死刑极普通，尤其是帝国后期。我们较简单，也较人道。

四、应该特别加以比较的，是科学。一般西洋人艳称希腊科学，而将这原因归于希腊人天才，以后归于希腊文化上祭司影响之轻微（Butcher，“Some Aspects of the Greek Genius”）。其实希腊人自己不是如此说的。

亚理士多德云，数学起于埃及。柏拉图谓希腊人之长，仅在改良他人之事物。戴里士乃留学埃及者，毕达哥拉亦是留学埃及者。近二三十年来，西洋人日益确认希腊文化，实得自东方。而希腊科学，自有盛衰，故亦断不能归于希腊特殊天才。希腊人科学，可分三期。一为毕达哥拉至亚理士多德时期，相当孔孟之际；二为亚历山大城初期（希腊风时代），相当战国末期；三为亚历山大城后期（希腊风罗马时代），相当秦汉时代。毕达哥拉时数学，不出幻方周髀范围，唯几何学渐发展。贝里克时代，安纳萨哥拉谓太阳与希腊同大，已使贝里克之宫廷震骇。亚历山大死后快乐派哲学家伊壁鸠鲁，谓太阳直径约二英尺。事实上，希腊科学全盛期，仅在亚历山大东征后所建立亚历山大城，而同时希腊本土殆无可言。此受埃及巴比伦接触之赐，甚为显然。到了亚历山大城后期，罗马人只知道应用埃及人之知识，以及若干注释前期希腊人之著作，而这犹多为希腊人犹太人及其他东方人。其次近来西方人知道，"数学光荣应归于印度"，而希腊人贡献仅在几何，而几何也只是以同等同形同大为范围的（欧几里德几何有后人之附益补充）。中国天文学之优秀性早为拉普拉斯所注意，近来关于中国科学之优秀性，也开始为人注意了（加觉里，史密士，霍格本前书，李约瑟大著）。自然，我们不可轻视希腊人之成就。但不如过去西人所夸张之并世唯一优秀或最高成就而已。兹节译有名的丹培氏科学史之言，以见希腊风时代，及希腊罗马时代科学哲学情形之一般：

"说古典希腊并无科学，自不公平（如希坡克拉特，亚理士多德）。但此时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的而非科学的，即德谟克利图之原子论亦然。亚历山大东征后，开始三百年希腊风时代（自亚历山大之死至奥古斯都，323—31B.C.。此使埃及巴比伦连于欧洲。学问方法始由综合哲学进入专门研究，有如学究哲学（Scholasticism）之到加利略与牛顿然。其时自以希腊要素为主，但亦有巴比伦要素——如迦勒底（Chaldaens，按：承继亚述之新巴比伦王朝，后并于波斯，希腊及安息帝国）之占星术。而克己主义始祖柴诺乃腓尼基人也。

希腊风有二期，初期是创造的，后期表现创造力之枯竭，及东方对西方之反动，终为罗马所破坏。罗马承继希腊后，不能排除亚洲影响。（秋案：此西方人之偏见。）即在初期，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已有东方观念之流传。拜星，天人之际，命运观念，起于巴比伦。柏拉图已知占星

术。公元前二世纪占星术迅速发展，即在哥白尼牛顿之世，尚未停止。欲逃命运之束缚，只有三条路，魔术，秘教之神道，基督教时代所谓"知神学"或"秘智学"(gnosticism)；秘智学者，乃谓天将自然之秘钥启示于若干贤人者。二世纪以降，魔术及秘教情绪日深，普遍于社会。研究哲学者乃少数人。最可注意者是克己主义，他提倡泛神论与道德。在科学史上最重要者是快乐论，他保持原子论。

自前三世纪初起，亚历山大城是学问中心。欧几里德(300B.C.—275B.C.)…… 亚几默德(—212B.C.)…… 亚理士塔克(Aristarchus，—230B.C.)……喜巴古(Hipparchus，—127B.C.)，代表符合于观察与实验的研究。当罗马人攻入叙拉古时，亚几默德为罗马兵士所杀。三世纪后期，亚几默德后辈中，人才甚多。其中之一，是伊拉托曾(Eratothenes—192B.C.)，以地为圆形，周径二四〇〇〇哩，日地相距九千二百万哩(现代实测各为二四八〇〇及九千三百万哩)。在数学上，前二世纪中叶阿婆龙(Apollonius)研究圆锥，抛物线，双曲线。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有发明家希罗(Heron)发明唧筒之类。

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人物为天文学家朴托莱梅，他在亚历山大城教书观象(127——151)，但未改变希腊人学说。他又是地学家。他著有占星学的书。亚历山大城另一学问为炼金术，最早希腊炼金术，起于公元一世纪，而大盛于三四世纪之埃及，至戴克里先于二九二年始加禁止。其后由阿拉伯及欧人复兴。占星术与炼金术含有一种自然观察之基础，以及合理然而错误之思想；故实对天文与化学上有真实可敬之贡献也。

古代独创性的科学，几为希腊人包办。罗马人只注意实用而不开其源，故不久枯竭。老加图(Cato，234—194B.C.)反对希腊文化，著文论农业，及于医术。约在同时，巴比伦人棣阿金尼(Diogenes)带给罗马人以克己哲学。此派哲学在罗马皇帝安敦著作中达最高峰。此又因波西顿(Posidonius，—51B.C.)学说中柏拉图主义成分而增强，成为罗马人主要哲学达三百年之久。波氏乃信占星术者。其后，西塞罗(Cicero，—43B.C.)始倡希腊哲学，而流克西(Lucretius，—55B.C.)倡快乐论。但非有新见。此外凯撒(—44B.C.)造儒略历定一年为三六五日

又四分之一。此在欧洲沿用至十六世纪，在英国至十八世纪。此外，在地理历史方面，则有斯特拉波(C. 20A. D.)，大普林尼(—79)，普卢塔克(Plutarch—125)，塔西佗(—125?)。而医学家则有小亚细亚之格林(—200)，他以为人之血由肝造，而气质则与以养分。罗马人在理论上不足注意，但水道建筑有利卫生。医学继续发达，一般科学哲学日衰，唯二三世纪间第阿帆图之代数为一例外。帝国最初三百年中，在亚历山大城研究科学者主为希腊人，然亦多以注释希腊人之著作而止。耶路撒冷则依然为东方宗教之中心。因此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哲学与东方宗教之会合地，而希腊(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哲学，遂亦流入基督教之神学云。”(W. C. Dampier，“A History Of Science”，三七页以下，1948。)〔注二一一〕

读者再将上述秦汉科学情形对照，即可知我国除无欧几里德外，其他实在远为优胜。有人，如维特浮格(Wittfogel)，竟谓中国数学不如埃及人。此盖由于这位“中国专家”对于数学史并无所知。〔注二一二〕而懂得数学的人则意见大为不然，史密士及霍格本承认中国早在纪元前一千年已知九数观念，中国早在毕达哥拉之前，已知勾股定理。并以为毕氏许多观念，或受中国影响。“中国人在文化上之贡献，我们负于他们究有多大，实尚须研究。他们在希腊人五百年前，已知希腊人之几何学。他们发现很多有关数学的东西，并似乎知道为今日统计学之基础的群论。不幸他们的知识，多被遗失。如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一样，中国图书常被焚毁。中国实早有优于欧洲之文明。他们的历家，不大有僧侣性质，较之欧洲，更为人文。何以今日中国人不能发展此一初期有希望之倾向呢？这理由很难推断。他们过于早熟，或为原因之一乎？”(《百万人之数学》)〔注二一三〕

如上所述，日本天文史家新城新藏以洋洋六七百页的证据，证明中国历法之先进。又云，“十九年法，在默冬(Meton，前四三〇年)前约早一百六十七年，七十六年法，在加利普斯(前三三〇)前约一百年”(《东洋思潮天文篇》)。又朱文鑫先生在《历法通志》中比较中西历法交食周之异同云：

“汉以前无预言日食之文，亦无推算交食之法，汉三统历始有合朔弦望、月食加时之术，三统以一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交为法，谓月食之既者，至此而复既，以六千三百四十五为会月，谓交食起于冬至朔旦也。四分历承之，以五百十三岁有一千八十一食，其数相同。(三统以四十

七周为会月，合五百十三岁。一周有二十三食，故四十七周有一千八十一食。）案三统创积年日法，为推步气朔之本，交食循环，为日月合璧之源。汉历仅言推月食而不及日食者，实讳言之耳。刘歆辈非不知也。盖当时以日食为非常，欲借以警惕人主之修德行政，而不愿以推步之法，揭明其自然循环之数，实则能推月食即可推日食也。续汉志论月食，谓宗诚以一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三者所修，冯恂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王汉月食注，自章和元年（西元八七年）至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年）凡九十三岁，合一百九十六食，但当时仍用诚术，盖依据三统成数，而未敢遽改也。

自诗经以月食为常，日食为丑，故春秋仅书日食，而不书月食，史记汉书因之，于是两汉四百余年，历法则推月食，实录则书日食。后之读史者，自可凭诸纪载，验彼法数也。三统历以一百三十五月为交食周期，见于史者以此为最古。西法之最古者，当推迦勒底人所创之交食周，以二百二十三月为周期，上推往古，下验来兹，莫不以此为根据。近代美天文家牛考慕（Newcomb）更立新法，以三百五十八月为周期，适为三统历与迦勒底两周期之和数，冶古今中外为一炉（牛氏是否凭我汉书彼未明言，未敢悬揣）。天文之学，后胜于前，为世人所公认。牛氏之数最晚出，固较密近。迦勒底之周期，引用最广，而三统之法，亦不尽疏远也。”

应特说的，中国以赤道为天体坐标，比希腊及中古欧洲人的黄道坐标优秀，且是他们现代坐标所改用的。如果数学是文明之镜，圆周率亦可谓数学之镜。兹将各国对圆周率研究之成绩及其年代列表如下：

巴比伦，希伯来，周代　　三
埃及（前一五〇〇年）　　三·一六
希腊·亚几默德（前二二五年）　　三·一四——三·一四二
中国·刘歆（约公元廿年顷）　　三·一五四
张衡（一二五）　　三·一六
蔡邕（一八五）　　三·一三
陆绩、王蕃（二四〇）　　三·一四
刘徽（二五〇）　　三·一四一六

| | |
|---|---|
| 祖冲之、暅之（四八〇年顷） | 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一七之间 |
| 印度・阿略波陀（四五〇） | 三・一四一六 |
| 阿拉伯・阿尔加什（Al-kashi）（一四三〇） | 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八七三二 |
| 法国・微也达（Vieta）（一五九三） | 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七 |
| 英国・瓦里士（Wallis）（一六五〇） | 无限级数 |
| 日本・建部贤弘（一六九〇） | 无限级数 |

不过现在最新式飞机设计，用到三・一四一六已经很够了。〔注二一四〕

这证明埃及人和亚几默德的伟大，也证明刘徽祖冲之的伟大。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云，“刘徽与祖冲之父子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之先所开创算法之妙处，应使人对亚洲停滞性，再加吟味。”（《东洋思潮数学篇》）

误信算盘系由罗马传入中国之小仓金之助，在读了《九章算术》后，恍然大悟：“九章算术为中国基本数学书，包括优秀的数学方法。在几何与数论上或不如希腊，在算术与代数上，实超过希腊。……刘徽之研究，不论在方法上，在结果上，不仅可与亚几默德比肩，毋宁更为优秀。……而在某种意义上，实凌驾希腊之第阿帆图”（《数学史研究》）。他又说到欧洲十八世纪始知联立方程式之解法，而刘徽已知之；则又何仅超过希腊人而已。

不过，两汉人对于日地距离之估计，不如亚历山大城伊拉托曾之精确。或者伊氏能在欧亚非三洲测量，因而较精也。而在其他实用科学方面，如农学，医学，工矿之学，中国皆断然优势；轻工业之丝织，专利世界；而重工业之铁冶“胜利之橄榄枝，归于丝国之人”（普林尼）。又炼金术或化学，中国亦在希腊人前二百年也。

五、在哲学上，亚理士多德后，西方哲学除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后学外，有克己派快乐派怀疑派折衷派之兴，而主流实为克己派快乐派。过去有以墨杨相比者。其实汉代儒道，反更为近似。流克西之原子，与淮南之气绝类。克己派倡导博爱主义影响了罗马自然法，亦与儒学使法律人道化相同。古代希腊罗马最大硕学，前后推亚理士多德与朴托莱梅。又前后汉间，印度之

胜论派倡原子论（极微计），尼夜耶派整理因明，有五分作法（宗，因，喻，合，结）。近人每以中国缺乏原子论，其实淮南之太素之说即是原子论。唯自墨名二家以后，中国人确不重逻辑，盖中国人重经验，少诡辩也。印度因明，希腊三段论法，对于思考严密之训练，自有功劳；然创造性的思考，不必即由此道，此理近人韦得麦尝论之（M. Wertheimer，"Productive Thinking"）。古代与近世科学之进步，皆由观察、实验及专攻开始，此则汉人有一日之长。有淮南史公扬雄张衡，足以匹敌当时希腊罗马印度人。

六、最可注意者，即中国之哲学文化，更富于人文色彩，民主倾向。西人常以"神秘"、"专制"诟病东方。后者尚当论及。若言神秘，可用于印度，希腊人不免，罗马人尤甚，而不能适用于中国。盖印度人，即宗教即哲学即科学；此无待多言。案希腊哲学，本始于神秘主义。希腊宗教，除奥林皮克神话外，有狄昂宗（Dionysus），拜酒神；阿弗宗（Opheus），信轮回；爱留宗（Eleusis）与奥林皮克神话相合，崇拜土地阎王，成为国家宗教。狄昂阿弗二宗起于特雷斯，前者务求狂热，至于食人肉；后者重清洁斋供，经毕达哥拉流入柏拉图思想中，在希腊哲学上留下深刻影响。到了罗马，除其原始神话宗教而外，希腊宗教亦流入。至奥古斯都时代，有万神殿（Pantheon）之建立，此与汉武帝之太乙五帝相似。然由于皇权增进，又有"皇帝教"之出现。先是凯撒死后，即有成神（宙斯）之说；奥古斯都死后，亦当神祭祀，成为一种现世神。此不仅我国所不许，亦东方各国罕见者。然其时各民族宗教亦大会合。如犹太教，基督教，埃及之女神（Isis）教，波斯之拜火教，拜日教，摩尼教，一时辐凑。而崭然露头角者，则基督教。在罗马殖民地巴勒斯坦犹太人中，耶稣随罗马帝国而诞生。此其为教，乃采克己派之世界主义，变犹太之民族主义为一种精神的宗教，仿奥古斯都之福音说，而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与帝王崇拜相抗者也。罗马人杀之，自在犹太及一般人心中，留下悲剧印象。然神性不足，不甚合西人口味。保罗始以其师为神人。至公元七〇年，罗马灭耶路撒冷。此教因犹人"离散"（diaspora），随罗马腐败，而大振其势。而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亦渐发生交流。基督教父中，始有秘智派；至二、三世纪，忒滔良（Tertullian）阿利金（Origenes）说上帝唯一，信仰不管智识，以及圣父、圣子、圣灵之说。此为神学之起源。同时柏拉图派之普罗丁（Plotinus，—270）说"唯一"或上帝生精神，精神生灵魂，人当去欲，洁魂，忘我以合于上帝。此所谓新柏拉图派。二者皆为罗马荒淫腐败之抗

议。此后希腊人之道(Logos),基督教之上帝与罗马之多神,便组织起来,而有三位一体说,由后来奥古斯丁之著作,奠哲学之基础。随罗马之分裂混乱崩溃,基督教虽屡经迫害,日益成为人民信仰之中心。其先尚有摩尼教与其争胜,而终在三一三年获得胜利,成为国教。而基督教神学日益和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主义混合,终于并吞哲学,且降哲学为其"婢女"。罗素所谓"西方哲学先在希腊脱离神学而产生,再度没入神学;基督教兴而罗马亡;至文艺复兴始再告分离"者,是也。如谓希腊罗马文化受"东方神秘主义"影响,其实西方之科学哲学,又何一非由东方来呢?

在印度、希腊、罗马,哲学、宗教、方术日益相混,而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国教后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传至近世西方诸民族与贵族同为人民之压迫者直至法国革命,此后依然为各国国教。中国则情形大为不同。秦汉之际,一时有万神教、皇帝教兴起之"势",然儒学终为国家精神中心,始与杂祀、神仙、纬谶和而不流,终于分袂。佛教虽乘中国大乱之虚而入,但佛教始终未成为一政治力量。道教亦仅能与佛教争席。盖中国知识分子自有其安身立命之地,无用上帝,不羡神仙。中国素来信仰自由,无罗马之宗教迫害,遂亦无国教。此中国可自豪者。

## 秦汉与希腊罗马之政治与兴亡

我们还应比较一下东西二大帝国政治社会情形以及兴亡之故。

西人常追溯民主于希腊罗马之德谟克拉西与元老院,其实这只是字源学上的。就实质而言,两汉较希、罗帝国,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人民至上"与"言论自由"两大原则,在古代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有更深更广的确认。

秦汉与希、罗兴亡之主要因素有十分相同的,即皆以中产阶级之盛衰而兴亡,均经宗教大盛之过程,最后均由蛮族来收拾。文化是国家之灵魂,文化创造力之兴亡即国家之兴亡;这原理是相同的。但我们和他们发生、发展方式不同,而结果也不同。最显著的是,两汉文化能再生,蛮族终同化于汉文化;而罗马是同化于蛮族,终于灭亡,死而不复生的。〔注二一五〕此其关键,实在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试略言之,以终本卷。

希腊罗马文化,起源于近东(Levant),埃及;尤其是近东。这些地方,战

争频仍,民族复杂,素行奴隶制度。希腊罗马本皆系外来侵人者。波斯既衰,希罗继起。希腊罗马发展略有不同,但都由小的城邦,进为王国,进为帝国。而也都是借武力与财力扩张的。罗马城邦,其先实为部落,有贵族平民奴隶之分。其时由元老院辅国王,此时元老院等于部落首长。到了共和时代(前五一〇——二七),渐次统一义大利半岛及邻近区域。在政治上由元老院设统领(Consul)主民政,战时设独裁官(Dictator)主军事。所谓元老院,实为贵族会议,等于蒙古之库鲁利台。平民中之上层为武士,卒伍为普罗列塔利(Proletarius),即无产阶级一语之来源。而被征服者皆为奴隶。平民负债者亦沦为奴。对外战争必须平民合作,终于由平民选举一人参加统领(前三七六)。此与春秋至战国之变化大体相同。而中产阶级之士族,亦罗马之骨干。自灭加太基,大扩领土。在扩张过程中,领土等级亦复杂,如自由领土,殖民地,同盟地(Municipia,Colonia,Socii),其权利皆不相等。此外尚有直属地,人民权利全被剥夺。此即所谓"分而治之"是也。关于税务,则有承包制度(Publicanus),先由贵豪包办,其后由驻军把持。到了共和时代后期,所谓贵族平民,实即旧地主与武士,而武士亦渐成富豪矣。马留、苏拉以后经前后三雄,由无限期之独裁官进入帝政,实即军人政府。但罗马帝国基础,一般而言,实为奴隶制度。罗马城一百五十万人中,九十万是奴隶。义大利半岛四百五十万人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奴隶。彼等用奴隶作工,自由人则担任征战。

其次,罗马原行严格家族制度。其先公职,皆父子相传,如我国所谓世禄、任子,元老院实即这些人之世袭团体。及不断对外征服,军人势力日张,乃有军阀。于是有元老院与军阀对立。因承包而发财的财阀,跃登政治舞台,是即所谓"新人"(Homo Novus);西塞洛即其著名之代表。他们是代表军人利益的。罗马帝政,即由元老院与军部妥协而生。后来军阀与新人(财阀)合作,压倒元老院。在帝国时代,罗马领土分为皇帝州与元老州。然军阀财阀合作,元老院渐有名无实了。而专制政治特色,便日益发挥出来。所谓专制政治,即是将军政治。自奥古斯都(义云至尊,即屋大维)至西罗马之亡(前二七——后四七六),大约七十三个皇帝。只有五人,号称"贤君"。皇帝无一定继承法,皆由军人拥立,元老院认可。军人置君如奕棋,杀死前皇帝,紫袍加身,新皇帝出现。西洋史家一口咬定专制主义是东方的。如非健忘,即系成见。其实,专制主义是军事扩张之必然结果。而自亚历山大以

后，希腊、罗马皆进入军阀政治。军人专政以后，发生几种趋势：

一、由武力崇拜而有皇帝崇拜，以皇帝意志为法律渊源，此必然是政治之专横暴虐，奢侈腐败。

二、不断用兵，然工作须用奴隶，奴隶日感不足，必继续征服，以保奴源。

三、三世纪初，“蛮族”已日益渗入罗马社会。为了财源、兵源，遂不得不给全部帝国人民以公民权，此亦即奴隶制度难于维持之意。

四、这增加罗马社会矛盾，同时征服不能无限进行，内争日烈。至三世纪末，戴克里先将帝国二分，自居东部。盖此时西部已因奢侈而贫困矣。乃实行永业制度，限制商人，类乎王莽政策。不过他不迷信。

五、至此，中产阶级破产，或为佃农，或逃入蛮人区域。统治阶级内争，更趋激烈。

六、君士坦丁（三一三）始藉基督徒之助，统一全国。行郡县制，迁都皮赞廷；设七部，治理国事，加强集权。

七、土地兼并日烈，大庄园（Latifundium）发生，自由农民为求保护，为大庄园之农奴。君士坦丁下令限制农奴迁移，罗马遂由奴隶帝国变为农奴帝国。实际上帝国基础，早已动摇，四世纪末帝国再分东西。

八、奥古斯都后，蛮族已多服务军中，并已渐起变乱。及匈奴西侵，罗马益求援于日耳曼人，日耳曼人遂常抢掠罗马，并操废立皇帝之权。四七六年佣兵队长奥多塞自立，西罗马终亡于蛮族，亦可谓亡于兵变也。

九、罗马文化早已为基督教征服。结果是“上帝的归教会，凯撒的归蛮人。”此后东罗马苟延残喘至一四五三年。如后可见，这还得感谢蒙古人也。

罗马史是西洋史骨干，亦西洋史代表。在与其对比中，我们即易见中国史之特色。

中国历史是一个有机文化体之自然发展。一、我们无奴隶制度基础，是因和平拓植而扩大，因同文化而结合为一大帝国的。与希腊罗马藉武力征服殖民地，寻求奴隶，再加希腊化，罗马化，而成帝国不同。二、秦代周为诸侯之水平兼并，而非主奴之上下征服。汉之代秦为平民“革命”，而非异族征服。皆在同一文化圈内演变。虽有中原边区之别，文化基础相同。此颇与马其顿之统一希腊相似。罗马虽原在希腊文化圈中，其于希腊，究为不同之民族，其相代类乎鲜卑蒙古之入主中原。然罗马人用希腊及罗马殖民方式

（对异族方式）统治希腊及希腊殖民地，故希腊罗马及各征服地始终有异；而鲜卑蒙古最后毕竟是用中国方式（对同族方式）统治中国的，结果又皆合而为一。要之，希腊罗马文化以奴隶制度为根基，以致马克斯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为“工钱奴隶制”。此种文化全靠权力或武力维持。中国文化中没有奴隶制度。我们是自由人之国。因此我们比他们稳固而长久。这又是我们可以自豪的。

自三代以至春秋，中国也是行的世袭政治，但这制度到战国废止；此战国之大功。秦汉帝国成立，帝位虽然世袭，亦有淫暴之君——始皇二世，一像戴克里先，一像尼禄——国家权力，一时亦有世袭之势（如任子）；但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知识分子起来限制皇权，并以选举学校考试之制，开一平民参政道路。这不是近世民主，但较之罗马贵族之元老院，却是更民主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自喜的。

孔子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大抵是平民之子孙，即自食其力者之子孙。故有“为生民立命”传统。而希腊罗马（以及其他诸古国）知识分子大概有三种人：一是贵族及蓄奴者之子弟，二是包税者之子弟，间有奴隶之子弟。故希腊学者罕不赞成奴隶制度，而罗马“新人”尤拥护军人，赞成军人扩张。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则决不赞成军人政治或军事征服。孔子、孟子更教导中国知识分子勿对不义之富贵，不义之权力屈服。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能对帝王之现实威权，另外树立了一种道义的威权，因而使人民权利得一保障。而这并不用上帝的名义。最高者是人民，所以贾谊说，凡与民为敌者迟早必败。我想举下一例，以见汉代中国民主与言论自由之程度。

东汉章帝时，太学生崔骃、孔僖在太学谈论。僖谓夫差乃画虎不成反类狗者，崔骃谓武帝后不如前。另有学生梁郁问曰，“然则武帝亦是狗耶？”僖骃默然。郁遂控二人“诽谤先帝，刺激当时”。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将捕僖，僖上书云：

> “诽谤者，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武帝美恶，显在汉史，非虚谤也。帝者为善，天下之善归焉；其不善，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诛于人也。陛下不推原大数，徒肆私忿，臣等受戮，死即死耳。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所以不爱其死，独敢极言者，为陛下深惜大业。陛下若不自惜，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事

实，岂不与桓公异哉？谨诣阙，伏待重诛。"(《后汉书》儒林传)

书上，章帝"诏勿问"，并拜孔僖为兰台令史。公元八五年，章帝过鲁祭孔子，大会孔氏之宗。帝谓僖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僖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辱临敝里，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同上)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捐钱帛，诏僖从还京师，校书东观。冬，拜临晋令。崔骃卜之不吉，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

这一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之精神。这说明孔僖之人格，而也表示章帝为汉代最贤之君。然而亦赖有孔僖之无畏，所以成其美。大抵皇帝之恶，也是由知识分子之姑息主义而起的。而这事件在同时代的罗马，真是不可想像的。我们不否认当时中国依然是专制政治，但较罗马开明多矣。这种传统，是我们可以自尊，而当保持发扬的。由周厉王之事与周召公之言，可知反对批评即是"非中国的"。〔注二一六〕任何人不得因有刀枪即钳制批评。

我想至此可以明白中西历史文化之得失了。两汉与罗马，并为东西两大帝国。假如没有中国知识分子之努力，假如没有儒家主张的孝廉学校之制，又假如汉武帝的扩张不停止，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便可以在汉朝走到罗马帝国的路上。至于为祸为福，可由大家判断了。

东西历史，还有相同而又不同者。罗马与两汉都靠中产阶级支持。代表罗马中产阶级的是武士，而中国则为儒生。罗马中产阶级之毁灭，是武士不戢自焚而起。两汉中产阶级之破产，是因政权腐败及知识分子合污于此腐败而起，不是因附和扩张政策而起的。一亡于军阀一亡于官僚。这是有同有不同的。当中国知识分子一部分合污后，一部分拒绝与腐败合作。知识分子与皇朝不合作亦无可合作后，才出现军阀政治。军阀政治有军阀政治之逻辑。三国之局，类乎罗马帝国之分裂，而晋武统一，类乎君士坦丁之统一。五胡乱华类乎民族移动，鲜卑帝国类乎查理曼帝国，而东晋南朝类乎皮赞廷帝国。这是相同的。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久又告分裂。在欧洲黑暗时代，唯教会为社会安定力，于是形成封建教权时代。教会对开化西人及保存学问均有其功，但亦设立教会法廷，奴人民而锢思想。其后基督教之欧洲，受回教冲击(又是东方影响)，经十字军之战争，欧洲民族国家始由"教会世界"脱颖而出，并由回教文化学习，欧洲各王国乃通过反教权文化运动(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及宗教战争,逐渐演变为近世欧洲与文明。在两汉与罗马解体之过程中,军阀蛮族宗教三者同时活动,是相同的。然结果在欧洲是分裂,而在中国则造成南北会合胡汉一家,而为隋唐一统之新局。在欧洲是黑暗时代,而在中国出现中国文化第二黄金时代。西人有谓佛教融合南北之界者。然何以佛教在印度在中亚都不能发生同样结果呢?我以为使中国重新统一的原动力,实为中国固有之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字与其典籍。有此,佛教始能发生融合之作用。自六朝至隋唐,世界各种宗教皆集于中国,而都只发生融合作用。唐宋光辉的文化,即由于这融合中发生的力量。再,中国文化不承认上帝凯撒之对立,不承认现世来世之对立,只承认天以人心为心,而政府应在此世本人心而治。故中国文化终不利于教权之出现,遂亦不再有政教之冲突,而新儒学再为中国民族团结之中心。这是大不同的。至于为祸为福,看我们继续努力如何了。

## 论同时比较法与中西文化

由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之不足,许多东西文化不同说,实未得其真。我只觉得,文化之根源在人类性能,产生于人与环境之交涉,表现于人类对环境之应付驾驭。各民族之聪明才智是相同的,一切文化其性能是相同的,其生死兴衰之原理是相同的。其所以有不同者,只是在文化原型创造之初,有基础不同;而后来在文化发展中,有进步迟速之不同。而这都是可以外部的地理的国际的原因,内部的文化政治经济状况来解释,以及外部原因发生作用时内部文化政治经济之反应能力及其力量之强度,来解释的。而适逢其会的学者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之作用,便表现出来。而他们的努力,也就成为一民族聪明才智之资本,不断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之传统。在国际的历史的变动中,后来的人,对此传统运用之能力,吸收新经验创造新传统之能力,又累积为一国文化财富,并视其对全人类历史之贡献,而决定其价值。由此根本观点,如果说到中西文化之不同,我只觉得:中西文化基本不同,只有三点:第一、我们因民族同质,因而能借和平之拓殖团结而为国家,同时我们的文字又有利于和平之团结,同时在这过程中,团结合作又证明其比武力征服有利,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原型之基本性质——和平勤劳性质,非宗教非阶级性质,成为后来传统之传统。在这过程中,中国文字作用实较一般想像者

为大(主张废弃中国文字者其无知即在乎此)。第二、因我们在东亚相对孤立之故,由中国文化之黎明到古典文化形成时期,中国文化未受外来战争干扰,所以能顺利发展,因而使我们开化特早,成熟极早。第三、由于同一原因,我们开化早而进化较慢。西亚、欧洲、中亚、印度的文化,实为一个系统。这是他们的文字可以证明的。他们自古以来,情况与我们不同。他们竞争剧烈,战争频繁。所以或根本灭亡,或突飞猛进。而我们在秦汉以后加入亚洲史。但当是时我们已发展了很高的文化,且在文化创造力极旺盛之时,故能再发展为大汉风文化,取得亚洲文化之霸权,并为亚洲安定力。而自此到中国加入世界史前,我们所受国际战乱影响,一般终较欧洲或中亚印度为小。大体来说,我们是而也能够以大的体积,雍容缓步。除此以外,我看不出中西文化有何根本不同。至今为止,中外人所谓不同,没有一点是真正可以避免驳倒的。

然而所谓进步慢者,仅指近三百年而言而已。当中国进入亚洲史之时,正当中国文化创造力鼎盛之秋,我们能适当的因革损益,乃能成功的建设了两汉帝国及大汉风文化,其成就是如此辉煌保证中国文化霸权达二千年之久,不仅是中国文化骨干,亦世界文化一大主流。自此到了十六世纪末,我们的文化,光照亚洲东部,从未落后于人。〔注二一七〕各个文化民族,皆有其黄金时代。但无一个国家有如中国霸权之长久的。

只是十七世纪起,西方由于航海,进步极速,而我们依然"斯文"如故,且闭关自封,慢慢落后下来。及西人发明蒸汽机,才发生我们之决定性的落后。然而这只能说是一时之参差,而不是文化本质的差异。由此参差,逐渐变为大祸。此一参差之生,自有内外原因。当中国进入世界史时代,正值中国文化创造力最衰落之时,复值帝国主义最剧烈之会,未能适当的因革损益。此今日悲剧最深远原因。然中国沉沦究不过一二百年之事。〔注二一八〕

对于中西历史文化作比较研究,必用同时比较法,而由双方文化之始源,在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看其同异,关联,得失。这才是历史之"全体大用"。如果只是随意比较,尤其是近人常只将蒸汽机以后的西方,与蒸汽机以前的中国或东方相比,不仅在学术上为轻率,实际上尤易误人和自误。第一、今日西人因一时进步,遂夸张科学民主为希腊人因而西方文化之特长,而我们非自卑即以道德、礼乐自满。经过同时比较法,即立见其非。战国秦

汉时代，希腊人之礼乐，不在我们之下。我们的科学，实在他们之上。将此方法继续应用下去，如后可见，十七世纪前中国有不逊于任何国之科学，十八世纪前，中国人实较任何国家有更多民主和自由。这证明科学与民主对中国不是陌生的，是我们能够征服的。此当自勉者一。第二、用同时比较法后，即如在本章可见，文化各部门之发展，有时不均衡。例如社会危机时代亦能产生新哲学（古典希腊末，秦末西汉末），而在全部文化衰落时，也能在美术、科学上发泄其才能（亚历山大城末期，东汉末）；但全盘而论，道德常为文化发展之先决条件，文化之健全总是一国健全之基础，文化创造力是一社会活力之标志，只要此活力不失，终能振衰起敝，拨乱反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虽一时落后，必能因愤悱而超胜于人。然长期落后，必一切堕落。长期堕落，一定是有病入膏肓之处了。我们今日岂仅科学落后而已，更可怕的，恐怕是道德的堕落了。此一堕落，亦不自今日始。这才是我们今日应该特别知耻的。此当自勉者二。第三、四五百年来，欧洲上升亚洲下落。近百年来，欧洲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实已盛极而衰。美国继兴，欧洲人自犹可以西方文化自豪。今日西洋人因一时进步，无视亚洲，进而渲染其祖德，一若世界文化，自始只有希腊罗马。久之其优越感因此历史观念之支持而牢不可破。然经过同时比较法后，即立知其非。但这不是可以口舌相争的。我们这一代，至迟下一代的人必须能在文化上达到今日欧美的同等水准，我们才真正能光先人之德。我先人曾为世界最先进者，此先进霸权，至近代而始告失坠，且因此而国命沉沦。光先人之德，即使我们成为人类文化中晚达之国——后来居上者，以救我们的国家并有所贡献于新世界之历史。我先人能长期胜于人，厥后西人又能胜于我，可见事在人为。有为者，他日再胜于人，有何不可？一国历史赖代有人才，才能风华继盛。世界史乃一部人类智力之世界运动会，正赖各国选手争夺各种锦标，造成不断之光荣记录。此我们所当自勉者三。第四、此非争祖先之光荣，亦非仅勉励自己争一国之荣誉而已。要再造新世界，从最深远处看，必须有东西文化之和会，国际之团结合作。真正了解中西文化，才可以确立一个世界的公平的历史观念，而这一观念，乃是世界之新大同——大一统所必须有的精神基础。历史必趋完整，人类必至大同。这尤其是我们的最高目标。由此可见，史学（孔子开创，太史公发展的春秋之学）不仅给我们伟大信心，亦给我们以明确方向。

※　　※　　※

我以无限庄严喜悦之感，结束我们古代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历史。由远古经三代，孔子，诸子，到两汉，中国文化是一路上升，由黎明到如日中天，遂在进入亚洲史时发展为“大汉风”文化，光芒万丈。两汉文化是我民族最大光荣。这不是暗示要“回到两汉”；而是我们如在回顾中了解先人方向之正大，先人精力可佩可感，我们就要借镜先人之眼界，效法先人的气魄，面对今日世界，向前开创更光荣的前途。

在中卷，即中古篇，将叙述两汉文化或大汉风文化解体和再生的过程。这便是由诸葛亮经南北朝到唐宋的历史。而我们还同样看到，我们的祖先，又如何通过极大苦难，再造中国文化之光荣。

在下卷，为近世篇，是元明清到目前历史。我们逐渐进入世界史了。这一面有重演上中二卷处。但十七世纪以来，我们已在学问上日益落后，而十九世纪的科学、工业与帝国主义世界是我们过去所不知的。我们无力应付，叠受西帝日帝侵略侮辱，整个固有文化亦在解体中。

然一方面，有数千年祖先心血培养的文化，衰而未亡，还是中国人重新团结之基础。另一方面，世界文化或西方文化也在一衰亡和再生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已在美国多少开始表现其新生的力量；世界上诸落后国家虽在摇摆之中，亦皆在求其独立与复兴。而中国知识分子继前人之心力，创造新的风会，新的人才，新的气力，来斡旋世运；即重新团结中国人之心力，会合中外新力，毕再造中国与世界之功于一役；是我热诚的希望。

〔注一〕本章事实，大体截至建安之终（二二〇），是年曹丕废立，旋三国正式称帝。但自董卓入洛（一八九），汉已名存实亡，赤壁战后（二〇九），三国业已开始，至晋武平吴（二八〇），约百年间，有与汉晋皆难分开者。此期之事，其与两汉相承者，仍入本章；其与两晋关系较深者，画入三国。

〔注二〕换言之，一、二以纪、传为主，三以四裔为主，四、五、六以书、志为主。

〔注三〕秦诸刻石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除害兴利，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又云：“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又云：“六国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

众，遂发讨师，阐并天下，永偃戎兵。”平心而论，这在当时，都不算过度夸张。

〔注四〕此即谶书。关于“胡”，看注六七；关于谶，看第六节四六〇页以下。

〔注五〕秦汉人对秦汉兴亡之故之所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陆、贾二人所说外，张耳陈馀讨秦理由云：“秦为乱政虐刑，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内外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按人头以箕敛之），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本传）。又严安云：“秦一海内之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则世世必安矣”（《汉书》本传）。又贾谊说到“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使二世子婴仅得中佐，固守关中以待其敝，收弱扶罢，山东虽乱，秦地可全而有（《过秦论》）。然又如秦长史欣告章邯所云，“赵高用事于中，事无可为者”（始皇本纪）。一个末朝，只能容“人头畜鸣”（汉明帝语）之赵高。

〔注六〕起事时，刘邦卅九岁，项羽仅廿四岁，自与两人才能有关。项羽学书才记姓名，刘邦知识亦较高。刘邦谓其与项羽得失，在他能用三杰，而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比项羽矜一人之蛮力，说什么“非战之罪”，亦有上下床之别矣。

〔注七〕班固已有见于此。“秦灭六国，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唯魏豹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犹不能自立，岂非天乎？”（魏豹传）

〔注八〕《汉书》诸侯王表云：“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又景十三王传赞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无道。”

〔注九〕卫青出身贫贱，非无能之人，他说其平朔方“皆诸校尉力战之功”，又能爱惜士卒。霍去病不惜士卒饥寒，而自穿域蹋鞠（毬戏）。其得名殆武帝故意功归一人而已。李广利更无论矣。

〔注一〇〕所谓酷吏以及绣衣使者非无善类。然有生杀大权，只对一人负责，则恃权肆威者，多于不畏豪强者矣。

〔注一一〕时隗嚣讨王莽檄，所言皆事实：“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

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买卖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冢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案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众庶，行炮烙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敢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饿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涉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𣩵者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注一二〕《后汉书》光武纪云："时长安政乱，四方皆叛。（称王者）刘永，公孙述，李宪，秦丰，张步，又董宪，延岑，田戎，窦融，隗嚣，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番，五楼，富平，获索，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注一三〕光武诸将如郑禹冯异等，皆儒生知大义，故军纪较佳。任光有长者名，亦以虏掠为招兵之法。光武云，"吾诸将非不健斗，然多好虏掠，为小民害。"吴汉军所过侵暴，逼反邓奉，破公孙述，杀其全家，焚烧成都，光武谴让之而已。

〔注一四〕东汉初，除刘氏外，李通、郑禹、贾复，皆以南阳人参机要，子孙皆贵显。外戚为马、梁、窦、邓。邓氏乃同乡又兼亲戚者。《后汉书》郭伋传：伋谏光武云，"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又宗室贵族多占田瞒税。刘隆传："刺史优饶豪右，侵刻百姓。"陈留吏牍云："河南南阳不可问。"盖"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云。光武曾以此事杀刺史太守十余人，而隆以功臣免为庶人。明帝即位之年，已谓"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朕甚嘉之。"可见明章以来，选举已渐为阀阅把持矣。按《史记》功臣表云：人臣之功有五等，以德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汉书》车千秋传犹言阀阅功劳。逐渐阀阅为世袭矣。

〔注一五〕明帝公卿免者赵熹，李䜣，郭丹，冯鲂；死者梁松，郭霸，王康，

薛昭，虞延，邢穆，韩光。

〔注一六〕楚王英与明帝为兄弟，喜结宾客，为最早信佛教之人，以大逆不道罪被迫自杀。《后汉书》本传载其事甚略。然参看寒朗、袁安、杨终、陆续、鲍昱等传，则株连冤枉至多，拷掠至惨，禁锢之风，盛于是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亦犹淮南之狱，长酷烈之风也。

〔注一七〕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此世人所知。太史公有外戚传，谓“受命继体之君，盖以有外戚之助焉”，词甚婉讽。又有佞幸传，谓“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班范之书续论之。自来论史者于此二事莫不慨乎言之，唯于致祸之原，尚有未尽者。范书以妇人干政，始于秦芈太后，故穰侯权重昭王。又论汉代君王帷薄不修，先色后德之过。其实中外亦有女主之下，国家很有进步的时代；英国人尤其高兴女王。女色倾国之说，罗隐已笑之，“西施若能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何国无女子，何人无亲戚？所谓女祸外戚之祸者，实由专制政治之祸耳。汉代皇帝，以及从来皇帝，大抵荒淫。由于淫，生出其他祸害。但个人荒淫者多矣，何至亡国？故帝王荒淫之所以发生祸害，实由皇权无节制而来，与女人无干的。

范书又云：“宦者之在朝，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内人），易以役养乎？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楚晋；景监缪贤，著庸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高后称制，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文帝有赵谈，北宫伯子，孝武爱李延年，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中兴之初，内官悉用阉人。……和帝幼弱，窦宪专权，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于是中官始盛。自明帝迄延平（殇帝），委用渐大。邓后以女主临政，不得不委用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之职，闺房之任也。其后孙程立顺，曹腾建桓，阿旨则光宠三族，忤意则参夷五宗，纲纪大乱矣。”王船山谓宦毒实源女祸，自是事实。然宦权始于多妻，而不一定成于多妻。中外女色之事甚多，不一定即有宦官之祸。又一般人以宦官皆生理变态之人，然东汉宦者，实大有妻妾子女。宦官不是一生理问题，而是一政治问题。自来论史者莫不耻宦官，甚至以为宁有权臣，勿有宦官。然他们何尝不是人之子乎？其中非绝无善类。如蔡伦、孙程，不待说；即灵帝时之吕强、赵祐等，亦号清忠，为张让等所杀。宦者原不过趋走之臣。得以为祸者，专

制之政耳。盖一人之政,其左右必渐成为宦官,不在其阉不阉也。不责专制制度而责宦官,是不公道的。总之,圣人专制且不可(圣人不会专制),自不论女人外戚和宦官了。又西人常以宦官为中国所独有,非也。宦官起于埃及,以后印度希腊波斯罗马皆有之。英文 Eunuch 一字,源于希腊文 eunoukhos,义云“寝室之侍从”,与中国之意义相同。回教国家有 Harem 之官。英文中之张伯伦(chamberlain),其字源亦属同类性质者。阉人送至回教国家为宦官,是一种贸易,此种贸易,几乎继续到现代才停止。而亦并非皆为去势之人。义大利,以去势者为歌人,其俗至教皇利奥十三世(——一九〇三)始行禁止,又初期教父颇多自阉者,意在避免肉欲,服务上帝。俄国亦有此派,名曰斯可普西宗(Scopzi)。

〔注一八〕纲亲造婴垒,问所疾苦,晓以大义。“婴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面缚请降。(张纲传)

〔注一九〕鸿都,城门名,于内置学,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蔡邕传)

〔注二〇〕当时变民,除张角之黄巾外,尚有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数千,亦多以黄巾自号。黑巾势力仅次于黄巾,领袖为张燕。参看《三国志》张燕传。关于宦官与黄巾勾结事,可看《后汉书》宦者传、刘陶传及王允传。

〔注二一〕刘焉见天下将乱,先谋赴交趾,未行,为益州牧。此贵族自保心理。后有割据称帝意,实军阀之祖。

〔注二二〕《通鉴考异》疑仲舒对策,应在建元元年。洪迈不以为然。沈钦韩以《通鉴》为是。按武帝举贤良有二次,一建元元年,一元光元年。严助出于建元元年。仲舒出于元光元年。仲舒对策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自汉元年至建元元年七十三年,尤证《汉书》不误。关于“推明孔氏罢黜百家”(详六节),其对策论兴学及选举有云:“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教化之本原也……今吏暴虐百姓。夫长吏多出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臣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民吏之贤者岁各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注二三〕桓帝时,宦官骂读书人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宦官王甫围杀陈蕃时,称之为“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

〔注二四〕宣帝祭庙出庙门，欲乘楼船，薛广德谓非从桥不可，否则自杀。其后儒生所争者，多帝王家庙之礼，立后立嗣之事。此皆我所谓细故。又匡衡之见用，得力于史氏，其后张禹孔光谷永杜邺党于王氏，而息夫躬则依丁傅氏者。此卷入外戚派系漩涡也。

〔注二五〕关于刘向、歆，可参看《汉书》本传及五行传，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梅福成帝时人，言三统及素王之说，又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主张封孔子以承汤祀，读书养生，后传为仙人。参看《汉书》梅福传。

〔注二六〕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有纪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尊。郇越，郇相昆仲散财州里，死后子拒受莽赙。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者。(《汉书》王吉传引)

〔注二七〕党锢始于西汉末。王莽之时，以吴章弟子云敞等为恶人党，皆当禁锢；见《汉书》杨王孙传。

〔注二八〕明张燧《千百年眼》扬雄始末辨云："扬子云古以比孟荀，紫阳氏著《通鉴纲目》，直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盖举市国之褚渊，历姓之冯道，所未尝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见成帝，年四十余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计五十有二岁。合四十余，已近百年。则与所谓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则雄来必在永始之前无疑。然则谓雄为延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郫县人，郫人简公绍帝辨证尤悉。简引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远，而《剧秦美新》或出于谷子云云。然考之《法言》云，汉兴二百十载，爰自高帝至平帝末，盖其数矣。而谓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计雄之终，或在平帝末，则其年正在七十余矣。因雄历成哀平，故称三世不徙官。若复仕莽，讵止三世哉？由是知雄决无仕莽。投阁、美新之事，紫阳亦未可实录也。"

〔注二九〕莽传：公孙禄云，"太史令宗宣以凶为吉；太傅平化侯饰虚伪，贼夫人子；国师嘉信公(即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今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羲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发符侯崔发，阿谀取容。"此可见歆当时仅讲古学而已。又道士西门君惠言"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歆谓东方必成(指刘縯)。《后汉书》光武传谓西门君惠所指即光武，而以图谶说光武起兵之李通，又为刘歆门下。则刘歆刘秀之间，有某种关系，似亦非不可能者。

〔注三〇〕刘秀在河北，多得力耿况弇父子之兵，故称之为“北道主人”。窦融马援曾游移隗嚣刘秀间。融以“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并有符命，是以决心应刘秀，援则以刘秀大度好学而归之。

〔注三一〕东汉之初，权贵亦多宾客。光明皆严禁之。第五伦谓“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云(《后汉书》本传)。此与西汉之风气异。至于汉末，戚宦尤多招宾客，以广声气，流品更乱矣。

〔注三二〕范晔总论两汉士风云：“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效己，凭义济功，前哲遗尘，有足求者。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或徒步而仕，草衣以升。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

汉高仗剑，武夫勃兴，绪余四豪(案：指四公子)。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守文之徒，盛于时矣。

王莽篡国，忠义之流，甘足枯槁，虽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去就之节，重于时矣。

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品核公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党锢列传)

〔注三三〕参看注一四。又章帝之初，韦彪云：“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后汉书》本传)

〔注三四〕以马融之家世及才名，先附邓氏，后附梁氏。“曹腾奉事四帝，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赵典。益州刺史种暠劾腾，腾不介，常称暠为能吏。腾卒，子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后汉书》本传)。按腾为曹操祖父，宦者中较好的。

〔注三五〕明帝时为四姓小侯专立学校，及邓后称制，又为邓氏子弟开邸教学经书，躬自监试。谓“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

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明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实则多朽木不可雕也。

〔注三六〕东汉贵族婚丧之礼之奢侈，可看王符《潜夫论》浮侈篇。又看《后汉书》邓后纪，亦可看出权门受文化陶冶以后一种矫揉造作之态。邓后为禹之孙女，颇知书，父训卒，“昼夜哭泣，三年不食盐菜。及入宫，动有法度，诸姬竞自修整，后独著素制。”和帝死，主政二十年，率命妇群妾相礼仪。然其所谓德政者，仅为节约。“每闻人饥，减膳救灾。”其实亦虚文之另一面也。

〔注三七〕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到当时贵族之奢侈，以及俸禄之薄，于是不法者贪污，而守法者至不能维持极贫之生活。能忍者为苦行，不能忍者自流于诈伪。“小人贵宠，君子困贱；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或以廉举，而以贪去”。然汉世有贪官，亦多廉洁之人。如东汉初张堪为太守，去职时破车布囊而已。章帝时李恂为太守，去职后，至拾橡为活。羊续为太常，资藏唯有布衾、敝裯、盐麦数斛而已。至独行逸民之多苦行，尤不待说。

〔注三八〕范晔尝论汉末名士云：“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適末或疏。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至乃诮噪远术，贱斥国华，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后汉书》方术传。)又徐幹论当时交游之风云：“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名誉可以虚哗获也，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

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呼，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中论》）

〔注三九〕郭太（泰）自汉末至六朝有高名，至尊为“亚圣”。世人每以其不及于难为滑头，实则他在陈蕃死后即病死。观其训左原以义方，拔庾乘于门卒，不绝贾淑之为善，则其奖掖至多。蔡邕称之，必非无故。

〔注四〇〕此许汜评陈登语，而刘备以为枉，为登不平。顾世人常以此为称许之词。

〔注四一〕三君八俊之类皆是标榜，亦即今人所谓宣传，举大事而掉之以轻心，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皆经验不足。

〔注四二〕《后汉书》酷吏传云：“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

〔注四三〕如杜乔劾崔瑗，胡广不救李固，许劭许靖兄弟且不和。

〔注四四〕如陈蕃自恃有窦后为援，毫不为备。蕃死，士流未能一致，愤起为蕃雪冤，而假手小吏张俭，快一朝之愤。李膺事发，未能联合内外超然者一致救援，当事者皆引颈就缚。

〔注四五〕三十六郡为秦始皇廿六年所定，至卅三年，增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据王国维考证，外又分八郡；实共计四十八郡。其自东北起，自北而西而南而东，在边境者为：辽东，辽西，右北平（热河），渔阳（北平），上谷（冀西察南），代郡（晋北察南），雁门（晋西北），云中（绥远东南），九原（绥西），上郡（陕北绥南），北地（甘宁），陇西（甘肃东南），蜀郡（川中），巴郡（川东），黔中（湘西），桂林（广西），象郡（越北），南海（广东），闽中（福建）。廿六年后，除南海四郡新设外，余仅分山东一带之郡（如胶东胶西等）。

〔注四六〕我在第二章注一说到中国民族之构成，并指出唐虞夏商周时代，在黄河长江上下游有氐羌戎狄夷貉蛮越之夏化。周代以后，如第三、四两章可见，中国还是华戎杂处之局。至于战国，如第四章注六、注七所说，一面是华夏民族日益统一，同时则有新夷狄匈奴之来。秦汉以来，夏楚化合为汉，成一整体，继续汉化各族；同时对敌对之族，先为抗争，继为同化。这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东南西南方面，即沿长江上游及南岸支流而至珠江流域和沿海；此即史汉两粤西南夷传所载。二是大东北辽河鸭绿江黑龙江流域，

以及朝鲜半岛海外。此史汉朝鲜传,《后汉书》、《三国志》东夷传所载。两者皆"蛮夷"区域。三是大西北方面之内外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及以外。此四史匈奴西域西羌及乌桓鲜卑等传所载者。此为胡羌区域。北部为胡,西部为羌。到了汉代,汉族与非汉族之关系始有较确实之文献可征。中国民族之铸成,实以此为大关键。本节注四七——一〇六各注,皆以此为主,而此至五胡乱华,亦脉络分明。幸读者留意。

〔注四七〕以上三处,相当于上注所说长江上游及珠江流域,与东北方面同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东夷南蛮西南夷传内。二者相较,可知"前汉"所谓两粤,约与"后汉"南蛮相当。唯后汉之范围,已较前世扩大。除朝鲜东夷详下注外,先论两粤(南蛮)及西南夷。

前汉两粤,指今浙闽两广。后汉南蛮:一、为长沙之武陵蛮,有盘瓠神话,好山居,着五色衣,输賨布(南蛮之赋);此即古之荆蛮。二、交趾,男女同浴;其西有乌浒,有食人之俗;南有越裳,周初献雉。周衰秦末,赵佗王南越,汉为郡县。交趾所属,皆项髻徒跣,以布贯头。又珠崖儋耳,贵者皆穿耳。珠崖常不安,后弃之。王莽时日南之黄支国来献犀牛。光武时七真徼外蛮里(里即俚,亦即僚黎)张游,率众内附。旋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姊妹反,九真日南合浦蛮里应之,至马援始平。汉末乌浒九真日南叛,朱儁平之。三、湖北四川之巴郡南郡之蛮(称廪君之后),和帝时尝以收税不公为乱。有四川板楯蛮夷(称杀虎者之后),居水,善巴渝舞,输賨钱,不输租赋;尝为中国御羌有功,亦尝以郡吏不法为乱。

按以上两粤与南蛮,实包括越蛮二系统。粤、越、乌浒、黎、僚,实为同族,亦与今日越南人并高山族同族,盖马来族为主体。彼等为东南沿海原住民。其后一部同化于苗傜,一部分南迁越南与南海。武陵蛮,巴郡蛮,賨,实即荆楚原住民,后世所谓苗傜畲蛋。故《后汉书》之南蛮包越、苗;二者殆同时住于华南,华中。而苗亦与氐、僰、濮、泰族有关,盖皆有盘古(盘瓠)之神话也。然何者受何者之影响不可知。氐族、苗族与越族之入中国,不一定有先后。大抵越在东,苗在中,而氐在西,以氐族分布区域最广。

《史》、《汉》西南夷分为三区:一以夜郎(宜宾遵义桐梓)以西,滇(昆明)以北,邛(西昌)为中心,椎髻,耕田有邑;二以巂(西昌一带)、昆明一带为中心,编发,随畜迁徙;三巂之东北,如筰、冉、駹、白马,以白马为中心,椎髻、编发二者,兼而有之;"皆氐类也"。按夜郎等地在金沙江,巂、昆明为澜沧江流

域，筰、白马之类，即西康甘肃间岷江、松潘、理番一带。《后汉书》又有哀牢，则在怒江及伊洛瓦底江，即云南之保山永平及滇缅边境。又《后汉书》云：夜郎句町好巫鬼；滇国出鹦武、孔雀，有盐池，金银畜产之富；邛都夷土地平原有稻田，碧鸡金马之瑞时时出现；筰都夷披发左袵，神乐仙人所居。明帝时，益州刺史朱辅开发汶山以西，夷人作诗，载于《后汉书》。顺帝时种暠继之。冉駹夷有六夷七羌九氐，有灵羊疗毒，多杂药。贵妇人，党母族。白马氐居于仇池，出名马、牛、羊、漆、蜜，人勇敢抵冒。尚有哀牢夷，穿鼻，文身，有五谷、蚕桑、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出铅锡金银、虎魄、瑠璃、翡翠、犀象、猩猩。明帝时，哀牢王柳貌率众五十余万内附。后一度用兵。和帝安帝时，徼外敦忍乙王献大象，僬侥种内附，掸国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即大秦也云。以上椎髻者即氐、濮、僰之族，编发者似为羌。《诗》商颂："自彼氐羌"；《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其所从来者远矣。关于氐、羌，尚有西羌南羌，详后。而哀牢，过去中外史家多以即南诏之先世，称为泰国之始祖。然观其文身穿鼻，殆为越族；而南诏者，仍为乌蛮别种，即东爨。哀牢以后，南北朝有两爨，东爨与今之泰寮人关系密切，而西爨与今日缅人有关。仍广义之氐僰与羌也。故哀牢南诏二者不同。氐族南下，有越族之地，而哀牢南下，入今日越南寮国之地欤？僬侥当即马来族或高棉族。掸当即后来之爨，今日之暹。由此可见西南夷大体以氐为主，羌次之，杂以苗越。其后益南移（经横断山脉诸水流域），变为今日中印半岛民族。今半岛语言，通分为猛，高棉，掸泰，藏、缅、安南四系，而广西云贵康藏一带之仡佬、仵佤；沙人、仲家、摆夷；西番、麽些、罗罗、阿昌、开钦；苗傜、民家；相关焉。

以上南蛮及西南夷，原受楚人文化影响。盖越为楚服，滇亦楚开。越族初非单节语，后用楚夏语言。皆早浴夏楚文化，自易结合。唯政平多归附，政恶则为变而已。

西南、东北、西北等地，乃研究民族问题最好之区域。关于西南方面，除我国记载外，近世英法人实地考察与著作甚多，如 H. R. Davies 之《云南》，伯希和之《交广印度两道考》等是也。

〔注四八〕此言黑龙江流域方面。东北方面之民族，通分古亚族及新亚族。爱斯基摩、虾夷、吉利亚克等为古亚族，芬、满、蒙古、突厥为新亚族（但此分类亦不一定可信）。爱斯基摩为匈、芬之族，虾夷为白种。满族即古之夷貉，当为新亚族最古居民之一，亦绵衍最盛者。日人有谓涉、沃沮为虾夷

(ユゾ)者,实无确据。丁谦谓沃沮即窝集,或然。我想认为"生夷"、"生貉",或无大误。

夏人建国,与西北戎狄关系密切。商人建国,则与东北夷貉关系密切。楚则与蛮越关系密切。夷貉可大体视为一族。在山东者为夷,在满洲者为貉,亦即貊。箕子封鲜,肃慎早贡,厥后孔孟恒以蛮貊(貉)并举,而燕人不断开发之。貉地之浴于中国文化,可谓最早矣。貉族建国,朝鲜以外,肃慎最早,次则扶馀(《后汉书》作夫馀)。扶馀在朝鲜鲜卑肃慎间,古王城在今辽宁昌图县。王莽时,汉之统治衰弱,扶馀南下,有高句骊、百济建国,而南韩有新罗之起。韩国《三国史记》谓新罗在公元前五七年建国,继有高句骊百济建国,未可尽信。高句骊本玄菟一县,其人亦沃沮涉貊之族,一时甚强,常侵玄菟郡。扶馀故国,犹存至隋唐。

古之朝鲜,指今之北韩,非全韩也。前汉之末,汉仅保有乐浪郡。至后汉末公孙度一带据辽,画乐浪之南为带方郡。其后丘毋俭司马懿入辽。晋初中国尚统治朝鲜半岛,包括三韩在内。

三韩者,原有七十余部。其中马韩为今日韩人正宗。辰韩即秦韩,"耆老皆自言秦之亡人",其王亦由马韩主之。弁韩辰韩杂居,言语有异,衣服相同。及晋内乱,高句骊统一北韩,扶馀人之百济代马韩。新罗统一辰韩。又有任那(加罗)代弁韩,此与日本人关系较密切。四国相争,而日本亦起。

〔注四九〕日本人种,据日木西材真次,谓为白色之倭奴,虾夷,黄色南通古斯,印度支那人,汉人,黑人,与混血之印度尼西亚(马来)人,六种;在三世纪造成近代日本人。但体质上之马来,语言上之通古斯,文化上之中国,最为显著。《山海经》海内北经云:"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市村瓒次郎以此盖国或即以后玄菟郡之盖马县;此殆关于日本记载之最早者。《汉书》以后,《三国志》及《后汉书》倭人传云,凡百余国,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大倭王居邪马台国(Yamato),女王之所居;该国原为男王,因内乱,始有女王,魏世封为亲魏倭王卑弥呼云。日本史家素以为邪马台即大和,女王即神功皇后。其后日本之爱国派认为"不体面",否认之。但其后白鸟库吉等认为中国记事均极可靠,唯以邪马台在九州。而内藤虎次郎等则认为确系大和,即日本本岛云。日本文化,远由中国,近由百济传入为多。夫馀百济代表半岛上中国文化之正宗也。又《史记》始皇本纪及淮南王传引伍被之言,有始皇与徐福童男女三千求蓬莱事。"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后汉书》以为在

夷洲澶洲，在会稽海外，非日本。徐福至日，非无可能。唯徐福即神武之说，则毫不足信。又《汉书》地理志言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国，或舟山欤？

〔注五〇〕滨田青陵云："满洲方面石器时代已有华人移植，春秋战国时代华化流入，为汉代文化移入之底子。此由旅顺一带周末明刀、方足布之货币可知。武帝以后，辽东始入金属文化时代，汉代坟墓中五铢至王莽货币，汉镜，漆器，均极为丰富。北朝鲜有同样情形。即越南方面，法人在东京发现与朝鲜同样汉式坟墓。南鲜（三韩）汉化较迟，日本接受汉文化又较南鲜为迟。在王莽时代日本始受汉文化影响，乃由石器一跃而入铁器时代。"（《东亚文明之黎明》并引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及法国 Parmentier 之论文）

〔注五一〕近世史学有几个可注意之趋势。一、由有史时代到先史时代。十八世纪来，先史学大有进步。二、由欧洲到西亚近东。自十九世纪初罗塞塔石之发现，埃及巴比伦之研究大盛。三、由近东到中东。过去认埃及为文化故乡，现在知道两河流域早于埃及，最近知道波斯阿富汗或巴基斯坦更早于两河流域。四、即是下注所述由中亚到远东，或由中国到中亚。五、和此并行的，是考古学研究由河川流域到河川与草原之关系。由此知道过去所谓石器、铜器、铁器三分法，以及旧、中、新石器三分法皆已不甚适用了。

〔注五二〕近世欧人对中国及东方研究，以明末清初来华教士奠基。一五八五年西班牙孟德萨（Mondoca）出版《中华大帝国史》，在利玛窦来华前。其后葡人鲁德照（Semedo）著《中华帝国志》。十七世纪中叶比人柏应理（Couplet）等始译"四书"。康熙时杜德美（Jartoux）等助测《皇舆全览图》，雍正时宋君荣（Gaubil）研究中国天文学，冯秉正（Mailla）译《通鉴》。他们除了关于中国一般研究外，亦逐渐集中于塞北，即满、蒙、新、藏及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方面。此盖注意中西交通之自然结果。及"典礼"问题发生，中西文化交流渐断。莱布尼兹提倡研究中国，西士回国传播汉文。于是十九世纪初"汉学"（Sinology）之名成立，学者辈出，著作杂志滋多。然至今西人（及俄人）关于中国研究，要以关于边疆者为多。此盖又受各国对华分离政策势力范围政策之影响者。其中可分为三方面。一为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最早者为十八世纪初，刘应（Visdelou）之《鞑靼史》。一七五六年有法国德经（Deguignes）之《匈奴通史》。十八世纪末，英国吉朋在其大著《罗马衰亡史》之第二卷，亦对欧亚游牧民族之关联，尤其是匈奴之踪迹，有卓越之研究。十

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土耳其人多桑(D'ohsson)以法文出其巨著《蒙古史》。自五口通商，学界人士亦随商业家来华。先是十八世纪中叶德国史家尼布尔(Niebuhr)在近东作学术旅行，开东方研究之一新时期。一八一四年以来，法国之列木沙(Remusat)首在法国大学辟“汉学”研究。此后则德人克拉普罗特(Klaproth)有名，唯主要系为俄人工作。其后牛曼(Neumann)来华，收集文献极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犹克(Huc)、加贝(Gabet)旅行中国边疆，而德人李希霍芬(Riehthofen)，则对中国地理写成古典著作。十九世纪末，美国罗志意(Rockhill)亦来华作全面性之研究。而英俄自尤多便利。英国玉尔(Yule)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并博考中西交通史料。法人入英籍之拉克伯里(Locouperie)倡“中国文明西源论”，此本糊口之作，竟一时惊动听闻。俄国有华西列夫；又有布莱西奈德(Bretschneider)，本德人，为俄国驻华使馆医士，著《基于东亚史料之中世研究》，尤详于蒙古方面；其《中国植物志》亦甚有名。法国戈馃(Cordier)以毕生之力编成《汉学书目》五大卷，提倡之功至大焉。廿世纪初，德人夏德(Hirth)，法人沙畹(Chavannes)，继而法人伯希和(Pelliot)，德人洛佛(Laufer)四人，为国际汉学泰斗。夏德、洛佛讲学美国，四人方面已广，然主要兴趣，仍在蒙古西域，次则南海。而自前世纪末，尚有 Lassen, Pallas, Howorth, S. Martin, Tomaschek, Kingsmill, Eranke, Marguart, Levi, Parker 等，皆由中亚、蒙古，以及波斯、印度之历史，进于中国史之研究。二为探险考古及民俗考察。由于欧亚草原早为俄国所并，俄人着手最早。自彼得时代起，尤其是一七二六年以后，俄人在西伯利亚发现许多塞契特遗物。一八三五年后，俄人成立“帝国地理协会”，各大学亦教授东方语言。西伯利亚及中亚之探险队不断出发。一八八八年雅德林策夫(Yaddrintsev)在外蒙鄂尔浑发现许多突厥碑文。但对彼等还是“天书”。本世纪拉德罗夫(Radloff)得丹人汤姆生(Thomsen)之助，得以读通，并进于宁夏及新疆北路之探。一九二一年后，俄人柯兹洛夫(Kozlov)又在外蒙掘出古匈奴器物甚多。其在西藏及中亚方面，一八四〇年后英人斯特雷奇(Strachey)兄弟实为探险先驱。一八五四年后，德人石拉金推(Schlagintweit)兄弟由藏入新，而死于该处。一八六八年，有英人萧氏(Shaw)至新研究言语，而加雷(Carey)继之。一八九〇年左右，英人鲍维(Bower)、法人格伦约(Grunard)在库车和阗发现梵文经典。一八九四年起，瑞典斯文海定(S. Hedin)已在新疆探险。一九〇〇年，匈牙利人斯坦因

(Stein)受英政府之雇,继之数次。一九〇二年,国际东方学会开会于德国,由俄人拉德洛夫提议,成立"中亚探险协会",德国有格伦威(Grunwedel)、勒科克(Le Coq),法国有伯希和(Pelliot),俄国有鄂登堡(Oldenburg),日本有大谷光瑞等参加。斯坦因继追俄人之后在宁夏黑城发掘。至一九二七年止,敦煌及流沙遗物、西夏文书,均被彼等席卷而去,今已成各国博物馆之珍品矣。即以斯坦因而论,第三次在新所得,即有一百八十二大箱! 三,由此进于先史时代研究。本世纪初,美国亨丁敦(Huntington)至新疆研究地质与气候。一九二〇年左右以后,美国安得鲁(Andrews)、纳尔逊(Nelson)组织中亚考察团,考察蒙古一带。而"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安特生主持之下,发现仰韶新石器文物,其后有"北京人"之发现。而一九二三年,桑志华(E. Licent)、德日进(T. de Chardin)在绥远发现旧石器。在东三省及满蒙方面,日人用力最勤,尤以满铁之孜孜调查为然。鸟居穷年不舍,收获甚多。而在西伯利亚与蒙古方面,则俄国为专门。西藏方面,英印人为专门。越南及西南方面,法国为专门。是皆我国财产,而由彼等整理之。

以上三种工作,固有助于东西历史之沟通,亦为彼等对中国各部门文化之研究以及中国整理历史之研究开路。关于中国语言文字文学者,以康熙时法国马若瑟(Premare)之译《赵氏孤儿》为先驱,此为福禄特尔《中国孤儿》蓝本。鸦片战后,英外交官安麦斯特(Amherst)亦颇译中国文学。十九世纪后期,则有德国格鲁白(Grube)著《中国文学史》,孔好古(Conrady)亦为中国语言文字专家。英国有理雅格(Legge)之翻译中国经典,翟理士父子(Giles)之翻译论著中国文学,此外尚有卫理(Waley)。而今日此方面最高专家,当推瑞典高本汉。研究甲骨文者,以加拿大明义士(Menzies)开始。关于中国美术者英国翟理士及布雪(Bushell),法国西恩(Siren)以降,著作颇多。洛佛之于陶瓷,高本汉及库普(Koop)之于铜器,尤有发明。关于科学者,有荷兰之施来格(G. Schlegel)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著《星辰考原》。他与戈牒于一八九〇年发起《通报》(Toung Pao),此为国际汉学最高杂志,旋有河内远东法国学院之《校刊》,一时与其齐名。美国加特(Carter)有《中国印刷术起源》。最近英国剑桥李约瑟(Needham)编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已出版,收集资料不少。关于通史及一般文化史者,理雅格译经之后,沙畹译《史记》,计成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完成十八,其余未成而死(一九一八年死);故能使法国握国际汉学之牛耳。夏德,以及沙畹弟子马伯乐

(Maspero)，均有《中国古代史》。近有美国顾理雅(Creel)关于商周及孔子之书。一般通史以德国卫礼贤(Wilhelm)之著作较早。佛郎克(O. Franke)在本世纪初即以研究西域史知名。自一九三〇年——三七年出版《中国通史》三卷，闻全书已告完成，乃篇幅最巨之作。其后继者福尔克(Forke)曾讲学美国，著有《中国中世哲学史》。美国加德纳(Gardner)对中国修史之学，有所著述。拉托列特(Latourette)之《中国人之历史与文化》，已为英文中最标准之书。而法国美术史家格鲁塞(Grousset)著述远东史，其中中国部分近已译为英文，题为《中华帝国之光荣伟大》，颇简明得体。余稿写成后始见之，竟多不谋而合者焉。此外论中国风俗宗教文化者，尚有美国卫三畏父子(S. W. Williams)，法国 Granet，Groote，以及近来 Fitzgerald，Gowen，Hughes 之英文著作。而赛珍珠女士之论文小说，介绍中国文化，厥功甚大。至于论及中国地理，农业，政治，经济，外交者未能毕数，要亦瑕瑜互见也。关于欧美中国研究，可看俄国(Bartrold)《欧洲及俄国东洋研究史》(有日译)，日本石田干之助《欧美之支那研究》；书目有戈牒"Bibliotheca Sinica"五卷，拉托列特之书，附有重要参考书目。至于日本，那珂为近代研究中国史最早之人，近世其"支那通"多如过江之鲫。而品学兼优之士固亦不少。关于文史方面，内藤，狩野，铃木，宇野，服部，中山，市村，武内，本田，盐谷，宇井，常盘，冈崎，大村，中村，梅原，原田，安冈诸人，可说是最有学问的。关于满蒙方面，除鸟居外，有稻叶，箭内，矢野；关于西域方面，有白鸟，桑原，藤田；近来新起者有江上，水野。彼等读中国书能力，常过西人，故常能有所创获。然在方法上，究不能脱西人之藩篱而已。

然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之研究，毕竟尚在开始之阶段。盖中国文献译为西洋文者，亦仅一部分。西洋之汉学家，除教士(如理雅格、卫三畏等)外，一部分为使馆或税关职员(如翟理士、沙畹、夏德)，一部分乃曾在中国执教者(如高本汉)，因得熟悉中国文献。然此究为极少数人之机会。由中国边疆，经中国金石，动植物，民族，诗歌，转入历史文化之考察，洛佛可谓一关键人物。然多方面之才识过人之精力如彼者，究竟不多(彼生平关于中国及远东著作，凡二百五十种，一九三四年死)。有一事至堪注意者，凡能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深认识之汉学家，自夏德、沙畹、洛佛、佛郎克、福尔克，以至拉托列特、顾理雅、格鲁塞诸人，固皆受西方文化之教育者，然只要能了解中国文字，读中国之书，了解中国历史以后，即无不对中国文化抱极大之敬意。甚

至不通中国文如斯坦因者，在经由古物知中国史后，亦赞服不置。近代日本人固受军人之误导，然积学之士，固深知中国为东洋文化主流，不失敬爱之忱。此谓中国文化之价值也可，谓之为魔力也可。所以我相信中国文化必有更为世界了解之一日。吾人不必因彼等之礼赞，即自忘近代之堕落，然我深信今日国人有略知西洋文物即对自己之历史与文化自惭形秽者，真一可愧之对照。又近日西洋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纵所知不多，而于满蒙西域之事，皆多能如数家珍。吾人因近代衰弱无力重践祖先之足迹，犹可说也。尝见二三译西人论新疆甘肃美术之书，竟有从头到尾无一史地名词，如谈海外天外之事者。余尝以中国近代之堕落标志，以及危亡根源，在对满蒙新疆之忽视。然则此一责任，又仅在肉食者而不在知识分子乎？此真一大可哀之事矣。

要之，由于欧美俄日汉学家之工作，近六七十年来，“欧亚之间”之历史，较之过去，已大为明白。而吾人必赖外人研究以助我国之史学者，老实说亦在这一方面为多。西人（及俄人）既有中国文献为引导，复有希腊罗马波斯以及阿拉伯印度之记载与古物比较，复能对古突厥文字今满蒙回藏语言释明，其研究自多便利。尤其是地下埋藏之物，虽出自我国，然或因在彼等势力范围之下，或因有政治及财政力量为后盾，不仅西北地下珍贵之物均落彼等之手，即西南之民族语言，在彼等有组织之调查后，其材料远较吾人丰富。此真言之可痛者。学问为天下公器，彼等之研究，吾人所必知。然多年来中国言史者中，若干人有一种倾向，以为言古史须问津于安特生；而汉唐以来之历史须问津于伯希和斯坦因，甚至以为“曾经外人手，议论安敢倒”，乃至以外人“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则又大谬不然者。

一则东洋主要史料，究在中国。斯文海定及斯坦因之发掘，系得中国书籍之指导，其发掘结果，亦证实中国文献之确切。吾人岂可怀宝自弃？西人看中国书籍极精细，然究未能通观。二则西人对欧洲民族语言分类知识，久无进步，对亚洲尤然。如彼等于亚洲只有对蒙古突厥印象最深，如是亚洲人皆蒙古人，非蒙古人即突厥人矣。三则西人为学，恒为东西之成见所蔽。他们动辄以东方文物，不出自巴比伦、希腊，即出自雅利安。如认为中国民族由巴比伦移来，中国古代之神话、天文、音乐不出于巴比伦即出于希腊，不出于希腊，即出于波斯印度，甚至以为高昌（火州）无中国文化之影响。又对于乌孙、月氏、吐火罗皆概认为雅利安人，而关于塞种月氏，时而称为雅利安，

时而称为蒙古。四，彼等对于个别事实，每精确绝伦，除上述关于中国边疆中外交通者外，关于中国天文美术之研究（参看注一八九、二〇二），因有比较之功，不可不知。但关于我国文学哲学，则尚仅翻译介绍而已。而最精且博若沙畹、洛佛、高本汉三先生者，乃西洋自有汉学以来仅有之三人。以全人类史之目光，对欧亚历史文化作会通研究者，犹未见其书。余于西人关于中国边疆中国历史之考证，略有涉猎，各国所藏中国古器古物古画及古文书，亦大半浏览，对彼等研究之精勤，甚至有时一字不苟处，颇表感佩。然本节及其他处所论述，不没其是，决不从其非。并深信对欧亚历史作公正综合研究，责在东方，尤其是我国史学界。“重新发现自己”，实责无旁贷者也。（上注写于二十四年前。其后有李约瑟之续卷，有费正清等之书文，此注参看四版序。一九七六年补记）

〔注五三〕此指蒲昌海（罗布泊）及里海，相当于“土耳其斯坦”一词。西人所谓土耳其斯坦，包括新疆在内。但此实不通之名词（详后）。本书西域指葱岭东，中亚指葱岭以西。北亚指西伯利亚。东北亚指大东北。

〔注五四〕我相信乌拉阿尔泰与印度欧罗巴（雅利安）二群，原来都在中北亚，二者出于一源，后来才分化的；然亦时生混合。无论体质言语皆然。

过去关于人种，有蒙古与高加索之分，前者又分北蒙古（满蒙），南蒙古（汉藏暹越），西蒙古（突厥）；高加索分为诺的克，阿尔卑，伊比利。此种分类，早已发生动摇。泰罗（G. Taylor）以蒙古、阿尔卑为一个系统，并以夏威夷人实为高加索。过去人种谱还在继续使用者，无非是一种惰性而已。再说语言。印欧语通分为东系（Satern）西系（Centum），雅利安（印度、波斯）为东系代表。而今日西欧语多出雅利安，于是德国人又以雅利安指犹太除外之印欧族。说者谓雅利安（Aryan）与伊朗（Iran）二语同源，指里海咸海至伊朗一带之所谓雅利安故地（Airyan—Vaedjo），义云“高贵”。但近来考证，此雅利安原为“犁耕”之意，与 Arable 同源。不过雅利安语形成于里海一带，大概是确实的。

所谓乌拉阿尔泰语，通分乌拉系（Fino - urgrian——芬、乌系），匈奴芬兰语属之；阿尔泰系（突厥鞑靼系），满蒙土耳其语属之。然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均复杂亦近似，而满蒙语颇合理而简单。则此分类，亦未可信。又乌拉阿尔泰语一般以为形成于阿尔泰，此误以土耳其语为最早之语言。其实肃慎、夫馀、丁零、鲜卑之开化最早。我相信所谓乌拉阿尔泰语言，实形成于贝加尔湖一带。

世人每以为雅利安为曲折语，乌拉阿尔泰为关节语，两种绝不相同。然赫梯人之种族及其语言，究为土耳其或雅利安，即不能确定。而关于吐火罗语言(Tokharian)，过去仅为印欧族之东西二系之争，而近来亦知其问题并不只此。其实如洪保德(Humboldt)所云，“华梵二语，代表两极，其他语言，皆在二者之间。”汤姆生(Thomsen)在一八六九年指出印欧语与乌阿语有亲属性。此后论者甚多，一九三四年，柯林德(Collinder)证明芬语与梵语颇多相同，而文法变形与希腊拉丁语有相类似者。本来语法进化原则，并非由简而繁，而是由繁而简(语汇则由简而繁)。由历史变动之迹象看，芬语梵语或同起于乌拉山之南，由此移动，西受闪族、亚述、叙里亚语之影响者为印度欧罗巴；东受氐、羌、藏、满即朝鲜夫馀鲜卑语之影响者，即所谓乌拉阿尔泰。以后便有伊朗土朗之分。故不如称雅利安语为“乌拉里海语”，乌拉阿尔泰语称为“乌拉贝加尔湖语”更为确切。以后由于塞契特、匈奴、波斯、希腊、氐、羌、月氏之东西移动，种族之混合频繁，故土耳其、回纥人之面貌，与西洋人有近似者；今日波斯人之混有大量乌拉阿尔泰之血液，也是不成问题的。

〔注五五〕此后即本章所说之塞契特与匈奴之移动；以后即柔然，哌哒与日耳曼之移动；以后即突厥、萨拉森、诺曼、蒙古、奥斯曼之移动。

〔注五六〕古代东西交通，一为陆道。内陆交通最短线经新疆。此世界上最干枯区域，仅南面塔里木盆地与南北高山之间少数沃洲地带适于居民，由此西经葱岭而至中亚阿姆河，而东通甘肃、黄河。东西两端之交通，因风沙障碍和水之缺乏，大队人马通过，非常艰难。此张骞玄奘以至马可波罗所经之丝道。此外，由西藏通塔里木东端及青海川西；及由川西通云南以至缅越；也是古代曾经有过的通道。前者可称羌路，也是吐蕃北上之路；后者可称西南夷路，是张骞计划开通而未成，而现在有滇缅线。此亦可谓之副丝道。然其艰险，不下前者。凡此丝道，乃农耕山岳之民所用之道。又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是较润泽，亦甚肥沃之地。此处北通西伯利亚。由西伯利亚可南经伊犁以入准噶尔；或略北入唐努乌梁海，沿阿尔泰山以入宁夏；或更北绕贝加尔湖到外蒙；或东至黑龙江以入满洲。此可谓之草原道。亦我所谓广义的胡道。这路在古代交通上自然更早，但一直在游牧民族控制之下(塞契特与匈奴)。狭义的胡道指二线。一是由河西走廊经准噶尔出伊犁。也许此一胡道为匈奴所塞而不通，才有丝道。二由贝加尔湖呼伦贝尔以入辽东。我相信所谓胡人，最早是经过此路与燕人及中国接触的。即匈奴亦大概

是由此而入蒙古的。直到十七——十九世纪，俄人仍经此路而入中国。二为海道。此即后来香料贸易道——由南海诸岛至红河东京。此可连西南夷道。

〔注五七〕关于塞契特(Scythia)，西方最初加以记载者为希罗多特。他在其《史志》中述欧、亚、利比亚(非洲)三洲之事，第四部专论塞族之事。塞契特地域，主要是自喀巴仟至顿河一带。此在七世纪前，尤其是乌克兰及巴尔干，原为吉美利人所住。(此 Bosporus Cimmerius 之名所由来。)前七世纪为塞契特人取而代之，至前四——二世纪，为萨马特人取而代之。此后塞契特已不复为一政治的民族的单位，但"塞契特人"一词，仍为希腊罗马史地学家所用。一面如斯特拉波(Strabo)，以指多布洛加人(Dabrogea)——多瑙河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之特雷斯人(Thracian)，后为塞契特征服者——称之为"小塞契特"，此词直至东罗马帝国犹用之。一面如朴托莱梅(Ptolemy)，以指东塞契特，即他所谓"内外塞契特"者。一般而言，地指黑海以北以东之草原地区，人指该地区统治的游牧民(Skuthes)。但其族性，实不分明。据希罗多特以及以后希腊罗马记载，关于塞契特及其有关民族之分布者，由近代欧人加以考证之后，其地望大致如下：第一，西塞契特，自阿尔比(Albia，黑海正北)以北，有 Callipidae，Aroteres 等族。他们种麦为生；在因古尔(Ingul)及第聂伯(Dnieper)河间，有 Georgi，亦大体相同。二，游牧塞契特，及王家塞契特区，在第聂伯及顿河间。此外，三，在他们后面者，为非塞契特而有关者。自西而东，在多瑙河北有 Agarthyrsi 族；在基辅有 Neuri 族；在丹波夫有 Androphagi 族；在顿河及伏尔加下游有 Sauromatae 族；中游有 Budini 族；以及半希腊种居民。自此经商业通路，在南乌拉山有 Thyssagetae 族；自托波尔至吉尔吉斯，有 Iyrcae 族及西塞族之殖民者；在阿尔泰，有 Argippae 族；在塔里木盆地，有 Issedones 族，再经独眼之 Arimaspi 族，以至极北通海之处，则为"北风外居民"(Hyperboreans)，乃善良之素食者云。在塞契特南者，克里米一带，为非塞族之 Tauri；而布哈尔大夏一带，则有 Massageta 族。凡希氏所说，自谓由旅行者得之 Issedones 人，自认并非可信，故以上仅可作猜谜观。后来之萨马特族，过去以为即上述之 Sauromatae(索马特)族；但近代研究此一问题之权威罗斯托策夫(Rostovtseff)，则提出甚多之相反论证。关于塞族来源，一说是希腊人所谓 Scoloti 之后。而希氏则认为实来自亚洲。塞契特尝统治米太约三十年，后为 Massagetae 逐至伏尔加河以入基美利之境。而此则又先由 Arimaspi 逐 Isse-

dones而引起。于是基美利人一面西南至巴尔干以南，一面东南至小亚细亚威胁亚述（亚述人称为 Gimirai，Gomer）。而塞契特继之而至（亚述人称为 Ashguzai）。亚述人初欢迎之抗基美利人，米太人乃至埃及人。此皆前七世纪下半期之事。据基美利人留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古物看，有伊朗色彩，和特雷斯色彩。塞契特之人名，有伊朗及芬族色彩。故多以为是芬族而征服伊朗者。而萨马特之为伊朗族，尤显著无疑。至基辅一带之 Neuri，多信其与斯拉夫人有关。希氏之书及希坡克拉特（Hippocrates）对于他们的民俗之记载，大抵为游牧好战，饮马乳，性关系甚滥，束带着裤，崇拜自然神，以人头为饮器，重葬仪，有以活人及截发殉葬，及以占卜治病之类。此与《史》、《汉》关于匈奴记载酷似。近代在南俄及西伯利亚，发现甚多塞契特之坟墓、武器。以前西亚武器，主为斧；彼等则习用短刀。又随塞人之来，武器上皆以动物为饰。人像皆作高帽。坟墓中甚多金银器物，但不一定皆为塞契特所有耳。参看希罗多特《史志》，其略可看《大英百科全书》塞契特条。

大概言之，希腊罗马人对欧亚草原之游牧民族皆称为"塞契特"，犹后来他们对亚洲游牧民族皆称"鞑靼"。直至十八世纪，吉朋犹以塞契特与鞑靼为欧亚游牧民族之总称。他们以芬族伊朗族为主，并包括特雷斯人、马其顿人、以及后来日耳曼斯拉夫人之祖先，亦无问题者。如芬族占主要成份，则与匈奴关系更为密切。盖匈奴亦以芬族为主也。详下。

〔注五八〕匈奴与塞契特相同者，除骑斗，短刀（径路刀），动物作风之艺术外，住穹庐，食肉饮血，饮乳酪，在树林中祭祀天神，金银墓饰，截发殉人葬仪，以人头为饮器，不一而足。自然这也大部分是草原民族所共同的。又波斯浮雕上"塞迦人"战士之盔饰与蒙古掘出之匈奴人像上之盔饰亦类似，唯前者尚较高。又匈奴西迁后所遗之弓，尤长于塞契特及萨马特人之弓。盖长弓是汉人的创作。此则匈奴受汉人影响之结果。

〔注五九〕当萨马特人代塞契特人为霸主之初，伊朗方面，有类似之游牧群出现，此即塞迦。后来塞迦与塞契特几成同义语。多数学者以为波斯人之 Sacae，希腊人之 Scyth 二者，与《汉书》"塞种"，所指为一。但一部分人则趋于另一极端，认根本无关（如 S. Martin，Cuno，白鸟等），我想一部分相同是事实，盖都有蛮夷、鞑靼之意。我都冠以塞字，即由于此。但波斯人之塞迦，指波斯边境之蛮夷，主要是雅利安种及波斯语之游牧民。其中当有一部分匈奴坚昆之族。希腊人之塞契特，指希腊边境以外之蛮夷，成分更广，实

包括特雷斯，芬人，斯拉夫人，乃至一部分波斯人与吐火罗人在内。而汉代中国人之所谓塞种，如后可见，似指一切雅利安之游牧民，且可能包括一部分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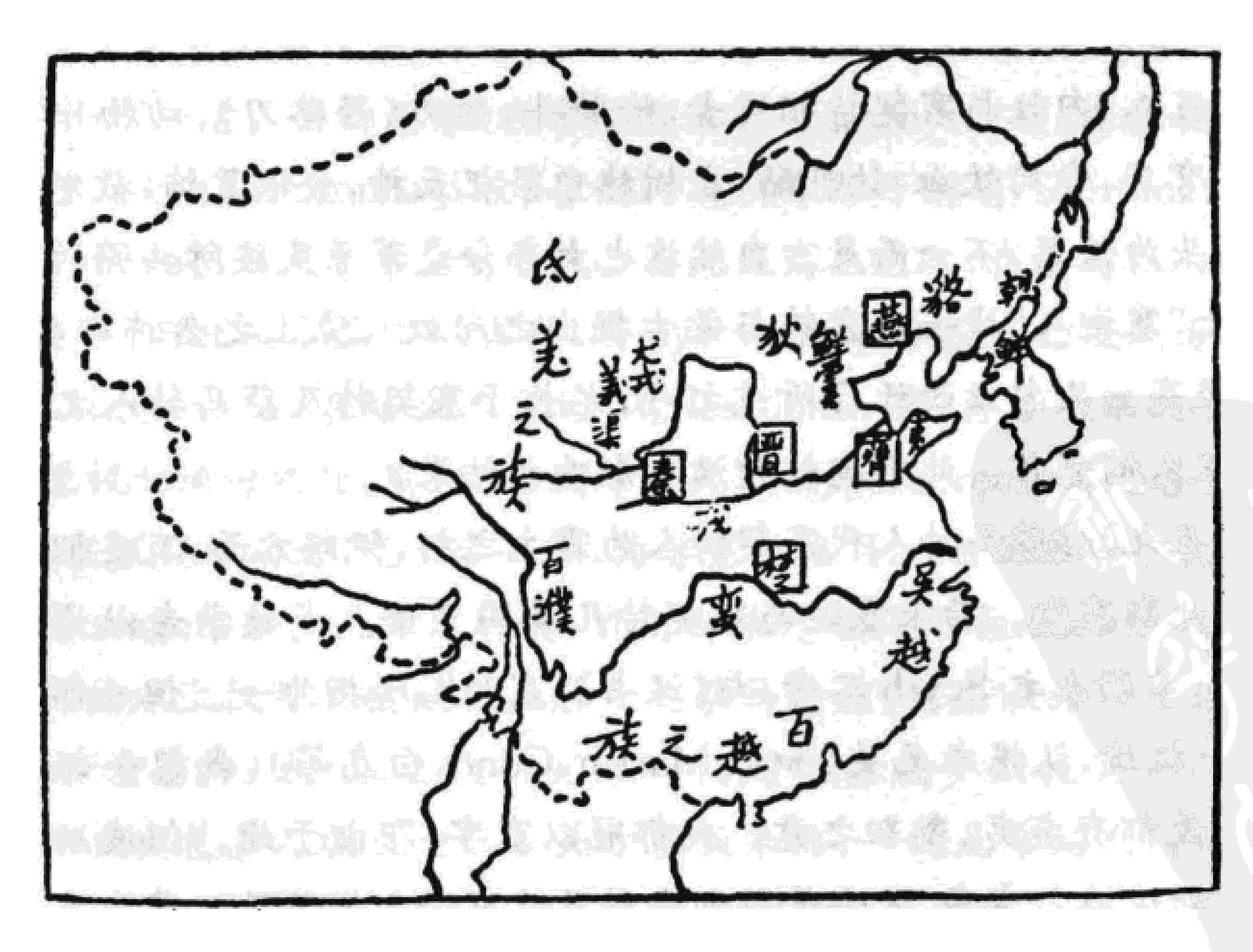
〔注六〇〕土朗一词，起于公元前三世纪，盛用于公元三世纪后，原波斯人指阿姆河以外区域而言，与后来土耳其无任何关系。以为有关者实误。

〔注六一〕我国记载，奄蔡改名阿兰。阿兰乃萨马特之后，此西洋史家之公论。我相信奄蔡乃塞契特之后裔。俄国史家自认为阿兰之后，此绝不足信。不过，阿兰曾统治俄境及俄人，则是事实。元世来华甚多。今高加索犹有其后裔。

〔注六二〕许多西洋史家时而将塞契特列为雅利安，时而列为蒙古，就是没有注意东进西进潮流，始渐形成这个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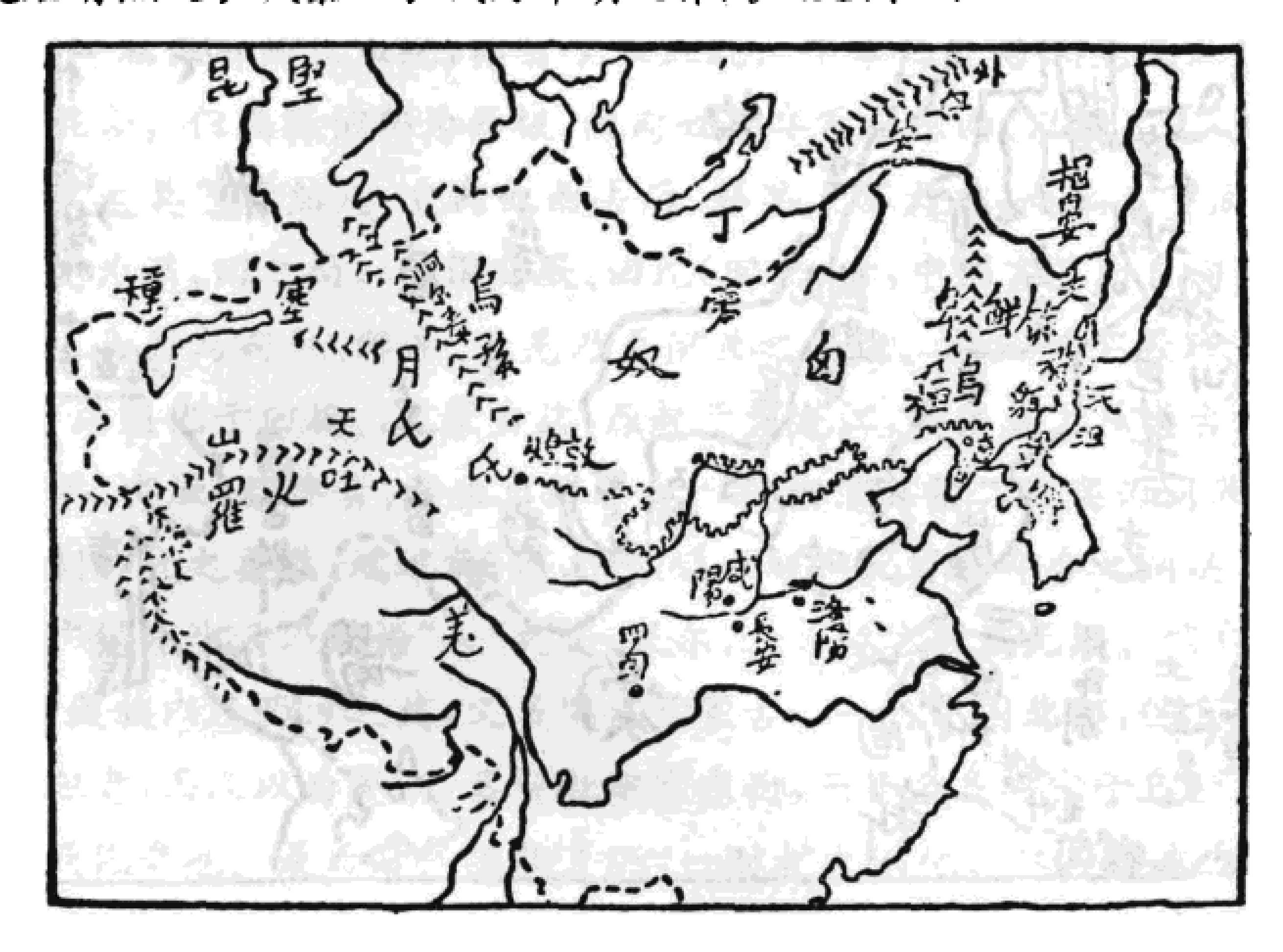
〔注六三〕在研究以下各节事实之前，我想先指出黄河与长江，乃中国民族团结与发展线索，而长城乃华胡之初期人为界线；兴安，萨彦，阿尔泰，帕米尔诸山，则后来之自然界线。其次，提出三点，为了解中国“北徼”(此何秋涛所用之词)形势及诸民族沿革之参考。

一是匈奴未出现前，中国书上对北方种族之记载。自满蒙新疆，其形势大略如上(春秋之末，夏楚诸族是在黄河长江与夷狄交错的)。(见图一)




图一

二是匈奴出现时满蒙新疆及西伯利亚之形势大概如上(战国至秦汉之际,先后有燕赵长城秦汉长城为华胡之界)。(见图二)




图二

三即今日西伯利亚及我国北部民族分布大概情形。除北冰洋及太平洋沿岸之古亚族外,自太平洋至乌拉山以西,大略如第三图(自秦汉以至清之中叶,中国民族不断混合扩大至葱岭、萨彦、兴安之界。唯此后被俄人割楔而入耳)。(见图三)

关于亚欧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之统系,自当一面自今推古,一面由古考今。此在今日,离充分澄清之时尚远。就今日西伯利亚人种言,一般学者以为所谓爱斯基摩,倭奴(虾夷)及丘克迟人(Chukchee),皆古亚族居民子遗,今皆多迁至北冰洋及鄂霍茨克之滨。匈奴以降,鲜卑以降,至今日诸族,皆称新亚族。在萨摩、巴什基、哈萨克、土克曼以西者,是欧洲之范围。就新亚族而言,今日俄人据一般欧人研究分类如下:萨摩(Samoyeds)、乌斯甲(Ostyak)、乌古(Vogul),属于芬乌系(Finno Ugrian);纳纳(Nenets)、泰米(Taymir)、布里雅特,属蒙古系;巴什基、哈萨克、月即别、瓦剌、雅库,属突厥鞑靼系(Turco-Tartar);哈卡斯属蒙突二系;而塔什克、巴达克等,属伊朗系。但是,这不一定是可靠的。

直至十八世纪末,吉朋以塞契特与鞑靼二词,为欧亚游牧民族总称。十




图三

九世纪以来，我国有汉、满、蒙、回、藏之分。近代欧人将藏人列于西南民族系统，而分西北游牧民为通古斯（满），蒙古，土耳其（突厥，回），芬乌四系。又将土耳其族与鞑靼合为一系，并有细分。此即上述俄人分类之由来。

其实通观历史，蒙土二系，皆后起之混合民族。殷周之际，在贝加尔湖以东者为貉，即通古斯，有肃慎、夫馀、朝鲜三国，后有乌桓、鲜卑、契丹、女真之属。在秦晋之北之西者，为戎，为氐羌。以后来之名词言，中国北部殆仅有满藏二族。春秋以降，始有狄，狄即丁零，丁零（高车）殆北狄及回族与中国接触最早者。其后狄之中似亦包括鲜卑，盖丁零以贝加尔湖及以西为根据地，貉族受其影响。继而坚昆、乌孙，亦楔入蒙古新疆间，构成狄之成份。如是有满、回、藏。其后匈奴迁来，而北狄变为胡。今日芬兰、匈牙利、爱沙尼亚以及萨摩、乌斯甲、爱斯基摩，皆为芬族。而匈奴与芬兰、匈牙利同种，殆已无甚问题。今日萨摩族在北冰洋一带使鹿。乌斯甲者，“鄂毕河居民”之意，在乌拉山鄂毕河及叶尼塞河一带狩猎。乌古疑即唐之仆固。尚有土瓦（Tuva）之族，即唐努乌梁海人，其名当得自拔都之子土哇。按芬人自称索米（Suomi）。《北周书》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此索国或

即指芬人之地。而匈奴故地，亦大体可知。然自匈奴入蒙古统治群族，建大帝国，中国北部乃有满、匈、回、藏，同时生大混合。如匈奴有鲜卑丁零氐羌血统，鲜卑不仅有匈奴血统，亦有丁零血统。丁零西迁与氐羌混血，且与伊朗之族混合。但满藏似仍为两极，故匈奴鲜卑常分东西（以后丁零，突厥，鞑靼，辽，蒙古莫不皆然）。自匈奴西去后，鲜卑丁零大盛，而氐羌多南迁。于是北部变为满、回之局。所谓突厥、回纥（回鹘）者，中国言其出自匈奴；实丁零、坚昆、乌孙与匈奴、鲜卑、氐羌乃至伊兰之混血。然回纥突厥既盛，满藏之族，亦颇同化于回族。至蒙古族，原起于黑龙江，实体质上属通古斯，文化上属回鹘、突厥、雅库者；要出自鲜卑也。我相信满蒙二族实为同源。世多以南北朝时代之柔然、蠕蠕、芮芮，为蒙族之祖。此皆当即今之纳纳，而纳纳据友人广禄先生云乃满语“人”之义，果尔，其为通古斯族无疑。然自蒙古既盛，满回藏族以及西方之族，又多同化于蒙古。一时中国北部，但有蒙回。

鞑靼者，西人以为突厥，其实鞑靼有东西，而其名多半出于乌桓，盖通古斯而突厥化者也。最后清代满族复兴，一时扩大满化。然彼等本与汉族因缘极深，故自化于汉，唯蒙古反多保存满族特质。所以乌拉阿尔泰族实可分为三系：一，肃慎、夫馀、鲜卑、满蒙；二，丁零、坚昆、乌孙、回突；三，匈、芬。

综上推论，自周代以至秦汉时代，塞北民族之移动，可简言之如此：一，满洲及大东北一带，自古以来，为夫馀鲜卑之地，由满洲进入东部内外蒙。他们乃半渔猎半畜牧者。二，原住新疆者，实为氐羌。他们由此进入西部内外蒙以及青海、四川、云贵、西藏。他们乃半游牧半农耕者。三，首先由西北方面移入外蒙新疆者，或为丁零坚昆。他们大约原事狩猎，受中亚游牧民之影响，转为游牧，因而亦使夫馀人受其影响。四，继而由外部移入新疆者，为月氏及乌孙。五，稍后继丁零坚昆乌孙之后而入蒙古西部者为匈奴，入新疆西部者为塞种。但其所从来方位，似不同。乌孙是由阿尔泰东南移入新甘的，而月氏则由天山南路而至新甘的，而所谓塞种，是伊朗边地即康居一带移来的。匈奴继雅利安之南下西迁，而向东南移。彼等至康居之北，为塞契特所阻及波斯帝国所阻，于是携中亚之马，东进经贝加尔湖黑龙江而入蒙古高原。匈奴既至蒙古，部勒原有各族，乌桓鲜卑缩至东部。丁零坚昆退至北部。战国末，自满蒙至新疆，自东至西为鲜卑匈奴乌孙月氏塞种并列之势。匈奴虽后来居上，然根基较浅，又与汉为敌，遂终不能立足。

关于鲜卑、匈奴、乌孙、月氏，每一种，其族性满蒙回藏四说皆有之。盖

其王之名与族之名既常混用，统治之民多相同，而血统语言，复常混合。文献不足征，难为绝对之肯定。不过，有几点是可以注意的：一，彼等之区别在统治者不在被统治者。二，彼等皆历狩猎游牧农商之过程。三，一集团之下层或被统治民族，常代统治民族而起。（此亦即革命。）四，彼等在游牧时期常向抵抗力较小处前进。如压力过大，常退为更原始之生活方式，或作远征式之大移动。

〔注六四〕前面曾引《史记》所述匈奴之沿革地望。兹略引《史记》及《汉书》匈奴传所传其风俗政治。畜多马牛羊。逐水草，无文书，随畜射猎，人习攻战，士尽为甲骑长兵弓矢，短兵刀鋋。自淳维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单于姓挛提（连提），称曰"撑犁孤涂单于"，天·子·广大之意。……单于之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凡二十四长。左右贤王、谷蠡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二十四长，亦各有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将、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左王将居东，右王将居西，单于居中。正月小会，朝单于，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时大会，课校人畜。拜日月，送死有棺椁金银，从死者数十百人。战得人畜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包敌。"又匈奴境内，亦种黍稷；通关市，往来长城下。有胡巫掌祭祀医药；有胡戏戎乐胡笳之艺术。

关于匈奴究为何族，有东胡、蒙古、突厥、芬种四说，尚有俄人，竟有谓其为斯拉夫族者。我以为芬族之说为是。如上所述，匈奴、突厥、蒙古均非单纯之族，有统治之族及被统治之族。《史》、《汉》云，匈奴以呼衍，兰，须卜三姓最贵（《后汉书》又有丘林一姓）。而今日掘出之匈奴人像，有极肥矮者；匈奴之统治阶级，当即芬人。后来之鲜卑有呼延之姓，则匈奴亦有鲜卑。五胡时代之匈奴，史称高鼻多须，此当杂突厥。吾人知突厥曾役于匈奴也。盖匈奴是一游牧联邦，其统治权渐转入通古斯族及突厥之手也。匈奴以汉降人为丁零王，似丁零原为大国，而匈奴为鹊巢鸠占者。然挫于李牧、蒙恬。匈奴遣子为质月氏，东胡向其索宝马；冒顿与之。可见最初月氏东胡皆强于匈奴。汉初，匈奴始强大。及败月氏，始为北狄之雄。

〔注六五〕贾谊尝谓"匈奴不过汉之一大郡"。有人据此认匈奴势力不大。其实此由贾谊对边事与匈奴皆不甚了解。

〔注六六〕谓月氏一时强于匈奴者，冒顿尝为质月氏后逃归，杀乌孙王，

见张骞传。谓其曾威胁中国者，因贾谊云，“将必以匈奴之众，列处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使备月氏灌窳之变”。是汉初尚欲联匈奴以制月氏也。（灌窳即浑庾，见下。）

〔注六七〕秦谶说，“亡秦者胡也。”晁错说，“汉兴，胡虏数入边。”秦汉人称匈奴为胡，又有东胡、西胡之称。其义何取，长为我所怀疑。按《周书》王会篇提到北狄之国有州靡，都郭，奇幹，均不可考。又记各地所贡之畜：

“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般吾白虎，其西禺氏騊駼，大夏白牛，犬戎文马，匈戎狼犬。”（篇末附伊尹献书，“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且略，豹胡，戎翟，楼烦，匈奴，月氏，纤犁其龙，东胡”，已杂汉初之事，不足为据。）

又按：孔孟仅言狄夷蛮貉（貊）。《墨子》兼爱，以“燕代胡（貉）”并举；又非攻云，“北者，且不一著何，亡于燕代胡貊之间”。《管子》小匡：“败胡貊，破屠何。”管子以屠何为骑寇。自此胡字常见。《周礼》考工记云：“胡……人而能为弓车”。《史记》天官书“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此当引自《星经》）。至秦汉，胡及胡虏，为匈奴之通称矣。然则“胡”是什么意思呢？

一为孙诒让之说，以胡即屠何。按《管子》唐人注，即以“屠何为东胡之先”。孙氏注墨子“且不一著何”，据《国语》晋语“献公见翟柤之氛”，《左传》“翟且豹胡”，以为墨子之且，邮翟柤；不一著何，即王会之“不屠何”之误，亦即管子之屠何。“豹不胡何，并一声之转。”不屠何汉为徒河县，属辽西郡，在锦州西北云。查《左传》，山戎有无终之国；管子所记山戎，有孤竹之国，皆在今日河北蓟县一带。其北则有屠何。胡之一字，起于东北似极确；而晋时辽西鲜卑，颇多姓徒河者（如段氏），似亦颇见根据。但究不能解释称北面游牧民为胡之故。二为日本白鸟库吉之说，以为胡为匈奴之原名，即蒙古人称人之意：“hun”；省称为胡。故以匈奴为蒙古人。然今日之蒙古人乃后起之民族。匈奴是否称人为 hun，并无确证。而“浑”亦不得译为胡。三，桑原骘藏倾向于淳维（匈奴祖），匈奴，胡，三者同音之说，其牵强同。四，王国维有《西胡考》，谓先汉之世，匈奴西域兼被胡称，后汉匈奴衰，西域遂专胡号。遂有以胡即胡子，指胡人多须；然今日匈奴遗物，无多须之征。五为哈特曼（M. Hartmann）以胡即回鹘之略称。然二者究非一事。秋案：《司马法》（《周礼》郑注及《御览》引）：“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此当即《考工记》所谓“胡之弓车”。胡车乃胡字特殊用法之最可注意者。弓车也者，即《史记》之穹庐（一般游牧民族之移动车上住宅）。《盐铁论》云，“胡车相随而

鸣”。秦汉时穹庐之族，皆称曰胡。查丁零铁勒，最以高车知名，其中有称车为“康”者，即后来之康里。弓车或即康车。然则胡者，或最早与殷（朝鲜）燕接触之住车民族，有自称为胡，或称车为胡者乎？二者皆有迹象可寻。关于前者：按丁零乃在匈奴之前，由西伯利亚入满而后入蒙者。与丁零有关之民族，有乌揭，亦作呼揭；胡奴车者，犹言呼揭奴车也。或乌桓等族捕彼等为奴，令其驾车，传于燕人，遂有此称乎？（乌揭之名，可能与乌斯甲、乌古有关，亦与回鹘有关，而皆与丁零关系甚深。今蒙语称库伦为乌戛，或最早由丁零之所建。）厥后乌桓人效其为车，因而胡车之名大著乎？关于后者：蒙古人称其会议为库鲁利台，今唐努乌梁海人称其议事之会曰“Huruldan”，今日西伯利亚民族犹有称其部落国家为乌鲁（Ulus）者。胡即“胡庐”，犹言车帐集中之地乎？然无疑者，胡字得名，确始于东北。墨子以胡貉并举。《国策》苏秦说燕文侯，“燕北有林胡”；千里马亦始于燕。惠施犹以燕越为南北之极。其后则胡越对举。燕赵接壤，赵亦有胡。然则胡者先指东方之胡（如初期丁零乌桓），匈奴亦用穹庐，及其大盛，始以胡称匈奴，而另以东胡称本来之胡乎？

以上为我过去对于“胡”字来源之假定。后阅白鸟《东胡民族考》，指出《南齐书》魏虏传中所举托跋语，谓国中呼“带仗人为胡洛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云。又指出《黑鞑事略》中“环卫则日火鲁赤”；《成吉思汗实录》中箭筒士，蒙语作“豁儿赤”；《元史》中带弓的，蒙语为“火儿赤”。又指出阿尔泰语谓阵营曰 Korum，武器曰 Koral；回鹘语谓防线曰 Kuluk，蒙古语谓防线为 Khori。而《康熙字典》云魏呼官吏为真。真、赤，同为主事格语尾云。秋案：满洲人对鲜卑语之解释自极可信。胡虏者，当即“胡洛”之对音。特白鸟以有成见于心中，反远求胡之解释于“匈”而已。《辽史》国语解对“虎思”二字释为强力，当亦有关。然则当初入满蒙骑马带弓之人，称为胡洛，其后鲜卑承其俗亦沿用之者乎？汉人初称胡洛，丑之变洛为虏，其后省虏而称为胡者乎？

要之，胡之来源，不外三者：呼揭，车帐，武士三义；而皆对胡马胡车民族而用。先称满洲方面之胡，次称北面之胡（林胡）；匈奴强大，专指匈奴；匈奴既衰，移用西域，波斯，印度，乃至一切生活习惯形貌有异之人。凡塞外来之外人称胡人，犹海通以后“洋人”之称。洋人先指葡荷之人，后指欧美之人，终于从不称为洋人之日本人亦号东洋人。故胡人者，可谓骑马之洋人；而洋

人者,乘船之胡人也。

匈奴入蒙之先,亦在满洲住了一个时期。按夫馀朝鲜皆椎髻,匈奴亦椎髻,当系先到东北受他们影响之一标志。又《史》、《汉》所载匈奴语言,东胡的成分多于蒙古突厥语成分。夏德对冒顿以土耳其语拔都(Bagatur,英雄)解释。实则毋宁近于满语Mukden(盛),蒙语Bogda(圣)。所以我相信匈奴是循其先行者丁零之迹,由乌拉山一带东经西伯利亚,经过上述胡道而入东北一带,然后向西推进外蒙古及新疆北部的。准噶尔(Zhungaria)一字,蒙语为"左翼"之意;广禄先生谓或与匈牙利(Hungary)有若干关系。案这是匈奴右部久住之地,日逐王降汉后,匈奴以郅支(吉尔吉思)为基地,又其左部之地;到窦宪西征以后匈奴才退出的。我还相信,匈奴之终于远走,即因系外来,究不如鲜卑丁零原住民之根深蒂固也。

〔注六八〕关于匈奴远遁后之踪迹,素有二说:德经,吉朋,夏德,皆以为引起欧洲民族移动之阿提拉,即北匈奴之后。其后列木沙及克拉普罗特,以为匈奴即突厥,西迁至哈萨克而止。白鸟附和之,唯以匈奴为蒙古族,与芬族无关,特后者自托于匈奴以壮声威。但今日匈奴及汉代遗物发现于南俄,匈奴西进道上,即伏尔加下流,北高加索,克里米以至匈牙利一带,则证明前说之确实。参看《罗马衰亡史》关于匈奴之章,巴克(Parker)《鞑靼千年史》,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江上波夫《欧亚古代北方文化》。

〔注六九〕早在彼得时代,西伯利亚即发现甚多古墓,内藏精美金器,此多为塞契特萨马特之遗物。其后绥远出土甚多之铜器,巴黎中国古董商卢君收藏甚多。其后日人在绥远发掘出土不少。皆匈奴盛时之物。一九二四年俄人柯兹洛夫在外蒙土谢图汗色楞格上游(库伦北七十哩)发现古墓二百十二座,墓室深达三丈,明器精美。皆二千年前之物。时在匈奴统治之下。此当塞种丁零尤其是匈奴与汉和平时期之物。在这些古墓中,有甚多殉葬之辫,而头颅殊不类蒙古人。墓似成于希腊人之手,织物有希腊图案,而多绣动物,有亚述、伊朗、米坎纳之作风,亦即塞契特式作风。此外丝织物,有汉代卷云及骑马仙人图案。又有汉镜,上书"广成新神灵寿万年";又有漆碗,上有"上林"二字,均作隶书。以上乃在蒙古境内者。又早在一七一五年,瑞典人在乌拉山发现精美汉镜。近年以来,自伏尔加至多瑙河一带亦发现汉代文物,与匈奴武器同在。当皆为匈奴西迁所遗。关于欧亚草原之考古学可看: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Minns,“Scythian and Greeks”

Borovka ,“Scythian Art”

Tallgren,“Collection Tovostine”

Salmony,“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梅原,《考古学上所见汉代文物之西渐》

江上,《欧亚北方文化之研究》

〔注七〇〕氐羌与夷,乃与夏族关系最密切者。楚与氐越亦密切。大约汉化者为氐,而生氐为羌。汉世之羌有三支:一西南夷传所说。见前。二西域之羌,如月氏,婼羌,及湟中月氏胡等。见后。三即西羌,此处所说。

《后汉书》西羌传以畎夷、犬戎、鬼戎、昆夷、獯狁皆是羌族,不以为匈奴(《史》、《汉》皆以为匈奴),极是。又以为陆浑、允姓之戎、义渠之戎,皆为羌族(《左传》陆浑之戎,亦名险戎,当即獯狁),“曾与诸夏会盟。周贞定王之世(战国初)秦赵逐之,多逃走汧陇以西,唯余义渠种焉。战国之世,强者称王,封爵,及衰亡,余种反旧为酋豪”云。所传无弋(奴意)爰剑之事虽未必确实,但西羌与西南夷之羌,以及南山羌为同类,则无可疑者。观其分布之广,一时胡羌与汉,就面积言,几于各有天下三分之一。宜汉人之严重视之也。又《后汉书》叙西羌民俗云:

“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强则为酋豪,弱则为附落,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敢不畏死。又披发射猎,性刚坚勇猛。”又“被发覆面,因以成俗”云。

如下可见,所谓突厥风俗,原极与羌类。这是很可注意的。

〔注七一〕世每以东胡由通古斯而来。其实东胡之称,早在战国。而通古斯乃雅库人指满族之称,其义为豕,盖豕之驯养或始辽东。通古斯一词传于欧洲,不过二三百年之事。

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余意东胡乃貉族而胡化(骑马化)者。先本称胡,及匈奴既盛,胡专用于匈奴,乃别号东胡。

《后汉书》记乌桓鲜卑为冒顿破后情形云:“乌桓善骑射弋猎,以穹庐为舍,食肉饮酪。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刻木为信,无文字。大人以下各自畜牧,不相徭役。计谋用妇人,男人任战斗。以髡头为轻便,妇人嫁

时，养发为髻，犹中国有簂步摇。女绣织，男作弓矢，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穄（稷）及东墙，东墙似蓬，实如穄。敛尸以棺，葬则歌舞相送，烧其衣物，使魂归赤山。赤山者，辽东西北数千里。敬鬼神，祠日月天地星辰，其亡畔，徙于沙漠，即丁令西南乌孙东北也。鲜卑言语习俗相同，唯婚姻先髡头。禽兽异者，有野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豽皮毛，为天下名裘。”

乌桓鲜卑二者之关系，约如氐与羌。秦汉之间，乌桓之名出现。鲜卑之名，如上所述，早见《国语》、《楚辞》，其后即不见。至东汉而大盛，至南北朝而统治中国。

所谓“余众保乌桓鲜卑二山”者，二山何在，久为史家所议论。有以为指辽宁西南，又以为指蒙古东部，而何秋涛以鲜卑即悉毕儿（西伯利亚），丁谦以大鲜卑山即在今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之南，西伯利亚即鲜卑之对音。近颇有信此说者。按：西伯利亚自古为肃慎夫馀乌桓鲜卑氐羌共有，在其外者，为丁零坚昆匈芬共有之地。由今日西伯利亚边缘之民，犹可见当年之复杂。而“西伯利”（Sibir）原为拔都之弟昔班后裔汗国之称，俄人灭之，扩大其所指。西伯利或即昔班。世多以“西伯利”或起于《元秘史》中之“失必儿”，地在吉尔吉思之北，乃“林木中百姓”之一族。相距甚远。或云起于“Iskir”之讹读，则皮毛之意。无论如何，西伯利亚与鲜卑，难作一等号。况西伯利亚本不通之词乎？如若正名，不如称为“北亚”。

我以为所谓乌桓鲜卑之山，大抵即二族原住地之“赤山”，此当指外兴安岭一带。其后东迁，以此为号。《续后汉书》记乌桓云，“桓以之名，乌号为姓。”南北朝之乌洛侯（乌梁海）当仍为同族。乌桓自经曹操亲征，多移内地，改姓桓氏，余众后入青海，为吐谷浑。遗民居黑龙江者，唐世犹有乌桓之国。

又按：鲜卑之名颇奇。除鲜卑可能与犀毗有关（见前）外，周之岐山称鲜原（见《周书》），北狄有鲜虞之国（见《左传》），而朝鲜一带之人，有鲜于之姓。又《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齐召南以此余吾即《史记》、《汉书》匈奴传之余吾水（当即鄂浑尔河）。则北鲜之山，当指杭爱，仍为外兴安岭系统。《魏书》记鲜卑之祖出于己尼大水，“盖北海也”。此当指黑龙江上流及贝加尔湖。乌桓鲜卑起于贝加尔湖以东至朝鲜一带，殆无可疑。乌桓鲜卑髡头辫发，其与满族渊源自极深，亦必早受肃慎夫馀朝鲜之文化。我甚疑朝鲜鲜卑，必有关联。他们共同起于外兴安岭，以开化之先后，其生活方式固皆经猎牧农三者。鲜卑者，殆朝鲜之下层阶级。周代克殷，曾携彼

等至陕西以御楚人(前引《国语》)。自后必已入内外蒙古一带,与丁零氏羌混血。所谓狄者,当大部分指他们与丁零。匈奴东来,由满入蒙,他们遂东退黑龙江、吉林、辽宁之西及热河一带。而亦由匈奴习知骑射,乃以东胡著闻。其最初著名者为慕容氏。《晋书》叙慕容氏"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当赤山),号曰东胡,后与匈奴并盛,风俗官号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云云(一〇八卷)。是时与丁零匈奴接壤,互相影响,极为自然。其后入据匈奴故地,尤多与匈奴突厥混血。所谓宇文氏者,与匈奴关系最密。五胡时代之鲜卑,史称其黄须。当与丁零混血者。而发展鲜卑族之势力者,为托跋鲜卑,对慕容氏东部鲜卑而言,则为西鲜卑小鲜卑。《宋书》、《齐书》均称其为李陵之后,或匈奴别种。当指其受匈奴丁零(匈奴以汉人为丁零王)文化影响而言。以后入主中原,奄有漠北,其种益杂。魏末有入西藏者,今日藏人,亦有鲜卑血统。以后辽金蒙古,实多东胡之族。而今日之锡伯、索伦,皆其后裔。所谓布里雅特蒙古者,似与夫馀之族有关,亦与鲜卑有关。

〔注七二〕《汉书》西域传序云:"西域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盖指武帝前言。时自内外蒙古至河西四郡,南至南山下,皆匈奴之地。而乌孙在北山之阳,故云。后乌孙西迁,武帝开河西四郡,匈奴境为外蒙科布多及塔城。则在匈奴南,乌孙东矣。"南北有大山"。南山指于阗南山(喀拉昆仑山支脉),北山指车师之北,即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魏书》作计式水,支流玉陇哈什(白玉)喀喇哈什(黑玉)之译音也。《水经注》称注宾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按指两山之间)。东接玉门阳关,西限以葱岭,南山与汉南山属"。"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东注蒲昌海,盐泽也。去两关(一千)三百里,广袤三四百里(按今已缩小一半)——河源出焉。"又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阿姆锡尔河等及里海)。除河源说有问题外,以百余字叙新疆地理,简明确切,叹观止矣。欲读此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必看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李光廷《西域图考》,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丁谦《后汉书六夷传考证》。又宜看王树枏《新疆图志》,及《水经注》前三卷。诸书流传不多,余拟集国史诸西域传,采中外考释为一新注。

〔注七三〕中亚(葱岭西)亦有大山,即兴都库什山;又北有阿赖山。有大河即阿姆河或妫水。波斯称河为"Veh",犹中国称黄河为河。波斯又称阿姆为"Oxus",故元魏及唐人又译为乌浒,玄奘《西域记》作缚刍。又锡尔河,

波斯古称 Jaxartes,即唐代药杀水,真珠河,质河。上流为纳林河,唐代称那密水。又吹河即唐代素叶河,碎叶川。

〔注七四〕轮台,《史记》作仑头,本国名。在车师前部西南千余里,与捷枝、渠犁皆在库车一带。李广利始并轮台。屯田之议始于桑弘羊,至是始实现。藤田以轮台与乌鲁木齐由同一名称而来。

〔注七五〕戊己校尉三人,异说甚多。《汉官仪》以匈奴在北为水,西域在西为金,戊己生金而制水,是也。

〔注七六〕《汉书》云:县度者,石山也,以绳索相引而度云。颜注县即悬字。我以为指兴都库什。看注八二。

〔注七七〕伊摩斯为希腊罗马人对帕米尔之称,班超大开东西交通以后,马其顿商人有至新疆者。他们的知识由朴托莱梅(Ptolemy)之《地志》加以整理。对帕米尔一带,即北接天山,南连兴都库什之地,称为"伊摩斯",并以为"内外伊摩塞契特"(Scythia intra a extra Imaum)之界岭,"由此以入丝国"(中国)。元代以后称为内外鞑靼,十九世纪以来,称为俄国与中国土耳其斯坦矣。

〔注七八〕《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一部分同《后汉书》,且有补其缺者;当同本班记。

〔注七九〕马可波罗记关于楼兰一带传闻云:"这一面沙漠很长,据说由于一端到另一端要走一年以上。自最狭处越过,也得一月。全是沙的丘谷,无一点可吃的东西。马行一日一夜,始可找到淡水,足够五十到一百人连牲口之用,多了不行。白天也有鬼叫,每被误认为人声,因而迷路……"这是海斯二氏实地探险完全证实的。他们的书甚多,海氏"My Life As An Explorer"可为代表;斯氏"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可为代表。二书有汉译,前译改名《亚洲腹部旅行记》,惜于故实多误,唯亦无大碍;后书向达译,改名《西域考古记》,很好。这是我希望每一中国人都能一读的。

〔注八〇〕两关今皆没流沙。《汉书》孟康注:二关皆在敦煌西。按敦煌为郡,辖六县,其中有敦煌县龙勒县(后改寿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关在寿昌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十里。"寿昌县当在今敦煌县治之南。《肃州志》云,"敦煌县西南百五十余里有废阳关",是也。是汉代两关,皆在汉之龙勒,唐之寿昌。据《元和县郡志》,玉门关唐时移于晋昌,今安西。盖唐世以北道为重,就哈密之线也。此二关见于记载之最重要者。至

于玉门县，乃汉时一度撤退玉门关居民而设，无涉于关。清末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谓敦煌西百六十里有大方盘城，为古玉门关。又四十里，有小方盘城处。又谓敦煌西南行百四十里有南湖，一名龙图山，即阳关。斯坦因于小方盘城发现古关址二处。证以敦煌石室《沙州图经》(今藏巴黎)，当不误。(敦煌古瓜州，唐于敦煌设瓜州，在安西东南设沙州。)按《史记》大宛传，记李广利初伐宛无功，欲还军，武帝"使使遮玉门，军有敢入者斩，贰师恐，因留敦煌。"于是沙畹以为汉代玉门关有二，即伐宛以前之玉门关在东，伐宛以后移西。王国维且以伐宛以前玉门在敦煌东，即今玉门县。伐宛以后始移敦煌西者。然敦煌固有六县，当时关外之地，仍可称敦煌。使使遮玉门贰师留敦煌者，固不一定相距甚远也。

〔注八一〕今《汉书》下有"焉耆"二字，徐松《补注》据王怀祖说，耆字衍文。是。班超以后，西域有三道，详下。

〔注八二〕以上诸国今地，北道大体参考徐松《补注》、李光廷《西域图考》，或无大问题。

然关于南道(以及葱岭以西)，徐注多不肯定；李考多肯定，然多不可从。《新疆图志》明确矣，然除若干修正外(如辨依耐非英吉沙，应为蒲犁东南等)，大体皆据李考，亦未必尽是。至今无人能全部肯定。困难之处，即班传本身未必无误，流传至今未必无误字。加之地理人文之变化甚大。如南道诸国，多沦沙漠。罗布泊不仅干涸，而且南移，至民国十年始重回旧地，此斯文海定所谓"漂泊的湖"；而塔里木河之改道，自不待说。山河如此，何况城郭。宋代以后，两汉故国，变为回族之城名。仅和阗尚留旧称。乾隆平准噶尔后，以回城当古国，如以辟展当鄯善，固马当皮山。一时所定，尤不知今之南路，并非汉之南道(见下)，有相隔甚远者。(例如今地图上，鄯善距故墟千余里矣。)徐松李光廷始加纠正，然辗转相承，今日地图多相沿未改。斯坦因按中国史籍，步步发掘，绘为新图，所明之事甚多。然关于鄯善两城之地点，至今学界议论纷然。其他可知。这是还需要地理历史考古合作并实地考察的。今仅事卧游，且图书不全。略述数点，以供参考。

先说关于西域文献。此自以我国最为丰富。一为《史》、《汉》而后，《后汉书》《魏书》《北史》以后诸正史西域传，至《清史稿》藩部传属国传。又《魏略》，《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二是法显《佛国记》，宋云、惠生行记(《洛阳伽蓝记》引)，玄奘《西域记》，慧立《慈恩法师

传》,又慧超《往五天竺传》(敦煌残本),杜环《经行记》(《通典》录),高居诲《行记》(《新五代史》附),以及耶律楚材《西游录》,长春真人邱处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李达、陈诚之游记等。三是《水经注》,《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残卷),《册府元龟》,《经世大典》,以及《西域图志》至《新疆图志》。四是清代祁韵士、徐松(除补注外,水道记最有价值)、魏源、洪钧、李光廷、陶保廉诸人的著作。在西方,古有朴托莱梅《地志》所引马其顿商人之说,以后有阿拉伯人记载。最著名是《马可波罗游记》。近代西洋汉学家自列木沙以降,有拉孙(Lassen)、李希霍芬、克林汉(Criningham)、马卡特(Marquart)、佛郎克(Franke)等人,据中亚印度历史对于西域史地之考释,玉尔及布莱西奈德以后,他们日益了解中国史料之价值,充分加以利用。夏德之《大秦国全录》,沙畹对于《魏略》及宋云行程考释与《西突厥史料》的集释,最有高名。最近更有斯文海定,和斯坦因、勒科克等洋洋大观的游记和考察报告,而斯坦因之《古和阗考》以玄奘行程为中心之考证最受重视。日本人亦承其风,有白鸟《西域史研究》,桑原《张骞西征考》,藤田《慧超传笺释》,羽田《西域文化史》,香川《西域考古图谱》,堀谦《解说西域记》等著作,最近有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两巨册。民国以来,张星烺先生译辑《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大卷,并附加意见,用力最勤。游记有谢彬先生之书,及友人张大军先生《横度昆仑三万里》。美国《地理杂志》亦常有帕米尔一带的探险报告,还有哈萨克同胞逃【亡】的记载。

现说汉代出关后的路线。《汉书》所记之国,有当交通线者,有不当交通线者。但重要之国,多当交通线。要确定诸国交通线则必须确定诸国地点。反之,要确定诸国地点,亦必对交通线大概情形有一了解。

汉代两道皆在天山之南,山北为匈奴,故山北无道。这是与今日天山南北两路不同的。汉之两道皆以鄯善为起点。由鄯善至且末精绝,扜弥以至于阗为南道。由鄯善至伊吾而车师前王庭,经危须,焉耆,龟兹,姑墨温宿,尉头以至疏勒为北道。不经鄯善,西自婼羌小宛,戎卢以至渠勒,则在南道之南,所谓僻南不当孔道。自伊吾而北至蒲类,西至车师后庭,卑陆,单桓,乌贪訾离以至乌孙,又北通郁立斯,卑陆后国,劫国,则北道之北,亦不当孔道。由于沙漠扩大,汉末北出高昌,是为新道。至隋,一方面汉之南道益为沙碛所掩,一方面则由新道向西打开新的北道。所以汉之北道,即隋之中道,亦今日天山南路。汉隋南道渐塞。到唐代康艳典重开,然行人仍少。今

至于阗者，由磨朗（密远）至卡克里克，过卡墙河（古且末河）而西。然须先北绕哈密，故仍多经汉之北道，再南东行。（参看五九一页汉唐西域交通线图）

但出玉门的道路，并不说明出葱岭以至中亚道路。后者比较前者更为复杂。必须将这一点弄清楚，才能确定西域西部许多国名，也才能了解当时西域形势和中西交通状况。（并参看三六七页丝道图）

由于山川形势，古今交通线大体相去不远。但城郭变更甚大。所以一定要找几个不变标志。中外记载中有两大的标志。一是朴托莱梅书中之"石塔"，二是中国书中屡次提到的"县度"之险。如下可见，关于这两个标志的说法，非常纷歧。

先说古今北道西出大概情形。《汉书》说北道经龟兹，出大宛，康居，奄蔡。《隋书》增加一新北道，即经过突厥可汗庭。此即唐之北庭都护府，在今济木萨。前者兹拟称北一道，后者拟称北二道。到了元代，则由伊犁通哈萨克之道大开。此拟称北三道。这还是今天的三大通路。还有塔城出斋桑泊一道，以后再说。

《汉书》言捐毒西上葱岭则休循，西北至大宛。朴托莱梅说到由大夏北行到 Komedoi 高冈，稍南通过山地，到达狭的平野。行时先向东，再稍稍向南，到离"石塔"(Lithinos Pyrgos)〔约一百五哩处〕再向北走。此石塔在上溪谷途中，连到向北走之伊摩斯山脉（葱岭?）。此石塔所在有乌什说，塔什干说，阿赖山谷说，巴达克山说，塔什库尔干说，以及叶尔羌附近说，疏勒西说等等。要之分为北道南道二脉。李希霍芬倡北道说。其后南道说占优势。斯坦因先主南道说。一九一六年第三次探险旅行后，认为东西所说者，皆经阿赖谷。所谓石塔，即喀拉堤锦之地，而 Komedoi 者，即《西域记》之拘谜陀，《唐书》之俱密。此已得一般公认。此丝道即我所说北一道，亦汉人北道出葱岭之主要通路。清代用兵，亦曾经此道。

又《汉书》陈汤传记其攻郅支分六校，"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此即前道。"三校自将发温宿，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至都赖水上。"此北二道也。按阗池即热海（特穆图尔泊，伊西库尔），都赖水即怛罗斯，在今日特穆图尔至塔什干之中点。当时伊犁河上流属乌孙，而郅支殆以下流至巴勒喀什湖一带为基地。故云北击"伊列"。陈汤路线后来班超亦经之。班超曾发康居兵攻姑墨石城。又裴记序"北道经突厥可汗庭达西海"，指此。至唐代记载更为清楚。玄奘云"自跋禄迦（姑墨）西北行三百余

里至凌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地名窣利。"又《唐书》西域传云姑墨西三百里渡凌山。又地理志记安西出碎叶道程（唐代北庭安西均出碎叶）"安西（库车）西出拓厥关……至姑墨州。……至小石城，……大石城。一曰于肃，一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谷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水，五十里至热海。"杜环亦云，"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为大唐与突厥骑施之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北行数日至雪海。勃达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案凌山即拔达岭，勃达岭，李光廷以为今之木素尔岭，李希霍芬据阿拉伯人记载以为 Bedel 岭。后说是。赤谷在其北不过五十里而已。这是唐代北道通西域要道。

更北之北三道，则经伊犁出巴勒喀什湖，到今日所谓阿拉木图。这是月氏西迁，匈奴西迁之道。唐代苏定方王方翼皆经此道，其后耶律大石西迁亦经此道。其后元代行军，以此为主要之道。耶律楚材，邱处机，刘郁西行，皆先经此南行与玄奘之道合。按：伊犁之西，元代有城曰阿里麻里。李光廷洪钧均不详其地，其实即今之阿拉木图也。楚材云"出阴山至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案即苹果）曰阿里马……西有大河名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思窝尔朵，即西辽之都。又西数百里，有塔剌思城。"阿里马即阿拉木图，亦列即俄人所谓伊犁斯克，虎思窝尔朵在别拉沙衮（Belasagum），今日俄人用以纪念其红军领袖，改称佛伦柴（Frunze）者是也。今日俄人所进行的新疆铁道，即由阿里马东经伊犁迪化者，亦即此北三道。

再说南道。古今亦有三道。一经瓦罕，巴达克山，一经明塔戛，坎巨提，几尔几特。二者皆自蒲犁，即塔什库尔干出发，在兴都库什北麓塔克敦巴什分道，在白沙瓦会合。其三则由于阗南下越喀拉昆仑。兹顺以南一道，南二道，南三道称之。此外尚有青海尼泊尔线，以后论之。

《魏书》西域传云，"从莎车西行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从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裴记序云，"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度吐火罗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按喝盘陀即塔什库尔干，伽倍即护密，亦即巴达克山之瓦罕（Wakhan）。波路如下可见，指勃律，亦即几尔几特。此二者所说相同，即南一道与南二道。

两道皆涉及县度。《汉书》云，乌秅（读如鷃拿）西有县度。然如县度地

点不能决，乌秅亦难定。又云“县度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魏略》则云，“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一以县度为中罽之界，一则以为中月之界。然则此因汉末月氏有罽宾，二者所指为一呢？或县度只在到罽宾或月氏道上呢？

似乎魏晋后一般人对县度地点不甚了了。梁代荀济以塞种悬度身毒“其实一也”(《广弘明集》)。唯郦道元知道县度指石山，于《水经注》云，“余诊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盘石之隥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絙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县度”。然此在喀什米尔何处呢？Ritter 以为兴都库什，Watters 以为即印度，Hermann 以为在几尔几特北，佛郎克以为即 Balistan，沙畹以为 Yasin 河域。日本藤田以为指印度河岸之险。《新疆图志》说，“县度者，坎巨提也”。要之，他究在南一道或南二道上呢？

先看法显出西域之道。法显由鄯善出发，先到�彝(焉耆)，“西南行一月五日到于阗，二十五日进子合国，南行四日入葱岭，到於麾国(乌秅)，二十五日到竭叉国，当葱岭之中，从此西行一月，得度葱岭，到北天竺，有一小国，名曰陀历。顺岭行十五日，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头河，凿石通路，渡河到乌苌国，正北天竺也。……东下到健陀卫国。”按新头河之为印度河，乌苌即 Swat 河域之 Udjana，健陀卫即健陀罗，在白沙瓦附近，无问题。竭叉国，克拉普罗特、理雅格以为拉达克，沙畹、斯坦因以为即疏勒。白鸟证明在塔什库尔干，陀历即 Darel 或 Dardistan。按白鸟之说是也。关于法显所说的“崖岸险绝”之处可与玄奘进入乌仗那和钵露罗国情形对照：“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或履绳索，或牵铁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蹑隥，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从此东行，逾岭越谷，逆上信度河，飞梁栈过，经五百余里，至钵露罗国。”乌仗那即乌苌，信度即新头，达丽罗即陀历。而钵露罗即 Balistan。唐代大勃律指 Balistan，小勃律指几尔几特(Gilgit)，是已经沙畹详细证明的。李考及《图志》以为钵露罗即博罗尔，非。故县度者，乃陀历到乌苌之印度河岸，为两汉到罽宾乌弋山离所经；与班传对照，皆能相符。此我所说南二道，即经由坎巨提，乃汉代南道至罽宾印度之要道。

再看宋云所行之道。《行记》云：“八月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西行三日到钵猛城，三日到不可依山，仍在山顶，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汉盘陀国乃在山顶。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王所居，十月初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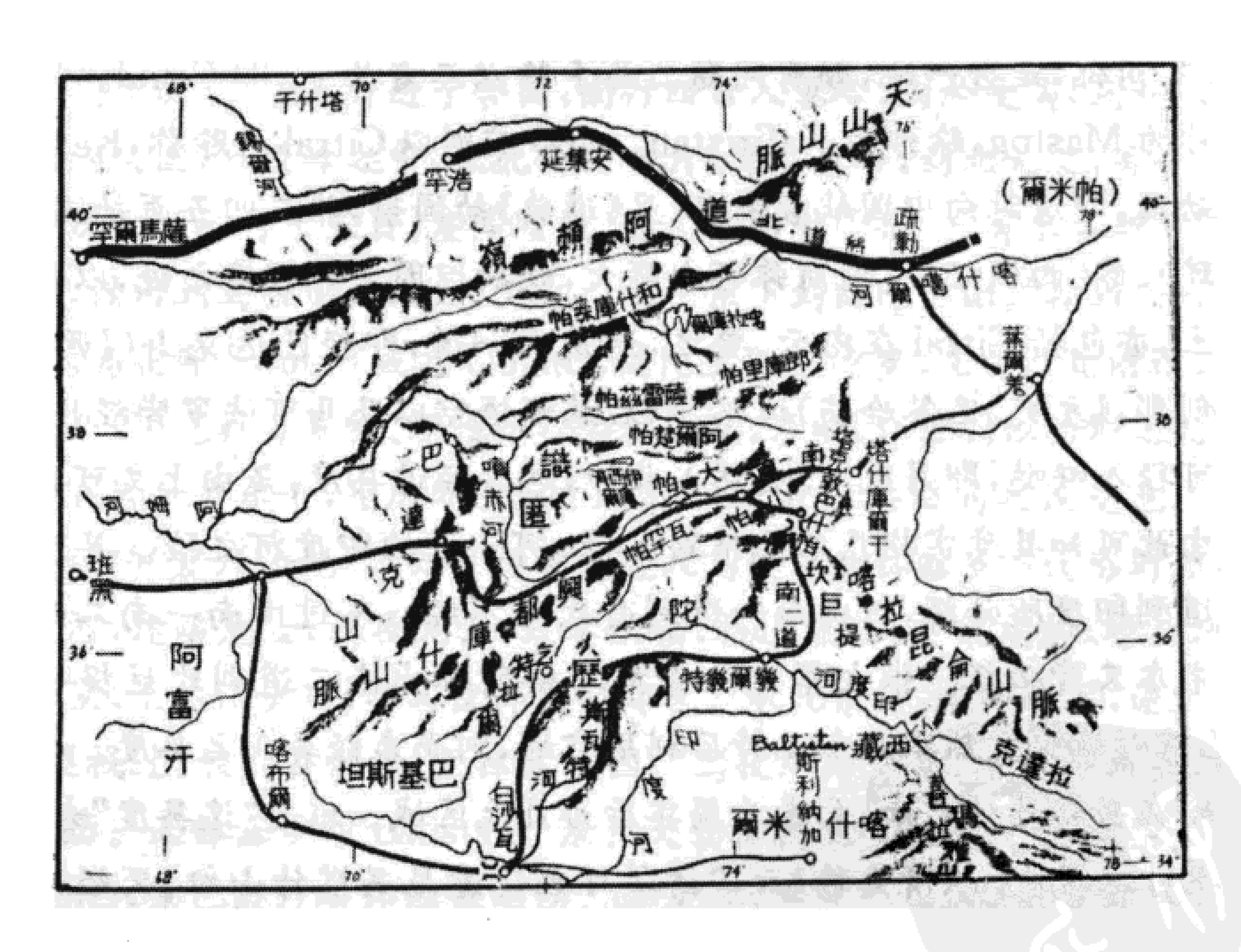
入哌哒国。十一月初旬入波斯国境(按此非伊朗)。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渐出葱岭,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从钵卢勒国向乌场,铁锁为桥,悬虚为度,下不见底。十二日初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邻天竺。正光元年(按五二〇年),四月入乾陀罗。"此宜与玄奘归途所言对照。"越达摩悉铁帝国大山之南,到商弥国,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里至波谜罗川(帕米尔),川中有大龙池(伊西洱库尔,及其南海子或维多利亚湖),南越山,有钵露罗国,自此川中东南,路无人烟,行五百里到揭盘陀国。"按此往来于巴达克山者也。盘陀,喝盘陀,竭盘陀,皆为塔什库尔干,唐代在此设有"守捉"(小军曰守捉)。钵和即护密,即达摩悉铁帝国,亦经李光廷考定。我想也可能特指今日博罗尔(在巴达克山东)。不可依山,斯坦因以为 Kandan,此《唐书》西域传之下忍岭,《西域记》之奔穰舍罗。波斯,马卡特以为即《魏书》波知,即 Zebak;斯坦因以为 Kokca 河上游。钵卢勒自即钵露罗,即大勃律。唯赊弥、商弥,是否一地,颇有问题。马卡特以二者为一,即 Citral。斯坦因以商弥为 Mastog,赊弥为 Kafiristan。而沙畹则以 Citral 为赊弥,Kafiristan 应为劫国,即唐时向中国献颇黎者(见《通典》劫国条,非三四五页劫国,颇黎即玻璃)。然《西域记》所说商弥领土颇大,故斯坦因又为调停之说,以商弥当时领土,亦包括 Citral 在内云。要之,这是南一道,即经巴达克山(《西域记》钵铎创那,《元史》巴答哈伤)道路。以后慧超悟空以及马可波罗皆经此道。而由此可径入哌哒,即月氏之地。然入北印,也要经过县度,是由上文可见的。

由此可知县度实指几尔几特到 Swat 河一带的印度河之险。县度乃由南二道到印度所必经,但由南一道到月氏可不经。不过由南一南二两道入喀什米尔又皆必经。张大军先生等描写由蒲犁出南二道到坎巨提一带之险,已惊心动魄。然至几尔几特后利用空运,则尚未经真正之县度。县度已出葱岭在兴都库什之南,此先为罽宾后为月氏区域。班超"迄县度"者,乃到县度为止之意也。《清史稿》云,"蒲犁厅经行逾尼若塔什山口,又经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南逾瓦呼罗特、明塔戛两山口,西为因都库什,东为穆士塔格山口,出口至……坎巨提。"所以我相信县度本兴都之译音,后来才有"悬虚为度"之解释。《广弘明集》载时人驳荀济之言云,"县度,南梵也,北天之险,乘索而度也。"前面说地点不错,后句是望文生义(因欲表示县度身毒不同)。我国许多地名,如交趾、敦煌之类,皆原本译音,后人生义,县度亦犹是也。所以 Ritter 言其来源,藤田说其地点,都是对的。《新疆图志》所指,也

到了县度的边缘。

高仙芝出兵，亦经南一道到达县度边缘。《唐书》高仙芝传云，“天宝六年诏讨小勃律。仙芝到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按帕米尔），遂顿特勒满川，行凡百日。特勒满川，五识匿国（Shignan）也。乃分军为三。使疏勒赵崇玭由北谷道，拨换（姑墨）贾崇瓘自赤佛道，仙芝与监军自护密入（按中路），约会连云堡。过坦驹岭……断娑夷桥，吐蕃兵到不得度。”斯坦因曾探险巴达克山，并以连云堡为Sahad，坦驹岭即达科特坂（Darkot），娑夷水即Gilgit河，因对此艰险，深致无上惊叹之词。清代追击和卓木，亦经此道而立碑于苏满卡。

## 葱　　岭　　图




此外尚有南三道。即由于阗南越喀拉昆仑。此似为捷径，法显同时之僧绍，唐僧宝云，似经此路，但无确实证据。海定曾两经此道。汉唐此道不盛之故，在汉代因对象是在西域而非印度，其后也许因为此道不安全。而更重要原因，则汉南道后来为沙漠掩塞，而由拉达克西行，一样要经过县度之险。海定探险，颇受俄人协助，所以俄人熟悉此道。

# 漢唐西域交通綫圖

圖例

古道

今道

鐵路

城市

要隘



路线大体既明，即有助于考定若干甚难比定之地点。如乌孙之赤谷，可谓业已确定。最难者，即葱岭一带之国；如休循，捐毒，乌秅，无雷，难兜，最后还有婼羌，尤为一谜。因《汉书》所言方位道里，甚难说通也。然就交通线参看水道，再对照班传，亦可作一说明。

《水经注》云："河水重源有三：（按徐松解释，一为葱岭北河疏勒河，二为葱岭南河叶尔羌河，三为于阗河，均合为塔里木河。）一源出捐毒之国，河水发葱岭分为二水（一水东流为北河），一水径休循国南，又径难兜国北，又西径罽宾国南，又西径月氏国南，又西径安息国南，城临妫水，与蜺罗跂禘水同注雷翥海（案里海）。"又云，"河水自葱岭分源，东径迦舍罗国，国小总万国之要道，城南有水东北流，径歧沙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无雷国北，又东流径依耐国北，河水又东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

此说休循难兜以妫水上游分界。再与北道交通线对照，休循在阿赖谷，捐毒在伊克斯坦，即北一道线上，是斯坦因实地考察后已大体确定的。

其他皆在南二道上。《水经注》之加舍罗国，非塔什库尔干莫属。无雷，班传言北接捐毒，西接大月氏。无雷西下葱岭接大月氏，当在喀喇库尔至伊西洱库尔之地，亦即博罗尔。

难兜以水与罽宾分南北。白鸟以为即陀历对音，即几尔几特河域，甚是；亦即今日巴基斯坦北部之地。

乌秅（《魏书》作权於摩），《汉书》言其在皮山西南，蒲犁无雷之南，又西有县度。《大清一统志》以在塔什库尔干。沙畹，斯坦因亦以为然。沙畹并以为即《西域记》之乌铩。斯坦因后来以乌铩即英吉沙。李光廷以为在巴达克南。而白鸟以为应在听杂布河域，且即宋云之钵猛。国人亦有定其在几尔几特者。然《汉书》言其西有县度，则白鸟之说不可信。又言其距长安较皮山为近，则又不能在喀拉昆仑之南。所以我想应在喀拉昆仑麓至葱岭沿途之山谷中，以至南二南一交叉点上，即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一带。

《汉书》言乌秅出小步马，玄奘《西域记》云达摩悉铁帝国出小善马，斯坦因亦尝骑巴达克小马；盖由喀拉昆仑北端，顺兴都库什北麓，可经瓦罕帕与大帕，至巴达克山也。

又《汉书》言婼羌最近阳关，又云难兜南接婼羌，又云乌秅西与难兜接。故世多疑者。然《通典》云，自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则婼羌之族布于喀拉昆仑山下可知也。又《魏书》西域传阿钩羌条云，"阿钩羌在莎车

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县度，上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引而度，因以名之。”又云，“波路在阿钩羌西北”。阿钩羌即婼羌异称，波路即大勃律。慧超传云，“迦叶弥罗国（按喀什米尔）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住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合而观之，可见汉唐之间，柴达木以西以南，天山以南，葱岭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以塔里木河为中心，实以羌族为主。柴达木义云盐泽。新疆亦多盐。我甚疑柴达之音，与羌有关，犹喀木之为康也。羌中有婼羌，盖为大宗，彼等与拉达克，大小勃律同种。东部胡去来王仅汉所属一部。西部难兜（小勃律）汉时为与罽宾间缓冲国，唐时为属国。而亦可见羌、月氏、吐蕃之关系矣。

此注在全书中完成最后，足以补充正文，并请与附图对照。

〔注八三〕据《魏略》西戎传：“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南道：且志（当且末之误）、小宛、精绝、楼兰，并属鄯善（鄯善，本楼兰改名，而此云楼兰殆指故城，盖西域所谓国，皆指城邑，与欧印同。大约是时鄯善扩境且迁治也）。戎卢、扜弥、渠勒、皮穴（皮山），并属于阗。罽宾、大夏、高附、天竺，并属大月氏。中道：尉梨、危须、山王（山国），并属焉耆。姑墨、温宿、尉头，并属龟兹。桢中（《后汉书》班超传损中城，注作顿中）、莎车、竭石（今喀什噶尔）、渠沙（《北史》渠莎，居故莎车城）、西夜、依耐、满犁（蒲犁）、億若（《后汉书》德若）、榆令（前后书皆无此国）、捐毒、休脩（休循）、琴国（前后书皆无），并属疏勒。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本国无增损。北新道：东西且弥、单桓、毕陆（卑陆）、蒲陆（蒲类）、乌贪（乌贪訾离），并属车师后部（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三国志》、《后汉书》臧洪传，注引谢承书，载洪父旻对袁逢之问，谓“西域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云。分散者以城邑渐多，二十余国者，则兼并后之雄长也。

〔注八四〕汉之经营西域，固在对抗匈奴，为了对抗匈奴，追求月氏，而月氏后来对中国文化影响，亦十分重大。故于此处略论其由来、移动，与种姓。

月氏出现至迟在战国时。《周书》王会，“禺氏騊駼”。禺氏之名，再三见于《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何秋涛以禺氏即月氏，似可信。又《小匡》有“留沙西虞”，当相同。氏音支，梁任公疑读氏。其与乌

氐殆亦有关。月氏或最初之王名。

关于月氏种族，德经以为鞑靼，克拉普罗特以为藏族，后改其说，认为峨特(Goth)。李希霍芬以为即吐火罗，并以为是 Takla Mahan 大沙漠得名由来。拉孙，夏德及白鸟力倡突厥说，最得赞成。我相信他是广义的氐羌之族，亦即吐火罗，且是由新疆南路乃至更南移住敦煌，始为中国所知的。

《水经注》："春秋传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见《左》昭九）。杜林曰，敦煌，古瓜州。——瓜州戎，并于月氏者也。"杜林为河西人，其说当可信。又杜佑《通典》云，"瓜州战国时为月支所居。"是匈奴出现库伦之日，亦月氏至敦煌一带之时。《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唐人《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本月氏国。"是敦煌一带，乃月氏故地，确无疑义。

何以知其为氐羌族？《史记》说月氏西迁以后，余众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汉书》称婼羌，后称婼月氏（赵充国，冯奉世传）。《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胡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弱者南入依诸羌，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其以"父名母姓为种"，亦同云。《魏略》西戎传："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有月氏余种，葱茈羌，黄牛白马羌，各有酋豪。"可见在秦汉之际，中国西部，包括新疆西藏及其外缘皆氐羌也。

谓他们由南路及更南进入甘肃者，因他们即吐火罗族。案吐火罗分布于喜马拉雅山一带。月氏西迁以后，中国所谓月氏，即西方（罗马、波斯、印度）所谓吐火罗。罗马斯特拉波始记"Tokharoi"，以之属于塞契特之一。以后朴托莱梅提及"Thagura"。我国显然记此译名最早者为《魏书》，作吐呼罗，其后作吐豁罗，吐火罗。然佛典中记载最多。《鞞婆沙论》，《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大智度论》等，均提及之，作兜佉勒兜呿罗乃至都罗，玄奘作覩货罗。而汉译常径作月氏或小月氏。玄奘《西域记》直认天山南路为"覩货罗故国"必本于佛教记载。他们原住地当与释迦族邻，历史甚古。《鞞婆沙论》云："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此论成于迦腻色迦王时，译于苻秦时）。《西域记》于月氏西迁后"覩货罗国故地"凡十二国，其中乌仗那、梵衍那、呬摩呾罗、商弥四国，皆云其王释种。释种与他们关系极深，亦无疑义。大约自西藏一迁于南路，再迁于敦煌，三迁于伊犁，四迁于妫水以北（康居境），五迁于大夏，而有贵霜之盛（详下）。然其同种之嚈哒（八滑、挹怛）亦渐起。八滑尝从班勇击匈奴（《后汉书》车师传）。其后属于柔然；其后强大，入据月氏领地。至齐梁之际，其王厌带夷栗陀时，国势大盛，事天神火

神(祆教)(《梁书》)。厌带,即哌哒也。贵霜故主,退妫水以北,附于康居,即昭武九姓之国(《北史》作安,钹汗,米,史,曹,何,乌那遏,穆,漕;《唐书》作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魏书》、《北史》、《隋》、《唐书》皆云,哌哒为大月氏种,滑国以姓为国号,哌哒为王姓;记载分明。沙畹《西突厥史料》据波斯记载,以五世纪中叶哌哒败波斯军,王名 Ephthalauos,为哌哒(Hephtalites)一名之由来。其先柔然哌哒合作。柔然既灭,波斯乃与突厥合作,以灭哌哒(六世纪中叶,陈末)。此皆亦与我国纪载相符。玄奘西行时,以史国(Kesh)铁门之南,自阿富汗以至葱岭,东北至南山,东南至喀什米尔,皆睹货罗之地。盖经一大圆周之运动也。突厥既败,唐复汉业,高宗时设康居都督府于萨马尔汗,设月氏都护府于阿富汗,玄宗时封其王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尤了无疑义之事。(吕思勉以哌哒即于阗。凡不通观来龙去脉之相符与否,纯以音之近似论史书所载译名者,其误常类此。)

故吐火罗为部族之称,而月氏、哌哒殆王朝之号。吐火罗之意义不明。案尼泊尔孟加拉及暹罗等地,读九为 Dagu,Taku。南诏国有九子神话,藏人有九子神话,昭武有九姓。吐火罗者殆即九姓九王之意欤?尼泊尔有尼泊人,有廓尔喀人,尚有塔古尔(Thakurs)人。此塔古尔人者,或即吐火罗之族乎?西方人多将吐火罗民族亦归于伊兰系统。日人多谓吐火罗为土耳其族。按西域库车出土之壁画中有一披发之人持中国笔作画之像,为海定发现,见斯坦因《西域考古图录》(Serindia)。此皆认为系吐火罗人,而丰腴类一般佛像,决非雅利安与突厥。吐火罗人种与氐羌关系极为密切,实无疑义。佛教起于尼泊尔附近,而自来佛像,罕作雅利安之容者。然则"极知吐火罗语"之释迦,究为尼泊尔人抑为印度人,非不可讨论之问题也。又应劭释敦煌为大盛之意。我尝疑敦煌二字原为吐火罗二字之音译。(近知藤田有此说。)

〔注八五〕《汉书》所谓塞种,当本于波斯人所谓塞迦。此指康居东北游牧之族。然自亚历山大,希腊人多与塞种混血,亦无问题之事。故《汉书》所指塞种,亦并指希腊人在内,此观《汉书》所记塞王南君罽宾及其风教可见。(梁任公看出此点,唯以塞即希腊则不确。白鸟根本否认《汉书》关于塞种记载,乃故意立异。)

始对塞种讨论者为梁代萏济引杜预说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追逐,遂往葱岭南奔,又谓悬度贤豆身毒,仍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广

弘明集》卷七)。殆颜师古《汉书》注,“塞种即释种”之所本。塞种本允姓之戎一说,当月氏之误。然塞种即释种之说,未可厚非。盖释迦与吐火罗有关,而吐火罗亦在广义塞族之列也。

塞种者,大体上,当游牧之雅利安人,而包含希腊人所谓塞契特及准塞契特者。其先当在乌拉山南,由此一部到哈萨克,一部到伊犁,因而亦至和阗一带。秦汉之际,大概言之,新疆东部南部为氐羌,西部北部为塞种。现在帕米尔一带有 Ghalchas 山民,据斯坦因说,代表纯粹阿尔卑型,操东伊兰语。此或与尼泊尔之廓尔喀人有关。此与塔什克,当皆塞种之遗。(白鸟以为塞种及 Caspian 皆起于葱岭西南,实无根据。)

〔注八六〕乌孙在《史记》以前,似无记载。乌孙故地,据《史记》、《汉书》,在匈奴浑邪王之地。而浑邪王之地,在张掖郡。故《史记》谓为匈奴西边小国。其后为月氏所并,月氏之地,遂亦自敦煌至张掖。及匈奴助乌孙攻月氏,乌孙遂西追至伊犁,而其东方之地,乃让与匈奴。此班班可考者。于是“匈奴右居盐泽,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大宛传)。

至于乌孙种族,有鞑靼、芬、印度、日耳曼、突厥、吉尔吉思诸说,清末国人一时曾信其为俄人。我相信他是坚昆——吉尔吉思之族。所谓丑异,不过当时汉人眼光。焦颜所说,亦有不同,然启示甚大。盖焦说指原有之乌孙,而唐代早无乌孙,颜说当即指黠戛斯,殆唐人信其即乌孙也。而是时之黠戛斯,已颇与塞族混血矣。

〔注八七〕这些语言,先多不明,据最近研究,知一种为河中一带(Transoxian)之语,即玄奘所谓窣利语。龟兹语即吐火罗语,和阗语为塞语。玄奘记窣利及其语文云,“自素叶水城(约当吹河岸之 Tokmak)至羯霜那国(史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三十余言,转而相生,竖读其文。父子计利,财多为贵。”又记覩货罗文云:“二十五言,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字渐多,逾广窣利。”关于塞语,无可见。唯提及于阗文字“聿遵印度,微改体势。语异诸国”云。

〔注八八〕婆罗文由南部闪族文字(Sabetaen)变来,行于印度;佉卢文则由北部闪文,即亚拉美文变来。后来梵文由前者而出。佉卢文流行中亚直至五世纪,后为梵文代替。卢尼文为北欧文字,由希腊拉丁变来,峨特人始传之。英人及突厥人均用之。

〔注八九〕于阗,古吐蕃文作“U-then”;初期回教徒称为秦(Chin)与马秦

(Ma-Chin)。奘记云：无忧王因太子之事，怒迁北印度呾叉始罗国之豪族至此，而东土帝子流徙居此东界。旦日合战，西主不利，东主乘胜，迁都中地。罗志意译西藏文佛传，谓有中国人 Rgya 瞿萨坦那与印人(无忧王宰相耶舍)合建此国。二书皆传说性质。然所谓东帝，未必即指中国。可能在战国时中国之氐羌为秦所逐，至此而征服塞种。今西藏西部阿里，藏音读作 Nga-Ri。又据西藏传，佛教由罽宾传于阗，在公元前八十年(昭帝)之际，又于阗王家姓 Vijaka；此亦由古物证实。而我国所称尉迟，即此王家之姓。汉末于阗绝贡，益强盛。与克什米尔一山之隔，无怪其为大乘重地。而天山北路，则小乘为多，此无非证明北路佛教之传入尚较南路为早而已。又《魏书》有朱居国"在于阗西，俗类于阗，时属哌哒。"此当即《唐书》之朱俱波。二者地望与《西域记》之斫句迦相合。西人多以此即莎车以南之 Karghalik，在今叶城西南。《魏书》又云西夜子合改名悉居半，或同一地方之异称。又《历代三宝记》言于阗东南，有遮居迦国，敬重大乘。梁任公以为即斫句迦，事实十分相似，但方位完全相左。似宜存疑。

〔注九〇〕在北道，因为气候比较润泽，不若南道干燥，易于保存古物；两汉文物，出土者较少。所发掘者，以高昌龟兹一带为多(现多在德俄)，以两汉以后唐宋之际者为多。

〔注九一〕《史记》云，大宛以蒲陶为酒，多善马：汗血马。汉持金请易汗血马，大宛杀汉使，取财物。汉遂兴兵远征。其马在贰师城。故李广利称贰师将军。《唐书》云，东曹国汉贰师城也。当时称苏对沙那，即今 Uratube。地在怖悍(费尔干)与萨马尔汗之间。浩罕之名，或即玄奘记之喝罕；十世纪以后始著。明代属布哈尔，清初察合台远孙建浩罕汗国。一八六四——七六年间，俄沦为费尔干省，为土耳其斯坦总督府所在。汉代居民或以伊朗族为多。其后塞种吐火罗人移来，又其后回鹘吉尔吉斯人移来。塔什克殆其原住民也。

〔注九二〕细君公主乃第一个嫁乌孙老王者。悲愁作歌云："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此见我国妇女之为国牺牲，亦可见游牧民之生活。其后公主嫁乌孙不绝。宣帝时公主在赤谷，是时乌孙内争，中国为其定地界。元帝时北单于侵乌孙大宛，并欲北击伊列——即伊犁。乃有陈汤之出兵康居。成帝时内乱，叛者末振率八万人投附康居。两昆弥仍不

合作，赖都护生存（昆莫、昆弥殆皆王号）。东汉关系渐疏，殆已将其“取消”矣。东汉之末，丁零似已渐入迪化塔城一带，盖追匈奴之后者。旋有柔然、悦般、高车、铁勒、突厥、黠戛斯之兴。

《元史》贾塔剌海传：“谦谦州（唐努乌梁海）古乌孙国也。”世有疑之者。今日乌梁海之首都仍名 Kyzy-Hoto，即赤城之意。叶尼塞河上游有乌斯河来会，河边有村曰乌萨。所以我相信乌孙乃由西伯利亚先至唐努，再至甘肃。隋唐之世，黠戛斯仍由此道而至唐努。嗣乌孙再迁伊犁，后迁纳林河北。今日吉尔吉思人，似仍是由唐努迁至纳林河一带的。今布鲁特、博罗尔人，大抵坚昆、乌孙遗裔。

〔注九三〕关于柔然记载，多自元魏。然二者为仇敌，故多不实。西人多以为蒙古之祖，法人及吉朋均以为即西史之“Avars”，实无根据。我赞成巴克以 Avar 即悦般之说。林惠祥以为柔然领袖属鲜卑，部民为高车突厥，似甚得其实。梁任公云：“匈奴西徙，鲜卑居其故地。鲜卑入主中原，柔然受之。柔然之后为突厥，回纥。回纥之后，小部割据，蒙古起而统一之。千余年来，蒙古统治之递嬗，大略如是。”（《梁任公近著》）

〔注九四〕据《史记》、《汉书》匈奴传：匈奴“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坚昆），新犁（龙薪犁）五国。”丁零当时在贝加尔湖。坚昆在西伯利亚。屈射疑即今之丘克迟族。浑庾即贾谊《新书》所谓灌窳（《魏略》浑窳），《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有窳浑，在今宁夏。龙新犁或即龙勒（敦煌南）。当皆与月氏或乌孙有关者。《魏略》云：“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出好马。坚昆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丁零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或以为此丁零即匈奴北丁零也。而北丁零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北丁零有马胫，短人之国。”又云据《史记》，则“北海之南，复有丁零（非乌孙西之丁零）”云。按呼得似即乌禅幕，安习水或即额尔齐斯河，乃坚昆朝廷，郅支所曾居者；当非指汉初匈奴之廷。如所记呼得三国方位无错字，则乌孙西丁零应即匈奴北之丁零（亦即北海南之丁零）一部西移者。而康居北之丁零，当塞种南下，匈奴西迁后再自乌拉山南移者，即《北史》、《隋书》以得嶷海（巴尔喀什湖）为中心之铁勒也。《魏略》此段记载，显示汉末丁零坚昆新移动。

〔注九五〕世以突厥或土耳其为回族之总称，实不确实。回族最早者，实为丁零、坚昆、乌孙。突厥为匈奴被统治民族之一部分。本为小部，后在平凉

(甘肃固原),附沮渠、柔然(蠕蠕)而兴,赖丁零高车支持而大。《魏书》仅有高车传。云,高车,古赤狄之余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言语略同匈奴而小异。其种有狄氏,袁纥氏(回纥?),斛律氏,护骨氏(乌揭?),解批氏,异奇斤氏。有关者,尚有吐突隣,纥奚,薛干等。又云,其先为单于之女与狼所生,而车轮高大云。时根据地在外蒙和林。盖《魏书》时代,丁零最强,柔然亦尝臣服之,回纥为其重要之一部。坚昆殆尚在其外,故不见。其后柔然自建其国,与丁零相争。而此时突厥尚附于柔然。此一时也。

至《周书》有突厥传,《北史》除突厥传外,并将铁勒与高车分为二。《隋书》突厥、铁勒并传。三书皆成于唐初。综三书所云突厥缘起有三说:一云,突厥先居西海之右,匈奴别种也,姓阿史那,其族灭后,有一儿,为狼所育,狼遂怀孕,逃于高昌北山,生十男,阿史那其一,后嗣渐衰,臣茹茹(蠕蠕)居金山为铁工。金山形如兜鍪,俗称突厥。又云:"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隶于沮渠蒙逊)。魏太武灭沮渠氏(晋宋之际)以五百家奔茹茹,居金山,号突厥。"又云,"突厥之先,出索国,在匈奴北。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又生四男,一号契骨,一居折施山,乃大儿也。山有阿谤步种,奉其为主,号突厥,即讷都六设也。十妻,以母为姓,阿史那为小妻之子,能跳高,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外,披发左衽,旗帜上施金狼,其俗似高车,亦微异。至(梁初)有土门,号大叶护,长子土门伊利可汗,次子室点密,土门为茹茹破铁勒,后终灭茹茹,而破悒怛,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云。则诸书所记大体相同。以上所说虽不一,但远来自西海(里海或巴尔喀什);附于匈奴;几经变乱,逃至高昌;次移甘肃先后附于沮渠柔然;与坚昆血统最亲,而颇染羌俗,并丁零柔然、悒怛及坚昆而盛;至为显然。北史时代,突厥方盛,继鲜卑统一漠北,然种亦甚杂。东西突厥,语言不尽同。时铁勒分属东西突厥,资其征讨之用。高车可谓东丁零,而铁勒为西丁零,亦包括坚昆回纥。此又一时也。

至《旧唐书》,只有东西突厥与回鹘(回纥),而黠戛斯附于回鹘。《新唐书》则有东西突厥,回鹘,黠戛斯,沙陀。而与沙陀有关者,则为鞑靼。突厥为杂胡,而回鹘已为丁零诸种之中心。回鹘传云"匈奴之后,俗多乘高轮,亦曰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有袁纥、仆固、薛延陀等十五种,袁纥亦称乌护,乌纥,韦纥",要即回纥或畏吾儿者是也。其源出丁零,加上后来新移来之铁勒诸部,甚为显然。隋世回鹘始脱离突厥而起。突厥既为唐人所

破(东突厥降,西突厥走),回鹘乃兴,而黠戛斯又脱颖而出。(同时则契丹继柔然而兴,吐蕃继月氏哌哒而兴。)《新唐书》云: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白山之旁。或曰居勿,结骨。种杂丁零,亦曰纥扢斯。自称李陵之后。南依贪漫山(唐努山)。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黑瞳必曰李陵苗裔。文字言语同回鹘云。据《元史》,吉尔吉思,乂云四十女,传匈奴以汉女四十人嫁之云。贞观时以铁勒已臣即来朝,以其地为坚昆府。后中宗劳之曰,"尔国与我同宗,非他蕃比。"旋为回鹘所破。其后回鹘内乱,为黠戛斯所败。回鹘未迁者附于室韦,亦为黠戛斯所破。黠戛斯助唐甚多。而与黠戛斯对立之沙陀,尚最后为唐出力。此又一时也。

此后辽夏并兴,而回鹘西迁高昌,并扩张势力于天山南路,以及碎叶川与药杀妫水之间,传布回教。以前逃至此处之突厥人皆受统治。自此有土耳其斯坦之称,直至蒙古时代,回鹘势力不坠。此又一时也。

由此可见丁零,坚昆,回纥,突厥,乃不同之民族。他们自然有关,但决不能以突厥概一切。可能的是认丁零坚昆为母体,而乌孙为分枝,回纥为大宗,突厥又其分枝。而他们后来各各混血,皆极可惊。丁零早与汉人匈奴鲜卑混血,汉末西迁前后又与蠕蠕及康居境内之伊朗塞种混血。坚昆与匈奴塞种丁零亦颇混血。乌孙尤与月氏塞种汉人混血。而突厥之族所在高昌平凉,乃氐羌匈奴柔然哌哒吐谷浑及汉人大混合地。大体言之,回鹘在文化体质上多与康居有关,而突厥文化承自柔然,种杂氐羌。突厥、回鹘西迁,尤多与伊朗人混血。即土耳其斯坦,根本是波斯名词也。唯黠戛斯在唐努甚久,或较为纯粹。回鹘西迁南下后,所谓土耳其族中势力最大者为黠戛斯,他们又统治中亚之突厥回鹘。所谓塞尔柱突厥,乃先为回纥,后为黠戛斯所统治者;而黠戛斯之色彩,尤为浓厚。至奥斯曼,实阿拉伯、波斯、突厥、回鹘与黠戛斯之混合物。其称土耳其,乃十九世纪之事。蒙古既兴,回纥、黠戛斯皆受蒙古压力,回纥蒙古化者为哈萨克,黠戛斯南迁布鲁特一带。据 Czaplicka 谓,吉尔吉思人乃土耳其族中最较纯粹者("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我想西伯利亚之雅库特,也有说是"土耳其族"中很纯粹的。至于沙陀,实回鹘化之汉人羌人;而鞑靼则东胡西胡化,西胡东胡化二者兼而有之,而与突厥关系甚远。突厥反以后来者为土耳其族之总名,实在是一种幸运。而蒙古以更后来者为一切亚洲人之总称,自更为幸运。与其以土耳其为回人总称,不如丁零、坚昆、乌孙、回鹘之称更确。事实上,土耳其与其说是一

种族之名，不如说是一言语学之名。自鄂尔坤河之突厥碑文出世，土耳其语文，大得世人注意。其实此种语言，即丁零高车回鹘之语言；而文字如卢尼文，似系由西迁中之匈奴传于柔然者；而窣利文，系由中亚传入者。最后为阿拉伯文字，则伊斯兰教之故。

〔注九六〕印度无史，故古史年代，多为传说。如印人南下，旧传公元前四千年。此处所说吠陀、史诗、教学时代之年代，系据新说。此后以有货币，及佛教等各种典籍对照，较无问题。此后一般印度史分为佛教时代，印度教时代，回教时代，蒙兀时代，英国时代。释迦之族，在释迦前后，极受雅利安人之迫害，视为贱种。此观玄奘《西域记》可见。《学原杂志》三卷二期载印顺法师《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谓佛教起于印度东方，即孟加拉一带（按即东巴基斯坦），此为非雅利安文化的孕育地，并颇引婆罗门及佛教文献为证；为我国论此问题之最有系统者。佛陀义为觉者。姓瞿昙，名悉达多。生前未尝自称为佛。释迦牟尼乃释族贤者之意。

又按：印度教为一民族宗教，印度人并不传教。正因佛非印度之教，无忧王非印度之人，使佛教国际化，并增进东亚民族团结，此佛教大功。无忧王派人至罽宾，臾那世界（Yonaloka），及师子国（Lanka）传教，终在亚洲及中国造成莫大影响（看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

〔注九七〕在中国伊朗间建国最早者为康居。《汉书》称为行国，实际上当时他已是半行国半居国了。关于其地点，久为问题。国人常将其与粟特、康国、康里混同。实则康居在妫水中流，正宋元花剌子模后来基华汗国国都所在。我颇怀疑康居之名，系由德黑兰与库狄斯坦间之"Kangavar"之扩大使用而来。康国乃萨马尔汗，康居盛时，尝并有之。康里者，即中国之高车（丁零），汉末以来，西迁至今日康居一带，服属于花剌子模帝国，此国后为成吉思汗所破，颇与蒙古人混血。彼等称车为 kang。而今日雅库特人亦云自出 Kangalas。关于康居历史，文献不足。兹将近来苏俄之研究择要介绍，仅供参考而已。

据一七二八，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后，苏俄考古学者在花剌子模（今月即别与土克曼）之发掘，认为："花剌子模之文化，对于中亚与西亚间，东欧与哈萨克及南亚西伯利亚间，素具桥梁作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花剌子模之新石器文化，与南西伯利亚之 Afanasiev 文化有关。印欧语系之东支（包括斯拉夫、印度、伊朗、亚美尼亚语），或形成于此处。公元前三——二千年，花剌

子模文化具有安诺文化之影响。花剌子模之青铜文化，与草原地带之青铜文化，是有关的。由石器到铜器时期，渔猎居民之住屋中，皆有圣炉之火。此或为袄教圣火之起源。他们有绘文字及象形文字，与摩衡觉陀罗，赫梯，及古伊兰古象形文字有关。公元一千年前，中亚还是游牧民与农耕对立之局。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纪，花剌子模人开始建国，并有运河工程。此即波斯人所称 Airyanvejo，Kangha，Khwarizm，在中国史上称为康居者。此国原来甚小，其后几经兴衰，在最盛时常保持其在花剌子模及锡尔河下流之核心地带，一度控制粟特，中锡尔河，呼罗珊（东波斯）之一部，北达乌拉山，伏尔加河，及亚速海区域。这是十二三世纪花剌子模帝国原型，为蒙古所征服的。花剌子模先后为波斯及亚历山大征服。到公元一二世纪，有贵霜王朝继之勃兴，统治粟特、大夏、阿富汗、北印，势力及于新疆，使花剌子模文化达最高发展。而根据王玺之研究，贵霜帝国实花剌子模，康居王朝，即 Siyavushidae 王朝之一支。而其文化则保持固有传统，而受希腊、佛教之影响者。至五世纪中叶，原为贵霜治下之哌哒，推翻贵霜。但不久突厥起来。而到六四六年，阿拉伯人败东罗马及萨珊波斯，为中亚主人。贵霜既衰，花剌子模自四世纪至十世纪由 Afighid 王朝统治——此乃旧康居王朝之一支，与印度之贵霜王朝、安息王朝及克利米之 Aspurgian 朝有关者。此王朝自四世纪时，统治阿姆河域。奴隶制度仍极盛行。文化上希腊影响之色彩仍深于波斯萨珊之影响。这一时期，虽然外患（白匈奴、突厥）内乱频仍，而十世纪时，据 Makdisi 云，“学艺发达，人民好客，勇于战争，但缺优雅之致。”十一、十二、十三世纪，土克曼方面之塞尔柱人以木鹿为首都建国。但西辽攻至萨马尔汗，而土克曼之游牧民亦焚掠木鹿及呼罗珊。继而花剌子模之沙，取得政权，国势复振，首都玉龙杰赤之势力自咸海伸至印度，波斯伸至大宛。据亚拉拉地学家 Yaqut（1170—1229）云，“殆东方最富最文明之国”。而蒙古入侵摧毁了花剌子模之文艺复兴。然康居在黑沙漠（Karakum）红沙漠（Kzylhum）间，固中亚之埃及云（K. Coates“Soviets in Central Asia”引）。

〔注九八〕以上地方，中国自两汉元魏唐代元代以迄今日，名称颇异，兹择要志之于下：花剌子模系元代之称，唐代称为火寻，货利习弥，过利。《后汉书》栗弋，《魏略》属繇，《魏书》粟特，《晋书》粟弋，玄奘《西域记》窣利，西辽时代之河中皆为一事。班黑（误作班里），班勒纥，皆《元史》之称，《明史》作把力黑，玄奘作缚喝。木鹿亦作戊地，代地，马鲁。帕尔特即《汉书》番兜。

忸密,布豁,捕喝,卜哈尔,不花剌,皆布哈尔。康国,悉万斤,萨末鞬,寻思干,薛迷思坚,赛马尔堪,皆萨马尔汗。者舌、石国、察赤,皆塔干什。大宛,宁远,怖捍,钹汗,拔汗那,破落那,洛那,皆即费尔干。

又按《史记》大宛传云,“宛西小国驩潜、大益……皆随汉使献见天子”。白鸟以驩潜即火寻或花剌子模,实为慧见。然以大益为 Dahe,则大误。盖此波斯人对敌人之称,不致以此自称。我以大益为 Herat,即元史之也里,陈诚之哈烈。又沙畹以 Herat(希腊文作 Alexandria Arion)即乌弋山离,亦是。乌弋山离在阿富汗及波斯南,但其立国,或由也里开始也。

〔注九九〕《汉书》西域传: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经注》云,水至安息,注雷翥海。世有以为咸海者,其实亦即里海。盖古代里海咸海相连,明代以前,阿姆河犹出里海,其后淤塞,始注咸海。(咸海古尝称花剌子模湖。)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汉书》之阖苏即奄蔡。

〔注一〇〇〕《汉书》康居五小王地,一曰苏薤,即《唐书》之史国。二曰附墨,即何国。三曰窳匿,即石国。四曰罽,即安国。五曰奥鞬,即火寻,亦即玉龙杰赤。此可见其领地,在西汉末已扩张。《汉书》又言东西九千一百四里。盖狭长之地,一时与大月氏为北南并立之游牧与城郭之二大国。《汉书》未提及粟特。大约西汉时萨马尔汗仍为大月氏所有。Marquart 认为大月氏确立主权于大夏,当在安息王 Phraates 四世时代,即汉之元成时代(公元前三十年左右),并推想大月氏南下妫水,系受康居之压迫。然此实无根据。二国关系甚为密切,盖共同对付塞种与安息也。至东汉,康居并有粟特、奄蔡,又有扩张。直至汉晋之际,据《魏略》,康居北有乌伊别国,又有柳国,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又有商度之国,去康居万余里。又云,阿兰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然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云。大概奄蔡汉末为阿兰所并,旋为匈奴所有。按今之亚速海即奄蔡海。又今日高加索,俄国仍设有 Ossetians 之自治区,即奄蔡之后。洪钧以亚速海即奄蔡甚是,但以基美利为鲜卑,塞契特为粟特,则误。(吕思勉谓康居亡于悦般,殆由阿兰之误。)

按《后汉书》一部分据《魏略》,关于“阿兰聊国”一句,当有错简。《魏略》属繇一段,亦有错简。而《魏书》似亦有错简。此在西域上引起一大问题。先是德经以匈奴即芬族,至克拉普罗特以匈奴乃突厥族,未至欧洲。至夏德再张德经之论。至金斯米(Kingsmill) 及日人白鸟又反对夏德之说。皆涉及此段文字。《魏书》云: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悉见虏。高宗初遣使请赎，听焉。四年，贡方物。”夏德据之，以粟特即塞契特，即在克里米。白鸟以为“古之奄蔡，居大泽，在康居西北”，乃奄蔡之事，误入粟特者。因以证明此处匈奴即哌哒，非芬族。近日人江上以为“古之奄蔡”直至“已三世矣”，应为奄蔡记事，误入粟特者。因而赞成夏德匈奴即芬族之说，反驳白鸟。按江上之说是也。又白鸟以奄蔡、阖苏皆哌哒对音，后又改为钦察对音，皆错误至极。

〔注一〇一〕关于此句，Remusat，Lassen，尤其是李希霍芬，以吐火罗为月氏。唯金斯米及马卡特以大夏为吐火罗之音译，佛郎克（Franke）与马卡特以 Pasiani 为 Gasiain 之误，即月氏之音译。马卡特据罗马公元初史家 Trogus Pompeius 之纪录，以 Asiai 本为吐火罗王家之名，误为种族之名者。然五河地方发现塞族王朝货币，有 Azes，Azilises 之名，则又不如认为奄蔡或塞种之王名更确。大月氏入大夏前人种状况虽不甚明白，然无吐火罗人，是不成问题的。

〔注一〇二〕狄麦多流以后，在高附至北印之希腊大夏王朝至少有阿婆罗都（Appollodotus）及弥兰王。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一四〇——八〇年，即张骞西征之时。弥兰王即 Menader 或 Milinda，曾与那先比丘问答（续见下）。在汉译佛典中，作弥兰王，毕邻陀，旻邻陀，难陀。斯特拉波据安息史家之记载，谓弥兰之领土，东至 Seres 与 Phryni；当指中国与匈奴。此自夸张。Plutarch 亦提及之。

〔注一〇三〕赞成马卡特之说（如桑原）者，每援引《新唐书》西域传：“大夏即吐火罗也”。其实此非指汉世大夏居民为吐火罗，乃指古大夏地之阿富汗，为唐代吐火罗人之地，盖当时波斯称阿富汗为“吐火罗斯坦”也。

〔注一〇四〕按巴基斯坦包括五河（Prinjab），阿富汗之边境（Afgan frontier），喀什米尔（Kashmir），俾路支（Beluchistan），合前三字头后一字之尾而成。不过今日巴基斯坦尚名实不符。盖喀邦尚在印巴相争中。又俾路支为古木俱兰地。后属波斯。及阿富汗独立，一度属之。后英国占东俾路支。今伊朗亦俾路支省。而由此亦可想到印度半岛分为二国，是有历史根源的。

〔注一〇五〕大夏，月氏，不明之事甚多。一为《史记》载大夏都蓝市城，

一为《汉书》记月氏都监氏城,是否一事?世多以为蓝为监字之误,即皆班黑(Balkh)。日本桑原以道里证明实为二地,甚是。世之言月氏者,每以为月氏西迁,即南入大夏。其实张骞仅云月氏臣伏大夏,其所派副使犹分至月氏,大夏二国。《史记》大宛传云,月氏都妫水北,故《汉书》之监氏,当即萨马尔汗。《史记》说大夏都妫水南,则其蓝市城,当在班黑或附近之地(即以后《魏书》之卢监氏,《北史》剩监氏。)一北一南,并非字误。唯其后月氏南迁至蓝市,其后再迁至健驮罗。其次,大夏、月氏、贵霜之关系。谓大夏本吐火罗地,希腊人占领之,月氏再占领之,其误不待言。但五侯之一之贵霜,究为大夏本来之一部落乎,抑伊朗人之领袖,或希腊人之领袖,或塞种领袖,受月氏之封者乎?或即月氏与吐火罗所立者乎?此均无可确考。唯近来颇有信贵霜为雅利安人者。但就玄奘之记看,应为月氏及吐火罗之族。一般西洋史家统称之曰:"Indo-Scythian",以此一词,包括塞种,月氏,贵霜,吐火罗,及哌哒。五者有关,亦是事实;但究非妥当之名词耳。又现在发现迦腻色迦王货币以佉卢文文记"Shaonanoshao Kaneshki Koshano"字样,义云万王之王贵霜迦腻色迦。称王为"Shao",出于波斯之:"Shah"乎,抑与后来苻诏之"诏","昭武"及南诏之"诏"有何关系乎?此则较难断言者。又迦腻色迦王时代,亦多异说。有认为大抵与班超同时者,有认为后汉顺帝桓帝时人者(《大英百科全书》定为一二三——五三),亦有认为以此为名有二人者(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但以提倡佛教出名者在东汉之末,则无问题。

〔注一〇六〕梁任公云,汉灵帝时月支有六百余人归化中国,支谦之父在内。《魏志》:徐邈为凉州刺史,西域流通。其时正诸葛北伐。《蜀志》后主纪注引《诸葛亮集》:"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有助亮北伐之意。"当时凉州之多月氏康居人可知。是时月氏康居必有大内乱。又《魏志》明帝纪,"太和三年(二二九)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月氏王"。此同时之事。据西人据钱币考证,迦腻色迦王前后,经 Huvishka 及 Vasudeva 王(三世纪中),后者殆即波调。据奘记,则王死后,"讫利多种,复自称王,毁坏佛法"。其后睹货罗国人来逐讫利多种。此时柔然向西域扩张。《魏书》云,大月氏都卢监氏,数为其所侵,西徙都薄罗城。其王寄多罗南侵北天竺。乾陀罗以北五国尽为所并。又云,寄多罗西徙后,令其子守富楼沙城,号小月氏。按四世纪后,印度笈多朝兴,于是月氏在印度河域之地渐趋瓦解,集于阿富汗北。柔然压来,欲向波斯发展,又

为萨珊朝所阻。乃再越开百尔关入北印。富楼沙又译丈夫城，又即白沙瓦也。此时哌哒起来。至五二〇年宋云入乾陀罗时，"为哌哒所灭已经二世"矣。

〔注一〇七〕《前汉书》云安息都番兜，当即帕尔特。《后汉书》云都和椟，洪钧以为即 Hekatompylos（义云百门市）。《魏书》有安息，又始记波斯，盖波斯已兴，而安息尚未尽并于波斯也。又云，波斯都宿利城，洪钧以为即塞流卡特昔芬城。此为塞流卡所建，后为安息之都，后为罗马所据，复为萨珊所复也。

〔注一〇八〕甘英所临之海，有红海、黑海、波斯湾三说。欲定所指，须先判条枝所在。条枝，徐继畬以为阿拉伯，李光廷以为克里米。按《魏书》云，波斯都宿利城，古条枝国也。洪钧既以宿利即塞流西城，认甘英临海，即波斯湾，甚是。然以条枝为大食音译则不确。夏德原主大秦即罗马，后改为叙利亚，改以条枝为迦勒底，并特指于罗。又以为阿蛮即 Eclatana-Hamadan，斯宾即特昔芬，于罗即 Hira（巴比伦南）。然当时固尚有南经苏萨之道。故藤田以为条枝即苏萨附近临海之 Taoke。按《后汉书》言转北而东通安息，则又不在海口。故甘英欲渡之处，仅底格里斯河口而已。以 Omman 为名之地，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皆有之。张星烺以为阿蛮即阿拉伯之 Omman，尚难定。然如以于罗为耶路撒冷，则《后汉书》此段文字，大体可解。与一世纪末西方地理书所记之道程，似亦能相符。

〔注一〇九〕汉译《那先比丘经》载那先与希腊弥兰王问答云："那先问王，本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当即犁轩。

如大家所知，所谓亚细亚（Asu）欧罗巴（Ereb），本亚述人"日出"、"日入"之意。Orient 与 Occident 之本义亦然。日所入者，不过西方之意而已。又古代 Aethiopia（义云焦黑，即阿比西尼亚）一在非洲，一在波斯湾口，称日出黑国，日没黑国。克乐巴一世摄政时，正在张骞西行略前。美人克乐巴七世乃与王昭君、赵飞燕同时。

〔注一一〇〕《魏书》著作时，罗马早已分为东西（三九五年分），叙利亚为东部罗马重镇，故其言如此。李光廷以大秦指东西罗马，张星烺以指叙利亚。皆不错。

按研究历史，重在会通，不宜专在字面上拘泥附会。我国注疏家常有望文生义者。而外国人则喜穿凿对音。此病西人常患，日人尤甚。如白鸟以

陀拔斯单为大宛，藤田以陀拔斯单为大秦。如此对法，天下无不可对之音矣。藤田又暗示印度德干高原之德干，亦由 Daksin 变来。但如定大秦为印度，则《后汉书》所言，皆不可解。当时经由南海商人自称大秦之事自有之，然班超已知印度方位，而仍命甘英求大秦于安息以西，则《后汉书》之大秦之非印度，甚为显然。

亚美尼亚乃安息罗马间通道之一。然至大秦经海道，亚美尼亚不经海道，谓大秦指亚美尼亚之非是，不待言。史公言犁轩在安息北者，自系方位不明。《魏略》云“在条枝西大海之西”，已甚为清楚矣。

〔注一一一〕沟通欧亚陆上交通最早者，当为欧亚草原之游牧民族，然无文献可征。大流士时，曾雇希腊人斯基拉(Skylax)至印度河及沿海探察。其后有旅行家希克泰(Hekataios)至印埃各地。唯皆仅由希罗多特引述。其后为四世纪之克氏、尼氏、奥氏诸人。塞流西时派梅加曾(Megasthenes)至孔雀王朝，孔雀朝亦派人至“臾那”世界。梅氏著有《印度记》，乃西方关于印度知识之渊源。以后则公元后一世纪斯特拉波，普林尼，蓬坡尼(Pomponius Trogus)。海上最早经营印度洋一带贸易者，为腓尼基人。至西元后一世纪，Hippalos 发现季候风而大盛。《红海一览》或《阿拉伯海周航记》即出于此时。二世纪之朴托莱梅(即《畴人传》之多禄某)，集西方古代地志之大成。

〔注一一二〕过去拉克伯里、李希霍芬以印度所传支那二字指安南，滇国，乃至和阗。一九一二年洛佛则以支那为古马来人指广东之称。他们的理由即《旧约》与印度使用支那一词时代，概在始皇统一之前。然中国之丝传入印度恒河一带，可能在公元前一千年至四千年，由此而至波斯和阗(《大英百科全书》)。日人北村四郎研究栽培植物史，以为中国原产之粟与大麦传至地中海，地中海之莱菔，中亚之葱传至中国，可能在新石器时代，约二五〇〇年前。秦自穆公(前七世纪)前称霸西戎。故我以为《旧约》，孔雀王朝，以及《摩奴法典》之支那本于秦与秦指中国，实无可疑。《旧约》之写定，有的较晚。《摩奴法典》，据近来考证，出于孔雀王朝以后。《汉书》匈奴传“缚马前后足，驰言秦人”；卫律“穿井筑城治楼，与秦人守之”；《史记》大宛传“宛新得秦人”；及罗什译经，称汉语为秦言；法显西行，西域犹称“秦道人”。亦见秦之源远流长矣。自伯希和力主秦说，渐成定论。玄奘以后，音译佛书称中国为至那、支那、莫诃支那、震旦、真丹。日本承之。民国以来，多以此有侮

辱之意。实则日本人之侮辱不在此词之本身也。

又法国列维(Levi)谓印度昔用支那以称雪山种种部落，而彼等不常属中国人。其实《水经注》早说“新头河西为天竺，南为中国人”。此所谓中国人者，一部分可能为柴达木方面南下之羌，一部分可能为随羌南下之中国人。羌可变为秦，而亦自附于秦。此仍不能推翻秦说也。

又《魏略》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第一条路指西域丝道；第二条路指海道达安南，亦即香道；第三条路经缅甸。我以为此第三水道陆道正是自古以来即存在的，使秦为域外所知的道路；亦即张骞所谓蜀贾奸出物的道路；这可能是最古的丝道，不过，至汉末更顺利耳。

〔注一一三〕求士丁曾助阿比西尼亚王子图由波斯手中夺丝道贸易权，但未成功。旋知二波斯僧曾居留中国，知蚕桑术。乃买其再至中国，将蚕种置竹竿中带至东罗马，时五五〇年。

〔注一一四〕罗马长城乃公元八三年以后陆续建筑，自梅因兹 (Mainz) 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亦用以防御蛮族，但远不如汉长城之坚固。

〔注一一五〕十九世纪末即有俄人日人到吐鲁番“考察”。一九〇二年——一四年，德国格伦威德、勒科克等，发掘吐鲁番库车一带。勒科克在吐鲁番附近之伯子克里克(Bezeklik)废寺中发现唐代回鹘佛教寺院壁画。其人之像貌有欧亚两型，格伦威德在库车之刻色耳(Kizil)发现壁画文书。此亦为一千佛洞。其中有汉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印度文与突厥文佛典。除丰富之壁画外，尚有一画家之画。其人殆吐火罗人，手持中国之笔，而署名则为希腊化之波斯名。又在库车之昆都拉(Kumtura)除壁画外，有二巨泥像。凡此皆为健驮罗美术之最好标本。前后四次，搜罗共四三六箱，每箱八十公斤。其间伯希和在敦煌收获最大，就在吐鲁番库车也不小。斯坦因也在此发现许多唐代壁画，宋代古钱，萨珊波斯织物，东罗马金币，唐代文书碑志，汉文，回鹘突厥文卷子，西夏文卷子和叙利亚文摩尼教卷子。他只是收拾残余，也竟装了五十骆驼而去。日本橘瑞超亦有相当收获。又斯坦因伯希和等在焉耆发现唐代木雕刻，在巴楚发现唐代佛寺残迹。格伦威德著《古代库车》，勒科克著《火州》，伯希和著《东土耳其斯坦佛教美术》，日本人翻印有《西域考古图谱》。勒科克区别西域佛教艺术为五种。一为纯健驮罗

式；二为西域所发展者，皆用婆罗文题字；三为古突厥式者，加入中国要素，用中文题字；四为回鹘式；五为西藏式。我不能说此德人无美术之知识。但他游记中，在《火州》中，说“中国徒尚武力，无文化建设”；又说新疆人为雅利安，吐火罗亦印欧人；说新疆不应称土耳其斯坦，虽然未说应称为雅利安斯坦；亦见其为一历史之文盲，文化之浪人耳。

〔注一一六〕中波关系，实不简单。前面提到玄奘所记波斯王娶汉公主之说。五世纪时波斯有 Moses 者，著书称中国为 Jenasdan，人民和善，富产丝锦。又谓公元后二世纪，中国人曾至亚美尼亚，时亚美尼亚称中国皇帝为 Jenpagur。故中国人后裔，名曰 Jenpakuriani。又谓三国时中国国王有 Arpog，太子名 Mamkon，逃至波斯，中国军追至，再逃至亚美尼亚。亚美尼亚 Mamigonians 族，即其后裔云。要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而已。唐代波斯王子逃中国，受唐封，当亦因此传说，有心理准备之故。

〔注一一七〕《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即处龟兹民者。但骊靬当以地出黑马革名。当时焉有大批犁轩民乎？

〔注一一八〕《魏略》载大秦物品甚详。要可分为三类：一为宝石，包括九色次玉，十种琉璃，珊瑚，玛瑙，真珠之类；二为毛织，包括十种氍毹，毾㲪之类；三为香料，有十二种香。最值注意者是琉璃。琉璃包括玻璃。按中国古无玻璃，犹西方古无瓷器。玻璃始于两河，盛于埃及。一世纪起罗马时代渐有透明玻璃。Silcock《中国美术史》谓洛阳发现周代坟墓中有甚美的玻璃彩珠与瓶之碎片，想时代有误。查汉代琉璃指 Beryl，乃一种宝石。后有颇黎。《本草纲目》云：“玻璃，水玉。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大秦国五色颇黎，以红色为贵。”《唐书》西域传吐火罗“北有颇黎山”。此乃巴达克山之 Balas Ruby，乃一种宝石非 glass 也。透明之玻璃南北朝时已由月氏人制造，至明而大量制造。然国人似仍以天然之物为贵也。其次是香料。香料之盛用，与佛教之流传有关。此在一世纪后成为重要商品。详续卷。《三辅黄图》以及《两京》、《三都》诸赋亦载四海珍宝。《后汉书》陈禅传载，西南夷掸国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而《魏略》云，“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二者皆马戏。灵帝极喜胡化，当喜此类异物。及据罗马史家记述，奥古斯都即位时，有丝国人朝贡（前二七年）。亦商人伪托耳。

〔注一一九〕大体言之，六师以后，自前三五年至后一五〇年，为诸教派

兴起时代。耆那与佛以外，六派先后成立（六派与六师不同）。一五〇——四〇〇年，为佛教大小乘分化时代。四〇〇——八〇〇年为婆罗门教复兴时代。九世纪后，回教输入。

〔注一二〇〕传为世友所作《异部宗输论》（中国有三译，此奘译），论述佛灭后四百余年间佛教宗派分化。据云佛灭后百有余年，即无忧王时，佛徒大天（Mahudeva）提倡异论五事，乃有大众、上座二部之分。其后百年内大众部分裂为九派。后一百年上座部分裂为新旧二派，旧派退雪山，新派为"说一切有部"，有部又分为十派，合旧派共十一派。上座大众共计二十派。按大众部自称大乘，以上座为小乘。大天殆大乘开创者。世友为有部领袖，此论自一家言，然为佛教史第一本书，故重要。参看释演培《异部宗输论语体释》。

日本学者宇井寿伯分印度佛教史为：一，根本佛教时代，即佛在世时。二，原始佛教时代，即佛灭后百年，至上座大众二部发生时。三，为部派对立时代（前二七〇——一〇〇）。四，为小乘完成时代（前一〇〇——后一五〇）。五，为大乘时代（一五〇——二五〇为初期，二五〇——四〇〇为中期，四〇〇——六五〇为后期）。亦可供参考。

〔注一二一〕关于佛典结集年代，所传不一。尤其是此第四次结集。玄奘记此事在佛灭后四百年，然证以迦腻色迦王时代应为六百年之误。故有谓世友不能参预此事，当时首席实胁尊者；而马鸣亦不曾到喀什米尔云。

《大毗婆沙论》乃解释迦多衍之"发智论"，而发智论似释"六足论"者。《毗婆》有苻秦、北凉、玄奘三译，梁任公认此为治佛学之必读书。《起信论》据日本学者考证，实汉人所作，托诸马鸣。此书印土无有，后由玄奘将其与老子并译为梵文。

〔注一二二〕本来佛教与婆罗门教不同；以佛为圣人，并非神道。人可依其教训以求觉悟解脱。但后来佛渐成为天上诸佛之一。于是阿弥陀佛（Amitabha，无量寿光之意）统治西天。而弥勒佛乃住"兜率天"之菩提萨捶，引接他人升天之当来佛。人即不能成佛，可成菩提萨捶（Bodhisattva）。菩提即觉悟，萨捶言"有情众生"。此实受波斯及印度宗教之神话影响者。以后佛教日益采入婆罗门及中亚之多神思想，神秘思想（密教），净土思想，一面采入印度哲学之思辨而成神学。大乘与小乘之别，一如天主教与原始基督教之别。

关于佛教哲学分派甚多，在《哲学系统史》一书(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中，哈米敦教授(C. H. Hamilton)关于佛教一文，综西人研究作如下分类，甚为简要：

一、上座部，小乘，有宗(Sthavirah，Hinayna，Sarastivadins)：甲，毗昙宗(Vaibasikas 宗毗婆沙论者)。乙，经量部(Sautsantkas，成实宗由此出)。

二、大众部，大乘，空宗(Mahasamybikah，Mahayana，Sunyavadins)：甲，中道论(Madhyamika)(性宗)。乙，唯识论(Vijinanavadins)(相宗)。

宇井云，上座主积聚说，大众主缘起说。自般若言空，乃有法华华严二系统。其后由华严出净土真言系统；其后由法华出涅槃，由华严出胜鬘诸系统。而禅实大小二乘所通，而又与其对立者云。

按佛说本为反抗婆罗门之梵我一如论及仪式主义而起。以人能修智持戒静定而解除苦恼，原为希望之教，渐变为消极之教。世间之苦由于无常，此佛说本义。然则世界本空幻乎？抑构成分子有坏之本性乎？上座部倾于后者。有部以一切实有，而以生，住，异，灭说实有；经量提出刹那说，主“现在实有，过(去)未(来)无体”。中道以一切实有思维，皆空，实指“无差别”，乃绝对怀疑论。唯识则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界非实有，亦非空无，而是识之流。大体说来，小乘在前，为本来佛教；重个人修行。大乘在后，主适应众生，故杂其他思想。有宗主智，是锡兰月氏系的；空宗主情，是印度系的。

欧人常分佛教为南北二派，南派指锡兰，北派指建驮罗。其实应可分为锡兰、月氏、印度三派也。

〔注一二三〕案《魏略》言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伊存口授经。牟融《理惑论》言明帝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使西域。《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又有博士弟子秦景使西域。梁任公以为系一人之误，因否定汉明求法事。余意释老志叙佛教事条理井然，谈佛理亦不错，景卢(宪)与秦景应为二人。任公又以为老子化胡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其实汉末襄楷及《魏略》已言老子出关教胡。又关于佛教来华历史以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最佳，并详六节。又佛陀先称浮图浮屠，释老志作释迦文者(劫比罗作加维卫)，《隋书》始作释迦牟尼。

按罽宾及健驮罗为无忧王最早传播佛教之地区。小乘实由此处进入天山南北。及大月氏奄有此处，提倡佛教，益促成此一趋势。丘就却之时代，

正当明帝时。及健驮罗日益繁盛,佛教乃与印波系乃至希腊系思想交流,形成大乘潮流。中国佛教,以来自月氏者最多。及哌哒之兴,佛教渐衰。回教来后,逐渐取而代之。亦即吐火罗斯坦变为土耳其斯坦也。

〔注一二四〕以后东来诸僧,南北朝则西藏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人居优势。海南诸国亦有来者(梁任公)。此后印土佛教亦衰矣。

〔注一二五〕班固云,"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匈奴传)

〔注一二六〕扬雄"谏不许单于朝",即代表此一见解。

〔注一二七〕桓帝任陈龟为度辽将军,上书云:

"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老者虑不终年,少壮惧于困厄。陛下以百姓为子,品庶以陛下为父,焉可不日昃劳神,垂抚循之恩哉。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是欲民遭圣君,不令遇恶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归之。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贤主。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扫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佑,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觉悟,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既到职,州郡重足震栗,鲜卑不敢近塞。省息经用,岁以亿计。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征还,遂乞骸骨归田里,后不食死,西域胡夷及并凉咸为举哀云。"(《后汉书》陈龟传)

〔注一二八〕今日之正草篆隶,皆在秦汉标准化,尤其是楷书在东汉标准化,只待晋人洗练之,到唐宋以印刷术来固定了。书体之变,是与书契工具有密切关系的。而书契工具,则一般文化进步所促成。笔墨纸砚,皆完成精

制于秦汉。

关于造纸以前之书契制度，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以前的“纸”，有甲、骨、金、石、瓦、陶、竹、木、缣、帛。有不同纸张，即有不同笔墨。主要纸张，在缣帛及人造纸以前，实以竹木为主，而竹尤为大宗。凡所谓简、策、符、籍、簿、篇、签、笺，皆是；笏等于日记簿。典、册，乃长篇而以丝纶编连之。(《齐书》文惠太子传。)用木者，则称方，牍，版。周人颇用之。竹木书长一尺至二尺四寸不等。帛之兴当在春秋时，《论语》：“子张书诸绅。”墨子：“古者圣王，书之竹帛，……一尺之帛，一篇之书。”初非普通人使用；直至汉世，竹简仍盛行。近年西北发现木简为多，盖西北不产竹也。笔在毛笔前，为刀笔并用。用刀刻痕用笔涂色，所谓“刀笔铅椠”。是时铅笔大概为铅粉，非今之铅笔也。后以笔写刀削。而所谓笔，亦为竹，木。觚、籥、苫(《学记》“呻其占毕”)、簏、叶、簙、籓、籛，皆指笔。颜师古以觚削木为之，亦竹木并用而已。又篆乃引书之意，籀则读或写之意，并皆从竹(参看王国维《简牍考》。其先当破其一端，如西洋之笔，后来细破其一端，如木匠之墨斗笔。由此进于毛笔，极为自然。毛笔大概是战国才有的，其先当为绘画之用；《庄子》所谓舐笔和墨是也。蒙恬改良，用以写字。汉末韦诞精于造笔(见《齐民要术》)。董作宾以甲骨文有祀字用笔之势，与今无异。英人叶芝(Yetts)谓铜器上细小之字，非毛笔莫办。但究为推测之词。墨之先当为漆。《诗》彤管，即为朱漆(《中华古今注》)。汉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汲冢书亦漆书。王国维疑漆书事，以漆书即墨书。但我以为天然之物，总早于人工之物。墨自古有朱黑二色。除朱漆黑漆外，亦可能用其他天然色彩，如所谓延安石液(《辍耕录》)。最初当为刻痕涂色之用，亦施于罪人。有丹书；《左》襄廿三年(前五五〇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墨刑更早。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墨须煮，故称庶黥(孙星衍《尚书注疏》引郑玄说)。墨而须煮，则中国古亦用墨水。于是以竹笔蘸之书写。墨水不便携带，乃有人造之墨。《田俅子》，“遗其丹书”。此丹书或后世银銖。《玉藻》，“史定墨”。《周礼》，“史占墨”。此墨当即桐松之烟炱，先和漆，后和胶者。春秋战国间制胶发达(原为制弓用，见《考工记》)，始概和以胶。墨子云，“书之竹帛”。漆不能书于帛。有了帛，一定有墨。大概战国时代以墨斗笔取墨斗中之墨汁书写。用此进于固体之墨。汉代墨犹多称墨丸。而隃麋(陕西汧阳)所产最精，韦诞亦以造墨名世，《齐民要术》载制墨法。等到有了纸，必须磨墨，于是有砚及矩形之墨。最初

之砚为瓦砚玉砚。研砚二字见张安世传班超传及《释名》。晋世始有石砚。

有不同纸笔，即有不同字体。今存最古文字，是甲骨文，此主要是盘庚以后之物（前一三四八——一一一一）。系刀刻，有作朱墨二色者。商代有若干铜器铭文，而西周以降，存世者甚多。毛公鼎是周公时代的。此系模范而成。次则石刻，以秦石鼓（前五世纪）最早。但皆特殊用途，非此外即无其他文字之意。除甲骨用于卜外，金石乃墨子所谓“恐其腐蠹绝减，镂之金石以重之”者。甲骨文中有册典字，则竹简起源极早，特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若以为甲骨金石文外，同时无其他字体，则为大误。汉世所谓古文，即是春秋以降书于竹帛之字体。

世人每以古、籀、小篆、隶、楷、行、草，或由甲骨而金文而小篆而隶楷，为一线相承之进化。王国维以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我相信鼎铭、书写，自古分途。凡金文籀文小篆隶书皆鼎铭系统，而甲骨文古文隶书，皆书写系统。中国文字只篆隶之变为一大变。而这是与竹笔之普遍使用有关的。至毛笔与纸之普遍，楷书草书才是可能的，自由的。

〔注一二九〕以经济解释历史，马克斯以前言者甚多，而太史公系最早看出经济重要者。系统论之者为阿拉伯史家伊本卡东（Ibn-khaldun，—140），近世则圣西门（S. Simon）、罗杰士（Rogers）及经济史家。马克斯主义之特点，第一乃“经济决定论”，此其婿拉法格（Lafague）所用之名词。此是夸张的。其次则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调和冲突，说明经济之变动；这是有见解的。又其次，则由此定下其“亚洲，古代，封建，资本”之阶段论，归结于社会革命。这是宿命论，机械论，且误西方政治史为社会史的。参看拙著《历史哲学概论》对马克斯之批评。

第一次大战后，法人施怀辙（Schweitzer）倡道德的世界观。以为文化有二重性质，即理性对自然之节制，及对人性之节制，亦即道德。生存之意志，对生活之敬仰，乃文化之第一要素。文明之全部意义，即提高道德。如道德崩溃，即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文明终必崩溃。他以此说西方文化之危机（“The Philosphy of Civilization”）。这是不错的。不过他的话含有神秘主义倾向，又以为科学无关于道德，则矫枉过正之言耳。

〔注一三〇〕周世有三夫人，九嫔，廿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之说。汉世天子多蓄嫔妾，先皆称夫人，及美人。元帝始加昭仪，倢伃，美人等十四阶级。昭仪位等丞相（《汉书》外戚传）。帝姑馆陶公主年五十，宠美少年董偃，偃复

导武帝淫乐。贵戚逾制,自董偃始(东方朔传)。光武省约为皇后贵人,及定选良家秀女之制。其初亦有强求淑哲之意,以后遂成淄蠹,而有桓灵之荒淫(《后汉书》皇后纪)。后宫至于数千。是以葛洪云,"但使后宫依周礼,租调不横加,斯则可矣,岂必无君乎?"

〔注一三一〕西北水利自秦人开之,新秦(朔方)之开垦,宁夏之秦渠,是也。汉武以主父偃计,继开朔方水利,复由赵充国开青海水利。番系之事未竟,唐人续成之,即龙门仓也。光武复整理太原水利。顺帝时在富平屯田。《水经注》:"河水东北经富平县故城西,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又宁夏有汉及汉延二渠。元人极重西北水利。明末刘献廷以西北水利为万世太平之本。东南水利始于楚吴越,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筑鉴河,亦一大工程。其后陈登亦于广陵修塘。参看郑肇经《中国之水利》。

〔注一三二〕汉代马政,似始于晁错说文帝:"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除公马外,私马在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平准书)。卫霍出征,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此养富强于民之效。太初时马高五尺六寸,禁出关。民间除传信外(汉世私人亦有驿,见昭纪),普通乘载,多用牛驴。宣帝外祖母王媪诣阙乘黄牛车。鲁肃云,"乘犊车",《后汉书》杜茂传,"驴车转运"。驴亦系西北来者。

〔注一三三〕丝锦文化与中国历史同始。黄帝以后,据禹贡,兖青均贡丝。《卫风》:"衣锦褧衣。"先秦实物,有长沙出土古坟土偶之服,其衣纹似为绣织品。秦汉之间,齐地丝织最盛。项羽谓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贾生言婢妾亦绣衣丝履。而由此传于外国,已见前。东汉时代,锦绣之襄邑(睢县),罗绮之朝歌(浚县),天下并称。而西蜀急起直追。李熊说公孙述,"蜀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东汉末蜀锦称天下第一。成都锦江织锦濯鲜丽,故称锦城。此则为诸葛抗魏之主要凭藉。襄阳种桑,而吴地之丝来自蜀。此今昔不同也。按帛(缯绢)为总称,细者曰缣,直纹有色曰锦,锦之作花纹图案者曰织成,斜绞曰绮,加刺曰绣,尚有绫、罗、绸、缎之属。

〔注一三四〕《中国通史》谓"据顾文荐《负喧杂录》,《汉书》地理志豫章出石可燃,考《汉书》并无这几句话"云云。此文明见《后汉书》地理志注引豫章记。

〔注一三五〕《日知录》:"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铜不充用,以铁足之,遂成风俗。"兵器由官主之,考工主作弓弩刀铠之属,存武库。尝禁民间挟弓弩。古有矢石,汉乃造发石车,曹操以此破袁绍。又有蔺石(城上之石),渠

答(铁蒺藜)(晁错传)。水师有楼船戈船,前者言其高,后者则轻便作战用者。三国时吴有"飞云盖海"。至王濬修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上可驰马。

〔注一三六〕历代对度量衡之统一,至为重视。汉世市官(市长,市吏啬夫)重要事务,即检查度量衡。度量衡沿革,可看《通考》及续书。大约周尺约今市尺六寸六分,汉尺约七寸一分,后汉官尺加长,约九寸。汉斛石略等,皆十斗,约百廿斤。(六朝以古五升为一斗。隋以古三升为一升。)《皇朝通考》云,律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合营造尺一尺,斛十斗,合二斗七升二合,斛一千两,合今五三一两。则五铢合一钱。又俞正燮《癸巳类稿》云,汉一斤合库平四两又三分之一。然则汉世石约合今民间十四斤斗二斗一升余。俞氏又云,"王制,古以周尺八寸为步,今以周尺六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卅步。秦开阡陌,秦地井田皆改,六国仍以步百为亩。东田,对秦田而言。武帝改东田,亩二百四十步"。又据欧洲日本人据汉唐所记域外道里数与今日里数相差不远。

〔注一三七〕汉世除中欧及西域贸易外,国境贸易亦盛。《后汉书》孔奋传:"姑臧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又鲜卑传:"顺帝时,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此西北之互市。又魏黄初时,轲比能帅其部落,驰牛马七万余口来交市。此东北之互市。又夷州澶州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孟尝为合浦太守,与交趾商货流通。此与番禺,永州,则东南西南沿海之互市。

〔注一三八〕东汉初桓谭云,"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第,为之保役。趋出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役"。因主抑商。其实此为抑商之流弊。桓谭通人,竟不解此。到了后来则有豪人货殖,而戚宦且公然"共"人之"产"。如梁冀事已见正文;又侯览之兄侯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者略亿计。"(侯览传)

〔注一三九〕汉世诸京都赋可见当时社会商业经济状况之一般。此以扬雄《蜀都赋》最早:"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雕镂铅器,百使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班固《两都赋》:"九帝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张衡《二京赋》:"廓开九市,商贾百族";"北燮丁零,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又《南都赋》:"推淮引端,三方是通"(指汝南江汉)。而左思《三都赋》最有内容:"使巧之家,机抒相

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蜀都）。“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吴都）。“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魏都）。

然而毕竟都是奢侈品的贸易为主。东汉风俗颇奢，观《潜夫论》浮侈篇可见。此一由社会富力之进步，亦由豪门僭妄。“今京师贵戚之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而丧葬尤奢，“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金”。

〔注一四〇〕汉世除山泽外，官田亦多。刘邦曰，“诸侯子及从军者，吾数诏吏先与田宅”。汉武赐苏武公田二顷，赐卜式廿顷，赐异母姊修成君百顷，哀帝赐董贤田千顷。又汉常分配田地与贫民。宣帝元年诏，“假郡国贫民田”，三年，“假公田贷种食”。以后元帝及东汉常有是诏。章帝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奉本乡者勿禁。黄香为魏郡太守，将内外园田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又土市住宅亦分配贫民。平帝元始二年，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安贫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之医药云。（《两汉会要》民政）

〔注一四一〕本章多对秦汉以前事略作追述。汉世之衣食住，除帝王贵族之绮绣，珍错，宫室，多另见外，兹略说一般衣食住状况如左，盖生活水准之一大变也：

关于食饮：太古自食鱼肉。其后农业兴。我国最古之食粮，殆为黍稷粟，稻可能起源于中国西南，大麦起于西北；小麦多半起于近东，系外来者。其后北麦南稻，由来远矣。此后佐食者普通蔬菜为多，食肉反不常。《左传》：“肉食者谋之”。孟子：“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矣”。然“鱼鳖不可胜食”，则食鱼者多。王制：“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古多羹食，和菜而脍之也。故有鼎，而匕较箸更为重要。和味之物，葱薤姜桂为荤（《仪礼》士相见礼）。又“水火醯酱梅，以烹鱼肉”（《左》昭二十）。酒则上古已有之。秦汉以来，肉食大盛。《盐铁论》云，“古者燔黍食稗，烨豚相飨。其后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燔炙满案。”又曰，“古者非乡饮酒，祭祀，无酒肉，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又曰，“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其后则有屠沽，沽酒，鱼盐而已，今熟食

遍列。”此食店也。炙食流行，此为貊俗。然通常仍多蔬食。王吉布衣蔬食，杨震蔬食布衣。又多吃两餐。晁错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而淮南厉王废后日三食，十人从居，日肉五斤，酒二斗，乃优待也。汉世群饮酒有禁，盖岁饥之事。酒有米，稷，粟三种。通西域后有葡萄酒。和味之物，“史游急就章乃有芜荑盐豉，秦汉以来始为之”（《左》昭廿疏）。茶始于蜀。顾亭林谓秦人取蜀始有茗。《晏子春秋》，“三戈五卵，茗茶而已”。晚采曰茗，早采曰茶。王褒《僮约》，“阳武买茶”，则已有茶市矣。甜食除蜜外，先有蔗汁（宋玉司马相如已言之）；后有甘蔗饧，由交州来（《吴志》孙亮传注）。汉世除葡萄胡瓜等由西域来外，由交州来之植物亦多，除甘蔗外，香蕉甘薯茄及其他香料等，其最著者。参看《博物志》，《南方草木状》，《齐民要术》，《本草纲目》。

关于衣冠：远古为皮服，卉服（草衣），其后为丝麻。然汉初丝麻尚未普遍，而是在汉世始普遍于全国者。卫飒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桑柘麻纻之属。崔寔为五原太守，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除丝麻外，汉世已有棉布。查《禹贡》，杨州贡“织贝”。传注多以为即吉贝。吉贝即棉花。然此当木棉，非能织布者。不过，《史记》所称榻布（货殖传），扬雄所谓筒中（蜀都赋），以及汉代所谓都布（马援传），所谓越布（独行传），所谓帛叠賨布（西南夷传），皆是棉布。而《梁书》武帝布衣，《南史》所谓吉贝、班布、南布，唐人所谓桂布，皆为棉布，尤无疑义。特元明以后，普遍种植于全国，且日益代替丝绸。至于冬服，为纩（丝绵）及裘。而古人穿裘，与西洋同，而与今日相反。诸夏发明蚕丝，特重冠冕衣裳之制。冠有方圆，衣裳分玄黄，天子冕服十二章，皆取象天地万物，此与乘舆、玉佩、佩刀、印绶，在封建时代，区别阶级，极为复杂；可看《书》皋陶谟，《仪礼》士冠礼，《周礼》弁师，司服，《礼记》玉藻杂记诸篇之注，及《后汉书》舆服志，《宋书》礼志，《晋书》舆服志及《图书集成》冠服部所绘天子九服王后六服及童子服等图。兹言一般者。覆头之物，有帽（小儿用），巾（包头）。礼服有弁，有冕。弁有旒者曰冕（天子十二旒，大夫五）。二者合称为冠。初以皮羽为之，后用布帛，加木铁为梁。古重冠笄之礼。天子之子十二岁冠，士廿岁冠。男女未冠笄者总角。既冠，“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内则）。以帛束发加冠。冠有卷，曰武（玄武）。冠带下结于颐下者曰缨、緌。带之上结于笄者曰纮（杂记、玉藻）。六国时代各国冠式不同。汉承秦制，有十三种。刘邦喜楚冠，以竹皮为之，状如鹊尾。然儒者多用古淄布冠，前高七寸，后高

三寸。庶人多用巾，帻(帻有作赤色者)。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武以天下凶荒，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以色别贵贱(《傅子》)。乃一种软帽，昔军中用之。是后加巾，自乘舆燕居下至士庶皆服之(《宋书》)。

自古诸夏分上衣下裳(裙)，尚宽大，外加带。然一般人民之服当仍较短。所谓"布衣短褐"。又少年亦然。《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其后儒家穿深衣，衣裳相连，一色，仍大袖。即一种短袍也。楚服则短。此至汉初犹然。《史记》：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短衣楚制"(叔孙通传)。内衣有衫有袴(即套袴)。古有抱腹。裤之有裆，据明张萱《疑耀》，起昭帝时。然胡服似有裆。楚人短服似亦有裆者。西汉有裈，其后裈裤相连，仍称裈，又称折裈。汉代文士之服宽大。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汉书》儒林传)。武士及工作之服窄。广川王去，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又李陵便衣，注云短衣小褎也(景十三王传，李陵传)。商人多白衣(《三国志》吕蒙传)。其后深衣普遍化。"孔子衣近今袍，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后汉书》舆服志)。此儒家破衣服之阶级也。

又古席地而坐，跣足为敬，故一般脱履兼脱袜(此俗至唐革)。平民多着麻屩木屐。墨子以跂跻为服(《庄子》天下篇)。汉世有靴，有履，有伏虎头鞋，有舄(即木屐)，有草鞋称"不借"云(《古今注》)。

妇女首饰有步摇冠，有五采通草花，有面花，有画眉，高髻广眉为美。粉古已有之，燕脂似由匈奴来者。《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可见当世时装。汉男子好装饰，有傅粉者。

关于住室：太古为巢穴。孟子所谓"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者。次为土木，大约起于洪水之后，再加石础。土指版筑，此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所谓筑室。而扩大于筑堤筑城。《古史考》云，"夏后时昆吾氏作瓦，乌曹作砖"。然"中国为陶之母邦"，陶器多从瓦，陶钧发明，砖瓦当无问题。夏商以来，已有台有榭。然大抵用于宫室宗庙明堂之属，而斗拱之制，翚飞之式亦起焉。一般居室甚简陋。标准格式，前堂后室，坐北朝南，堂东西曰厢，庙寝之地。堂北为阶，西南为奥，西北为屋漏，即天井。室普通二，多者三。中室曰中霤。春秋战国建筑趋于华丽，多造楼(上宫)。民间最简者三开间。晁错云"古之徙民也，为之筑室，一堂二内"。又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蓬户"。疏云，"一亩径一步，长百步，东西各十步"。方丈为堵，柴草为门

户。殆所谓阖庐。有床,上置箦。秦汉皇宫如《三辅黄图》所记,盛用金玉珠铜,极奢侈能事,一般亦较提高。普通是木架土墙茅屋。木即柱梁之类。韦孟诗:“翦茅作屋,筑室于墙”,此即所谓白屋草庐。《后汉书》酷吏传,“周纡筑堑自给”。时西北反多林木,地理志,“天水陇西民以板为室”。有院落,曰虎落。晁错论移民,“为之中周虎落”。江南多竹茅之屋。钟离意传,“帅人作屋,人赍茅竹,或持林木,浃日而成”。较好的房房用砖瓦木架斗拱,所谓精舍。普通用一种平瓦。此由石阙刻画可见者。砖瓦业大盛。《后汉书》杨彪传:“杜陵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普通三开间,大第宅有厢房。杨敞传:“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汉世三代同堂,屋必渐大。延笃云,“吾昧爽坐于客室,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轩即楼。马融见郑玄于楼上,则中人以上多楼居矣。仲长统欲“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矣。

〔注一四二〕汉人娱乐,常见记载与诗赋者为博奕,斗鸡,走马,角抵,击鞠,弋猎。《后汉书》梁冀传有:“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又《岁时记》有斗鸡卵,鞦韆。后者据云为山戎之戏。

〔注一四三〕长统谓少数人之廉洁无益于风俗。又云:“在位之人,有乘弊车食菽藿者矣,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有过客不敢酤酒者矣,有还俸禄辞爵赏者矣,莫不以为清高。好节之士,有妻子冻馁而不纳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而上漏下湿者矣,有穷居而不可得见者矣,莫不以为高洁。然不可以言中也。世之所以高此者,古制休废,时政不平,直正不行,诈伪独售。世俗知节义之难复持也。背道驰奸,彼独能介然不为,故见贵也。如使王度昭明,禄除从古,向所称清邵高洁者,将以何矫厉哉?”又云,“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何得不破坏耶?”(《群书治要》)

〔注一四四〕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有如史公论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秦行统制经济,以灭六国,亦以自灭。汉初矫之,一时实为放任政策。及武帝伐匈奴,又采取统制政策。其流弊已见前。卜式在政治上反对统制,太史公在思想上反对统制。其传货殖,以为“不害政,不妨民,智者有取”。昭宣以后,乃半统制政策,而权门乘机货殖,贫富日益悬殊。班固见其害而未察其源,以“均无贫为言”,其传货殖,以为“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伤化败俗,大乱之道”;并怪史公“崇势利而羞贫贱”。此马班最大之不同。此亦汉代儒家思想之趋势之一变。其实史公之所取者,固非班氏

之所非者。然自《盐铁论》以至班氏，儒家非难货殖之见，竟日见固定矣。

〔注一四五〕“三通”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最后出，内容最善。然郑樵《通志》之列传，亦极可取。本书体裁，一二章相当于郑志之本纪列传；第三章相当杜佑《通典》之边防，郑马书之四裔；第四章相当于郑之六书，“三通”之食货，而风俗则本章所增；第五章相当于礼，州郡，职官，征榷，国用，选举，学校，兵刑之属；第六章相当于经籍，艺文，乐，郊社之属。有所略，然关于人民权利，哲学科学，及与并世比较，亦有所详也。

〔注一四六〕尹文子云，“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狭义之法，指第三种。此对内曰刑，对外即兵。《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左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故司寇与尉，为军官，亦法官也。班书将兵制列于刑法志，即由此。

〔注一四七〕按希腊人之法，极似中国之礼。“希腊人之法，实与宗教道德舆论合而为一”(Butscher 语)。柏拉图之《法律》(Leger)为晚年之作。其内容较《国家》(Republica)尤为广泛。其论法，以道德为归。道德有人德、神德。神德为和平法，人德为战争法。神德为知，慎，正义，勇敢。最高立法，应本神德。所以使民知德者，为教化。教育即德化。教育之始，为乐。他以法即理性。唯终有强制之义，故又分法为二种，一为威吓，二为威吓加劝导。劝导者，在劝人行中庸之德。尤须敬人敬己。柏氏又主张限制财产。国家之官吏，应先受教育而后选举之。结婚十年无出子，可以离婚。不过，对于不从顺之奴隶，应用刑而不用法。对于儿童教育，应注重射，御，礼，乐，数，与天文。诗歌应以颂为主，俳优乃低等艺术。但最优良之市民，则应超越法律而服从道(Logos)。最后专论刑法，而主张市民，夷狄，奴隶，轻重不同。犯渎圣，叛国，杀亲三罪者，凡市民皆处死，外国人及奴隶则加笞，投诸四裔云。

〔注一四八〕《史记》首列礼，《汉书》礼次于律历，《后汉书》、《宋书》同，《晋书》则次于天文地理。太史公将礼与封禅分开，班固将礼乐与郊祀分开。《后汉书》之志，本蔡邕十志，应劭谯周亦缵其业，至司马彪为《续汉书》，总为八志。皆为名家，非同凡手。关礼者，分礼仪，祭祀，舆服，而礼仪主为王礼。沈约《宋书》，又将范书三者合而为礼志。唐太宗主撰《晋书》，则据《周礼》吉、凶、军、宾、嘉五礼为言，而以祭祀归于嘉礼。杜《典》郑《志》亦然。然以

五礼包含诸礼，实甚牵强，故《通考》再分为郊祀，宗庙，王礼，实甚合理。唯以明堂即郊祀，则与郑玄之说不合。又以为民间士庶之礼，文献不足，未加整理。此实为缺憾。此今后言礼史者所最当留意者。然亦可见谓中国为礼治，亦过甚其词也。

按古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家打破后者。儒家之兴，除普及教育在学术上政治上发生一般影响外，对社会礼制上之影响尤大。最重要者有二：一是促进礼之人文化，二是扩张礼下于庶人。

古代之礼，包括祷、祠、祭、祀，班朝治军宦学事师，教训正俗，道德仁义，篮及律历度量衡，昏丧庆吊之事（曲礼）。文化进步，礼逐渐分化，同时又皆合理化。此三代之一般趋势。

在这一点，墨子实代表传统的信仰。他以为上有天，中有鬼神，下为人。他以为国家亦为上帝所立。“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政长也，非富贵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也”（尚同）。他心目中上帝相当抽象化，一元化，然鬼神则是很多而也很具体的。“三代圣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立以为蕞位，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择六畜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择五谷为酒醴。其务山川……鬼神厚矣。……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赏也必于祖，僇也必于社”（明鬼）。这是神权政治形态。墨子以为世乱即三代以后大家不信鬼神之赏善罚恶。事实上，三代以降，古代天地鬼神之祭，渐弃神权之意，变为“大报本返始”，“大功配食”之义（郊特牲，祭法，祭义）。而儒家乃发展这一趋势的。（至于道家，则一面以自然否定天，唯以仙代鬼神。）

古代人殆皆祭天神，地祇，人鬼。《尧典》所谓上帝六宗（岁时日月星辰之属），指天神，山川群神指地祇。其后各部落领袖亦追配之。古之五帝，殆指上帝及四方之神，其后各部落之先亦升为帝即所谓人帝。其后又有佐五帝者。此即《月令》之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及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后五佐，皆颛顼少昊之子（据说勾龙先为后土，后升为社神，火神黎代之）。其后唯天子祭天，而以其祖配之。《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又“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祭天地皆于郊。《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方丘奏之。”郊丘实为一（王肃说）。宫室既作，乃有明堂，此郊祭之延长（马端临本诸儒说）。《孝经》：周公郊祭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然郊祭仍保存，封禅亦有遗制；唯延长举行之时间耳。古之蜡（见郊特牲，此或后世禁字由来），即是地祭。宫室既作，乃有社稷之坛。所祭实即土神。而稷即五谷之神（《后汉书》祭祀志引仲长统说）；亦以有功者配之，如"炎帝死为灶，禹死为社，后稷死为稷，羿死为宗布"（《淮南子》，宗布一曰祭田，又曰司命）。又共工氏之子勾龙为后土配社，烈山氏之子农（又曰柱）能殖百谷，后以周弃继之，祀以为稷（祭义及《后汉书》祭祀志注）。然山川之祭仍保持之。司命中霤户灶之神亦其遗制。有大社（王族），有王社，有国社民社。汉郡县皆有社稷。城中亦有社。汉初刘邦令天下立灵星祠以祀后稷。盖以后稷配食星（天田星）也。一说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也（《后汉书》）。汉代民间多祀司命之神，刻木，尺二，为人象，行儋篋中屋作小屋（《风俗通》）。此后世土地神之由来。城亦有社。《易》泰卦："城复于隍"。两都赋："京师浚城隍。"《古今注》对"城隍庙"三字作注解，或已有城隍庙，至南北朝有城隍神。然王者仍有其直系之祖先，此则宗庙所祭。古代社稷宗庙并称。《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庙本祭祖之处（庙训貌），古以尸（以子孙立如尸），后以主（木主），汉有象。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有庙祧坛墠之制，所以序昭穆祖考。而礼有禘祫（皆大合祭，三年曰祫，五年曰禘）。士庶无庙，亦祭于寝焉（丧服小记，祭义，《后汉书》张纯传）。汉末以后始以庙为祭神之所。西汉初，一时人神杂糅，然由于儒家影响，礼祭又再告分离。不过互相影响亦是必然的。《后汉书》于礼仪，所述为合朔祭日，立春报春，行耕蚕之礼，养老之礼；立夏请雨，贺太子，立秋貙刘（射猎），案户（敬老），行腊礼及傩礼（逐疫）。皆涉时令。此外则朝会及王家冠丧礼。此一部分为古代祭礼之遗，而太半乃关实际生活者。《后汉书》于祭礼，则包括即位告天，郊祭五帝山川之神灵，以刘邦配食；明堂亦然。此外则宗庙社稷之祭。学校祭先师之礼甚早。祀孔始于刘邦。章帝于宗庙增祀孔子，汉末增祀老子。此古代祭礼之本务，而又受礼仪之影响者。而民间亦常祭有功德者，如卓茂、王涣皆有祠庙。由于古制之累积，各方礼祭之混合，以及礼祭之分合，这是古代礼制难于详别的原因。东汉以降，祭天之礼渐渐仅为形式了。

儒家对礼制另一最大之影响，为破礼之阶级，即一面推士礼于天子，一面广士礼于庶人。衣服之标准化即其一端。两汉以降，冠、乡、射、朝聘之

事,已不能泥古,然昏丧之礼,尚多沿自古代,而六朝人尤重之。古士庶无庙,而汉人则有祠堂。此或靡费,然祭礼之平等,亦大事也。社之普遍,节气之集合,亦有民主意义。汉代一般社会礼俗,《白虎通》,《风俗通》,《独断》,《四民月令》,《博物志》,《古今注》等书,颇多资料。岁时节气,除新年久远外,清明、端午、中秋,上古已有之。水滨禊祓腊鼓鸣春,金刚逐鬼,孔子时秦地已有之。端午始于楚,寒食始于晋。元宵之俗,已始于汉。葛洪《西京杂记》:"元夕燃九华灯,照见百里。"又小年,人日,七七,重九,已皆有之,见《荆楚岁时记》。墓祭送丧,亦至汉而大盛。又秦汉称呼,口语,谚语,其见于《史》、《汉》及汉人书中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辑有一部分,亦颇可见当时风俗者。如称呼:先生甚普遍,但常单称先或生;君臣为一般敬语谦称,不限于君臣;对人主亦称足下,朋辈道贺亦可呼万岁;受业称弟子,再传曰门生。如口语:不中用,多谢,阿玄之称已流行,打喷嚏曰"人道我"。如"不知其人视其友","水至清则无鱼","骄子骂母","唇亡齿寒"等,皆秦汉之谚语也。

〔注一四九〕吕氏灭后,刘氏诸侯,王,始日专横。始主抑诸侯者为爰盎,次则贾谊,次则晁错。于是吴楚七国反,而爰盎竟以私仇主张杀错。然七国并不罢兵。幸终为周亚夫所破。武帝即位,为"推恩令",即细分诸侯子孙;及淮南王衡山王反败后,为"左官律",仕于诸侯者为左官;"附益律"乃取缔诸侯滥征赋税者;"酎金律"乃责成诸侯献黄金于宗庙者。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干政。自是以来,虽有如八旗子弟,为一寄生集团,封建问题,遂告解决。此之谓强干弱枝。此是有益的。然君尊臣卑,亦由此起矣。

〔注一五〇〕十三部据《汉书》地理志,则禹贡九州外,增幽、并、交趾、朔方,改雍曰凉,改梁曰益。据《晋书》地理志注,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其后置司隶,察三辅、三河、宏农,是十有四部。成帝时省司隶。始更十二州名,即冀、扬、青、徐、兖、豫、雍、益、幽、并、交、朔方属并州(扬雄十二州箴)。而汉志于三辅未属州。建武时复司隶,并朔方于并州,仍为十三部。

〔注一五一〕据两《汉书》两汉人口统计,每户平均四口至七口。日本《汉学会杂志》三卷一号载牧野巽《汉代家族之大小》,以为汉代家族人口甚大,疑当时户口统计或有未充分计算老幼奴婢人口者,因而未必十分确实。该文搜集汉代家族史料甚丰。在家族中,大体为家族共产主义。父在子分家,名曰生分,为世非难。但父死兄弟多分财,而以平均为原则。普通同居,至

从兄弟为止。按家族制度之大小与儒家学说有关，亦与农村社会及治乱有关。在农村社会，如世太平，自易有同居倾向。而儒家学说又促进之。故汉世初为小家庭，其后有大家族。有同居同财，有异居同财。《风俗通》云，“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财，下耳。”三世共财，传为美谈，亦可见大多以两代为常也。

〔注一五二〕“部曲”之名已见李广传王莽传，三国时常见之。《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则后世旅团营之意。所谓奴婢、宾客、部曲，常不分。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奴谓“宁作民有爵耶，将止为刁氏作奴乎？”(《汉书》货殖传)此不妨奴而有钱。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杀之。主诉光武帝，帝大怒。宣曰，愿一言而死。陛下中兴，纵奴杀人，何以理天下乎？(《后汉书》酷吏传)此奴而有势。可见汉世所谓奴，指工人、经理，及家中仆人也。

〔注一五三〕自陆贾、贾谊、贾山、晁错、董仲舒以后，汉人此类言论，充满两《汉书》，即帝王亦承认。汉世诏书，无不以天心经义祖制为言。然又如第五伦所云“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改，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臣下不称故也。”自爱者之俭德，无益于奢贪；公认之经义，亦无益于败政。此非臣下不称，实缺乏一种制度，能实际否决帝王之命令，罢免政府之官吏也。

〔注一五四〕汉官制多沿秦置。而秦之官制，多缘周室及六国之官。如丞相，六国有之，尚书，齐有之，尉亦古制。庶子，大夫，周有之。郎中，齐楚赵皆有之。参看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二章，施之勉《古史摭实》。

一切制度，都是有因有革的。中国古代制度杂见古书，《周礼》虽详，只足供参考，到两汉才有详细记载。此汉制最值得研究之一点。故以《左传》为中心，上考《尚书》，下推秦汉，参看“三通”资料，亦研究秦汉以前制度之法。大概说来，古代制度可分三期。一为教权时代，亦部落同盟时代。二为封建时代，亦贵族诸侯时代。三为统一帝国时代，而战国为过渡。而其背景，则为文化之统一，扩大与提高。

在官制上，教权时代，政权在主持天文农业工艺者之手，其后有刑法之官。到封建时代，渐变为司空司徒司寇之官，而昔时天文专家，成为太史，在顾问地位；民政之长的宰相，和主兵的司马最为重要。所谓三公，当是元老性质。相制之真正确立，或始周公。自此体制渐复杂。此由《左传》所记官

名可知。然《管子》云，"主明，相知，将能，谓之参具。"楚庄王谓孙叔敖曰，"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可代表春秋时政治权力。白圭曰，"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是战国时相权已重。而随贵族制之衰，乃有郎中成为官吏之主要候补者。秦汉则将战国各国之制扩大于全国。"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言天下事无不统焉。故丞相见天子，御座为起"(《通考》职官考)。

在财政上，最初只有贡，此指人民对诸侯，诸侯对天子所纳礼物性的东西，故为税之总名。后有赋，即田赋。这包括什一之田税和力役。其后才有税。税原指山林关市之税。及"井田"之制废，分为二大项：一为税，此包括田税——自秦舍地税人，十一之税变为田租；以及山林商市之征收。前者供行政之费，后者供诸侯王私人之用。二为赋，包括军马徭役，力役。战时服兵役，供军需，平时人民服役三日。孟子犹希望"耕，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市廛而不税，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以及"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然由于行政机关扩大，尤其是军需浩繁，战国赋税加重，而秦又为领导者。除山林关市之税增加，盐铁渐为专卖外，租赋都加重了。又由于舍地税人，于是有户口之赋。汉代依然如此。后来租庸调亦由此变化而来，至唐之两税而一变。

在军政上，《周礼》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五人为伍；军将师帅皆卿大夫，百人以上之长为士。这大概是传统制度。春秋时代，车战为主，步卒随之。一车多少人，其说不一(看《周礼》,《司马法》,《孙子》)。其实各国办法，也未必一定，又因时而不同。其后兵员扩大，步兵地位渐重。晋作州兵，扩六军，毁车崇卒。郑有偏伍之法(二十五乘为偏)。楚除正军之外，又有二广之亲军(十五乘一广，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十五乘为大偏，一广十五乘，百二十五人从之)，游阙之游兵，以及舟师。而秦在殽之战，有步兵三军，军三百乘，陷阵三万。此可见减车加步趋势。到了战国则步车之外，骑兵又重要了。终于车为骑所代替，同时，铜兵器为铁兵器所代替了。关于征调之法，在周代是与田制不分，每家中一人，十井(八十家)出一车。人民轮流服役。一人从军，七家奉之。楚调卒之法，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及战争频繁，轮调也频繁了。"魏之武卒以度取之"，是专门武士，亦募兵之始。秦则以秦人任战，客人任耕。并因需要，以秦人任将校，普征客民为兵员。秦末骑兵万人，动员人数达二百三十万了。汉代行普遍征

兵制。唯将校仍以六郡子弟为多，盖精于骑射也。

〔注一五五〕汉世丞相可“封还诏书”，即拒绝皇帝命令（《汉书》王嘉传）。《后汉书》百官志有太尉所设诸曹：“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迁除，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辞曹主辞讼，法曹主邮驿科程，尉曹主卒徒转运，贼曹主盗贼，决曹主罪法，兵曹主兵，金曹主货币盐铁，仓曹主仓谷，黄阁主簿录。”此当承相府旧制。

〔注一五六〕据《通典》职官：“惠帝时遣御史监三辅郡，察事凡九条。文帝时遣丞相史出刺，并监察御史”。《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六条：“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任刑任赏，烦扰苛暴。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五、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二千石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此亦考课之始。《汉书》百官表“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此与赐尚方剑者同类。然此决不是办法。而此辈中自良莠不齐。至明之锦衣卫而害益大。

〔注一五七〕两汉中央与地方制度，一变于武帝，再变于成哀，三变于光武，四变于灵帝。其在中央：丞相秦二人，汉初一人，后二人。哀帝时改司徒。太尉，武帝初省之，后置大司马。御史，成帝时改大司空。自霍光以大将军辅政，皆加司马衔，位次丞相，权则过之（“幕府”、“关白”之词亦始此）。此相制之一大变。成帝时，何武主张建三公之制。后三年，即哀帝初，朱博以三公职事难明，愿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后三年，为位置董贤，又复大将军号。至光武，改三公为三司，太傅一人为上公，不常置。同时，则扩张尚书之权。西汉尚书四人为四曹，一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事；户曹尚书，主士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增三公尚书，主断狱事。东汉有尚书令，仆射，代常侍尚书事，尚书六人，增吏部曹主选举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八座。侍郎三十六人，分隶六曹，主文书起草。此相权之又一大变。灵帝时，吏部称选部。魏世三公有名无实，尚书成为政府。至于地方政府，武帝初设十三刺史。成帝时，薛宣以刺史侍权苛细为言。何武翟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至哀帝，朱博既奏复御史大夫官，又力主复刺史之制。其后三年，又复改州牧。光武复十二刺史及司隶。灵帝时，刘焉始主改置牧伯，虽所改仅豫、益、幽、荆、冀等州，然刺史亦无不兼兵。此刘昭所谓“靡灭群黎，流祸百世”者。

由此可见，三公州牧纷更皆由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私，非为国家作万世计，此所以终于以乱济乱也。人选由地方，法令出中央；军财大事必统一，特殊情形任小异：其治大国之道乎？

〔注一五八〕汉世黄金多，而后世渐少，顾亭林以为由于佛像涂金，泥金写经，帖金作榜等事。然此不过原因之一。流入西域，及经豪门而流入民间，亦为二大原因。

〔注一五九〕观韩信"贫无行不能推察为吏"，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则秦世已有察吏，征召之法。而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秦之考试制。特秦所试为法，而汉所试为经而已。任子、任赀，或亦始于秦。

〔注一六〇〕孔门有四科。汉人取士，立诸科目，贤良最早。科举之名取义于此。日人译科学二字，亦仿此。

汉人仕进之途，可看《通考》。其以学问入官者，则贾谊董仲舒等以博士，晁错以太常掌故，兒宽萧望之以博士弟子，匡衡梅福王章以郡文学。

〔注一六一〕据《两汉刊误补遗》引晋灼说，西汉无太学。马端临对西汉是否筑宫以居学生，亦有疑词。其实汉人官宫通用。天官即天宫。所谓学官，即是学宫，学馆之意。文翁修起学官，注谓学之官舍。又韩延寿修治学宫。又鲍宣得罪，博士弟子举幡太学下。此西京有太学，殆无可疑。又《三辅黄图》云，"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又《三辅旧事》，"汉太学中有市有狱"。

〔注一六二〕博士始于战国。《史记》循吏传，公仪休为鲁博士。其时当已有博士弟子。《汉书》贾山传，"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沈钦韩疑弟子二字或系衍文。其实古代传学多口传，有博士即有弟子，乃甚自然者。

〔注一六三〕对策者，乃长篇问答。汉武纪："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射策者，《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设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射言投射也"。又《后汉书》徐防传奏云，"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五经各取上第，《论语》不宜射策"。即专试章句。

〔注一六四〕私人学校，孔子以来，即有之。西汉其故居素为学者习礼之所。西汉私人讲授有明文者，有疏广、翟宣。又吴章弟子千余人（云敞传）。后汉杨厚、曹褒、楼望、张玄，弟子皆数千。郑玄数千，蔡玄弟子著录者万六

千人。是时已有同学录也。尚有居官不废教授者，如翟方进、伏恭、张奂等。

〔注一六五〕汉人六经中，《易》与《春秋》，最为重要。盖一言天道，一言人事；一本隐之显，一推见至隐（皆史公语）。换言之，一为自然哲学之基础，一为历史哲学之来源。关于前者，先有《易传》淮南子言易，继有孟京之易，继有扬雄之易。关于后者，先有陆贾之春秋（《新语》亦名《楚汉春秋》），继有董仲舒之春秋，继有太史公之春秋之学。至郑玄，则特言礼。此两汉思想之标志也。

〔注一六六〕《易经》以八种基本物象对待之理说六十四种变化中之利害，《洪范》以五种物性物能生克之理以求正直，为不同之系统。自五星之研究日明，邹衍倡阴阳五行之说，说循环之理。《易传》受其影响，扩大八卦系统，说消长之理。八卦以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象征万物，而不言五行。至《说卦传》以乾为金，巽为木，而坎离为水火，始以八卦包五行。又《序卦传》言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亦非拥君权者。邹衍重在说历史循五行（五德）转移，而《易传》认"盈天地间皆万物也"，而以阴阳之生生消长以说明之，其说实较五行说为胜。故易，阴阳，五行本非一事。不过后来合流以后，儒家及象数派用以说政治，道家及方士用以说自然。

〔注一六七〕《汉书》高帝纪，"张苍定章程"。如淳注：章，历数之章术也。程，权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师古曰，程，法式也。案：如说是。

〔注一六八〕夏曾佑云，"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皆谓黄帝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元女经（名见《抱朴子》，书在《道藏》），备列占岁利，月利，嫁娶，祠祀，妇人产，吏迁否，六畜，囚系，远行，田蚕，市贾马牛，奴婢制新衣，子弟事师，恶梦，葬等家庭琐事。书有功曹，廷椽，诸侯，将军二千石，令长等言，皆汉时名物。是必汉时民间日用书，黄老学者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案，即此等书，似当较治身之黄帝书为晚出。

〔注一六九〕两汉言黄老不言老庄，有之，唯《淮南子》"考验老庄之术，以合乎得失之势"。至魏晋，老庄始不分。

〔注一七〇〕眭弘（孟），少好侠，修春秋，而云"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宜择天下求索贤人，而退自封百里"。此可见原始今文派之见解。特后来博士渐趋迂拘耳。

〔注一七一〕《后书》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按与太史太祝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

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则待遇亦薄矣。

秦之博士甚多。汉初博士亦较广，赵岐孟子题辞云，“文帝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注一七二〕《汉志》于六艺中，几乎每一种经都列古经与经，经指今文。计：《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经二十九卷；《诗经》二十八卷，毛诗二十九卷；《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十一卷。又《论语》、《孝经》，亦有今古文。其经历可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或《隋书》经籍志。并参考沈钦韩《两汉书疏证》。

按秦焚书不及《易》，故今古文仅数字之差。今文易说已亡，仅存《焦氏易林》一书，且有问题。唯清人有辑佚。今易由古文费氏之底本。

《书》，除今古文篇同者，文字有七百余字之不同外，古文较今文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加序一篇，故为四十六篇。现今古文皆存。

《诗》，今古文无差异，唯训释不同。今唯毛诗完全。今文三家说清人有辑佚。

《周礼》为古文，缺冬官，以考工记补之。

《仪礼》十七篇，今存。是今文古文除十七篇外，多三十九篇，有异字，是为逸礼，今不存。

《记》百三十一篇，后又得《明堂阴阳记》五种，共二百十四篇。其中包括大戴（德）记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小戴（圣）记四十六篇，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即今《礼记》。今古二派均无异词。

《春秋》，仅三传大异，又今文经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

《论语》，有齐鲁古之别，齐论多二篇。张禹以鲁论为主，合并今古而成今本。

《孝经》，古文多四章，现本为今文本。

今之十三经，《礼记》、《尔雅》、《孟子》，无今古问题。《仪礼》、《公羊》、《穀梁》、《论语》、《孝经》，皆今文本。《易》，《诗》，《春秋》，《左氏》经传，皆古文本。《周礼》唯有古文。《尚书》亦古文本，但又有极复杂真假古文问题。详后。

又案：经当本线装书之意，其后义始尊。汉人但有六艺六经或五经之说。东汉人已加入《论语》为七经。唐人于《诗》、《书》、《易》，外加“三礼”、三

“传”，为九经。而开成石经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宋人加入《孟子》，而有十三经。今十三经注本，《诗》毛郑，“三礼”郑，《公羊传》何，《孟子》赵，皆出汉人；《书》孔，亦汉人；《易》王，《论语》何，三国人。此外《左传》杜，《穀梁》范，《尔雅》郭，晋人。《孝经》，唐玄宗。

〔注一七三〕罗素在《西洋哲学史》罗辑分析派之章说：“自毕达哥拉以来，哲学上即有两派对立：即其思想主要受数学启发者，以及更受经验科学影响者。柏拉图，亚奎那，斯宾挪莎，和康德，属于数学派；德谟克利图，亚理士多德，以及现代自洛克以降经验论者，属于反对派。”前者可谓广义的象数之学。

按毕氏亦讨论幻方，提出勾股定理，并以音乐与数及自然有关知名。而《周髀》最早部分，在毕氏之前五百年。律历度量衡同论，以及两种黑白点子幻方图（宋人所谓河图洛书）恐怕要早到二千年以上了。故欧人有谓毕氏是受中国影响的。

此象数之学，与邹衍之说不同。邹衍不言数，他无宁是属于经验派的。

纬书如下所言，实为占星之学，乃五星发现以后之事。自此天文学进步，必用历算专家，即所谓畴人。阮元《畴人传》引谈泰说，谓畴有四义：类也，家家世世相传也，同类之人俱明历者也，畴昔知星之人也。谈氏据汉律“计二十三传之畴官”，取第二义。秋案：其实，四义皆相通也。《国语》言“井田畴均”，畴人或本指统计田亩之人。其后筹策为计算之具，如是算者称为筹人。畴筹相通。九畴之说，与九数有关；亦畴人之发明。及天文发达，必用筹算。他们附于史官。然为专门之学，故家世相传，如太史公是，然其他行政，亦多用算者；故军事亦有畴人。汉律所谓“传之畴官”，正是 Logistics 之本义。参看以下论天文历算之节。

〔注一七四〕日本三上义夫著《中国算学之特色》，据中国古算字作示，又二十作廿之类，以卜筮与算筹有关，算筹或在书契以前。又据墨子“一少于二，而多于五”，及《左传》史赵谓“亥二首六身”（襄三十），皆为算筹排列，以至少墨子时已有筹算；均见读书之细心。不过我想卜算是两个系统。当龟卜之时，用圆石计算。而两种幻方，可看作他们排列算石之基本格式。其后有筮卜，同时则有筹算。由于卜筮可以代替算筹，春秋以后逐渐合流，也是很自然的；此由《易传》“大衍之数”可以见之也。

〔注一七五〕汉人所谓图书，指八卦九畴，然幻方之类算数技术，仍存于畴人之手，此两种幻方，他们称为大衍九宫，并不称为图书（参看《数术记遗》

甄鸾注）。不过后来纬书有河图洛书为名者。这些纬书传于道教徒之手。故陈抟以后，宋人又以幻方为图书矣。

〔注一七六〕然此无碍新柏拉图主义以及通神学和魔术，促进西方文艺复兴乃至近代科学。按自一世纪后，希腊之克己派快乐派渐衰，基督教渐兴，亚历山大城哲学，大抵为希腊哲学及东方宗教术数之混合物。先有新毕达哥拉派，后有菲伦（Philon，25BC—50AD），皆以犹太人之神（God）与希腊之"道"（Logos）结合。到普洛丁（Plotinos，204—269）组织新柏拉图主义，著《九论》，表示对基督教之反抗。他不承认神，神不可说，即泰初，强名之曰"一"。由此顺次"流出"精神，灵魂，和物质。此派又唱"静"、"动"、"复"之三阶段说，为黑格尔之辨证法之祖。基督教先迫害之，以教父哲学为唯一哲学。五六世纪间，叙利亚教父哲学以基督教义与新柏拉图说混合；而罗马教会则努力于基督教与亚理士多德之结合，此为学究哲学（Scholasticism）之来源。其后阿拉伯人犹太人以新的知识发展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给与学究哲学以启发。至文艺复兴期，由于教会奉亚理士多德，故人文学者首先提倡柏拉图。近世各国"学院"由此而起。继而人文学者为教会所压迫，于是人文派进而研究亚理士多德，唯不依教会之解释而已。同时，阿拉伯哲学促进秘密科学——炼金术占星术之发达，罗杰培根（？—1294）即其代表。文艺复兴期哲学，精神在探求自然秘密。而最初努力，实为通神学（Theosophy）。此实基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如求得自然秘密，即可制服自然。于是通神学进而为魔术。当时自然哲学家如库桑（Cusamus，1401—1461），巴拉塞（Paracelsus，1493—1594），都是这一派的卓越代表者。他们始有无限观念。直径无限延长，即圆周，无限即神云。而号称德国哲学家之祖的贝姆（Boehme，1575—1624）则又回到神秘主义。这是文艺复兴期思想之真相。培利云，"直到哥伦布，麦哲伦，哥白尼，刻卜勒，加利略等人的新发现相继问世，思想才得到最后的救援"。（R. B. Perry，"History of Philosphy"）

〔注一七七〕《史记》注张晏云，"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兵书，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靳、蒯列传"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芜杂鄙陋，司马贞所谓"非才妄续"。不过其中仍有史公之笔，非皆褚文。据自序，律书论兵权，故张说有据。律书一部分当为兵书文，一部分应入历书。

〔注一七八〕对中国此一最光辉时代之最光辉天才，只作如此简述，乃欲

另作一书说明他。此处且补说数点。一,他综合当时知识,但超过同时任何人。他受陆贾贾谊影响,但他将历史概念扩大不知多少倍。时,扩张到黄帝;空,扩张到东海大宛了。他受董仲舒影响。但他对"天人之际",求合理解释;而又加上"通古今之变";使天子诸侯以及天与帝王的春秋之学,变为全人民和全社会的史学了。二,历史扩大以后,他以黄帝为本纪之首。孔子为世家之殿,夷齐居列传之先,乃是以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为历史中心。他是以他的大作,从此使帝王不能作历史之主人了。三,兹引沙畹在其《史记》法文译注序言中论史公几段话如下:"人与民族皆到成熟期,始反省其过去。此史学登场甚迟之故。司马迁在其时代影响之下,也在其上。对外而言,张骞唐蒙之出使,代表真知识革命之黎明。司马迁乃第一个对异民族作客观纪述之史家。对内而言,秦始皇始统一中国,而汉代乃在确认公民权利基础上建国者。当时权力,不在贵族,而在有知识者之手。自此中国历史非帝王历史而为学者为主历史,此司马迁对于经济礼仪土木特别注意,而在帝王本纪之外,加上著名人物列传之故。他对资料引用,极端慎重。怀疑乃科学之进步。这是困难的。他在一世纪之初,即已有怀疑精神之充分判断力。今以此赞词献于司马迁,当知此实非常之赞词。"这是二十世纪西洋学者对二千年前我国学者之言。国人有于汉代仅言王充者。其知东山而不知泰山乎?

〔注一七九〕扬雄《太玄》虽拟《易》,然他以"圣人以人占天",则是要使象数之学与神离开。他在天地之外加上人,在阴阳二力之外,增加了一个玄;一切以三九来说明。他之所谓玄,指一种平衡的力量,以说明物极必反之理。而在处世态度上,主张"修德俟时"。他以自然人事,都依玄之原理,初中终的过程,和三百六十四日半之数理旋转。他确定浑天说,促进历法改革,并提出无限的观念。在这一点,他极像文艺复兴期之库桑。库桑影响布鲁诺,他是近代再度提出"原子"式或"玄子"之人。而此二人,又是影响莱布尼兹者。扬雄亦影响张衡和以后理学。只是后来从事秘密科学者,多为道家,而他们没有很好的头脑。而儒家多半研究到天文历算为止。实验的观测和数学的推理,没有密切结合起来,才使中国科学没有达到加利略之高度。

〔注一八〇〕今《书》孔传,东晋初梅赜所献。《经典释文》谓王肃注今文而解与古文相类,或私见而秘之。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史谓皇甫谧得古文尚书,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此《书》孔传自宋代吴棫已

疑之，至阎若璩力攻其伪。而上述三人，成为伪孔传之嫌疑犯。毛奇龄说孔传为伪，古文仍真。焦循以为晋世有心人作，阴与竹书相抗者。日本武内义雄以孔晁字安国，即其所作。陈梦家据《晋书》以东晋另有孔安国，“承诏作传”，非有意作伪，特后人误为一人而已。案《晋书》荀崧传已提到《书》“孔氏”，故梅赜伪作之说已渐不成立。郑玄与弟子问答之《郑志》亦有引《书》古文者，是此书在王肃之前。王肃系注今文，皇甫谧《帝王世纪》引《书》古文处甚少，而不同处反甚多。又孔传论天象多本三统历，所说亦有与王肃皇甫谧不同者。则王、皇甫伪作之说亦未可信。钱熙祚云，“魏晋之际，真古文未尽亡，好事者搜集遗文，重为补缀，盖不出于一人，亦不出于一时”（《帝王世纪》序）。此说甚是。此补缀工作，东汉末已有刘陶为之。魏晋间荆州学派（宋衷司马徽等）作《五经章句后定》，乃经学一大综合。由于《书》孔传之有根据及颇多民权大义，我相信郑玄以后，王肃以前，只有他们有此识力。但他们只是补缀旧文，决无意作伪。只是今孔序断非武帝时之孔安国作，而文亦卑弱。此则如非孔晁等之有意欺人，即后人之自致误会，谬为蛇足耳。详续卷。

〔注一八一〕《后汉书》方术传序云，“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张衡不信图谶，而云，“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

〔注一八二〕律历并称，由来已远。故史公云“建律运历”，班氏云“推历生律”。《世本》及《晋书》律历志云，“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车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述而著焉，谓之调历。”此言历数起于黄帝。由此而有法天行事之观念。而尧舜禹之禅位，皆以“天之历数在尔躬”为言。殷周以来，律历之事由太史掌之。汉初张苍以明律历为丞相、御史。其后司马迁父子为太史令（称太史公者，乃当时太史官之通称）。《后汉书》百官志云：太常掌祭祀礼选试博士，内有（一）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及时节禁忌；记灾异，太史待诏卅七人，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舆宅，四人日时，筮三人，又禳九人，请雨、医，各二人等。又明堂灵台丞一

人，掌候日月星气；又明堂待诏四十二人，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等。此外，（二）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教弟子，又秘书监掌图书。（三）太祝令掌读祝及迎送神。（四）太宰令，（五）太子乐令，（六）高庙令，（七）世祖令，（八）先帝陵令。

〔注一八三〕八音指乐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五声指音阶：宫，商，角，徵，羽，后增变徵，变宫；或上，尺，工，凡，六，五，乙；即 do，re，mi，fa，so，la，si。六律连同六吕指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即 C，C♯，D，D♯，E，F，F♯，G，G♯，A，A♯，B 之调。《吕氏春秋》古乐与音律篇与《史记》律书均言以十一月黄钟之宫为准及以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之法。管先用竹管，后用玉、铜。自黄钟至应钟各应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十月之律。吕氏之时，毕达哥拉学派亦用三分损益法以定其乐律。（兹录董榕森先生《实用中国乐法》中周代黄钟宫调七音与律位比照图如左。）




《汉书》律历志本于京房刘歆，分五项：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者皆以黄钟为标准。数："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此以六等边形求圆周率法。声：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损益以定商角徵羽及十二律吕，以应十二月之气。度：龠长九寸，围九分。黑黍九十粒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量：容黍一千二百粒。十龠为合，十合为升。衡：百黍为铢，一千二百粒黍等于十二铢，即半两也。此中国度量衡以黄钟管音波之振数为准也。按近世米突制长度原定经巴黎子午线千万分之一而以铂铱棒为准。十九世纪末，米凯孙(Michelsen)谓长度标准须以光波量之。一九二七年，一米突之定义为：镉之一，五五三，一六四．一三波长。（至一九六〇年，再定义为氪同位素 $Kr^{86}_{36}$ 在真空管中辐射线之一，一五〇，七六三．七三波长。）则中国古以音波为准，亦非无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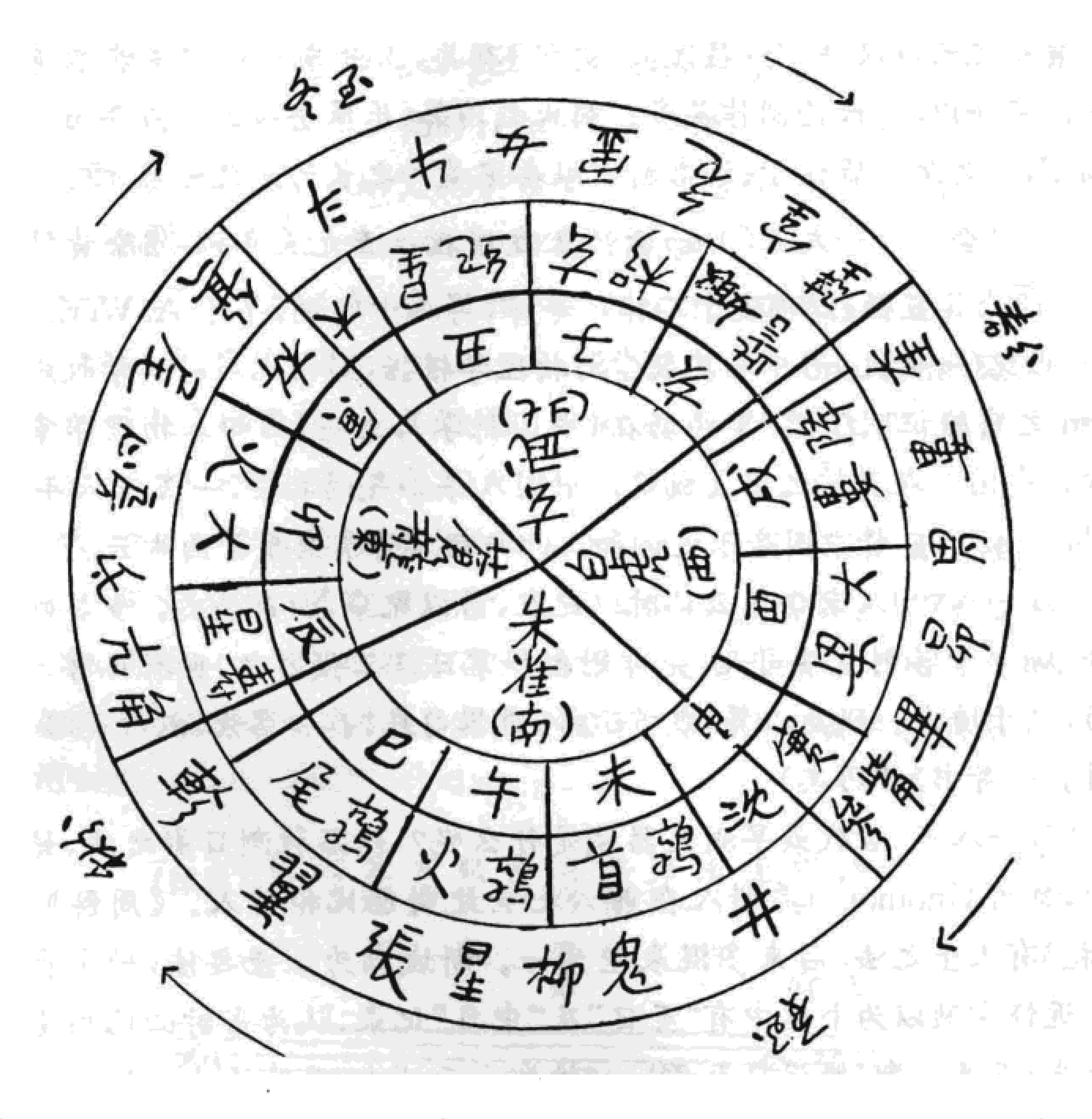
黄钟之长,《汉书》与《吕氏》、《史记》有异,三分损益法亦不能求得正确等律。京房以后,议论制作甚多。明朱载堉著《乐律全书》及《万年历》,依据“试验”,认为历代皆误于《汉书》,以纵黍定黄钟之长为夏尺一尺,重定等律。《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五〇版)云:“朱载堉在一五九五年以$\sqrt[12]{2}$除黄钟之长度,以$\sqrt[24]{2}$除其直径,以确定十二律之等律,得八十四调,早于 A. Werk meister 一世纪(一六九一)。而其数学与物理学根据,则由比利时声学权威 Mabillon 之实验证明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卷物理学章认此等律为中国人在声学之重大成就。中国人早知气动之理,一五五六年 Gaspa da Cruz 已盛赞中国音乐之调和。此与磁学皆有启发于西方云。〕

〔注一八四〕汉末杨伟云,“时以纪农,月以纪事,由来尚矣。少昊则玄鸟司分,颛顼帝喾则重黎司天,尧舜则羲和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历,颁于境内。研桑心算,隶首运筹,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验日月。”(《晋书》律历志)

〔注一八五〕古代最早测天器械是什么呢?以石柱测日影之法,始于巴比伦,称为 Gnomon。希腊人在前六七世纪由巴比伦传入。《周髀》有表,《周礼》有土圭之法,后来多混表圭为一。新城以为土圭之法,始于春秋中叶。近饶宗颐以为卜辞中有“至日”及“中日”记录,认为当时必已用圭(《大陆杂志》五卷三期《殷代日至考》)。按郑众云,“圭,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周礼》地官郑注引)。能田据之,以为表为 Gnomon,而圭不同,乃度日晷之影者。《周髀》之表,乃合二者而言。又古代之碑,亦“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仪礼》聘礼郑注)。髀碑二字,当为同源。《尧典》之测昏中,《诗》大雅“既景乃图”,鄘风“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皆为测景之事实。《左传》僖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即八节),以及《周礼》、《礼记》春夏秋冬之加孟仲季等,皆测日晷消长而来。然则立表或早在尧舜之时,而测影之长短,因而勾股之术,始于周代乎?至春秋战国有漏刻,而汉代有浑天仪及漏水转浑天仪矣。

〔注一八六〕能田指出,现在测角法,为△=−23°.66,负号表示太阳在赤道之南。由于中国分为三六五度又四分之一,而非三六〇度,中国一度相当于 0°98563,故所测廿四度之赤黄交角,实正确至极,亦中国独创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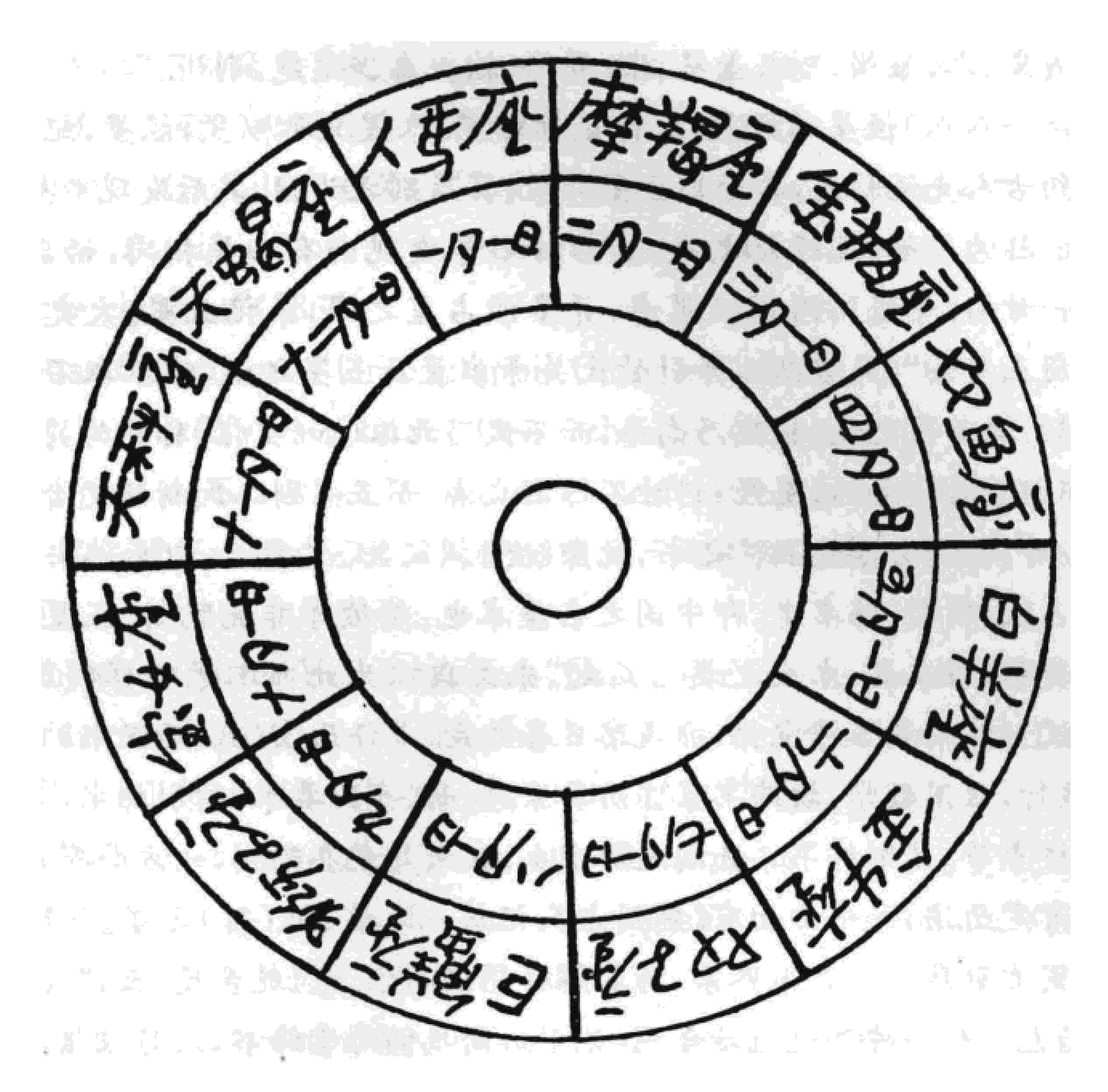
〔注一八七〕尧典始记四中星,及二分二至。四中星者,星鸟,即朱鸟中之鹑火;星火,即苍龙中之大火;星虚即玄武中之虚;星昴,即白虎中之昴。




此在西方星宿之名称如下：鸟——$\alpha$ Hydrale；火——$\pi$ Scorpii；虚——$\beta$ Aquarii；昴——$\eta$ Tauri 或 Pleiades。

古经传常言中星。朱子云，“中星，或以星言。盖星适当昏中，如星虚，星昴是也。星不当中，而适当其次者则以次言，如尾火是也。次不当中而适界于两次之间者，则以象言，如星鸟星火是也。”此四星皆辰，宿，即恒星。其后数目逐渐增大。《夏小正》及《诗》有织女，参，毕，牵牛，箕等。《论语》有北辰，匏瓜。《左传》、《国语》有营室，辰，角，且以辰配龙，“龙，宋郑之星也”(《左》襄廿八)。《尔雅》提到十九宿十二次。《月令》有廿五宿（唯牛、女、室、壁、觜、星，称牵牛、婺女、营室、东壁、觜觿、七星；鬼作弧）。《淮南子》言廿八宿。至《史记》廿八宿之宿名齐备，其与四陆四兽（玄武在地指龟）十二次之分配如六三八页图。

《月令》、《吕览》、《淮南》对十二月日缠之昏旦中星，《汉书》律历志复对廿四日气日缠之初中终，有详密记载。如：“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




初，冬至（夏十一月商十二月周正月）。终于婺女七度。”此春牛之由来也。（古历冬至在建星即斗星，后四分历即复建斗。）

按巴比伦人分十二宫。其作境界标示用之土砖，记有十二宫中之形象者，发现甚多，其时间约前一一七〇——七〇〇年。完全记有十二宫者，约为前九世纪之物。其名称如六三九页图。

至前一二二——一〇〇年，巴比伦文献中，可发现廿四至四十个星名。然认为有廿八宿者，皆想像之说。唯印度确有廿八宿，且与中国大同小异。又波斯希腊以白羊为春分节，有白羊胜节。

分野之说，《国语》、《左传》中已有之（如《周语》伶州鸠之言）。但两书写定在战国初，分野说亦恐系后世追记。至少分野说之系统化当出于战国初。《淮南》，《史记》，《汉书》均有分野画定，唯多少有异同。《晋书》天文志谓范蠡，张良，京房，张衡，诸葛亮，陈卓皆云：“角、亢、氐、郑，兖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斗、牵牛、婺女、吴、越，扬州。虚、危、齐，青州。营室、东壁、卫，并州。奎、娄、胃、鲁，徐州。昴、毕、赵，北冀州。觜、参、魏，益州。

东井、舆鬼、秦，雍州。柳、七星、张、周，三辅。翼、轸、楚，荆州。”

〔注一八八〕恒星称经星，五行星称纬星。木星又称岁星，经星，纪星，应星。大约古人先泛称星，其后别巨星为辰。其后别之为宿。其后发现木星运动有常轨，称为岁经，及经纪之星。其后甘石等发现尚有四星相同，始合为纬星。今传甘石《星经》，乃说恒星者，并多涉占星之事，未记五星。太史公云，“甘石历五星法”（天官书），并引甘氏关于岁星及五星之说，唯不取石氏；而《汉书》则取石氏之说。甘氏乃南派，而石氏乃北派（如《史记》称参为罚，张为七星即由于此）。大约《星经》仍甘石综旧文者，而五星则二氏新研究者。故除《星经》外，当尚有专论五星之书，此即《史》、《汉》天文所记，以后纬书所本，《开元占经》所引。纬书者，即中国之占星术也。然彼等非凭臆断。五星之名，如岁，荧惑，当本名，木火之类当后起。朱文鑫以为此亦本于观察（《历法通志》）。汉世纬书虽多涉灾异，亦观察日晷之景，以评历法（见《后汉书》）。观察五星运行，必用数学，故纬书家亦历算家也。而《齐民要术》所引纬书，多涉农令，种植季节。然则纬书又民间之历书也。汉末刘表在荆州，一方面有宋衷集七历，考定历法；另一方面有《荆州占》，记瑞、客、流、妖（彗）之星。然即事占星者，固亦勤恳之天象观察家，特其解释错误而已。又《乾凿度》云，“太素者，质之始也。”此与彼等说地动合观（见下），则我们对于纬书，应另眼相看了。

〔注一八九〕中国历史最完整，对于天象记载亦最完备。除以上所说《尧典》、《夏小正》、《月令》外，历法、星图，均以中国最古。其次关于日食、彗星、流星、客星之记载，亦以中国最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七，经中外学者考校，确实无误者凡卅三，为世界最古之记录。孛名始见春秋，书于经者三，彗之名始见战国，载诸史者九。两汉彗孛凡廿九。客星凡廿一。鲁文公十四年（前六一一）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西人（如 Williams，“Chinese Comets”）均谓为哈雷彗星最古记录。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此为流星最古记载。鲁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此为陨石最古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客星见于房。此为客星记载。其次关于日斑之记载，亦以中国最早。《汉书》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日中黑气大如钱。至《明史》，日斑记载凡一百有一。西人有望远镜始知之。美国海尔（Hale，“The Depth of the Universe”）云，“中国古人测天之精勤可惊。日斑观测远在西人前约二千年，史载不绝，且颇确。独怪西人在此长时期何竟无一人注意及之。直至十七世纪应用远镜，方才发见，不亦奇哉！”（朱文鑫《天文考古

录》)。因此,不仅是天象史之资料,而且可以星差原理,考证古书年代了。

西洋专门研究中国天文历法者,有下列古典著作:

Antoine Gaubil(宋君荣):“Traite de I'astronomie chinoise”(1732)

Jean - Baptiste Biot:“Etudes sur I'astronomie indienne et sur I'astronomie chinoise”(1862)

Gustaff. Schlegel:“Uranographie Chinose”(1875)

Alexander Wylie:“Chinese Researches by Alexander Wylie”(1897)

Leopold de Saussure:“Les origines de I'astronomie chinoise”(1930)。

而记录研究一般天象历史及推算交食及天象周期图表的天文年代计算之书有:

Theodore Ritter Von Oppolzer,“Canon der Finsternisse”(1887)

Friedrich Karl Ginzel,“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logie”(Bd Ⅰ,Ⅱ,Ⅲ,1906—1914)

P. V. Neugebaure,“Astronomische Chronologie”

“Tafeln Zur Astronomische Chronologie”(Bd Ⅰ,Ⅱ,Ⅲ,1912-1929)

D. Simon Newcomb,“Reaserches on the Motion of the Moon”(1912)。

自西法传入,据以研究天象史者清代有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徐发,江永,戴震,秦蕙田,雷学淇,李锐,俞正燮,林春溥,阮元,孔广牧,成蓉镜,姚文田,王国维。日本有饭岛忠夫,新城新藏,能田忠亮,平山清次。最近我国有朱文鑫,董作宾,高平子,程发轫,鲁实先。

戈比(汉名宋君荣)以《尧典》天象合于前一七〇〇——三九〇〇年代。毕阿以前二三五五年为尧即位年。毕阿倡廿八宿起原于中国,而韦伯(Weber)倡印度起原说。其后巴比伦说大盛。其后西人多以中国文化,源于西方。日人饭岛以儒家经典,皆公元前三〇〇年受希腊影响而编者。新城起而驳斥之。他通新天文学,而能精研中国历史,故能在天文学史上画一新时期。其贡献有三:

其一,证明中国天文学是独立创造的。巴比伦有十二宫,并无整齐之廿八宿,只有二四和三六之数。印度廿八宿,颇与中国类似,但以大角代角,以牵牛、织女、匏瓜代牛、女、虚,而数亦不定。又牵牛,织女,实不当黄道。故新城以为印度之廿八宿,乃由中国传去,后中国加以整理,改为河鼓婺女,而

印度仍保存中国之旧。他以为中国廿八宿之成立，当在周初汉水上游，而与朔字使用同时，由中国传于印度及波斯的。廿八宿之名大半可解，无外来之痕迹。中国纪年法之自动进化，至为显然。古岁名摄提格十二个，半数可由中国语原说明，非外来语。至于中国历法星图均在希腊罗马之前，更无待言。而中国之月蚀周期，亦与巴比伦不同。

第二为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上古年代，从来只有概数。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尽心，孟子活动时约前三三〇。)古经传记武王伐纣，有十一年十三年之说(洪范为十三年，书序为十一年)。而十一年与十三年，究系文王受命起算或武王即位起算，亦说不一。太史公云，"文王受命七年崩，十一年伐殷，十三年武王崩。"就史公系统，伐纣之年应为前一〇四七年，刘歆作《世经》则推为前一一二二年(《汉书》律历志附《世经》)，此今日一般所用。然其时有殷历，推算不同。张衡以为《世经》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来出现之竹书及皇甫谧之推算，亦不同。

林春溥《古史考年异同表》统计武王伐殷之岁，有以下诸说：

| | | | |
|---|---|---|---|
| 竹书 | 前一〇五〇 | 诗正义 | 前一一三〇 |
| 史记 | 一〇四七 | 通鉴前编 | 一一二二 |
| 帝王世纪 | 一一一六 | 又清李锐 | 一〇七〇 |
| 三统历 | 一一二二 | 林春溥 | 一〇五一 |
| 大衍历(僧一行) | 一一一一 | 姚文田 | 一〇六六 |
| 通志 | 一一二二 | | |

查刘歆(三统历)所用方法有四：

一为岁星位置。周语，"昔武王克殷，岁在鹑火。"

二为月相及日干。如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霸癸巳。"

三为年次序列。如据二记《文王世子》篇，而推"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

四为王公积年。此据鲁历推算。

新城认为刘歆方法极为妥当，今日亦不能外之。唯材料有问题。他根据王国维之《生霸死霸考》、《竹书纪年》以及金文材料，定为一〇六六。其是非自尚可议，但一行说亦非定论(董作宾从一行说)。

第三为春秋长历之研究，并考汉历异同，以推论战国秦汉历法。如是再

造一个中国历法之历史，并证明《左传》、《国语》非刘歆伪作。他以为春秋中叶已用冬至标准历，略为十九年七闰，以前五九六年为历元之四分历殆已成立，他称之为殷历古法。至战国中叶，即前三五六年左右，恢复正月之夏正，以前三六六年为历元，此即后来之颛顼历，用至汉初者云。

其弟子能田忠亮应用其方法，对考据知识更过其师，进而考《尧典》以来之历法。又以中国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与巴比伦三六〇度不同，为中国未受西方影响之证。他们能利用西洋方法，中国材料，所以成就过于西人。其所说自不一定皆对，但其方法是可取的。

〔注一九〇〕埃及、波斯、罗马历皆太阳历，巴比伦历、犹太历、希腊历、印度历、中国历、回历皆太阴历。然除回历为纯阴历外，其他皆酌采阳历。尤以我国之历为然。西方自儒略历后，一五八二年格里高修正之，为一劳永逸计，凡世纪数可以四除尽者，二月为二十九日。此即现行阳历。现德人倡世界历。一年三六四日，五十二个星期，星期日固定。平年多一日，闰年再加一日，不列星期。也许很便利，然习惯亦问题。

〔注一九一〕《诗经》小雅《十月》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除郑玄以为厉王时外，自来中外学者，皆以为幽王六年(前七七六)之事(阳历十一月三十一日)。伯希和始以是年确有日食，然镐京未必能见。德人Hartner，日人平山，以为应系平王三十六年(前七三四)。然以下四篇之诗，又确系西都时代之诗。此《诗经》问题之一。参看能田《诗经之日食。》

〔注一九二〕我国"历史"其所以自尧舜以来记载渐多者，亦即因自是以来历法逐渐进步之故。尧舜以来，"天之历数在尔躬"，"观象授时"，是我国大事。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成为征诛之藉口，伏生马融以三正为子丑寅，郑玄以为天地人。近人多否定之。我以为三正即正年月日，《舜典》所谓"协时月正日"者即是。《左传》"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文元)，亦即其意。到了周代以后，才有后来三正之说。纪年月日之法，今日皆用干支。这是历法完备的结果。江永尝谓"春秋历术甚疏"。孔子说到"司历过也"(《左》哀十二)。孟子云，"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关于古代中国纪年月日时之法，略记如下，以为阅读古书之便。

一，纪日。殷人以旬，先用十干，后用干支。周人初用四分法。据王国维《生霸死霸考》：

| | 初吉 | 既生霸 | 既望 | 既死霸 |
|---|---|---|---|---|
| 继承大月 | 二日至<br>八日 | 九日至<br>十五日 | 十六日至<br>廿二日 | 廿三日至<br>一日 |
| 继承小月 | 三日至<br>九日 | 十日至<br>十六日 | 十七日至<br>廿三日 | 廿四日至<br>二日 |

但旬法通行已久，终不见用，其他经传所记日名大抵如下(据朱文鑫)：

| 阴历 | 名称 | 阴历 | 名称 | 阴历 | 名称 |
|---|---|---|---|---|---|
| 一日朔(月始苏) | | 八日 | 恒 | 十六日 | 生魄 |
| 二日 | 死魄 | 八日 | 上弦 | 十六日 | 哉生魄 |
| 二日 | 旁死魄 | 十四日 | 几望 | 十七日 | 既生魄 |
| 三日 | 哉生明 | 十五日 | 望 | 廿三日 | 下弦 |
| 三日 | 朏(月出) | 十六日 | 既望 | 卅或廿九日 | 晦 |

干支纪日自汉始。现行干支纪日，以乙酉为一日，丙寅为二日。

二，纪月。十二支原称十二辰，大约初为殷人纪月符号，其后仍用序数，而以一月为正月。三正之说殆起于春秋战国之际。汉以寅为正月，并用支纪之。然通用序数。

三纪时。《尧典》有日夕昏旦。殷人有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后有妹(昧)兮(曦)明，朝等名(董作宾)。一般经籍，有朝、暮、日中、日昃、日晡等。《周髀》有表漏。即其时代有问题。《史记》司马穰苴传记"立表下漏"，则春秋时代记时之术(刻漏)已具。《左传》，"日有十时"(昭五)。《淮南子》有晨明，朏明，旦明，等十五时。《史记》历书"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此十二时记载之最早者。《周髀》下卷有十二辰及《加时》，三统历用之。至汉，漏刻既精，有刻分之制。一日夜十二时，百刻，一刻十分。夜半为子正。唐代分一日夜为十二辰，一辰五刻，一刻一百零一分余。此外有更点制。所谓甲夜一夜，犹后世之一更，二更，共五更，更之五分之一为点。至清始"以西洋法数，纳大统规模"，以子正为零时，丑初为一时。

四，纪年。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先用岁星所在之次纪年(鹑火等)，后用太岁(岁阴、太阴)纪年。盖岁星并非整整十二年一次，又与十二辰之次序相反，乃用岁星所在之次之反对方向为假定指标，称为太岁(或岁阴，太阴)；如太岁在寅。但用干支异名，以免混乱，如摄提格等。其后刘歆设计超辰法，

盖测得每一四四年岁星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以次纪年，将一百四十四年而多一次，因创超辰之法。（如第一年岁星在子，太岁为丑，第一四四年，星岁过酉在申，太岁亦超辰而为巳）。但刘歆死后未用，而由此过度到干支纪年法，即脱离岁星也。此干支异名常见古书。列表如下：

| 岁　　名 | 太岁所在 | 岁星所在 | | |
|---|---|---|---|---|
| | | 十二辰 | 十二次 | 廿八宿 |
| 摄提格 | 寅 | 丑 | 星纪 | 斗　牛 |
| 单阏（蝉焉，亶安） | 卯 | 子 | 玄枵（天鼋） | 女虚危 |
| 执徐 | 辰 | 亥 | 娵訾（豕韦） | 室　壁 |
| 大荒落（大芒落，大荒骆） | 巳 | 戌 | 降娄 | 奎　娄 |
| 敦牂（大律） | 午 | 酉 | 大梁（大棣） | 胃　昴 |
| 协洽，业洽，汁洽 | 未 | 申 | 实沈 | 毕觜参 |
| 涒滩（芮汉，涒滩） | 申 | 未 | 鹑首 | 井　鬼 |
| 作噩（作鄂，作谘） | 酉 | 午 | 鹑火 | 柳星张 |
| 阉茂（淹茂） | 戌 | 巳 | 鹑尾 | 翼　轸 |
| 大渊献 | 亥 | 辰 | 寿星 | 角亢氐 |
| 困敦（困顿） | 子 | 卯 | 大火 | 房心尾 |
| 赤奋若 | 丑 | 寅 | 析木 | 箕　斗 |

| 支 | 月名 | 月序 |
|---|---|---|
| 寅 | 陬 | 正月 |
| 卯 | 如 | 二月 |
| 辰 | 寎 | 三月 |
| 巳 | 余 | 四月 |
| 午 | 皋 | 五月 |
| 未 | 且 | 六月 |
| 申 | 相 | 七月 |
| 酉 | 壮 | 八月 |
| 戌 | 玄 | 九月 |

（续）

| 亥 | 阳 | 十月 |
| --- | --- | --- |
| 子 | 辜 | 十一月 |
| 丑 | 涂 | 十二月 |
| 干 | 岁阳 | 月阳 |
| 甲 | 阏逢 | 毕 |
| 乙 | 旃蒙 | 橘 |
| 丙 | 柔兆 | 修 |
| 丁 | 强圉 | 圉 |
| 戊 | 著雍 | 厉 |
| 己 | 屠维 | 则 |
| 庚 | 上章 | 窒 |
| 辛 | 重光 | 塞 |
| 壬 | 玄黓 | 终 |
| 癸 | 昭阳 | 极 |

顾亭林云“甲至癸十日，寅至丑十二辰，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太初元年，年名焉逢（阏逢）摄提格，月名毕聚（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

〔注一九三〕西洋最初研究中国数学史者，为一般汉学家，但非专门研究。一九一三年日人三上义夫著《中日数学之发展》（Mikami，“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在德出版。翌年与史密士合著《日本数学史》，是以西洋文字系统论及中国数学著作。三上尚有《中国算术特色》及小册《东洋思潮：数学》。钱李诸人之作，惜未有译为外文者。

〔注一九四〕据史密士云，阿拉伯人之五，略似〇，故以点代圈。在十六世纪，仍用38ᑕ9代〇。但即以史氏所收印人数学符号，印人之七，九，六，亦均似〇，而喀什米尔人以〇表一，以表零，尤可注意。又无忧王后，其一二作| ||，塞种一，二，三，四，作| || ||| ×，贵霜作一，二，三，零皆作♉，而廿有作〇者。而佉卢文以| || ||| |||| ||||为记号。此均表示中国之影响，而〇不一定为印度之发明。

〔注一九五〕《立成算经》，现存伦敦，李俨初次刊入《图书季刊》一卷四期，后收入《算学史论丛》。

按中国河图洛书，早作圈点。又投壶之礼，以“中”盛算器，上有圆圈盛算（《礼记》投壶注）。历算之算，本作筭，而通作筭，后来才作算。

唐人用大写之壹贰，又用㊊表月字，⊖表日字。贾宪（十一世纪）《立成释锁》平方立方法，其数字外均加〇，即象棋子式之算木也。

〔注一九六〕三上《中国算学特色》谓，据云十一世纪司马光为首先用〇者。虽然如此，三上以为仍迟于印度，故虽对于谁先用〇，表示疑问，仍倾向于印度之说。我不知其司马光用〇根据何在，如指《潜虚》，其中确有＋－×＝之数学符号，且有大圆圈，但其意义不同。不过邵雍学生张九成在《皇极经世索隐》中，用了四种符号——●，〇，▌，▯，极可注意。因印阿人亦有以▯为零之符号也。而如果了解印度在十二世纪仍圈点并用，而秦九韶未必是第一个用〇的人，则此事自大有研究之余地。更重要的，是中国有〇之传说，而印度没有。除文中所说种种外，试以货币为例。中国自秦以来，钱皆外圆中方（象天地），适为圈形；而各国皆浑圆，即一大点。又自河图洛书后，中国道教徒喜欢画圈点。讲《参同契》的人有水火匡廓圈，三五至精图，至少唐代有之。由此一面到太极图，以圈点讲哲学；一面将圈点和数字刻于算木，代替空位与筹；实甚自然。我将此类意见告诉友人徐复观先生，他说查阅古陶器图案，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圆圈，而各国皆无类似情形。这都可给我们以思索此一问题之资料。

〔注一九七〕《九章》中之社会经济史料，如云：漆一斗三百四十五钱，缣一丈一百一十八钱，素一匹六百二十五钱，牛金两半，承价九百，羊一百五十，犬一百，鸡七十钱，酒一斗五十钱，金一斤六二五〇钱等。又一人一日耕三亩，女一人一日织二尺五寸，一人三日为瓦三十八枚。凡此之类，虽系设算，当去实际不远。又利息三分，可谓甚高。又工程堤防，对柔土坚土，皆有计算，此西方所无者。又米麦交换，制酒制豉比例，亦有标准。又李俨《中算史论丛》有文论刘徽重差。

〔注一九八〕宋代一多方面天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云，“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叀术。叀之形象，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数缀之而已。”案：叀读专，当指几何作图之属；缀术在中国渐失传，然日本传之，乃级数论及微积分也。

参看泽田吾一《日本数学史》。

〔注一九九〕殷人尚巫鬼，亦甚艺术。今殷虚掘出之牛鼎，石刘鸟兽，均见其宏大之致，铜人面亦值注意。铸铜术之精，尤不待说。诗《那》及《烈祖》，可想见其乐舞状况。柳诒徵谓周人辟雍，或亦仿自殷制。唯周人以殷为鉴，初较质朴。而在文化上，如在艺术上可见者，初亦较殷人为低。但他们终能吸收殷人文明而为创造。在艺术上发展图案和装饰作风，在文学上尤留下更大的足迹。大概言之，周人是承继夏人，而楚人则是承继殷人传统的。这两大传统终于在汉代完成完全的融合。

〔注二〇〇〕世以为文学批评始《典论》，实则始于扬雄论辞赋。《典论》分文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四科"；亦汉世已有体裁。陆机《文赋》增碑、颂、论、说，同时挚虞之《文章流别》为第一部总集，即昭明之所本。然固皆主"以文传意"也（范晔语）。厥后唐人编《古文苑》，分为赋、诗、书、对、状、颂、述、赞、铭、箴、杂论、记、碑、诔、颂。至《唐文粹》、《宋文鉴》仍以赋诗居首，论文次之，碑铭传记书序墓志居后。列仙列异，所谓小说者，汉人开始，但至唐人始视为文学也。

章实斋云，"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战国如改为两汉，似更妥。有一事须于此指出者，即中国文语之距离，亦由两汉日远。本来文语绝对一致，乃各国所无。而我国所以距离最大者，即我国语言变动甚大，而文字变动甚小。而这相差是渐进的。胡适以为此一分离起于战国，其实恐怕还要早。但剪刀之状态之形成，实在西汉。盖西汉为夏楚两地口语大混合时代。西汉初的乐府，谚语，自系语体。但与西汉末王褒《僮约》，颇有距离。这表示西汉首尾口语变动甚大。而将太史公与向歆父子及扬雄的文章加以比较，史公殆当时半文半语之体，而后者为一种纯文体。到了东汉，王充代表半文体，而班固为纯文体。此后语言因五胡之乱，变化更大，而魏晋以来的文字始终保持东汉之规模。所谓骈文之体，实由东汉人开始；连珠则其有意的形式，蔡邕已开始。这是我国言文分歧之真正原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体之变动较小，终于也限制了语言的变异。时至今日，渐渐又再走到一致之路上。

〔注二〇一〕汉代艺术亦是南北艺术之会合。自春秋至于战国，中国艺术中心有三：一为洛阳，现在洛阳出土所谓"先汉镜"，已用金银镶嵌之法，均极精美。淮北亦有之。二为齐地，此为纺织中心，风俗颇奢，绘画发达。汉

代壁画亦多出山东。三为楚,除壁画外,又为漆器中心。抗战时长沙出土楚墓漆器(大约怀王时代),有云气之图案,彩色风俗画,其水准已极高。楚人之于中国文化,犹希腊人之于西洋文化。三者会合,使汉代艺术达到甚高水准。汉代因铁器发达,铜器艺术以汉镜为主,改过去之平面镜为凹面镜。而在各种图案及彩色画,则是楚风。齐地据服虔云,"游子乐其俗不欲归"。有一种淫画,恐起于齐。《汉书》广川王去(武帝侄),好画,亦淫暴,其后其侄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姊妹饮,令仰视画。废徙房陵。"此旁贝风光。唯罗马人不以为罪耳。

汉世绘画终以楚地最发达。《吴志》,三国时曹不兴善画,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刘惇传引《吴录》)

〔注二〇二〕西洋论中国文化史者,于文学哲学无可观,然于中西交通、天文,则因有新方法、新材料,实不可不知。而美术亦然。盖中国藏美术品者不一定有知识,而有知识者不一定能藏之见之。加以近百年间,中国名物,多已"出洋",此西人所见,反有逾国人也。除上注之书外,下列诸书,俱为西人论我国美术名著:

Laufer, Berthold,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eology & Religion", 1912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1909
"Chinese Grave Sculpture of the Han Period", 1911
"Archaic Chinese Bronze", 1917
"Chinese Clay Figures", 1914
Koop, Albert J., "Early Chinese Bronzes", 1924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1930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Ferguson, John C, "Outline, of Chinese Art", 1949
Bushell, Stephen Wootton, "Chinese Art", 1904
Munsterberg, Oskar,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von Oskar Münsterberg", 1910
Siren, Osvald,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4 volumes), 1929—1930
Tizac, Ardenne de, "L'art chinois classique", 1926

Kummel, Otto, "Die kunst Chinas, Japans, und Koreas", 1929

Trever, Camilla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1932

Binyon, Laurence,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1908

Fairbank, Wilma, "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 1942.

日本论中国美术史者甚多,其中以滨田耕作、大村西崖、伊东忠太之书最著名,而梅原末治之于中国古镜,关野之于建筑,原田之于缯绢,小山之于陶磁,均有著述。

〔注二〇三〕襄楷上书桓帝云,"前者宫崇献于吉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陛下乖其道。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今陛下淫女艳妇,奈何欲如黄老乎?"按于吉书即《太平经》,大抵为神仙家言,中杂咒语。而襄楷所传浮屠,则本《四十二章经》。此乃就阿含经抄译而成,大抵以离欲清净为主,有十善十恶,尤以财色二者为刀刃。有云:"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又云"树下一宿","革囊众秽。"由襄楷之言,则至迟桓帝时已有译本。又孙策时,有一道士于吉,当另一人,或冒其名者(犹东西汉皆有王乔,以下别称后于吉),为孙策所杀。孙策并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烧香,读邪俗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亦可见交州佛教之影响。曹操盛招方士,有甘始,左慈,郤俭。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言之,傅玄、张华亦言之。植云,"甘始本师姓韩,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擘背出脾,欲食少而弩行也。"则西域方术亦早于汉末流传于交州或凉州矣。

〔注二〇四〕《四十二章经》,世传明帝时迦叶摩腾竺法兰译,为佛经入华之第一部。梁任公以为文词华茂,不类汉人,当出东晋。《开元录》言吴支谦亦译《四十二章经》,"辞旨可观"。汤用彤以为殆原有汉译,支谦又重译之,或即现存之本。

中国翻译事业,始于汉晋间之译佛经。初期翻译,固多无名之士。因有"失译"(无译者名)。译本杂出,遂杂伪经。东晋释道安始编《众经目录》,书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引之,而所录之目亦多"失译",而凉土异经尤多,尚有疑经伪经。梁任公分译经事业为三期。汉晋间为第一期,东晋南北朝为第二

期，唐代为第三期。第一期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余部，多小乘；支谶译《般若道行》、《首楞严》诸经，多大乘；支谦则改译《四十二章经》，又译《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朱士行求《放光般若经》而译之。此期最后之健将为竺法护，始译《大品般若》及《法华》。此期以节译为多，翻译文体亦未定。

〔注二〇五〕牟子《理惑论》载《弘明集》。附注《苍梧太守牟子博传》。梁任公亦疑为两晋六朝人所作。谓牟融不曾为太守，其文言及沙门，而据《高僧传》，石虎时王度曾云："汉魏皆禁汉人出家"，安得有沙门。周叔迦作《牟子丛残》，考其中记事，皆符史实，以为太守二字乃后人误加。胡适以为《理惑论》之沙门指外国人，不指中国人。

〔注二〇六〕汉魏禁出家，唯外国人得为沙门。朱士行后，汉人出家者日多。直到东晋，支遁法显，皆称道人。和尚二字，始见《晋书》佛图澄传，石勒称澄为大和尚。《宋高僧传》云："梵云邬波陀那，疏勒云鹘社，于阗云和尚"。《翻译名义集》云，僧伽为众称，沙门为出家通称，义云功劳。邬波遮迦，亲近教师之意，于阗译和尚，又作和阇羯磨，罗什译为力生。按邬波一词，本于奥义书派。以后和尚流行，此亦北派佛教凌驾南派。

〔注二〇七〕后世张道陵，当即张陵之讹。后汉另有一张陵，能作法术，有疑为一人者。其实此乃张霸之孙，蜀人。而"张天师"及张鲁乃沛人。汉初神仙家乃服食派（外丹）。自于吉以后，即有三张。此符箓派。汉末魏伯阳作《参同契》，兼言内丹，说同孟喜虞翻"纳甲"说。此炼养派。三张稍后，有后于吉及甘始、左慈。于吉以符水治病，属于符箓派；甘始讲"吐纳"还童，左慈言补导长寿，则炼养服食派。符箓为北派，炼养服食为南派。后于吉虽被杀，江南人民皆祭之。服食炼养，梁任公合称丹鼎。虽涉迷信，然对救荒、医药、化学，皆有贡献。至葛洪，二派理论合流。晋人称曰"天师道"。此后"道"、"佛"渐别称。唐代以后，至杜光庭而下，及黄冠之徒，专言经典科教，符箓特其一事。（参看《文献通考》论道教典籍条。）

〔注二〇八〕化胡说不始王浮（见注一二三），特至浮而大盛。

〔注二〇九〕中国之道教源于方士。我们知道方士为魔术家，亦即原始科学家。他们常与术数结不解缘。汉代的"道人"研究占星，此后多转入炼丹及医药。然他们研究数学之传统似未中断。佛教徒不重科学而中国科学知识一部分在道教徒，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例如魏伯阳、葛洪、陶弘景、崔浩，以至陈抟之徒等，皆道教徒而为科学尝试者也。这种科学，或前科学，自

有合理与不合理部分。每一步科学知识之扩大，儒者常能摄取其合理部分，此与欧洲哲学家相类；然又常对其合理部分亦概鄙视之，此则有类于教父。此足与道教以打击，而彼等但求模仿佛教，遂亦无佛门龙象，以振作之，终无以自拔。例如《云笈七签》亦有若干医药卫生知识，究荒唐为多。这是很可惜的。但不能根本否认他们在学术史上之作用。近见吴康先生论老庄与道教，谈及此意，甚是。（又李约瑟亦以道教徒近于科学。）

〔注二一〇〕所谓六家九流，要而言之，不外儒墨道。道本楚学，汉人已吸收之。《汉志》论墨家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观此亦可知墨学亦多为汉人所接受，而儒墨之原始区别本不大；墨者殆儒之最保守派也。

〔注二一一〕所引丹培文中西人卒年，与前面对照表，有不尽相符者。盖因有难确考，仅为近似者；西人前后所考定者，亦有不同。所引来源不同，不是错误。

〔注二一二〕加觉里论古代西方诸国数学，大意云："两河流域之人甚长算术，彼等知级数，也许知算盘，但几何学无所成就。埃及人，用石子计算，最高数学书为学者亚美斯所书草纸（Ahmes Papyrus），约出于前一七〇〇年。其中"圆周率为三・一六，有原始之比例知识，及勾股知识。但关于四角形之计算多不确实，而不知任何关于定理知识，分子一成不变。"希腊人在几何学方面有大成就。但在欧几里德以前，资料不足。在后期亚历山大城，三角代数有所发展。但代数也许是由印度得到启发的。希腊人轻视实用算术。欧几里德以后，四百年间，数之理论是停滞的。希腊人之算术算盘是由印度来的。印度人爱好算术。他们是代数发明者。不过，其毛病即为天文学之奴仆且在僧侣之手。"至于罗马人，在哲学科学文学方面只是模仿，而在数学上连模仿之意也没有"云。

〔注二一三〕霍格本提出第二个假设，以为这是中国文字之过。这自是西洋人极易发生的误会。关于这问题，高本汉和顾理雅已说得很好，霍氏不知而已。其实中国最早的时期，即是现在的文字。反之，中国文字是促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因。中国文化发展速度不与进化之早成比例发展者，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利刺激。

〔注二一四〕此据霍格本之表，但关于中国，颇多错误，则加以更正。

〔注二一五〕文化之力量，一表现于创造力，一表现于领导权。此决于三方面：道义立场，有利刺激（需要与竞争），社会之鼓励及知识分子努力之程度。一民族文化如失其道义立场，创造力终必衰竭，则一遇强敌，即难保生存。道义立场包括两方面：不以力压迫他人，亦不为压迫屈服。罗马权势，是完全建立于武力上的。他先在精神上被基督教征服。及武力破产，整个罗马即崩溃。而且一溃而不复生。东比以世界国家与世界教会说文化解体与再生之理论，纵令能适用于欧洲，亦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因中国无教会。中国虽有王朝起灭，整个文化不曾死灭。中国文化能够复兴之故在其本身根荄之深厚，不是通过教会的。中国曾被征服，但文化从未被征服，而中国反因此而大。今日中国还是古代中国之成长。这是中西历史一大不同。在此意义上，中国不曾亡国（王朝之亡不是亡国）。不过，一种文化，黩武固然必败，然不能御侮，那也不成事体。过去中国文化虽因其坚实，未被征服，近百余年在外力积压之下确已趋于瓦解，加以媚外者之合作，决不能说不能长期的强制的消灭之。

〔注二一六〕见上卷六七、九二页。中国历史上之一大特点，就是周代以来，不仅朝廷设谏官，而且承认人民有言论之权。此由《国语》及《史记》周本纪所记召公之言可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听民之言，始能“行事不悖”。厉王禁民言论，终于被逐。虽然没有近世之报纸与评论，但古代之风谣，汉代之乡评，发展为汉代之清议，即是当时之舆论。知识分子之清议，有道义威权。西方过去有元老院之弹劾，有帝王之法律，有祭师教会之处罪与破门，但没有与中国谏官和清议相当的东西。只在近代新闻评论发达以后，才有相当于清议者。如果新闻是现代民主之标志，则清议是中国古代民主之标志。

〔注二一七〕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我即认为，一六〇〇年是中西文化一重要界线。在此以前，世界文化领导权在中国。在此以后，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西欧手上了。然即在十八世纪，欧洲人仍对中国表示礼赞。直至一七五〇年，中国出版之书籍，仍等于世界之总和。自此以后日益悬殊。所以近代中西文化，只隔哥白尼，加利略和牛顿，尤其是瓦特与富兰克林而已。

〔注二一八〕我常说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一二百年，是我们空前未有堕落时代。注二一五所论文化盛衰之理，亦适用于中国，并能解释近代堕落之

故。我们看汉之何以盛，必可以知道今日何以衰。我曾在我之《世纪中文录》中略言此理，并将在本书第三卷近代篇中详论。要言之，首先是明末之腐败造成满清之入关，而满清政权因自私而孤陋之心理——虽然他初期扩大版图与安定民生，均有大功——采取闭关政策，因而落后。其次是因落后引起帝国主义之围攻。第三是因此二者而生的固有文化之解体以及道德与精神之堕落。然问题之中心，依然在知识分子之丧气无力。所以造成知识分子之无气力者，是有政治原因，也有自身原因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失败和压力之下，丧失信心，不自爱重，屈服于外力，以崇洋媚外代替文化之因革损益，乃当代衰落之最内在原因。想先人光烈，当增加我们耻痛；然也应该增加我们的信心和气力，由复古、【洋】化之囚笼解放，走中国人的新的正道与生路。这也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而虽在颠沛之中，精神愈健；虽为此书身心疲困至于头白，仍乐之不疲者也。校完上卷，终以句曰："妄道积污成此局，栖皇自可傲群奴。春秋自此开生面，不枉书成见白须。"

（一九五六年一月校竟记）

# 古代中外文化史对照表

中国史自黄帝建国，五帝以后，三代秦汉以来朝代相传，逐渐扩大其范围。

西方史由两河开先，经苏末人，亚加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新巴伦（加勒底）之王朝。埃及次之，经先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在两河与埃及之伸缩与对抗中，有克列特，赫梯，犹太，腓尼基与希腊之兴起。而总结于四大帝国之兴亡。①亚述帝国一时统治西亚并征服埃及。②新巴比伦与米太合作灭亚述后，波斯人继建帝国，统一西亚。③时希腊已兴，遂有希波战争。继而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埃及均入版图，成大希腊帝国。直抵葱岭，且入印度。对抗希人，印度孔雀王朝起，佛教大盛。④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先分四大部，后为三大部。时罗马已兴，而腓尼基人所建迦太基势力亦盛，与希腊人合作对抗罗马。罗马灭亡迦太基后将希腊帝国一一合并，遂有罗马帝国。此外，⑤希腊帝国先在中亚瓦解，安息大夏独立。安息由萨珊波斯帝国承继。而在中国与匈奴对抗中，吐火罗人入大夏，建月氏帝国与贵霜王朝。⑥东汉瓦解后，五胡乱华，鲜卑突厥代兴。匈奴西迁，引起民族大移动，西罗马帝国亡，东罗马帝国维持至一四五三年。⑦阿拉伯人起，继而法郎克人建国，基回二教斗争，演变为近代世界之诸国。

※下表右方无年代者，意即同左方之年代。

| 公元前<br>四〇〇〇 | 近东最先由新石器进入青铜文化，开始城市革命。两河苏末人开始在乌尔建国 | 公元前<br>三七〇〇 | 仰韶彩陶、龙山黑陶诸文化 |
|---|---|---|---|
| 三〇〇〇 | 苏末人创楔形文及车轮 | | 伏羲氏之世 |
| 二八〇〇 | 埃及先王朝有历法 | | 神农氏之世 |
| 二七〇〇—<br>二二〇〇 | 埃及古王朝，建大金字塔 | 二六九七 | 传黄帝即位有熊 |
| 二三五〇 | 亚加德王萨恭之世 | 二三三三？<br>一二一八四 | 尧舜时代 |

（续）

| | | | |
|---|---|---|---|
| 二二〇〇—一五八〇 | 埃及法老权力瓦解，继而希克索人侵 | 二二〇五 | 禹会诸侯于涂山 |
| 一七九二—一七四九 | 巴比伦王汉姆拉比时代 | 一七六六 | 汤元年 |
| 一五八〇 | 埃及新王朝征北非西亚 | | 太戊之世 |
| 一五〇〇 | 克列特极盛，雅利安人入印 | | 祖辛之世 |
| 一三七五 | 埃及伊赫东之世，赫梯极盛 | 一三八八 | 盘庚迁都号殷 |
| 一二二〇 | 摩西率众离埃及 | | 武丁之世 |
| 一一九三 | 希腊人攻特罗亚 | | 太丁之世 |
| 一一一四 | 亚述王狄格拉毕列塞第一之世 | 一一二二 | 周武王伐纣 |
| 一一〇〇 | 腓尼基人文字 | 一一一五 | 周公摄政（诗书时代之始） |
| 一〇一五 | 犹太扫罗王在位 | | 周昭王之世 |
| 一〇〇〇 | 印度吠陀时代、犹太大卫之时 | | 周穆王之世 |
| 九三三—六〇五 | 亚述帝国 | 八四一—七七〇 | 共和元年平王东迁 |
| 七二二 | 亚述灭诸国及以色列，继而统一西亚 | 七二二 | 春秋编年始（鲁隐公元年） |
| 六八三 | 雅典废王政每年选执政 | 六八五 | 管仲相齐 |
| 六五〇 | 波斯拜火教起、希腊僭主相继出 | | |
| 六二五—五三八 | 新巴伦帝国 | 六三二 | 晋楚城濮之战 |
| 六二五—五四五 | 泰里士 | 五八九 | 晋齐鞌之战 |

（续）

| 五九四 | 梭伦执政 | 五五四 | 子产为郑大夫 |
|---|---|---|---|
| 五八〇—五〇〇 | 毕达哥拉 | 五四六 | 向戌弭兵会 |
| 五五〇—三三〇 | 波斯帝国（亚克美尼朝） | 五五一—四七九 | 孔子 |
| | | 五四四—五四〇 | 周景王初季札周游晤晏婴，韩宣子至鲁观易春秋，又伶州鸠之时 |
| 五七〇—四八〇 | 色诺芬 | 四八一 | 春秋绝笔 |
| 四九九—四七九 | 波希战争 | 四九四 | 夫差败越 |
| | | 四七三 | 勾践灭吴 |
| | | 四四六 | 子夏居西河 |
| 四九五—四三〇 | 贝里克时代，希罗多特，辩者齐诺 | 四五六 | 子贡死 |
| 四五〇 | 罗马十二铜表法 | | |
| 四六〇—四〇四 | 雅典斯巴达之战 | 四〇三 | 周威烈王令韩赵魏为诸侯 |
| 四七〇—三九九 | 苏格拉底 | 三八七 | 魏文侯死 |
| 四八六—三八六(?) | 释迦牟尼 | 三八六 | 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
| | | 三八一 | 吴起死 |
| | | 三七六 | 三家分晋，墨子死 |
| | | 三七〇 | 杨朱死 |
| | | 三六二 |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 |
| 四六〇—三七七 | 希坡克拉特 | | |

（续）

| | | | |
|---|---|---|---|
| 四二七—三四七 | 柏拉图 | 三四二 | 齐宣王立 |
| | | 三三七 | 申不害死 |
| | | 三三四 | 苏秦倡合纵 |
| | | 三二〇 | 孙膑死 |
| | | 三一一 | 张仪倡连横 |
| 三八四—三二二 | 亚理士多德 | 三八五—三一二 | 孟子 |
| 三五九—三三六 | 菲力统治马其顿 | 三六〇—二九〇 | 稷下时代 |
| 三三四—三一三 | 亚历山大东征及其死 | 三六九—二八六 | 惠施庄子著作时代 |
| 三三四—三〇 | 希腊帝国与大希腊风时代 | | 自齐魏相王至汉成帝初 |
| 三四二—二七〇 | 伊壁鸠鲁 | 三四三—二九九 | 屈原，星经 |
| 二六三 | 苦行派之齐诺死 | 三一〇—二五〇 | 公孙龙，别墨 |
| 三〇〇前后 | 欧几里德 | 二五〇 | 邹衍 |
| 三〇五—三〇 | 埃及朴托莱梅王朝 | 三〇七 |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
| 三〇五—六四 | 西亚塞流卡王朝 | 二八四 | 乐毅破齐 |
| 二七二 | 罗马统一义大利半岛（特棱吞之战），同时无忧王亦统一印度 | 二七六 | 封信陵君 |
| 二六四—二四一 | 第一次布匿战争 | 二五六 | 周亡，荀子为楚兰陵令 |

（续）

| | | | |
|---|---|---|---|
| 二八七—二一二 | 亚儿默德 | 二二一 | 秦始皇统一全国称帝 |
| 二四九 | 安息、大夏脱离希腊独立 | 二三九 | 月令、吕氏春秋 |
| 二一五—二〇五 | 罗马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 二四六—二一〇 | 秦始皇之世 |
| 二三六 | 迦太基雷电将军（汉尼拔之父）征服西班牙 | 二三三 | 韩非死 |
| 二一八—二〇一 | 第二次布匿战争 | 二一八 | 蒙恬伐匈奴 |
| | | 二〇八 | 李斯死 |
| 二〇七 | 罗马败哈斯德鲁巴于西班牙 | 二〇六 | 汉高祖元年 |
| | | ？——一五四 | 晁错 |
| | | ？——一二二 | 刘安 |
| | | 一七九—一〇四 | 董仲舒 |
| 一八三 | 汉尼拔死 | 一四〇—八七 | 汉武帝之世 |
| 一四六 | 迦太基毁灭 | 一四五—八六？ | 司马迁 |
| 一四六 | 罗马统一希腊 | 一三八 | 张骞使月氏 |
| 一三三 | 格拉古被杀 | 一三四 | 策贤良文学 |
| 一〇七 | 马留为执政 | 一二一 | 霍去病破匈奴 |
| 一〇五 | 日耳曼人西入高卢 | 一〇四 | 李广利征大宛 |
| 八二—七九 | 苏拉独裁 | 八六 | 霍光摄政 |
| 六〇 | 第一次三头政治 | 六〇 | 郑吉为西域都护 |
| 五八—四四 | 凯撒征高卢，进军罗马及其死 | 一三七—五二 | 赵充国 |

（续）

| 四三 | 西塞罗死 | 五四 | 杨恽死 |
|---|---|---|---|
| 三〇—二七 | 克乐巴死，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始 | 二七 | 汉成帝之世王氏五侯 |
| 一九 | 味吉尔死 | 六 | 刘向死 |

| 公元后<br>九 | 日耳曼人击败罗马军 | 公元后<br>一一九 | 王莽由安汉公而国号新 |
|---|---|---|---|
| 公元前四—后三四(?) | 耶稣 | | |
| 一七 | 李维、奥维德死 | 公元前<br>五三—后八 | 扬雄 |
| 四三 | 罗马征不列颠 | 二三 | 刘歆死 |
| 六四 | 尼禄焚城，保罗彼得死 | 二五—五七 | 光武之世 |
| 五四—六八 | 尼禄之世、与安息和 | 四三 | 马援平交趾 |
| | | 五六 | 倭人遣使入贡 |
| 六三 | 塞内加自杀 | 七一 | 楚王英死(最早祀佛者) |
| | | 八九 | 窦宪大破匈奴，班超为都护 |
| 七九 | 大布林尼死，维苏威火山爆发，罗马竞技场 | 七九 | 诸儒会白虎观 |
| 九八—一一七 | 特拉扬之世东攻安息 | 九一 | 王充死 |
| 一一七—一三八 | 哈德连之世 | 三二—九二 | 班固，与窦宪同年死 |
| 一二〇左右 | 塔西佗、普卢塔克先后死 | 七八—一三九 | 张衡 |
| 一六〇左右 | 天文家朴托莱梅 | 一六六 | 马融死，党锢祸起 |
| 一六一—一八〇 | 马可斯·奥理略之世 | 一六六 | 大秦王安敦遣使安世高来华 |
| 一九九 | 格伦死 | 一八四 | 黄巾起 |

（续）

| | | | |
|---|---|---|---|
| 二一五 | 波斯摩尼生 | 二〇〇 | 张鲁据汉中 |
| 一六〇—二三〇 | 忒滔良 | 一二七—二〇〇 | 郑玄 |
| 二一二 | 卡拉卡拉扩张公民权 | 二〇八 | 赤壁之战 |
| 二二六 | 波斯萨珊王朝立，袄教再兴 | 二二〇—二二二 | 三国分立 |
| 二四一 | 罗马波斯长期战争开始 | 一八一—二三四 | 诸葛亮 |
| | | 一九五—二五六 | 王肃 |
| | | 二二六—二四九 | 王弼 |
| | | 二二三—二六二 | 嵇康 |
| 二六〇 | 波斯摩尼教起 | 二六三 | 蜀亡 |
| 二六八 | 三世纪罗马军人相杀，克劳第乌二世为帝 | 二六五 | 司马炎废魏主称晋武帝 |
| 二八四—三〇五 | 戴克里先之世，罗马分东西 | 二八二 | 皇甫谧死 |
| 二九六 | 罗马波斯战于两河 | 三〇三 | 陆机死 |
| 三〇六 | 君士坦丁立 | 三〇八 | 匈奴刘渊称帝，五胡之乱始 |
| 三一三 | 君士坦丁发米兰敕令，继定基督教为国教 | 三一七 | 东晋元帝立 |
| 三七五 | 匈奴入欧，民族大移动 | 三八三 | 淝水之战 |
| 四〇六 | 万达、阿兰、峨特焚杀高卢 | 四〇五 | 鸠摩罗什为后秦国师 |
| 四三〇 | 圣奥古斯丁死 | 四二七 | 陶潜死（刘宋称帝后七年） |
| 四七六 | 西罗马帝国亡 | 四七六<br>四七九 | 北魏孝文帝<br>南齐灭宋 |

※本书古代篇终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是年曹丕篡汉。西洋古代史终于四七六，故此表截至是年止。